

文革史稿

文革史料彙編

第三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下）

徐志高

世界華語出版社

文革史稿（第三册）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下）

编者：徐志高 (**zhigao Xu**)

封面：密歇根大学珍藏文革剪纸

出版：世界华语出版社（**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发行：谷歌图书（电子版）

电邮：**minellc@gmail.com**

网站：**www.worldchinese.us**

版次：**2016**年**5**月第一版

字数：**450**千字

电子书定价：**19.99**

国际书号：**ISBN 978-1-940266-15-2**

目錄

第一章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	7
第二節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十六條）	15
第三節	毛澤東、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全會的講話	24
第四節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	29
第五節	紅衛兵	38
第六節	8.18 毛澤東檢閱紅衛兵	48
第七節	大串聯	55
第八節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中央工作會議 中央領導講話彙編	85
第九節	兩報一刊	126
第十節	周恩來等人談江青	130
第十一節	周恩來等對聯動頭頭講話	137
第十二節	首都紀念《講話》二十五周年	144
第二章	文革中的武鬥	
第一節	武鬥第一槍	152
第二節	上海文革最血腥武鬥“八四行動”	154
第三節	槍林彈雨	169
第四節	武鬥照片	187
第五節	文革中最慘烈的十大武鬥	190

第三章	上山下鄉運動	
第一節	上山下鄉的由來	201
第二節	全國知青分佈點	207
第三節	一個知青群體的下鄉時間分佈	138
第四節	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模圖	246
第五節	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	256
第六節	一份三十六年前的知識青年工作調查報告	268
第七節	我國知青文獻的計量分析	284
第八節	知青回城的緣起：雲南知青步行數千里上京請願	296
第九節	悲情往事：那些被蹂躪的女知青	310
第十節	1800 萬知青下鄉真相	327
第十一節	緬共知青“紅飛蛾”王曦	340
第十二節	四十年後回頭看—空前絕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352
第十三節	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361
第十四節	知青的感恩人民的懷念	377
第十五節	中國知青館建設與發展	401
第十六節	反映知青經歷作品	404
第四章	全國山河一片紅	
第一節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408
第二節	毛澤東送芒果給工宣隊	413
第三節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416

第四節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間	424
第五節	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436
第六節	六廠二校經驗	468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	
第一節	整黨建黨	472
第二節	中共九大	481
第三節	林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	486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章程	518
第五節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上的發言	524
第六節	中共“九大”軼事	529
第七節	一打三反運動	534
第六章	林彪事件	
第一節	緊急會議	569
第二節	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	571
第三節	六號簡報	579
第四節	林彪出走的中央通知	589
第七章	最後的歲月	
第一節	“十大”準備工作	601
第二節	中共“十大”	606
第三節	“十大”政治報告	611
第四節	黨章	625

第五節	王洪文修改黨章報告	630
第六節	批林批孔文件	636
第七節	全國四屆人大	648
第八節	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	679
第九節	文革期間的文藝	685
第十節	文革各地區群眾組織匯總	718
第十一節	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研究	733
第十二節	文革中的中央委員	749
第十三節	文革中死人集中的幾個時期	75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封建政治集體智慧的產物	765
編 後		777

第一章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擴大），簡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擴大），於 1966 年 8 月 1 日—12 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141 人。列席會議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 47 人。

一、簡介

為進一步將“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並使之合法化，毛澤東決定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全會原訂會期為 5 天，議程有 4 項：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三、通過會議公報；四、補行法律手續問題（即 5 月 23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等決定）。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報告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的各項工作，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劉少奇的講話沒有正式文字稿，同時說明，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8 月 4 日，全會發生大的轉折。原定這天開大會，5 日全會結束，但在這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發表了措詞十分激烈的講話，並決定當日不開大會了，各組傳達常委擴大會內容。由此全會改變了原定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8月7日，大字報發表後，全會立即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

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全會討論和批准了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內、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決定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及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的職務；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2人；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的副手和接班人。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後只有林彪被稱為副主席，取消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

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會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很大部分權力，逐漸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所掌握。^[1]

二、全會公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過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舉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進行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出席了會議。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中央有關部門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列席了會議。

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全會討論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內和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

國內

毛澤東同志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當時的形勢作了正確的分析，再一次強調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南。近四年來，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指引下，展開了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人民公社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全國到處是一片熱氣騰騰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現新的全面躍進的局面。

我國的國民經濟正在持續地健康地向前發展。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已經勝利實現。從今年起，開始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戰線上，不但產品的數量，而且品種，品質，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在農業戰線上，連續四年獲得了好收成。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三次核子試驗的成功，集中表現了我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新水準。

近幾年來，在全國的農村、城市和軍隊，廣泛地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國興起。工農兵群眾、革命

知識份子和廣大幹部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開創了勞動人民直接掌握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紀元。

全會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兩個檔，是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下制定的，是我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在農村和城市，應該繼續按照這兩個檔，結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四清”運動，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

全會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這些決策主要的是：

關於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發揚群眾路線的革命傳統的問題，

關於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

關於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號召，

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

關於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問題，

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體系和佈局的問題，

關於全黨抓軍事，實行全民皆兵的號召，

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規劃和部署的問題，

關於人民解放軍和工廠、農村、學校、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都應該成為一個革命化的大學校的號召。

全會強調指出，毛澤東同志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當前我國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

全會認為，搞好這場文化大革命，關鍵在於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就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要敢於革命，善於革命。不要怕出亂子。反對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包庇右派，打擊左派、壓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製造許多框框，束縛群眾的手腳。反對做官當老爺，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

要熱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全會認為，毛澤東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問題，大大加快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勝利，對於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我國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積極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保證我國將來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國際

八屆十一中全會認為，當前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形勢是大好的。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各種政治力量正在經歷著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儘管國際形勢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曲折和反復，但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總趨勢，是改變不了的。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對革命群眾的殘酷鎮壓、瘋狂進攻和收買欺騙，都不能挽救他們

滅亡的命運，相反，只能進一步地促進各國人民的革命覺醒。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所進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正在促進各國人民的革命活動。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貌似強大，實際上是很虛弱的。從長遠看來，他們都是紙老虎。

蘇共新領導集團，繼承赫魯雪夫的衣鉢，實行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他們的路線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偉大的列寧，背叛了偉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背叛了偉大的蘇聯人民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他們咒罵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其實，他們所攻擊的恰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正在聯合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結成一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國的新神聖同盟。可是，這種反革命的神聖同盟，是註定要破產的，現在已經陷於分崩離析。

全會認為，近幾年來，我們黨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所進行的全面的公開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是一個綱領性文獻。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下制定的這個檔，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評論，《評莫斯科三月會議》，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等等，對當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

全會認為，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決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對於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必須劃清界限，堅決揭露他們工賊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們搞什麼“聯合行動”。

全會指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全會熱烈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正義鬥爭，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全會最強烈地譴責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越南戰爭的罪行。全會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國同胞書》，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最後勝利。全會完全同意我黨中央和我國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關於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經採取的措施和將要採取的行動。

全會強烈譴責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在越南抗美鬥爭的問題上，執行假支持、真出賣的反革命兩面政策。

全會認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共同敵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必須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進行分裂、破壞和顛覆活動，積極為美帝國主義效勞。他們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

我們一定要聯合世界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人們，把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進行到底。

我們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把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推向前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八屆十一中全會強調指出，全黨全國大學毛澤東同志著作，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工農兵群眾、革命知識份子和廣大幹部，進一步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使我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證。對毛澤東同志著作，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適用的，應當進一步在全黨全國推廣。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的黨，是毛澤東同志締造和培育的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我們的黨，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有認真的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我們的黨，是經歷了歷史上最激烈、最艱苦、最長期、最複雜的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是偉大的軍隊。我們堅信，在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軍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和障礙，一定能夠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一定不辜負世界革命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八屆十一中全會號召全國工人、人民公社社員、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師生、科學技術人員，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諸方面來的阻力，克服困難，克服缺點，克服錯誤，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陰暗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我們一定要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我們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建設好，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我們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的突然襲擊。如果它們膽敢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七億中國人民，就一定要打斷侵略者的脊骨，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把它們消滅掉。

第二節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

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

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願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

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將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佈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八、幹部問題

幹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鬥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裏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裏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品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份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第二節 毛澤東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關於第九次大會的問題，恐怕要準備一下。第九次大會什麼時候召集的問題，要準備一下。〔1〕已經多年了，八大二次會議〔2〕到後年就十年了。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再開，現在要準備，建議委託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會來籌備這件事，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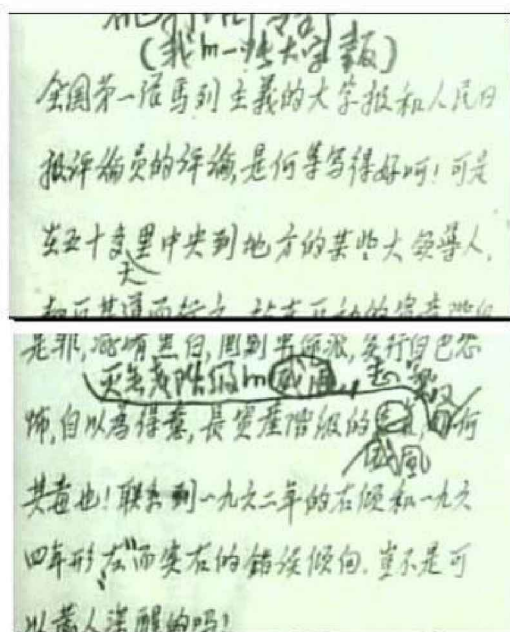
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3〕，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是，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實行，還是要靠我們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群眾路線，還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依靠，一種是不依靠；一種是實行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可能比過去

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並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以及公報的實行。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根據中共中央檔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林彪同志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對待毛澤東思想有兩種人。

一種人拼命學毛澤東思想。有的人學得好，挨打擊。因為那時候管思想的最
高機關中宣部，陸定一那一幫人，上邊還有根子，反對學毛澤東思想，他們污蔑
學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膩了。污蔑立竿見影，說沒有太陽，就見不到影
子。甚至惡毒攻擊，胡說什麼現在學毛著好的人，將來打起仗來，都是漢奸叛徒。
這些黑幫對毛澤東思想充滿了敵視、仇恨。

一種人不學毛澤東思想，處於落後或中間狀態。

對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兩種人。

一種人重視政治思想工作。

一種人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搗亂。

我們的幹部在對待工作問題上，也有兩種人。

一種人有幹勁，工作有成績，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運動中大字報最
多，過不了關，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罷他的官。

一種是老好人，什麼事情也不做，什麼鬥爭也不參加，誰也不得罪，人事關
係搞得好好的，選舉的時候能夠得全票，運動中貼他的大字報也很少。

所以我們對幹部，要來個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我們根據主席講
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了三條辦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條，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第二條，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
的，罷官。

第三條，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

這三條，同主席的五條原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按主席的五條和這三條，特別是第一條，作為識別、選拔和使用幹部的標準。

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那些犯錯誤甚至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只要他們接受教育，堅決悔改，還可以在今後工作中繼續考驗他們。至於那些不可救藥的，就堅決罷官。不這樣，就打不破死氣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顛覆活動的就是他們。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體同志，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臺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主席處理問題，有全盤考慮，高瞻遠矚，還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們是不瞭解的。我們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眾的智慧。就是依靠領袖和依靠群眾。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辦事。大事不幹擾，小事不麻煩。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有時也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麼辦？辦法是朝令夕改，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準、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對中央文革）你們的工作碰到了困難，有很大的困難。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

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佔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變人的靈魂，把舊思想打垮。

我們不是單純從思想著手，一方面從物質著手，發展生產，提高技術；一方面從精神上著手，改造人的思想。生產力主要因素是人。發揮人的因素，就要改變私有觀念，提高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這事，一句話可以說完，做起來要經過反復，經過無數次鬥爭、批判、表揚，在整個思想戰線上進行大的鬥爭，才可能把人改變過來。鬥爭通過許多低級階段，達到高級階段。兩條戰線：物質戰線，精神戰線。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就是搞這條精神戰線的。我們從兩條戰線向前進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在兩條戰線上前進的總火車頭，我們象火車一樣在兩條軌道上前進。不要象修正主義國家只搞物質，那就必然倒退，必然復辟，非出修正主義不可。我們一切工作要由毛澤東思想領先。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這一精神戰線抓住不放，要把這場戰鬥頑強打到底。腦袋裏打了勝仗，物質上才能打勝仗。這絕非小事，是大事。

你們這些同志，這幾個月起了作用，今後還要起更大的作用。當然潑冷水潑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轉過來了。不然大山壓下來頂不住，大石頭擋住通不過。

現在魚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須把魚目和珍珠分開，把珍珠給工農群眾，免得人民見不到文化，見不到光明。魚目混珠，讓他們自己挑選有困難，我們現在要告訴他們，毛澤東思想就是珍珠，大家要負起這個責任。

擁護毛澤東的大字報

陳伯達

完全擁護毛主席八月五日寫的一張大字報。一個共產黨員在大的政治鬥爭關鍵忘記了群眾，忘記了階級分析，看不見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進行鎮壓群眾，

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同無產階級政黨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這樣做，不是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勝利，而恰恰會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失敗，引向資本主義復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黨的領導從最近一兩個月的錯誤路線引向到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上來，這是黨的偉大勝利，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同時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馬克思曾經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由德國首先發動，而由法國來完成。但沒有實現。列寧也設想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由俄國首先發動，而由德國、法國、美國來完成，但也沒有實現。現在的歷史可否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由俄國首先發動，而由中國來實現呢？看現在修正主義蘇聯篡軍、篡政、把蘇聯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那裏從革命走向反動，走向對列寧史達林的背叛。難道這不象人們所說的國際希望在中國嗎？

看種種因素，最關鍵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有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確實是這樣。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我們這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不能使我們新中國在世界上建設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模範國家。

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掃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在我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讓毛澤東思想能夠為最廣泛的群眾所掌握，再而變成更宏偉的力量。我們相信能夠做到這樣，中國的偉大成就將進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來源：1967年8月4日紅代會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紅衛兵主辦《紅衛報》

第四節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是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統治學校17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

有些大膽的反對造反的人，今天突然變得忸怩起來，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麼太片面了呀，什麼太狂妄了呀，什麼太粗暴了呀，什麼太過分了呀。

這統統是謬論！要反對就反對，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麼“人情”呀，什麼“全面”呀，都滾一邊去！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片面了嗎？你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全面呢？看來你們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義。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嗎？我們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說：“糞土當年萬戶侯”。我們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動派，我們還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動派。革命者以天下為己任，不“狂妄”怎麼行呢？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粗暴了嗎？我們就是要粗暴！對待修正主義怎麼能纏纏綿綿，大搞溫情主義呢？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革命的殘忍！

你們不是說我們太過分了嗎？老實說，你們所謂不過分，就是改良主義，就是“和平過渡”。這是妄想！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還有些人，對革命害怕得要死，對造反害怕得要死。你們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縮在修正主義的蝸牛殼裏，一有造反的風聲，你們就神經緊張。這些日子，無情的斥責聲天天送入你們的耳中，你們天天心驚膽顫，你們不感到難受嗎？你們怎麼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孫猴子，金箍棒厲害得很，神通廣大得很，法力無邊得很，這不是別的，正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

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附中紅衛兵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毛澤東

過去，工人打倒資本家，農民打倒地主，剝削階級誣之為造反。無產階級造反的帽子真是光榮得很！

今天，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產生修正主義的東西，都完全消滅了嗎？

沒有！

各地各單位的黑線黑幫現在都完全消滅了嗎？

沒有！

現在消滅了黑線黑幫，將來就不會產生新的黑線黑幫嗎？

不是！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消滅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產階級能不造反嗎？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怎麼能不萬歲呢？

資產階級的右派先生們，我們這群造反之眾，有領導，有武器，有組織，有“野心”，來頭不小，切不可等閒視之。

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

我們的武器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的組織是徹底革命的紅衛兵！

我們的“野心”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紅衛兵難！

資產階級的右派先生們，我們很理解你們的特殊心情：你們被我們專政了，你們痛苦了，你們也想喊一聲“造反”了。

無怪乎，最近出現了左派、右派齊喊造反的怪現象。老實告訴你們，珍珠不容魚目來混雜。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

七月四日

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清華附中紅衛兵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動派說：剝削有理，壓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義統治有理，無產階級造反無理。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最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把這個混蛋理論顛倒過來了。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

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誰個是修正主義，誰個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大造其反！

我們，毛主席最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

對待革命的造反行動採取什麼態度，是鑒別忠實於最高指示還是反對最高指示的分水嶺，是鑒別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

你是革命者麼？你就必然歡迎革命的造反，擁護革命的造反，參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麼？那就出於階級的本能，就必然咒罵造反，反對造反，抵制造反，鎮壓造反。

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飯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天天在造我們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騎牆、搞折衷是不行的！對黑幫，對舊世界，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就得來一場革命的大造反！

一聽革命的造反就心驚肉跳，就皺眉頭，就暴跳如雷，就罵街，就歇斯底里大發作的先生們，不是反革命就是糊塗蟲！

這些混蛋們，只准他們造無產階級的反，不准我們無產階級造他們的反。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真是豈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傳統，是紅衛兵要繼承和發揚的傳統。我們過去造反，現在造反，將來還要造反！只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就要造反！只

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萬年一億年還需要！

目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蕩的大風暴。紅衛兵的戰士們，一切革命的同志們，讓我們像勇敢的海燕一樣在這場大風暴中翱翔吧！

紅衛兵的戰士們，我們既然已經把反造起來了，那麼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讓革命的大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萬萬歲！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四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誓做國際紅衛兵

紅衛兵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造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四舊”之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席捲了全中國，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紅衛兵縱橫三山五嶽，威震五湖四海，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亞非拉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齊聲歡呼，向紅衛兵致以崇高的敬意。

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則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紅衛兵。毛主席教導我們：“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紅衛兵受到國內外階級敵人的起勁反對，這真是光榮得很！

國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注意到紅衛兵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了嗎？紅衛兵的造反胃口很大，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統統都

要反。我們紅衛兵不但要登上國內政治舞臺大演造反劇，還要殺到國際舞臺上，大演造反劇！

美帝和蘇修是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頭子，罪大惡極，是我們造反的頭號物件！

美國佬聽著：我們紅衛兵，既然是兵，就要打仗。我們是英雄的人民解放軍強大的後備力量，我們將是反美戰爭的主人！美帝早已是中國人民的手下敗將。無數事實證明：你們不過是一隻貌似強大的紙老虎。現在，你們已在越南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果你們還不住手，有朝一日膽敢把戰火燒到中國人民頭上，那麼，你們聽著：我們將堅決同你們較量！“禮尚往來，來而不住非禮也”，把你們殺得屁滾尿流，打斷你們脊樑骨的就是今天的紅衛兵！

你們知道嗎？中國誕生了紅衛兵，豈止宣告了國內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死亡，也宣告了你們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種妖魔鬼怪的死亡。我們要自豪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紅衛兵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死刑的執行者！我們將親自參加埋葬美帝國主義的戰鬥！

蘇修是個叛徒，對怕死狗我們百倍的憎惡！蘇修叛徒們，我們給你們的第一個見面禮，是把你們使館面前的“揚威路”改成“反修路”！叫你們認得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反修的，造反的！今天是革命小將，明天是反修大將！你的幹老子——美帝國主義的性命將斷送在我們手中，你們也活不長！

國際資產階級都是在莫名其妙地談論著紅衛兵，老實告訴你們，紅衛兵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爆破手！你們那裏想得到，若干年後，絞殺你們的就是我們這些年輕的紅衛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會主義中國點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之火，必然將燃遍全世界！全世界都要出現紅衛兵！亞非拉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一代，拿起武器，起來造反吧！把壓迫你們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徹底打倒，徹底反掉！不要改良主義，不要折衷主義，不要和平共處，就是要“好戰”！好同反動派大戰！亞非拉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容忍，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造反才有希望！造反才有出路！造反才有解放！造反才有理！你們不是最渴望毛澤東思想嗎？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要革命！要造反！反動派最怕造反。億萬紅衛兵在中國造了反，他們就馬上完蛋了，他們是紙老虎。亞非拉造反的紅衛兵們，全世界造反的紅衛兵們，我們前面有刀山火海，有妖魔鬼怪，但是，偉大的紅色統帥毛主席在指揮著我們，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全世界革命大造反的道路。我們中國紅衛兵永遠是全世界紅衛兵最強大的後盾！

毛主席說：“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

讓一切妖魔鬼怪在國際紅衛兵的革命大造反的面前發抖吧！

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無產階級新世界必將在國際紅衛兵的手中誕生！

國際紅衛兵，天下誰敵手！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紅衛兵戰校紅衛兵（注：紅衛兵戰校紅衛兵即清華附中紅衛兵）

第五節 紅衛兵

一、紅衛兵出世

“紅衛兵”三個字，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十月革命。在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奪取了沙皇的政權，革命導師列寧稱讚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紅色的衛兵。

1966 年 5 月 29 日晚，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對舊的教育制度不滿的學生，在學校裏討論北大聶元梓等七人於 5 月 25 日寫的大字報。卜大華、王銘、駱小海、張曉賓、陶正、張承志等七八名學生，悄悄來到學校附近的圓明園廢墟上集會。他們決定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一個學生提議以紅衛兵名字寫大字報，她說：“紅就是革命，衛就是保衛，兵就是戰士，全意為做一個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堅強戰士、紅色衛兵”。紅衛兵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就這樣誕生了。

當時很多學生簽名表示贊同，大家約定，以後再寫大字報時，相同觀點的都以紅衛兵的名義出現。不久，這種半秘密性質的組織很快獲得了不少學生，尤其是北京高幹子女的共鳴，並迅速地擴大到了首都的其他學校。

隨後，文化革命工作組進入學校，將其宣佈為非法的反革命活動以後強行予以解散。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將不服，並繼續反抗，發表了著名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工作組指責紅衛兵，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造反”是什麼意思？紅衛兵反駁道“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緊接著他們連續發表《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強烈表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而且要一反到底。

6月2日以後，北京地院附屬中學、北京礦院附屬中學、北京石院附屬中學、北大附屬中學及北京市二十五中的學生，積極給與相應，相繼成立了首都最早的一批學生“紅衛兵”組織。

在名稱確定下來之後，他們一起宣讀了《紅衛兵誓詞》：“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稚嫩而莊嚴的紅衛兵，就在這群大的不過19歲、小的只有13歲的孩子們的童音中誕生了。5月29日這一天，後來被看成是紅衛兵組織的誕生日。

紅衛兵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紅衛兵從此在中國大地上無法無天，甚至有的老外也戴著紅衛兵的袖章學紅衛兵運動。有的外國評論說，紅衛兵將是中國長期的青年學生組織，與中國距離最近的香港也爆發了紅衛兵運動，但很快就結束了。老外也是湊熱鬧瞎起哄。

二、 撤銷工作組

毛澤東安全在周恩來了主持的“首都工作組”安排下得到保證後於7月18日返京。在“踢開黨委鬧革命”、“踢開工作組鬧革命”的口號下，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決定》說：“在工作組撤銷之後，大專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在大會上宣讀了北京市委7月28日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分別講了話。

他們的講話錄音當時我在讀的學校也組織了收聽。因為聲音不很清楚。中心思想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陳伯達的福建話沒有一句能聽懂。聽了這一錄音以後各校紛紛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但很少能開展實際工作。但是緊接著的大串聯開介紹信發揮了作用。既然學校中踢開黨委、工作組鬧革命，正常的黨政工作幾乎停頓，也不起作用了。中共中央發了文《關於各單位停止黨組織活動的通知》於是乎學校師生徹底放開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何時恢復組織活動另行通知。

學校沒有組織，沒有工作組的領導，放開了。

三、 血統論

我們先從一份誓言看起：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看看，夠革命吧，夠紅色吧！他們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到過天安門，參加過破四舊，進行過大串聯，至於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飯。他們鼓吹紅色恐怖，私設公堂，私設監獄，嚴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己的同學老師，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許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其實大多出自於他們的瘋狂，他們的正式名稱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1、都是對聯惹的禍

“拿起紙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文革初期，許多高幹子弟連誰是黑幫都搞不清楚就跟著起來瞎折騰。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部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自中國有對聯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幅對聯的影響力能與此聯相比。他不但將當時的社會搞得血雨腥風，甚至穿越歷史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也許還會穿越時空影響未來。對於喜歡民主的朋友們來說，什麼時候能把這幅對聯的影響徹底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來。

2、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聯一出現，就像滾燙的油鍋裏撒進了生水，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出發對它發表不同看法。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辯論圍繞對聯展開了。

1966年8月1日，創作對聯的北航附屬中學學生把對聯貼到北大、清華、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於是，“血統論”對聯在北京迅速傳播開來。凡是對聯出現過的地方，無不發生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有些人甚至累暈過去。但即使這樣，學生們的熱情絲毫不減，青春的燥動與傳統封建禮念的浸潤促使著他們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對聯影響的北京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大會，正式將對聯推向了社會。

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們替他們境遇悲慘的老爹老媽喊出了壓抑已久的聲音：共和國應對功臣們封妻蔭子！這聲音如此強大，以至於社會上引起普遍共鳴，從中央到地方，從孩子到大人，牛棚裏的和牛棚外的，拿槍的、拿刀的、拿筆的、拿暗器的無不躍躍欲試，都想從這幅對聯中爭取到自己的未來。普通學生們管這

幅對聯叫“鬼見愁”，確實是鬼見愁，因為對方的辯論根本不是嚴肅認真的討論問題，只是要你表明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對反對者的處理也很簡單，一個字-----打！

四、中央文革試圖將爭論納入正軌

文革的即定目標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鬼見愁”對聯宣揚的血統論無疑是幹擾了這一目標的繼續執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堅決反對。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我們沒有必要再打已經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動，只要兒子是革命的就要團結他”，他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但經過運動洗禮的高幹子女此時已不比當初，他們已經有了點政治頭腦。剛開始揪“三家村”、“彭羅陸楊”，他們還沒反應過來，路線鬥爭哪次不損耗幾個人，跟他們劃清界線就是。直到鬥爭不斷升級，威脅到他們自己老爹老媽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鬧了半天自己又打又鬧把火點起來是為了燒烤自己老爹呀！怎麼辦？再次造反。

陳伯達講話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學生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地高呼“鬼見愁”對聯，從而引起更大躁亂。他們還開始醞釀成立工農革幹子弟協會，後改稱“貧協”，清華、北大等校立即回應，以出身為標準將人群分成兩大派別。這就是熟悉的紅五類和黑五類，紅五類自來紅，黑五類自來黑。

陳伯達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請出兩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指出“我懷疑又有什麼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起來，把鬥爭目標鎖定

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8月5日凌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出：“‘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時，江青一再重複“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的新改對聯，結果卻催生出更多如下對聯：

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

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

橫批：理應如此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

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

橫批：專政到底

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橫批：代代相傳

老子革命打江山；

兒子造反為江山。

橫批：代代紅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

後來人伏妖患猛鎮猛斬。

橫批：誰敢翻天？

五、八旗子弟很瘋狂

溫和的勸導壓制不住極端的熱情，經過天橋劇場大辯論後，對聯思想在社會上氾濫成災，很多紅衛兵組織甚至將對聯思想做為一種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

下，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招搖過市蔚然成風，這不僅是一種服飾特徵，更是一種能彰顯紅色貴族高貴血統的標誌。這些稚氣未退的娃娃們穿著並不合體的大人衣服，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汙言穢語，一時間，竟成為青年們竞相模仿的偶像。

可紅色貴族並不好當，他們選擇成員的唯一標準就是“純”。什麼意思？當時中國行政級別共有 24 級，父母行政級別在 13 級以下的統統不要。他們認為，唯有如此顯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來紅”。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他們組織內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職大小來安排職務，他們成了一群名符其實的“八旗子弟”。如此森嚴的等級不僅把大批工農子弟排除在外，甚至連一般基層幹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門檻，另一方面是社會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衝動與幼稚，於是悲劇發生了：一個 14 歲小女孩要求參加紅衛兵，結果紅五類們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夠堅決。”小女孩聽後一言不發，抄起刀走進關押老師的“牛棚”，連續數刀將老師捅死，然後趾高氣揚地對紅五類們說：“我革命怎麼不堅決？現在該讓我參加紅衛兵了吧！”

但文革初期持血統論的八旗子弟們可不管這套，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是自娘胎裏帶出來的，老爹被整又將他們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燒起來。於是，我們看到 60 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復活：

他們將幾間教室打通，將抓來的俘虜關進去，用活人來練習摔跤、格鬥、擒拿、拳擊等，美其名曰集訓。這就是他們私設的監獄。再看看他們的公堂：像縣太爺一樣高高坐在老師的講臺上，將昔日的同學老師挨個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臉、開水洗澡、上吊練習……手段之殘忍直追日本的 731 部隊，真是駭人聽聞！

六、血統論領軍人物

文革前他學的是無線電專業，文革後學的是法律專業。曾任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文革中他是“老紅衛兵”的理論家，他因鼓吹反動血統論而名揚四海。他的名字叫譚立夫。



“文革”譚立夫 “改革”成譚斌

天橋劇場的一場大辯論，帶來了“血統論”在社會上的大傳播，引起一個小人物的強烈共鳴。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無論是出於封妻蔭子的潛意識，還是即將由紅變黑的殘酷現實，他和同類們都不得不拼死一搏。請記住這個名字，當時全國有很多人被他的講話迷了心竅，紛紛改成他的名字，以至於開放改革後他不得不改頭換面，用另一個名字馳騁政壇。他就是當時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

1966年8月12日，譚力夫與別人聯名貼出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對聯當做“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把他”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條條本本。”大字報一貼出，如同今天網上突然出現一個酷貼，立即有人響應。當日，北京各高校紛紛出現了隻字不差的大字報，傳播的速度是相當地快，新一輪大辯論又開始了。是日，僅到北京大學觀看大字報的人就達 17.9 萬人。

當然他們也借了一股東風，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在把紅衛兵運動推向全國的同時，對聯的思潮也迅速氾濫起來。

中央文革感覺到勢頭不對，他們組織力量到各高校張貼《江青在天橋劇場對紅衛兵的講話》，希望把勢頭壓下去。但剛剛在破四舊中取得輝煌戰果的紅五類們此時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北工大連續兩天發生了強撕江青大字報事件，並引致了校園內宣傳“血統論”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辯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口若懸河，一氣呵成了聞名全國的講話。這篇講話在大力宣揚“血統論”的同時，尖銳指出“批鬥各級幹部是難以容忍的事情。”

譚力夫的講話一出籠，不但很快風靡北京，同時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這並不莊嚴的宣告，這並不雄偉的聲音，通過各種現代化工具，一樣傳遍白山黑水，黃河長江。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好得很，應大力宣揚。個別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以新華書店等主管道迅速發行到工廠村莊。有些單位還規定每天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但他們對同時期下發的、中央一再要求嚴格執行的“十六條”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大力推廣譚力夫講話的直接效果是：譚力夫在群眾中獲得巨大聲望，僅在福州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有5人更名為“力夫”。這還不算，在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先後刮起了一股“報出身”風。比方說你要上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會讓你報一下出身：紅五類，您上座；黑五類，站著，有座也不許坐。

在特定的瞬間，歷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創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將講《論語》的於丹視為“文化奶媽”一樣，當時的走資派也是將譚力夫視為救世主的。他們渴望“血統論”救他們一命，當然會不遺餘力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幫他一把，他們明白：幫這個小人物也就是幫自己。

譚力夫，1942年8月出生於陝西延安。原籍湖南資興。已故前中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之子。1966年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時譚立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是宣揚血統論的理論家。

12月18日，譚力夫被逮捕。譚立夫是“老紅衛兵”中最早被捕的一個。他還在獄中寫下了一首《鐵窗歌》：“鐵窗孤影對，深夜寒風吹。生當共產黨，死作革命鬼。縱死亦含笑，問心無大愧。敬愛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隨後，公安部在首都“三司”的配合下抓了300多名“聯動”分子。“聯動”的全稱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一個由高幹子女組成的中學生組織，他們宣揚“血統論”，他們打砸搶，他們反對“中央文革”，被中央定為“反動組織”。一些老幹部們紛紛帶著自己孩子去自首。

董必武的兒子董良翮是北京六中紅衛兵的頭頭，六中私設監獄，打人現象最嚴重。董良翮自首後也在被抓進監獄。董必武向毛澤東報告此事。1967年4月22日，毛澤東下令把被關押的老紅衛兵放出來。沾了董良翮的光，譚立夫也跟著出了監獄。

譚力夫1968年畢業後沒有分配工作。1969年下放到農場勞動。1970入伍參軍在內蒙古集寧、山西大同、北京等地服役。曾任武警總部群工處副處長。

譚立夫在文革結束後改名譚斌，他曾以一個老紅衛兵署名文章，批判血統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把他血統論的主張一股腦的推給了江青。那時，中國人把一切壞事都往林彪、四人幫身上推。

1987年譚立夫以大校軍銜奉調轉業，他曾在鄧小平兒子鄧朴方麾下的康華公司任職，被中組部任命為康華總公司人事部總經理（正局級）。

1989年7月譚立夫函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他原來學的是無線電專

業，這回徹底改了行。1996年2月被國務院評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之突出貢獻的文化行政管理專家。高級工程師。

1994年4月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館長。1996年7月任文化部辦公廳主任。曾陪同美國總統克林頓、俄羅斯總統普金參觀故宮博物院，給外國元首講解中國傳統文化。



第六節 8.18 毛澤東檢閱紅衛兵

7月17日，73歲的毛澤東，暢遊長江之後，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後。

於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將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統帥毛主席。

一、檢閱現場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覽館召開大會，宣佈撤銷海澱區各中學工作組。會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訴了工作組對他們的迫害。駱小海、曠濤生也上臺發言，並把幾論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給了江青，請她轉交毛主席，讓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動在什麼地方。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在釣魚臺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給他們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檔之二《毛澤東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懲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1966年8月1日

毛澤東本人的堅決支援，宣佈了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

為了動員全國的青年學生參加“文革”，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這次大會，既是慶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也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總動員。

大會預定在早上7點30分正式開始。但天濛濛亮時，上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便已在統一指揮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門廣場。參加大會的紅衛兵雖然一夜沒睡，每個人都興奮異常。

站在天安門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他們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模型。這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支持的。本來，聶元梓等7人的造黨委反的大字報一經貼出，就遭到了上千張大字報的批判。毛澤東指示，向全國公佈這張大字報，並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所以北京大學的紅衛兵當之無愧地站在毛澤東視線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也算站在天安門正面位置的，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臺上則站滿了數以萬計的北京紅衛兵的代表。

清晨5時，毛澤東穿著一套綴有紅帽徽、紅領章的草綠色人民解放軍布軍裝，繼林彪、周恩來之後，從天安門城樓下走過金水橋，微笑著向人群揮手，和群眾握手，在人群面前轉了一圈。

毛澤東在金水橋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橋上，向廣場凝神望著。他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向群眾招手。

然後，毛主席戴上軍帽，轉身上到了天安門城樓。

顯然，毛澤東乘車來到天安門後，並沒有馬上登上城樓，而是首先來到了群眾中間。此時的毛澤東特別希望接觸群眾，以便將自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願直接訴諸群眾。

就在幾天前，即8月10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正式公佈的那天晚上，毛澤東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門，來到門外臨時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與在那裏慶祝《公報》發表的群眾見面。在場的群眾幾乎都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激動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對青年學生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特意讓大會安排了1,5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能夠近距離地看到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這對他們說來真是天大的榮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和清華附中、北京大學、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紅衛兵代表作了親切的交談。7時16分，毛澤東單獨會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40名師生代表。

正如新華社所報導的那樣：“幾萬個系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生龍活虎，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從以後幾天的新聞報導中可以看出，這次大會就是要給紅衛兵組織一個突出的地位。

7時30分，慶祝大會開始。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會議。

林彪和周恩來先後講話。

隨後，北京大學代表聶元梓和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學生代表也分別講了話。

慶祝大會結束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望著廣場上浩浩蕩蕩的人群，毛澤東高興地對站在身邊的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1967年1月13日深夜，當他在人民大會堂與毛澤東最後一次談話時，還鄭重表示：只要能夠解脫廣大幹部，他可以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願意攜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毛澤東沉思良久，只是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臨別，還親自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客氣地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在“八一八”接見中狂熱一時的紅衛兵們，隨後的結果也是可悲的。起初，這些自封為是“紅五類”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標榜，但隨著在幾個月後運動的深入發展，多數領導幹部受到衝擊，他們的子弟也在一夜間變成“黑五類”。例如紅極一時的“宋要武”，自己的父親宋任窮後來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無情事實，讓他們不能不起而抗爭，結果一些人自己也被鬥被抓。到了後來，早期的“文革”回應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對者。







第七節 大串聯

一、中共中央關於大串聯的檔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大串聯問題的幾個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
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

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

（中發〔66〕450號）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目前，全國各地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為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組織各省、市、自治區高等學校革命學生全部、革命教職工代表和中等學校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工代表從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來北京參觀、學習，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經驗，以利於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將來京參觀的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每批來京參觀的外地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在北京逗留的時間定為四天，主要活動是：（1）參觀和學習北京各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2）支持北京各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3）受中央負責同志接見。

（二）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學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五十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按每十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一人；教職工按每一百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各省、

市、自治區應該根據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以及城鄉分佈的不同情況，通盤籌畫，妥善安排。

（三）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同當地鐵路管理部門密切聯繫，協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決。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

（四）注意事項：

（1）旅途中自帶乾糧，火車上只供應開水。到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但每人應按照自己的糧食定量交出糧票，在京時的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

（2）自帶簡單行李、衣物和碗筷。

（3）為了預防火災，保證旅途安全，不要在車廂內外貼大字報。

（4）為了保證來京參觀的學生和教職工旅途健康，可根據旅途的長短，由各地自行配備必要的醫護人員。

（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人委應當建立領導小組，負責組織工作，落實計畫，並切實做好來京參觀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時，還應當推選負責人帶隊，負責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區應當根據本省、市、自治區的學生和教職工來京時間的先後，選派幾個幹部先行到京，負責聯絡工作。

為了做好這項工作，各地黨委和政府，教育、鐵道等有關接待部門，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實組織安排，使來京的革命師生參觀好，學習好，把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串聯問題的通知

(中發〔66〕493號)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

目前全國鐵路客貨運輸十分緊張，為了不影響工農業生產，現在除了保證各地革命師生到北京和北京革命師生去各地參觀學習進行革命串聯、交流革命經驗以外，不能再增開列車。因此，各地革命師生在國慶前暫不要到其他省市去進行革命串聯，以免全國鐵路運輸無法安排。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國務院關於各地革命師生暫緩來京進行革命串聯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

外地來京革命師生現已超過百萬，接待能力已達頂點，食宿、交通、衛生醫療等等都已發生極大困難。加之近來氣溫急劇下降，很多人不帶被蓋棉衣，極易生病。切盼各地革命師生暫緩來京，待現有的外地革命師生離京後，再按中共中央、國務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計劃地來京進行革命串聯。

國 務 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周恩來關於學生徒步來京的電話緊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 1、《人民日報》發表的徒步來京的消息和社論是根據中央的指示，不是《人民日報》自己決定搞的。
- 2、同學們有不同看法可以聽聽大家的意見，這兩天可以暫時不報導這方面的問題，過幾天中央瞭解情況再說。
- 3、徒步串聯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會一下子都走光。
- 4、同學們提出來，人走了怎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多數同學來說，主要是進行教育，要徹底肅清錯誤路線的影響。

5、你們過去反對工作組，批判錯誤路線是正確的。有些人出去了，他們可以得到鍛煉，你們仍然堅持正確路線，思想就容易統一起來。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

中發〔66〕554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自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門上接見北京和外地來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以來，全國掀起了革命師生大串連的高潮。預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來過首都的外地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將近九百萬人。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最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不到三個月的短短時間內，舉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見大會。

為了使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發展，全國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續到明年暑假。因此決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目前正在水陸交通沿線等候車、船外出串連的各地革命師生，可勸說他們返回原地。從明年四月起，還有充足的時間，凡是應來而未來北京進行革命串連的大中

學生，都會有機會免費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看望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並進行學習和交流革命經驗。

今年是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並且更好地實現明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資運輸。同時，為了準備明年春暖季節更好地、更有計劃地免費輸送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也需要對前一階段的運輸工作進行總結，並對前一階段使用過度的客車、客船進行必要的檢修。因此，決定從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國水陸交通，只負責免費輸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進行革命串連的革命師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返回北京。他們要憑免費票上車，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告訴我們：“毛主席是支持同志們步行串連的。……當然，這種步行串連，必須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地進行。”為了貫徹林彪同志的這一號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範圍內，專區範圍內有組織地進行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徒步串連的試點，在全國和各大區將由中央、國務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區，有組織地進行重點試點，以便取得經驗，為明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對於已在進行徒步串連的少數革命師生（幾個人到幾十個人），中央和各地黨政機關應主動地給以必要的便利。超過百人以上的徒步串連，必須同有關黨政機關事先接洽，有計劃地進行，以免沿途發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難。有關徒步串連的注意事項，將另行通知。

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學校革命師生中宣讀，並在機關、學校、車站，碼頭張貼。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通知

中發〔66〕590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見了二百五十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小將，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是三個多月以來革命師生進行串連和學習的一次勝利總結。

中共中央、國務院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中規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中學校、軍事院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現將一些具體問題補充規定如下：

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必須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費乘火車次序，完全離開北京返回原地。從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吃飯、乘火車和汽車，不再實行免費。

二、所有在外地進行革命串連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在北京的按前條辦法），也必須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從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車、輪船、汽車，不再實行免費。

三、解放軍派出的人員，對已被接見未離開北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仍應繼續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傳播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並應熱情地幫助他們安排好參觀、學習以及儘早離開北京返回原地的計畫。要對他們負責到底，直到把他們送上火車，歡送他們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一律開給直達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須在北京站中轉的，也要開給直達票，按照車票上規定的車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車，不要延誤。

五、徒步長征來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的接待辦法，另定。

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學校革命師生中宣讀，並在機關、學校、車站、碼頭張貼。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二、大串聯的由來

從 1966 年 8 月 13 日，天津大學的部分造反派學生決定徒步到北京“取經”。中央文革得知以後，立即抓住這個典型，派火車去楊村車站接他們。注釋了大串連這一新生事物的開始。到 1967 年上半年歷時 10 個月左右。大串聯最大程度促進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最大程度的促進了全國各地的革命造反浪潮。

當時中央的相關規定，不准學生到工廠、農村串聯。同一天中共中央又發文《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內容與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一樣。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聯的緊急通知》，通知規定北京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聯，但作用不是很明顯。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串聯問題的通知》從11月21日起一律停止串聯。12月1日又發出《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通知》規定從12月1日起不再免費供應車票、吃飯了。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聯，同一天又發出《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聯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長途步行串聯在全國停止，返回原則上應當步行。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應當返回學校。1967年2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外出串聯人員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規定外出人員一律於2月20日前返回本單位。1967年2月19日中央發出《關於處理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外出串聯、請願、上訪的通知》應立即返回原單位。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供討論和試行用）》規定從3月1日起停止外出串聯，一律返校。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分期分批進行軍政訓練。3月9日中央發出通知停止串聯，3月19日中央再次發通知停止串聯。196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重申停止大串聯的決定。此後中央又幾次重申停止串聯的決定，到了1967年上半年大串聯終於停止。

三、大串聯

5月25日北大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貼出後，引起了全校的注意，有反對的，有支持的。北京其他學校的師生就紛紛到北大看大字報，轉抄大字報。這實際是大串聯的前奏。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後，大串聯在全國就蓬勃開展起來。有北京紅衛兵到全國各地的，有全國各地到北京的，到其他地方的，均是免費到任何城市革命師生接待站，只要出示學生證，校徽，只要能證明是學校師生均可以安排住宿、吃飯、交通。沒有錢可以借。當然有不還的。整個火車車廂內，凡是可站人的地方擠滿了人。車廂內有5層人（行李架、座位、靠背、小窗臺、座位地板），列車到站先到公共場所。我在南昌站，洶湧的人群將車站的鐵柵欄沖倒，可見人群的力量。如有人倒下再也起不來了。只要衝上火車，不管開到哪里，直到終點站下車。面對巨大的運輸壓力，大連海運學院的紅衛兵首先提出步行串聯。為此人民日報作了報導。有相當部分的師生參加了步行串聯。從中央關於串聯的檔可以反映出來。在串聯中有部分師生到越南去串聯，為了援越抗美。到越南的火車被攔在廣西柳州車站。回到上海，學校專門傳達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革命師生串聯越南問題的通知》，意思是，革命師生熱情是好，到越南援越抗美，中央有統一的部署，革命師生到了越南以後由解放軍統一安排參觀學習，然後返回。但在越南看到的、聽到的回國後不要宣傳，防止國內外階級敵人造謠、破壞等。但這個檔的“文號”，內容現今在網上是查不到的。

紅五類子弟可以外出串聯，非紅五類子弟外出串聯要各個學校自己掌握。外出串聯回來後就有紅衛兵問我：你怎麼可以外出串聯？我回答：“我

是革命師生，當然可以外出串聯”。事後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第一次外出串聯到杭州。在出站的時候門口站著一長排北京紅衛兵，每個人要報家庭出身，成份是黑五類的就不准出站，還要用軍用皮帶抽。當時我很緊張，有一位同學就悄悄地問我：你報什麼成份？我說：不知道。她很大膽說，你報工人，北京紅衛兵又不知道的。就這樣混出車站。因為她與我是小學同學，瞭解我家情況。這次杭州串聯多虧了她，我一直心存感激。

四、 戚本禹與紅衛兵談話

1966年10月25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與部分首都紅總司，發表了談話，主要是講串聯問題。他說：“關於出去串聯問題，你們可以討論一下，自己應考慮留多少，走多少，我看問題不是那末嚴重。這篇社論有缺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鬥爭，可以再寫篇社論。我贊成有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目前，有些省鬥爭非常艱苦，空氣很不好，現在北京形勢好。。。。我希望你們去，我希望北京的同學能夠有組織的分散到各地去，把中央的精神，十六條和十三期社論帶下去。會起到促進作用。。。。關鋒插話：反動的圍攻革命的左派。。。。走路還是坐車，你們根據你們的需要。提倡走路是中央的意見，是毛主席的意見，為什麼要提倡走路？現在有一種傾向，很錯誤，高幹子弟如譚立夫之流到外地後要求待遇，要住高級賓館，要住招待所，還有的要克扣，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套。

我們要發揚走路的精神，現在有的地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爺們壓制革命派，不給車票，他們就走路，要向中央反映情況。我們知道了就打電話派火車（關鋒插話：走路就是革命）一方面可以鍛煉身體，另一方面可以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阻力。有的同學說，已經都走光了。你們不要給我施加壓力，你們組

織的情況我還是瞭解的。你們還可以批判。你們是有能力的。會有辦法的，怎麼會都走光呢！轉江野戰軍（原北京地質學院），上海儀錶電訊技校翻印。

從戚本禹談話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是多麼希望紅衛兵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

大串聯帶來交通上的嚴重壓力，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1966年8月末9月初，在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串聯學生與工人、農民發生衝突：9月7日，毛澤東專門給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現在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了工人、農民反對大串連中的學生的事情，這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試以中央發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指示，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指出：“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強調工人、農民要支持學生串連、造反，要和學生們團結起來，共同搞“文化大革命”。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指出：“要以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再次明確工人、農民不准串聯，並不准幹擾學生運動。

五、 紅衛兵大串聯小結

一些青年學生認定自己是“革命”的，是被“黑幫”壓制了。就只有循著中國古代社會民眾冤屈上京告狀的思維去行動。同時，抱著欣喜的心情，懷著追求“真理”的赤心，不畏千辛萬苦，踏上了進京的征程。這便是“大串連”的起端。

對於學生進京的問題，毛澤東是贊同的。早在 1966 年 6 月 10 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8 月 4 日，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華東組會議上說：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學生，上百批來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況。其中有一些是外地來的，實際上成了串連，就毛澤東的態度來說，利用學生進京串連把“造反”的資訊帶回去，可以迅速將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因此他是支持學生“大串連”的。

大批來京上訪的青年學生，一般都投宿於各大專院校的同學處。他們四處活動，多方聯絡，以求得到對他們“造反”行動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認為，外地來京師生是一個把北京“造反”火種帶到各地的最好機會。於是，他們決定大造輿論，以使外地來京師生回原單位後能起到帶頭造反的作用。8 月 16 日，中央文革小組籌備舉行了“外地來京學生群眾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在大風大浪裏成長》的講話。在講話中，他鼓動外地來京師生學習北京的“造反”經驗，然後回去“革命”。

“八一八”和“八·三一”，在不到半個月內，毛澤東兩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首都紅衛兵和外地來京師生，肯定了紅衛兵的造反行為。於是，各種新聞媒介對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進行了大肆渲染。能去北京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法，能去見一見“日夜思念的毛主席”，能去學習北京紅衛兵的作法，成為全國各地青年學生的強烈心願。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

從9月5日起，全國大、中學校的學生在全國範圍內向北京市定向流動的“大串連”就開始了。

北京立即成了聖地，無數的人流從全國四面八方湧向這裏。各大、中、小學校由於停課和串連而空出的校舍，首先被開放為接待站。不久，隨著人流的驟增，機關、單位和工廠紛紛騰出房屋開設接待站；各街道居委會也把被“遣返原籍”的人家的房子騰出來作為接待站。請專人做飯，專人管理串連師生的食宿問題。作為“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外地紅衛兵在北京受到了極高的禮遇，每人都有免費乘坐交通工具的乘車證。

在參觀北京各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同時，外地紅衛兵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見到“紅司令”毛澤東，並視之為“一生最大的幸福”。繼8月18日、8月31日兩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之後，毛澤東不辭辛苦，又於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至26日，先後共8次接見紅衛兵。

與萬眾進京的“串連”路線相逆的，是北京紅衛兵由北京向各地“四下點火”的“長征”。

外地師生在京時，不斷地接觸北京市的紅衛兵。外地師生及上訪人員對本地“資產階級路線”壓制“造反派”聲淚俱下的控訴和求援衝擊著北京紅衛兵“解放全人類”的滿腔豪氣，一種“扞衛毛澤東思想”的責任感。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等於是發佈了去各地“煽風點火”的動員令。在破“四舊”的同時，北京各大中學校中最早的紅衛兵一批批走出校門，走出北京，開始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革命大串連”。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起來。

北京來的紅衛兵，被看成是毛澤東派來的，他們的“造反”行動也被譽為“首都精神”、“中央精神”，北京紅衛兵的言行常常成為各地運動的發展方向。

在各地地方，由於主要黨政軍領導人不理解青年學生對各部門的衝擊、揪鬥意義何在，因而在這種風雲突變之際，仍以幾十年來的工作經驗處理此事，和青年學生特別是北京出來“煽風點火”的學生發生了嚴重的對立和衝突。

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聲言“只接見左派，不接見右派”。這實際等於認定 2000 多名當時要求接見的北京和武漢紅衛兵是“右派”，導致了紅衛兵在湖北省委門前靜坐絕食的“九·二九·四”事件。湖北省委還提出大抓“南下一小撮”。

在上海，北京南下紅衛兵和上海各大中學校紅衛兵、部分上海造反工人聯合“炮轟”上海市委。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等主要負責人也積極組織力量反擊，相繼發生了圍攻北京紅衛兵的“八·二〇”、“八·三一”、“九·四”事件。

四川，李井泉和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調集工人“赤衛軍”和郊區農民，把首都赴渝紅衛兵和重慶紅衛兵打成“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前哨部隊”，進行了圍攻。1966 年 11 月底，成都部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組織進入設在成都的中共西南局機關和四川省委機關，強佔辦公大樓，將主要領導人拉上街頭批鬥。

在貴陽，當 8 月下旬首都紅衛兵南下串連隊殺進貴陽後，貴州省委先是讓紅衛兵住高級的貴陽飯店，想以此穩定紅衛兵的“造反”勢頭。但當看到無效後，就公開提出“謹防政治扒手”的口號，調集數萬群眾，製造了“九·五”、“九·六”、“九·七”圍攻首都紅衛兵的事件。

1966 年 12 月 31 日 11 時，南京軍區遭到萬餘紅衛兵衝擊，有 8 位軍區領導人被抄家，2 位部長和 1 位副政委被抓。

1966年12月31日晚9時，瀋陽軍區也遭到數千紅衛兵的衝擊，軍區大部被佔領，衛兵被打傷，唐子安副司令員被毆打成重傷。

在西安、長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也都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各地黨政軍負責人驅趕北京串連紅衛兵的目的，是想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儘量把運動放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同時也是為了保住他們的職位。

就在9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他認為：“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試以中央發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

社論一出，各地工農與學生對峙的局面立刻冰消霜融。紅衛兵終於挑起了全國各地的“衝擊黨、政、軍”狂潮。

衝擊黨、政、軍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後，由於要求“放手發動群眾”，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各地紅衛兵組織衝擊黨、政、軍機關，揪鬥黨、政、軍領導幹部的行動勢如潮湧。

8月11日，北京地質學院“鬥批改”兵團紅衛兵揪鬥院黨委副書記聶克。10日，北工大在譚力夫主持下組織了8萬人參加的鬥爭宋碩（前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大會。清華大學“八·九”派開會鬥爭了校黨委副書記艾知生。8月15日，北大校文革（籌）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鬥爭黑幫分子陸平、彭雲大會”。8月20日，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揪鬥了校黨委書記、校長林楓。8月23日、9月5日至9月19日、10月8日和27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

紅衛兵組織 “四進地質部”，以揪鬥前地質學院工作組長為名，圍攻地質部。8月25日至9月23日，北航“紅旗”紅衛兵以揪鬥前工作組長為名圍攻國防科委達28天之久。

9月23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衝擊院文革，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奪取了廣播台。院文革指使工人赤衛隊和“鬥批改”兵團紅衛兵與“東方紅公社”紅衛兵進行爭奪，雙方發生武鬥，造成170多人負傷的嚴重流血事件。

11月8日，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600多名學生衝破兩個營解放軍戰士的防線，進入國防部辦公大樓，揪鬥了總參李天佑、玉新亭等人。

12月19日，首都“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聯絡站，“三司”和中學首都兵團紅衛兵聯合行動，以各省政府駐京辦事處是“情報機構”為名，沖砸了各省政府駐京辦事處。12月21日，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紅衛兵查封了石油部大樓。12月24日，在京軍事院校和其他院校的紅衛兵10000余人在工人體育館揪鬥了羅瑞卿、蕭向榮、梁必業等人。12月27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衛兵查抄了薄一波的家。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將彭德懷從四川押回北京。

在吉林省，長春市各大專院校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後，吉林大學造反派進駐省委機關，對立一派也隨後趕到。雙方在省委機關就廣播線路發生了爭鬥。10月29日，為“揪鬥省委內的走資派”，吉林師範大學紅衛兵組織派出人員分別進駐省委和長春市委機關。10月30日，長春地質學院200多名紅衛兵沖進省委機關大樓，抄砸了省委“文革”辦公室，搶走部分材料，強行帶走辦公室工作人員，省委陷入一片混亂。從10月30日起，吉林省委機關不

得不轉入“地下”，到1967年1月25日省委機關垮臺以前，省委機關辦公地點竟先後轉移了7次。1966年11月17日，吉林省委書記趙林被紅衛兵綁架。不久，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阮泊生也被綁架。

在桂林、蘭州、包頭、哈爾濱、重慶、西安等大中城市，相繼出現紅衛兵遊行示威後黨政機關下令軍隊保護機關駐地以防止紅衛兵的衝擊的情形。紅衛兵包圍各省、地、市委駐地的情況屢有發生，也發生了部分地區領導人以武力驅趕紅衛兵圍攻的事件。

對於紅衛兵衝擊各地黨、政、軍機關和揪鬥主要領導人的行為。在第三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的大會上，周恩來說：“大專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象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這個講話是經過毛澤東審閱的。

走遍祖國山河

隨著“大串連”的興起，全國各地又統一開闢了“串連接待站”。紅衛兵，後來還有一些“紅週邊”“黑五類”學生都先後加入了“大串連”的行列。紅衛兵最初是抱著把毛澤東思想傳遍四方的衝動和決心進京和北上、南下、西征、東進的。哪里傳出了“黑幫”壓制革命紅衛兵的消息，哪里就會出現前去串連、聲援造反的紅衛兵。這是紅衛兵“大串連”的第一個重要流向。其次，出於對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光榮歷史的欽佩，著名的“革命聖地”如延安、井岡山、韶山等都成為紅衛兵的第二個流向。第三，紅衛兵出於對某些先進單位的興趣，常常參觀諸如大慶、大寨等地，這是紅衛兵“大串連”的第三個流向。年輕好動的紅衛

兵在“鬥黑幫”的過程中，還常常到著名的風景區一睹為快，這是紅衛兵的第四個流向。

這麼多的流向，這麼龐大的人數，立刻給中國鐵路、公路、水運交通部門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

9月中旬，鐵道部北京鐵路局發出了緊急通告，調整買票、上下車和火車到開時刻等有關事項，以“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師生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保證從全國到北京、從北京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串連活動往返乘坐火車的需要”。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無限的人員流動的需求，中國出現了交通運輸史上罕見的客運量最高峰。長途汽車、內河船隻、海運輸船和火車的超載都達到了極限。每節原定裝載 100 多人的火車車廂，現在裝載 200 至 300 之多。二排座之間的 3 平方米的空間，有時就要坐上 20 至 30 個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面、椅背上、過道裏都是人。有時車廂廁所內同時擠進去 6 至 7 個人。

最早外出串連的紅衛兵大部分是“破四舊”時的勇士，他們自認為是最革命的。所以，每到一處，看到所謂“封、資、修”的東西，就是一陣痛砸。每到一地，就參與那裏的揪鬥“黑幫”活動，把他們揪鬥的經驗、打人的特技傳授出去。

1966 年冬天，參觀革命聖地和先進單位的紅衛兵們已是遍佈全國各地。由於革命紀念地一般地處偏僻，地勢險要，常常發生死亡事故。在大寨，同時有 10 萬餘名紅衛兵參觀。大寨無法接待如此眾多的參觀者，只得電求中央軍委用直升飛機空投食物和大衣以解燃眉之急。在井岡山也有 10 萬人蜂擁而上。9 月份就有東北工學院等 15 個單位的紅衛兵參觀井岡山。10 月份有“紅衛兵共計 40 批，5743 人”參觀井岡山。到 11 月份，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由於人太多，每天閉館的時間推遲到 23 點 30 分。井岡山紅衛兵接待辦公室下轄的 17 個接待站，

僅炊事員就有近千名。在“大串連”中，井岡山先後接待紅衛兵達 100 餘萬人次，耗資 250 萬元人民幣。

大連海運學院的紅衛兵，在上不了火車的情況下為以示革命，15 名紅衛兵決定徒步而行。8 月 25 日，他們打著“大連北京長征紅衛兵”的旗子出發，歷經近一個月的艱辛，行程 2000 多裏，終於抵達北京。10 月 22 日，《人民日報》社論高度讚揚“大串聯，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聯，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社論希望“各地的革命師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

在中央文革的鼓動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積極回應步行串連的紅衛兵。一支支命名為“長征隊”的紅衛兵串連隊伍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移動。

然而多數學生依然乘車串連，少數學生徒步並沒有從根本上緩解交通擁擠的狀況。大量的生活物資和生產資料的難以調運，工業用品和糧食的調拔極為困難，已開始危及許多城市市民的生活和工業生產。此外，外出串連使各地的學校變得空空蕩蕩、冷冷清清，這就使各校的鬥“黑幫”、批“走資派”活動流於形式，無法真正搞起來。大批學生利用“串連”之機，到處遊山玩水，四處遊蕩，樂不思歸，大大分散了青年學生政治熱情和注意力。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11 月 16 日、12 月 1 日，又連續發出通知：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11 月 20 日，首都紅衛兵一、三司令部、大連海運學院“長征紅衛兵”和蚌埠鐵路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聯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四個單位誓師大會”。周恩來參加大會並說：“我支持你們開這個大會”。會議通過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

步行串連四個單位倡議書》，向在外串連紅衛兵發出了號召，步行串連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但在北京、韶山、井岡山、瑞金、遵義、滬定橋、延安等“革命聖地”依然人滿為患。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長途步行串連，在全國都停止。各地也開始堅決拒絕接待參加串連的紅衛兵。

1967年2月27日，陳伯達在接見首都紅衛兵“三司”駐外地聯絡站代表時說：紅衛兵在運動初期搞串連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有功績，但後來各地造反派起來了，繼續留在那兒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駐外地聯絡站一律都要撤回來。1967年2月3日和3月19日，中共中央又連續發出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取消了原定當年春天再進行大串連的計畫。希望各級領通向學生和群眾妥為解釋，並作為通知在全國張貼宣傳。“串連”活動至此才逐漸減少，範圍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少，但究竟何時串連活動完全結束，恐怕很難有一個確切的時間。

六、 串聯照片

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1966年9月5日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

七、



39、紅衛兵學習紅軍的革命傳統，在毛主席率領的練兵場舊址演兵習武。

大約六七月間，全國已出現“串聯”師生。外地來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經”和接受毛主席接見的師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風點火幫助“破四舊”的師生，有紅衛兵、“紅週邊”和一般學生，以大中學生為主，也有個別小學生跟著哥哥姐姐走的。

毛澤東主席分別于 1966 年 8 月 18 日、8 月 31 日、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11 月 26 日 8 次接見了紅衛兵，受接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青年師生大約 1300 多萬人。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化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風景。感謝原作者給我們帶來的溫馨回憶！

邱崇祿的博文



18、外地革命師生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



30、由大連海運學院“長征紅衛隊”點燃的步行串聯的火把，已在全國各地燃燒起來了，各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紛紛走出學校，步行到外地進行革命串聯



3、貴州清鎮半農半讀師範在婁山關宣誓。



4、1967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長徵兵團先遣隊，登上井岡山主峰，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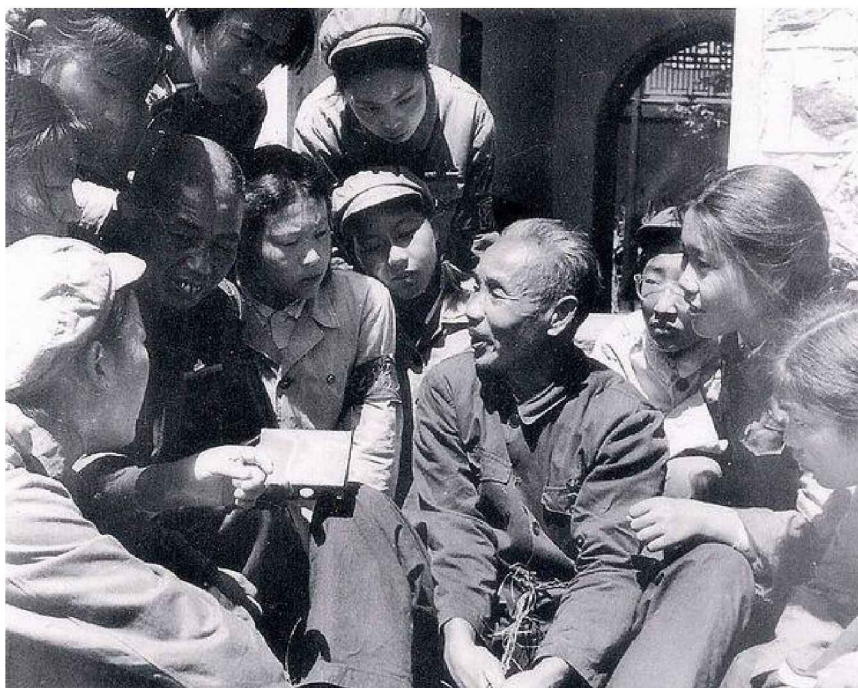
5、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展覽室裏，紅衛兵們懷著崇敬的心情，仔細參觀，學習毛主席青年時期的革命事蹟。



6、紅衛兵長征到北京在天安門留影。



7、1966年，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參觀《收租院》泥塑展覽。



8、1966年，來自外地的紅衛兵小將向井岡山的革命老人學習打草鞋



9、來自山

西、河北和天津的紅衛兵訪問了張思德同志的家鄉，決心向張思德同志學習。這是紅衛兵小將們正和張媽媽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10、哈爾濱航空工業學校的九名女紅衛兵組成的“女紅軍長征隊”在長征途中，來到了毛主席的好戰士劉英俊同志的家裏拜訪劉媽媽，這是劉英俊的母親朱秀蘭向革命小將介紹劉英俊同志的先進事蹟。



11、來自內蒙古的一支紅衛兵長征隊在延安街頭載歌載舞，熱情歌頌毛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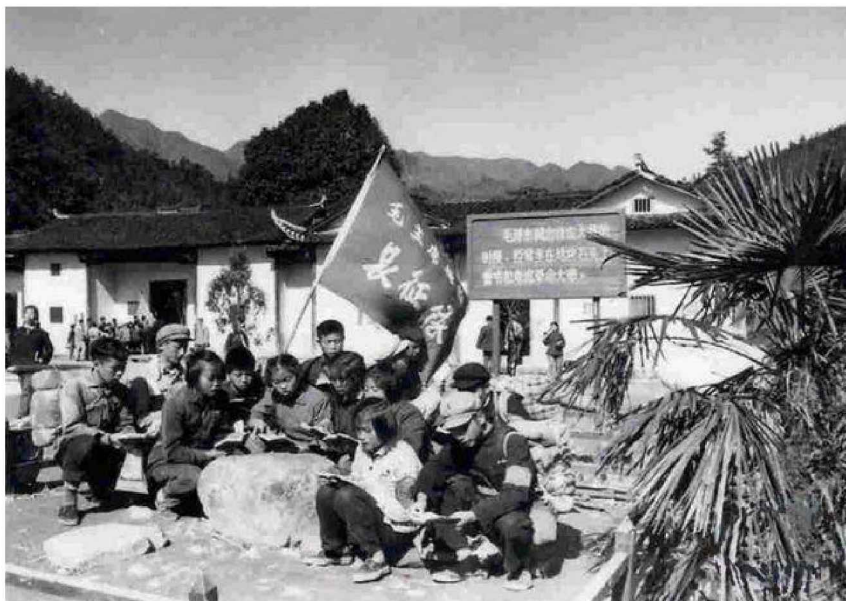
20、來自西安的紅衛兵長征隊在毛主席曾經住過的窯洞前朗讀毛主席語錄。



21、紅衛兵們在白求恩紀念碑前宣誓。



23、北京的紅衛兵正在學習討論《人民日報》社論，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當做一切行動的指標，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32、1967年，來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長沙第一師範長征隊在大井毛主席舊居前集體學習毛主席語錄。



34、1966年，上海市南市區十所中學的二十名紅衛兵小將，組成一支“跟隨毛主席長征代表團”，出發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這是他們在長征途中，在田間向公社社員宣傳的情形。



36、這是江蘇常州的紅衛兵在王傑烈士墓前合影。



37、1966年，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進行革命大串聯、這是他們在北京大學參觀學習的情景。

第八節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 中央領導講話彙編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陳伯達等人的講話

這次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以批判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進一步排除黨內各級幹部的阻力。

會議印發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國家計委黨組《今年一至九月份經濟情況》等檔。還印發了十幾個參考材料，如關於紅衛兵的《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關於國務院文教各部門紅衛兵查抄五類分子家庭的情況簡報》、《小學也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檢查提綱》等等。

第一階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組會為主，大家談對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認識。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開全體會議，林彪講話

現在我們需要總結一下這一個時期的經驗，研究怎麼樣繼續努力地貫徹十一中全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四日下午總理、陶鑄同志還有軍隊的同志在主席那裏彙報文化大革命形勢的時候，主席就提出來召集各地的同志開這個會。主席本來要親自到會，恰恰這兩天受涼。這個會議的時間準備只開七天，從今天起就開小組會，大約開兩三天，然後再由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作綜合性發言再討論兩天，最後一天請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來就中央工作會議的開法問題提議：（一）發言請談觀點、擺問題。（二）每區發言兩種方法，每大區先有一個同志發言，其他同志以後講，或者兩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一起講。（三）可以口頭講，也可以書面談，充分發揚民主，盡可能都能發言。不同看法，開門見山，都可以講。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來接見清華大學八個組織的代表，針對他們要王光美立即到清華大學作檢查一事指出：你們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檢查，太快。彼此要有個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們要對她負責。她作檢查也要

準備中央也要討論。王光美不能到清華去當場檢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葉劍英在第二小組發言：主席說，這次運動暫定搞到明年一月，還有四個月。十一中全會後搞了兩個月，要很好地總結經驗。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為了戰備。現在的戰備任務很重，時間很緊。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後發生戰爭。主席說，三線不建起來，覺也睡不著。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備動員，這一點日本人、美國人都看出來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什麼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組發言談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況。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來在第五小組插話說：要爭取主動。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爭取主動，還要繼續被動下去。還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吳德在第一小組發言談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況。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檢查提綱

同志們，同學們：

近日來，廣大的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勇敢地捍衛十六條，堅決地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市委對於同學們這種革命的英雄行為，表示最堅決的支持，對市委的批評，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前一個時候雖然作過檢查，但認識是不深刻的，檢查是不徹底的。我們決心在廣大師生的幫助下，進一步檢查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同廣大革命師生站在一起，堅決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決裂，堅決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市委在六、七月間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線的錯誤，主要責任應當由我來負。

市委在前一段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存在著一條違反毛澤東思想、“怕”字當頭、害怕群眾、害怕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我們對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對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組，包辦代替，總是想讓群眾按我們的舊章法、老框框、過時的經驗行事，不瞭解革命群眾思想、感情。沒有同革命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沒有支持革命群眾大造反、大民主；沒有鼓勵革命群眾大揭露、大批判。對於革命群眾的新創造以及他們創立的新秩序、新形勢，感到突然，不知所措。開始領導就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後來，逐漸從落在群眾的後面，發展到站在群眾的對面。當群眾要衝破我們的框框，要趕走工作組，不按我們的錯誤軌道行走時，我們就輕信了一些錯誤的反映，認為是有壞人在背後操縱，於是就限制群眾、壓制群眾，最後在若干單位就發展到圍剿革命派，打擊革命群眾，這樣就鑄成大錯。

在犯錯誤的這一段時間內，我們始終沒有真正放手發動群眾。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講話，就反映了這種思想。這個講話，沒支持聶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字報，而是怕亂，怕上街，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造謠污蔑，強調內外有別，強調組織紀律等等。這樣就實際上給群眾潑了冷水。而且很長時間，不覺悟，曾經還辯解說：我沒有反對聶元梓同志等的大字報，只講了個貼的地方問題，是技術問題。其實這明明是個政治問題，哪是一個技術問題呢？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佈了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大大支持了群眾的革命行動，群眾象火山爆發似的起來了。新市委就在這個時候，奉命成立，本

來應該同群眾站在一起，站在運動的前面，放手發動群眾，大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大造修正主義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這時我們卻害怕群眾這種革命造反的“亂”，以為一個單位沒有黨委領導就不好辦，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後集中了近萬人，倉促地進入各個單位。他們在六月三、四日接連召開的大中學校、工交、財貿系統和市委機關幹部的會議上，不適當地過早地講了一些政策界限，實際上提出了一些錯誤框框，束縛了群眾的手腳，限制了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這對運動起了阻礙作用。

當工作組進到各單位後，有許多工作組在市委的錯誤指導下，硬要廣大群眾按我們所規定一套清規戒律來行事，違背了革命群眾運動的發展規律，這就在事實上站在群眾對立的立場上去了。後來雖然發現有些工作組害怕群眾、壓制民主，以至鎮壓群眾的情況，發現了五十幾所大專學校中，有三十幾所趕工作組，但總覺得離了工作組不行，希望工作組改正錯誤，領導運動，並且向群眾提出既要批評工作組，又要擁護工作組，而沒有覺悟到派工作組的本身就是錯誤的。對於當時提出撤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也不能理解。這就看出我們還沒有理解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我們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提出了所謂“消除幹擾”的問題，這是我們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典型表現。在六月中、下旬，本來我們應該放手發動群眾組織革命隊伍，打擊反革命修正主義，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我們卻信了錯誤的反映。例如聽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報告和其他校的有關報告，對廣大學生的革命行動，作了極錯誤的分析，這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我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話中，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過高估計了階級敵人的力量，混淆了

兩類性質的矛盾，錯誤地強調運動出現的所謂複雜情況，認為“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都出臺了”，右派學生在爭奪領導權，資產階級對運動的破壞在客觀上有總起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運動的破壞事先已作了預謀，有組織的反革命也在進行破壞，因而就強調大講黨的領導和大講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右派趕工作組，“工作組要頂住”，“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要站出來，否則納吉要上臺”等等。結果就在許多大專院校又引起了鎮壓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師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這就傾倒了敵我關係，實質上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對受迫害的革命師生，應該按照中央規定，給以徹底平反，銷毀有關檔案，並且我在這裏向這些同學賠禮道歉！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表現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實際上放鬆了對各個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例如在六月間市委召開的工作會議，當聶元梓七同志的大字報公佈後，我們根據形勢，提出了要站在運動的前面，一切為了前線，縮短工作會議的時間。但又認為已經接上了火，停不下來，結果開的很長，領導沒有深入前線，削弱了對於運動的瞭解指導，而實際上起了保護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作用。本來這個會是要徹底揭發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打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我們卻想先整司令部，實際上前市委這個司令部已經爛掉了，要解決它的問題，不依靠廣大群眾起來革命造反，關起門來開會是不行的。參加這個會議的是前市委的委員，各部門各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在這些人當中，不少人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犯有嚴重錯誤的，當一些單位的群眾起來要鬥爭他們的時候，而他們還在市委開會，這就必然影響了群眾的鬥爭積極性。當要散會時，我們還籠統地希望參加會議的人，回去後能站起來領導。我在

六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還再三動員他們“引火焚身”，給他們出主意，說“你站出來檢查，工作組給你幫忙”，“可以晚幾天回去”，“有的還可以易地革命”等等。這個會雖然有某些收穫，但實質上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一個極其錯誤的會議。

在六月下旬，還錯誤地讓北大、工交系統等幾個工作組，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介紹了錯誤的經驗。另外，還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情況，提出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同時，市委還過早地提出了恢復黨團組織活動，實際證明這種主張是根本錯誤的。特別是象北大這樣的反動堡壘，黨團組織必須認真、徹底地改造，簡單恢復，只能導致舊領導、舊思想、舊統治的復辟。《北京日報》在六月三十日還錯誤地發表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社論。

我們還錯誤地說過：“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正當群眾起來進行大革命、進行革命造反的時候，這樣講，只能是起壓制群眾的作用，必然導致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應該說在任何時候，新市委做錯了事都是可以批評，可以反對的。

總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極其錯誤的講話以後，不僅把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出現了冷冷清清的局，而且出現了更多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這就是實行白色恐怖，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而還自以為得意。

市委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這樣嚴重的錯誤，歸根到底，就是沒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大的政治鬥爭中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毛主席教導我們：“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要敢字當頭，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們卻是怕字當頭，怕出亂子，怕打亂舊秩序，怕炮轟司令部。總之，一句話，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所以對舊習慣勢力、舊習慣觀點、舊思想、舊框框，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捨不得與之決裂。這就必然和革命群眾敢闖、敢幹、敢鬥、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銳的對立，犯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就毫不奇怪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當人民的勤務員，要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要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而我們卻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做官當老爺，以領導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瞭解群眾的思想、感情、習慣於包辦代替，不放手發動群眾，以致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運動中，發展到同群眾處於對立的地位，壓制群眾。這就說明，在我們靈魂深處，還存在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而我們在這次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把自己擺進去，對改造自己的靈魂缺乏思想準備。

當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糾正了我們的錯誤，扭轉了運動的方向之後，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廣大革命群眾，生龍活虎地發揚了革命的首創精神，不僅創造了文化革命委員會這種新的組織形式，而且創造了紅衛兵等富有非常戰鬥性的革命組織。紅色的革命

小將們敢闖、敢幹、敢革命，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從學校的鬥批改，進到社會上的鬥批改創建了偉大的功勳。北京的革命師生到全國進行革命大串聯，外地的革命師生也上北京來大交流經驗，首都充滿嶄新的革命的景象。

十六條公佈以後，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綱領，在毛主席、黨中央的正確指導下，在廣大革命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根據林彪同志的幾次重要講話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執行十六條的過程中，又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

正當十六條決定公佈以後，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時候，市委曾經錯誤地支援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七萬人參加的鬥幾個小流氓的大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這說明瞭我們的思想還是沒有徹底解放，仍然是怕字當頭，遇到這樣的事情，就驚慌失措，生怕出“亂”，結果適得其反。

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錯誤，並且幫助工作組去批判錯誤路線，肅清它的影響，雖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徹底。同學們對我們的批評，我們完全接受，批評的對，批評的好。工作組撤退時，有一部分工作組沒有檢查或者沒有很好檢查，因而工作組雖然已經撤了，但其影響並未肅清，受打擊受迫害的革命師生沒有給他們徹底平反。而對於過去受錯誤影響的部分同學，也沒有下狠大的力量，採取適當的方式，幫助他們從錯誤路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從而消除兩派同學之間伯原則分歧。

...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的講話

目前運動的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問題，主要解決兩條路線的認識問題，這個運動進行好不好，是要看貫徹毛主席對文化革命正確路線如何，各部門

各地都要想一想。

這次文化大革命對黨內外、國內外震動很大，對資產階級威風，對反革命的威風，是殺了他們的威風。

現在要幹部思想搞通，就要擺事實、講道理，要講從文化大革命以來輝煌戰果。要講清不要怕，怕什麼呢？把各種各樣的怕，都擺一擺，怕這怕那，究竟有多少“怕”，擺得清清楚楚。“怕”有兩重性，有好有壞，好處更多。對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怕”有必然性，對群眾的偉大作用要認識清楚。過去推翻了統治階級推翻了什麼？爭取了什麼？在政治上奪取了政權，在經濟上成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在思想上改變了私有制觀念。

我們二十多年的戰爭，全國解放也有十七年了。政治，我們奪取了政權，經濟有公私合營、土地改革、合作化；思想有社會主義思想，革命也幹了一些，如三反，五反，反右，但是幹得不夠得很。現在要大幹一場。我們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是要用較長的時間，要經過大大小小的戰役。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一個大戰役，或幾年之後還會來大戰役，既有暴風驟雨的大戰役，又有和風細雨的小戰役，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鬥爭，才能把幾千年培養出來的私有制的意識形態打掉，如果不把私有制觀念打掉，就有可能使公有制經濟，無產階級政治變色。因此，推翻統治階級的私有制的思想越徹底，無產階級政權更加鞏固，社會主義經濟更加發展，人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生產力更能解放。要鞏固公有制就要推翻各種私有制的觀念。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破除私有觀念，如果不破除會使社會主義停滯、甚至倒退變色，成為修正主義，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文革以來，十一中全會前後，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不相同的是我們黨內戰勝了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相同的是我們各級

黨的領導很多直到現在還處於被動狀態，還是防禦的，限制的，抵觸的，對於放手發動群眾還是不通，大多數人長期以來沒有提到自覺性來革自己的命，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因此，要向幹部作政治思想工作，大多數幹部怕革命怕群眾，具體表現形式不同，但怕群眾怕革命是一樣的。一小部分人反對文化大革命，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具體表現不同，用各種各樣形式表現出來。因此，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打通思想，使文化革命搞得更深入，更廣泛。有的幹部表現壞，被革命的群眾運動洪流沖掉了，這是好事情。有的幹部或是中間狀態的，想革命的，那我們要向 he 打通思想，為他幫助他，使他敢於到群眾中間去的，放手發動群眾。所以為他挽救幹部提高幹部，鍛煉幹部，要作政治思想工作，把大方向，大道理講通，至於還有一些具體政策和辦法好解決。總之，要幹部樹立信心，解除顧慮。

...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小組會上講話

聽了韓光的檢查和張本宣讀《科委機關少數派同志聯合揭發韓光同志的錯誤》第一部分以後，插話如下。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過問科委、科學院的運動。為什麼科委的運動進展緩慢？一是因為我忙，二是韓光陽奉陰違。過去他總是推到聶榮臻身上，實際上韓光對聶榮臻同志也是陽奉陰違的。六、七月份李富春、陳伯達、康生、聶榮臻同志都批評他，他總是找藉口，為自己辯護。

八月十三日，我與聶榮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來管，韓光對我也是陽奉陰違，除了張本同志剛才講的那事之外，還有幾件事證明韓光是有組織搞的。我本想把群眾引導到毛澤東思想基礎上來進行大鳴大放辯論，辯明是

非，結果倒發現韓光方面有組織地搞示威，當我的面鬧事，對付張本同志。在計量院的大會上，舉起預先準備好大字牌子，不讓張本上臺。我預先打過招呼，韓光、張本同志不上主席臺，只要計量院革委會協商的主席臺。開始有支持張本同志，遞條子要張本上臺，大會主席沒有念條子，最後靠近韓光黨委那方面的主席（人），遞了一個可疑的條子，交給大會執行主席念，要張本上臺。接著下面就舉起了不要張本上臺的大牌子，轟鬧。我和我同去的人看得很清楚，是有組織的。

還有一件事，雙方準備在辯論會上的發言稿，請把清樣送給我，我說過清樣印出來後允許修改。韓光那一方面負責人個人發言稿是十九日送來的。這時已經學了十月五日軍委總政的指示了，伯達、江青同志講過話了，這些難道他們都不知道？代表你韓光方面的三個發言，太不象樣子，完全不對頭。完全不對頭！韓光完全是有人組織的陽奉陰違。我同意剛才韓光交給我的計量院的要求，今晚將全部人事檔案封存起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來就清華大學紅衛兵以發“請帖”的名義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一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

“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復在第二小組發言：

新華社五百多名記者，二十八個分社，竟然不能擔負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國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實情況的任務，中央文革小組從部隊中調了一百多名軍事記者到疆各地瞭解情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馬純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來要第五小組會議上插話：“要敢於革命，敢

於革自己的命，把我們自己放要內。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個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也沒的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來和陶鑄聯名致信毛澤東，報告中央工作會議進展情況建議毛澤東十四日或十五日約常委談一次，聽取彙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區負責人和會議各組組長在毛澤東處開會，聽取各組彙報和研究會議情況。

第二階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陳伯達講話（十月二十四日的修改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

（一）形勢大好

...

（二）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並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實行……”事實證明瞭毛主席的預見。

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但錯誤路線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現，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鬥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有些人不執行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亦即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叫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物卻反對，他們搬來國民黨的“訓政”來對抗，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諸葛亮，把運動引向相反

的道路上，這是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強加於群眾，不過是為了強行推行路線罷了。工作組撤了，但有些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人，仍用各種辦法推行他們的路線，如違反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推薦出一個他們理想的“籌委會”、“革委會”……，甚至當各地大量革命師生來京見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著來“串聯”，企圖打擊來京革命師生。九月廿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來京師生，我曾有個建議：如高幹子弟在各校、各單位文革中佔有領導地位，最好讓給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擔任。高幹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業和他們自己都無好處，但如高幹子弟有的的確很好，群眾選他，我也不反對，但調查材料說，有人聽了我的話，很快就採取對付措施了。他們說：中央有指示，高幹子女不做紅衛兵領導，於是辭去職務，指定了“立場最堅定”的人來擔任。花樣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對於這些花樣津津樂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說：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把無產階級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制群眾，施行白色恐怖，還自以為得意。

有人仍不聽毛主席的話，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是資產階級本能地在他們頭腦、行動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

歷史的階級鬥爭的確如此，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站到敵人一邊，先

進的變為落後，落後的變為先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現出來。我們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的革命歷史忘得一乾二淨，毛主席批評的官、暮、嬌、驕四氣他們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能讓群眾觸動他們的缺德（不是缺點，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動員一批群眾保他們自己。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話應當讀一讀，我引她一句話。她對兩個街道幹部說：“如果這兩個學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出這麼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這位普通婦女的話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說：“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又不是國民黨的地委，又不是舊政府，為什麼怕群眾？”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得多麼明白，簡直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幹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實是擺著的，兩條路線還在鬥爭，還在繼續，還會經過多次的反復，階級鬥爭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八月八日通過了《決定》，不過十二天，有個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就跳出來，提出了對抗綱領(指高幹子弟搞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來紅”血統論)，而且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決定》不感興趣，對他的綱領卻為之印刷、廣播，不亦樂乎。另一高幹子弟竟稱讚說：“這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高幹子弟中有許多好的，較好的，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卻要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分析，不分為二，只醉心於高幹子弟專權，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去培養接班人。為什麼高幹子弟要專權？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嗎？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給我寫信，尖銳地提出問題：十六條之前，是否全國凡派工作組的地方都犯了路線錯誤？十一中全會後，各地對待大串聯，多數、少數關係上，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是否要承認都是反動路線？這實質是一個認

識、估價問題。我的看法：

1、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2、黨內路線的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其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相當一批世界觀未改造好的糊塗人。

3、派大量工作組鎮壓群眾是路線錯誤，沒有派工作組，但也鎮壓革命學生，同樣也是路線錯誤。當然，有自覺執行的（少數）和不自覺執行的（大量）之分，有輕重之分，有及時改正錯誤和仍然堅持錯誤之分。

4、區別改正和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承認了執行的是一條反動的錯誤路線，認真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並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

5、不肯徹底批判錯誤路線，就不可能認真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即毛澤東思想路線。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會後，還用各種形式在各種問題上繼續犯路線錯誤。如對待大串聯，少數多數問題，仍挑動工農群眾、機關幹部同學生衝突等等，歸根結底，都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

7、壓制群眾的錯誤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不是說凡是執行反動路線的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那就不僅可能是二、三類幹部，還可能是一類。以前定為一類，犯了這個錯誤，也必須承認犯了路線錯誤。

8、對一般同志來說，他們錯誤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

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無論何人，無論過去有多大功績，他們只要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會滑到同黨對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對每個人的嚴峻考驗，現在仍在考驗著每個人。

（三）去掉幾怕，放手發動群眾

...

有些人口頭上講並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四十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並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說：有些同志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於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他們挑動工農、幹部鬥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麼？其實只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讓全國學生大串聯，是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們在串聯的革命熔爐中受鍛煉，辯明是非，熟悉群眾和鬥爭，革命的意義深遠。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並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串聯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可以提倡步行，讓他們演習長征。長征是宣言書、

宣傳隊、播種機。大連走來的同學可能成為有用的人，如果從家門到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人，難道會成為可靠的接班人嗎？

“串聯妨礙生產？”今年農業形勢大好，工業以高速度上升，糧棉大增產，棉花可達五百萬擔，糧食二百億斤，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議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不乘火車、汽車，一定會有很多學生這樣做。毛主席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聯，並且大推廣。紅衛兵剛露苗，而且還在受摧殘，誰支持了呢？是我們偉大的統帥，七月卅一日他就寫信給清華紅衛兵說：“我表示熱烈支持。”星火燎原，幾個月，毛主席高瞻遠矚，一小批紅衛兵發展成為廣大隊伍，牛鬼蛇神為之喪膽，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締，至少也納入我們的軌道。紅衛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議，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實行，戰果必須開展覽會，用事實教育群眾：“造反有理”。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在看了紅衛兵後斷論，兩個多月的歷史，已成為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組織，大概會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和生活。還說：“如果西方世界的蘇修集團，認為這種狂熱只是流氓行為或短暫熱情，那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險的。”敵人的觀察比我們的一些同志還深刻得多，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本是我們祖國的事，為什麼會使敵人感到危險呢？現在已經不是封鎖國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響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進國內的革命化。什麼地方、什麼單位、認真而不馬虎地抓革命促生產，就可以大大促進生產積極性和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新飛躍，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準。

（四）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在各個革命時期，革命的力量和物件是有變化的，但毛主席的階級路線永遠適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於發現不帶括弧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權術的兩面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份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屬於哪一個階級。思想意識不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工人階級自發產生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會地位曾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列寧、史達林以至於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有一些工人出身的並不一定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英國工黨領導人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在蘇聯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製造和散佈這一觀點的人，是要製

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不願革命，也不准別人革命。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黨內，曾長期處於少數地位，卻恰恰代表廣大人民、馬列主義，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人都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不作階級分析，處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數，也不支持少數，這是不行的，是虛偽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無產階級在歷史上代表最廣大的人民，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指出：我們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按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類，否則自己不能最後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義，單兵獨馬的策略。無產階級相反，是要招收廣大人馬，好把敵人包圍消滅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取得一個個勝利。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舊人。無產階級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定取代資產階級的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傳部發佈了第五次接見師生的口號。

十七日又重新發佈，刪去了一條有關歡呼毛澤東的口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繼續小組討論。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紅衛兵三師”針對十七日重新發佈的刪去了一條歡呼毛澤東的口號一事，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上街遊行抗議，並喊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首都紅衛兵“三司”提出的標語口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

同日下午，清華大學出現了“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來約陶鑄、童小鵬、周榮鑫談話，佈置勸阻哈爾濱工業大學師生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來就北京外貿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要李先念去參加二十日下午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並要求提供三輛宣傳車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講話錄音事批示：“參加大會可以，提供三輛廣播車在大街上播送李的錄音不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來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代表，告誡他們不要去天安門張貼批劉少奇的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來得知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學生準備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五十萬至一百萬人的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大會一事後，要周榮鑫和中央文革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工作，說服他們不要開。後此會未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後，約劉少奇、鄧小平談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來約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韋國清等各大區負責及陶鑄、陳伯達、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譚震林、蕭華、江青等開會，談劉少奇、鄧小平的檢討方式問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和陶鑄、李富春約鄧小平談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和全國廿五省市紅衛兵的

談話中指出：“炮轟司令部”問題：有的轟得對，有的轟得不對，如果是堅強的領導，站出來不怕轟，不怪同學，上海轟了兩次。當然不要一點材料沒有，就要人家承認是黑幫，你總得有些材料。錯誤路線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而不是無產階級立場；長資產階級威風，而不是長無產階級志氣。和群眾站在一起，先作學生，後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線錯誤。怕一兩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們不怕，一般領導幹部都有點怕。怕過去就行了，而有長期怕的。由不相信群眾到對立，要壓制群眾，這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是不是路線錯誤就是敵我矛盾？一般的路線錯誤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是反黨分子、反黨集團。堅持錯誤不改，有可能滑到敵我矛盾。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你們不要什麼都懷疑，照你們這樣說，那就“洪洞縣裏沒有好人”了。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你信任的東西就要堅信不移，堅信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信不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約國務院副總理、各口負責人、各部委黨組書記、中直和中央軍委負責人及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開會，談如何緩解在工作組問題上工作組和學生的緊張對立關係。指出：工作組，首先是工作組組長或幾個主要負責人，要挺身而出，承擔責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組的錯誤總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嘛！今天下午會上有兩位同志作檢討他們把責任負起來。會前如今這麼一個緊急小會，先給你們打個招呼。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各組討論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對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

路線》的批語：

即送陳伯達同志。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彙報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說：有什麼可怕呢？你們看了李雪峰的簡報沒有？他的兩個孩子跑出去，回來教育李雪峰說：“我們這裏的老首長，為什麼那麼怕紅衛兵呢？我們又沒打你們。”你們就是不檢討。伍修權有四個孩子，分為四派。有很多同學到他家裏去，有時幾個人或十幾個人。接觸多了，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覺得他們很可愛。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應先受教育。你們不通，不敢見紅衛兵，不和學生說真話，做官當老爺。先不敢見面，後不敢說話。革了幾十年的命，越來越蠢了。少奇給江渭清的信批評了江渭清，說他蠢，他自己就聰明瞭嗎？

毛澤東問劉瀾濤：你回去打算怎麼辦？

劉答：回去看看再說。

毛說：你說話總是那麼吞吞吐吐的。

毛問周恩來會議情況。

周說：會議開得差不多了，明天再開半天，具體問題回去按大原則解決。

毛問李井泉：廖志高怎麼樣？

李答：開始不大通，後一段較好。

毛說：什麼一貫正確！你自己就溜了，嚇得魂不附體，跑到軍區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

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

允許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 Q 正傳》。

這次會開得比較好些。上次會是灌而不進，沒有經驗。這次會議有了兩個月的經驗，一共不到五個月的經驗。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錯誤！死了多少人！社會主義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個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經驗。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

毛問李先念：你們今天會開得怎樣？

李答：財經學院說，他們明天要開聲討會。我要檢查，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說：你明天還去檢查，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李說：明天我要出國。

毛說：你要告訴他們一下。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點不足。

他們不聽你們檢討，你們就偏檢討。他們聲討，你們就承認錯誤。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麼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史達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

（陶鑄說：大權旁落。）

毛說：這是我有意大權旁落。現在到處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來應經中央討論作一個決定就好了。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個副總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

來找我，後又到天津，我馬上答應，四個又回去了，可鄧小平就不來。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了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完不成任務不要緊，不要如喪考妣。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比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會以後，項英、彭德懷（新四軍皖南事變、彭德懷的百團大戰）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後中央沒有幾個人。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分兩路，我同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劉少奇、朱德在華北，還比較集中，進城以後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別分一線、二線，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財經會議以後，就打過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氣，向中央通氣，向地方通氣。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與彭真不同。過去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羅章龍、李立三都是搞公開的，這不要緊。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沒有好下場。犯路線錯誤的要改。陳、王、李沒改。（周恩來插話：李立三思想上沒有改。）不管什麼小集團，什麼門頭，都要關緊關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允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時，陳其涵說不能把犯王明路線的選為中央委員。王明和其他幾個人都選上中央委員了。現在只走了一個王明，其他人還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東崗一戰他是贊成的。寧都會議洛甫要開除我，周、朱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也是反對他們的。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你們有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這次會議是我建議開的，時間這樣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想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來了這麼大的事。學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難道我們出身都好嗎？不要招降

納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一個人不去接近幾個右派，那怎麼行呢？哪有那麼乾淨？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嘛，瞭解他們的動態。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民主黨派要不要？一個黨行不行？學校黨組織不能恢復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後發展的黨員很多，翦伯贊、吳晗、李達都是黨員，都那麼好嗎？民主黨派都那麼壞？我看民主黨派比彭羅陸楊就好。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同紅衛兵講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孫中山搞起來的。那時沒有共產黨，是孫中山領導搞起來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樣紀念呢？和紅衛兵商量一下，還要開紀念會。我的分一線、二線走向反面。

（康生說：八大政治報告是階級鬥爭熄滅論。）

毛說：報告我們看了，這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

工廠、農村還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們的思想，把會議開好。上海找個安靜的地方開會。學生鬧就讓他們鬧去。我們開了十七天會，有好處，象林彪同志講的，要向他們做好思想工作。

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講階級鬥爭熄滅論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肅反，還不是階級鬥爭？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誰會打倒你們！？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

（聶榮臻說：這個人很懶。）

對形勢的看法，兩頭小，中間大。“敢”字當頭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數。真正“反”字的還是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薄一波、何長工、汪鋒，還有一個李範五。

真正四類幹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來說：現在已經大大超過了。）

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個書記搞生產，其餘五個書記搞接待。全國只有劉建勳（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

聶元梓現在怎麼樣？

（康生說：還是要保。李先念說：所有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都要保護。）

對！

（談到大串聯問題時，周恩來說：需要有準備地進行。）

要什麼準備，走到那裏沒飯吃？

對形勢有不同的看法，天津萬曉塘死了以後，開了五十萬人的追悼會，他們也認為這是大好形勢，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是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何而來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表現在懷仁堂幾次會議上的彙報和決定的一些問題。正當毛主席提出正確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之後，為什麼會出現錯誤路線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報告中提到對錯誤路線有提出者和執行者，但各有輕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緒，為什麼錯誤路線的創造者就不出來承擔責任？

即使是錯誤路線，也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但如果指

出以後，犯有錯誤的人還不改正錯誤，那就有滑到反革命邊緣的可能，到那時矛盾就轉化。

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歷來是一、二個人或一個很小的集團搞起來的，如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線錯誤就是少數人搞的。這次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會上批評過，大多數同志不知道，這次會議說穿了，就是劉鄧，就是劉鄧的錯誤路線。

在懷仁堂的會議，主要就是他們兩人搞的。北京抓在他們手裏，想搞成一個樣板，全國照他的樣板去辦。這很明顯是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的，為什麼劉鄧路線能在全國推行呢？這是因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劉鄧利用中央大權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不是站在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上。把一場有世界意義的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創舉，劉鄧搞得冷冷清清。

劉鄧的辦法，是孫中山訓政時期的辦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把群眾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諸葛亮。把一場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圖按照他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去進行。這條錯誤路線是劉鄧聯盟搞的。對劉的錯誤大家瞭解的較多，對鄧是不瞭解的。對他的大字報也不多。其實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而且也是很嚴重的。工作組的形式，便於執行錯誤路線。如王光美到清華大學，後臺是少奇，鄧的女兒在師大附中，後臺是鄧，劉的女兒到清華附中，也是有後臺的。這裏是挑起了群眾鬥群眾，工作組撤出之後，還是有人在那裏操縱的，那裏許多消息比我們還快，他們頑固地掌握學校的統治。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變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他就要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見的人，用各種辦法把他們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

華大學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辦公廳來談問題，還有二個人押著來的。那時主持清華大學工作的是王光美，後臺是劉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樣搞下去，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這是嚴重違反了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對全國都有影響的。

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沒有人批評他的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憑他的聰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不做調查研究，淨亂決定問題。

每次開中央會議，他是以批評為主，對於其他大事無所用心。對群眾是不接觸的，對群眾路線不感興趣，可是什麼事他都愛“拍板”，總理也只好陪綁。要同鄧談問題，真比登天還難。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搞南三區、北三區分開搞，也沒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評說：“哪個皇帝決定的”，以後陶鑄打電話，叫北三區的到南三區來開會，而鄧當時坐火車遊遍全國，不做調查研究，不了了之。對國際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條反修的綱領，根本不能用。以後到杭州，主席親自搞了二十五條。

去年起草二十三條時，主席對劉鄧也批評過，主席批評兩個獨立王國，但沒有觸動他，這次批評錯誤路線還沒有觸動他。

劉鄧的思想作風是和毛主席對抗的。鄧的面貌如不在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是打著一樣的旗幟。

去年九月中央會議，如果黨中央有一兩個搞修正主義的人，就會把中國變顏色。蘇共的教訓，只要一變，就會有很多糊裏糊塗的人跟著跑的。

六二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線的問題，主席退到二線，

這是組織上的措施，鄧以為大權在手了。全黨占統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劉、鄧利用毛主席休息時把錯誤路線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錯誤路線很適合於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觀未得到改造好，習慣以勢壓人，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有的是盲目地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現在只要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回頭，站到正確路線上來就是好的。我們還是要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再去做先生。我們的年齡也不輕了，不要再跌跤子了，跌了的爬起來再走。劉鄧的錯誤路線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但是時間很短，只要主席一點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們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我們黨還是興旺的，現在要求我們大多數同志，當錯誤路線一指出來，趕緊清醒過來和錯誤路線劃清界線，現在劉鄧並沒有承認錯誤，他還想進攻。最近中央組織部的喬明甫同志說，代表中央的是劉、鄧、彭，還有的人說鄧彭是實力派。

我們有些同志在組織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們發生關係，清醒過來就好了，我們批判反動的錯誤路線，要有無產階級無所畏懼的精神，只要一切為無產階級事業，黨的事業，我們有什麼不能丟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說過，只要我們一想起先烈，還有什麼不能丟掉呢？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所丟掉的是鎖鏈，是壓迫。我們丟掉的是思想上的錯誤鎖鏈。這對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對個人是好事。現在劉鄧還未丟掉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更頑固，現在有人說十年以後再算賬，這是鄭天翔說的，我們這些人年齡老了，更要看破人世，為世界革命有什麼不能丟掉的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

廣大群眾轟轟烈烈，從學校到社會，從文化的領域影響到經濟的、政治的、

社會的各方面，收穫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穫。黨內揪出了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搞臭了很多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還挖出很多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破獲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電臺、黃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確實是觸及了人們的靈魂。大破舊思想，大立新思想，這是一個深刻的大革命，社會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變化。毛主席的思想在這次運動中得到很大的宣傳，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對整個社會的教育，對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經過這次運動，不少青少年可能培養成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社會生產，並沒有如某些同志所擔心的，要受破壞。恰恰相反，生產還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應該促進生產的，而且在事實上已經得到證明。

...

思想，社會意識，世界觀，風俗習慣，政治觀點，法律觀點，藝術觀點，藝術中間的電影、戲劇、造型藝術、文學，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來叫做文化。我們為什麼要搞這個文化革命呢？要搞這個社會意識領域裏面的革命呢？決定的因素，就是因為我們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思想是從那裏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認為，思想是從物質來的。社會意識是從社會的存在來的，從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的佔有制度來的。全國解放以來，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我國社會的佔有制根本變化了。原來是地主的田地，我們沒收到農民手上，以後又轉到集體化。這是農業所有制經過的兩個變化：地主所有制變為農民個體所有制，又變為農民集體所有制。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經過種種的過渡階段，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現在要準備取消定息。經濟基礎既然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社會意識形態這個上層建築，一定要跟著變

化，一定要趕上去。如果我們不趕上去的話，就妨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鞏固，就會使我們進步緩慢，就會使新的社會生產力不能得到發展，就會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鞏固，就會走到資本主義復辟，就會使保護社會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權遭到顛覆，就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被推翻，就會走到修正主義統治中國，使中國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關係無產階級政權能不能鞏固、革命成果能不能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政治問題。

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有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政治，一個方面是經濟，一個方面是意識形態。

通過軍事戰爭，推翻一個政權，這是暴力的行動。我們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時間（當然以前還有很多年），就把國民黨打垮了，我們取得了勝利，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至於搞兩種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革命，時間就短些。可是，另外一個戰線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更曲折的鬥爭，這就是思想領域裏面的鬥爭。這要比取得政權需要的時間更長，比搞所有制的變化需要的時間更長。蘇聯的革命勝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資產階級思想肅清了多少？無產階級的思想增長了多少？五十年來的一個結果，史達林死了以後，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義，走向資產階級採取新的形式來復辟，走向資本主義制度用一種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現出來。南斯拉夫是第一個復辟的。除此之外，不單是蘇聯，還有若干“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勝利一、二十年，因為這一方面的鬥爭沒有抓緊，放鬆了，因此革命停頓、倒退、復辟等等現象都發生了。如果我們不抓緊這一點的話，我們同樣的要發生像蘇聯那樣、南斯拉夫那樣的情況。蘇聯搞了近

五十年，今天修正主義上臺統治。我們如果不始終一貫地來抓文化革命，也會產生這個結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當做國家大事，當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間，修改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同意寫上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重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經典的觀點，把它當成國家大事，當成政治問題。如果我們不抓緊文化革命，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那我們中途也要變顏色。

...

我們在奪取政權以後，就國內任務來說，除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搞經濟建設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設，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單我們如此，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這麼幹的。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統治階級，它是不許可同它相反的階級立場的思想傳播的，它一定要堅持它的思想，以便鞏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歷史上，每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儘管以代表全社會的面貌出現，但是，實際上是代表那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利益的。每一個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都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勞動人民的思想，在過去那些時代，不能占統治地位。而勞動人民大部分是長期被愚弄的，被欺騙的。我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說，要同舊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要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我們有權力、有必要來建立我們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的統治。

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取得統治地位，在經濟上取得統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取得統治地位。我們在經濟上推翻了舊的階級，在政治上推翻了舊的階級，可是在思想的領域，舊階級的東西還是很占勢力的。所以，我們有必要在這條路線上堅持不懈地、進行到底地來開展這個鬥爭。史達林搞了幾十年，並沒有

解決這個鬥爭問題。毛主席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我們來解決，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極其光榮而偉大的任務。

看來遠遠不是幾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幾百年，才能夠肅清舊的思想。當然，舊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對立在將來的社會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萬年，它總有新舊對立的。這樣，就必然還有一個思想領域裏面的鬥爭，總有新的要反對舊的，也總有舊的要保存，不讓，不肯退出歷史舞臺。那個情況，同今天我們進行的這種階級鬥爭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但是有共同點：新的要戰勝舊的。

相信將來還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鬥爭。所以，這個文化方面、思想領域的鬥爭是長期的鬥爭，不是一個簡單的容易的事情。

我們鬥爭的方式有的時候是採取報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胡風的反動思想的批判，對楊獻珍的批判，以及對吳晗、鄧拓、翦伯贊、周揚等的批判，等等，這些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運動，有很深刻的意義。可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要有像五個月以來的這種轟轟烈烈的，全社會都動起來的大掃蕩，大破除。這種運動，這種大戰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個堅固的基礎。這種運動的作用決不是那種報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這次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但是，大戰役和小戰役可能是交替進行的。

舊文化、舊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叫舊文化，舊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動權威，舊學術，舊道德，舊藝術，舊法律，舊教育制度，舊世界觀等等，這些東西，最本質的舊，舊是舊在一點上，舊在一個私有制上。概括來說，舊在一個字上，舊在“私”字上。那個新東西，新思想，

又新在哪一點上？概括來說，新在一個“公”字上。

人類社會沒有文字的歷史，那是很長了，至少是五十萬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億年，這是科學家的一種說法。可是在人類有文化的期間，這幾千年，都是階級社會，奴隸制度社會，封建制度社會，資本主義制度社會。這些社會的共同點是什麼？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各式各樣的剝削階級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樣八樣二十樣，但統統都是為私有制來辯護的。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土地也好，工廠也好，生產資料統統歸公。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鞏固這個制度，那就必須要破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舊文化，破除用各種各樣形式所表現出來的維護私有制、恢復私有制的舊意識形態。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和影響，最後勢必要恢復維護私有制的舊政權。反對破除舊文化舊意識形態的那些人，一定要壓制革命，壓制群眾。我們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須提倡為公的觀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來建設新的社會，塑造共產主義精神的人。什麼樣是共產主義精神的人？就是我們毛主席所提倡的張思德、白求恩、劉胡蘭、雷鋒，還有象歐陽海、焦裕祿、王傑、劉英俊等等，這就是共產主義的人，新型的人。我們新的社會需要這種人來創造，我們要漸漸地把社會上的人改造成這樣的人。

...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我講幾句，講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史達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

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上海發表的。

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沒有送出，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傳出去了。

文化革命運動時間還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現在十月，五個月不到。所以，同志們不那麼理解。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沖，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

上次會議，我說，會議的決定，有些人不一定執行。果然好多同志還不理解。經過兩個月以後，碰了釘子，有了一些經驗，這次會議就比較好了。

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你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化。

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勝利，開始誰也不知道怎麼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內。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們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實踐中間總結經驗，找出道路來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這個文化革命只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們現在就那理解了。

自從去年十一月批判吳晗開始，許多同志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等等，更不用講了。

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問題不能解決。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麼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

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麼兩個月以後，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講，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對。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至少這四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的幹部統統弄得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麼清楚，思想不通。

好幾個同志對我講，“原則上我是贊成的，到了具體問題上又糊塗了”。這種話我就不那麼相信。原則上你又理解，具體問題又不得解決，是什麼道理？現在我看，恐怕也有一點道理。不然為什麼老這麼講？原則上是贊成的，碰到具體問題又處理不好，恐怕還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就根本沒有開，有些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麼充分，被紅衛兵一沖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麼問題，以為表面上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都那麼快地就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我講這麼兩件事。一件事是歷史，講一線、二線的問題。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沖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了一些錯誤，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麼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麼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有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吧！他接觸了那麼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鐘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組織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澤東和黨中央

送決心書，表示堅決揭發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被陶鑄阻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各小組繼續討論。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華東組插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昨天各小組分組開會，研究了具體問題，徵求了各省、市的意見，今天向主席、林總請示，經過他們同意，今晚作原則的回答。

會議開得很好，主席說：“前一段開得還不那麼好，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利了。”大家要經受得住考驗，敢字當頭，在大風大浪中鍛煉，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目前的形勢還處在運動的初期階段，運動還可能持續五年到十年，主席說五年才能取得經驗。那還不是初期嗎？一浪推一浪，運動是方興未艾，繼長繼增，欲罷不能。運動的規律要逐步認識，逐步地摸出規律。從亂中摸出道路來。要把我們腦子裏的舊東西衝擊一下，每個人都要自己放在運動中去鍛煉。出修正主義是不可能的，全國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現，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認識，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裏糊塗的啦！像林總說的那樣，掉了腦袋，還不知道是怎麼掉了哩。這不能僅僅看著是個人威信的問題，要看成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要在運動中經受鍛煉，（舉了幾個人）經得起考驗，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決心，大好機會不要錯過，運動方興未艾，欲罷不能，要在群眾中進行鍛煉。現在我來回答兩部分問題。

第一部分：

（一）兩個會如何傳達的問題：主席提議各省回去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贊成要開公開的會議，不要開秘密會議。你們下車以後有可能被（紅衛兵）捉去，所以中央要發佈公開通知，宣傳討論，對紅衛兵講清楚，讓你們好好傳達，集中

精力開好會，抽出幾個同志處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學學生到中南海，預先並沒有通知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兩派鬥爭，既然他們來了嘛就不能讓他們靜坐絕食，要讓他們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劉瀾濤、霍士廉笑話我們。這是學習，群眾逼著我們學習。紅衛兵參加會議是不行的，因為這是黨內高級會議，紅衛兵不能參加，實際上一說就通了。

（二）傳達的內容和範圍：劉、鄧檢查要發到縣、團級，是否要擴大，須進一步考慮。

林總、伯達的報告，按主席的指示發到支部和紅衛兵小隊。伯達要求街上的亂傳的稿子要收回，不要傳出去，一句話說錯了，將來就難變，修改後兩本同時發下去，好滿足要求。

（三）林總和伯達的報告要分兩段傳達。先在三級幹部會上傳達，吃透了再發給支部和紅衛兵小隊，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會議結束後再向下發。各省會議時間最好大體一致，免得互相衝擊。主席廿五日的講話，也要向三級幹部會議傳達，如何向下傳達，以後再通知。

（四）其他文件（簡報、會議材料）大區、各省可帶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帶一份，如果機關不保險，可以放在軍區保存，省市、各部不帶回檔了，因為自顧不暇，如譚××（啟龍）。

（五）對文化大革命這是否可以設想一個時間表。如大區、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復直屬中央，減輕河北的負擔。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屬市再加 26 個省）大區、各省、市委機關的文化革命運動，初步設想，在春節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運動，也在春節前告一段落，是否能辦到，這要看那時的情況，這是設想。富春曾設想，部、司、局長十月半結束，但現在已過了，現在有

不少部長被學生扣起來了，比如呂東、榮高棠被扣，開會時還沒有回家，仍在學生那裏進行爭論。主席說春節前初步告一個段落這是設想，不要以此為限。也不要以為春節後日子就好過了，要考慮還有反復。昨天，聶榮臻同志去指揮發射導彈，去時主席說：“你是常指揮打勝仗的，這次可能打敗仗，要準備兩手才好。”結果打了勝仗，打得很好。常勝將軍也要準備打敗仗。總之，要時常準備兩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關政策和措施。十六條訂了，還要經常補充，事物是發展的。

現在回答幾個問題：

（一）革命大串聯問題。

（二）紅衛兵問題。

（三）四清問題。

（四）檔案問題。

第八節 兩報一刊

兩報一刊社論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同時刊出的社論。因《紅旗》仍按原週期刊載，有時就會出現同期刊有幾篇兩報一刊社論現象。《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紅旗》雜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理論刊物，《解放軍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機關報。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始於 1967 年 10 月 1 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結束於 1978 年 4 月 1 日《神州九億爭飛躍--歡呼全國科學大會勝利閉幕》。

原因

由於其時原有黨政軍權力運轉體系已經出現脫節現象，政令無法按既定形式暢達，兩報一刊社論就成為打破常規，越過所有行政層次直接傳達中共中央最高層聲音的一個管道，顯示領導核心團結、運轉正常的象徵。在當時的輿論體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檔的權威性，是以公開形式發佈的中共中央檔。它的撰寫多數不是出自兩報一刊的自主行為，而是中央領導核心的授意，從主題、立意、闡述角度、材料、結構、風格到作者、發表時間都有明確安排，有最高層輿論主管官員（政治局常委如陳伯達、和政治局委員如姚文元等）的參與、修改、審定。

介紹

社論經常擔負傳達毛澤東對運動的戰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階級隊伍"，無引語標識的用黑體字標出)並給以闡釋論述的職責，有的是事務性、帶有日程表的說明論述(1968年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論述(如批判劉少奇的《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有的是意識形態的理論論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論述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引起長久批評而成為歷史事件的著名社論，莫過於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披露毛澤東"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被判定為偽造遺言的奪權宣言)，和1977年2月7日《學好檔抓好綱》中提出的"兩個凡是"(被後來學者定義為導致華國鋒倒臺的政治綱領)。

社論的功能定位要求對全局具有指導意義。因此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各地報刊要頭版頭條全文轉載、廣播電臺要播送。這樣的社論遠遠超出文本範疇，本身就是政治權力的運作過程。

具體說，它是非常時期的一種組織形式和社會動員形式：兩報一刊社論發表前(前一天晚上 7 點)有預告(有重要廣播)，社論文本由新華社發電訊通稿；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軍隊、地方(各省市縣)和單位領導要組織收聽、記錄，收聽完要組織敲鑼打鼓慶祝遊行；要在最快的時間裏安排貫徹落實，成為制定工作規劃(大計畫小安排)、政策法規的根據，作為國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都要以此為中心，組織文章、報導，闡釋社論精神(據一個不完全的統計說，僅僅 1976 年 9 月 17 日至 30 日 14 天內，《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社《內部參考》、《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等 7 種報刊就有 236 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針辦"內容)，編寫學習輔導材料，報導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反響；政治學習要反復宣讀、宣講，座談心得體會，聯繫地區、單位、個人實際，重點在怎樣把社論精神變成單位和個人的思想、行動；甚至被收入課本，作為政治課、語文課的教材。中國以外的觀察家把它當成了在資訊匱乏條件下收集、感知、判斷中國動向的寶貴的資訊源。

由於挾持最高權威，在當時受眾心中社論論說高屋建瓴，文風氣勢磅礴，修辭精確生動，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對象，作文論證引證的經典。塑造、影響了文革時代的文風。個別地區還曾一度流行把《兩報一刊社論集》當作婚禮禮品的民俗。

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劉小楓把以兩報一刊社論為代表的這種語式稱為"社論'語式"。認為它是"一種道義-權力訴求"，指出"這種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內含--道義權力更有約束性"，被"階級的標籤"的"社論'語式'"成功地顛覆

了傳統的種種自在語式並進而獨佔全語域"，"甚至像抒情詩這種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論'語態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義-權力訴求理念的文人學者那裏，'社論'語式(表現於某些特定的選語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在的呢喃》，載《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三聯書店 1996 年版)

後來的研究者也把它作為剖析當時的思維、話語範式的典型文本。他們認為，它是特定歷史時期畸形政治的產物，其賴以運轉的政治/社會結構是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政黨統制體制，話語方式是用領袖/政黨學說話語代替新聞學術話語(辭彙頻率最高的是"革命"、"階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鬥爭"、"專政"、"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批判"、"路線"、"偉大")，經濟/文化基礎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統一的輿論宣傳，輿論生態是"黨報'本位'的封閉型傳媒環境。1990 年代以來，它往日的神聖、神秘不再，在人們的口語裏也逐漸含有貶義，成了調侃的素材。

中央文革關於學習兩報一刊社論的通知

中發〔68〕69 號

中央兩報一刊重要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以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慶祝湖南，安徽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的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五一”社論“乘勝前進”，傳達了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總結了革命委員會的經驗，指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望各級革命委員會，各革命群眾組織，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以及一切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認真組織學習和討論，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最新指示，繼續勝利前進。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第十節 周恩來等人談江青

我們的文藝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近幾年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是文藝革命化、大眾化、民族化的一個大飛躍。這些成就，都是經過嚴重的階級鬥爭，衝破了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重重障礙而取得的。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指導下取得的。這是在普及的基礎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這些樣板的影響和帶動下，已經產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學藝術作品，廣大的工農兵登上了戲劇舞臺。這個革命運動必將在各個文藝領域裏進一步深入地開展起來，必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在這裏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堅持毛主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路線的，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

族化的，但是，在實踐上，曾經犯過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做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感謝江青同志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

《周恩來同志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

(1966.11.28)

同志們！戰友們！我在這裏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奮鬥的生平，我們要曉得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當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分子，國民黨的反動派對她的迫害。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似的敢於向迫害、壓迫、摧殘誹謗、造謠的人反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所以當時江青同志戰鬥過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來讀一讀，那是紅文章。至於有些反動派誹謗者他們寫的壞東西，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這些黑幫、壞分子收集的臺灣、香港、美帝蘇修的材料。（黃永勝：學習江青同志戰鬥革命精神！）所以這樣收集的這些材料，就是這些黑幫反動派，帝國主義者、特務所寫的那些材料，誹謗的材料，這些人就是黑幫，所以我們要追究這些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的材料嘛！魯迅也遇到過嘛！何況江青同志那個時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藝術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欽佩她。在抗日戰爭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體不好的時候，也能勤懇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裏，還參加了我們解放戰爭。到了解放以後，這些黑幫分子，就是剛才說的，從大叛徒劉少奇起，劉、鄧、陶彭、

羅、陸、楊、彭德懷、賀龍，一直到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還有譚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跟他們鬥爭，所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我們就看見江青同志的表現麼，一九六四年的戲劇革命，八個樣板戲劇到今天還是光輝燦爛！（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這個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個二月提綱的時候，正是林付主席委託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文藝會談紀要的發表的同時，你們看一看鮮明的對照，一個是黑的，一個是紅的，多麼鮮明的對照啊！光輝的紀要，值得我們大家學一學，再重新學一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歷史時期，在剛才所說的照陳伯達同志的分析，按照我們剛才說的這些鬥爭當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裏，江青同志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也是嚴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度，來考察每一個同志，分清敵我的界限，當著是同志的時候，她非常誠懇熱心地幫助同志，當著判明是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勇敢地把她端出來，這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以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我不敢當，我還要學。

《周恩來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3.27)

“在這裏，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熱烈鼓掌）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

料！（熱烈鼓掌）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臺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口號：誰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誰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到了1966年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彭真寫了個《二月提綱》，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託，寫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談紀要》，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人手一冊，讀過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江青同志：功勞歸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們就打倒誰！）”

《周恩來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九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復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和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檔，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1966.03.22）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檔，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瞭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04.10）

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的幹部中間很傑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瞭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實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發現問題。文化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固然是主席的領導，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黨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獨特的作用，始終在

這個運動中站在最前線。（葉群：江青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責難逃！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林彪《在軍隊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8.03.24）

江青同志是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九·一八”就參加了革命。卅多年來，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江青同志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黨員。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來不願意出頭露面，所以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入黨的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開端。京劇改革的成績，外國人也不能不承認，好人宣傳這個事，壞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而江青同志就是這個京劇改革的首創者。（熱烈鼓掌）京劇改革以前，在北京很少有人看京劇，京劇改革之後，有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愛看京劇。賣票也要定座了，要定到好久才能看到戲，這是我們文化生活一個很大變化，現在只是一個開端，不能小視這個開端。這個改革對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係，差不多每個人都要看京劇吧！京劇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文藝的改革，京劇改革引起對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批判問題，這就引起了要檢查我們的文藝究竟執行不執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規定的路線，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是執行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還是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革命經常是由一個地方打開一個缺口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本人在內，都很感謝江青同志。

《陳伯達同志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07.24）

當前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無產階級宇宙觀，系統地、徹底地解決了我們文藝戰線上的問題。同時系統地、徹底地給我們開闢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條完全嶄新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的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改變了。同時，其他劇種也進行了改革。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臺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著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陳伯達同志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
(1966.11.28)

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臺，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

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陳伯達同志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967.05.23)

來源一：《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同志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南開大學衛東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紅海燕》編印，一九六八年二月。

來源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萬歲》，《重慶工人》編輯部一九六八年編輯。

第十一節 周恩來等對“聯動”頭頭的講話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楊成武等接見被關押（扣留）140多名“聯動”頭頭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二日晚）

背景：1966年8月初，壓制普通群眾文化革命運動、支一派打一派的工作組撤出各大中學校後，各校轉入以民選方式產生的文革委員會領導文化革命階段。在“民選文革委”籌備時期，“高幹子弟紅衛兵”趁工作組撤出之機，借用在工作組撤走前指定的在原文革委員會中的地位，搖身變成學校文化革命的主導。他們推行成分論、血統論，採取了矛頭重點對準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群眾子弟造反師生的文革路線，並將其推向極端，這與毛澤東矛頭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黨內“黑線”）的文革路線背道而馳，不久便遭到“群眾子弟紅衛兵”、普通師生的反擊和中央文革的打壓。隨著文革的深入，工作組和各地各級“當權派”在批判“資反線”（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脫離群眾、不相信群眾、壓制群眾、把給領導提意見的群眾隨意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訓政路線。其與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發地揭露黨政陰暗面的群眾路線是對立的）、“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官僚主義等思想和行為）中受到群眾造反組織的衝擊，眾多“高幹子弟紅衛

兵”由運動初期的“造反派”變成“保皇派”，一些爹媽受到群眾揭批的“高幹子弟紅衛兵”糾合一批“革幹子弟紅衛兵”，於10月1日分化出一個“聯動”組織，以北京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為骨幹，大搞“打、砸、搶、抄、揪、沖”。1967年1月17日，“聯動”組織因破壞文革路線、損害黨的政策、衝擊黨政機關、危害人民生命財產被中央取締，139名骨幹分子被管教，清華大學、北航等學校紅衛兵搗毀聯動的“據點”後舉辦了“聯動罪行展覽”。4月22日，毛澤東下令釋放了這批“聯動”成員。

這篇講話記錄，就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等人接見這批被釋放“聯動”分子時的講話。

伯達：請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眾答：沒有）有點不好，就是接見你們太少了，對你們幫助太少了。前一個時期我有病，沒有接見你們，我有責任，委屈你們了。主席說要立刻釋放你們。（眾呼，毛主席萬歲！很多學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個會都打斷了，請來了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謝富治、王力等同志都來了，和你們見一見。（眾拍手。）你們也不要寫自我檢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後如果你們還要“聯動”還可以把牌子掛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復你們原來的紅衛兵組織。如北大“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回去恢復你們的組織鬧革命。搞革命犯點錯誤不要緊，這個錯誤我們責任大，有個同學叫彭小蒙寫了兩次信給我，說牛宛平的問題，我也不清楚這個問題，派了個記者去瞭解了一下。

還是我責任大，對你們幫助少。你們去八寶山上墳（指用死人壓活人），搞

頹廢主義。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嘛！你們半夜裏出來喝酒，吃貓肉。你們關了多久了？（答：100 多天了。）（兩個月。）允許你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嗎？（允許）虐待你們沒有啊？（沒有）。責任我們負得多，教育得不夠，你們寫了一付對聯“為革命召之即來”，有點才氣。你們回去以後再恢復你們的組織，如北大“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傳達得怎麼樣，總之主席很關心你們。你們犯了一些錯誤，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伯達：江青同志講得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們放出來。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沒做好（江青同志插話：昨天和其他同學講時未講主席的命令，我們的意思是怕強加給他們。）大家出去決不能用毛主席的命令壓他們。你們犯的錯誤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們打過交道，也有西糾的。（江青同志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後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嘛。）犯了錯誤會使今後謹慎些，避免犯錯誤了。你們“聯動”是有思想基礎的，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麼“血統論”，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你們說有三萬人，有的說有十萬人要我辯論，我去了又沒辯論。你們有沒有這種說法？（未答）你們當時這種說法是反動的社會思潮，這就是反動的思潮，是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思想有聯繫的，是從那裏出發的，黨內有部分幹部長期在機關脫離群眾，沒有看到群眾，有相當的人不瞭解群眾。聽說你們看見別人的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當流氓打，老百姓的扣子未扣好的多得很。你們的父母在遊擊戰中經常穿破衣服，沒有鞋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了特權階層，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不是馬列主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反馬列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了。他們挑動群眾鬥

群眾，隨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來很快就糾正了。不能包辦代替嘛！毛主席從來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提倡包辦代替，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群眾當成阿斗。他們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國民黨的“訓政”，就是教訓群眾，結果使中國快亡了，這就是結果。中國共產黨救了中國，這其中有你們的父母作了一些工作，但主要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不能記在你的、他的父母帳上，要看到廣大的人民群眾，看到階級，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武裝起來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江山，不是個人的。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這點要充分警惕。劉少奇就是鎮壓群眾，把國民黨“訓政”搬出來，把群眾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們提倡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從劉少奇那裏來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也說要高幹子弟掌權。你們抄了劉鄧的口號。江青同志說過這是封建的世襲制度。掌不掌權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給你權，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這是一種思潮，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害了你們。我們見面少，對你們幫助少。聽說你們搞了頹廢生活，養了毛驢，養了狗，八一學校搞得亂七八糟，學校破壞得厲害。破壞最多的是幹部子弟學校。你們不知道老百姓怎麼勞動的，你們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窩窩頭是哪里來的。你們接近群眾太少，只在幹部子弟中來來往往，要吃虧的。說了你們服氣不服氣？（答：服氣）不服氣可以辯論。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給你們帶來損害。現在剝削階級，同時有高薪階層，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別是“八一”“十一”等學校給你們很大害處，使你們脫離了群眾，現在回過頭來好，中國有句古話：“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們並不是浪子，將來可能成為寶貴的財富。現在回過頭來很寶貴的，能不能成為寶貴的財富要看你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

度。將來沒犯錯誤的人不一定如你們，看你們的態度，但不是你們就對了。

對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麼殘暴的手段，你們是從舊的最壞的小說裏學來的吧？我們過去沒用什麼揪、砸，你們不是走一條正路。毛主席講科學，講實事求是，你們靠打、砸、搶怎樣能搞好我們的事業，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在座的，有些是上當的，有些傳單你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成了“聯動”。

要好好地領會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這樣是不是妥當，有沒有污辱你們？

（答：沒有）你們的願望是好的，但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聯動”的名字不反動，但綱領是反動的，代表反動的思潮。（江青同志插話：如果你們還要搞“聯動”的牌子的話，我給你們交通汽車，印刷等。父母革命兒女不一定革命，父母革命兒女可以革命。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我相信你們能夠革命。）父母有問題不要緊，國家可以培養你們，他們不革命，你們可以革命嘛，什麼“老子反動兒混蛋”，要給人家一個出路嘛！要看實際行動，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績吃一輩子，他們做好事，做壞事是一回事，你們做好事又是一回事。反動的血統論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長期的。（江青同志插話：你們過去犯的錯誤應該我們負，不要搞請罪，寫悔過書，主席最反對請罪，今後好好幹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風，你們可以回到學校去搞整風，灌輸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批評。對你們來說，要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你們過去犯的錯誤一筆勾銷。（江青同志插話：什麼手續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們可以回家去。）（眾：長時間歡呼毛主席萬歲！）

康生：我沒有更多的話講，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的講話我同意。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實在是幸福的。我經常這樣想，年青要

象你們這樣，是真夠幸福的。大家要珍惜這個幸福。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要有雄心大志。今天毛主席的決定，大家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麼偉大。（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你們有沒有革命的雄心壯志。（眾答：有）我也相信你們有，既然有，那麼有沒有勇氣，敢不敢承認在過去短短的時間犯的錯誤？（眾答：敢）看一個人有沒有勇氣，其中有一條就是勇於承認錯誤，過去我看醫生，看他是否承認三個“不”字，承認就是好醫生。看了病，不懂就說不懂，沒有把握搞好就說不能，治錯了敢不敢說不對。敢於說這三個“不”字是好醫生，不敢說這三個“不”字，就不是好醫生。我們要敢於承認錯誤，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要敢於承認。第二，就是要改正錯誤，回去以後，有的人會說句把閒話，你們回去別人不會放鞭炮歡迎你們的。這個說閒話那個說閒話，有的人不敢沾你們的邊，怕說親“聯動”。有的時候還要打一打架。這些都阻礙你們改正錯誤，你們要做好準備，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幫。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有本領的人，不是不犯錯誤，犯了就改正。犯錯誤也是一個鍛練，只要你們改正，相信你們會革命的，可以成為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周總理講話：江青、伯達、康生同志講的很好。的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寬大，犯了錯誤，給你們改正的機會。錯誤的原因有家庭的關係、社會關係、學校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有責任，你們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發源地。寫了三論“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說是好文章。可是三個同學後來都有聯動思想。可以說，你們落伍了。除了家庭、社會的原因以外，我們見你們少了，對你們幫助不夠。（江青同志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是：西糾初期還是有功績的，但後來就不象話了。）後來對你們就管得少了。過去責任盡的不夠，今後我們幫助你們，不但是我們，還有你們的家庭，還有社會。

今後加強我們的責任。我是沒有兒女的，我八一到學校參觀後，才知道你們這樣特殊。我有個侄女在八一學校，雖然不是“聯動”，但有“聯動思想”，在中南海北門罵解放軍說“就是你們把我們的同學抓起來的。”解放軍打電話告訴我，我們全家批評了她。讓她學習了一個星期的毛主席著作，後來讓她去八一學校，她參加了反“聯動”，成了造反派。你們一定要改，我們已經是老頭子了，有了錯誤還要改。

家庭這關要過好。家庭有兩種，一種是有的父母不贊成你們，罵你們甚至打你們，當然我們不贊成打囉！但生起氣來打幾下也是有的，你們要受得住，做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另一種是疼愛你們，溺愛你們，你們回去以後，大哭一場不見得好，不要一回家溫暖了，就舊病復發了，將來準備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見一見，談一談。家庭這關要過好。

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還有一類家庭，父母犯了錯誤，被鬥。那不要緊，你們是國家的財富，可以到公安部說一下，國家管你們，總會讓你們學習的。

到學校那就更困難了，他們知道你們被捕過、扣留過，甚至是同學把你們扭送到的公安部。當然我們要做工作，你們也要做工作。不要因為過去他們扭送你們，回去後就報復；但也不要氣餒。見了他們，既不自卑，也不要覺得了不起，好象我坐過監牢。要平心靜氣，叫別人感到誠懇，使同學們生不起氣來。

不要請罪，請罪是封建主義的產物。錯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評，還要能聽別人批評。回去以後勸說有聯動思想的孩子改過。這也是將功補過。你們受

過扣留，自己改好了還要說服他們改好。你們在學校裏參加戰鬥組織，要成為表率，成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講過“紅衛兵萬歲！”，你們要把紅衛兵光榮的旗幟再舉起來，要真正舉得高，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紅衛兵”。把自己過去的過失補上。（有同學寫條子，提到破四舊問題）（總理接著說）現在不忙破四舊。好好讀點書，談一談，做一點批評自我批評，把家庭、學校關係搞好。再過十天半個月後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談談。過去談得少，今後多談一點，把經驗總結一下。

我們相信你們絕大多數是會改好的。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你們跌了跤是有代價的，最後希望你們聽我們全黨全國的副統帥林副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江青同志：已發給紅衛兵的文件，統統發給你們。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一個小團體，會引起誤傳。你們自己考慮。

康生同志：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紅衛兵，也不要自悲感。才十個月有什麼老啊！（康生同志見一個學生留有小鬍子便說）把小鬍子去掉，你們同意的話，我也把小鬍子去掉。

摘自“紅代會”清華井崗山《通訊》南京大學“八·二七”材料組翻印 1967年5月4日

第十二節 首都紀念《講話》二十五周年

首都隆重集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 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

新華社（1967.05.24）

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同志出席大會

江青同志主持大會。陳伯達同志作重要講話。戚本禹同志發表長篇講話一萬六千多文藝戰士和工農兵、革命師生、革命幹部代表，決心以《講話》為指南，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新華社二十三日訊 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在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嶄新的歷史時代，首都文化藝術界和工農兵、革命師生、革命幹部代表一萬六千餘人，今天在雄偉壯麗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集會，隆重紀念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和有關方面的其他負責同志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聶榮臻、謝富治、劉甯一、江青、蕭華、楊成武、粟裕、蔡暢、鄧穎超、郭沫若、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吳德、汪東興等，出席了大會。

大會在給毛主席的致敬信中熱烈表示：“最最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向您保證：我們一定認真地學習、運用《講話》和您的一切指示，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批判文藝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切流毒；在大批判的同時，進一步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團結幹部和群眾的大多數，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開發表後舉行的這次大會，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大會，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獲得輝煌勝利的盛大檢閱，是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大勝利的莊嚴誓師！當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決戰階段，在全國各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正在聯合起來，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起總攻擊的關鍵時刻，這個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和偉大現實意義的大會，必將給我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和億萬革命人民帶來巨大的鼓舞和無窮的力量。

今天的人民大會堂，洋溢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的真摯的革命激情，充滿了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強烈的戰鬥氣氛。主席臺正中，高懸著全中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畫像，十面紅旗簇擁兩旁。在主席臺對面，兩幅紅色大字標語橫貫大廳：“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向工農兵學習，與工農兵結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徹底粉碎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參加大會的首都文藝戰士和工農兵、革命師生、革命幹部代表以及來京演出革命樣板戲的上海、山東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完全沉浸在慶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劃時代的偉大文獻發表二十五周年的無限歡騰中，一次又一次地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一遍又一遍地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下午四時十分，當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登上主席臺時，全場起立，掌聲雷動，“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經久不息，震撼著整個大廳。

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主持大會。大會開始後，全場同聲高唱《國際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在熱烈的暴風雨般的掌聲中，發表了重要講話（全文見第一、二版）。

陳伯達說：“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歷史時代。這是以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二十五年前，我們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預示著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即將在全中國到來，同樣，也即將經過不同的歷程，在世界各國到來。”“毛澤東同志這篇偉大的著作，是二十五年前以文藝問題為題，實質上是屬於政治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是圍繞著關於肯定工農兵或者否定工農兵這一個當代政治根本問題的一次大論戰的總結。”“這篇偉大著作，是我們黨關於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的一篇劃時代的政治宣言書，解決了一切要作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世界觀問題，解決了許多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是否入黨的問題，指出了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光輝道路。”“這篇偉大著作所涉及的，不限於文藝問題，但它又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於文藝鬥爭經驗的總結，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解決文藝問題的百科全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藝方面進行的一個全面的大革命，並且成為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和綱領。”“這篇偉大著作，在實質上，還成為世界上被壓迫階級、被壓迫人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政治大搏鬥的思想武器，成為各國革命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向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進軍的號角。”

陳伯達強調指出：“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同志一直關注著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一直把無產階級在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文化思想戰線上這些方面的鬥爭聯結在一起。十七年來，所有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重大問題，從批判賣國主義《清宮秘史》、奴隸主義《武訓傳》、唯心論《紅樓夢研究》開始，都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現在我們重新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毛澤東同志的關於思想、文藝問題的一系列戰鬥性檔，非常必要。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後的這一系列檔，是要大家注意清除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影響，而歸根到底，就是在於防備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陳伯達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和史達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陳伯達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臺，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接著，戚本禹同志作了題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的長篇講話（全文見第三、四版）。

戚本禹在講話中，敘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光輝著作產生的偉大意義和時代背景。他說：“在光輝燦爛的毛澤東思想的寶庫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部光彩奪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著作，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最完整、最系統、最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它是人類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光輝文獻。”

戚本禹回顧了全國解放後十七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他說：“從全國解放以來文化戰線上的尖銳鬥爭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所作的鬥爭，歸根到底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他又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以復辟和反復辟鬥爭為主要內容的階級鬥爭中，革命的文化大軍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氾濫的重要力量。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主要的是依靠手裏拿槍的人民軍隊，但是文化大軍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軍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樣肩負著保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任。”

戚本禹指出：“在今天，誰要是僅僅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還存在著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存在著無產階級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為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鬥爭，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戚本禹接著根據《講話》精神，對文藝界當前的戰鬥任務和方針、政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意見：第一，堅持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積極參加革命的大批判運動，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第二，組織左派隊伍，搞好本

單位的鬥批改；第三，抓創作，樹樣板，大立無產階級之新；第四，開展群眾性的文藝批評。

戚本禹說：“我們要在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展大批判的運動中，大破他們的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服務的文藝方向，大立我們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我們要以毛主席的《講話》為武器，積極參加大批判運動，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的江山。”在談到現在文化界有所謂究竟是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還是批判去年六七月間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爭論時，他說：“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同批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的。”“我們既要批判十七年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也要批判保護這條文藝黑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都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前大批判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深、批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樹立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

戚本禹最後說：“敵人在今後仍然要同我們進行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文化陣地處於階級鬥爭的前線，鬥爭更為複雜和艱巨，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會遇到新的困難和阻力，但是，歷史前進的車輪是不可抗拒的，威力無窮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任何困難和阻力都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

陳伯達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講話，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大家一次又一次地振臂高呼：“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的作曲者于會詠、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演員鐘潤良和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的指揮陳汝棠，先後在大會上發了言（全文見第五、六版）。

參加今天大會並在主席臺上入座的還有：

中共中央委員蕭勁光，候補委員劉建勳、趙毅敏；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謝鏜忠、穆欣；

中國人民解放軍負責人李天佑、王新亭、徐立清、邱會作、吳法憲、余立金、鄭維山、傅崇碧、李作鵬、劉西元、虞棘；

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唐平鑄、曹軼歐、李廣文、趙易亞、王唯真、李英儒、舒世俊、劉巨成、陸公達；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劉錫昌、徐鎧、王景瑞、魯文閣、苗永昆、鄧萬田、張桂福、黃作珍、劉紹文、範普權、牟立善、聶元梓、譚厚蘭、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李冬民、周景方、丁國鈺、高揚文、塗武生，委員吳富博、許永昌、劉慶生、洪振海、閻德璞、張振元、屈金河、鄭書才、趙天順、呂嘉才、吳式全、劉世珍、李自衛、薑大千、金樹良、李桂林、馬永祥、趙志璽、高清林、王勇軍、王春江、李樹林、李福茂、張鳳蘭、康淑芬、劉瑞敏、林茂、鹹毅山、孔祥秀、劉大亂、黃金相、張永和、由文俊、劉同聲、甘俊、吳志堅、閻成恩、陳榮金、朱成、譚劍峰、楊哲、馮興旺、劉長信、潘朝東、王德祥、陳兆琪、薛玉峰、程金香、陳永康、劉龍江、楊壽山、楊少橋、梁家瑞、王振宗、王鐵明、何秀芳、葉華寶、張文蘭、蒲文清、曹淑青、梁月英；

各方面的代表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錢學森、張本、朱光亞、關肇直、許廣平、於立群、廖初江、王善福、張映哲、劉素媛；

演出《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八個革命樣板戲的各單位的代表童祥苓、沈金波、李麗芳、趙文奎、聞捷、錢浩梁、譚元壽、馬長禮、宋玉慶、樂玉峰、王國華、鬱蕾娣、餘慶雲、顧峽美、凌貴明、張雲卿。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的委員，也參加了大會。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勝利結束。

第二章 文革中的武鬥

第一節 武鬥第一槍

全國各地幾乎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到處都發生武鬥，僅區別於規模而已。這裏介紹的僅是說明當時的情況而已。

文革中的武鬥

全國武鬥掠影

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是上海首先打響的。早在 1966 年底，上海兩大派別組織的對立已呈白熱化狀態。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另一派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赤衛隊”成立之後，發展迅猛，號稱 80 萬人。他們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開反對張春橋與“工總司”簽字的五項要求。

經過一次次明裏暗裏的較量，雙方的鬥爭越來越激烈。1966 年 12 月末，被“工總司”劫持的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壓力，無可奈何地公開表示：“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這一來矛盾更為複雜。原來支持上海市委的“赤衛隊”有被遺棄之

感，索性也召開大會，要“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方面，“赤衛隊”緊急商討對策，決定給黨中央、國務院打電報，要求中央派專人來解決上海問題；另外，調集人馬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帳。無疑，“赤衛隊”要“算帳”，卻找錯了債主。這一情況經進京向張春橋彙報情況的馬天水一番渲染，變成了“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並且還要搞全市性停電、停水、停交通、罷工等。很快，各種紅衛兵小報紛紛出版號外，稱“赤衛隊砸了張春橋的家”。號外上還登有張春橋被砸的照片和張春橋妻子李文靜署名發表的《聲明》。李文靜在《聲明》中寫道：“今天，有一批‘赤衛隊’無視公安部的規定，公然衝擊我的家。……我呼籲上海造反派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謹防舊上海市委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轉移鬥爭大方向，撈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發生什麼衝突，陳丕顯、曹荻秋罪責難逃……”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條規定明文指出：誰衝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這樣，“赤衛隊”自然成了反革命。12月29日，“工總司”在上海衡山飯店設立了“火線指揮部”，由王洪文等人調集了十多萬造反派成員，準備向“赤衛隊”發起衝擊。衝擊“赤衛隊”的情況，在當時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有如下記載：工人造反派員從下半夜兩點鐘左右開始向盤踞在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衛隊進行衝擊。到6點多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7點鐘，近2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條馬路上集中，袖章繳獲下來六大堆。這是上海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武鬥中，“赤衛隊”91人受傷。兩天後，“工總司”發佈《緊急通令》，在各級造反派把“赤衛隊”大小頭頭統統抓起來。之後，240多名“赤衛隊”頭頭被關押。

上海的武鬥，只是全國大規模真槍實彈武鬥的前奏。

第二節 上海文革最血腥的武鬥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調動十餘萬餘萬人馬攻打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上柴聯司），爆發上海文革中最大規模最血腥的武鬥。此後，工總司司令王洪文終於於坐穩「工人領袖」，以致日後被毛澤東欽定繼林彪之後的中共接班人。

上柴是上海東北角萬人大廠，文革初形成兩大派：以黨團員、幹部為主的東方紅總部和以青年工人、普通職工居多的聯司。東方紅早一步找到工總司為靠山。聯司則參加赤衛隊與東方紅唱對臺戲，赤衛隊垮臺後聯司又加入工總司楊浦區分部。不料後者並非王洪文嫡系，被工總司砸了。廠內聯司則占上風，奪了工廠領導權。六七年一月聯司的人找到張春橋的上海住處，張春橋不願見，有人翻牆入院。次日王洪文帶萬余人人沖入上柴興師問罪，抓走聯司二百多人。從此聯聯司與工總司公開對立。

僅三千餘人的聯司面對數十萬之眾的強大對手不甘示弱，便去公安局請願，在市中心貼標語、大字報；宣傳車上街大聲控訴。一時聯司在上海家喻戶曉。三月王洪文以市革委會名義派軍宣隊進駐上柴，四月軍宣隊宣佈聯司大方向錯了。

上海交大青年助教湯福坤，與清華大學畢業的聯司負責人楊仲池志同道合。湯成為聯司的高參，以「全向東」化名著文、演說、獻策。湯成立支持聯司的聯絡站（支聯站），一時上海反王洪文、工總司和不滿文革現狀的各股勢力紛紛集聚。全向東公開指責王洪文推行一條“新型的帶手銬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面對心腹之患，王洪文毫不手軟：設代是以“888”號秘密據點，專事掌控聯司的活動；派間諜秘密打入支聯站，搜集情報。七月十八日上柴工具車間兩派爭吵導致武鬥，工段黨支部書記解福喜混亂中受傷死亡。三天後王洪文以市革委會政法指揮部名義發佈通令，稱聯司“私設公堂嚴刑拷打解福喜，以致慘死”，責令聯司頭頭交代罪行，交出兇犯。當晚召開幾十萬人追悼會。

七月三十一日晚支聯站成員開會。王洪文獲得密報急調上體司一群身強力壯的打手突擊，全向東和三十餘參加會議者被擒，關進公安局頓時支持聯司的全市性力量群龍無首。八月三日派去上柴的宣傳車受圍攻，於是攻打聯司的藉口有了。八月四日凌晨張春橋從北京來電：“群眾起來要動，就讓他們動吧！”市革委會內部的異議就此平息，一場血戰在所難免。

八月四日清晨通向上柴的軍工路上車水馬龍。廠旁黃浦江上登陸艇，打撈船遊巡。十多萬工人手執武器，團團圍住上柴。王洪文等拿望遠鏡、對講機指揮。聯司早有準備，築好防衛工事，貯備糧食和長矛、頭盔、磚石、燃燒瓶等。近千名聯司成員包括一些不願撤離的婦女在廠內居高臨下嚴陣以待。高音喇叭呼喊：工人不打工！

晨八時王洪文下進攻令。數百名敢死隊員，一波波衝擊堵塞的工廠大門，被彈弓射射來的鐵螺絲帽和拋下的磚石擊退。中午大型鏟車撞破一段圍牆，後來大門被二十五噸履帶吊車衝開，後門也被攻破。三路人馬潮水般沖入，聯司退守幾幢大樓，繼續抵抗。

十多輛消防車馳援，高壓水龍猛烈噴射。冒著石塊、燃煤瓶、從雲梯水管上攀的進攻者與窗戶裏，屋頂上的抵抗者用鋼斧、鐵棒、長矛展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血肉橫飛場面慘烈。此時兩架直升飛機低空盤旋，在空中拍攝實況影片。進

攻者誤認為空軍支援，一時士氣大振。聯司成員前僕後繼，終於寡不敵眾。大樓一幢幢被攻下，最後聯司總部所在四號樓經逐層搏鬥後也陷落，楊仲池在地下室被捉。俘虜一律挨頓毒打，男人上衣剝光，個個被迫作舉手投降。上千遍體鱗傷體的聯司成員在鐵棒、長矛之間哼著《國際歌》緩緩走上囚車。重傷倒地血肉模糊的俘虜像貨物一般被扔上車。晚六時上海最慘烈的武鬥落幕。

次日，武鬥時不在廠內的聯司成員一個個被抓來“補課”受刑，刑具數十種。聯司一方共傷千人，其中一百二十餘人殘廢，死十八人。工總司一方傷者近千，有的頭皮破裂，有的斷腿，有的燒傷，也十分慘重。

“八四”後王洪文兼任上柴廠革委會主任。全市成立專案組，關押六百餘人，最長達八年，追查聯司的“黑後臺”直指陳丕顯顯、陳陳毅、李富春、周恩來來等中共老幹部。

一九七〇年九月毛澤東與王洪文在上海長談，毛提及“八四”時他正在上海，看到武鬥的現場紀錄影片。毛讚賞王洪文：“打了勝仗，穩定了上海形勢”。可見毛澤東完全支持“八四”行動，也以此作為火箭式提拔這位工人造反派司令任中共副主席的功績之一。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一九八一年一月王洪文被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八四”行動列為主要罪狀。數年後王病死獄中。

文革中周恩來親自指揮的兩次軍事行動

“文革”開始後的1967年2月15日，原屬於北京軍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xx軍奉中央軍委命令轉隸蘭州軍區，由山西進駐陝西，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任務，軍部駐地也由太原市移至西安市。

2月22日夜，軍部突然接到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要求軍長胡煒于2月23日晨乘坐專機前往北京領受任務。

次日上午，胡煒乘坐國務院派去的專機抵達北京。下了飛機，便驅車前往京西賓館。此時，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在京西賓館舉行。胡煒由工作人員領進會場後，看到周恩來總理正在講話。秘書走到周恩來的身邊，低聲向他作了報告，周恩來朝胡煒看了一眼，繼續他的講話。胡煒找了一個空座位坐了下來。

大約11點鐘，周恩來講完話，會議也就結束了。周恩來站起身，徑直朝胡煒走來。胡煒雙腿並立，腰杆挺直，以標準的軍人姿態向總理敬了一個軍禮。看樣子，周恩來對於陝西省的局勢比較焦慮，也沒有另找一個場合與胡煒談話，直接給他佈置了任務。

周恩來說：“西安現在很亂，大遊行、大辯論、大喇叭。西安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你們部隊到達西安以後，要盡力穩定形勢。你們要做工作，促使兩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現在，西安兩派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們見見面，瞭解一下情況，做做工作。”

遵照總理的指示，第二天，胡煒先後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區駐京辦事處兩地，分別與住在那裏的西安地區兩派群眾組織頭頭見面，和他們談話，瞭解情況。

3月2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接見了胡煒以及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王明坤、蘭州軍區空軍副政委劉鎮、西安地區群眾組織頭頭40余人。

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介紹說：“為了穩定形勢，中央決定派xx軍到陝西省執行‘支左’任務。今天xx軍軍長胡煒同志也到會了。”

胡煒站起身，向周恩來和大家敬了一個禮。

周恩來接著介紹道：“胡煒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軍年輕的軍長。xx軍到陝西省以後，你們兩派群眾組織都要支援軍隊的工作。”

周恩來的這一番話，顯然是為軍隊著想，為軍隊進駐陝西以後能夠順利地開展工作而創造一個比較好的條件和環境。

談到陝西省的形勢時，周恩來目光炯炯，掃視著在座的 40 多位群眾組織頭頭。他雖然語氣溫和，娓娓而談，但言語之中又透著幾分嚴厲：“你們把西安的形勢搞得這麼亂，光講自己正確，光想壓制別人，這算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嘛！兩派群眾組織要整風，大學要搞軍訓。兩派群眾組織都要克服自己的問題，要聯合起來，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讓生產停頓！”

接見結束以後，胡煒回到了京西賓館住處。深夜 12 點鐘，他正準備休息，電話鈴突然響了。電話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打來的，要他馬上去人民大會堂，說總理要再次接見他。胡煒不敢怠慢，立刻穿好軍裝，動身前往人民大會堂。

到了人民大會堂，胡煒看到，除了他，一道參加接見的還有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王明坤、蘭州軍區空軍副政委劉鎮、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薛焰。

周恩來先是問了陝西省的情況，接著作了指示，主要內容是：現在地方黨政機構已經癱瘓，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要組成統一的“支左”領導機構，暫時把全省的工作管起來。要穩定形勢，促進聯合，抓好生產。軍隊的負責幹部要和群眾組織協商，做好群眾組織的工作。讓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領導幹部出來工作，一面接受批評，一面抓好生產。

說到霍士廉、薛焰等領導幹部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裏去，陷到那裏，不好工作。”

幾天內受到周恩來三次接見，胡煒覺得總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統一駐陝部隊(包括省軍區、野戰軍、空軍等)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統一地方和部隊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齊心協力，一道做好群眾組織的工作，以利於陝西省局勢的穩定，迅速恢復生產。胡煒和參加接見的陝西省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對於總理的指示都表示擁護，並表示堅決貫徹落實。

在江青“文攻武衛”和王力、關鋒“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鼓動下，漸趨穩定的形勢重新緊張。一造反派陰謀搶劫解放軍武器庫，周恩來向胡煒下命令：“你要派部隊加以保護。必要時，可以開槍！”

胡煒軍長所轄部隊，是中央軍委專門派赴陝西省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理所當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項工作。他們進駐陝西省以後，抽調大批幹部、戰士組成了幾百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廠礦和一些企事業單位。同時，他們把西安交通大學等4所院校的學生集中起來，進行為期1個月的軍訓。這樣，把學生穩定在校園裏，減少了對社會的衝擊和干擾。通過軍訓，也加深了學生和解放軍指戰員之間的溝通和瞭解，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感情。同時，由於陝西省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比較統一，工作得當，陝西省的形勢很快就穩定了下來。

1967年5月下旬，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和胡煒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工作。

5月24晚，周恩來在釣魚臺16號樓中央文革碰頭會辦公室接見了黃經耀、胡煒二人。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聽取了黃經耀、胡煒二人的彙報後，周恩來感到很滿意。他首先肯定了陝西省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們要進一步做好兩派群眾組織的工作，促使兩派聯合起來，鞏固和發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時還特別指出：“資產階級派性是很頑固的，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脹，防止形勢出現反復。”

許多善良的同志都以為，陝西省就此可以風平浪靜了，不管運動怎麼搞，有野戰軍的一個軍在陝西坐鎮，至少不會出什麼大的亂子。但他們沒料到，不久後，江青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和王力、關鋒為《紅旗》雜誌起草修改的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惡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團時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個革命組織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文鬥，堅決反對武鬥，這是第一條。……但是還有第二條，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支、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

第二天，《文匯報》披露了江青這個講話的精神。這樣，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好像聽到了衝鋒號，都打著“文攻武衛”的旗號招搖過市，武鬥愈演愈烈，逐步升級。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由王力、關鋒等起草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社論說：“我們必須進一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王力、關鋒起草的這篇社論，影響也十分惡劣。社論發表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紛紛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解放軍，貼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大字報，衝擊解放軍軍營，毆打部隊幹部戰士，搶劫槍支彈藥，甚至公然搶劫解放軍的武器彈藥庫。

8月5日，也就是王力、關鋒“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發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頭就貼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大字報和大幅標語，赫然入目，聳人聽聞。一派群眾組織動員了數萬人上街遊行示威，在部隊門前靜坐。而與其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也動員了數萬人上街遊行，並高喊口號：“反軍亂軍，絕無好下場！”

原本矛盾已經得到緩解的西安市兩派群眾組織，轉瞬間就怒目而視，變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兩派的矛盾逐步激化，並最終於9月2日發生了一起較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幸虧解放軍官兵及時趕到武鬥現場，才避免了更大的傷亡。

9月4日，設在西安市的軍部總機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打來的，說總理要胡煒軍長接電話。

胡煒拿起話筒，聽到了總理那熟悉的聲音。周恩來告訴胡煒：西安市有一派群眾組織離開了西安，竄到陝西省某地的解放軍武器庫附近一帶，與當地的造反派組織糾集在一起，企圖搶劫那裏的武器彈藥。

介紹完情況，周恩來以一種命令的口吻說道：“胡煒同志，你要派部隊嚴加保護。必要時，可以開槍！”

如同在戰爭年代接受戰鬥任務一樣，胡煒雙腿併攏，筆直挺立。他手持話筒，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斬釘截鐵地說：“請總理放心，我們堅決執行總理的命令，保證完成任務！”

造反派武鬥升級，由大刀、長矛發展到動用真槍、真炮。中央頒佈命令：解放軍在遇到特殊情況時，“有權自衛反擊”。西安市造反派搶劫武器彈藥庫的企圖未能得逞

在採訪中，當聽胡煒將軍說周恩來總理曾經親自向他下達過“可以開槍”的命令時，筆者感到非常驚訝。這種極為罕見的現象，不僅僅是筆者，恐怕就連長期從事黨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聞所未聞的。那麼，究竟是什麼萬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來用了如此嚴厲的措詞呢？為了搞清楚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筆者查閱了很多相關的資料，並作了大量調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地的武鬥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武鬥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磚頭、棍棒、大刀、長矛等，尚屬冷兵器時期；二、武鬥進行到一定的階段。此階段，各地對立的武鬥隊都想置對方于死地，都覺得原先那麼打不過癮，於是都想方設法去搞武器裝備。

1967年5月下旬，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和胡煒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工作。

5月24晚，周恩來在釣魚臺16號樓中央文革碰頭會辦公室接見了黃經耀、胡煒二人。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聽取了黃經耀、胡煒二人的彙報後，周恩來感到很滿意。他首先肯定了陝西省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們要進一步做好兩派群眾組織的工作，促使兩派聯合起來，鞏固和發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時還特別指出：“資產階級派性是很頑固的，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脹，防止形勢出現反復。”

許多善良的同志都以為，陝西省就此可以風平浪靜了，不管運動怎麼搞，有野戰軍的一個軍在陝西坐鎮，至少不會出什麼大的亂子。但他們沒料到，不久後，江青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和王力、關鋒為《紅旗》雜誌起草修改的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惡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團時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個革命組織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文鬥，堅決反對武鬥，這是第一條。……但是還有第二條，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支、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

第二天，《文匯報》披露了江青這個講話的精神。這樣，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好像聽到了衝鋒號，都打著“文攻武衛”的旗號招搖過市，武鬥愈演愈烈，逐步升級。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由王力、關鋒等起草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社論說：“我們必須進一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王力、關鋒起草的這篇社論，影響也十分惡劣。社論發表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紛紛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解放軍，貼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大字報，衝擊解放軍軍營，毆打部隊幹部戰士，搶劫槍支彈藥，甚至公然搶劫解放軍的武器彈藥庫。

8月5日，也就是王力、關鋒“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發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頭就貼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大字報和大幅標語，赫然入目，聳人聽聞。一派群眾組織動員了數萬人上街遊行示威，在部隊門前靜坐。而與其對立的另一派群眾組織也動員了數萬人上街遊行，並高喊口號：“反軍亂軍，絕無好下場！”

原本矛盾已經得到緩解的西安市兩派群眾組織，轉瞬間就怒目而視，變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兩派的矛盾逐步激化，並最終於9月2日發生了一起較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幸虧解放軍官兵及時趕到武鬥現場，才避免了更大的傷亡。

9月4日，設在西安市的軍部總機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打來的，說總理要胡煒軍長接電話。

胡煒拿起話筒，聽到了總理那熟悉的聲音。周恩來告訴胡煒：西安市有一派群眾組織離開了西安，竄到陝西省某地的解放軍武器庫附近一帶，與當地的造反派組織糾集在一起，企圖搶劫那裏的武器彈藥。

介紹完情況，周恩來以一種命令的口吻說道：“胡煒同志，你要派部隊嚴加保護。必要時，可以開槍！”

如同在戰爭年代接受戰鬥任務一樣，胡煒雙腿併攏，筆直挺立。他手持話筒，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斬釘截鐵地說：“請總理放心，我們堅決執行總理的命令，保證完成任務！”

造反派武鬥升級，由大刀、長矛發展到動用真槍、真炮。中央頒佈命令：解放軍在遇到特殊情況時，“有權自衛反擊”。西安市造反派搶劫武器彈藥庫的企圖未能得逞

在採訪中，當聽胡煒將軍說周恩來總理曾經親自向他下達過“可以開槍”的命令時，筆者感到非常驚訝。這種極為罕見的現象，不僅僅是筆者，恐怕就連長期從事黨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聞所未聞的。那麼，究竟是什麼萬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來用了如此嚴厲的措詞呢？為了搞清楚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筆者查閱了很多相關的資料，並作了大量調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地的武鬥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武鬥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磚頭、棍棒、大刀、長矛等，尚屬冷兵器時期；二、武鬥進行到一定的階段。此階段，各地對立的武鬥隊都想置對方于死地，都覺得原先那麼打不過癮，於是都想方設法去搞武器裝備。

為了弄到真槍真炮，他們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基層的人民武裝部和民兵組織。20世紀60年代，我國中型以上的國營工廠、農村的人民公社都設有人民

武裝部和民兵組織，並配備了一定數量的武器彈藥。所以，最先遭到“造反派”搶劫的是這些基層人民武裝部和民兵組織的武器彈藥。

當江青“文攻武衛”的講話和王力、關鋒“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出籠之後，造反派就開始公然搶劫所在地軍分區、省軍區、解放軍部隊的武器彈藥。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軍區軍械一庫、二庫的武器彈藥先後被造反派搶劫，被搶走的有迫擊炮、輕重機槍、衝鋒槍、手槍、信號槍、手榴彈、子彈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陽軍分區、邵陽武裝部的武器彈藥庫先後被造反派搶劫，被搶走的有各類槍支、迫擊炮、手榴彈、子彈等。

針對這種嚴峻的局勢，1967年9月5日，經毛澤東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了《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群眾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哪一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船舶上裝載的武器彈藥；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今後如有違反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無效時，可宣佈這種搶奪是反革命行為，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命令是9月5日頒佈的，也就是說，周恩來總理于9月4日向胡煒下達“必要時可以開槍”的命令時，“九五命令”已經決定頒佈了。

我在採訪胡煒將軍時，他感慨萬分地說：“周總理一向做事謹慎，輕易不會下達開槍令。這也是迫不得已啊！這個倉庫的武器裝備，可以裝備幾個步兵師，一旦被搶，整個陝西省就要大亂。不僅如此，還會威脅到鄰近的省份。周總理給我打過電話之後，又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聯絡員吳斌同志給西安交通大學造反派頭頭打電話，責成他們立刻前去把準備搶奪武器彈藥的人員全部撤回來。”9月4日，胡煒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沒有片刻遲疑，馬上就向徐保儉團長下達了命令，要他親自率領1個營的兵力，用最短的時間火速趕到該武器庫，全面接管武器庫的防務。

因為有總理“可以開槍”的命令，部隊官兵也就不再畏手畏腳了。部隊一到該武器庫，徐保儉就命令戰士們把武器庫的防務全面接管過來，裏裏外外佈置了好幾道警戒線。他們架起機槍，子彈上膛，並向造反派發出警告：如果有誰膽敢跨越警戒線搶奪武器彈藥，解放軍就要執行周總理的命令，開槍制止！

在解放軍指戰員強大的武力威懾下，西安市造反派搶劫該庫武器彈藥的企圖沒有得逞。

川陝兩支武鬥隊匯合一處，意圖奪取秦嶺深處的一座國家戰略儲備油庫。周恩來再次直接打電話給胡煒，命令他馬上派部隊趕去制止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30萬群眾在市中心的新城廣場隆重召開慶祝大會，正式宣告陝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瑞山任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黃經耀、胡煒等11人任副主任。

雖然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了，但陝西省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其主要表現就是鄰近的省份河南省、山西省、四川省、湖北省的武鬥事件持續不斷，受其影

響，陝西省境內的惡性事件、大規模的武鬥事件也在逐步升級，範圍在不斷擴大，並且有省內外造反派武鬥人員互相勾結、互相支援之勢。

5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的軍部總機再一次接到周恩來總理打來的電話。周恩來首先向胡煒通報了一個情況：四川省廣元地區一支幾百人的武鬥隊沿寶成鐵路竄到了陝西省境內，與陝西省漢中地區的一支武鬥隊結成一夥，包圍了秦嶺山脈深處、寶成鐵路附近的一座國家戰略儲備油庫。接著，周恩來在電話裏給胡煒下達了命令：“胡煒同志，你馬上派部隊去解決這個問題！”

放下電話，胡煒隨即命令駐守在寶雞市的解放軍某師師長孫玉水率領兩個營的兵力迅速前往秦嶺山脈深處，保護國家的戰略儲備油庫，制止和平息那裏的事態。

由於情況緊急，孫玉水接到命令率部出發時，來不及對部隊進行動員，拉起部隊就走。

那天夜晚，正值下雨。夜色裏，秦嶺山脈黑雲密佈，雷電交加。隨著一聲聲短促、急切的口令，6個連隊的幹部戰士踏著四濺的雨水，跑步集合完畢。身穿雨衣的指戰員一個個荷槍實彈，神色嚴峻，在寶雞市陸續登上了卡車。隨著一陣陣汽車發動機的轟鳴，一盞盞汽車前燈如同一把把利劍，劈開雨霧和夜幕，長蛇般急速向秦嶺大山裏進發。

部隊出發之前，孫玉水已給駐守在陝西省略陽縣的張文斌團長下達了命令，命令他率領兩個連從略陽乘火車向油庫所在地進發。兩路部隊，分進合擊。

如今，孫玉水已經去世。我採訪了現居住在西安市的張文斌。張文斌老團長離休前先後擔任過漢中軍分區副司令員、商洛軍分區司令員。他回憶道：“秦嶺大山裏有一座大型油庫，距離寶成鐵路線還有七八公里，火車把油罐車拉到

油庫附近的一個火車站，再通過輸油管道把油輸送到油庫裏。那是從國家戰略需要出發，60年代專門在三線大後方設置的。1968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孫玉水師長突然從寶雞給我打來電話，命令我率領駐紮在略陽的兩個連乘火車出發。兩路部隊，分進合擊。當天夜裏我就和略陽鐵路部門聯繫，調來了一個火車頭，在後面加掛了五六節車廂。秦嶺的公路本來就不好走，那天晚上還下著大雨。孫玉水師長率領的部隊走到鳳縣時，因為雨下得太大，山路泥濘，道路實在是不好走，不得不停頓了一下。孫師長在出發前，都沒有時間對部隊進行動員，他是在鳳縣對部隊進行動員的。孫師長在動員時告訴幹部戰士們：今晚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任務是什麼，對大家提出了要求……離開寶雞時，那6個連隊糊裏糊塗的，都不知道師長要帶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第二天中午12時左右，孫玉水率領的6個連和張文斌率領的兩個連幾乎是同時抵達油庫附近。孫玉水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指揮部隊迅速控制了油庫，把火車站和油庫一帶的幾個山頭都給佔領了，佔據了制高點，裏裏外外佈置了幾道警戒線。

來自四川廣元、陝西漢中的兩支武鬥隊，不知道從哪兒事先得到了消息，說是解放軍派來了大批部隊，晝夜兼程正在朝這裏進發，便嚇得逃之夭夭了。所以，解放軍部隊沒有和他們發生正面接觸和衝突。文章來源：東北新聞網

第三節 槍林彈雨

我也經歷過槍林彈雨——文革紀事作者：非文

文革動亂我不僅看過許多死人，也經歷過槍林彈雨。



1967年7月13日，以“七一三事件”為標誌，蕪湖兩派對立的造反組織和爆發了大規模武裝衝突，一串串信號彈刺破夜幕，密集的槍炮聲響徹蕪湖上空。至此，“三籌處”和“聯總”的武裝人員，在蕪湖中山路等地壘起街壘，佔優勢的“三籌處”嚴格盤查過往行人，機槍流彈滿街飛。我們家和鄰居們吃了一個多星期的麵條，沒人敢上街買菜也沒有人賣菜，實在熬不過去了【鹽和米總是要吃的】，家中主事的男人就冒險出去，貼著牆根躲著流彈去糧站供銷社購點米油鹽。

一天父親出門後就沒了音信很晚才回家，敘述他被綁架險些喪命的經過。那天父親出門後在街角突然被人蒙住雙眼拖到一個地方，房間有人厲聲呵斥：

“XXX，你必須老實交代！”父親一聽名字不對知道他們綁錯了人【那時造反派

已經顧不上批判走資派自己在打內戰】，趕緊大喊：“我是走資派 XXX 不是 XXX...” ，經過戰爭年代的父親很鎮定，報上自己走資派的身份名字，在對方準備打人拷問時及時化險為夷，最後被蒙上眼原路放回。

一對上海夫婦為了躲避武鬥買了回上海的車票，老婆先回上海老公處理一些善後事情準備晚一天回去，沒承想第二天男的就被流彈打死在和平大戲院前的馬路中央，屍體就這麼一直趴在蕪湖最繁華的馬路中央，老婆在上海頓報紙呼籲吶喊，還是沒人敢去收屍，數月暴屍在街頭。

就在人心惶惶之際，1967 年下半年傳來了“五湖四海”到居民家武裝搶劫的消息。

文革時期全民都組織戰鬥隊，清潔工組織的叫“鐵掃帚戰鬥隊”，醫療衛生部門組織的叫“白求恩戰鬥隊”等等不一而足，最為荒誕和諷刺的是小偷盲流們組織的“五湖四海”戰鬥隊【名字起得何等貼切！】，乘亂持槍武裝搶劫居民。無奈之下居民只有自發組織起來自保。

一天傍晚“五湖四海”一溜十多人到地委所在地張家山打劫來了。

那時蕪湖地委總共只有 2、3 個三層樓建築，號稱“縣長樓”，因此成了打劫的主要對象。我家在樓的最西邊大套無遮無擋，一樓和三樓的人都不敢在家裏呆，好多人都跑到二樓的我家，父親是打過遊擊戰的老新四軍，被視為整棟樓的主心骨，他安排各家各戶備好鍋盆到時聽他指揮。我家成了與打劫匪徒正面交鋒的主戰場。

那天彎腰在陽臺望風的我們，看見對面三十米開外有十餘人彎腰匍匐朝我們樓逼近，手上拿著槍不時地朝我們放上一槍。

那“八勾、八勾”的清脆槍聲令我膽寒，我渾身不由自主地發抖上下牙齒打顫，三個兄弟卻興奮的在家裏直竄，在父親的命令下猛敲手上拿著面盆大聲吶喊，雙方對峙了約半個鐘頭，看到我們這邊早有準備，五湖四海的毛賊們只好撤退了。

事後我因為沒有敲盆吶喊和雙腿顫抖語不成聲被父兄們嘲笑了很久，他們不知道我那種恐懼是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就像看到血腥的死人場面，內心裏有個聲音“趕快走開”，但是雙腿有千斤重，怎麼也跑不起來，只能機械地移動雙腿如機器人，這種現象恐怕醫學才能夠解釋。

住在家裏面臨槍林彈雨是在 1968 年 6 月底。

1968 年 6 月 26 日晚，蕪湖“聯總”和“三籌處”兩派，先後行動搶部隊的槍，準備武裝自己消滅對方。我家住在地委，也是駐蕪部隊十二軍的領導機關，成了造反派兩派襲擊的首要目標。

那個夜晚，機槍“噠噠噠”，步槍“叭勾叭勾”聲此起彼伏，綠色的曳光彈在我家周圍閃來閃去，我家南面西面北面全部暴露在流彈範圍內，我不敢站在家中南北西任何一個窗子前，彎著腰在家裏走動，恨不得趴在床底下才覺得安全。

只有父親談笑自若，還分析槍聲和來源處，斷定我家西面相距只有十來米的駐軍機關是目標，我家實際上也成了目標範圍。一時間父親忘記了文革以來不斷被批鬥的煩惱，興奮地說起戰爭年代打槍的事，說起勃朗寧、左輪，說起三八大蓋，告訴我們連發的“噠噠噠”是機槍聲，窗前不斷閃過的綠光是曳光彈.....。

一夜槍聲不斷一夜未眠。

文革中唯一不敢亂的地方是軍隊，誰動了軍隊動搖了根基當然是找死，所以紅衛兵小將也不例外，

搶槍行為很快就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追繳令由最高領袖毛主席親自簽發。

附：中共中央歷史文件如下：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轉發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十二軍黨委《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的通知

中發〔68〕120號

毛主席批示：照辦。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革籌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現將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十二軍黨委《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轉發給你們參考。

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安徽蕪湖地區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瘋狂反撲和絕望掙紮，挑動一部分群眾，反對人民解放軍，反對革命委員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和十二軍黨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認真分析了形勢，採取了有力措施，特別是他們抓住了“七·三”佈告作為強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宣傳“七·三”佈告，聲討蕪湖地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勢，團結，教育和保護了廣大革命群眾，徹底揭露和孤立了階級敵人，迅速穩定了該地區的革命局勢。

安徽的經驗進一步表明，“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是毛主席的偉大

戰略部署，它是推動各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發展的有力武器，對全國各地都有普遍指導意義。只要把“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的宣傳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階級鬥爭結合起來，同擁軍愛民結合起來，持續地開展強大的宣傳攻勢，放手發動群眾，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深入人心，家喻戶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

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並南京軍區：

六月底、七月初，安徽蕪湖地區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炮製了一起反對解放軍，反對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安徽省革委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事件。我們依靠“七·三佈告”這個強大武器，放手發動群眾，很快摧垮了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撲，迅速穩定了蕪湖地區的時局，有力地推動了全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發展。

（一）事件的經過

蕪湖地區的一小撮叛徒、特務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利用蕪湖“聯總”（P派）和“三籌處”（好派）嚴重對立、長期武鬥的矛盾，唆使他們搶解放軍的槍，妄圖搞垮解放軍，毀我長城。六月二十六日開始，就有四、五百人衝擊駐蕪湖部隊的領導機關。二十七日全面搶槍，毆打解放軍，兩派分別佔領制高點，將部隊分割包圍。二十八日打死解放軍的一個汽車司機。二十九日衝擊電臺，砸開監獄，放走犯人。以後，又衝擊海軍駐蕪機關，搶走機密海圖，還先後聚集兩千多人，

衝擊空軍雷達站和導航台。一周內，共搶走各種槍支八百多，子彈、炮彈近十萬發，搶走和砸毀汽車三十四台，一千三百多幹部、戰士受打，其中被打傷二百多人。駐蕪部隊的所有大小單位基本都遇到打、砸、搶。

這次反革命事件的特點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同時策動兩派“協同”行動，把矛頭指向解放軍，他們的罪惡計畫是：第一、把槍搶光，解除部隊武裝；第二、搶、砸汽車，使部隊失掉機動能力；第三、破壞通訊設備，使部隊失去聯絡和指揮，最後，把部隊搞垮趕走，他們揚言，要“用機槍歡送”。

（二）我們對事件的認識和處理

事件發生後，省革委會和十二軍黨委立即進行了研究，認為蕪湖事件決不是孤立的。它是階級敵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勝利的新形勢下，進行全面反撲的一個新嘗試。蕪湖事件只是一個序戰，敵人是要從蕪湖打開一個突破口，進而向全省或更大範圍擴展。基於上述分析，省革委會和軍黨委決定：對於階級敵人的倡狂反撲，必須給予堅決回擊，在“突破口”上就把敵人壓下去。

六月三十日，省革委會召開緊急常委擴大會議（有各專、市革委會、各部隊負責人和群眾代表參加），揭露了蕪湖事件的真相，動員全省人民向蕪湖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一個強大的政治攻勢，刮一場十二級的颱風，給階級敵人以迎頭痛擊。

從七月二日起，全省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聲討蕪湖反革命事件、聲援蕪湖駐軍和蕪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群眾運動。合肥市開了十萬人的大會，其他專、市、縣也都開了大會，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

（三）“七·三”佈告是根本解決蕪湖事件的強大武器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傳來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七·三”佈告。“七·三”佈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重大措施，不僅適用於廣西，也完全適用於安徽。“七·三”佈告為我們解決蕪湖問題指明了方向，帶來了力量。我們立即組織力量，大張旗鼓地宣傳“七·三”佈告”。我們從合肥、蚌埠、淮南、馬鞍山、銅陵五個地區抽調了大批軍隊、地方人員，組成了強大的軍、幹、群三結合的宣傳組，派到蕪湖，同當地駐軍和廣大革命群眾一起，採取領導帶頭、定點劃片、分工負責的辦法，運用多種形式進行宣傳。針對階級敵人散佈的“七·三佈告是對廣西的，不適用於蕪湖”的反動謬論，把“七·三佈告”所揭露的廣西階級敵人的罪行和蕪湖階級敵人的罪行加以對照，揭穿了敵人的謊言，使廣大群眾擦亮了眼睛，認清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動本質。對於公然破壞“七·三”佈告，繼續製造事端的少數壞人，立即堅決進行打擊。廣大群眾拍手稱快，有的感動的流了淚，激動地說：‘七·三’佈告是解決蕪湖問題的及時雨，是保護群眾、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七月十五日，省革命委員會又召開了一次全省範圍的蕪湖問題報告會，到會四千多人，各專、市、縣都有代表參加。根據“七·三”佈告精神，正式宣佈蕪湖事件為反革命事件；依據確鑿的證據，當場點了地、市委內五個操縱群眾組織的壞人、黑手和群眾組織中的兩個壞頭頭；表明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七·三”佈告方針政策的決心和態度。全省廣大軍民方向更明，信心更足，決心更大，掀起了一個聲勢更大的宣傳“七·三佈告”、圍殲階級敵人的新高潮。

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七·三”佈告，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

級司令部的聲音，一經和廣大群眾見面，立即產生了無比巨大的威力，蕪湖形勢迅速改觀。廣大群眾階級鬥爭的覺悟空前提高，受蒙蔽群眾迅速覺醒，對所犯錯誤深感痛心，紛紛反戈一擊，掀起了一個揭發蕪湖反革命事件黑幕、檢舉黑手、壞人和自動上繳武器的高潮。階級敵人驚恐萬狀，分崩離析，有的自動投案，有的被群眾扭送部隊。省革委會點名的七個壞人、黑手已全部歸案。現在，武鬥停止了，工事平毀了，專業武鬥隊已經或正在解體，在短短幾天內交出了這次搶去的全部武器和絕大部分彈藥，過去隱藏的武器也交出不少。全市的交通、郵電和社會秩序，已經恢復正常。外流人員大部返回，抓革命促生產。

“七·三”佈告解決了蕪湖的問題，蕪湖問題的解決又推動了全省革命形勢的發展，加快了專、縣革命三結合的步伐。專、市成立革委會的原來只占百分之六十，現在已達到百分之八十。縣（鎮）又有十八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的縣、市已經實現了上下一片紅。

（四）下一步的打算

繼續深入宣傳貫徹“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掀起一個群眾性的擁軍愛民活動。同時，深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乘勝直追，主動地向階級敵人展開猛烈的進攻。我們準備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再點幾個隱蔽更深、危害更大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壞頭頭，徹底揭開蕪湖階級鬥爭的蓋子，進而把全省的反革命黑線徹底挖出。

以上報告當否，請指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

十二軍黨委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根據中央文件原件列印)

湖南道縣大屠殺，一個武鬥的地方

永州，中國歷史的縮影；她是五千年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

作為永州人，我想一定要弄清永州道縣 1967 年發生的大屠殺事件，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在道縣大屠殺中，被殺的人大多是滿門抄斬，有的大隊甚至株連族人。被殺的人大部分是當時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從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歷時 66 天，涉及 10 個區，36 個公社，468 個大隊，1590 個生產隊，2778 戶，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殺 4193 人，逼迫自殺 326 人。最後派了軍管，才平息下來。

屠殺的方式駭人聽聞：用自製的土槍崩、沉河、斷頭、截肢、開膛、腰斬、投窯火燒、集體爆炸，年輕的婦女則集體輪奸後殺害。據全道縣統計，屠殺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種。基本歸納為 10 大項：1、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2、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4、炸死（又稱“坐土飛機”）。5、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7、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8、繩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燒（含熏死）。

有的被殺人團作為反革命一齊趕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後活活餓死悶死在岩洞裏，淒厲慘烈的哭叫聲持續達兩天兩夜，令人聞之喪膽。洪塘營公社的殺人團，

把兩百多名反革命綁到附近的礦坑旁邊，殺人團的李波清等先用槍打，然後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礦坑活埋。

橋頭鄉橋頭村右派周文棟及妻子陳蓮娥、子周輝在杉木嶺出工時，被生產隊長指揮青壯勞力，推進一口多年不用的廢窖裏。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子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見裏面喊得淒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煙子。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

殺人兇手們不但殺父奸女、殺夫霸妻，還對受害人妻女進行集體輪奸。殺人兇手不僅是為了執行任務，還為了從中獲取報酬。在大屠殺風潮中，當時的“行情”是：每殺一人，報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穀不等，酬金由大隊或公社開支。

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協”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在縣委新樓召集“法院”頭頭開會，會上他說：“現在上面癱瘓了，我們不能耽誤。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倡狂進攻，再遲疑我們*人就會像四十年前在武漢長沙那樣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後，“湘江風雷”被打成“反動組織”。縣人武部在鎮壓“湘江風雷”同時，對“革聯”派以大力打壓。“湘江風雷”在5月以後又重新複出，並與“革聯”聯合反熊。“革聯”派在縣城得到發展。

5月以後，兩派不斷發生武鬥，6月以後，開始在縣城和郊區進行派性武裝割據。隨即，雙方的武鬥規模不斷擴大。在“你死我活”的武鬥中，兩派都在標榜本派的革命性，編排對方的罪名，以致其於死地，消滅對立派。

8月5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負責人參加的“全縣抓革命促生產”緊急會議。列舉了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提出：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熊炳恩是要為在日益緊張的派性鬥爭中，找將對立派和“四類分子”一視同仁進行鎮壓的藉口。會議號召全縣狠抓階級鬥爭並嚴厲打擊四類分子。而各區、社負責人回去後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殺高潮。

8月8日，道縣“革聯”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搶奪了武裝部的庫存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彈藥全部搶走。“八·八”搶槍後，“革聯”用搶來的武器，迅速裝備其武鬥隊伍。其勢力在道縣縣城大張。

8月9日，“紅聯”召開骨幹緊急會議，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

在殺人的高峰期，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 47 軍轉發了這份電報。電報稱：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採取行動。

軍隊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物件和非專政物件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 7 7 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8 月 1 1 日晚上，“紅聯”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召開各區武裝部長會議。會議決定，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槍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有志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會上強調，必須加強管制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

與此同時，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社“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組長電話會。熊炳恩佈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栽紅薯任務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從而確定了以“打擊階級敵人”為名，針對“革聯”派和“四類分子”的鎮壓運動，在道縣開始發動起一場大屠殺。

8月13日，“紅聯”進攻道縣二中的“革聯”總部的戰鬥失利，被打死2人，打傷多人。“紅聯”舉行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而“革聯”派大有實力，手中有槍，佔據了武裝割據的地盤，又有造反派的名頭，有力量擊退“紅聯”派的進攻和屠殺。至於那些身份為“無產階級專政物件”的“階級敵人”，在毫無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況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縣大屠殺的刀下之鬼。當日，熊炳恩對四馬橋的王甫昌、一區的武裝部長劉善厚、七區副區長宛禮甫，以及由縣裏派去大坪鋪的張望恥和其他各區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負責人說：“告訴下邊，一隊可以先殺一兩個。”

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的徐善明，根據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陳智希的指示，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決定“搞掉”歷史反革命分子、曾經當過軍統特務的朱勉。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他的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

當晚，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召集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山上，將朱勉打死。朱勉成為道縣大屠殺第一個被害人。從此，道縣大屠殺迅速發動和開展起來。

8月13日，祥霖鋪區的宛禮甫在上渡公社召開殺人大會，殺掉了7人。緊接著，他又成立了一個百人殺人團，分赴各個公社和大隊，組織更大規模的屠殺。被殺的有的是從床上拖起來的，有的是從田裏叫上來的。從8月13日到8月底半個多月的時間裏，據宛禮甫上報的殺人名單中，一共殺掉了一千多人。

在四馬橋區“紅聯”副司令、楊家公社公社“紅聯”司令蔣文明的策劃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黨支部委員、聯

絡員鄭逢格主持召開召開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又以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鐘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要“組織反革命暴動”，“殺害大隊幹部和貧下中農”的罪名，殺害了鐘佩英和她的兩個兒子。

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氾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8月17日上午，蔣文明又主持召開了各大隊支書、大隊長、治保主任、民兵營長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31人。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召開清塘區生產隊以上幹部緊急會議。會議由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關有志主持。在會上，他強調：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從八月八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支，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8月13號又開槍打死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我們區也發現了“農民黨”和“新民黨”，八區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向與會者佈置殺人任務，並要求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行使生殺大權。

久佳、新塘兩個公社的5個大隊迅速行動，行使起“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權力，4天內殺了13人。鳳成洞、中文洞大隊殺了四十多人，當數字報給熊丙恩時，他頓時兇相畢露，厲聲斥責道：“你們那裏就那麼清白？你們的階級立場到那裏去了？”於是，這些地區的幹部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補殺人課。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人1054人，全區50人中就殺了1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龍九有感於已落後形勢，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叻口大隊即回饋資訊，該大隊計畫殺5人。大隊黨支部已開會研究，同時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基接到電話，當即答復可以。得到批准後，洞叻口大隊民兵將這5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口，用烏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中。

同日，蚣壩區主要負責人王盛光坐鎮興橋，下令民兵封鎖所有道路渡口，嚴查行人，不准放走一個“階級敵人”；並於當晚召開宣判大會，叫民兵五花大綁了楊貴清，謊稱要將楊押送道縣公安局勞改。押到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屍瀟水河中。

當晚，王盛光打電話給區武裝部長兼區“紅聯”司令何昌學，要他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和蚣壩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宰掉。何昌學於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示下達給了蚣壩和小甲兩個公社。

緊接著，全區三個公社和幾乎所有的大隊都相繼召開了殺人部署會。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個大隊已有12個大隊殺了人。但小甲大隊行動不力，公社副書記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龍九幾次向該大隊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仍然不見成效。

8月30日，楊盛芳和楊盛芳和召開全公社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叻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會後，派出一個排的基

幹民兵，帶著槍支、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當天，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將這12人坐“土飛機”炸死。

8月23日，柑子園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高級法院”，先後共開庭審訊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裝部長敬反修、公社貧協副主席“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梁域指示下，27日，豔旗大隊殺7人，28日，紅旗大隊殺6人。

8月29日，柑子園公社召開各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基層幹部會議，傳達解放軍47軍制止殺人的電報，強調不准再殺人，誰殺誰負責。但緊接著黨委書記胡化維講話，卻表揚了那些殺人多、行動快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沒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那些大隊很不服氣，散會後，東風、勝利等大隊回去後就殺了15人。會後，梁域召集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碰頭決定，當晚殺掉了朱用進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壩公社河灘大隊將各個生產隊推出的21名青壯年“四類分子”五花大綁，由手持馬刀、梭鏢、鳥銃和鋤頭的民兵和積極分子押解至葫蘆岩的洞口，大隊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岩洞。有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在洞口邊竄來竄去，急得直跺腳。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稻草，點燃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一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一聲沉悶的巨響，葫蘆岩岩洞內重歸寂靜。

隨後，何興盛回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和公社彙報請示。得到區委主要負責人之一葉成虎“全部殺掉”，公社黨委書記“一個個都給我搞掉！”的指示後，當晚，何興盛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一隻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中。

道縣殺人的消息傳到長沙，當時的省革委會籌備委員會同支左的47軍派出劉兆豐副參謀長於8月30日，趕赴道縣，召開各區各公社幹部會議，宣佈命令停止殺人，敦促他們立即趕回去制止屠殺。熊丙恩在散會之後示意這些幹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時間，有的甚至在路上打電話通知劊子手抓緊時間，在一天內把該殺的人殺光。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三天內共殺569人。

9月1日清晨，47軍軍用飛機在道縣上空撒下制止殺人的傳單。部隊兩次向廣州軍區和□□、國務院報告，提出制止殺人的措施。9月22日，經中央批復，6900部隊和湖南省革籌小組向零陵軍分區發出電報：“要採取措施堅決制止殺人，對組織殺人頭頭要嚴加追查，對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必須堅決取締”，發出嚴禁打砸搶抄殺的通告，並用飛機將電報和通告在道縣撒播。

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共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至10月25日，零陵地區殺人風潮被制止。

三、回顧與反思

道縣閻維勝、周志清、蔣良信、何適、王恩昌、周家豐、周賢維、劉香喜等8人，冒著生命危險，走訪了一百多名當事人和目擊者，走遍了道縣的村村落落，含著熱淚聽那些孤兒寡母敘述他們親人慘遭殺害的經過。最後寫出了道縣屠殺經

過大事紀三百多頁，記錄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後半年，用多種方式向湖南省委彙報，控訴熊丙恩等人的罪行。

中央著令湖南省委調查上報，湖南省委又批轉零陵地區，零陵地區又批轉道縣縣委。材料就象一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最後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縣縣委向零陵地區報告：死人是實，是兩派群眾組織武鬥時被打死的。零陵轉報省委，省委再轉報中央，皮球按照原來的路線又轉了一圈。一個圈的時間是整整一年。

而 8 名上書者則遭到程度不同的殘酷迫害：閻維勝，因為姓閻，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頂閻西山特務的帽子，關押了一年，在監獄裏受盡了毒打和折磨。周賢維、周家豐兩人，曾任大屠殺專案調查組副組長，被長期關在牢裏，先後受迫害死亡。蔣良信，則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勞改 10 年。劉香喜，被判死刑，後改為 20 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來。歷史應永志他們的英名。

如今，這三百餘頁材料的八名作者半數已作古。這篇文章是對六千五百名冤魂的悼念，也是對八名作者的淡遠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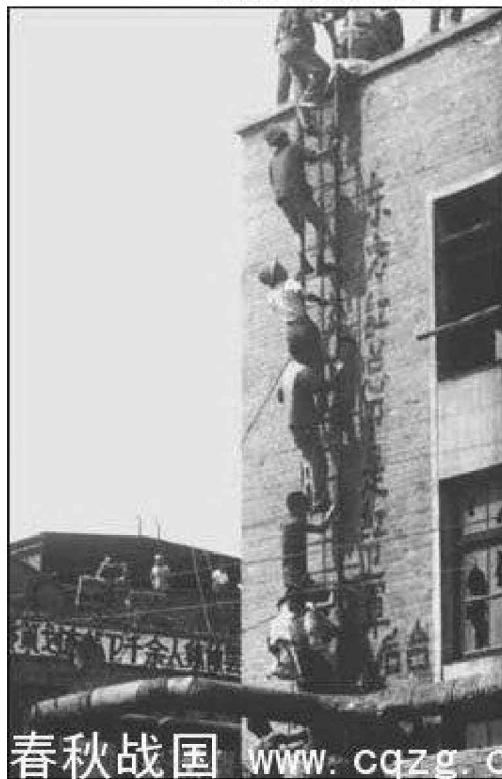
歷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歷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四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麼都沒發生，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第四節 武鬥照片



1970年，上海市“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成为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第二武装。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上海民兵发了枪，企图抵抗。后见大势已去，计划夭折。

blog.sina.com.cn/jhon502



春秋战国 www.cqzg.c

上海“工总司”攻打“联司”的场面



1967年夏，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七·二〇”武斗事件中，被打伤残打死者达十八万四千余人。图为事件发生后两天，街头仍有各派张贴的大字报

blog.sina.com.cn/jhon502



1967年8月，苏州两派武斗，一方推行火攻，焚毁商店25家、民居326间，115户居民受害，161人无家可归，因为烈火熊熊中的衙门朝天楼商店。右图为：焚毁后的鲇鱼墩残垣断壁。

blog.sina.com.cn/jhon502



第五節 文革中最慘烈的十大武鬥

“文革”結束後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鬥事件調查組”，於1978年6月-1979年8月，經向當事人瞭解情況、經整理相關材料、復核有關資料後統計出：從1966年至1975年間，向當地革命委員會、政法部門、軍管會（組）報案、備案，傷亡1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有57227件，其中傷亡10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有9790件，地方駐軍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報、報案親屬失蹤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是其中傷亡最嚴重、最慘烈的十大武鬥事件：

一、1967年青海西寧“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寧武鬥擴大到省委、省政府、軍民用機場。省公安廳、西寧市公安局被佔據，3所大學、12所中專、職校、35間軍工企業職工

參與造反，從 2 月 26 日到 3 月 5 日持續武鬥，曾出動“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 2177 人傷亡，死亡 822 人。

二、 1967 年 7-8 月黑龍江伊春武鬥事件

1967 年 7-8 月，黑龍江省伊春市林業局籌備革命委員會，因派性激發，對立的兩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捍衛者”自居，經過 15 天協商，雙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協，又因爭奪財權，矛盾激化，發生衝突，開始搶掠市財政、銀行。地方駐軍參與支左，導致武裝對峙。8 月 2 日-8 月 25 日，武鬥升級。37 座政府建築物被毀，兩座軍營遭炮彈攻擊，230 多名官兵傷亡。在武裝衝突中，有 3750 多人傷亡，有記錄的死亡名單為 1944 人，多數是林場職工和家屬。

三、 1967 年 8 月—11 月湖南懷化武鬥事件

1967 年 8 月—11 月，湖南省懷化市職工紅衛兵造反派佔領、接管了懷化勞改農場、勞改工廠。軍隊奉命進駐，遭到武力阻止。勞改農場、勞改工廠的囚犯們被武裝起來編成敢死隊，向軍隊發動進攻。軍隊奉命鎮壓反革命武裝叛亂，造成 37700 多人傷亡，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軍隊傷亡 430 人。

四、 1967 年 6 月—68 年 3 月四川宜賓大武鬥

1967 年 6 月—68 年 3 月，四川宜賓地區兩派群眾組織，就“劉結挺、張西廷，是毛澤東司令部戰士還是劉鄧司令部黑幹將”發生激烈鬥爭。中央文革 1968 年 1 月表態：劉、張是毛主席司令部戰士，長期受到劉鄧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當地駐軍隨即跟著表態，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展開了激烈的武鬥。參與動用武器武鬥的有 17 萬多人，有兩個團兵力介入，造成 43800 多人傷亡，死亡 21100 多人。軍隊在宜賓地區實施戒嚴長達 15 個月。

五、 1967 年 10 月—69 年 5 月內蒙古內人黨事件

1967 年 10 月 20 日—69 年 5 月底，內蒙古發生“內人黨”特大慘案。中共黨員、幹部、知識份子、農牧民、知識青年（主要來自北京、河北、山東的 66 屆、67 屆、68 屆大專畢業生），有 56200 多人被殺害，多達 377000 多人被關押，受冤案打擊迫害的人達 355 萬多人，占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 1968 年 5 月—9 月安徽蚌埠、淮南武鬥

1968 年 5 月—9 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 間企業單位的職工發動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華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圍了兩地的革命委員會，佔據了鐵路、公路交通長達 12 天。中央文革派調查組，毛澤東派往東興帶隊下去瞭解情況。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性質，說“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後臺”，從合肥等地調動 5 萬武裝民兵，配合駐軍限時繳械自首。期限到後，展開進攻和逮捕。在長達 35 天圍剿、追捕中，有 7300 多人傷亡，其中死亡 3433 人，軍隊、民兵傷亡 525 人，827 間建築被損毀。

七、 1968 年 12 月—69 年 2 月陝西寶雞武鬥

1968 年 12 月—69 年 2 月，陝西省寶雞地區八間兵工廠展開“清理階級隊伍”政治運動，7 萬名職工有 45400 多人（一多半）被列為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其中有 297 人被當地軍管會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第二天，全地區發生大動亂，駐軍報稱發生反革命暴亂，展開追擊，於是追擊和反追擊戰鬥開始，出動了坦克、裝甲車、四筒平射炮、噴火器等投入戰鬥，死傷 48300 多人，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死者中包括軍管組組長、政委、寶雞市革命委員會軍代表。寶雞駐軍營房兩棟被炮火擊毀。

八、 1968 年 4 月—7 月廣西南寧“四二二”慘案

1968年4月—7月，廣西南寧地區兩派群眾組織130多萬人參與武鬥和自衛反擊，軍區5間武器庫的槍支彈藥被搶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戰爭的武器在鐵路線上就被搶掠。4個月時間，發生規模性武鬥22起，有1750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人數101000多人，報失蹤33115人。周總理派去的調查組中，也有3人被槍殺。據說，廣西南寧武鬥是文革中死傷中嚴重的。

九、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兵變”大鎮壓

1975年5月，新疆生產兵團石河子、奎屯梁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發生所謂“集體兵變”、造反，投向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事件，於是出動軍隊、建設兵團進行整頓、整肅，引發武裝對抗，展開激戰，石河子地區有7330多人傷亡，其中2170人死亡。兩地報失蹤8137人。武裝鎮壓中，出動了武裝直升飛機。

十、1975年雲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雲南省施甸“XXX共和國”事件，造成3700多人傷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區政府建築物被炸毀。這是一宗人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當年中央撥下2000多萬撫恤金才平息了這個事件。

附：文革期間被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及受迫害致死的名單

1. 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 1966. 5. 17 服毒致死。
2. 吳晗 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 1968. 10. 11 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3. 范長江 名記者，曾任人民日報社長 1970. 10. 23 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4. 翦伯贊 歷史學家 1968. 12. 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5. 上官雲珠著名電影演員 1968. 11. 22 病中跳樓身亡。
6. 容國團 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 1968. 6. 20 北京龍潭湖畔槐樹上吊自殺。
7. 董永甯 乒乓球國手 1968. 5. 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8. 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 1968. 4. 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9. 熊十力 國學大師 1968. 5. 24 絕食身亡。
10.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 1. 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11. 嚴鳳英 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 4. 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傳死後被解剖，在體內找發報機。
12. 老舍 著名作家 1966. 8. 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大右派 1966. 6. 7 傳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14.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15.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16. 傅雷 著名翻譯家 1966. 9. 3 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17. 金仲華 老報人，上海市副市長 1968. 4. 3 在書房上吊自殺。
18. 陳夢家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 1966. 9. 3 自殺。
19. 葉以群 文藝理論家，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 1966. 8. 2 跳樓身亡。
20. 李立三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67. 6. 21 服毒身亡。
21. 蕭光琰 化學家 1968. 12. 10 被拷打後服安眠藥身亡，其妻女隨即同日服藥自殺。
22. 楊嘉仁 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 1966. 9. 6 與妻子程卓如開煤氣自殺。
23. 劉盼遂 北師大教授 時間不明 被打死後，屍體浸水缸誣為自殺。
24. 聞捷 著名詩人 1971. 1. 13 用煤氣自殺。
25. 言慧珠 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

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 1966. 9. 11 在浴室上吊自殺。

26. 田保生 國際法學家 時間不明 不堪凌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27. 高仰雲 天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 1966 被紅衛兵毒打後跳河自殺。
28. 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倫 時間不明 不堪凌辱自殺而死。
29. 周瘦鵑 鴛鴦蝴蝶派作家 1968. 8. 12 在蘇州周家花園跳進身亡。
30. 張宗燧 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東蓀二子 1969 清隊時因對毛的物質無限可分有異議被迫害，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 顧而已 著名電影導演 1970. 6. 18 瞭解藍蘋歷史而備受迫害，上海天馬電影廠工具棚上吊死。
32. 劉綏松 武漢大學教授 1969. 3. 16 批鬥後與妻子楊嘉仁自殺身亡。
33. 羅廣斌 小說《紅岩》作者 1967. 2 跳樓自殺，另一說是他殺。
34. 馮大海 作家 時間不明 跳樓身亡。
35. 許政揚 文史學者，南開大學教師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處旁小溪。
36. 田家英 毛澤東秘書 1966. 5. 23 在毛澤東書房走廊上吊死亡。
37. 饒毓泰 南開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 李廣田 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 李 達 哲學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 8. 24 自殺。
40. 謝家榮 地質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 時間不明 自殺而死。
41. 趙宗復 太原工業大學教師 時間不明 跳樓身亡。
42. 姚 溱 中宣部筆桿子 1966. 8 康生秘書李鑫恐嚇後上吊死。
43. 陳笑雨 文藝評論家，筆名馬鐵丁 1966. 8. 24 遊街後跳北京龍潭湖自殺，另一說為投永定河。

44. 王重民 史學家，胡適弟子，北大圖書館學系主任 1975. 4. 16 自殺。
45. 海 默 電影劇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陳屍 7 天被指自殺。
46. 周予同 文史學者，復旦大學教授 時間不明 自殺。
47. 陳又新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樓自殺。
48. 小白玉霜著名平劇演員 時間不明 毒打後吞食安眠藥自殺。
49. 李平心 歷史學家 1966. 6. 15 自殺。
50. 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書記 1966. 12. 25 在廣州被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
51. 雷春國 雲南德宏州副州長 1967. 1. 12 殺死妻子和一兒一女後自戕。
52. 楊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 8. 3 服安眠藥而死。
53.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農大學生 1968. 4. 22 說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为二、八個樣板戲未必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等等。一個直接的導因是他跟女朋友打電話時用了英語，當時是為了練習英語口語，結果被同學聽見，說他裏通外國，把他抓了起來關押在學校裏，遭批鬥後從關押處跳樓身亡。
54. 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樂學院學生 1968 郭世英死後不久自殺。
55. 遠千里 詩人，河北省宣傳部副部長 1968. 6. 22 關押時用刀片割頸動脈而死。
56. 劉克林 《大公報》名記者 1966. 8. 6 在中宣部墮樓死另說是他殺。
57. 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報》記者 1966 在上海跳樓自殺。
58. 姚啟鈞 華東師大教授 1966. 8. 4 日 跳樓身亡。
59. 舒繡文 女影星 1968 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60. 黃紹閔 著名民主人士 1966. 8 自殺。
61. 徐 冰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 1968 自殺。

62. 張琴秋 中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1968. 4. 22 被誣為叛徒跳樓自殺。
63. 郭興福 南京軍區步校教員，“郭興福教學法”創立者 1969. 1. 30 殺死三個孩子後，與妻子雙雙自殺，獲救後被判死刑。
64. 閻紅彥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1969. 1. 7 服安眠藥自殺。
65. 趙九章 物理學家 1967 批鬥反動權威後自殺。
66. 孔 厥 《新兒女英雄傳》作者 1966 勞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殺。
67. 趙慧深 著名表演藝術家，在《雷雨》中成功飾演繁漪聞名 1967. 12. 4 含恨自殺。
68.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 12. 16 在天津全副劇裝服毒死。
69. 應雲衛 電影藝術家 1967. 1. 26 自殺（另一說是猝死于遊鬥的車上）。
70. 陳 璉 陳佈雷女，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委，胡耀邦為她題寫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1967. 11. 19 從十一層樓上跳樓自殺。
71. 國璋 陝師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 8 與妻子范雪茵雙雙上吊自殺。
72. 陳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紅軍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1967. 7. 30 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73. 張紹昌 著名藥理學家，曾執教哈佛，演員陳沖的外祖父 時間不明 自殺。
74. 張宗穎 天津社會學家，張東蓀的三兒子 1966 妻子呂乃朴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
75. 陳同度 北京大學生物學家 1968. 8. 28 “清隊”中被折磨，服毒自殺了。
-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受虐）而死者部分名單

(既有自殺，又有被虐殺或稱“受迫害而死”或死因不明，但他們都是含冤、含恨離開人世的)

- | 姓 名 | 職務或職業 | 死亡日期 |
|---------|------------------|------|
| 1. 劉少奇 | 國家主席 | 1969 |
| 2. 彭德懷 | 國防部長、元帥 | 1974 |
| 3. 賀 龍 | 國家體委主任、元帥 | 1969 |
| 4. 陶 鑄 | 國務院副總理 | 1969 |
| 5. 張霖之 | 煤炭工業部部長 | 1967 |
| 6. 賈拓夫 | 原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 | 1967 |
| 7. 許光達 | 國防部副部長、大將 | 1969 |
| 8. 張學思 | 海軍參謀長，張學良之弟 | 1970 |
| 9. 田 漢 | 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黨組書記 | 1968 |
| 10. 趙樹理 | 作家 | 1970 |
| 11. 邵荃麟 | 文學評論家 | 1971 |
| 12. 侯金鏡 | 文學評論家 | 1971 |
| 13. 鄒大鵬 | 中央調查部副部長 | 1967 |
| 14. 劉秀峰 | 建築工程部部长 | 1971 |
| 15. 章伯鈞 | 民盟中央副主席 | 1969 |
| 16. 何 偉 | 教育部部長 | 1973 |
| 17. 南漢宸 | 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委 | 1967 |
| 18. 陳正人 | 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 | 1972 |
| 19. 錢 瑛 | 監察部部長 | 1973 |

20. 廖魯言 農業部部長
21. 徐子榮 公安部副部長
22. 胡錫奎 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23. 劉錫五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24. 王其梅 西藏軍區副政委 1967
25. 劉 仁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26. 謝家榮 中科院地質所 1966
27. 沈知白 音樂學家 1967
28. 李嘉言 古典文學專家 1967
29. 喜饒嘉措佛學家 1968
30. 胡先（馬肅）文學評論家 1968
31. 陶 然 文學評論家 1966
32. 陳翔鶴 小說家 1969
33. 伊 兵 戲劇評論家 1968
34. 彭柏山 小說家 1968
35. 張宗燧 中科院物理所 1969
36. 楊偉名 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農民黨員 1968、5、5
37. 潘天壽 著名畫家 1971
38. 蓋叫天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江南第一武生 1971
39. 葉渚沛 冶金學家
40. 張家燧 昆蟲學家
41. 呂 熒 美學家 1969

42. 周信芳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 1975
43. 劉芝明 文藝活動家
44. 蔡楚生 電影導演
45. 楊 朔 詩人作家
46. 孫維世 導演
47. 陳翔鶴 作家
48. 鄭君裏 導演
49. 巴 人 文藝評論家
50. 孟 超 詩人劇作家
51. 焦菊隱 導演
52. 魏金枝 作家
53. 肖也牧 作家
54. 周潔夫 作家
55. 曹荻秋 上海市長 1976
56. 傅連璋 衛生部副部長 1968
57. 陶 勇 海軍副司令員 1967
58. 劉 仁 北京市副市長 1973
59. 張國峰 山東省公安廳廳長 1968
60. 高心泰 淮北市委書記 1967
61. 劉國璋 宜賓地委組織部副部長 1967
62. 吳亞雄 南昌鐵路局局長、黨委副書記 1968
63. 張國士 市建築公司經理 1968

64. 劉 健 上海外輪公司副經理（越劇演員傅全香的丈夫） 1968
65. 張志新 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批評林彪 1975·4·4 割喉槍殺
66. 遇羅克 工人 1970·3·5
67. 毛應星 教師批評文革江青 1970·4·14 槍殺
68. 吳曉飛 南昌市第一中學高一學生、抨擊林彪江青 1970·2·17 槍殺
69. 時傳祥 掏糞工，著名勞動模範 1975·5·19
70. 張坤豪 工人、為劉少奇辯護 1970·2·25 槍殺
71. 忻元華 技術員、批判文革 1970·5·30
72. 官明華 雲南兵團四師女醫生，“文字獄”，反林彪 1971·3·12 槍殺

第三章 上山下鄉運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文革期間無法繞過的重要一頁。它涉及千家萬戶。它關係千家萬戶青年學子的命運。梳理上山下鄉運動也是研究文革史的重要內容之一。更使我們能夠聯想到當年柬埔寨共產黨將成城市居民全部趕到鄉村的原因。

第一節 上山下鄉的由來

50 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建政後，遇到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和就業的難題。建政後的第三年，全國小學畢業生達 260 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應屆小學畢業生有限，與要求升學者的數目相差較大。1955 年，合作化運動進入飛速發展時期，《人民日報》在 8 月 11 日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

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級組織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發出下鄉的號召。

這年 9 月初，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寫了一段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當會計，到哪里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9 月 4 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上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言：“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中共中央馬上作出反應，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回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下鄉上山”的概念就是這時產生的。

1962 年前後，全國開始精簡下放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受挫，全中國有 2600 萬人被精減下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 1962 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塗抹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1964 年 5 月 4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對於那些充滿幻想、滿懷政治熱情的青年也具有吸引力。

在當時的形勢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是宣傳部門的一個重要的話題。1968 年 9 月 24 日，《甘肅日報》發表了《鞏固偉大勝利，發展偉大勝利》的社論，祝賀全省各級全部成立了革委會。革委會的全部成立，標誌著“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就想到對城裏人到農村去應加大宣傳。

對甘肅的情況顧立清是十分清楚的，這裏的自然條件很差，人們不想在農村呆，都想往城裏擠，可城裏又沒有多少工業，不少居民沒有工作。他當時認為中央組織居民上山下鄉是對的，覺得那麼多人呆在城裏，不下去幹啥？

1968年9月底的一天，《甘肅日報》派駐定西記者站的記者馬占海接受儘快瞭解定西地區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的情況的任務。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由來

馬占海直接到軍分區向政委王化宇瞭解情況。王政委對他說：“定西的情況，孫司令員掌握得比較多，你可去找他問問。”於是，馬占海就找到了司令員孫繼力。性格直爽的孫司令員對馬占海說：“定西是個窮地方，城市和農村差別不大，城裏住的，大部分也是農民，下與不下區別不大。就算戰爭打起來，蘇聯絕不會把原子彈扔到這個地方來。”話雖這麼說，但孫還是給馬占海介紹了定西上山下鄉的情況：“本地區靖遠縣城的行動比較快，已經有50%的城市居民下鄉了，會寧下去的有40%。”孫還說，“會寧縣下去的人雖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較紮實。”

馬占海得到軍分區領導提供的線索，便去會寧縣採訪。他通過向縣領導瞭解情況、找群眾座談，掌握到幾個比較突出的人和事：一個是居民王慶一，王在向縣革命委員會提交的下鄉申請中說：“我是一個青年，呆在城裏沒事幹。農村很需要勞動力，我決心到農村去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另一個是王秀蘭，當時已經50多歲了，有兩個兒子在外當工人，家裏只有她和兒媳婦；再一個是到土高公社陳原大隊陳川生產隊安家落戶的高玉蘭，她雖然下鄉才幾個月時間，但由於各方面表現好，已被社員們評為標兵；此外還有高中

畢業知識青年王永強和只有 14 歲的女青年羅蘭芳。

馬占海找了這幾個人逐一進行了認真採訪。當他問王秀蘭對上山下鄉有何感想時，王秀蘭不假思索地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

作為一名職業記者，王秀蘭這句話正好是切中馬占海此次要採訪的關鍵字，於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蘭作為了一個重點來寫，並突出了她這句“豪言壯語”。

馬占海採訪回來，把稿子交給了報社編輯部。編輯部將稿件作了修改。當編輯部照例把排有那篇稿子的報紙清樣送給顧立清審查時，顧立清一看到馬占海寫的那篇稿子就感到不錯，覺得王秀蘭真不簡單，那樣大的年紀了還主動下鄉；並把王秀蘭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作為主標題放大了字型大小，還加了帶花邊的編者按，並把這篇稿子從其他位置提到了頭版。

1968 年 12 月 8 日，《甘肅日報》在頭版右側，以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沒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標題的引題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他們說”，接著是大號字的主標題“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

這則消息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稿子註銷來第三天晚上，新華社打來電話到《甘肅日報》值班室，說是毛主席看了這篇稿子，認為很好，問新華社為什麼不發這篇稿子。

這篇看似普通消息稿，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據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推開以後，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戰略部署得不到順利地貫徹執行。當刊登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消息的《甘肅日報》放到他案頭後，這位一直就十分重視新聞媒介的領袖，就像寫詩

一樣，一下觸到了他心裏的某個點。毛澤東立刻指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派人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實這篇文章的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

第二天，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兩名記者坐飛機就趕到蘭州。

經過一周多的調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說：“會寧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實反映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的進展成就，寫得沒問題。”說是新華社要發通稿，他們建議在轉發時署新華社和《甘肅日報》兩家的名。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了的12月8日《甘肅日報》的消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面那個“市”字，是毛澤東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還在與報頭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語錄》一欄裏，發表了毛澤東為推動上山下鄉運動所作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從此，由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轉化成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掀起了狂潮

消息傳到甘肅省會寧縣，縣城幾千群眾在紅軍會師樓前舉行了慶祝大會。他們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厲，努力把上山下鄉工作做得更好，把鬥、批、改各方面工作大大推進一步。”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等全國和各省級報刊也先後全文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一文，上山下鄉

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在報紙掀起轟動效應的同時，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輿論工具，都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導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蘭的命運得到了徹底改變，不僅有蜂擁的記者前來採訪，而且她還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作為上山下鄉的帶頭人，王秀蘭又動員兩個兒子和媳婦，以及孫子，只帶了一些鍋碗、一點米麵、兩個小箱子和鋪蓋卷，來到距離會寧縣城 60 多公里的白草原四百戶村落戶。

王秀蘭一家當時在農村的勞動很積極，鄉親們都叫王秀蘭的兩個兒媳婦為“兩隻手的兒媳婦”。

那則消息稿子以這樣的形式出現，並在全國產生如此的影響，但後來他們卻因為這篇稿子，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有人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形成狂潮歸咎到他們的頭上，說他們執行了極“左”路線。

受到衝擊的首先是馬占海。他宣傳上山下鄉，把自己也捲進了那場狂潮中，稿子發出時間不久，報社也要動員一半的人上山下鄉。當時馬占海在完成稿子後因病回蘭州休息，他也被定上了上山下鄉的名單裏。這消息可讓馬占海著慌了，他聽說在阿幹鎮煤礦搞報導的記者楊忠同領導很熟，就托楊向領導說明自己的身體情況，希望不要安排他下鄉。顧立清也覺得他那身體到農村去吃不消，在會上表態說：“馬占海身體不好，就不要下了，如果因為那篇文章，那是我的想法，

是我派他去采寫的，責任在我。”後來，馬占海被安排在離蘭州只有 30 多公里的阿幹鎮煤礦，領導還親自給阿幹鎮煤礦的領導打電話，希望他們能照顧馬占海，他才被安排當了煤礦的報導組長。

可他因這則消息，省委宣傳部的顧立清在副部長位置上十幾年不但再沒動過窩，後來在批判極“左”思潮時，他還理所當然地成了批判對象。

在結束採訪時，顧立清再三強調：“至於那場運動是洗禮，還是災難，各人有各自的感受，不是我所能評說得了的。後來批判說我搞了那些極“左”的東西，我也沒作過申辯。我覺得，自己當時在那位子上，應該把工作幹好。但的確沒料到，那則消息會產生那樣大的影響。也許這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吧。”

採訪結束後，引起了我們對那場運動更多的思索。這場把城市人口和知識青年向農村和偏遠山區轉移，其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實屬罕見。無論怎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張友琴 趙仕樞，《文史精華》2006 年第 8 期

第二節 全國知青分佈點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從正面來介紹知青這一段歷史，來反映再現這一段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我們只要從正面去做，慢慢的這些人的觀點或許會淡化。



圖為知青館鳥巢展。在 1962 年到 1978 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約有 1776.48 萬人離開城市，進入農村。（圖片來自網路）

7 月 1 日，一位 47 年前在黑龍江插隊下鄉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櫃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張影。紫色的秋衣洗得發白，但還能清晰看見胸前巨大的“獎”字和沈建平當時所在的兵團番號。流覽著三個展廳的展品，沈建平認出了當年戰友們的物品——軍大衣、醫學教材。

這是在北京鳥巢的知青博物館，門票 120 元，知青免費。

在全國巡展兩年之後，遠在東北邊陲小鎮的黑河知青博物館在京城鳥巢落了戶，正如它的負責人潘忠林所說，“等於黑河館在北京鳥巢開了分館”。然而在引發一代人青春記憶的同時，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評和輿論爭議，北大教授賀衛方甚至指責它“將罪惡變成了偉業”。

這家占地 1600 平方米，耗資超過 400 萬的知青博物館鳥巢展，被港媒稱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雖然潘忠林不太認可這個說法，但他還是覺得，比之

十八大之後蜂擁而出的知青博物館，自家的可以“理直氣壯”地稱為“客觀”，因為“無論從內容、形式設計上，還是國家、省市層層審批上，都是立得住的”。自 1955 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 1962 年被納入了國民計畫，直到 1978 年宣告結束，這場延續 20 多年的運動永遠改寫了將近 2000 萬名年輕人的命運，他們中斷了學業，進入農村。學界流傳最廣的觀點是，上山下鄉是為瞭解決城市糧食短缺和就業問題，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知識青年下鄉“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並非只是宣傳之詞。

由於期間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人們在對待知青歷史時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 7 月 2 日的微博中，賀衛方說：“不久前我曾參觀預展，有關人士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參與策劃，無怪乎展覽強烈的文革歌德派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難一點都不提。”在 6 日的微博中，他又給知青博物館提出建議，認為：“知青展應通過解說和各種實物展現：1) 作為文革組成部分的知青運動；2) 反智主義與知青下鄉；3) 對下鄉的擁護與抵制，事例如李慶霖事件；4) 廣闊天地中的苦難。書信歌謠圖畫及文學作品；5) 那些真實和虛假的英雄人物；6) 風起雲湧的返城抗爭；7) 傷痕文學裏的知青。”

認證為前《國企》雜誌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 4 天後對賀衛方提出反駁，直指其是“雞永遠理解不了鷹”，並讚揚知青運動的優點：“知青運動的本質，是防止工業化進程變成對農村的單方面榨取，也是為了防止中國從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社會。”

人大教授張鳴與賀衛方有著類似的觀點：“把人人為地投入到災難之中，然後拼命強調這個災難對個中人的鍛煉。現在說知青下鄉運動好的人，都是這樣幹的。別客氣，請你們把你的子女，孫子孫女也行，放到最艱苦西北農村，幹上 8 年。”

老知青們的觀點也出現了對立，他們在微博上“現身說法”，以自己的經歷或支持或駁斥賀衛方。@曉日 xiaori 說：“在我的知青戰友圈兒裏也有很多“青春無悔”的人。我們之間也經常辯論。贊同無悔的人認為自己的成功來源於知青時代意志的磨練，這一點我並不否認，但對大多數知青來講只是災難，既然有人無悔，既然贊同下鄉運動，那又為何要返城，為何不去當一輩子農民？”

作為“親身體驗知青一代”歷史的潘忠林，認為賀衛方的觀點“太過偏頗”。他覺得知青博物館與文革“沒有一點關係”，他不否認當年有不好的事發生，但他不斷強調著，辦此館是為了“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這與他的同事、黑河館館長劉樹新頗為一致。在 2013 年接受採訪時，劉樹新說：“在展覽裏永遠也不要提，也沒有必要提。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體現一代人的風采。寫它，是把我們大家對國家的責任感奉獻，抹黑了。”

對話/許曄

鳳凰網：烏巢這個知青展覽館是如何建起來的？

潘忠林：我們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館，這個建的比較早，是 2009 年開的館，那個時候全國各地沒有知青館。我們這個館開得也很艱難，當時寫完了大綱之後，無論是當地政府還是上一級的，比如省文化廳，都不大敢批。

後來趕上有一個機會，我們遇到了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龔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結很深，於是我們就把這個大綱給了他，他找了一些專家給審，黑龍江省文化廳又組織專家給了論證，這樣這個館才能夠得到上級的批示。

我是 2012 年退居二線，之後，我就帶著知青博物館開始在全國巡展。因為黑河館比較偏僻，全國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後來我們就考慮在全國巡展，但巡展費用比較高，也還是滿足不了知青需要。我們在北京的地質博物館展了一個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來萬觀眾，我們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萬多觀眾，根本就不能夠知青的要求，所以我們才決定在北京建館。2013 年在北京展覽期間，我接觸到了中國萬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就開始和他們談合作的事。他們在鳥巢有兩萬平米的場地，給我們提供了三個廳，我們建了這個館。

鳳凰網：這次展覽首次展出一張李克強在田間得知大學錄取時與朋友的合影，這也是知青捐贈的？

潘忠林：整個展覽的照片有三部分來源：第一，是我們逐個走訪知青得到的，我們瞭解到一些知青事蹟，就去和他一對一走訪，然後核實他提供的照片，文字。第二，人民日報社黨史辦出了一本知青畫冊，這個畫冊的圖片都是當年《人民日報》刊發的一些照片。第三，就是隨著展覽開放，知青源源不斷地給我們提供一些資訊，然後我們又跟蹤採訪核實清楚之後，再上版面。比方說像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照片，都是我們在國家的黨報黨刊上找到的，或者是當年跟他們一塊下鄉的知青給我們提供的。李克強那張田間照片應該是知青提供的，因為那張照片在網上也能搜到。



1973 年上山下鄉時期，習近平（左二）在陝西延川縣。新華社發



20 多歲在鳳陽縣插隊時的李克強（中）。資料來自李誠故居。

鳳凰網：有港媒稱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是這樣嗎？

潘忠林：現在還不好這麼說。十八大之後全國各地知青館蜂擁而上，習近平、李克強他們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結，所以這個時候口子就開了。我們在春節前統計過，全國大概有大大小小 79 家知青博物館，截止到現在可能是有百

十來家了，但是目前這些博物館，實實在在地說，展覽內容就不一定能夠很客觀地反映知青這一代的歷史。而我們這個館，為什麼我敢理直氣壯的說呢？第一個，這個展覽是經過龔心瀚組織專家論證的。第二是經過黑龍江省文化廳專家組論證審批的。第三，我進京展覽之前，又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王偉光親自給把的關，包括這個主題“與共和國同命運”都是他給幫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現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館裏，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館是隸屬於國家文物局系統管理的館，而且是國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費開放的博物館，它是黑龍江省級愛國主義基地。鳥巢館實際上就等於是黑河館的分館，所以說這個展覽無論從內容、形式設計方面，還是從國家、省級層層審批這個環節上說，都是立得住的。

鳳凰網：強調黑河館和鳥巢館是“客觀”的，為什麼？

潘忠林：我們這個館之所以辦得好，就是我們和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性，我們弘揚的是正能量，是在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心聲。知青心聲是一種什麼心聲呢？在建國初期，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中國的長子長女們，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承擔起了一個老大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他們從學校畢業之後，國家沒辦法安排他們的工作，散落到社會，那不是個辦法，所以怎麼辦呢？農村又需要文化，這個時候他們從繁華的都市來到了祖國需要的地方，這是與共產黨同命運，也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題。國家有困難了，你作為祖國母親的大兒子、大女兒，你就得要承擔這個困難，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麼？是擔當、是奉獻、是拼搏、是創業。我們要弘揚知青精神，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樣。

那麼知青精神是什麼精神呢？我覺得它和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大慶精神、載人航太精神以及抗災救險精神一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要傳承它，要弘揚它，這就是我們現在辦館的目的。我們不想在學術上去糾結什麼，至於知青那個年代，有沒有一些知青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難道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沒有了嗎？何況 70 年前。我覺得有些人，起碼我覺得他們不是弘揚正能量，和黨中央、國務院沒有保持一致。

鳳凰網：你如何回應北大教授賀衛方的質疑？

潘忠林：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偏頗的，不是實事求是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從 1955 年開始的，1955 年跟文革有關係嗎？沒有關係。1955 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願者墾荒隊，60 人，隊長是楊華。到了 1962 年的時候，國家已經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上山下鄉，納入到了國民計畫。到了 1968 年的時候，全國進入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所以我說這個賀教授，我不能說別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他對黨有什麼不滿，對知青有什麼仇恨。

第二點，當時毛澤東同志組織青年上山下鄉這件事，其實與文革沒有任何關係，這其實源自于他對青年運動方向的一種思考。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就曾和那些進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農調查的報告。在 1939 年的 5 月 4 日，他在延安召開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大會，在那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講話，叫作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麼做標準？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夠和工農群眾相結合。1946 年，毛澤東就把他的兒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去補上農村這一大課。緊接著就是 1955 年。你想想它和文

革有什麼關係？所以我說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說我不針對某一個人，我認為有的同志他不客觀就在這。

賀教授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很多知青都在聯繫我，都希望我能夠從正面去回應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和他們講，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觀點，人家要說，你也不能夠非得要針尖對麥芒，各抒己見去爭執，沒什麼意義。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從正面來介紹知青這一段歷史，來反映再現這一段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我們只要從正面去做，慢慢的這些人的觀點或許會淡化。

我覺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觀點，讓我挺痛心的，因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結。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知情點發佈情況表

編號	地方名稱	常熟沙家浜蔣巷村統計數（個）	鳳凰網統計數（個）
一	寧夏回族自治區	760 多	94
(一)	固原地區		29
1	原州區		17
2	西吉縣		3
3	涇源縣		2
4	彭陽縣		2
5	隆德縣		5
(二)	石嘴山地區		8

	大武口區	0
	平羅縣	6
	惠農區	2
(三)	吳忠地區	9
	青銅峽市	4
	利通區	5
	同心縣	0
	鹽池縣	0
(四)	銀川地區	44
	靈武市	0
	興慶區	6
	永寧縣	15
	西夏區	9
	金鳳區	1
	賀蘭縣	13
(五)	中衛地區	4
	沙坡頭區	3
	中寧縣	0
	海原縣	1
二	河南省	1279
	周口	71
	商丘	24

信陽	178
駐馬店	115
南陽	159
平頂山	74
漯河	22
許昌	63
洛陽	70
三門峽	51
濟源	10
焦作	60
鄭州	174
新鄉	59
開封	25
鶴壁	35
安陽	58
濮陽	13
三 湖北省	1507
黃岡地區	142
黃石市	66
鹹寧地區	67
荊州地區	206
宜昌地區	120

	恩施	49
	神農架	1
	十堰市	65
	襄樊市	161
	隨州	56
	荊門市	174
	天門	69
	潛江	40
	仙桃	46
	武漢	138
	鄂州	12
	孝感	94
四	湖南省	1257
	郴州	109
	永州	96
	邵陽	64
	懷化	115
	湘西	38
	張家界	27
	常德	123
	益陽	120
	嶽陽	103

	長沙	132
	婁底	34
	湘潭	32
	株洲	116
	衡陽	149
五	海南省	233
	文昌市	0
	海口	18
	澄邁縣	14
	臨高縣	2
	儋州市	26
	白沙黎族縣	19
	昌平黎族縣	2
	東方市	10
	樂東縣	10
	三亞市	18
	保亭縣	7
	五指山	4
	陵水縣	8
	萬寧市	13
	瓊中縣	25
	瓊海市	12

	屯昌縣	18
	定安縣	27
六	廣西省	688
	桂林	81
	柳州	50
	河池	49
	百色	52
	崇左	34
	防城港	15
	北海	26
	欽州	45
	玉林	92
	南寧	106
	貴港	43
	梧州	38
	來賓	18
	賀州	39
七	貴州省	501
	銅仁地區	64
	遵義市	96
	畢節市	48
	六盤水市	21

	黔西南自治區	7
	安順市	37
	黔南自治區	101
	黔東南自治區	56
	貴陽市	69
八	重慶市	427
	奉節縣	11
	榮昌縣	12
	永川區	13
	忠縣	17
	萬州	24
	黔江區	7
	西陽土家族縣	29
	沙坪壩縣	12
	長壽區	7
	雙橋區	2
	城口縣	4
	江洋區	19
	南川區	15
	南岸區	11
	銅梁區	5
	巴南區	8

武隆縣	9
雲陽縣	11
大渡口區	2
江北區	3
潼南區	2
渝中區	13
九龍坡區	9
豐都區	11
涪陵區	18
開縣	21
巫山縣	8
墊江縣	1
梁平縣	11
渝北區	1
大足縣	3
綦江縣	20
秀山縣	10
璧山縣	12
合川區	14
萬盛區	5
巫溪縣	1
北碚區	14

	彭水縣	13
	石柱縣	19
九	四川省	1216
	達州	81
	巴中	44
	廣元	56
	阿壩藏族自治州	6
	甘孜藏族自治州	20
	涼山黎族自治州	104
	雅安	46
	樂山	69
	宜賓	93
	瀘州	49
	自貢	32
	內江	44
	眉山	79
	成都	127
	德陽	38
	綿陽	101
	資陽	61
	遂寧	8
	廣安	27

	南充	85
	攀枝花	46
十	雲南	1085
	昭通	4
	曲靖	42
	文山	14
	紅河	71
	西雙版納	363
	普洱	66
	臨河	79
	德宏	108
	保山	23
	大理	32
	怒江	2
	迪慶	1
	麗江	15
	楚雄	47
	玉溪	27
	昆明	191
十一	西藏	33
	阿裏	1
	日喀則	4

	山南	5
	林芝	16
	昌都	1
	那曲	0
	拉薩	6
十二	青海	121
	海西	30
	格爾木	6
	玉樹	2
	果洛	0
	黃南	4
	海南	11
	海東	42
	海北	3
十三	甘肅	817
	酒泉	238
	嘉峪關	2
	張掖	88
	金昌	19
	武威	77
	白銀	30
	蘭州	62

	臨夏	36
	甘南	7
	隴南	77
	天水	51
	定西	22
	平涼	58
	慶陽	50
十四	新疆	542
	阿勒泰	37
	塔城	32
	博爾塔拉	10
	伊犁	62
	克拉瑪依	6
	昌吉	51
	烏魯木齊	48
	吐魯番	12
	哈密	19
	巴音郭楞	85
	和田	20
	喀什	29
	柯爾克	3
	阿克蘇	128

十五	內蒙	2060
	呼倫貝爾	223
	興安盟	71
	通遼	293
	赤峰	232
	錫林郭勒	182
	烏蘭察布	239
	包頭	99
	呼爾浩特	132
	巴彥單爾	446
	鄂爾多斯	99
	阿拉善盟	15
十六	山西	836
	大同	86
	朔州	35
	欽州	112
	呂梁	53
	臨汾	66
	運城	164
	晉城	31
	長治	90

	晉中	81
	太原	93
	陽泉	25
十七	廣東	2286
	汕頭	34
	潮州	29
	梅州	808
	揭陽	43
	汕尾	56
	河源	49
	惠州	69
	韶關	136
	清遠	161
	肇慶	247
	雲浮	25
	茂名	45
	湛江	64
	陽江	69
	江門	42
	珠海	16
	中山	11
	佛山	34

	東莞	27
	深圳	14
十八	江西	2283
	景德鎮	65
	上饒	320
	鷹潭	64
	撫州	260
	贛州	240
	吉安	428
	萍鄉	17
	新餘	42
	宜春	301
	九江	327
	南昌	219
十九	福建	758
	寧德	48
	福州	95
	莆田	21
	泉州	34
	廈門	13
	漳州	66
	龍茗	91

	三明	190
	南平	200
二十	浙江	475
	舟山	5
	嘉興	40
	湖州	40
	杭州	167
	荊州	39
	麗水	16
	金華	22
	紹興	34
	寧波	53
	台州	24
	溫州	16
二十一	江蘇	1432
	徐州	86
	連雲港	131
	宿遷	54
	淮安	152
	鹽城	422
	揚州	69
	南京	122

鎮江	48
常州	56
無錫	41
蘇州	111
泰州	50
南通	90
二十二 上海	1203
南匯	72
嘉定	29
崇明	332
松江	29
金山	7
盧灣區	13
虹口	68
青浦	10
靜安	29
楊浦	66
奉賢	87
長寧	42
閔行	40
寶山	39
黃浦	74

	徐匯	55
	浦東新區	98
	閘北	57
	普陀	56
二十三	山東	1048
	威海	16
	煙臺	93
	青島	59
	濰坊	130
	東營	69
	濱州	17
	德州	34
	聊城	60
	荷澤	27
	濟寧	131
	棗莊	31
	泰安	90
	萊蕪	6
	濟南	97
	淄博	57
	臨沂	91
	日照	40

二十四	安徽	1759
	宿州	108
	淮北	51
	亳州	83
	阜陽	131
	淮南	59
	蚌埠	109
	塗洲	196
	合肥	95
	六安	117
	巢湖	96
	馬鞍山	23
	蕪湖	42
	銅陵	29
	安慶	199
	池州	131
	黃山	72
	宣城	218
二十五	天津	294
	靜海	11
	河東	37
	南開	35

	北辰	11
	塘沽	11
	紅橋	18
	河西	32
	薊縣	17
	東麗	6
	津南	8
	寧河縣	8
	漢沽	2
	河北區	17
	西青區	14
	和平	36
	寶坻區	14
	武清區	10
	大港	10
二十六	遼寧	2253
	鐵嶺	296
	撫順	181
	本溪	70
	丹東	144
	鞍山	115
	營口	67

	大連	141
	盤錦	254
	錦州	218
	朝陽	102
	葫蘆島	108
	遼陽	34
	瀋陽	432
	阜新	100
二十七	吉林	1478
	延邊	297
	吉林	304
	長春	253
	松原	104
	白城	130
	四平	212
	遼源	26
	通化	93
	白山	59
二十八	黑龍江	4661
	大興安嶺	215
	黑河	1561
	齊齊哈爾	453

	大慶	90
	綏化	112
	哈爾濱	275
	牡丹江	55
	雞西	370
	雙鴨山	615
	佳木斯	379
	鶴崗	389
	伊春	110
	七台河	37
二十九	陝西	28
	榆林	189
	延安	34
	銅川	225
	鹹陽	377
	寶雞	93
	漢中	30
	安康	8
	商洛	167
	西安	184
	渭南	699
三十	河北	90

唐山	34
秦皇島	70
承德	103
張家口	41
廊坊	37
保定	65
滄州	20
衡水	93
石家莊	54
邢臺	92
邯鄲	493
三十一 北京	54
順義區	11
密雲縣	9
門頭溝	15
崇文區	24
大興區	8
懷柔區	23
延慶縣	37
西城區	33
宣武區	18
平谷區	28

東城區	21
昌平區	31
豐台區	15
石景山區	12
房山區	62
朝陽區	70
海澱區	22
通州區	

第三節 一個知青群體的下鄉時間分佈

非常感謝北大荒網友“老邊”贈送給我兩本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15 團 4 連知青的文集《夢回鯰魚哈》（第二、三冊）和光碟。當年這個連隊共有 270 餘名來自哈爾濱、北京、上海和溫州的知青，如今竟有那麼多人參與文集寫作和網上評論活動，真是難得啊。

這本文集中有一個包含了該連隊 270 多知青的名錄（可以在該連的鯰魚哈網站找到）非常引人注目。這個名單不僅人員齊全遺漏極少，還包含了城市、性別、到達和離開連隊的日期以及部分人的去向。雖然有些專案的資料並不完全，但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個較大的知青群體的多專案資料表，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以具體分析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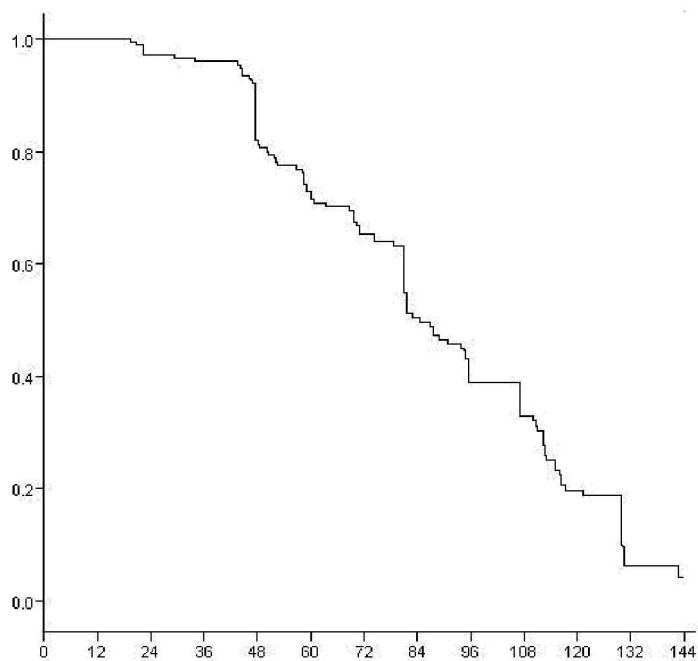
首先想到的是，可以對這個群體的下鄉時間分佈做初步分析。

這裏說的“下鄉時間”不是下鄉的年度，而是知青在農村生活的時間長度。這個數字和每年度下鄉知青人數一樣，是描述上山下鄉規模及其影響程度的基本指標，其重要性無需多言。我在先前的博文《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模圖》中做過一個估計：全國城鎮知識青年的平均下鄉時間大約是 4.3 年。我在那篇文章中還寫過：“僅僅用一個平均的下鄉時間遠遠不能說明上山下鄉對知青的影響程度。實際上，知青的下鄉生活時間有一個很寬的分佈區間，這個分佈不可能是非常集中的。”但是知青總體的下鄉時間究竟是如何分佈的，我們找不到任何具體資料加以描述，甚至連一個稍大一點兒的群體的資料也沒見過。所以當我看到 15 團四連的資料表時，立刻想到這是一份很有用的資料，可以用它分析這個群體的下鄉時間分佈。

具體分析需要採用“生存分析”方法。這是統計學的一個分支，在壽命保險業、醫學研究、工業產品的可靠性分析等方面都有應用。這種方法最主要的特點是它可以處理所謂“不完全資料”（或稱“截尾數據”）。15 團 4 連知青名單表中許多（大約一半）知青的“離開時間”是離開連隊而不是離開農村的時間，我們不能據此計算這些人下鄉的準確時間但知道返城時間一定是在這個時間之後。這就是所謂“截尾數據”。實際上在進行知青史回顧性分析時無論調查者多麼認真努力，也很難避免這一類資料出現，因此只能使用生存分析方法。本文不敘述統計學概念方法和分析過程，只列出分析結果。

主要分析結果是一個百分率表及根據這個表繪出的下鄉時間分佈曲線，以及兩個統計指標：平均下鄉時間和中位下鄉時間。百分率表略去，分佈曲線如下圖。

圖 1：十五團四連知青下鄉時間分佈曲線圖



這個圖的橫坐標是下鄉時間(以月為單位，知青下鄉時間的計算截止到1980年底)，縱坐標是每個時刻仍然留在農村的知青人數百分率。所以我們看到的這條曲線是從100%開始逐漸下降的。各年度留在農村的知青的比率見下表：

年度	留在農村的比率	本年離開的比率
第一年	99.0%	1.0%
第二年	97.3%	1.7%
第三年	96.1%	1.2%
第四年	82.1%	14.6%
第五年	71.6%	12.8%
第六年	65.4%	8.7%
第七年	50.5%	22.8%
第八年	38.9%	23.0%

第九年	33.0%	15.2%
第十年	19.6%	接近 100%

注：由於名錄中有些資料沒有標明具體年度或月份，為了使其能夠參與計算一律改用中間值近似代替。例如，只有年度的一律改為該年 7 月 1 日，“197x 年”的一律改為“1975 年 7 月 1 日”。這種近似代替使得曲線中的某些“臺階”變大。表中第三列“本年離開的比率”的計算方法以第四年為例是：

$$(96.1\% - 82.1\%) \div 96.1\% = 14.6\%$$

從曲線圖和資料表我們看到了這個連隊的知青下鄉後，每一年留在農村和離開農村（回城、參軍或進工礦企業）的百分率的變化趨勢：前三年離開的很少，隨後的三年每年都有 10% 左右的比率離開，第七年起上升到 20% 左右，直到最後大返城。這些圖形和數位，使我們對知青在農村的停留時間有了一些具體認識，從一個小群體的角度瞭解知青運動的變化過程。如果它們具有較好的代表性，那就是很有意義的歷史資料了。

看來同為知青，在農村生活的時間也是很不相同的。下鄉兩三年和六、七年、甚至十年以上的知青，烙印的深淺顯然不同。如果讀者也是一個荒友，不妨對照此圖，看看自己是在那個百分比的位置離開邊疆返城的。

這個分析還得到兩個指標：這個知青群體的平均下鄉時間是 88.1 個月，約 7.3 年，中位下鄉時間（也就是在農村的知青還剩下一半的時間）是 84.6 個月，約 7.0 年。這兩個數字使我想起先前的博文提到的，我所在的連隊的北京知青下鄉的平均時間和中位時間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兩者的接近使人聯想，十五團四連知青群體這支“麻雀”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性，與黑龍江兵團的知青整體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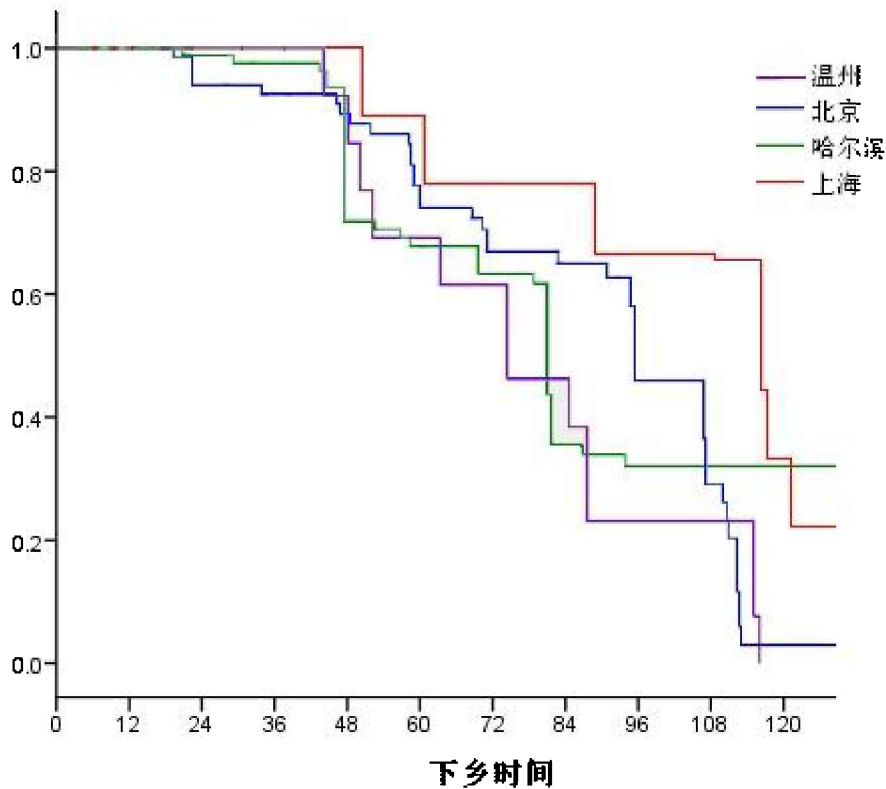
差別不會很大。如果我們能再找到一兩個連隊的這樣的資料，並且能看到各個連隊的主要指標和分佈特徵具有比較好的一致性，就可能作為整個黑龍江兵團的三、四十萬知青整體較好的代表性樣本了。

但是要拿這個群體和全國的城鎮上山下鄉知青相比，差距就大了。我曾在先前的文章中估計過全國城鎮知青的平均下鄉時間是 4.3 年，與這裏的 7.0 年相差很多。這是由於黑龍江兵團的知青大多數都是 1968 至 1970 年到達農村的，知青運動後期接收的人數很少。而全國的數字是，1975 年以後的下鄉知青多達 600 多萬，占 1/3 以上。因此其他地區的知青應該另外獲取樣本分析。

既然從知青總體看，下鄉時間是一個很寬（至少有八、九年）的分佈，那麼是什麼原因影響了知青的下鄉時間長短呢？或者反過來問，是什麼原因使某些知青能夠較快離開農村呢？這個資料表中包括的其他專案（下鄉年度、性別和城市）與此有關嗎？

先看看地區吧。我們可以具體比較一下不同地區知青的下鄉時間分佈曲線。

圖 2：十五團四連不同地區知青下鄉時間分佈曲線圖



此圖中的各地知青的下鄉時間分佈曲線還是有一些差別的。上海知青的曲線下降速度（也就是返城的速度）最慢，這與上海和溫州知青在下鄉的前幾年基本沒有人從4連離開邊疆返城有很大關係。哈爾濱知青有20名是年1976年8月才到達的，這使得圖中的哈爾濱知青下鄉時間分佈曲線也降低了一些。但總的來看各地知青下鄉時間的分佈差別不能算很大，因為當年對於知青回城的政策全國各地大體是一致的。。

按性別分組的曲線沒有多大意義就不畫出了。

其實在談到影響知青在農村生活時間長短的因素時，我們這一代所有人都能立即想到，最主要因素是知青的“家庭出身”。

如果能獲得這200多名知青每個人當年的“家庭出身”，我們就能畫出不同出身知青的下鄉時間曲線了，那一定是一組差別很大的曲線。其中，下降速度最

快的肯定是“革命幹部”出身的部分。如果細分，其中“革軍”的很可能又比“革幹”的下降得更快一些。眾人皆知下鄉前三年離開邊疆的知青，最主要的途徑是當兵。這當然不是普通百姓子弟所能享受的。雖然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出身影響下鄉時間這個客觀事實，但很遺憾至今我也沒看到對這一事實的資料描述。

上述說法並不是想貶低知青群體中的某些成分，只不過是要客觀真實地描述知青運動的具體過程——我想這也是所有知青的共同願望。知青離開農村的時間是與離開的途徑（按時間先後是當兵、上學、進工礦、困退病退、高考，直至最後的大返城）緊密相關的。這些途徑的前幾項與出身的緊密關聯是眾所周知的。客觀地列出這些事實和數字才能真實描述歷史長河中知青“大潮”是如何起落和分流到了何方的。

當然在那個年代，有些“革幹”成了“走資派”、“黑幫”，使一些知青的“革幹”出身成了說不清楚的複雜問題。至於“工人”出身的知青，除了在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時有利外就不具備任何優勢了，有時或許比知識份子或職員出身的知青還差些，例如在1977、1978年高考時。

以上所說的都是對知青整體而言的，和具體知青個人的感受未必一致。我們可以舉出許多與上述說法不同的個例。比如我所在的連隊就有一個知青戰友，他的父親是鐵道兵司令部的軍官。那時我們都知道，只要父親說一句話，他就能離開北大荒。但是他毫不動搖地堅持到了最後，贏得所有人的尊重。我的一個同班同學，父親是資深的中共成員，卻在文革中成了著名“叛徒”，使他在農村插隊多年。人們完全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特例，但是要想客觀真實地描述上山下鄉運動和知青群體的演變，就不能只從自身的體驗或個例出發，而應當從沒有選擇偏倚的群體出發做出分析，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

出身影響下鄉時間——不論有無具體資料，這個結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毫無疑問。但是對於後人，對於根本不瞭解“家庭出身”、“本人成份”為何物（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連糧票、布票、購貨證、工業卷一類的東西都無從想像）的下一代人，提供一系列真實確鑿的、有代表性的統計資料，應該是他們正確認識那段歷史的重要的史料和依據。

這也是我在連續幾篇博文中一再提出應該用定群研究的方法，全面地進行一次知青史回顧性調查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夠進行這樣一次調查，獲取的東西可以不限於知青在農村的這一階段。還可以包含知青結束下鄉生活的流向以及 80 年代、90 年代和 2000 年代的分化情況。

從 70 年代後期，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社會的進步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空間，“家庭出身”的影響、先前的起點已經未必是決定後來命運的最重要的東西了，知青個人的因素更多地影響了“後知青”時代多變的經歷。如何在回顧性調查中反映這些變化和影響因素（比如 70 年代末仍然留在農村的知青是否比已經返城的知青具有更大的動力參加高考），也是一個有意思的課題。

四十年前，知青這個群體是被夾在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知識份子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一個既獨立又不穩定的特殊階層，始終沒有被農村同化。多年以後，他們之中有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人從實為小學程度的體力勞動者變成了卓有成就的學者、教授、藝術家，有些從一文不名的待業青年變成了大大小小的企業家；更多的人始終沒能躋身於“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只是通過一輪又一輪的艱苦努力填補著那十年的空白，成為當今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有一部分人最終成了時代的弱勢群體。就像一棵擁有無數分叉的大樹。有些分叉枝葉繁茂果實累累，有些分叉因先天不足瘦弱枯萎。但所有分支樹葉都源于同一

個根源和主幹，所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以這樣一個歷經滄桑豐富多彩的群體作為研究物件，進行一項當代史回顧調查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研究啊。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俱有足夠的專業洞察力，看到知青題材在當代史中的特性和研究價值，看到青群體當年在中國社會的相對獨立性和集體生活方式為今天用定群研究的方法考察分析歷史提供的有利條件。

十五團四連的那份知青名錄並不是為了做下鄉時間分析而收集的，因此有些資料並不完全符合分析要求。比如記錄的離開時間是離開四連的日期而不是離開農村的日期，有些知青去向沒寫清楚，更沒有包含“後知青”時代的項目。但能見到這樣的名錄還是讓人很高興，它說明如果現在進行一次知青史回顧性調查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如果能再找到一些這樣的連隊，在此基礎上進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史回顧調查，成功的可能性一定很大。我覺得最終只要能有三四個連隊的完整資料就可以有很好的代表性了。

北大荒知青群體有很多特殊，比如機械化大農業生產，軍隊系列和轉業官兵為主體的管理幹部素質較高（相對於農村插隊），國家職工待遇，接收知青時間較早，知青來自全國各大城市等等。所以單獨作為一個分析單元很有必要，調查的專案也可以特殊一些。網上知青中荒友占的比例很大，很多單位都有像十五團四連知青一樣懷有熱情和積極性的群體。只要認真地發起，不愁沒有群眾支持回應。這些有利條件可以將北大荒作為全國性調查的先行試驗地區。至於其他地區我不瞭解，就不好多說了。我想其他地區的知青一定會有許多人有志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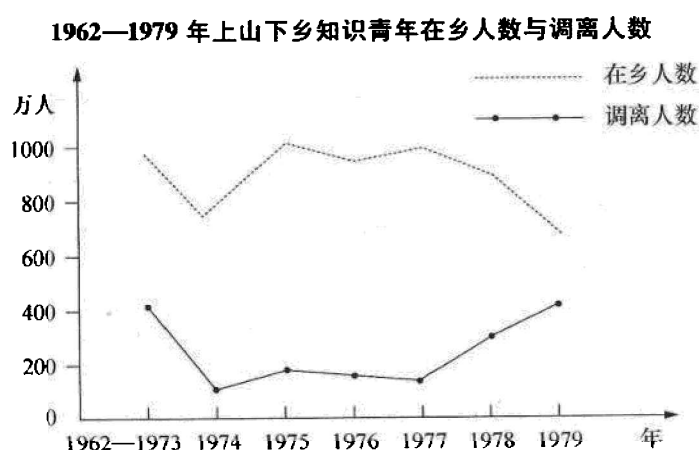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模圖

要想完整地直觀地描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整體規模和變動趨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畫一張各年度知識青年的下鄉人數、調離農村的人數和留在農村的人數這三項統計數位的圖形。這是我們從整體上分析評論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我一直想找到一張這種圖，至今也沒見到。

其實在劉曉萌、潘鳴嘯和金大陸、金光耀等人關於知青的著作中，已經列出了一些知識青年下鄉和調離的資料，有些書還畫了統計圖。只是這些資料和圖形要麼比較簡略，要麼缺失一部分年度，還有的圖形不正確。

例如：

劉曉萌著的《中國知青史·大潮》的第 536 頁畫出“1962——1979 年知青下鄉人數動態曲線”。這幅圖的不妥之處我已經在前面的博文“文革期間影響上山下鄉規模的基本因素是什麼”中指出過，此處不提了。此書第 539 頁還有“1962——1979 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鄉人數與調離人數”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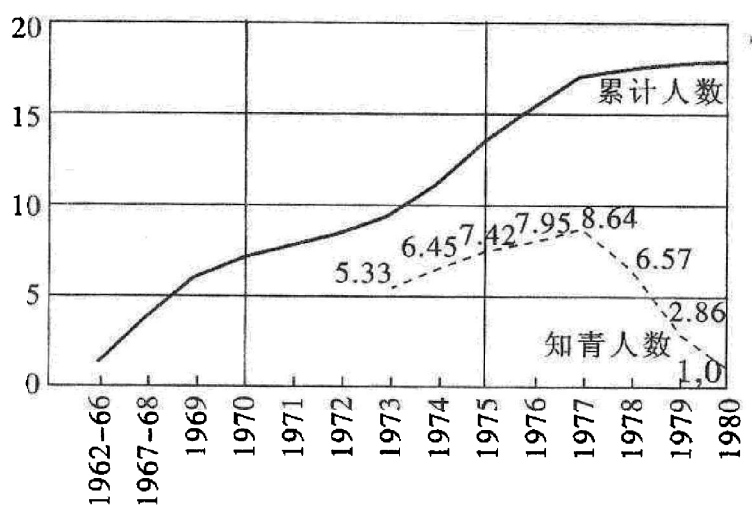


遺憾的是這幅圖也有同類的錯誤：將 1962——1973 年的資料點的高度按照多年累計的數值畫出。這就造成一個直觀表像，似乎在 1962 年至 1972 年時，每年調離人數曾達到過 400 萬，大大超過了 70 年代中期，這當然不是真實情況。

此圖的“在鄉人數”曲線，顯然是畫錯了（讀者可與本文最後一圖以及潘鳴嘯的下圖對比）。

潘鳴嘯在《失落的一代》第 178 頁（圖 3）畫出了“1974~1979 年知識青年下鄉和回城的情況”圖，但沒有畫出 1973 年之前的資料。

同一頁的圖 2 是“1962~1980 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累計人數及身在農村的人數”如下（資料單位是百萬）：



這幅圖也沒有畫出 1973 年之前的在鄉知青人數曲線，不能給人一個全面整體的描述；而且橫坐標（年度）不是線性均勻的，不能正確地表達 1960 年代累計人數的時間趨勢。

金大陸、金光耀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給出了主要的相關資料。此書附錄中的表 1 (P814) “1962——1979 年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和表 5(P819) “1962-1979 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調離農村人數及去向”列出了歷年知青的下鄉人數、調離人數和在鄉人數。但只列出了資料，沒有畫圖。為節約篇幅我就不列出原表了，主要有關資料列在了下面的表 1 中。

為什麼劉和潘的書中會有這些缺憾不足？為什麼上海的書中不能根據資料直接畫出 1962——1980 年各年度各指標的曲線呢？原因只要看一看後一本書中的資料表就知道了：第一：“下鄉人數”中 1962——1966 年是合併統計資料；第二：“調離人數”中 1962——1973 年是合併資料；這兩段時間都沒有每個年度的資料。這給我們直接畫出圖形造成了困難。要想正確和準確地畫出統計圖，最好能首先計算出每一年度的資料。

上述三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有顧順章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1949~1985）》，國務院知青辦編的“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統計資料”。這些資料我都沒有見過。我只能根據《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中的表 1 和表 5，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多年合併統計的資料分配到每一年度，畫出一個六七十年代整體的圖形。

對於 1962——1966 年下鄉人數合計數的處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平均，將這幾年的合計下鄉人數平均分配到每一年。這樣做當然會有誤差，實際資料很可能是逐年遞增的。但我們沒有什麼依據能給出一個合適的比例，也只好平均處理了。好在這幾年的下鄉人數與後來各年相比數量很小，這個誤差對總體的影響應該不大。

1967——1968 年這兩年的下鄉人數不適合平均分配，因為 1967 年全國中學生沒有正式進行畢業分配，下鄉的人數很少，與 1968 年的規模相比可以忽略。因此將兩年合計數全部算在 1968 年上要比平均分配更合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不是我首先想到的，潘鳴嘯在他的文章“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P401）中的圖 1 就是這樣處理的。我在前面的博文“文革

期間影響上山下鄉規模的基本因素是什麼”中引用了這張圖，提到過他的這個看法。

1962——1973 年的“調離人數”就更不適合逐年平均了。如果平均計算，就會產生六十年代前期調離人數超過下鄉人數、在鄉人數出現負數的荒謬。本文的計算假設是：忽略 1962——1969 年的調離人數，將這些年的合計的調離人數平均分配到 1970——1973 年。

這樣做的依據是：1967 年之前調離農村的知青人數不明，這些數字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但既然那時下鄉的人數相對較少，忽略調離人數的影響也就不會很大。1967——1969 年正值上山下鄉大潮初起，很少有人在這幾年調離農村。後來的形勢就不同了。眾所周知，1970 年有一陣知青當兵風，1971 年至 1973 年已經有了上學、招工，合計的調離人數應該主要是這幾年產生的。因為無法設想一個有根據的比例，只得將合計調離人數平均到 1970——1973 這四年。這樣計算當然會有誤差，實際上這四年“調離人數”可能也是逐年遞增的。

以上假設是不得不做的。可以稍感安慰的是，對於累積資料，這些假設造成的誤差方向相反，可以相互抵消一部分。比如 1962——1966 年的下鄉人數平均計算造成的誤差顯然是增大了累積下鄉人年數；而 1970——1973 年調離人數的平均假設造成的誤差卻減少了累積下鄉人年數。最終的總誤差是二者抵消後的結果，而不是二者累加的結果。

在上述假設下計算，得到下表：

表 1：1962——1980 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人數、調離人數和在鄉人數

年度	下郷人數		調離人數		在郷人數	調離比率
1962年	129.28	25.86	401.35	0.00	25.86	0.00%
1963年		25.86		0.00	51.71	0.00%
1964年		25.86		0.00	77.57	0.00%
1965年		25.86		0.00	103.42	0.00%
1966年		25.86		0.00	129.28	0.00%
1967年	199.68	0	401.35	0.00	129.28	0.00%
1968年		199.68		0.00	328.96	0.00%
1969年	267.38	267.38	60.35	0.00	596.34	0.00%
1970年	106.4	106.40		100.34	602.40	14.28%
1971年	74.83	74.83		100.34	576.90	14.82%
1972年	67.39	67.39		100.34	543.95	15.57%
1973年	89.61	89.61		100.34	533.22	15.84%
1974年	172.48	172.48	60.35	60.35	645.35	8.55%
1975年	236.86	236.86	139.79	139.79	742.42	15.85%
1976年	188.03	188.03	135.25	135.25	795.20	14.54%
1977年	171.68	171.68	103.01	103.01	863.87	10.65%
1978年	48.09	48.09	255.32	255.32	656.64	28.00%
1979年	24.77	24.77	395.39	395.39	286.02	5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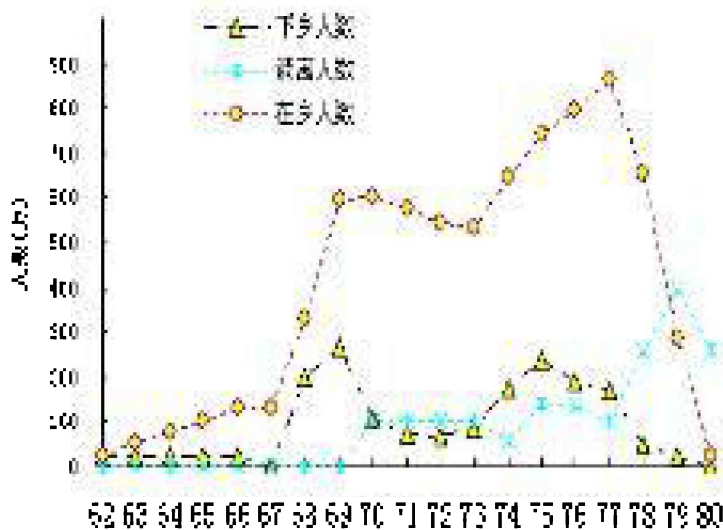
1980 年		0.00		261.25	24.77	91.34%
各年合計		1776.48			7713.16	

(單位：萬人)

第二列“下鄉人數”和第四列“調離人數”摘自《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附錄的表 1 和表 5。第三列和第五列按照前述假設計算。第六列“在鄉人數”的計算方法是：每年度的“在鄉人數”等於前一年度的“在鄉人數”加上本年度的“下鄉人數”減去本年度的“調離人數”。

為什麼將時間截至在 1980 年？因為 1979 至 1980 年出現知青大返城，實際上宣告了上山下鄉的終結。雖然此後仍有少數知青因為各種原因留在農村，表 1 並沒有列入計算。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數相對很少，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性質與原來的上山下鄉運動已經不同了。如果有人一定要分析 1980 年之後的資料，不妨以“上山下鄉遺留知青”為題單獨進行獨立分析，不必與 1980 年之前的資料混合。

在 Excel 中建立了表 1，就可以直接生成下面的“1962——1980 年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模圖”：



無論多麼粗略，無論有多少主觀和客觀的誤差，我們總算是將描述近 20 年上山下鄉活動的規模的主要統計資料完整地畫在一張圖上了。它大致展現了六七十年代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的整體規模和興衰過程，比較實際地反映了各項指標的動態變化，給了我們一些直觀的印象。

可以看到，整個 60 年代，知青的“下鄉人數”在 1968 年大幅度升高，在 1969 年和 1975 年兩次出現高峰；“在鄉人數”在 1977 年的最高峰時達到 860 餘萬人。自 1970 年至文革結束的 1977 年每年大約都有 10%~15% 的知青離開農村（1974 年的“調離人數”是最低值，令人聯想是否與“批林批孔”運動有關）。1977 年以後，“下鄉人數”大幅度減少，“調離人數”猛然增加，“在鄉人數”直線下降到底。總之這些圖形特徵清晰地反映了知青運動的高潮和結束與文革的興衰之間存在著的明確的因果關係。

表 1 中“在鄉人數”的計算假設與 1974 年之後的數字無關，因此 1974 年之後這項指標的數位和圖形與潘鳴嘯的（圖 2）基本一致。

除了這樣一個整體直觀的規模圖，還可以得到兩個有用的統計指標。一個是“城鎮知青累計下鄉人年數”，它就是表 1 第六列（在鄉人數）的各年合計數，約為 7713 萬人年。另一個指標是“知青人均下鄉時間”：

知青人均下鄉時間 = 知青累計下鄉人年數 ÷ 下鄉知青總人數 = 7313.16 人年 ÷ 1776.48 人 ≈ 4.3 年。

“累計下鄉人年數”和“人均下鄉時間”這兩個統計指標使我們從整體上對上山下鄉的規模和影響增加了一些定量的認識。

7 千 7 百多萬人年，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這是上山下鄉運動所付出的人力資源代價。這個代價要比中央所說的“國家花了 400 個億”的資金方面的代價不知高出多少倍。而比這些人力和資金方面的付出更大的代價是無法計算的——7 千 7 百多萬人年中包含的青春年華和熱血忠誠。

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規模描述，除了人數之外，知青下鄉的時間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人均下鄉時間”為 4.3 年，這使我們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但僅僅這一個數字是遠遠不足的。看到這個數字肯定有人會立即表示不滿意：“下鄉時間哪止是 4 年多？”

有這種感覺的人一定是“老”知青，即下鄉較早的老三屆和六九屆、七零屆知青。對於這一類人，在農村的平均時間肯定不止 4 年多。我前面的文章就寫過，我下鄉所在的黑龍江兵團的連隊，北京知青平均下鄉時間是 7 年多，比這個值長多了。那是因為我們這些知青都是 1968 年下鄉的。看了表 1 就知道，1975 年之後有 600 多萬知青下鄉，此時距離“大返城”已經很近了，他們大多較短時間就回城了。“人均下鄉時間 4.3 年”是總體平均計算的結果，並不適用於“老”知青。

這說明，僅僅用一個平均的下鄉時間遠遠不能說明上山下鄉對知青的影響程度。實際上，知青的下鄉生活時間，有一個很寬的分佈區間，這個分佈不大可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我們很想知道有多大比例的知青下鄉時間超過 5 年、8 年和 10 年，就無法從這幅圖中得到。而這些是我們分析知青群體的重要資料。影響下鄉時間的因素，除了屆別（下鄉的年度）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調離途徑。據我所知，1970 年開始的當兵，是知青成批離開農村的第一波。這些人在農村的時間只有兩年左右。隨後是 1971 年開始的大學招生和城市、工廠招工，這些人在農村的時間也不很長。再然後是 70 年代中期開始的困退、病退潮。最後是 1977、1978 年大學招生和 1979、1980 年的大返城，此時的知青，很多都已經下鄉 10 年左右了。不同屆別、不同調離途徑的人群，下鄉時間的差異很大。而“調離途徑”的背後，則是家庭出身等因素。只有分門別類地統計計算，才能完整真實地描述清楚。

但是眾所周知，我們無處尋找按照不同因素分類統計的資料，將來也不大可能找到現成的統計資料。

另一種可能的不滿是：為什麼只說城鎮知青而沒有包括回鄉知青？

我在先前的博文中寫過一句：“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一千多萬知青的上山下鄉都可以說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屈指可數的重大事件”。後來有人對此表示異議：“涉及一千多萬人？不止吧？知青史別忘了回鄉知青。”

我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期間，我們連就有三名文革前下鄉的哈爾濱知青以及多名山東“支青”，還有幾個中學畢業的八五八農場老職工子弟。後者應該算是“回鄉知青”吧（其實他們也沒有離鄉）。他們當然應該算是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的一個分支。但是這一類別的知青資料就更難找尋了。

在上個世紀動盪的六七十年代，重要統計資料的缺失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有些資料現在還不願公開，這給我們帶來很多困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已經結束 30 年了，經過知青史研究者這麼多年的努力挖掘，積累的資料資料可以說仍然極有限，距離廣大知青的希望和研究者對這一宏大運動的分析需要還有很大的距離。就連本文所做的這麼一點簡單分析，仍然不得不借助於各種假設、簡化。看來對新的知青史資料的發現，以後也很難抱有很大指望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一再提出進行一次上山下鄉回顧性調查的建議。這種調查應該是能夠部分彌補包括下鄉時間分佈和回鄉知青資料在內的各種歷史資料缺失的有效途徑。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方法嗎？

第五節 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

一、上海百萬高、初中生上山下鄉

“文化大革命”經歷了兩年，本應畢業的 1966、1967 屆學生仍滯留在學校。從 1968 年開始，上海對這部分學生進行分配。1968 年 7 月 2 日，市革命委員會在虹口體育場召開“上海市 1966 屆高、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動員大會”。（據統計：上海 1966 屆初中畢業生共 149669 人，高中畢業生共 30970 人）7 月 8 日市上山下鄉辦公室成立（9 月份辦公室的工作劃歸市革委會郊區組），各區縣和街道、鎮也先後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和知青工作組，各中學成立畢業生分配工作組，開始大規模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7 月 27 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隊落戶的紅衛兵出發。8 月 9 日，上海首批赴黑龍江務農的紅衛兵出發。這兩屆中學畢業生共 44.5 萬人，經動員上山下鄉的有 22 萬餘人。但 66、67 屆畢業生仍統一實行“四個面向”的政策，即有部分畢業生進入工礦企業。1968 年

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幾十萬上海人連夜上街遊行，熱烈歡呼“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插隊落戶幹革命，上山下鄉當闖將，繼續革命立新功”。駐各學校的工宣隊也立即行動起來，趁熱打鐵，為做好上山下鄉工作進行宣傳和組織準備。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員會決定：通過上山下鄉安排3年來積壓下來的數十萬大、中學校的畢業生。決定68、69兩屆中學畢業生（共46萬人）和前兩屆（即66、67兩屆）餘留下來的符合分配條件的畢業生，除極少數身體殘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難的外，全部動員上山下鄉（共50.7萬人），即實行“一片紅”政策。1970年11月7日，上海根據外省市已改變中學生面向農村的單一去路，上海的工礦業也存在勞動力缺口，故對70屆中學畢業生恢復按“四個面向”進行分配，實行以兄姐去向為依據，決定本人分配到工礦或農村、上海或外地、全民或集體的“按檔分配”、“對號入座”的辦法（1970屆畢業生共21萬人，其中11.5萬人去外地農村，9.5萬人分配進市區工礦企業）。這一辦法延續到1978年。1971年8月17日，上海安排7萬名知識青年作為外地代訓學徒到工礦企業培訓。上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去內蒙古、黑龍江、雲南等地幾個大型生產建設兵團和郊縣國營農場。這部分知青在那裏有固定工資，有公費醫療和探親假等，過著有組織的集體生活。據1968~1970年統計：各類農場安置上海知青25.6萬余人，另一種是去江西、安徽、吉林、雲南、貴州、內蒙古、黑龍江、遼寧、浙江、江蘇等地及市郊農村插隊落戶，一般4~10人建立“知青點”，參加當地社隊的生產勞動，自食其力。這些地區本來經濟情況不好，勞力過剩，生產門路狹窄，所以工分很少，生活也很艱苦，這部分知青達到31.8萬人。據上海市勞動局統計，1968~1978年，上海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總

人數為 1112952 人，分佈在黑龍江、內蒙古、雲南、貴州等 10 個省的廣闊地區。

1968 年開始，許多家長為使子女有所照顧，通過在農村的親友，把子女送往家鄉插隊落戶。1968~1972 年，去江蘇、浙江等省投靠親友的下鄉知識青年共有 8.3 萬餘人。

〔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1978 年上海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及分佈表

單位：人

去向	上山下鄉總人數	插隊人數	建設兵團、農林場人數	
合計	1112952	513671	599281	
跨省（區）下鄉	615517	401147	214370	
其中	黑龍江	165186	27046	138140
	江西	118805	106856	11949
	安徽	149421	137374	12047
	雲南	55944	10065	45879
	貴州	10491	10491	
	吉林	23815	23815	
	內蒙古	7963	1608	6355
	遼寧	594	594	
	江蘇	51200	51200	
	浙江	32098	32098	

上海郊縣	497435	112524	384911
------	--------	--------	--------

說明：上海郊縣有 15.6 萬（其中 1968 年 9.3 萬，1969 年 6.3 萬）名農村戶口的初高中畢業生，回到所在社隊務農，未記錄入上山下鄉人數。

至 1975 年 4 月，據市上山下鄉辦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會的報告：當時上海在全國各地的知青人數統計情況，總人數計 398908 人（江浙等省回鄉探親及郊縣插隊農場知青不計）。

1975 年上海知識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鄉人數及分佈表

單位：人

所在省市	總數	插隊	兵團農場
總計	398908	216395	182513
雲南	42407	1726	40681
貴州	3109	3109	0
江西	87640	75896	11744
安徽	113090	104322	8768
吉林	11286	11286	0
黑龍江	134690	19494	115196
內蒙	6686	562	6124

當對畢業生實行“一片紅”上山下鄉政策時，除有一批響應號召的積極分子外，部分青年和家長有抵觸情緒。於是學校、機關、街道、里弄、工廠、企業舉辦學習班，開展“大批判”，製造政治壓力，有的甚至採取強遷戶口，斷絕口糧供應等手段，逼迫動員。市紅代會常委則帶頭上山下鄉。鐵路運輸部門每天安排三個專列，有關部門甚至還動員海軍艦船將知青從上海運往大連，再轉運至吉林、黑龍江。1970年開始，上海市中學生恢復實行“四個面向”政策，動員知青上山下鄉仍然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為此，被分配上山下鄉的部分知青及其家長不滿。1972年8月29日，市上山下鄉辦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會反映：最近上訪人數增加，尤其獨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全部下鄉的家長來辦（公室）申訴情況集中，平均每天多達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鄉後家庭發生父母患病、父母雙亡等困難。同時社會上傳言外地獨生子女已調回。個別家長認為“同一個市革委會同一條路線，相隔一年就採取了兩種絕然不同的做法”，要求“還我唯一的一個孩子！！！”但因上山下鄉運動已被賦予濃厚的政治色彩，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根本大計，因此儘管有人不滿，每年仍有大量的上海知識青年被送到全國各地。1973年3月31日，有800多名中學生赴黑龍江邊疆地區上山下鄉，全市組織了10萬人夾道歡送。1975年12月29日，市紅代會在市革委會大禮堂召開“上海紅衛兵上山下鄉誓師大會”，向1975屆紅衛兵發出倡議，要“以實際行動回擊教育界出現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談怪論，掀起上山下鄉新高潮”。到上山下鄉運動後期，每到年底都有一批知青返城不歸。1974年底回滬探親的上山下鄉知青有91241人。1975年4月26日，市革委會召開各局負責人會議，佈置動員返滬知青回原地“抓革命、促生產”。另據中央文件，當時上海的中專、中技、半工半讀畢業生一般按

“四個面向”的原則進行分配。至 1972 年底，全市各大專院校在文革前招收的大學生基本分配完畢，共計分配畢業生 21220 人。

二、知青安置政策及其演變

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去市郊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不包括回鄉投親插隊的知識青年），政府規定發給安置費，主要用於修建住房，購置必要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鄉知青的單程路費、行李運費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難補助。知青口糧，在下鄉第一季度由當地糧管部門供應。第二季度開始，由生產隊按社員口糧標準供應。吃菜由當地社、隊分給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種菜。疾病醫治，參加當地合作醫療，對少數重病患者，按照自力更生、各方資助的原則，除自己承擔外，由合作醫療負擔一點，家長單位補助一點，醫療部門減免一點，下鄉經費補貼一點，共同幫助解決。

去外地農村集體插隊的知識青年，除按國家規定撥發給安置費外，根據不同去向，發給每人不超過 25~35 元的行裝補助費，並發給布票、棉花票和每人一頂蚊帳券。去內蒙古、黑龍江、吉林等嚴寒地區插隊的，供應草綠色的軍大衣、棉襖、棉帽和取暖膠鞋。1973 年又規定另外補助 40 元冬裝費。下鄉知青的單程路費按實支數報銷。一般下鄉的頭一年由國家供應統銷糧，由社隊供應柴草或燃煤，並分給供應種菜用的自留地，以後則參加集體分配，並輔以必要的照顧。去外省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一般參加當地農村的合作醫療，重病重傷的由安置部門統籌補助解決。對去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新疆等邊遠地區插隊的，插隊期間按規定享受兩次探親路費。去生產建設兵團、國營農場、林場、牧場、茶場的，生活由場部安排，工資待遇按國家規定辦理。

上海知識青年到全國各地農村上山下鄉後，滿懷激情地參加農村體力勞動，想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改變農村貧窮落後的面貌。各地農民也給予了上海知青很大的幫助和支持。但是，由於中國人口多，土地少，貧窮落後，隨著下鄉知青的不斷增加，也發生了諸如知青和當地農民爭口糧、爭工分的問題，知青和他們的家長生活困難負擔過重的問題，隨著年齡增長出現的婚姻戀愛問題，知青在農村受打擊遭凌辱的問題，甚至一些地區發生了對下鄉女知青逼婚、強姦等嚴重摧殘身心健康的犯罪行為，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長的強烈不滿，特別是林彪叛國事件後，上海知識青年普遍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長“在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大膽地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信“告禦狀”，反映包括他自己兒子在內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艱難狀況。4月26日，毛澤東給這位家長復信：“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復信後，中共中央於6月21日發出了〔1973〕21號檔，國務院也於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研究“統籌解決”的措施。此後，一批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被法辦，上海下鄉知青的情況有所改善。1973年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下鄉知青中家庭生活困難的，由其家長所在單位給予補助，被稱為“聊補”。還有一些知識青年下鄉以後，生活不能自給，需要上海家長接濟。1973年下半年，組織知識青年家長所在單位，每年普遍對知青家庭進行兩次訪問，並對生活困難的家庭酌情補助。補助金額平均每戶30元左右，補助面在30%以上。1973~1974年，合計補助2300餘萬元。1975~1977年，平均每年補助1500萬元。1974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轉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關於上海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對市郊農村插隊知青的一次性補助費由每人230元提高

到 480 元。去國營農村的知青每人 400 元、分別由各縣和上海市農場管理局統籌使用。對於插隊知青的口糧、食油、須按城市居民標準供應。疾病醫療辦法也有所改進。生產和生活用具統一由公社採購、發給。

1973 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後，首先對教育界進行了整頓，恢復了大學對工農兵學員的招生考試。1974 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門組織 16 所大專院校先在安徽阜陽、江西上饒、黑龍江黑河、吉林延邊、雲南西雙版納 5 個地區試辦業餘函授教育。開設政治理論、語文、歷史、農業生產、農用機械、醫療衛生等 23 個專業，招收學員 2.8 萬餘人，其中上海下鄉知青約占 50%。1975 年，又擴大到大興安嶺、井岡山、宿縣、滁縣等地區，學員增加到 6 萬餘人。另有很小部分上海知識青年參加了全國各地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招生考試或被直接選送到大學學習，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1974~1975 年，上海知青回滬探親時，上海各區街道和企事業單位協作，舉辦電、木、泥工、農機維修、農藥使用、醫療、縫紉、理髮等 560 多個短期技術培訓班，培訓下鄉知青 1.6 萬餘人。與此同時，1968~1975 年，上海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編印《上山下鄉》小冊子 43 輯，共 628.8 萬餘冊（其中資料 61 種，145 萬冊），內容主要反映下鄉知青的成長和他們的“先進”經驗。上海人民出版社專門組織近千人的寫作力量，為下鄉青年編寫自學讀物 20 多種，出版其他農村讀物 36 種，合計 284.3 萬餘冊。通過上海駐各地的學習慰問團向去外省、區下鄉的知青贈送圖書 4 批、41 種；向上海郊區下鄉的知青贈書 4 批、51 種，共 425 萬餘冊。從 1975 年 6 月開始，上海為江西、安徽、吉林 3 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較集中、集體經濟比較薄弱的地區，扶持創辦了 550 餘個小作坊、小

工廠。其中江西 335 個，安徽 187 個，吉林 28 個。以後又為黑龍江、遼寧、內蒙、雲南、貴州等省、區協辦 257 個。這些工廠、作坊，有農機修配、農副產品加工、竹木製品、鐵鍋生產、制磚、縫紉、補鞋等為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服務等多種專案。這些專案推動了當地集體經濟的發展，幫助知青克服生產、生活方面的一些實際困難，吸收安置了 1 萬多名生活比較困難、不宜參加農業生產的病弱青年，使他們中的不少人解決了生活自給問題。再據上海市勞動局統計，1968～1973 年，上海市對安置省、區提供價值 1600 多萬元的物資。到 1975 年，上海市給在各省農村的知識青年提供大小拖拉機 7000 餘台、拖斗 800 餘隻、各類汽車 50 餘輛，以及柴油機、發電機、電動機、變壓器、水泵和各種建築材料等物資，價值 5500 萬元，還提供無息貸款 500 萬元，最後全部免予歸還。

三、學習慰問團

1969 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提出“五七”幹校幹部“四個面向”（即面向邊疆、農村、工礦和文教基層系統）藉以驅散原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8 月 27 日，市革委會召開動員大會，並層層分配指標。當時的口號有“四個面向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組成部分”、“四個面向是又一次路線站隊”。結果，上海市革委會派出 2000 多名幹部組成的“學習慰問團”（共分 7 個總團，55 個分團，233 個小組）分赴黑龍江、雲南、貴州等上海知青安置地，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幫知青解決一些實際問題。與此同時，市革委會還與黑龍江革委會達成協定，派出 1700 名幹部帶著戶口、糧油關係和 16 萬知青一起去黑龍江“插隊落戶幹革命”。1973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索要各省市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組長名單事宜，發出正式通知成立上海知青上山下鄉

領導小組（1969年10月，上海市革委會曾成立市知青上山下鄉辦公室，軍宣隊張芳信為主任。1981年1月1日，上海知青上山下鄉辦公室宣佈撤銷，其業務併入市勞動局），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任組長，黃克、呂美英，張芳信任副組長。1973年11月10日，上海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由王一平主持並講話。會議通過三條建議：（1）建議向各省派出由670名幹部參加的慰問團，分頭赴各省慰問上海知識青年，幫助當地安排知青的生活。（2）建議召開第二屆送子女上山下鄉革命家長代表會議。建議農口召開上山下鄉先進分子集體代表會議。（3）建議上山下鄉辦公室增加一個大組，下設宣傳動員、城鄉聯絡、信訪接待、辦事4個小組，處理經常工作。1973年12月16日，上海市知青領導小組召開了第二次會議，討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上海的有關領導外，還有中共安徽省委、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會議討論上海知青在外地的情況，還決定派代表去貴州研究上海知青安置落實問題。1974年上半年市委再次召開會議研究“學習慰問團”事宜，並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作了專題報告。當時，全市共動員2000多幹部組成8個“學習慰問團”，分赴有上海知青的9個省（區），深入265個縣、3782個公社，54.9萬多個生產隊及兵團、農林場，對46.8萬多下鄉知青進行慰問。至1975年“學習慰問團”的幹部進行了輪換，具體安排如下：工交系統540多人去江西、安徽，少數去雲南。科技系統50多人去內蒙、黑龍江。郊區系統50多人去雲南。財貿系統90多人去貴州。文教系統100多人去吉林。市革委會機關和公安系統130多人去黑龍江。同時，市委決定：今後“學習慰問團”不再搞春節回滬整訓，兩年內，可分批安排幹部回滬休假一次，為期20天。批示聲稱“學習慰問團”不僅是“教育幹部、鍛煉幹部的有力措施，對堅持上山下鄉的方向，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具有

重要意義”。以後隨著知青的返城，這項工作也就自然結束。值得一提的是曾去黑龍江插隊的那批幹部，因上海方面不接收，暫只得轉向安徽銅陵新橋礦、江蘇大屯和張家窪，後又在三地待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陸續返回上海。

四、知青返城

1978 年春，國務院批轉檔，放鬆了知識青年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因本人身體健康，家庭困難的知識青年開始返回上海。不少身體健康的上海知青為了回滬向當地醫院“開後門”獲取假病歷，當地醫院也出於同情為其出具可返滬的證明。1978 年 10~12 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對知識青年政策做出了調整，終止使用上山下鄉這一方法安置城市知識青年，要求對已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積極妥善地予以安排。其間，上海出現了知青要求返城的遊行請願活動。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會見了知青代表，瞭解情況。團市委廣大幹部深入到第一線做疏導工作。與此同時，1978 年 12 月 4 日，雲南景洪東風農場 4 分場以全體上海知識青年名義致電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勞動局，要求為“廣大知識青年平反昭雪”，要“回上海參加四個現代化的建設”，要求立即派調查組去雲南。1979 年 1 月 3 日，上海市委召開幹部大會，傳達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精神，提出貫徹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因春節期間，各地知青回滬串聯。1979 年 2 月 5 日，即春節後第九天，上海發生部分知青（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業的知青）為達到返滬目的的聚眾遊行活動。當日下午，部分知青聚集到上海共和新路道口，部分人員竟採取臥軌攔截火車的行動，將上海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堵塞。6 日凌晨，在國務院下達電話指示後，在有關方面的耐心勸說下才撤離現場，少數不聽勸說者，被員警帶入公安局，交通恢復暢通。這次臥軌使上海站 29 趟列車不能出站，

31 趟列車不能進站，滯留旅客 8 萬多人，始發晚點和停運晚點累計達 632 小時 27 分，僅此一項損失 219.56 萬元。2 月 7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電視廣播大會，號召知識青年做維護安定團結的模範，全市各單位也要求知青家長配合做知青工作，穩定在滬知青情緒，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汪明章也邀鐵路、公交、財貿、地區各方面的青年和回滬知青代表座談這次事件的教訓，要對青年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一方面做耐心的勸說工作，肯定廣大知識青年赴外地上山下鄉，為祖國建設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對他們不顧大局，集會鬧事，造成嚴重後果，進行了嚴肅地批評。隨後，上海從實際出發，研究了知青問題現狀，加快了對知青問題的解決。1979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上海召開各方參加的統籌安排知青工作會議，確定“全黨動員、廣開門路、統籌安排、擇優錄用”的方針，在全市企業生產任務不足，增人指標有限的情況下，主要採取子女頂替、發展集體所有制（包括企業大集體、區建勞動服務公司、街道集體所有制）等方法，發揮各局、區的積極性，採取任務到局、區，條塊結合，統籌安排本系統、本地區職工的回城子女。還具體規定，市企事業單位的職工退休、退職時，可招收 1 名符合招工條件上山下鄉子女回滬“頂替”工作。對按政策批准回上海的知識青年，原則上採取“歸口包乾”的辦法，以知青父母所在單位主管面為主，規劃組織集體所有制企事業安排回滬知青，並承擔安排部分父母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回滬青年。各區、縣也廣開門路，發展集體所有制企事業安排知青。據統計，僅 1979 年上海就安排返城知青 30.3 萬人，基本上解決了因知青返城帶來的壓力。至 1983 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插隊的上海知識青年除已在當地安排工作和已和當地職工、農民結婚成家者外，基本上回上海安排了工作。同時，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某些遺留問題作了善後處理。為適當幫助

仍在外省區的原上海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解決其子女就讀、就業方面的實際困難，經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勞動局、教育局、公安局、糧食局於 1989 年 3 月 21 日聯合發出《關於允許在外省區工作的原上海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子女來滬就讀入戶問題的通知》，規定仍在外省區工作的每戶知識青年允許 1 名 16 周歲或初中畢業以上未婚、未就業的子女來滬就讀入戶，來滬就讀入戶的必須有知青在滬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監護人”，自行解決住房問題。符合這些條件的知青子女，由知青和知青子女的“監護人”，向知青原戶口遷出地所在街道、鎮的勞動部門填報《申請表》，經區、縣勞動局審核批准後辦理來滬入戶手續。當年經批准來滬的知青子女 35955 人。1990 年批准 15205 人。

第六節 一份三十六年前的知識青年工作調查報告

嫩竹

1972 年 1 月，在吉林省琿春縣敬信公社防川大隊插隊的我，因工作需要上調到縣革委會五·七辦公室（“知青辦”的前稱），主要從事宣傳工作。在 1973 年的 4、5 月間，在當時的五·七辦公室主任安熙雲的帶領下，抽調十多名幹部，深入全縣各社、隊，歷時二個來月，對知識青年工作開展了比較全面的調查。並根據調查的情況進行分析，提出進一步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打算。我自始至終參加了當時的調查，並將調查的情況寫成詳細的報告上報縣委。

三十六年過去了。我保存的這份當年打字的調查報告，打字紙已經泛黃發脆，字跡已經不很清楚，但大致還能辨認。經過幾天的辛苦，我終於將這份三十五年前的知識青年工作調查報告，重新用電腦打出來了。通過這份報告，大家可以瞭解到當年知識青年工作的概況、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當時五·七辦公室向

縣委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打算。

1973年還是“四害”橫行之時，知識青年工作中問題甚多。當時的以安熙雲主任為領導的五·七辦公室，能夠對全縣知識青年工作開展大調查，發現不少急待解決的問題，並提出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工作的具體打算，而當時的縣委領導也相當重視知識青年工作，這在現在看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海（琿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我謹將這份保存了三十六年的知識青年工作調查報告，奉獻給當年在琿春插隊的知識青年朋友們。

阮雲寶

2009年3月

琿春縣下鄉知識青年工作調查報告

縣委領導：

為了進一步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重要指示，瞭解和掌握當前我縣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實際情況，以便進一步做好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根據領導的指示，我辦在今年（1973年）4至5月抽調十多名幹部，深入各社、隊對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現將我們的調查情況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報告如下：

一、我縣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概況

我縣自一九六四年開始安置知識青年。截止今年五月五日統計，共安置來自

上海、長春、圖們和本縣的知識青年共 8,546 人。其中七 0 年以前下鄉的有 7,365 人，七二年下鄉的有 835 人，投親插隊的有 346 人，共建立 582 個集體戶，分佈在我縣 12 個公社、114 個大隊、562 個生產隊。幾年來招生 132 人，招工 2,478 人，參軍 137 人，結婚出戶 486 人，轉往外地 882 人，病退回城 135 人，死亡 22 人，犯罪法辦 18 人，共減員 4,290 人。現有知識青年集體戶 486 戶，知識青年 4,256 人。其中上海知識青年 2,449 人，長春知識青年 49 人，圖們知識青年 564 人，本縣知識青年 1,192 人。

我縣 12 個公社黨委中，最重視知識青年工作的是春化公社黨委。該黨委多次被評為縣和地區的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先進黨委，該公社草帽頂子大隊四隊的上海知識青年集體戶多次被評為縣和地區的先進集體戶。近幾年，馬滴達公社黨委注意加強對知識青年的培養使用，黨委書記金春權親自到五道溝大隊蹲點，培養上海知識青年宋愛敏。這個典型的樹立對當前上山下鄉工作很有推動力。楊泡公社黨委書記方鶴然、英安公社黨委書記祖國林等同志都十分關心“再教育”工作，親自動手抓，各有很突出的事蹟。

從全縣有知識青年的 114 個大隊黨支部來看，自從 1971 年樹立馬滴達河東大隊黨支部這個典型以來，又湧現出春化公社草坪大隊黨支部以及英安公社八二大隊黨支部、涼水公社河西大隊黨支部等先進單位。這樣的黨支部全縣共有 35 個，占全縣黨支部總數的 30%。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支部書記親自抓知識青年工作，重視對知識青年的培養和使用，在新時期注意對青年開展理想和前途教育，把“再教育”工作作為黨的長期事業來抓。平時能過問知識青年工作的黨支部有 64 個，占黨支部總數的 56%；基本上不過問知識青年工作的黨支部有 12 個，占黨支部總數的 14%。

草坪大隊黨支部書記李成祿幾年來親自抓知識青年工作，該大隊 59 名知識青年中先後培養了 4 名黨員，25 名團員。有 21 名知識青年擔任了大、小隊的各種職務。由於工作的需要，先後有 20 多名知識青年調離農村，4 個黨員走了 3 個，他們並不認為這是 “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為能夠給國家各條戰線輸送人才感到光榮。他們又繼續加強對知識青年的培養使用，又準備吸收 4 名知識青年入黨。幾年來這個大隊沒有一個知識青年轉戶，而先後有 3 名外地知識青年來落戶。今年春節前後，有不少知識青年回上海探親。在知識青年回隊之前，大隊黨支部發動民兵為知識青年們燒炕、劈柴、打掃衛生。知識青年們回來一看，從心底感到熱呼呼的。馬滴達公社五道溝大隊黨支部注意培養知識青年，大隊知識青年中有一半人參加過 “一打三反” “鬥批改” 宣傳隊。英安公社八二大隊黨支部注意抓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的教肅，涼水公社河西大隊黨支部在對知識青年開展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方面比較突出。

從 “再教育” 隊伍來看，自從 1971 年縣 “積代會” 樹立了蔡奎泰、許蓮玉等貧下中農戶長典型後，這幾年在貧下中農戶長中又出現 18 個先進典型。

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貧下中農戶長隊伍不健全，不起作用的多。據統計，全縣 486 個知識青年集體戶的貧下中農戶長中，起作用的有 201 人，不起作用的有 226 人。有 40 個集體戶至今沒有配備貧下中農戶長。主要原因是，在知識青年大批招工、招生之後，對 “再教育” 工作產生模糊認識，認為批培養知識青年是 “白搭工”、 “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基層培養好了就被上面拔走，而表現一般的知識青年 “培養不培養一個樣”。好些黨支部和貧下中農戶長還認為，知識青年下鄉都四、五年了，他們都已經會幹農活和料理自己的生活，不用多操心了。更多的人認為，知識青年遲早都要離開農村的，他們不可能在農村呆上一輩

子，管不管都一樣。如馬滴達公社四道溝大隊黨支部、涼水公社南大大隊黨支部、馬川子公社炮臺大隊黨支部，多年來基本上不過問知識青年工作，還將知識青年當包袱用。大隊領導看到縣、社幹部就提出要求“把知識青年都調走”。有的還講“現在的知識青年不起先鋒模範作用，只起麻煩作用”。

好多知識青年反映“現在縣、社的幹部，品質、貧下中農戶長很少到知識青年集體戶”。有的講“貧下中農戶長平時不來，我們殺豬、殺狗、打打糕，或者從上海回來，他們就來了。”

（一）當前知識青年的思想狀況

根據調查，七〇屆以前的下鄉知識青年中，招工、招生、參軍的有2,747人，占下鄉知識青年總數的36%。由於大批的招工、招生，加上知識青年年齡的增大，好多知識青年對是否在農村紮根產生動搖。女知識青年、多子女下鄉未抽調的知識青年、家庭經濟困難的知識青年、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思想波動更大。好多知識青年開始考慮戀愛、婚姻問題，但想到結婚以後有許多實際困難難以解決（住房、生活自給、探親等），因此真正打算在琿春農村安家的並不多。已經有883名知識青年轉到外地農村（大部分是南方各省的農村），占下鄉知識青年總數的10%，其中大部分是女青年。尚有887名知識青年準備轉戶，其中上海知識青年有470人，占上海知識青年總數的15%。有的知識青年走前將一年的口糧都賣掉了。如英安公社英安九隊一個有十一人組成的上海知識青年集體戶，有十名青年是賣掉一年的口糧後回滬的。至今還有1,300多名上海知識青年探親沒有回來。春化公社草坪大隊一隊的上海知識青年楊東輝，下鄉後表現一貫很好，是大隊培育入黨的物件。即使是這樣比較先進的青年，他表示自己願意在農村紮根，但是否在琿春紮根，還沒有想好。他認為從長遠考慮，還得轉到南方的

農村去。

我縣原有 538 名長春市的下鄉知識青年，幾年來以各種理由轉戶的有 264 名，占長春市的下鄉知識青年總數的 44%。這些青年多數轉往長春市近郊，大部分已被招工。除了招工、招生 173 人外，現在在農村的只有 51 人。好些知識青年的家長認為，子女下鄉好幾年，應該招工、招生了。有的認為子女沒能上調是因為“表現不好”，“家長臉上不光彩”，這加重了青年的思想負擔。

城市中的不正之風——“走後門”對青年的影響很壞，造成不少青年對回城的嚮往和不安心在農村。如春化公社草帽頂子大隊二隊的長春知識青年李連弟，下鄉後表現很差，但通過其父親的關係，以“轉戶”為名將戶口遷回長春市，現在他已經在長春某部隊當鍋爐工。有的青年講“老子當官兒進城，老子做工兒務農”；有的講“一等爸爸有辦法，二等爸爸想辦法，三等爸爸找辦法，四等爸爸沒辦法”。

（二）關於下鄉知識青年的培養使用

我縣各級黨組織及廣大貧下中農，這些年在培養和使用下鄉知識青年方面是有成績的。全縣下鄉知識青年中有 162 人入黨，2,226 人入團。擔任公社黨委委員以上職務的有 8 人（其中縣委委員 1 人，州委候補委員 1 人。大隊黨支部委員 30 人，黨小組長 3 人。擔任公社團委委員的有 51 人（其中團縣委委員 4 人，團州委委員 2 人）團總支、支部委員的有 527 人，團小組長 176 人；擔任生產隊副隊長以上職務的有 236 人，擔任大、小隊其他職務的有 514 人，擔任公社婦女主任的有 12 人，大小隊婦女隊長的有 141 人，擔任民兵排、連幹部的有 625 人。全縣有 771 人次的知識青年被抽調參加過整建黨、一打三反、鬥批改宣傳隊。幾年來出席省、地、縣、社各種積代會和講用會的知識青年有 906 人次。

以春化公社為例，幾年來在這裏插隊的 668 名來自上海、長春、琿春的知識青年中，先後有 19 人入黨，186 人入團，擔任公社黨委委員以上職務的有 3 人，黨支部委員的有 6 人，黨小組長 1 人，生產隊副隊長 13 人，民兵連、排幹部 64 人，有 111 人次參加過各級積代會，成績是突出的。

幾年來縣、社先後抓了上海知識青年諸梅芳、付義孝以及長春知識青年路惜寶，圖們知識青年尹起范，琿春知識青年潘麗穎等個人典型和大北城、分水嶺、防川等 16 個集體戶典型，以點帶面，推動了上山下鄉工作的開展。

由於工作的需要，大批的招工招生，原有的典型人物和骨幹青年大多數都調離了農村。從去年下半年起，各公社又抓了上海知識青年宋愛敏、長春知識青年劉瑞雲等先進個人典型。馬滴達公社五道溝大隊黨支部為了培養宋愛敏，黨支部決定將住在二隊的黨支部副書記調到四隊負責幫帶宋愛敏。三隊的女青年徐文華被培養擔任了大隊治保副主任，成為黨支部的得力助手。四隊的上海知識青年劉亞卿出身資本家家庭，本人表現好，黨支部培養她入了黨，並擔任大隊的報導組長。全縣新湧現出來的先進個人典型 17 個，先進集體典型 27 個。

存在的問題：一是由於典型個人、青年骨幹上調的過多，客觀上造成好多大小隊不願意培養和使用知識青年，尤其不願意讓知識青年擔任有“實權”的工作。二是有計劃、有目的、長期的下功夫培養知識青年典型不夠，有任其自然成長的傾向。有的典型“牆裏開花牆外香”，在外地名氣很響，而本地學習並不理想。

（三）關於打擊階級敵人的問題

從 1968 年以來，我縣共發生破壞上山下鄉的案件 82 起，涉及案犯 92 人。

對這些案犯的處理情況是：槍決 1 人，判刑 26 人，戴帽 3 人，社隊批鬥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有 56 人，在押未定的有 4 人，自殺的有 3 人。

這些案件的出現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自從貫徹黨中央（1970）26 號檔後，我縣大張旗鼓的打擊了一批階級敵人，殺了個劉海鵬，全縣震動，有力地保護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據統計，1971 年案件減少到 10 起。但是由於我們對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認識不足，抓階級鬥爭時緊時鬆，從 1971 年年末起，對壞人的打擊不夠有力，案件又有增加。去年發案 16 起，今年上半年又發案 4 起。這說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案件分析，幹部利用職權，以“關心”“培養”為名，以招工、招生、入團、入黨為誘餌，姦汙、調戲女知識青年是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全縣 82 起案件中，姦汙、調戲女知識青年的就達 38 起，占案件總數的 46%，其中幹部為非作歹的就達 19 人。另外，壞人利用“三黃四舊”拉攏腐蝕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案件有 28 起，這充分說明兩個階級爭奪青年一代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

通過調查，我們認為過去處理不當需要重新復查的案件有 42 起，僅僅以批鬥了事，明顯要判刑的有 16 人，已經判刑但是判決不當要重判的有 2 起。過去對迫害上山下鄉女知識青年的案件處理不嚴的比較多。如涼水公社河西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張成，以“培養入黨”為名姦汙一名女知識青年，僅給予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馬滴達公社河山大隊四隊原革委會副主任于得寶和民兵連長董加全合夥姦汙一名女知識青年，手段惡劣，性質嚴重，但對二人僅以批鬥了事。馬串子公社五二大隊二隊貧下中農戶長吳加順強姦一名集體戶的女知識青年，至今未嚴肅處理。縣林業車隊司機崔玉奎利用職權姦汙一名女青年，使該女青年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崔玉奎僅判刑五年，且監外執行。類似的案件都需要重新嚴肅處理。

我辦在去年 7 月對犯有嚴重錯誤、但尚可挽救的 12 名後進青年舉辦為期三個月的學習班，成效較好。現在除了 1 名青年還繼續犯錯誤外，其餘的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四）關於知識青年的生活自給情況

據調查，七 0 屆前下鄉的 3,260 名知識青年中生活能夠自給的有 1,186 人，占知識青年總數的 35.5%；半自給的有 1,262 人，占知識青年總數的 36.5%；不能自給的有 810 人，占知識青年總數的 28%；這些生活不能自給的知識青年，生活費用主要依靠家長負擔和生產隊欠款。據調查，三年來依靠家長負擔生活費每年在 200 元以上的有近 700 名知識青年，每年由家長負擔生活費在 300 元以上的有 17 人。

從自給能力來看，三家子、春化公社最高，自給和半自給的知識青年占青年總數的 94%以上。‘哈達門、敬信、鎮郊、密江、涼水、英安、板石公社的知識青年自給和半自給的占知識青年總數的 70%；自給能力最低的是楊泡、馬串子公社，有 50%的知識青年生活不能自給。

生活不能自給的主要原因是生產隊基礎差，工價太低。如楊泡公社的松林、東阿拉，馬串子公社的南山、電線、炮臺、東光，英安公社的關門、甩彎子，涼水公社的南大，馬滴達公社的四道溝等大隊的一些生產隊，幾年來工價普遍只有二、三角錢，常年無法開支。知識青年即使積極勞動生活也難以自給，連買牙膏、肥皂的錢也要家長負擔。屬於這種情況的知識青年有 480 人，占不能自給知識青年總數的 60%。有的是生產隊工價並不低，但是知識青年本身不愛參加勞動，或是回城時間太長，在農村參加勞動時間太短。如密江公社有個上海知識青年集體

戶，有 8 名青年生活不能自給。該生產隊去年的工價是九角三分，原因是青年勞動太少，每人全年參加勞動僅七、八十天。涼水公社石頭大隊五隊的上海知識青年趙萬庭，好逸惡勞，全年參加勞動還不到二十天。還有的知識青年自稱“五·七戰士”，即全年在農村呆五個月，在城裏呆七個月。由於參加勞動少，生活當然很難自給。屬於這種情況的知識青年有 238 人，占生活不能自給知識青年總數的 29%。

再一個是病殘知識青年。這些青年不適宜參加農業勞動，戶口又在農村，每年只能參加少量的勞動，而治病的開銷又比較大，給家長和所在生產隊帶來不小的負擔，青年本人思想也很苦悶。如英安公社英安大隊二隊的上海知識青年姚北海，患有 1400 度的高度近視，鏟地草苗不分，平時連自己料理生活都有困難，參加勞動少，欠生產隊口糧款數百元。馬滴達公社三道溝大隊的上海知識青年邱志明患有先天性的大腿肌肉萎縮症，不能參加勞動，欠生產隊口糧款七百多元。屬於這種情況的知識青年有 92 人，占生活不能自給知識青年總數的 11%。

集體戶正當合理的開展副業生產，對於彌補因農業收入低造成知識青年生活困難有一定的作用。如涼水公社南大大隊六隊集體戶的上海知識青年，幾年來共養豬 28 頭，副業收入達八百多元。該生產隊農業收入不太高，但是由於集體戶重視養豬，很好的彌補了生活費的不足。集體戶用這筆錢解決日常戶裏的開支，購置了一台收音機和好些圖書，並用一部分錢補助生活一時發生困難的知識青年。從全縣來看，這項工作開展不平衡。全縣 486 個知識青年集體戶，僅養豬 191 頭，平均每二·五戶才養 1 頭豬。鎮郊公社有 30 個知識青年集體戶，僅養 2 頭豬。

基於上述情況，知識青年欠生產隊口糧款的現象相當普遍。據敬信、板石、

英安、春化四個公社對七〇屆前的 429 名知識青年的調查，欠款高達 32,116 元，平均每個知識青年欠款達 70 元。

（五）關於“再教育”隊伍的組織建設問題

“再教育”隊伍的組織建設是否健全，關係到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能否真正落實和順利進行的重要一環。據調查，全縣十二個公社的“五·七”連，現在人員配備較齊、力量較強的有鎮郊、馬串子、敬信、英安、密江、涼水、馬滴達、春化等八個公社。人員配備不齊、專職幹部不專用的或至今沒有配備專職幹部的有楊批泡、板石、三家子、哈達門等四個公社。從總的情況來看，公社一級的專職幹部調動比較頻繁，專職幹部不專用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公社領導對知識青年工作重視不夠，甚至讓不適合做知識青年工作的幹部來做這項工作。如涼水公社，這幾年專職幹部連續換了 4 人，造成這些幹部不熟悉工作情況，也不願意做這項工作。該公社知識青年多，出現問題也多。板石公社的專職幹部調走，至今沒有配備。三家子公社讓民政幹部兼管知識青年工作，而專職幹部長期下鄉蹲點，對知識青年工作

不再過問。哈達門公社的專職幹部長期病休，由公社一名插隊幹部做知識青年工作，並不合適。

五·七排是在有插隊幹部時成立的，曾經發揮過較大的作用。全縣出現過涼水公社河西大隊五·七排這樣的先進集體。但隨著插隊幹部逐步調離農村，不少的五·七排架空了。全縣 114 個大隊五·七排，比較健全還起作用的有 48 個，占五·七排總數的 42%。工作一般的有 54 個，占 48%。不建或雖然建了但不起作用的有 12 個，占 10%。從去年下半年起，縣、社又注意抓五·七排的組織建設。現在的

五·七排一般都有大隊黨支部的成員、貧下中農和知識青年的代表參加。但仍然需進一步加強對五·七排的整頓和充實。

全縣 486 個集體戶，小班子健全起作用的有 289 個，占 60%。小班子不太健全或起作用一般的有 135 個，占 27%。沒有小班子的有 40 個，占 13%。造成小班子不健全的主要原因是集體戶人員過少。據統計，全縣 5 人以下的集體戶有 123 戶。為便於對知識青年的管理和其他工作的開展，需要儘快對這些人員過少的集體戶進行組織整頓。

（六）關於知識青年安置經費的管理使用問題

從 1986 年起國家下撥我縣知識青年安置經費共 1,739,574 元。有一段時期由於管理比較混亂，出現了一些佔用、挪用甚至貪汙的現象。自從黨中央（1970）26 號檔下達後，我辦組織專人三次對全縣安置經費的使用情況進行了三次清查，基本上查清了問題，並制定了《下鄉知識青年經費使用條例》在全縣試行。

據調查，全縣有 13 個大隊佔用安置經費 9,817 元；217 個生產隊佔用安置經費 64,281 元；84 個集體戶佔用安置經費 15,583 元，98 名知識青年佔用安置經費 2,614 元。以上共佔用安置經費 92,315 元。由於去年部分社隊受災，佔用款僅收回 22,600 元。

全縣有 8 個生產隊的幹部貪汙安置經費共達 1,864 元，對這些人社隊都給予必要的處分。對貪汙的錢款在查實後已經追回 1,264 元，尚未追回 600 元。

（七）其他問題

1、關於落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政策情況

我縣下鄉知識青年中，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有 254 人，其中已入黨 1 人，入團 32 人，招工、招生 31 人，擔任團支部委員以上職務的有 9 人，擔任民兵連排幹部的有 2 人，參加大、小隊領導班子和擔任各種職務的有 27 人。馬串子公社五二大隊二隊的上海知識青年張三元，其父是歷史反革命份子死於獄內。本人表現一貫很好。由於落實了黨的政策，下鄉後他入了團，去年又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被選為團縣委委員，不久又當選為州團委委員。馬滴達公社五道溝大隊四隊的上海女知識青年劉亞卿出身于資本家家庭，她被吸收入黨，對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有不小的激勵作用。

這些存在的問題是：好些知識青年的家庭成份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因為不少知識青年的檔案材料中“水分”比較大，不準確。這幾年儘管社、隊發出幾百份的函調信，但好些知識青年的家庭出身情況尚未搞清。此外，在招工、招生中有的單位沒有很好的落實黨的政策，有的知識青年多次被貧下中農推薦招工、招生，體檢都合格，就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有關單位就是不收。如英安公社八二大隊二隊的上海女知識青年趙寶蘭，一貫表現很好，只因為她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有關單位都不接受。

2、關於知識青年的婚姻問題

隨著知識青年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婚姻問題也提到議事日程，需要引起各級領導的關心和重視。據調查，全縣七〇屆以前下鄉的知識青年中，已經有 486 名結婚，其中與當地社員結婚的有 263 人，與知識青年結婚的有 114 人，與外縣青年結婚的有 96 人，與當地職工結婚的有 13 人。另外已經訂婚的有 97 人。至於談戀愛的就難以統計了。從發展趨勢看，知識青年的戀愛婚姻必定呈現上升的

態勢，這是正常的現象。但是過去幾年，我們對青年的晚戀晚婚宣傳多，對他們正常的戀愛婚姻考慮不多，甚至對一些本屬正當的戀愛婚姻予以不適當的干涉。從長遠看，我們既要在青年中宣傳晚戀晚婚，但對已經到了結婚年齡的知識青年，就應該對他們的戀愛婚姻問題給予關心、保護和支持，幫助他們在農村安家樂戶，當一代新型的農民。

據調查，知識青年與當地社員結婚的一般困難不大，但是知識青年之間結婚的則面臨好多實際困難。我縣目前知識青年之間結婚的有 57 對，只有 6 對由生產隊幫助、自己動手、父母扶持蓋了住房。其餘的都借住社員的房屋、原來集體戶的房屋或插隊幹部調走後的住房。他們多數家底薄，在結婚後他們的口糧即按照當地社員的同等標準為每年 400 — 450 斤，普遍反映糧食不夠吃，有的還沒有給及時分配自留地。

3、關於集體戶的住房問題

這些年我縣共修建知識青年集體戶住房 582 戶。因大批招工、招生及並戶，現空出住房 95 戶。其中賣出 17 戶，個人借用 20 戶，社隊借用 32 戶。因破舊被拆除 5 戶，尚有空房 21 戶。從調查中瞭解到，知識青年集體戶住房需要維修的比較多。現有住房中有 142 戶不需要維修，165 戶需要中修（需維修經費 100—200 元左右），有 22 戶已經沒有維修價值需要拆除。582 戶住房中除了 141 戶是上瓦的以外，其餘都是草房。從長期安置知識青年的需要考慮，今後不宜再蓋草房，因為每年上草維修的費用並不低，且不利於長期安置知識青年的需要。

二、關於進一步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的意見

鑒於上述情況的調查和分析，為了進一步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鞏

固上山下鄉的偉大成果，現提出我們今後的工作意見：

1、各級黨組織、革委會要切實加強對“再教育”工作的領導，把這項工作放入黨委的重要議事日程。黨委必須有一名領導專管這項工作，要象春化公社黨委那樣，每年至少有二次會議專題研究知識青年的工作。大隊黨支部應每個季度專題研究知識青年工作一次，並形成制度。

建議縣委考慮在今年適當時機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大造革命輿論，進一步提高各級領導和廣大幹部在新形勢下做好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的認識。

為了進一步做好“再教育”工作，根據政治部黨委的指示，由我辦擬訂《下鄉知識青年工作條例》，在部黨委審定後在全縣試行。

2、縣、社兩級每年召開一次知識青年和“再教育”隊伍的積代會（或先進代表大會），樹立典型，以推動上山下鄉工作。今年七月末將召開縣、社兩級積代會。從現在起各級要做好會議的準備工作，並迎接省、地（州）積代會的召開。

3、加強對青年骨幹的培訓。縣、社兩級每年都要利用農閒期間辦 2—3 期的知識青年骨幹培訓班，開展學習政治、學習軍事、學習農業科學技術等。建議由縣裏投資建設一所知識青年學校，作為“再教育”工作基地，有計劃的分期分批的培訓知識青年骨幹。

積極、慎重的做好知識青年的黨、團員的發展工作，大膽的培養和使用他們，爭取在比較短的時間裏做到每個知識青年集體戶有一名黨員，團支部建在集體戶。生產大隊、小隊的領導班子裏應有知識青年參加，各社、隊召開幹部會議，應注意吸收知識青年骨幹參加。要讓更多的青年參加農業科學實驗活動，使他們在“農業學大寨”活動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4、加強組織建設。各公社應在國家編制以內按照每一千名上山下鄉知識青

年配備 4 名幹部的比例安排專職幹部，並一保證幹部的品質。對這些幹部做到專職專用，儘量少抽或不抽這些幹部做其他幹部，保證工作的開展。這些幹部蹲點應安排在知識青年多的生產隊，便於多接觸、瞭解和做好知識青年的工作。

各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或副書記要分管知識青年的“再教育”工作。一定要配齊、配好、配強貧下中農戶長。對那些不起作用或不適宜擔任貧下中農戶長的要進行調整。今後，生產隊應當儘量安排由政治隊長兼任或由四十歲以上的老貧農、老黨員、老幹部擔任。每個集體戶應配備男、女戶長各一名，便於開展工作。

5、按照黨中央（1970）26 號檔的精神，繼續嚴厲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的階級敵人。縣、公兩級黨委要定期檢查、落實 26 號檔的情況。目前，由縣公安局保衛部、縣法院、五七辦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正在對過去的有關案件進行復查。對過去處理不當的要重新處理，有的要改判。對幹部利用職權為非作歹強姦、姦汙女知識青年的一定要依法嚴懲。對新發生的案件要抓緊查清，及時處理。對知識青年犯罪的也要嚴肅處理。對後進青年進行調查摸底，準備在今年的適當時機繼續舉辦轉化學習班。

6、對因為生產隊基礎差、工價低，使知識青年生活不能自給的應進行調整，將這些青年調往生產基礎比較好、工價比較高的生產隊，以提高他們的生活自給水準。對積極參加勞動，但因生產隊基礎差導致生活不能自給的青年，在上級統一解決生活補助費之前，由縣委考慮從安置經費的節餘款中酌情補助一部分。對生產隊長期不抓知識青年工作，經過教育仍無轉變的，建議將這些知識青年也調到重視和比較重視知識青年工作的生產隊。

7、大力提倡集體戶開展副業生產。凡是符合“農業六十條”規定的、允許社員搞的副業，知識青年都可以搞。要大力發展養豬、養雞，爭取儘快實現集體戶

三人一頭豬，一人一隻雞。對開展副業生產經費有困難的，縣、社應考慮酌情予以貸款或補助。

8、根據省、州關於抽調幹部組成下鄉工作組的指示，按照每一百名知識青年配備一名幹部的比例，我縣應抽調 42 名幹部。現在已經抽調 17 名，還要繼續抽調 25 名。

9、對知識青年的婚姻問題要予以支持、關心和可能的幫助。對已經結婚沒有住房和缺少農具、傢俱的青年，本人和社、隊確實無法解決的，由國家給以適當的補助。如上級無蓋房款，建議將插隊幹部調離後的住房款（大約七萬餘元）酌情用於已婚知識青年蓋房之用。他們結婚後的口糧建議仍然按知識青年的標準執行，三年內不變。對已婚知識青年社、隊要在政治上、經濟上等各方面予以關心和幫助。

10、對生產隊佔用及個人貪汙安置經費的這筆錢款（大約七萬餘元）要在今年秋後全部收回。這筆錢今後用於知識青年集體戶的住房維修。今後將儘量以實物下撥，以減少佔用等情況的出現。在掛鋤期間，全縣各社、隊要抓緊時間對知識青年集體戶住房進行維修。

以上報告是否妥當，請指示。

琿春縣革命委員會五七辦公室

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

第七節 我國知青文獻的計量分析

引言

20 世紀 60~70 年代我國大規模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成為過去。這場運動的發起、延續和結束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1]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歷史文化的議論，一直是社會各界，特別是有“知青”經歷人士熱議的話題。有關知青問題的研討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真正標誌知青史學術研究開端的可能要數中央文獻研究室張化研究員 1985 年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試論“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2]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復旦大學等 5 單位舉辦“2008 知青學術研討會”後，我國知青問題研究逐漸成為熱點，與此同時，社會公開發表的文獻也逐步增多，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全景式的知青上山下鄉將更清晰地展現出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也將使我們對知青上山下鄉及其相關問題的認識更趨深化，視角更趨多元，研究也更趨深入和理性。（沈國明語）^[2]

為建立知青文獻資源庫，通過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對有關以知青為主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期刊論文，以及報紙、會議、年鑒論文或文章等資源（統計時間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進行檢索和總量統計，並從年代分佈、文獻來源、著者、學科專業和文獻機構等角度對整合的主要文獻資源進行細分計量統計，可初步分析知青研究及其文獻的發展特點、發展脈絡以及存在問題。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討論的知青文獻主要指發表在公開出版的期刊、報紙上的論文、文章以及高校研究機構發佈的碩博士論文，並不包含公開發行的圖書、非正規出版物和網上資源等。

1 知青文獻計量統計分析

1.1 採用主題途徑檢索進行總量統計

分別選擇“知青”“上山下鄉”“支青”“下放青年”等檢索詞，從主題詞途

徑進行文獻檢索。由於主題詞經過了規範化處理，它對文獻中出現的同義詞、近義詞、多義詞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書寫形式等進行嚴格的控制和規範，其含義較明確，便於準確檢索，可避免或減少出現漏檢和誤檢現象。文獻來源主要分佈在公開發行的期刊、報紙、會議錄和碩博士文庫，文體主要有學術論文、文章、雜感、報導、傳記、回憶錄、散文等。

通過文獻的檢索，初步得到 6.5 千篇左右的資料。進一步對已下載的這些資料進行人工甄別、篩選和歸一化處理，原則是：

- (1) 注重保留學術性的文獻，刪除與知青主題明顯不相關的資料；
- (2) 歸併整合重複性的文獻資料；
- (3) 有選擇地保留部分雖與知青主題弱相關，但有個案性、有典型性的文獻資料（如政策、檔、法律、案件、名人、事件、作品、企業、科技、教育、就業、慈善、會議、書評等）。

最後獲得知青文獻約 4500 篇，總體情況和載體分佈情況見表 1。

表 1 知青文獻資料初步計量統計

主題詞	載體形態	按主題詞檢索結果（篇）	甄別、篩選結果（篇）
知青	期刊	3523	2836
	碩、博士文庫	287	277
	報紙	399	250
	會議錄	48	42
上山下鄉	期刊	1697	643（去除重複）
	碩博文庫	99	95（去除重複）
	報紙	303	233（去除重複）
	會議錄	39	37
支青	所有文獻	58	55
下放青年	所有文獻	38	32
文獻總量（篇）		約 6500	約 4500，其中： 期刊文章 3650 博士論文 34 碩士論文 244 報紙文章 406 其它文獻 166

由於期刊刊發的知青論文、文章和高校研究機構發佈的碩、博士論文學術性

較強，文體寫作也比較整齊規範，以這類重要文獻作為統計分析物件，其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邱新睦認為，知青研究從 20 世紀 70 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體上被劃分為 4 個時期：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1985 年為萌芽期，1986 年至 1994 年為初潮期，1995 年至 1999 年為高潮期，2000 年以來為後高潮期。這種劃分是基於對研究活動及成果發佈情況的統計分析。[3]本文基於 1982~2013 年我國期刊有關知青主題的文獻刊發總體情況和年代分佈情況（見圖 1）分析，認為我國知青文獻起步於 70 年代末（當時主要是紙質版文獻，從 1982 年起有電子版文獻）。從圖 1 可以看到，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有關知青問題的文獻數量在總體上呈穩步增長趨勢（稱為孕育期）。1998 年前後有一個熱潮（“後知青”文化熱導致的知青問題議論，稱為發展期）；2008 年以後，年發文獻的增幅較快（受“2008 知青學術研討會”影響，進入高潮期）。2012 年和 2013 年，我國期刊發表的知青文獻分別達到 245 篇和 227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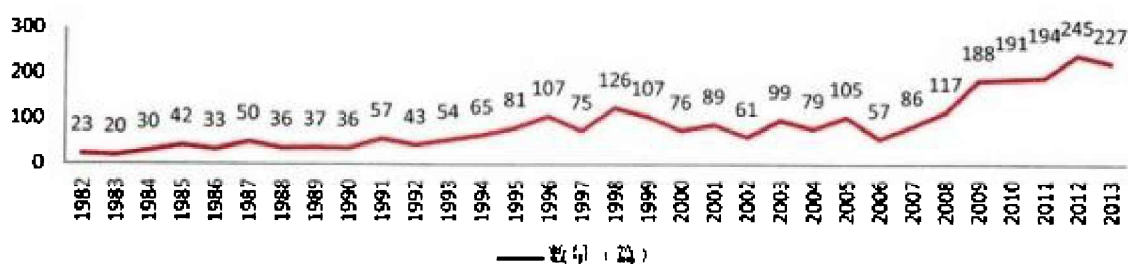


圖 1 有關知青主題的期刊文章發表數量變化

我國有關知青主題的碩博士論文發佈起步於 2001 年（以張曙博士論文《不對稱的社會實驗——論“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為標誌）。2008 年後有關知青主題的碩博士論文成果每年發佈數量增長很快（圖 2），2013 年達到 44 篇。截至 2013 年底，我國有關知青主題的碩博士論文總量達到 278 篇，其中

碩士論文 244 篇，博士論文 34 篇（僅占碩博士論文總量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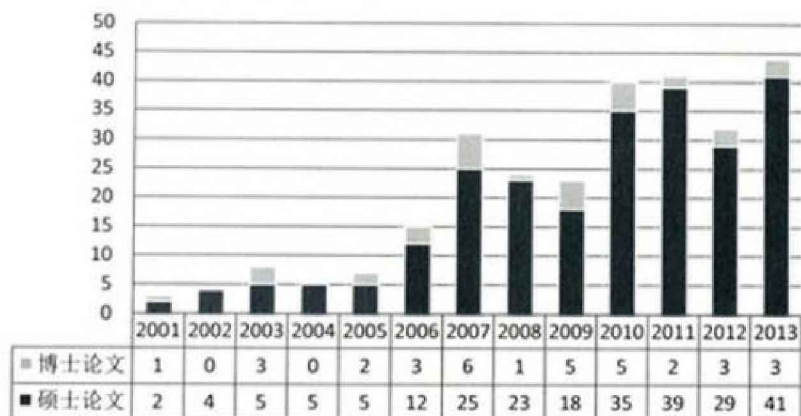


图2 有关知青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数量变化

1.2 對文獻來源類別進行細分統計

文獻來源類別指刊載某個專題文獻的期刊（或載體）所歸類的學科專業領域。通過對文獻來源類別分析可以確定有關知青研究的性質、橫向研究程度等。文獻搜集的時間範圍從 1980 年代起，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按主題詞“知青”對知青文獻進行學科專業統計分析（圖 3 和圖 4）和文獻源統計分析（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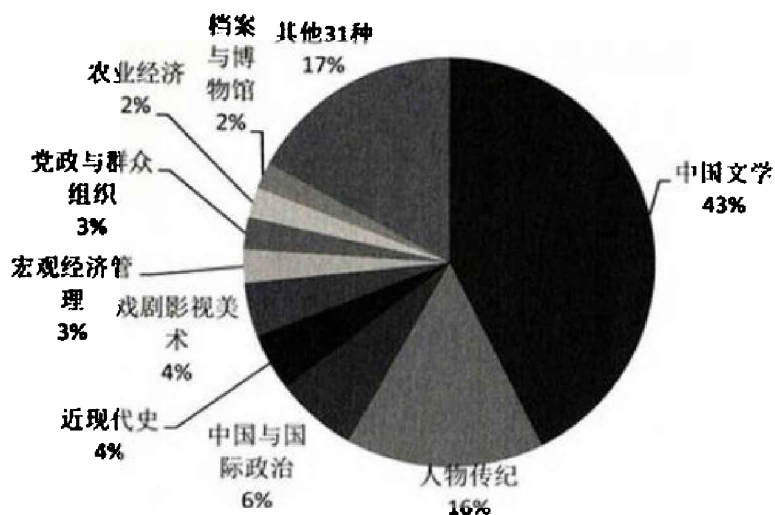


图3 有关知青主题的期刊文献的学科专业分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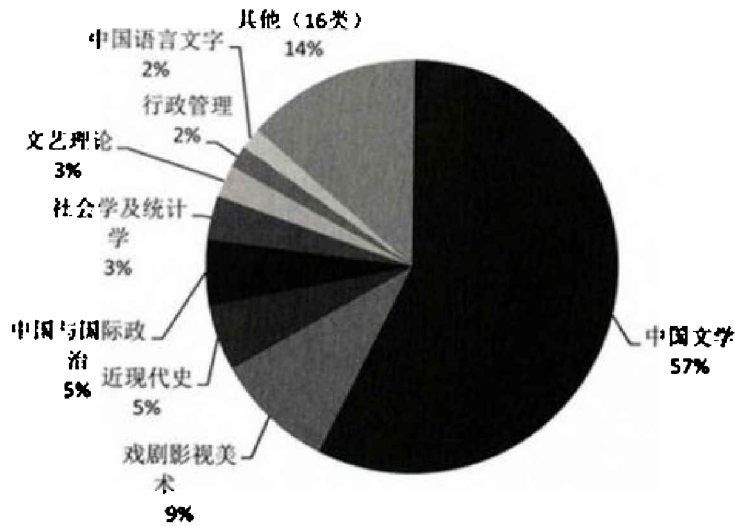


图4 知青主题的硕博论文的学科专业分类统计

表2 知青文献的主要文献源统计

期刊名称	数量(篇)
中国农垦	69
当代文坛	48
文艺评论	47
当代作家评论	46
小说评论	44
中国劳动	38
文艺争鸣	36
中国青年研究	33
南方文坛	32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学自由谈	31
文史博览	24
名作欣赏、兰台世界	21
贵阳文史	20
商业时代、创作与评论	18
江淮文史	16
当代电视	15
粤海风、南风窗、文学评论、成人教育	14
博览群书	13
电影文学、黑龙江史志、文史月刊	12
档案春秋、全国新书目、社会	11
中国职工教育、安徽文学(下半月)、决策探索(上半月)	10
黑龙江科技信息、学理论、湖北档案、黑河学院学报、文学教育(上)、文艺理论与批评、书屋	9

1.2.1 文献学科专业统计和归类

我國有關知青主題的期刊文章和碩博士論文學科分佈於眾多的學術領域，這表明：

- (1) 知青研究受到眾多相關學科研究人員的重視；知青學是一門跨學科交叉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多個領域有應用價值；跨學科研究有利於知青學理論體系的發

展和完善。

(2) 目前知青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藝術類、文藝理論類和人物傳記類領域。

而專家最推崇的知青史研究比較薄弱（僅占 4-5%）。

1.2.2 文獻源統計和歸類

通過文獻源（研究成果刊載分佈）分析，可知知青研究文獻的刊發載體比較離散。表 2 為 40 種主要期刊按刊發知青文獻篇數的排序，可知目前知青文獻刊發載體主要以文學類和人文社會類期刊為主。

1.2.3 文獻著者統計和歸類

以發文數量排序來確定知青文獻的核心著者（表 3）。從表 3 可見，我國還未形成有關知青問題研究的核心著者群體。目前發表文獻的作者主要集中于高校學者和研究生。本計量統計的不足是：僅注重文獻數量，未考慮著者影響力和學術水準；僅限於期刊，未統計學術專著、重要報刊和網站的文獻；因此忽略或未凸顯一些著名人物，如定宜莊、劉小萌、潘明嘯、鄭謙、鄧曉芒、劉曉航、沈國明、阮顯忠、朱政惠、金光耀、金大陸、黃洪基、楊劍龍等。在一些影響力或時效性較強的紙媒和網站上，有時可閱讀到這些學者專家觀點前瞻、睿智實現的文章或訪談錄。

表3 知青文献主要著者统计

第一著者	数量(篇)
车红梅	10
刘可可	7
刘起林	6
刘小萌、杨健、陶东风、姚新勇、吴景明	5
王源、王洪义、周建江、高飞、郭小东、刘复生、杨扬、石兴泽、闫晶	4
黄海、侯桂新、肖复兴、王江、陈超、董淑华、孙旋、陈道淳、朱旭辉、张穗强、张曙、陈思和、罗长青、江红英、陈建新、丁帆、陈国恩、石金焕、朱孔芳、刘传霞、南帆	3

1.2.4 文献机构统计和归类

以文献

我国知青文献的计量分析(二)

著者所在机构的發佈文献数量为标准，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表4。从表4可以了解到，有关知青问题的研究机构主要是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文献發佈数量排序依次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

表4 知青文献发布的主要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	数量(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32
复旦大学	28
南京师范大学	27
南京大学	22
山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21
北京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	20
黑河学院	19
山东大学、武汉大学	17
吉林大学	15
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13
上海大学	12
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11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
海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9
哈尔滨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延安大学、中国作家协会	8
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漳州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7

2 從文獻計量統計分析我國知青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

2.1 知青研究的主要特點

從對知青問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中，可以大致總結出我國知青問題研討以及文獻發展有以下主要特點。

2.1.1 知青問題研討向深層次發展

從文獻數量及年代分佈來看，近些年知青文獻呈較迅速增長的態勢，知青問題逐漸引起學術研究人員與政府管理者的重視。同時有關知青，包括後知青問題的社會研究文章也越來越多，這對後知青時期的社會管理和政策研究具有一定指導作用。與此同時，高校的碩、博士論文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達到44篇），這說明知青問題研討已成為社會需求熱點，知青學研究正向深層次發展，且後繼有人。

2.1.2 知青研究初步形成了體系

從知青文獻計量分析中可以看出，知青文獻初顯規模並初步形成了一定體系，即從基本理論研究到方法研究，再到人文社會、經濟管理、城市化發展、青年教育、哲學思辨、法律倫理、社區服務、心理研究等方面，構架了知青研究文獻的框架。同時有很多研究者借鑒其他學科理論與方法進行知青研究。知青文獻統計分析也初步印證了朱政惠教授的觀點：知青學是一個跨學科、多學科研究問題，需要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民俗學、統計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多種學科的聯合探討，需要資料化手段的介入和多學

科的交叉研究。^[2] 因此研究範疇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創新將對知青研究文獻體系的合理構建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2.1.3 知青研究注意與社會現實溝通

近幾年，除了文學期刊外，其他多種人文社會期刊發表的知青論文、文章的數量逐漸增加，相關著者和文獻機構的數量也日漸增多，特別是知青研究應用於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文章開始出現。從知青研究文獻的主題分佈來看，研究學科專業由原來單一化的文學研究逐步向社會、經濟、法律、管理等領域多元化發展，開始注意與社會現實溝通，拓展和提升了知青問題研究應用範圍和應用價值。

2.2 知青研究存在的問題

我國知青文獻發展情況較好，但從以上的定量分析中，仍可發現一些存在的問題：

2.2.1 知青研究的學術結構不合理

知青文獻中的人文研究文獻偏多，特別是文學類研究佔有相當大比重。目前文獻著者絕大多數從事文學教學與研究，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知青這代人重文輕理知識結構，也反映出知青文獻局限於少數研究領域的學術結構缺陷；知青名人的文獻較多。一些有知青經歷的企業家、官員、學者、藝術家在功成名就後傾向投入“青春敘事”，而他們書寫的“功德碑”文字往往或鮮有史料價值，或需要史實甄別；雖然近年來知青研究與其他研究領域相結合的文獻有所增加，但總體上數量還是偏少，這與朱政惠教授有關知青學分為八方面，即知青歷史研究、知青社會研究、知青史料研究、知青文學研究、知青研究史、後知青社會和文化研

究、知青研究資料化和物化研究、知青研究的學科建設和方法論問題等研究領域^[4]的期待還距離較遠。

2.2.2 知青研究縱深發展遭遇瓶頸

知青研究遇到許多棘手問題，學術發展遭遇部分瓶頸。這些問題如不解決，很難向更縱深的方向發展。問題之一是知青問題研究涉及“文革”敏感話題，許多研究者不敢涉入過深，有的研究僅局限於資料、資料、事件的碎片化分析；問題之二是專業歷史學家的研究文獻太少。同我國龐大的史學研究隊伍相比，從事知青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較少，高水準的研究論著也還嫌少。知青史還未列入中國當代史的學術體系；問題之三是知青研究文獻的著者離散，缺乏專業的研究隊伍。從已有成果看，有影響的研究知青史的學者大多數是有知青經歷的歷史學者，他們是上山下鄉的親歷者（“文革”結束後有機會在高等院校接受正規的史學訓練），但知青史研究對於他們而言卻是額外的“副業” [5]；問題之四是新生代學者中，研究知青專題的博士研究生偏少（僅占研究生總數 12%）；青年學者對於“文革”史和知青運動史瞭解不透，他們撰寫的論文中有時存在一些“硬傷”。

3 結語

綜上計量統計分析表明，我國知青研究文獻發展經歷了孕育期和發展期後，進入了高潮期，成為社會關注熱點。通過搜集、篩選、歸併和整合分類，獲取有效的知青文獻約 4500 篇，其中有關知青主題的碩博士論文共有 279 篇（截止 2013 年底）；對期刊文獻和碩博士論文進行類別統計分析表明，知青研究範疇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學藝術類、文藝理論類和人物類領域；著者大多從事文學領域的研

究，還未形成有關知青問題研究的核心著者群體；知青研究成果的刊發載體比較離散；文獻研究機構發佈的知青文獻數量的排序與其影響力不成比例。

文獻計量統計分析顯示，我國知青問題研究正向縱深發展，初步形成了研究文獻的體系；知青研究注重與現實溝通，顯示一定社會效應；知青學研究的新生代學者成果豐碩；對於當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如研究結構不合理、發展遭遇瓶頸等，需要呼喚有關部門、學術團會和知青文化研究會等組織共同研討解決。

為建好知青研究資料庫，下一步工作除了對 2014 年後發佈的知青文獻繼續進行搜集整理外，還需著手進行知青學術圖書和重要媒體（包括知名報紙、網站、博客、電子期刊等）上有關知青文獻的搜集，注重挖掘和收集有思想深度和有人文價值的知青文獻。

【參考文獻】

- [1] 阮顯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貢獻》，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 2014 年刊，第 52 頁。
- [2] 金大陸、金光耀：《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9 版，第 1 頁，第 729 頁。
- [3] 邱新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當代中國研究》2003 年第 4 期。
- [4] 朱政惠：《“知青歷史文化研究現狀與展望座談會”錄音紀要》，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 2011 年刊。
- [5] 胡黎霞、韓維業：《述真實歷史待後人評說》，《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4 期。

致謝：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阮顯忠會長、樓曙光副秘書長等專家的指導，在此特表謝意。

第八節 知青回城的緣起：雲南知青步行數千里上京請願

核心提示：其後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願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願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上山下鄉的知青 資料圖）

本文摘自：南方週末網，作者：盧麗濤，原題為：《青春有悔？無悔？走不出的知青領袖夢》

40年。一個人壽命的一多半。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生命，已經步入夕陽。

走在上海街頭，丁惠民並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館子裏吃鍋貼、喝老鴨粉絲湯，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爾引來青年人側目。他們不知道：整整 30 年前，1978 年 12 月，這位老者帶著數十位雲南知青，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願，打出“我們要回家”的標語，並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

時任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受命赴雲南調查，猛定農場知青以絕食明志，長跪不起。

年輕人的決絕，震動了北京。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啟動。

今天，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座標，再度調整到“知青”這一刻度上。當年的北上請願團核心成員，如今或在重慶，或在上海。一切卻已不似當初。

靠近

“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鬥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是帶著“建設邊疆”的決心來到雲南西雙版納的。

他們走進莽莽大山，住在草棚裏，半夜裏蛇會從房梁上“嘭”的一聲掉下來，吃飯時，叢林裏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頭幾年，是拼了命地幹。砍掉原始森林，種上橡膠樹。一次會戰，十幾天不下山。

但幾年努力，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丁惠民說：“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絕望了。”

重慶知青李長壽，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他的記憶被饑餓充斥，“豬瘟年年鬧，一鬧死一片，簡直沒辦法；沒辦法就去河裏找魚吃，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管他呢，就拿去炸魚，那時候吃傷了，直到現在，一點魚都不沾……”

在紅土地上，這些城裏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一個人就像一部汽車，你光叫他開，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們當時已經沒油了。”丁惠民這樣比喻。

邊疆除了自然風景，其他的一切幾乎都跟宣傳不一樣。更何況，吊打、侮辱、強姦知青的事情時有發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在遠山僻嶺的對撞，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當年開著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幾無避諱。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農場是副教導員。對他來說，迷茫來自於對公正性的顛覆。

一位高級幹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她們的爺爺去世時，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否則就拒開追悼會。僵持的結果，是蓋著“中共中央組織部”大紅印章的調令發到了農場。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聖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卻是對其神聖的嘲諷。

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後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麼都不要了。一位高幹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早點回來……哪還有影子啊？今天想來，自己都笑著搖頭。”

與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在農場，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種無奈躁動的發洩”，到了後幾年，連架都懶得打了，也沒有力氣打了。

他得出結論：越是知青老實的連隊，管理就越緊，吊打體罰之類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對那個年代的回憶和解釋是：“一開始都很老實，後來在長期艱苦的條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來了。知青和軍人都是如此。”

李長壽後來寫了一首歌，其中有這樣一段：“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鬥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們並不相識，更想像不到：彼此的相逢，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

就在那個冬季，火星出現了。

相逢

“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上世紀 70 年代中，已顯疲態。

經過近 10 年的農場生活，西雙版納知青們已經從迷茫走進了絕望。為了得到一張病退證明，他們服用麻黃素、生壓靈來製造高血壓，喝 10% 高效麻醉藥製造“心力衰竭”，喝農藥製造“胃痙攣”，喝墨水製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為回家。

“四個不滿意”彼時在中央高層內部被提了出來：農民不滿意，知青及家長不滿意，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政府不滿意。當時分管副總理陳永貴說：“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到這件事就頭疼。”

對上山下鄉的重新評估和大批知青的現實出路，不得而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堅冰鬆動的跡象，遠在版納膠林裏的知青們，是難以瞭解和體察的。1978 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會議的討論在北京召開，如李先念所說：“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說法始在雲南知青中悄然流傳，但隱約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農場的丁惠民，是一個例外。這個十分場學校裏的總務員是個有心人，他趁著給學校拉運物資、進出農場的機會，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乾柴，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

他貼出了公開信，陳述知青現狀，提出回家的願望，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在禮堂大會上，有人說：“什麼也不要怕，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回家鄉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瀾滄江大橋，佔領農場。

紛亂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機緣來自李的一句高聲發言：“人多有什麼用？又不是去打臺灣！”

李長壽就此被任命為糾察隊長，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調核心形成了。

其後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願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願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那個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親眼看著他們走過瀾滄江大橋，走向嚴冬的北方。重壓和勞累讓丁惠民病倒了，知青們用擔架抬著他，副總指揮劉先國特地叮囑糾察隊長李長壽——專門派人保護“小丁”的安全，這是頭等大事。大家像愛惜眼睛一樣，愛惜著丁惠民。

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在“我們要回家”的橫幅後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夾襖還裹在外套外面。

當時分管農墾系統的國務院一位元領導接見了他們，雖然態度慈祥，但話語嚴厲：“都這樣鬧，國家能富強？”這讓他們感到委屈。當晚，丁惠民、劉先國、

李長壽、鄒盛永四個人，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裏碰頭商議，決定立即回雲南，請願團宣告終結。

而正是那天，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分局悄悄地飛出，成了知青的報喜鳥：不願留的通通走……後來他們知道：這是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後，作出的表態。

次年 2 月至 6 月間，5 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營部索性把公章掛在門口，大家自己拿著蓋。因為辦戶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牆被推得直晃悠”。後來他們知道：北上請願的行動，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

當年罷工請願的幾位核心成員，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聲東擊西、出其不意。劉先國說：“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各自

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雲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1979 年丁惠民、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先後回到家鄉——武漢、重慶和上海。

1985 年，幾經波折，丁惠民終於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與妻子團圓。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區的舊房子裏。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

上請願時的“三駕馬車”之一劉先國，經常見面了。劉先國回城後頂替父親，進了重慶客車廠的基建科，後來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於建築工地。

丁惠民的聰敏難以掩飾，他很快被借調到檢察院。然而，他不願忍受絲毫的刻板規制，最終放棄了這條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廠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劉兩人在一起時的主要節目。劉先國對那兩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悶。”那時候，他們年屆三十。

兩年後，1987年，劉先國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兩地分居，不能再持續下去。這個難得的機會，是與別人交換來的戶口指標，還必須補償對方1200元錢。送錢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為了“多一個心眼”，當時還在檢察院的丁特意準備了一台小答錄機，偷偷保留了給錢的證據。

劉先國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線再一次岔開，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後來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能夠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靠著對雲南的熟悉，他從緬甸販進木材，拉到上海去賣，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

多年後，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適合做生意，我這種性格，連合同都不簽的。”這十幾年中的往事，連他的戰友也知之甚少。

遠在上海的劉先國，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這些年裏，他在圖書公司工作，木工、保衛科長、物業中心經理、電腦廣場專案負責人，入黨、提幹、買房，女兒從北京大學畢業，就職於外資銀行。生活在他面前熱鬧地延展，應酬繁多，越來越忙。

入黨時，單位特地派人到雲南去作了調查，農場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講了劉先國的知青時代，“連偷雞摸狗的事也講了”。然而命運總是令人難以捉摸——單位的黨委負責人也是知青出身，對這些評價淡然處之：“不偷雞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長壽的後半生，受一番話影響很大，他工廠裏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體驗，勸慰他：“小李，你的個性不能搞政治，鋒芒太露。現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裏人，多想想怎麼讓他們更安心吧。”

李長壽離開工廠後，做過通訊器材生意，還辦過研究所，小有成績。在十幾年的闖蕩之後，他閱盡人生，如今落腳上海，在知青戰友的公司裏就任核心管理崗位。他堅持在城區邊緣的七寶古鎮住了下來，已經五年。

他戴著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和古鎮裏雲南菜館的老闆談笑風生。就在這間小館子裏，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願團的秘書長朱一平，兩人相擁大笑。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雲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當年離開時，知青們一個個發誓“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如今卻一次次夢回雲南。

李長壽常說：“我們在那裏 8 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國家第二個橡膠生產基地。”

丁惠民卻說：“40 萬畝，如果我們不去砍，保留下來，現在是多麼好的原始森林啊！”

輪回

命運總是輪回，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今天哭著離開。

版納農場的工人，大多來自湖南農村，數量少於知青。

每天同樣上班，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他們回去之後還要養雞、養豬、上山砍山貨，養活一家大小。知青們餓得凶了，就去偷他們的。

告狀、並連帶知青因此受罰的是他們，“看你端著白飯鹹菜揮手叫你過去撥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們；幫著連隊幹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傳授給知青農業技能的還是他們。

三十年前，知青們潮水般退去，一個個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衛生所沒有了醫生，連開拖拉機的運輸人員都成了問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

三十年後，三位老工人遠赴重慶，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頭的車流中，無所適從的他們被交通事故奪去生命。知青們大哭。

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

有統計數位顯示：50%以上的連隊幹部有過吊打、責罰知青的行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直到現在，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

1984年，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推銷橡膠，設法聯繫到一些重慶知青。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裏，他對提著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說：“你們種的橡膠樹，都開始割膠了。過去，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請你們原諒……”

李長壽感慨：“有這一句話，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還提它幹嘛？”

當年，李長壽在熄燈後睡不著覺，抱著曼妥林（一種樂器）在木堆上唱歌。連長是退役軍人，嘩啦一聲便端起槍來：“信不信老子斃了你！”

這劍拔弩張的一刻，留在記憶中很多年。那個晚上，李長壽同宿舍的三名知青聽到動靜，揣著砍刀摸到了連長家的後門，如果槍響，他們打算砍了連長的老婆孩子。

連長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樣，在農場老去。三十年後，李長壽聽知青戰友說：連長的老伴去世一年了，連長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覺得自己太虧欠這女人。知青跟著一起哭。

幾十年後，李長壽感慨說：“出生在那個年代，你沒法選擇。所有需要人去承擔和承受的東西，是那個時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離開時，車子無法開動。老連長、老營長、老工人們久久不願鬆手，車上車下哭成一片。在李長壽的記憶中，只有當年離家奔赴雲南的火車站上，有這樣哭聲震天、依依惜別的場面。

命運總是輪回，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今天哭著離開。

重聚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生命軌跡，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的《往事》欄目，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現了當年北上請願的歷史。鏡頭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胸前印著“知青”兩個大字。

他頻頻來到上海，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社保問題、戶口問題，等等等等。他回到雲南，在那裏立起一塊大牌子：“知青有事，請找丁惠民。”下面留著手機號。三十多年後，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

他辦了版納知青網，聯繫出版畫冊和書籍，知青有戶口一類的問題，他希望登記填表、集中於他處，再通過他去上訪、謀求解決。他積極籌畫中國知青旅遊文化節，希望借此機會重聚知青，擴大影響。他抵押了房子，換來的錢幾乎盡數投入於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錢，他也隨手接濟知青。朋友勸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卻說，“只有實踐能檢驗真理”，他還說：“我丁惠民早就不屬於我自己，或者屬於我這個家庭，我永遠屬於知青。”

丁惠民說：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一點點政治待遇。他想呼籲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

老戰友們的命運和心跡，在同心協力北上請願三十年後，畫出相離的曲線。

1998年，胡建國住房動遷後不久，當年的“三駕馬車”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悅，其餘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

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調回“知青”這個刻度上。他想找回當年的“三駕馬車”，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

後來，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間，跟那麼多的海歸、高知相比，我們已經落伍了。儘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你要牽頭這麼做，就無異於陳勝吳廣，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節，當年的糾察隊長李長壽，面對丁惠民希望籌集捐款的想法時說：“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馬上把兜掏乾淨！”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戰友重病或有困難時，幫助聯繫買藥、運送，盡可能解決具體問題；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來做維權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後來，李長壽曾對丁惠民說：“你想想，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們的父輩好？我們的孩子，是不是比我們那時候強？這說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

丁惠民沒有吭聲。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一條“青春無悔”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無悔？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群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

“有悔”者，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們感慨磨難、追撫傷痕，後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瞭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對現實，前者發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後者選擇與接受現實並與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丁惠民，在將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過程中，選擇了前一種姿態。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不乏追隨者。他們稱呼他“丁總”，或者“司令”。這樣的稱呼，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

而當年最親密的戰友胡建國、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他們，選擇了另一種姿態。

“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給戰友們的印象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都能絲絲入扣地復述當年的細節。唱起請願團團歌，暮年的他們早已明白：知青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起到了關鍵的撬動作用，“那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請願九十天中結下的情誼，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劉先國的父親在重慶去世。他從上海趕回，未事聲張，料理喪事。此前，在知青問題上雖已話不投機，卻不知丁惠民從何處得到消息，趕來守靈兩天。

幾天後劉先國返滬，臨走前來到了丁惠民家時，丁正在與一群老知青談話。

劉先國靜靜地呆了一會，離去。

（劉曉航《我們要回家》一書，對本文亦有說明，特此鳴謝）

第九節 悲情往事：那些被蹂躪的女知青

對於當年那段難忘的歲月，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

不能否認，當年的知識青年的這種生活、這種豪情、這種信念，是那個年代的狂熱，那個年代的虔誠，是發自內心的，是無愧的。不是麼？剛剛走出學校的小青年也不過只有適齡十七八歲，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裏，用稚嫩的身軀、脆弱的生命，抗衡著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的生活是多麼的煎熬。對知識青年來說；如果打娘肚子裏出來就生活在窮鄉僻壤的農村、邊疆，沒見過外面的世界，到也罷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貧瘠的農村，而且要插隊一輩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將意味著被這片黑泥土慢慢消損、吞噬……

但是，最令知識青年心悸的，恐怕還不是生活條件的艱苦，體力勞動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沒有保障。

當時，任意批鬥、吊打知青事件，在各地農村（農場、生產建設兵團）均有發生。每逢整頓社會秩序，“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來臨，知青中一些表現不好的知青就成為整肅的重點。手段極為狠毒，有拳打、腳踢、掌臉、跪板凳、木棍打、皮帶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夾、光身凍（包括女青年）火棍燙、火炭燒等 15 種刑罰。在知青受迫害問題中，最害人聽聞的莫過於女知識青年被侮辱，姦淫的案件。

公審大會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駐地在河口縣城的雲南建設兵團第十六團進入了空前的戒備狀態。在方圓十九裏地內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設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的民兵和端著衝鋒槍的解放軍戰士站崗。

一大早，數千建設兵團戰士便在一種緊張氣氛中集合起來，從各個連隊出發，通過一個個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夾道持槍者，來到一個山坡下。這個山坡

平時並沒有什麼特殊，上面同樣是一層層梯田，梯田上長著稀疏的實生橡膠樹，山頂處有一塊保護原生林，有著竹叢和荒草。

但現在他們回過頭去，看到十幾挺輕機槍和兩挺重機槍的槍口以俯視狀態對準山坡下。這些戒備都只是為了能夠安全地召開一個公審大會。

河口的知青們剛成為兵團戰士就參加過一個公審大會，審判大瑤山上一個六十多歲的瑤族老頭自封皇帝，結果是連他帶十幾個大臣一同槍斃！

在一條三面環山的口袋形山谷裏，十幾個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幾名持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排成一排，平舉自動步槍，在一聲命令中，扣動扳機。大約每人都放空了槍中的子彈後，戰士們跑步離開刑場，兩個提手槍的公安人員走過去，對著未死的犯人補槍。

這次不同，被審判物件不同。

隨著一聲汽車喇叭，唯一被允許開進公審大會會場的汽車出現在公路上。汽車停下來，在一排槍口中，車蓬窗被打開了，十幾名現役軍人被押上會場。

被審判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幹部！在解放軍威信和地位處於巔峰的年代中，在說解放軍一句壞話就被扣上“毀我長城”的歲月裏！

山腳下已經搭好了一個簡易的主席臺，幾個雲南省軍區的領導和軍事法庭的負責人臉色鐵青地坐在上面。

十幾個將被審判者站在臺上，低垂著頭。

在一種沉悶，肅穆的氣氛中，主席臺上一個領導拍案而起，大聲宣佈。

武裝戰士們沖上去，憤怒地撕下了十幾個被審判者頭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領章。

XXX，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四師第十八團副參謀長……利用職權姦汙女知青八人……

XXX，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四師第十六團保衛科長……利用職權姦汙女知青六人……

XXX，……連長，姦汙女知青……

XXX，……政治指導員，姦汙女知青……

還有一名現役軍人連長，不但姦汙四名上海女知青，還與一條小母牛有過性行為，被上山打獵的老頭發現揭露出來，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場者無不譁然。

十八團的副參謀長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將在軍人勞改場中渡過他的殘年。

十六團的保衛科長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親是雲南省的一個地委黨書記，沒法給他一絲的袒護。又可憐他年輕的妻子和幼女將為他承擔一生的恥辱。

而在審判會場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姦汙和凌辱的人看著這種場面會產生什麼想法呢？

在這次大規模審判之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六團的兩位團級軍官被槍斃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的一個獨立營長和一個連長被槍斃了。

而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以及陝西盛山西盛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隊知識青年的地方都舉行了大規模宣判會，對姦汙上山下鄉女知青的罪犯進行了嚴懲。

女知青頻遭姦汙 震驚中南海

早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初期，女知青被迫害的問題即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周恩來會在看完一份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關於姦汙女知青的材料後擊案大罵：“這

不是，這是國民黨！其實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為，就是國民黨也絕不會容忍的！”

從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強調要保護女知識青年。1971年中發26號檔要求各地堅決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的階級敵人，凡是強姦女知識青年的，都要依法嚴懲；幹部利用職權為非作歹的要撤職查辦；包庇慫恿犯罪分子的，要給予嚴格的紀律處分。各地知青部門紛紛發文，貫徹檔精神，處理了一批摧殘女知青的案件，使肆無忌憚的淫徒惡棍有所懲戒，邪風暫時斂跡。然而時隔不久，嚴打風頭一過，案發率便重新攀升。

60年代末70年代初，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強姦、猥褻，確切數字將永遠是個迷。在一個極重貞操、乃舊殘留著封建意識的社會裏，許多失去貞操的女知識青年不能永遠保持緘默。她們中的某些人為了達到返城的目的，被迫屈從於權勢的貪欲。1973年6月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前，國務院知青辦曾經對各地知青狀況進行了摸底調查。根據遼寧、吉林、四川、安徽等24個省、市、區的不完全統計，1969年以來共發生迫害知青案件2.3萬餘起。其中，姦汙女知青案件約占70%。這就是說，被官方確認的這類案件就有1.6萬起。即便以這一統計為依據，也足以證明當時女知識青年被摧殘的程度是何等嚴重了。

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當時吉林的九台一個縣，1973年前的調查就發現迫害知識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強姦、姦汙下鄉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殺1人，自殺未遂3人，懷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殘嚴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門縣先後安置下鄉知青1.3萬余人，共發生姦汙、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還高。

農村基層幹部多數是利用職權，借招生、招工、上學、發展黨員之機，對女知青進行姦汙的。九台某生產隊長齊殿發，先後強姦、姦汙、猥褻婦女 23 名，公開宣揚“好漢霸九妻”把女知青騙到他家住宿。1971 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將女知青蔡某強姦，蔡右眼被齊犯擊傷。蔡受傷後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齊對蔡軟硬兼施，一方面哄騙說：“你放心，小隊有我，大隊有我哥哥，公社、縣裏我有人，將來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嚇道：“這是我們齊家的天下，你要告發，我頂多半年不當隊長，我叫你骨頭渣子爛到這裏，也別想走！”齊對蔡某多次姦汙。蔡某忍無可忍向上告發，公社辦案人員竟將此案當作“通姦”問題出理。黨支部只給齊犯留黨察看兩年處分。蔡看投訴無門悲憤交集，1972 年 12 月寫下遺書，服毒自殺，經搶救脫險。但胃膜燒壞，精神失常。

遺書寫的摧人淚下，書中說：我被齊殿發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囑咐母親保重身體，把自己忘掉。勸告妹妹“不要讀書了，不能再下鄉走向姐姐的地步。”遺書最後絕望地寫道：“現在公社這樣處理問題，證明瞭齊殿發說的話，是他們的天下，沒人給我們辦事，這是他們逼的。”

許多受害的女知青都與蔡某一樣，她們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面對的則是由親族關係、地域關係、權利關係盤根錯節編織在一起的邪惡勢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只好以死相拼。

吉林科右前旗察爾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強姦後服安眠藥自殺。在遺書中寫道：毛主席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完全正確，應該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這裏的階級鬥爭太複雜，我鬥不了，希望你們知識青年趕快離開，我惹不了他們，只好走這條路。不管這些自殺者的動機是什麼，單憑正值豆蔻年華而自尋短見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轟動輿論，引起人們的廣泛同情和上級領

導的重視。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肇事者當然難逍遙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卻是無法彌補的。

當年知識青年在農村插隊落戶，由於分散居住，管理不善，使這些女知識青年落到了“天高皇帝遠”的農村、邊疆，女知識青年被強姦、姦汙的問題就相當突出。她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手無縛雞之力，成了衣冠禽獸任意宰割的俎上肉。

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識青年有一首歌這樣唱道：“我是一名知識青年，下鄉到農村；整天哪掄大鎬刨大糞，真累啊真累啊，累的腰腿酸；幹了一年回家轉，沒有盤纏錢。”但最令下鄉女知識青年心悸的，不是生活的艱苦，體力勞動的繁重，而是人身安全沒有保障。

許多被揭露出來的女知識青年被蹂躪的案件是令人髮指的。有一個典型案例：四川廣漢縣某公社獸醫站站長麥明程，多次姦汙一名女知識青年卿某。卿某懷孕後，他用服瘋狗藥，超量注射奎寧針和用自行車鋼條戳胎兒等聞所未聞的殘忍手段強迫被害人墮胎未成，導致大量出血，身體完全被摧垮，1971年5月自殺未遂。麥犯不顧卿某的死活，複用閹豬刀給她剖腹取胎，由於剪斷大動脈，大量出血，被害人痛苦難忍，拒絕再切。麥犯草率縫合，腹部已切六層。術後被害人一直發燒、昏迷。麥犯又用注射針在卿某右腹部深刺3針，企圖刺死胎兒，逃脫罪責。並在她傷口劇痛，無力抗拒的情況下，再次將她強姦。

安徽渦陽縣某大隊黨支部委員高懷山，先後姦汙婦女27人。全村37戶，有33戶受害。1971年7月，高乘上海女知識青年王某患病在家休息之際，闖進宿舍，將她推倒撞昏後強姦，並威脅說：你要是不老實，就叫你在農村呆一輩子。

瀋陽女知識青年馮某，在遼寧昌圖縣插隊，1970年5月被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杜景峰強姦，生一子。為掩蓋罪行，大隊幹部把小孩賣的。1971年2月，昌

圖縣將馮某送回瀋陽家中養病，並將杜某逮捕，判處徒刑四年。瀋陽市皇姑區公安局聽到馮家鄰居的片面之辭，不做調查，竟將馮某以“女流氓”、“腐蝕幹部”罪拘押一個月，在繁華街道遊鬥3天。當年12月，馮母到公安部上訪，才檢查糾正。但此後的一年多裏，被害人不僅沒有得到安置，反而成了名聲狼藉的無業遊民。

湖北天門縣某大隊年僅十七歲的武漢女知識青年王某，先後遭到了生產隊會計、民兵排長、生產隊幾個人的姦汙，被弄得身敗名裂。知青們歧視她，地痞流氓調戲她。她被逼無路，只好要求搬到豬圈去住，也被隊幹部據絕。縣、公社、大隊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誣衊她是“拉幹部下水”的“女流氓”，寫報告要求逮捕她判刑。真正的罪犯卻逍遙法外。該縣的公安司法幹部有一種論調：凡對女知青進行強姦的，第一次沒有揭發的、再次進行姦汙的，由強姦變成了通姦，一般不予刑事處分。一些被害的女知識青年，或攝于罪犯淫威，不敢挺身揭發，是不難理解的，而這樣做的結果只會招來更大的羞辱。由於該縣的公安、司法部門的怠忽職守，對迫害女知識青年的犯罪打擊不力，1971年—1972年間，連續發生女知識青年遭強姦後被殺死，殺害的惡性案件。

對敢於維護自己尊嚴並與罪犯進行鬥爭的女知識青年，往往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對出身不好的女知識青年來說，這樣做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氣。她們是弱者中的弱者，是血統論壓迫下的戴罪羔羊。因此最易成為邪惡者漁獵的對象。有的幹部姦汙女知青未遂，就到處散佈對方亂搞兩性關係的留言蜚語，並將對方的家庭歷史問題公佈於眾，進行打擊報復。這種殺手鐮實在厲害，足以將對方置於絕境。“做一個人難，做一個出身不好的女人更難。”這就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因拒絕公社幹部誘姦並飽受打擊後發出的哀歎。

一個色狼在橡膠林中遊蕩

一九七零年雲南農場在屯墾戍邊的偉大指示下，成為昆明軍區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大批現役軍人進入到兵團，擔任了由連長以上的全部正職幹部。來自成都、重慶兩市的知識青年懷著“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志願，經過嚴格政審，大批來到雲南，認為自己已經成為准軍人。

女知青施某在連長的第一聲哨子中便從睡夢中醒來，她以軍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襯衣、蹬上長褲和螞蝗套，戴上頭燈，挎上膠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陰影遮擋著黎明，幾個小時後陽光才會照進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範圍內的這個小山寨，或者叫做連隊。一盞又一盞晃動的頭燈說明又一個割膠日開始了。

頭燈在通向橡膠林的道路上匯攏了，曲曲彎彎，排成一長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螢火蟲在飛舞。

漸漸地，燈火稀疏了，人們一個個鑽進屬於自己的林段，濃密的橡膠樹葉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離連隊駐地三裏遠的山坡上，她負責著幾十畝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膠樹的割膠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點，她稍微喘了口氣，抽出鋒利無比的膠刀，開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認真，但這並不影響一顆由於年輕而不會停歇的大腦在躍動。

她是自願從十裏洋場來到西雙版納的密林中的，這裏的傳說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樣年輕的少男少女，他們懷著改造自己和改造邊疆的宏願離開家鄉，把青春和汗水拋灑給紅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這裏很艱苦，有人跑回家鄉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緬甸。但是，施某沒有像那些人一樣，她覺得這裏的一切都還不錯。尤其是那個面和心善的現役軍人連長，對知識青年，尤其對女青年們關懷備至。

上面一層林帶傳來輕微的響聲，施某的心一下子縮緊了。她曾聽說有一野豬一拱嘴就把一個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邊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頭，上面也是一團光亮，說明有一個人戴著頭燈。她看出來了，是連長，他在幫她割膠。她放心了。

連長幾乎天天出現在各個林段中，檢查生產情況或幫助生手、慢手割膠。

她比平時快一個小時割完了膠，和連長在山頂處的一小塊空地上。連長一上山就把掛在腰上的雨布鋪開，自己坐下後，讓施某坐在他的身邊。

施某驅趕了一下蚊子，又尋找著有無螞蝗爬上來，一隻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幫她驅趕什麼，她很感謝，側臉沖連長笑笑。連長也在笑，眼中燃燒著一股施某從未見到過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連長為什麼會這樣笑，以至於連長的手挪到她胸前，解開全部襯衣扣時，她才開始恍惚。

施某沒有戴胸罩，由於西雙版納地區的炎熱也由於施在生活上和貧下中農一樣。

施某頓時嚇呆了。她不知道連長要幹什麼，或者說由於意識到連長要幹什麼，而目瞪口呆，束手無策。

連長飛快地脫下自己的衣褲，像猛獸吞食小動物一樣瘋狂地佔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幾下，但那樣無力。完事之後，連長撫摸著她向她許了不少願，入團、入黨、提幹等等。

施某本來可高聲呼叫，但她不敢。連長的權勢，紅領章、紅帽徽的尊嚴，她心裏壓力太大了，以致於會覺得人們將指責她在犯罪。

連長心滿意足地站起來，收起了雨布，哼著毛主席語錄歌，揚長而去。派他到生產建設兵團，他一開始是牢騷滿腹。但很快他便在這貧困的山林中發現了樂趣，這便是那些一個個青春年少的女知青們。女知青們，來自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她們比連長在軍營附近見到過的那些農村姑娘確實白嫩、誘人。

連長像一隻餓狼一樣開始物色獵物並選擇撲食方式。橡膠林中是最好的地點，那裏僻靜偏遠，很難碰到別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女知青們都會有恐懼感。

第一個女知青在他的懷抱中連掙紮一下都沒有。於是，他帶上一塊雨布，每天都和勤勞的膠工們一同走進山林之中，先從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個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經是他身下的第八個犧牲品了。

女知青徐玲先母子雙亡 點燃全國知青回城請願運動

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一個名叫徐玲先的女知青腆著無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路上。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吁吁的年輕孕婦身上...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著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一位姓成的赤腳醫生讓一位對生孩子富有經驗並且熱心的家屬大嫂做他的幫手，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嬰兒的降臨。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裏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久，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九時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農場醫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雙亡。十點半鐘以後，終於有人在距場部不太遠的一間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醫生……

聞訊趕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換上一身草綠色軍裝，面部淡淡化了妝，部分掩蓋了年輕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間殘留的痛苦痕跡。那個未及出世便過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繖襪中，與他的母親並排躺在一起。母子倆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來弔唁的知青大多是本農場的老同學或戰友，他們有的趕了很遠的山路，個個挽著褲腿，臂戴黑紗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進門就忍不住大放悲聲。人們與其說用眼淚痛悼亡友，不如說同時也為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悲泣……

人們互相傳染和彼此激發著長期被壓抑的怒火和不滿。有人籌畫舉行追悼會，要求農場善後處理等等。上述提議立即得到多數知青一致回應。於是這種由女知青猝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醫院藉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留，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遭知青阻攔，未果。

十六日，農場保衛部門奉命強行處理屍體。消息傳開，知青譁然，於是越來越多群情激憤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會鬧大。我們以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無辜的犧牲品，那麼我們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懲治那些

草菅人命的醫生。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說：“問題在於農場領導採取高壓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準備使用武力強行驅散知青，壓制人們的不滿情緒。在這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知青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雲南西雙版納由於地理條件特殊，當時成為種植橡膠這個重要戰略物資的基地，曾經有 10 多萬知青，到 70 年代末，這裏還一共約有 7 萬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為主。他們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這個特殊的半軍事組織，不但生活和勞動條件極其艱苦，而且經常受到兵團幹部的欺負和壓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運尤為悲慘。

根據 1973 年的一內部報告，“全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識青年 1034 起，受害知識青年 1874 人，2 人被打死。調戲猥褻姦汙女知識青年的幹部 286 人，受害女青年 430 人。”其駭人聽聞的程度使得高層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法西斯行為”，要求嚴肅處理。

但就是在這樣嚴酷的情況下，1978 年到 1979 年，雲南知青發起了要求回城的請願運動。這場運動始於 1978 年底一些知青向鄧小平寫信反映問題，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團當局的阻撓後他們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會，發起請願甚至絕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代表不但和兵團一級的領導打交道，而且見到了中共主管兵團工作的副總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

雲南知青請願成功勝利返城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激勵各地的知青爭取回家的權利，從而使知青返城運動達到了高潮。到 1979 年底，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高層宣佈結束上山下鄉運動。

附：報刊、檔案資料

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簡報第八期：關於走後門。領導幹部子女走後門上大學參軍，招工招幹，下麵頂不住。山西反映，國家計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後門參軍回北京，不通過下面就把戶口轉走。雲南反映，省委在討論處理走後門時，對“走後門要退回”的提法，兩次刪去，說牽涉到相當多領導幹部，不好辦……(略)

瀋陽軍區第一師二團六營連長張國良又是另外一種類型。張國良，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人，在瀋陽軍區某部“雷鋒團”任排長。一九七一年，張國良借談心之機姦淫了第一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聲張。此後張國良膽子愈發大起來，頻頻得手。據材料揭發，張國良任連長三年，幾乎不動聲色地姦淫了幾十名女知青，其中數人多次墮胎。以至於後來才有李先念副總理指出的那樣：女知青聽見喊一聲“連長來了”，就會嚇得簌簌發抖。

十八團衛生隊隊長孫濤，四十五歲，河北河間縣人。一九四五年入伍，一九七〇年三月調入十八團任衛生隊隊長。副營級。姦汙女知青十一人，三人墮胎。占衛生隊女知青人數一半以上……李文峰，三十歲，貴州石阡縣人。十八團二十連指導員，正連級。姦汙、調戲、猥褻女知青十五名。被姦汙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殺未遂……——摘自聯合調查組《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八團部分幹部摧殘姦淫知識青年的調查報告》第十六團五營三連連長陳忠友，有婦之夫，姦汙、調戲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膠，聽見樹葉響都以為連長來了……九營二連連長田宮成，有婦之夫，姦汙上海女知青多人……——摘自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情況反映》(1973年第4號)第十一團“七人姦淫案”，現已查明系該團保衛幹事段xx(正連級)屈打成招。此案牽連知青達數十人，其中五人判刑，十餘人受處

分……——摘自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會議簡報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孫小虎(正連級)，有婦之夫，長期姦汙三名女知青，並致使其中二人墮胎……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姦淫男知青二十余人……——摘自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會議簡報。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汙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在所有摧殘姦淫知青案件中，姦汙女知青案件比例重大，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有的達百分之九十。例如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淫知青案件一百二十六起，姦汙案一百一十九起，占百分之九十四。江蘇、吉林兩省，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參謀長袁候新，在地區革委會任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姦汙女知青達九十余人。……(略)

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簡報第九期：軍隊幹部子女上山下鄉情況反映：成都軍區：後勤部應下子女五百一十二人，職工子女下了二百四十人，幹部子女未下一人。十三軍和五十軍幹部子女，從一九六八年至今，未下一人。武漢軍區：湖北省軍區機關幹部子女，應下一百八十一人，實下四人，到農村不久，兩人參軍，一人進廠。該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幹部子女共五十九人，無一人下鄉。昆明軍區：一九七二年應下子女八十七人，只有兩人下鄉。……(略)

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十一期：1. 拷打批鬥(不完全統計)：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吊打知青六十九起，僅一師批鬥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2. 姦汙女知青(不完全統計)：黑龍江兵團：三百六十五起。內蒙古兵團：二百四十七起。雲南兵團：一百三十九起。廣州兵團：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師級幹部二人，團級幹部三十八人。……(略)

3. 工傷事故：黑龍江兵團：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團第三天，在沒有進行過任何安全生產常識教育的情況下，派他們排除啞炮，全部炸死。一九七〇年第三十九團打荒火，燒死二十一名知青。內蒙古兵團：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傷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團二連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團四連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燒死知青六十九人。廣州兵團：死亡二百一十人。雲南兵團：死亡二百九十七人。新疆兵團：一九六九年來，僅自殺事件就達一百三十四起。……

4. 管理粗暴：內蒙古兵團二十六團八連連長在大會上公開說：這裏過去是勞改農場，他們是大勞改，你們是二勞改。雲南兵團二團有的連隊規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開會不發言，記曠工一天。晚上不參加學習，罰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罰二十元。江蘇兵團規定：大小便超過二十分鐘，扣半天工資。

5. 知青思想不穩：黑龍江兵團：長期在外二萬餘人。獨立二團：一九六九年接收北京軍隊子女二百四十名，一九七〇年走掉二百零四名，其中一百零四名任何手續都不要。廣州兵團：外逃港澳二十八人，未遂二百八十四人。雲南兵團：近年內知青走後門達三百多起。(略)

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十六期：黑龍江兵團：副參謀長xx調戲女知青七人，邊學習中央文件邊調戲女知青。二十五團副團長xxx，在全國召開打擊批鬥姦淫女知青罪犯大會的同時，還在辦公室裏姦淫了一名女知青。(略)

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十七期：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僅兵團第一師捆綁吊打事件就達七百二十九起，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淫女知青。上海市慰問團反映：僅該市川沙縣分配到一師六團的知識青年，三年內死亡二十九人，其中打死六人，自殺三人，其他非正常死亡二十人。一師一團十二營三連北京知青

李子敬，與副營長爭吵幾句，害怕批鬥，上吊自殺。九天後找到屍體，已腐爛。團領導宣佈：“上吊自殺是背叛黨，背叛人民。”一師六團十六營姦汙女知青案件十六起，現役軍人占十一起。(略)

雲南省知青工作會議簡報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江洪洲同志講話(摘要)：……據不完全統計，前一段時間，兵團各單位捆綁吊打知青一千多人，被姦汙女知青二百多人。案件還在清查中。一師一團，捆綁吊打過知青的幹部達四百六十多人次，團部關押知青達三百一十四人，有的知青被關押達一兩年之久。被關押知青，每天強迫頂著烈日幹十多個小時重活兒，每天吃一餐，每餐二兩。其中遭毒打和非法用刑五十餘人。甚至強迫被關押的知青互相毒打……十營十連，百分之八十知青被批鬥。有個知青，因為在開大會時放個屁，被當場批鬥，罪名是“污染空氣”。六營三連指導員左國生，長期姦汙一上海女知青，另一個男知青唐潔新試圖揭發，被扣上“反軍亂軍”帽子，遭到瘋狂報復。四師十八團，一百四十一個連以上單位，捆綁吊打過知青的單位達一百二十多個，占百分之八十五，受摧殘姦淫知青達二百四十多人，被姦汙女知青達一百多人。(略)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赴上海彙報團彙報材料……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女知青被姦淫侮辱九十六人，捆綁吊打八百五十二人。(略)

國務院、中央軍委檔(1973)第104號關於黃硯田、李耀東姦汙姦淫女知青的通報。黃硯田，黑龍江建設兵團十六團團長，四十九歲，江蘇泗陽人，一九四三年入伍，一九四四年入黨。李耀東，十六團參謀長，四十八歲，河北遷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黨。姦汙、猥褻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姦汙後，又被李姦汙。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國務院知青辦《情況反映》

1975年4月28日轉發浙江省革委“關於處理祝江就姦汙姦淫女知青案件的通報”。祝江就，浙江省江山縣豐足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四十四歲，一九五〇年入伍，一九五四年入黨。用各種手段姦汙女知青八人，猥褻八人，還姦汙其他婦女八人，甚至姦淫病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雲南省知青辦《情況反映》（第14期）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破壞知青上山下鄉案件的處理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自一九六九年組建以來，共發生破壞知青上山下鄉案件四百一十一起，其中姦汙案二百零七起，捆綁吊打案九十八起，兇殺二起，逼婚三起，打擊報復五起，煽動外逃一起，死因不明三起，猥褻八十三起，姦淫未遂九起。犯罪人員中，現役軍人占一百一十六人（師級幹部四人，團級九人，營級三十一人，連級一百零五人，參謀幹事十人，其他七人）；地方幹部犯罪二百四十五起。已處理一百七十九件，占百分之四十三點六。死刑四件，死緩二件，無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十三件，行政處分一百三十八件，其他十三件。未處理二百三十二件，占百分之五十六點四。

第十節 1800萬知青下鄉真相

導讀：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厚厚一本40萬字的集大成式專著，本人知青出身（八年鄉齡），讀之感慨萬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年中譯本），厚厚一本 40 萬字的集大成式專著，本人知青出身（八年鄉齡），讀之感慨萬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從《失》著所附參考文獻上，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今年乃知青運動爆發 40 周年，內地知青自我紀念再掀高潮，一些報刊也開始關注知青話題。按說 40 年的時間應該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時日積累，有了研究客觀化足夠的時空間隔，應該湧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式專著。然而，由於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系著文革，而且鉤掛著中共意識形態，牽扯著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和所有赤左胎兒一樣，無法在襁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無法“轉正”——由民間入廟堂。此外，儘管知青運動結束已 30 年，但 1800 萬知青垂而未老，不僅“人還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會能量甚巨。精於意識形態管理的中共，當然明白還必須為某些歷史遮醜。如此這般，知青學自然“宜粗不宜細”，只能與文革一樣“淡化處理”。迄今為止，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上山下鄉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不是沒人報，而是不肯批——“穩定壓倒一切”。因此，這一重大當代史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潘鳴嘯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覲著其時。

“知青學”在國外，當然不是我們這些知青學人不自愛，不知此山有壁，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條件比我們關心“知青”。不僅經費、時間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綜因合之，老外學者的研究熱情遠比我們易燃，學術興趣也遠

比襄內學子更熱烈更持久。儘管事實如此，無論如何，我還是為這一“集大成”課題流失國外而汗顏，為中國而感慨。

說起來，大陸“知青學”並非毫無進展，也出現一些臺階性研究成果。如鄧賢《中國知青夢》（1993）、劉小萌、定宜莊等人《中國知青事典》（1995）、顧洪章、劉夢章等人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1996）、金大陸的《世運與命運——關於老三屆人的生存與發展》（1998）、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1998）、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2004）。但這些成果均屬初級階段的資料性歸掃，雖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積微言細的原始資料，但由於是民間行為（除金大陸為上海市級課題），所錄資料大多為知青親歷，局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到“必須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須面對出版那道嚴審雄關，多少資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了。失去資料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資訊封閉的厲害。

二、學術貢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於它是一本嚴肅的學術化專著，對大量散落的原始資料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歸納梳扒，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可謂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瞭解上山下鄉運動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作為漸入秋暮的當年知青，30年來一路總還算關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輯資料仍聞所未聞，30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來說仍是新聞，捧讀此書才真正認識這場運動，一路發歎“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發現自己不僅當年被蒙鼓裏，40年後仍然不知就裏。若非讀到《失落的一代》，終身都將不瞭解這場運

動的全局性資訊。如從 1956 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1963 年周恩來計畫 18 年內動員 3500 萬知青下鄉。（頁 61）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借助紅色意識形態，將工業疲軟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用給農村。如此這般，既維持中共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神話（最高指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間奇跡都可創造出來。）又遮了大面積失業之醜。至於將青年精英送往農村——工業化的相反方向，會造成怎樣的歷史後果，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似乎從未考慮過。因為，他們來不及慮及，亦毋須慮及，反正他們怎麼做都是“偉光正”。

從《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聞：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可能與 1979 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頁 142）上山下鄉在 1980 年被最後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 1979 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了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頁 163、166）

——宣傳幹事、教師、生產隊長等當年混得不錯的“積極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萬惡的殖民地”，因為連他們也無法在農村農場“展望自己的未來”。（頁 300）廣州動物園某職員因賣虎糞給知青而被捕，因為虎糞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時嚇退追捕警犬。（頁 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後來的故事，如張鐵生、吳獻忠、柴春澤、朱克家、蔡立堅、侯雋、董加耕。（頁 159~160）李慶霖的三改刑期——從無期到八年。

（頁 160）認識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歐陽璉（阿克蘇知青領袖）因帶頭鬧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強姦之證據，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有時是幾十起。（頁 285）《南京之歌》（我至今會哼唱）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頁 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裏女知青給郊區小夥，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頁 211）

—— 1974 年 10 月 23 日廣州十萬青年自發聚集白雲山，放了幾百隻風箏，風箏飄語：“順風順水到尖沙咀！”（頁 377）1974 年 4 月，南京爆發遊行示威。（頁 379）1984 年，1.7 萬上海知青勸返新疆。（頁 189）民主牆時期，上海知青王輔臣在人民廣場張貼大字報：“大黨閥、大軍閥、大獨裁者——毛澤東，上海人民決不會饒恕你。”（頁 408）1980 年 10 月 29 日，插隊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剛自爆事件——10 死 81 傷。（頁 196）

——1978 年底～1979 年初，各地知青運動風起雲湧。京滬甯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鬧了，上海知青以臥軌“擴大影響”，遊行、絕食、請願，持續一月，提出口號：“要工作！要吃飯！要戶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反動！”滬青民運領袖滕滬生被捕。大多數農場這一期間都出現自殺事件。（頁 144～147）甚至讀到“反動至極”的請願語：“勞改犯服刑期滿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們反而不如勞改犯，這麼長時間了還不允許我們返回北京！”（頁 197）

——文革結束時，中共發現如不說謊就不能維持“安定團結”。1978 年李先念已說：“國家花了 70 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認這是一項錯誤政策，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1] 必須對已認識到

的錯誤進行反向宣傳，迫使國人接受這種“政治潛規則”，誰不接受誰就是“政治上不成熟”。這就是我們知青一代成長的社會環境。（頁 131）這種“殺傷力”強大的資料，自然不會討官方歡喜，不能在大陸媒體得到傳播。

——某臺灣學者 1972 年對上山下鄉大聲喝彩，將這場運動稱為“理性而大膽的”實驗。（頁 44）1967 年秋，法國共青團幾位負責人訪華後，受知識份子必須與群眾相結合的毛氏理論啟迪，發起“插入運動”，影響數百法國青年放棄學業，在城市“插廠”。（頁 434）1970 年代初，法國數千名青年再掀“回歸土地”運動，堅持七八年，最後吃癩。（頁 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鮮血寫就的歷史正像毛澤東主義的恐怖寫照，特別是下鄉運動時期提出來的某些指示。”（頁 432）幾則隔岸“新聞”使我陣陣驚悚，再一次直觀感受赤左學說的欺蒙之力。

《失》還提供了一系列資料，使全書論述站在實證的地基上。如 80 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頁 202）1980 年仍有 15·5 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 43 萬。（頁 168）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 42%，工人出身 31%，普通家庭 4%，出身不佳 1%。（頁 213）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 100 多萬，技校生減少 200 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頁 411）列示資料，結論自明。文革對國家的傷害、對教育的摧毀，可謂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運動完全違反經濟規律與客觀現實，硬將知青送往不需要勞力的地方充當勞力，還讓知青硬幹類似西西弗斯的活兒。1957~77 年間，全國可耕面積減少 11%，人口卻增加 47%；1978 年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 0·3 公頃，日本 0·

7 公頃，印度一公頃，美國 48 公頃。國家投資 46 億辦農場，結果虧損 32 億。

（頁 399）

最悲劇性的是知青運動的宏觀投入與產出。為安置知青，國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資 500 元，去農村 178~303 元/人，去農場 690~1119 元/人。（頁 61）內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當中級幹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頁 160）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 1900 元，而安置社隊工廠 1300 元，安置鄉鎮企業僅需 500 元，知青下鄉成了比開工廠還昂貴的事兒。（頁 166）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尤其包括對政府的怨恨，引發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懷疑，普遍出現“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一代青年的崇拜物件用馬基雅弗利（Machiavel）、達爾文（Darwin）、於連（Julien Sorel）換下孔子、雷鋒。（頁 348）於民大怨，於國大害，於己大損；裏外兩傷，損人不利己；何苦？何苦！為何！為何？歪謬之屋一定建立於某一歪謬地基，一定有一歪謬的價值支撐，今人當然都認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權爭。為了一己之權壞了一國之政，為了一己之欲壞了全國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著分析的深刻性，亦達知青學前沿。雖然分析知青運動難度不高，但大陸學者受制於“局限”，特別那位揮手肇始者的巨像還高高懸掛，知青研究就必須戴著鐐銬起舞，寰內學者就無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別得到映襯，言我們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鄉屬於最具專制之列。這種強制性的放逐邊遠地區從事體力勞動無疑就是流放。……當權者擁有對人民的極大權力，而老百姓為保護自身幾乎走投無路，這一現實在運動中暴露無遺。（頁 430）

——農村勞動力閒置不是很顯眼的事情，與城鎮失業相比，政治上的危險性也比較小，而知青混在農民群眾中也不會造成駭人聽聞的人口增長數字。……上山下鄉運動完全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而是掩蓋問題的辦法。它使人忽略了擴大就業的很多機會。（頁 390～391）

——大多數情況下，越是呱呱大叫要紮根農村，就越有機會離開，等於公開鼓勵口是心非。（頁 307）全面打亂道德禁條，結果就是極大地削弱這些禁條對精神的控制力。知青們學會了把以前他們譴責的所作所為看成是正常的。（頁 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這一表現出有某種獨立精神的社會階層。仇視知識份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亂，下鄉運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鄉運動與毛的有關教育培養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現知識份子及滋長批判精神。……毛一向……認為鄉下人的道德精神遠高於城市人。（頁 429）

——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 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 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 223）（農民）懷念集體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還談到解放前。（頁 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謂“歷史使命”為名，君王式蔑視社會經濟利益而命令全體社會成員必須服從他的安排。（頁 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種不公平的犧牲品..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謂“歷史使命”為名，君王式蔑視社會經濟利益而命令全體社會成員必須服從他的安排。（頁 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種不公平的犧牲品。

——老三屆從童年開始就被灌輸戰爭神聖偉大的思想。各類宣傳不斷向他們顯示戰爭是通往光榮的道路……知青們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一打，起碼可以變一變。要死，死在戰場上，誰知道呀，當個英雄，總比憋死在這個破地方強。”一位海南知青：“我幻想著哪一天世界革命爆發，我們知青便可以告別農村，殺向歐美。”（頁 364）

——下鄉運動遺禍久遠，它迫使政府當局從 1978 年起採取了與現代化高效率的經濟目標背道而馳的上下策，就是頂替制度（工人退休之時，其職位由其子女自動頂上）和歸口包乾制度（年輕人的招聘由他們的父母所在單位負責）。必須指出，由此引致的職位世襲現象，不僅對保證勞動力品質及經濟生產效益是有損無益的，而且也是違背毛派們決意抑制社會不平等的代代相傳的願意的。（頁 392）

對大陸知青研究者來說，提煉撮抓這些“親身感受”似應更方便更容易，他們當然更理解自己當年由皮肉得來的真理。如今，絕大多數國人也已認識到：任何整體利益不過是個體利益的集合，只有尊重每一個體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是“人民政府”，才可能獲得執政的合法性。然而，就這些已在口邊的認識，絕大多數

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臺。

四、所得思考

依靠《失》所提供的全局資訊與宏觀資料，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1800 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頁 155）當今青年很難想像：“回家”這樣一個最原始最初級的欲望，我們當年竟難如登天！

1977~79 屆，只有 43·9 萬知青進入大學，加上其他管道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估計總數不會超過百萬。1/18 的成才率，既是 1700 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頁 184）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元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繞了一個大彎竟走到這兒，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從走向民主自由的起點，最後竟拐入比滿清還暴虐的專制，難道不是 20 世紀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的集體失職麼？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就知青運動而言，不僅僅整整一代人被耽擱，整個國家人力智力資源大浪費，而且做了比無用功更可怕的反作用功，留下一地赤左瓦礫，還是不易覺察的

意識形態瓦礫。直至 1978 年，中央還在致力於“在全社會樹立以務農為榮的新思想”。（頁 404）再如恢復高考後，天津市長發現大學新生中工農子弟比重降低，立即打報告揭發“新的招生制度使新生的階級成分改變”，若非鄧小平即刻回復“救國要緊”，還不知會折騰出什麼“革命行動”來。（頁 412）

更使我心頭作痛是知青集體跪求的圖片。1979 年 2 月，雲南猛臘農場千余知青跪地向農墾總局局長哭求：“我們要回家！”（頁 141）這樣一代依靠下跪維權的青年，能為他們身後更為孱弱的農民爭取站立的人權麼？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價值與意義，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頁 424）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當然，通過上山下鄉，知青根據皮肉糾正了思想，被迫學會接受此前絕對不能接受的“道理”，視原來認為的“極不正常”為“實屬正常”。他們通過認識農民而真正認識“與工農相結合”，通過嘗到“再教育”而意識到“再教育”的實質內涵——聽毛主席話，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思想。事實上，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麼是反現實。

從宏觀上，知青下鄉完全與現代化背道而馳，愚蠢地停留於原始勞動。通過簡單的農業勞作怎麼可能進至科技化？揮鎬運鋤怎麼比得上電腦操控？下鄉運動走在歷史大倒退的錯誤路線上，我們的青春熱血完全給錯了地方，知青成傻青。對於國家來說，除了愚蠢地“浪費”一代人的智力，還支付了巨大的道德成

本，動搖了“真實”這一社會之本。當人人戴著面具才敢出門，當人人心裏運著作著兩套價值邏輯，街上還能看見“真實”麼？

五、商榷與探討

潘先生認為“經濟問題不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他在 2009 年 5 月 28 日《社會科學報》（上海）再次重申這一結論。對此觀點，筆者認為需要商榷。因為，從表面上，確實是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主導了這場大運動，但從根子上則離不開經濟因素，即扔甩失業包袱。當然，之所以會產生失業包袱，最終原因還是政治問題，即中共從 1950 年代中期就發現無法按自己的設計對社會進行各項安排，“美好設計”無法貫徹於實踐，尤其公有制並未分泌出“巨大生產力”，經濟無可避免地滑向疲軟，這才不得不借政治高調裹經濟失敗的肉身。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各地工廠緊著向中央討要青年員工，而且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識的青年員工，相信任何一位政治領導人都不會也不敢發動這場城鄉勞力大對流的知青運動——1800 萬城鎮知青下鄉，800 萬農村青年進城。（頁 37）更不用說還要冒巨大政治風險：植恨於千萬城鎮知青家庭。一場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政治經濟及時勢等諸因之合，單因釋源難免顧此失彼。

儘管政治原因在所有共產國家永遠是第一位的，但具體到知青下鄉運動，乃是意識形態造成經濟疲軟萎縮，從而合成這一紅色怪胎。筆者認為：意識形態使中共自封萬能救世主，決不能容忍存在失業，一旦出現失業不是面對而是習慣性掩蓋。三年文革，全國只抓革命不促生產，政府財力日蹙，應付“吃飯財政”尚不及，不可能通過投資擴大內需提供職崗。同時，大學停辦，高中縮招，而三屆積壓的大中專畢業生嗷嗷待崗，必須安置，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情急

之下，毛澤東只能利用“領袖魅力”先送他們下鄉“就業”，既顧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續意識形態神話，也顧了經濟上的裏子——遮掩無法安置就業之實。

潘先生說：“我們得到的有關 70 年代城鎮招聘及人口的正式資料都清楚地表明，以城鎮就業和人口壓力問題為理由是不可能說明為什麼要發起下鄉運動的。”（頁 394）從結果來看，當然如此。不過，這可是事後總結，後見之明，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當時可沒有想到“毋須如此”，更不可能想到下鄉運動會招致中國共運徹底失去“後來人”。更要緊的是：一貫的“偉光正”使他們不必想得這麼深遠，他們只須不斷出新招表示“不斷革命”就足夠了。至於這些新招的後果與責任，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破壞”是革命的主旋律，毋須論證，永遠正確。同時，專制暴虐之下，更無人敢於向毛敲邊提醒，連個海瑞都沒有了。

不過，有始必有終，凡是歷史必有結果。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顧頭不顧腳的飲鳩止渴，全國知青及他們的家長由此真正認清了毛澤東思想的“價值方向”，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1978 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中共“工作重心的轉移”。

六、結語

從規模上，中國知青下鄉運動乃是國際共運的孤本，也是當代世界史一道獨異的“人文風景”，凝聚著種種不可複製的“歷史特色”，加上千萬知青與他們的同齡人還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們還會不斷出新聞。中共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退休後的“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

象”還在延續。此外，知青下鄉運動所必然附帶的一系列後續效應，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對後代的文化輸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對無知的下意識崇拜、對暴力的下意識認同……與之相伴，“知青學”可望在今後二三十年間持續走熱。尤其對國內知青一代學人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總不能再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時間搶救性搜集這場運動的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研究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無謂支付的青春。

一個隔著千山萬水的法國人（儘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瞭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面，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呵！

第十一節 緬共知青“紅飛蛾”王曦

導讀：這次我們知青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幾位同志到昆明同檔案館商談一個文化合作專案，會後之餘，張剛秘書長約談昆明知青文化研究會同志見面交流。唐岫瑛老師是位昆明知青聯誼活動中的熱心人，不但陪伴我們參觀了雲南大學文史遺跡，還安排幾位昆明知青代表同我們見面。我想這倒是個機會就詢問能否請到緬共知青王曦見見面，唐老師一口答應說他們也是老朋友。第二天，我們就在橋香園共進晚餐吃過橋米線，王曦夫婦來了，雖是初次見面，但在電話裏已是“見”了幾次面，他的第一本緬共知青紀實文本《紅飛蛾·薩爾溫江絕唱》就是委託我在上海知青中推解的，想不到一百本書一銷而光，可想而知“緬共知青”在我們知青人中的影響。這次能在昆明見到他也可說是了我一個心願。

王曦是個納於言表的 66 屆初三老知青，黝黑清瘦的臉頰明顯刻痕著歷經緬北腥風血雨的蒼桑，和《紅飛蛾·薩爾溫江絕唱》封面照上的緬共知青帥小夥子判

若兩人。人生風雨，世事蒼桑，歲月一點也不饒人的。他的第一句話是“誰是周公正？” ，一下把我們的感情拉近了，他的言談很悲情，這也不奇怪，從血火中走過來的人，至今受到不公正的遭遇能是好心情嗎？我勸他把“緬共知青”這段歷史全過程反映出來，現在主流社會要迴避這段歷史不足為奇，我們自己可要自信自己的足跡，自信自己的內心，當年“革命”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是時代召喚，稚嫩、激奮和懵懂不應是年輕人的罪過。

現在想來，王曦他們當時義無反顧地闖入烽煙滾滾的緬北叢林，高唱著“英特納雄耐爾”的壯歌，揮舞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紅本本，高舉著“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衝鋒槍儼如飛蛾撲火，前撲後繼也是當時可以理解的一種生活道路抉擇。但世途多舛，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他們鮮活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甚至寶貴的生命都與社會的變幻風雲一起灰飛煙滅了…….

王曦相比長眠於緬北叢林中的亡者，他是幸運的。今天，我們能共同吃一碗雲南知青的美食過橋米線是幸福的。他從一個69年下滇西隴川插隊的知青，到緬共人民軍的戰士、營文書、連指導員、旅部幹事參謀、營政委、師教導隊主官和師保衛處長，85年回國後做了一名工人及邊貿者到今天的一個退休工人，生活的清貧並不“蛻變”了這位老知青人，一路走來的困苦、慘烈、坎坷、困惑，直至今今天能拿起筆發一聲吶喊，還是一位生活的強者。是時下多少“款”者、“腕者”所望塵未及的，他已先後寫出網路博客《紅飛蛾》、《萬水千山壯少年》、《母親1949》、《兩航悲歌》和出版發行《紅飛蛾·薩爾溫江絕唱》、《紅飛蛾·叢林煉獄》、《紅飛蛾·金三角畸戀》等紀實文本，為中國知青文學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仍至中國文學中遺失的一頁。

王曦臨別說到第四部《紅飛蛾·國際悲歌》可能話題有些敏感，我鼓勵他社會在發展、我們應該拒絕遺忘，歷史就在於真實，我們走過的路自己再不能說出來、寫出來，那更要被拋棄了、被遺忘了。

今天，再一次翻閱由王曦簽名的《紅飛蛾》文本，分外親切而沉重，這部記載了王曦們足跡、心跡和吶喊的奇書，也是我們雲南知青史中的一份珍貴史料。我們雲南知青除了和全國知青有著共同的命運和足跡外，我一直認為：雲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和緬共知青話題是有別於其他地域知青的顯著特例和研究課題。原農墾部趙凡老部長生前在談到雲南知青返城問題時曾不無擔憂地說“現在沒人研究這些了”，現在王曦的《紅飛蛾》系列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緬共知青”的第一手資料，王曦以十五年浸染血汗的戰地日記為素材，以對叢林戰鬥的真實感受為線索和對人性綻放的追憶及大量當時攝下的珍貴照相映照、真實地告知了人們這段悲涼的歷史。

對於緬共知青這個事實，有人總想淡忘、掩蓋和抹去，然而歷史是不容封殺和遺忘的，王曦能不甘沉淪、不畏權勢和世俗困擾，青燈數載，秉筆直書，在蝸居中創作出《紅飛蛾》系列文本，這是我們雲南知青的驕傲和榮光。

春城難得的見面，寸心相印。我們都已是年近七十而能“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了。特別是象王曦這樣從鬼門關前走過來的戰士，正如沈從文先生說的“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王曦作為倖存者理應回到故鄉，雖然“紅飛蛾”們的命運不可能在血和火的洗禮中鳳凰涅槃，但熱愛和平，珍視生命已是王曦們靈魂的昇華，獨立思考，忍耐堅韌，腳踏實地，與祖國同行已是今天知青人的共識，相比我們當年“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理想目標，今天能讓世人活得幸福而又尊嚴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

王曦還告訴了我在緬共人民軍中有一位上海知青的“褲腳兵”（自願者）現已回滬定居，好不叫人欣喜，過幾天一定要去拜訪。

昨天，昆明知青趙德深發來了去年元旦他和王曦等人去緬北第二特區（佤邦）參加對外關係部副部長、原昆明知青石磊兒子的婚禮時走訪觀感，附登在此與朋友們分享。

2014年4月6日

附錄：緬甸第二特區（佤邦）印象

緬共知青“紅飛蛾”王曦

導讀：知青與緬共叢書《紅飛蛾》一書的作者王曦、雲南知青文化研討會會長楊小彪及部分成員、都市時報記者等一行9人前往緬甸佤邦首府邦康參加石磊兒子的婚禮，有幸會見並採訪了至今仍堅守在緬甸特區的中國知青、參觀了緬共黨中央遺址、看到了佤邦和平建設取得的可喜成績，讓我們這些對緬甸共產黨、緬共人民軍及至今仍然生活在緬甸金三角的中國知青、緬甸第二特區（佤邦）的神秘色彩充滿好奇的老知青們，無疑是一次探訪秘境的饕餮大餐。為使和我們一樣有著知青經歷、對在神秘的金三角生活戰鬥過的中國知青的命運充滿關注的朋友能有所瞭解，特將本人在佤邦幾天的走訪瞭解，並通過對《紅飛蛾》、《守望金三角》等中國知青與緬共叢書的研究，現將本人粗淺的認識和見聞與大家分享。

一，佤邦簡介

緬甸第二特區（佤邦）位於緬甸的東北部，分為南佤邦和北佤邦兩地區。北

部地方與我省的耿馬、滄源、西盟、孟連及西雙版納州的猛海縣相鄰，國境線長達 500 公里，面積約 1.8 萬平方公里。南部地區與老撾會曬、泰國的清萊府、美斯樂等相鄰，國境線長達 600 多公里，面積約 1.7 平方公里。南、北佤邦之間有一部分是緬甸聯邦政府的揮邦地區，因此分為佤邦北部地方和南部地區。佤邦全邦總面積 3.5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5 萬，居住著佤族、拉祜、傣族、漢族等 16 種民族，其中佤族約占人口的 70%。緬甸獨立後，佤邦所在地劃入揮邦。1969 年初緬甸共產黨在佤邦開展武裝革命鬥爭，佤邦的遊擊隊決定接受緬甸共產黨的領導，被編為緬甸人民軍，隸屬東北軍區。隨著緬甸人民軍的壯大，在緬共的領導下，結束了佤邦地區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部落統治並得到了統一。

由於緬甸共產黨後期因執行錯誤路線，導致領導內部分裂，使佤邦民不聊生、貧困加劇、部隊供應短缺、根據地不斷縮小，最終緬甸共產黨被迫退出了的歷史舞臺。1989 年在以趙尼來、鮑永祥為首的領導下，佤邦脫離了緬甸共產黨的錯誤路線領導，終止了緬甸共產黨在佤邦的一切活動，成立了“佤邦聯合黨”來領導佤邦人民。隨後，與緬甸聯邦政府達成了和平停戰協議。緬甸聯邦政府將佤邦列為特別行政區進行管理，授予佤邦“緬甸揮邦第二特別行政區”的稱號，對佤邦實行高度民族區域自治，自此佤邦走上了和平建設國家，建設美好家園的大道，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實行“不分裂國家、不分裂佤邦、不幹預政權”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緬甸聯邦政府的領導及國際社會的關心、幫助下，經過佤邦 40 多萬各族軍民的不懈努力，佤邦的文教衛生、城鎮建設、水利建設、農業生產、禁毒禁種、替代種植、交通能源事業等都取得了空前的繁榮和發展，佤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禁毒鬥爭的勝利，受到了聯合國禁毒署和中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

經過佤邦 20 年的和平建設和不懈努力，過去那令人談虎色變的金三角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片片橡膠林、甘蔗地、果園、稻田等替代種植的農作物，公路、大橋、電站、廠礦、學校、繁華的街道集市、公私豪宅隨處可見。佤邦聯合黨和緬甸第二特區（佤邦）政府所在地邦康也由原來 10 多間茅草房和 4 個傣族村寨，而今已是高樓聳立，車水馬龍、入夜燈火輝煌、商鋪林立，電視電話通暢，搖身一變成了一個繁華小鎮。佤邦呈現出一片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大好局面。

二，緬甸共產黨及緬共中央遺址介紹

緬甸共產黨始建於 1939 年 8 月 15 日，于 1948 年建立軍隊並開展武裝革命鬥爭，曾經取得過重的勝利。1950 年因與克倫族統戰部隊關係破裂，導致第一次武裝鬥爭失利，被迫撤入山區開展遊擊戰。從 1968 年起進入緬甸北部地方開闢革命根據地，1969 年 9 月進入佤邦地區，建立了各級政權組織及軍事防區。1978 年緬共中央緬共中央機關被迫從下緬甸的勃固根據地遷至東北根據地的佤邦邦桑。（現今的邦康），在此領導和指揮全國的革命運動，取得了若干戰役的勝利，創建了沿中緬、泰緬邊境部分地區的遼闊根據地。1985 年 9 月緬共中央委員會在現今的幫康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會的領導班子。並多次在此舊址處召開了中央全會和重大軍事會議，邦桑曾是緬甸共產黨開展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地方政權的指揮中心。

由於國際社會的風雲變幻和緬共後期執行錯誤路線，緬共中央主要領導年齡老化，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十分頑固，20 多個中央委員平均年齡超過 60 歲。大民族主義、宗派主義日趨明顯，幹部中培植親信，拉幫結夥。不斷地在黨政軍內推行極左路線、運動不斷、整人不休、搞紅色恐怖搞得人人自危，時至 80 年代，

緬共推行的極左路線堪比當年的中國，階級鬥爭越搞越激烈。導致緬共領導出現分裂、緬共中央大權旁落、戰亂加劇、民不聊生、部隊供應短缺、根據地不斷縮小，甚至步入了以毒養軍的地步。

1988 年底緬共的敗相已露，部隊供給困難、軍心渙散，軍人紛紛請假回家長期不歸。從 1967 年就追隨緬共出生入死的彭家聲、彭家富處處受到排擠不得重用，再跟著緬共幹下去已沒有前途，所以決心脫離緬共另樹旗幟，於 1989 年 3 月 11 日宣佈脫離緬共，彭家聲打出了“果敢同盟軍”的大旗，與緬共分道揚鑣，對在果敢的緬共幹部准予退伍回家。但緬共中央不僅沒有看到自己已是四面楚歌、搖搖欲墜，而是企圖用武力解決果敢事件。專門成立了軍事指揮部，命令當時任北佤縣長兼 12 旅旅長的趙尼萊、中部軍區副司令鮑有祥前往鎮壓。趙尼萊、鮑有祥等緬共將領早就看到緬共中央大搞宗派鬥爭，大緬族主義愈演愈烈，把矛頭首先對準屢立戰功的彭家聲、彭家富兄弟，又對貴州老兵、湖南籍老兵、克欽族、佤族及佤邦地區的少數民族和中國知青進行清洗、打壓，更加要命的是緬共中央在排擠忠心耿耿追隨緬共幹革命的各族緬共將士的同時，不加考察就重用從下緬甸上來的緬族人和參加過緬甸 1988 年“8.8”民主運動的緬族青年，而這其中有不少人是緬甸軍人政府派來的特務，輕而易舉的打入緬共內部，甚至打入緬共核心，緬共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趙尼萊、鮑有祥等早有脫離緬共、取而代之的想法，緬共命令趙、鮑二人前去鎮壓彭家聲的指令變成了催化劑，趙、鮑二人決定 1989 年 4 月 17 日起事。鮑有祥運籌帷幄坐鎮邦盆進行指揮，不到一天的時間，用極小的代價取得了成功，原緬共中央的要員 200 餘人基本抓到，起義部隊問那些緬共中央委員他們要去哪里？他們回答要去中國。起義部隊就把這些緬共中央領導和隨行人員 200 餘人全部安全送過南卡江到了中國孟連的孟

啊，因德欽巴登頂主席年邁有病，起義部隊用輪椅做成擔架後抬到江邊，這時德欽巴登頂主席請求說“我願意留在緬甸，發一隻槍給我和大家一齊幹革命”但還是把他安全送到江對岸。

緬共中央流亡到中國孟連後，德欽巴登頂在孟連主持召開了緬共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將兩名劣跡斑斑、重用從下緬甸來的青年中的軍人政府派來的特務，且在黨內軍內大搞分裂、結怨最多導致緬共垮臺的罪魁禍首開除出黨，但已經無法挽救緬共滅亡的命運了。最終緬共被迫於 1989 年 4 月退出佤邦及歷史舞臺，最後落得個緬共中央沒有一片立足之地，沒有一卒追隨的境地，流落到中國的緬共中央領導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妥善安置，並在中國內地頤養天年，這在共運史上實屬罕見，如今在幫康所能見到的只是幾排破爛的、令人心酸的緬共中央遺址。

三，部分緬共中國知青仍為佤邦的和平建設和繁榮發展做貢獻

1968 至 1978 年間，約有 3 萬中國邊民（當然包括知青）踴躍參加緬共人民軍，平均每年有近 3 千人自願赴緬參戰。曾經是紅衛兵的緬共知青他們不怕流血犧牲，站在大廝殺、大搏鬥的前線，起著核心與中堅的作用。他們的大多聰明智慧、角力鬥智、橫刀立馬、馳騁疆場。1968 至 1976 年軍齡在一年以上的中國知青兵有 800 多人，共有 600 多名中國知青戰死疆場，（見張建章為“紅飛蛾。叢林煉獄”作序）這批中國知青來自北京、上海、成都、重慶、南寧、武漢、長沙及昆明，更多的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雲南回鄉知青。他們的加入，極大地提升了緬共叢林遊擊隊的文化素質和軍事素質，在眾多的緬共王牌部隊裏，中國知青占了一半、甚至有的部隊裏中國知青占了三分之二，經過多年革命戰爭的歷練，他們有的成為軍中骨幹、軍隊的旅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有的還當了緬共中央候補委員。許多知青老兵成了緬共軍校、炮校、醫校、電臺通信等方面

的骨幹與專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將走出原始部落的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戰士帶成了一支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為緬共立下了汗馬功勞，挑起了緬共革命的功勞。時光走過 40 餘年，昔日龍騰虎躍、敢於拼殺、含笑赴死，曾經輝煌的緬共老兵們正在消失。他們在戰勝苦難和死亡中戰勝了自己，用血淚譜寫了一曲曲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戰歌。

據瞭解，緬共退出歷史舞臺，佤邦與緬甸聯邦政府達成和平停戰協定，緬甸聯邦政府授予佤邦“緬甸撣邦第二特別行政區”，對佤邦實行民族區域高度自治，佤邦人民與緬甸聯邦政府一起攜手走上了和平建設國家，建設美好家園的康莊大道後，當年參加緬共人民軍的部分昆明知青和來自雲南及全國各地的知青、華僑知青仍然守望在金三角地區，這些年過花甲的軍旅鬥士，他們有的在緬甸 4 個特區擔任軍政要職，有的已經棄甲歸田，他們仍然在為緬甸的和平建設、繁榮發展做貢獻。這些原緬共人民軍裏的中國知青，每一個人都是一部不同凡響的奇書、他們戎馬一生，從平民到將軍的傳奇故事令人歎為觀止。他們前 21 年為緬共打江山出生入死，後 22 年為金三角的和平發展嘔心瀝血。正如緬甸撣邦第二特區主席鮑有祥所說：我們這一代人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終結了緬甸共產黨在佤邦的領導、二是打垮了坤沙集團、三是在佤邦禁種了罌粟。的確，目前佤邦的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走在了緬甸的前面，令世人矚目。

四，佤邦及各和平組織在前進的道路上仍面臨風險和荊棘

緬共垮臺後佤邦和果敢、撣邦、克欽獨立軍、克欽 101 軍區、撣邦第四特區等武裝於 1989 年與處於內外交困的緬甸軍人政府達成了沒有文字的口頭停戰協定，佤邦按照果敢模式停止戰爭、接受軍人政府的領導，佤邦成為國家的一個行政單位即緬甸撣邦東北第二特區，實行高度民族區域自治。因此緬甸國家有了近

20 年的相對和平發展，軍人政府得以做大，緬甸民族和平組織的和平建設、繁榮發展得到保障。

2009 年，在緬甸國內基本穩定，軍人政府已牢固地控制了國家政權的情況下，2009 年 4 月 23 日接緬甸國防部軍事安全局局長耶敏中將率團訪問佤邦，商討“和平組織轉變、過度”，並通報緬甸軍人政府已成立了由丹瑞主席親自擔任主席的“過渡時期政策委員會”。方案將佤邦聯合軍納入法律範圍，稱為“和平部隊”，要把他整編為國防軍司令部統帥的邊防部隊，部隊成員按國家公務員的要求，年齡限制在 18 至 50 歲，（佤邦的核心領導的年齡大多都是在 60 左右）並讓現任領導放心、不應該有什麼顧慮，“都安排好了”。佤邦聯合軍整編後政府軍要派一部分人員參與領導，政府軍要每個營都派 3 個工作人員配合工作，實質是把佤邦聯合軍化整為營進行控制，並將在 2010 年緬甸的全國大選後，佤邦將以佤族自治州的形式確定。同時將原屬佤邦的幾個區劃出佤邦的管轄。軍人政府還劃出放棄武裝、放棄武器的最後期限為 2010 年 9 月 1 日為最後時限，如不放棄武裝，超過所規定的時限，繼續持有武器的話，即將被定性為原先的叛亂分子，國家有制止這些非法行為的職責。甚至發出恫嚇：要求佤邦談判代表轉達給鮑有祥一句話：‘佤邦方面還存在著所謂 8 個人、21 位名單的國際壓力’問題。（即被國際組織上定為大毒梟或恐怖分子）

當然佤邦聯合軍和佤邦聯合政府不會接受接受緬甸軍人政府的無理要求和恐嚇，整編破產。2010 年 9 月 3 日軍人政府撤走了在佤邦、撣邦第四特區、克欽邦、獨立軍等處的所有人員，中斷了正常往來。2012 年緬甸軍人政府與克欽邦發生的戰爭衝突，就是圍繞著要求克欽邦放下武器，整編為緬甸政府邊防軍的問題談談打打。





第十二節 四十年後回頭看——空前絕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一、昆明十年知青潮

1968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話（當時稱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從此在全國拉開了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大幕。從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時間裏，全中國大約有2000萬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去到農村（農場）生活和勞動。

這些“知青”絕大部分是初、高中畢業生，也有少量知青只是小學畢業，因受“文革”耽誤已到了15、16歲，也被安排上山下鄉。主動要求到農村去的知青很少，絕大部分人都是根據當時的政策不得已而“上山下鄉”的。如果不去農村，在城裏是不可能就業、上學或者入伍的，甚至可能連糧食供應和戶口都沒有。所以，當時這些城市青年基本是沒有選擇的，只能無條件地服從安排到農村去，只有病殘者、獨生子女，或者兄弟姐妹中已有多人下鄉而父母身邊僅剩一人的，才可享受政策照顧留在城裏。

當時中國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涉及“知青下鄉”。多數家庭至少有一個孩子下鄉，還有的家庭裏幾個孩子都下到了農村。當時全中國的城市人口也不過2億人，2000萬“知青”下農村，也就意味著中國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到了鄉村。所以，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確實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少有的從城市到鄉村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下鄉知青一般在農村少則2、3年，多則7、8年，都在艱苦的環境中度過了他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

“文革”期間，許多事情都以“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知青下鄉是涉及千家

萬戶的大事，因而也是一個重要的“運動”。各地在動員和組織工作完成後，一般都要召開熱烈的“歡送知青上山下鄉大會”，領導發表講話，知青代表、家長代表也要講話，慷慨激昂地表決心。即將下鄉的知青們披紅戴花，然後敲鑼打鼓地把他們送到農村。這類場面通常都很熱鬧，知青們也很風光，但到了農村之後的艱辛和困難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據統計，1969—1979年期間，昆明市共有78570名知青上山下鄉。這7萬多人又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1969—1972年下鄉的，這些人主要是去滇西（當時被稱為“外五縣”的潞西、隴川、盈江、梁河、瑞麗等地）的農村插隊或者到邊疆農場（當時叫“生產建設兵團”）當農工，共有3萬餘人；第二部分是1973—1979年下鄉的，這一部分知青主要是在昆明市的安寧、晉甯、呈貢、富民、官渡、西山等郊縣區的農村插隊，共有46000多人。

1969—1972年從昆明到“外五縣”插隊的知青主要是按知青畢業的學校進行動員和安置的，而1973—1979年在昆明郊縣區插隊的知青則是根據家長所在單位進行組織動員和安置的。後來也有人把1969—1972年下鄉的那些昆明知青稱為“老知青”，把1973—1979年下鄉的昆明知青稱為“小知青”。

在昆明郊區插隊的知青到農村後一般都組成知青集體戶，人數從三、五人到一、二十人不等。早期下鄉的知青戶多被安排在生產隊的集體公房裏，後來下鄉的知青多了，便由市縣、知青家長所在單位和當地農村（社隊）共同建蓋知青房。知青們與農民一起勞動，下工後便回集體戶生活。也有少數知青因有文化（或被照顧）擔任了農村的赤腳醫生、民辦教師、會計員、農科員等。插隊知青一般在農村幹幾年後，便可通過招工、招生、參軍等方式離開農村。同時，每年又有新的知青不斷從城裏下到農村來。這樣，插隊知青們來的來，走的走，最後沒有形

成農場知青那樣集中返城的“大潮”。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全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就進入了尾聲，到1979年便最終停止了。據有關資料統計，1971年到1980年，在昆明郊縣區農村插隊的46000多名知青中，先後有44466人以招工、招生、參軍、病退等形式離鄉返城。到1980年底，除少數留在農場和在農村安家的外，昆明郊縣區99%的知青都離開了農村。

在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時間裏，昆明與全國一樣，一批又一批知青們滿懷激情、熱熱鬧鬧地從城裏去到農村，後來又一撥接一撥懷著複雜的心情離開農村，返回城市。十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就像大海邊起落的潮水，嘩啦啦地漲潮，又呼啦啦地退潮，最後幾乎沒有在海灘上留下什麼痕跡。

二、我在呈貢插隊的四年

“文革”期間，我1969 - 1971年讀了兩年初中，1971 - 1973年又讀了兩年高中（昆明第十中學），於1973年10月到呈貢縣龍街公社小古城大隊插隊，算是所謂的“小知青”中最早的一批。

呈貢屬於昆明近郊縣區，從縣城到昆明只有20多公里，條件相對好一些，是當時知青選擇的熱門插隊地區。據有關資料，從1972年到1979年，共有6313名昆明知青先後下到呈貢縣，被安置在全縣6個公社的50多個生產大隊裏。

我們這一批到小古城大隊插隊的共有9個知青，分為三個集體戶安排在三個自然村（小古城村4人、西波村3人和麻莪村2人）。我和另外兩個男知青（康寶成、張興華）、一個女知青（朱秀萊）組成了小古城村的第一個知青集體戶。剛到時沒有地方住，生產隊就把碾米房騰出來讓我們臨時安身，西波村的三個女

知青則被安排在豆腐房。我們在碾米房一住就是兩年多，後來才搬進了新建的知青房。

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尤其是我們下鄉的小古城大隊，是呈貢縣的糧食主產區之一，人口不算多，但土地面積大，山坡上有山地，村子周邊有水田，當時基本沒有什麼農業機械，所有農活全靠人力，因此勞動強度很大。除了春節可以休息幾天，一年到頭基本上沒有閑下來的時候。

最辛苦的是春耕和秋收季節。春耕時的一項重活是用二齒（一種只有兩個齒的耩耙）挖田，幾天下來，手掌上滿是血泡。還有就是往田裏送肥料和送稻秧，要肩挑一百公斤左右的擔子走一、兩公里路。秋收時白天割穀（稻）子、挑穀子，晚飯後還要在場上加班打（脫）穀子，到半夜下工時人累得像癱瘓了一樣。

對於當時不到二十歲，過慣了城裏生活的年青人來說，農村生活確實是一種挑戰。我們不僅要承擔高強度的勞動（與當地農民幹完全一樣的活），下工後冷鍋冷灶，還要自己燒火做飯；而村民們家裏有人，回家就有熱飯吃。知青才到農村一無所有，既沒有菜，更沒有肉，常常就是一點鹹菜下飯。而村民家有自留地可以種菜，可以養豬養雞，因此吃的也比知青好。從這一點來說，知青的生活比當地農民還要苦。

當然，由於土地多，一年辛苦下來，除了完成上交給國家的公糧任務外，生產隊也能剩下不少糧食，吃飽飯是沒有問題的。生產隊裏還辦了一個小鑄造工廠，有一點副業收入。這樣，小古城的 10 個工分（一個壯勞力一天的工分）值可以達到一塊錢左右，在當時算是比較高的收入了（有的生產隊 10 工分只合 4、5 角錢，甚至 1、2 角錢）。我記得，我下鄉的第一年年終結算時，共有 2000 多工分（知青不能算壯勞力，每天只能有 8 - 9 分；而且也不可能全出勤），

扣除糧食錢外，分得了 160 多塊錢，在當時算是很可觀的一筆錢了。

下鄉第二年後，我們知青戶也分到了自留地，開始種一些蔬菜，後來還養了幾隻雞和一頭豬。年底殺了豬做了一些鹹肉，還學著醃了一些鹹菜，生活有所改善，對農村生活也逐漸習慣了。村民們看到我們幹活賣力，能吃苦耐勞，不會幹的農活虛心向他們請教，因此大多數村民，無論年長的還是年青的，對我們都很友好，常常在勞動中和生活上給我們許多幫助。一些年輕人還成了我們知青的好朋友，直到多年後仍保持著聯繫和來往。

當時像小古城這樣的壩區農村一個很大的困難是缺乏燃料，當地既沒有煤也沒有柴，村民們做飯主要靠燒麥秸和稻草。我們幾個知青從書報上看到可以用沼氣做燃料後，就在大隊支部書記徐志的支持下試建了一個沼氣池。當我們開始使用沼氣時，村民們都來知青戶看新鮮，看到居然能用豬糞牛糞加雜草產氣煮飯、點燈時，無不嘖嘖稱奇。此事經縣上報導後，一時間全縣各地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由於當時我們設計的沼氣池不夠科學，輸氣管等材料的品質也不好，用了不到一年後就廢棄了，但我們知青戶畢竟是呈貢縣最早開始嘗試使用沼氣的。直到十多年後的 80 年代末，呈貢縣（以及雲南其他地方）才在政府的支持下在農村推廣普及沼氣。

由於我們小古城大隊知青戶表現好，連續幾年都被評為公社和縣裏的先進知青集體戶，我本人也先後被評為縣級和市級的先進知青，到縣上和市里出席過先進知青代表會。我在中學時加入了共青團，下鄉第二年後就擔任了小古城大隊的團支部書記，第三年又被任命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當時小古城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徐志一心希望我長期留在農村（當時叫做“紮根農村”），多次動員我入黨。但我卻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不想在農村永遠“紮根”，所以始終沒有寫入黨申

請書，徐支書為此一直耿耿於懷。

下鄉時我從家裏帶來了一些書，主要是中學的數、理、化、歷史、地理、英語等教科書和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我們這批知青都還比較好學，當農閒或下雨不出工時，大家就在知青戶裏看書學習。“文革”期間中學上得很馬虎，反而是在農村的幾年裏，我還自學了不少東西。當後來有機會考大學時，成績居然還不錯。我們後來把這種在農村仍然堅持文化知識學習稱為“念早稻田大學”。

到 1976 年，與我同時下鄉的 8 位知青都陸續參加招工、招生離開了農村，原來的集體戶只剩下了我一個人，甚至連那些比我晚一、兩年下鄉的知青也開始離鄉返城了。當時我沒有急於離開，一是因為當地徐志支書等農村幹部的熱情挽留，而自己也已適應了農村生活；更主要的是我不想直接參加工作，而是希望能進大學學習，畢業後再工作。就這樣，一直到 1977 年底我通過考試被昆明工學院錄取，如願以償地成了一名大學生後，才離開了小古城村。

19 歲下鄉，23 歲離開，我在農村整整勞動和生活了四年。雖然後來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成了大學老師，後來又多次出國進修、講學、研究，但四年的農村生活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年來，我不時會在夢中回到小古城村，也時常會回味那些雖然艱苦但卻值得懷念的歲月，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知青情結”吧。

1993 年和 2008 年，我們幾個知青曾兩次相約回到小古城探訪。但發現早已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滿眼都是陌生的景象了。當年我們住過的碾米房、豆腐房早已不復存在，到處都是村民們新蓋的房子；連我們原來種過的自留地，現在也分給村民蓋起了新樓房；村子裏遇到的人多數都不認識了；一打聽，徐志支書、王舉隊長等幹部都已去世；找到當年熟悉的青年朋友家中，見到的也是一張張蒼老而

陌生的面孔……

三、四十年後的評說

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過去了整整 40 年，當年那些意氣風發、充滿青春活力的知青現在大都已年近花甲、兩鬢斑白，即將退休或者已經退休了。今天重提“知青”這一話題，除了會帶來一些懷舊的傷感外，更多的應該是引起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反思。

毛澤東宣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般認為主要出於兩方面的動機：一方面是理想主義動機，讓年輕人到農村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鍛煉自己，最終“消滅三大差別”；另一方面則是現實主義動機，“文革”後期城裏解決不了大批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升學問題，必須儘快為他們找到出路，免得他們在城裏“造**”添亂，“上山下鄉”便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也都有根據，但從毛澤東的思想和性格來看，理想主義的色彩可能更濃一些。

在 10 年的時間裏，將 2000 萬年輕人從城市送到農村和邊疆，波及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也幾乎涉及到每一個家庭，如此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發生，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而且我相信，今後也不會再有。它確實是毛澤東一次空前絕後的超大規模社會實驗！

然而，可悲的是，這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實驗最終卻以失敗告終。“上山下鄉”運動既未能實現“消滅三大差別”的理想，也未能解決現實的經濟社會問題（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轟轟烈烈的 2000 萬知青上山下鄉大潮，後來也退落得一乾二淨：不僅到農村插隊

的知青都走光了，那些去到邊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也基本走光了。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可以說是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蓋棺定論。

從歷史的角度、國家的角度可以這樣來評價“知青運動”。但是，作為個人，尤其是我們這些“知青運動”的親歷者、參與者，又應該如何來看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呢？

知青中對“上山下鄉”運動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種是完全負面的看法，認為“上山下鄉”坑害了一代人，耽誤了這一代的青春，使他們失去了上大學、出國、享受家庭溫暖的機會，讓他們吃了許多苦、遭了許多罪。還有的人甚至把“上山下鄉”說成是一部“知青血淚史”、一場“噩夢”，認為知青下鄉是遭受政治迫害、是“變相勞改”，下農村如同下地獄，青春被埋葬，是人生中最黑暗、最悲慘的時期；… 作為一個下過鄉、吃過苦的知青，我對這樣的說法總是嗤之以鼻。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即使不下鄉，城裏的生活比農村也好不了多少，一樣也要吃苦，更談不上出國、上大學了。即便是改革開放的今天，也並非人人都能上大學、出國。因此，不能把一切不幸和痛苦都歸咎於“上山下鄉”。那些不過才下了幾年鄉就對上山下鄉運動喋喋不休進行“血淚控訴”的人應該想一想，當地的農民們終生在鄉下勞作，種出糧食養活了城裏人，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難道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該一輩子在農村吃苦受罪？

另一種看法則正好相反，熱情歌頌、讚美“偉大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一種無私的奉獻，他們獻身農村，獻身邊疆，為祖國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知青們把文化知識帶到農村，縮小了城鄉差別；知青們在農村戰天鬥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自己也在精神上接受了洗

禮，思想得到了昇華；因此，知青們付出的青春年華是值得的——“青春無悔”！

但我覺得，也不能把“上山下鄉運動”看得那麼美好，它畢竟是一種在特殊年代裏的一種非常措施，是一種逆時代發展潮流的運動。正如前面所說的，知青下鄉是毛澤東一次不成功的社會實驗，也是他“文革”錯誤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整個國家、整個社會處於一種不理性、不正常的狀態下，知青們能有多大的作為，知青運動能“偉大”到哪里去？

總之，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理性、客觀地來回顧這個運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上山下鄉”是一個不成功的運動，它沒有真正推動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且給許多家庭和個人留下了一些難以平復的創傷。但從知青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在這個運動中並非一無所得。首先，上山下鄉使我們認識了農村，瞭解了農民，看到了城鄉間的巨大差距，同時也獲得了許多在城市裏和課堂上難以獲得的人生營養。譬如，我們常說“吃過農村插隊的苦，就再沒有吃不了的苦”。這難道不是一種寶貴的人生收穫嗎？

其次，上山下鄉使我們這一代人自覺不自覺地養成了一種不畏艱苦、不甘沉淪、堅韌頑強、奮發進取的精神。儘管當時確實有少數知青由於看不到前途，在鄉下消沉頹廢，偷雞摸狗，打架鬥毆，但大多數知青是努力向上的，他們腳踏實地、辛勤勞動；他們努力學習，勇於思索；他們熱愛生活，團結互助；他們與當地農民同甘共苦、友好相處；他們在前途迷茫時不自暴自棄，對未來充滿希望……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知青精神”。

著名學者秦暉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否定“知青運動”並不等於否定“知青精神”。雖然那場悲劇性的“知青運動”是失敗的、是值得反思的，但是，那種與命運抗爭、努力奮鬥的“知青精神”卻是值得弘揚的，甚至是應該歌頌的。

第十三節 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中發〔1973〕30號

一、中共中央檔

毛主席已圈閱。

中央同意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報告，現在轉發給你們，望認真貫徹執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各級黨委要以批林整風為綱，以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教導為指標，層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糾正不正之風，以極大的熱情和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做好這項工作。應組織力量，深入群眾，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嚴格地全面地進行檢查，抓緊解決目前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並且總結經驗，表揚先進，推動全面。

此件發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級黨委，傳達到城鄉廣大群眾和知識青年。附件發到省、市、自治區黨委，望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本地區的具體規劃和實施辦法下達。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

（發至縣、團級）

二、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毛主席、黨中央：

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復信，傳到了全國。熱烈地學習討論中央 21 號檔，成為城鄉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為推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其他工作的強大動力。

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大好形勢，檢查了當前存在的問題，研究了統籌解決的辦法。

在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全國已有八百多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農村和邊疆的各條戰線上。這股革命洪流，猛烈地衝擊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輕視農業勞動、看不起農民的舊思想、舊習慣。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在各級黨委的領導和貧下中農的關懷下，廣大下鄉知識青年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做出積極貢獻，湧現出大批先進集體和邢燕子，侯雋式的先進人物。他們中間，有從天津市到山西平陸縣毛家山插隊的三十名青年和一名教師，同貧下中農一起，艱苦奮鬥，糧食總產量三年翻了一番。河南光山縣孫鐵鋪公社鄭堂青年生產隊，在貧下中農協助下，艱苦創業，一年建隊，二年自給，三年有貢獻，四年糧食總產從七萬斤增加到二十萬斤，棉花地拉沙改土，加強管理，使畝產從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某部由知識青年組成的擔架連三排，在珍寶島反擊戰中，配合邊防部隊，為保衛祖國領土立了功。在雲南猛臘縣山寨紮根的上海知識青年朱克家，成為愛尼族人民最喜愛的多面手。河北涿鹿縣的插隊知識青年程有志，在培育優良品種方面做出了顯著成

績。在陝西延川縣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孫立哲，成為能做較大手術的赤腳醫生。到黑龍江農村的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為了搶救社會主義財產，光榮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經過實際鬥爭鍛煉，廣大下鄉知識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斷成長，已有五萬九千多人入黨，八十三萬多人入團，十四萬多人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更多的人成為各種各樣又紅又專的人材。

毛主席指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豐碩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充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鬥爭。

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反修防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貧下中農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狀況如何，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既能經風雨、見世面，得到很好的鍛煉，又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增添力量，有利於密切城鄉關係，加強工農聯盟。這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有很重要的意義。

劉少奇和林彪一夥為了達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瘋狂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散佈“讀書做官”、“下鄉鍍金”，“變相勞改”等反動謬論，刮起“走後門”等歪風邪氣，妄圖毒害和爭奪青年一代。

在這樣一場激烈的鬥爭中，我們有些同志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理解不深，有些同志中了劉少奇和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和舊習慣勢力的影響，工作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的有些領導幹部，把這項重大戰略部署當作臨時措施，抓得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不少下鄉知識青年生活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培養、教育無人過問。有些領導幹部“走後門”，把子女留在城市或者調離農村。一小撮階級敵人和蛻化變質分子，極力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他們甚至篡奪了個別單位元元元的部分領導權，實行法西斯專政，殘害下鄉知識青年，而我們有些領導同志對迫害、摧殘下鄉知識青年的犯罪分子打擊不力，有的甚至縱容包庇。

我們必須以批林整風為綱，以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復信和有關教導為武器，發動廣大群眾，開展革命大批判，肅清劉少奇和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提高路線鬥爭覺悟，糾正不正之風，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健康地發展。

三

怎樣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存在的問題，會議討論和議定了六條統籌解決的辦法，並起草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

（一）各級黨委要深入學習、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有關指示，層層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對下鄉知識青年的全部情況嚴格進行檢查，總結經驗，加強領導。縣以上黨委，都要建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得力的辦事

機構，並由一名書記主管，組織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力量，滿腔熱情地積極地做好這項工作。

（二）切實解決下鄉知識青年在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實際困難。對已經下鄉插隊生活困難的，國家要給以必要的補助。今後安置經費要適當增加。

（三）大力加強對下鄉知識青年的培養教育。適當安排業餘時間，積極組織他們攻讀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有關部門和科研單位要組織一定的力量，輔導他們學習文化和科學技術。充分發揮青年人的敢想敢說敢幹的革命精神和他們的特長。積極培養和吸收具備條件的青年入團、入黨、參加各級領導班子。特別要注意對女青年的培養使用。青年有了缺點錯誤，要耐心說服教育，絕對不能採取簡單粗暴態度。認真落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不要歧視他們。下鄉青年檔案填寫混亂和錯誤的，要進行清理。

（四）堅決剷住“走後門”的不正之風。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1972）19號、40號，44號文件中有關制止和糾正“走後門”的各項規定，必須告訴廣大群眾都知道，發動群眾監督執行。領導幹部“走後門”的，要主動檢查，堅決糾正。今後要嚴格制度。違反的，不但要把他們的子女退回去，並且要給予紀律處分。

“走後門”的責任在家長，對於青年本身要做細緻的思想工作，鼓勵他們上山下鄉，不得歧視。

（五）發動廣大群眾，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作堅決鬥爭。對於以法西斯手段殘酷迫害知識青年和強姦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懲辦。犯罪分子為掩蓋罪行對受害人進行威脅、對檢舉人進行報復的，要從嚴懲處。對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舉行公判，堅決殺掉。殺人要嚴格控制，

不可多殺。坦白認罪好的，可以從寬處理。要保護受害人的名譽和安全。要保護青年之間的正當戀愛和婚姻。嚴禁逼婚。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警惕階級敵人擾亂我們的陣線。

(六)今後每年將有大批的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紮根落戶，有關部門和省、市、自治區要作出長遠的全面的規劃，同整個經濟建設、開發邊疆和文教科研的規劃銜接起來。

今後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採取以下四種形式：1、插隊，要適當集中，建立青年點，有條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戶；2、以下鄉知識青年為主，由帶隊幹部和部分貧下中農參加，在人民公社裏建立集體所有制的青年隊；3、在土地比較多的地方，單獨建立以下鄉知識青年為主，由帶隊幹部和部分貧下中農參加的集體所有制農場；4、到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林、牧，漁場。

各級黨委要先抓好三分之一，派出得力幹部，把知識青年集中的地方和單位辦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農業先進單位，辦成亦農、亦工、亦學、亦兵的大學校。

現在，全國已有許多先進單位開創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好局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各級領導要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並且積極推廣，充分發揮先進榜樣的力量。他們能夠做到的，別的單位只要認真學習，努力工作，也一定能夠做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五十年內外，一百年內外，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時代。我們國家的面貌，特別是廣大農村的面貌，將要發生極大的變化。要鼓舞廣大下鄉知識青年，樹立雄心壯志，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裏紮根成長，同貧下中農在一起，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做出重大貢獻。

以上報告，是否妥當，請指示。

國務院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根據中央文件附件宣傳提綱

現將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知青會議報告講解發給你們，望宣傳執行。

- 一、 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黨中央關懷下召開的，6月22日到8月7日結束。有28個省、市、自治區、11個大軍區、5個生產建設兵團，123人出席會議。中央、毛主席十分關懷。毛主席給李慶林復信，中央政治局進行討論，國務院派了12個調查組，總理親自起草的21號文件，親自向主席寫了報告。會議期間總理和其他中央同志參加，檔改了12次。國務院、政治局各二次。8月4日呈送主席批示。當天主席批示。8月6日接見了全體到會同志。周總理和其他同志作了重要講話。非常重視、關懷。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給李慶林的復信，嚴格地檢查總結。中央反復指出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用毛澤東思想去解決各項具體困難。會議分析了知青上山下鄉的大好形勢，總的是好的。已有870多萬人戰鬥在農村，湧現了大批先進集體、個人。他們經過實際鬥爭，在思想、政治上大大提高了。各級黨委、貧下中農做了大量的工作。整個社會風氣大大好轉。在前進中存在著問題有的還相當的嚴重，揭露了矛盾，統一了認識，存在主要問題有：
 - 1、有些地方部門不重視，有的領導說是管頭等大事，生產不抓不行，有的沒有無產階級感情，只管自己子女，有的抓的不緊。

- 2、有些領導幹部走後門，到會同志分析了危險性，腐蝕廣大群眾，影響了黨群關係。
- 3、有些插隊青年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長期借住社員房子。
- 4、有些地區摧殘迫害知青，周總理對新華社記者寫的摧殘事件，總理看了這些材料立即指示，此等法西斯行為非立即處理不可。各級黨委嚴肅處理。先念、紀登奎等同志也做了批示。把摧殘作為一般的問題，會議的同志看了非常氣憤，工作中出現了很多問題。

二、 根據政治局的精神及 30 號檔的精神解決方法

- 1、第一步是對各級黨委講的，要做好工作，會議期間中央領導同志說：知青上山下鄉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大事，是意識形態的一場戰爭，是衝擊剝削階級看不清農村的思想，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環節。我們的農業還在過關中。蘇聯搞了 50 多年還沒有過關，我們還不到他們一半的時間，現在能生產 5 千億斤糧食，下鄉知青有文化，要把建設新農村看成是世世代代的長期事業，戰略措施。新農村委不斷充實。現在有 950 萬平方公里，圍河不行，圍海還可以，江蘇、浙江、山東、遼寧都可以圍海造地。只要人口有計劃增長，糧食還可以。當然各地不平衡了。有的地方還很困難，因此要有更多的人到農村去，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

中央領導同志指出：搞好知青工作要抓思想路線，抓左還是批右，林的實質是右，中央已經提出右到不可以再右了。毛主席有一篇著名的文革“青年運動方向”批判了孔子他們不會勞動，不會種田。我們這條路線與孔子完全相反。知青工作做好本身就是一場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還長，鬥爭還多，

要與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作鬥爭。我們還準備經歷各種各樣的鬥爭。文件規定建立知青辦公室，要設在各省、市、自治區的議事日程。

- 2、規定要切實解決口糧，住房困難。這次有了明確的規定（1）關於經濟、生活不能自足，每人補助 100 元，沒有建房 200 元。從 1973 年安置經費適當提高。回農村老家插隊，集體農場，南方各省 480 元，北方各省包括蘇北、皖北 500 元，到內蒙，新疆牧區 700 元，建設兵團、國營農場 400 元，安置經費省市自治區、地、縣根據情況統一掌握。越是偏僻的地區要多一些。蘇修到邊疆牧馬，我們不是這樣做，我們實事求是。造房子的問題要給木頭，房子不准挪用，挪用要退回，處分。北京、天津、杭州、上海到外省插隊路費報銷，到高寒地區冬天 40 元，到邊遠地區領二次車費。吉林、黑龍江、新疆、貴州、雲南包括以前下鄉的，國家要多拿出十幾個億。問題在我們的工作，如工作排不好，再加上 400 元也不行（2）衛生醫療主要辦好社隊的合作醫療。衛生部門要每個青年點培養赤腳醫生，特別照顧女青年的生理特點，有的地方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重傷。經縣團級批准可當地醫院看病。探親期也可以到市醫院看病。男青，女青是對勞動力，誰不是母親生出來的。中央領導同志說：有的地方招工不要女的，女的留下重男輕女，招工這樣是錯的。中央領導同志說：計劃生育與知情分不開，每年 100 多萬人下鄉到處宣傳，這就是最大的宣傳，不能放鬆計劃生育工作。（3）口糧，插隊第一年與當地秋糧分之前由國家統一分配，參加勞動後，既要按勞分配，也要給予照顧，正常出工的國家補助。有些隊口糧補助青年標準由各省制定，當地糧食部門要保證調換全國糧票。（4）其他問題：“知青”要與當地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不能以任何藉口扣除工分，招工經知青小組評議，由帶頭領導同意，經縣團批

准，其他單位不准隨便到隊裏招工。(5) 病假不能參加農業勞動；獨苗，子女只有一個留在身邊，外國人中國籍不動員下鄉。歸僑另外安排。礦山、森林等可以退休工人頂替，或職工子女招工。上海準備有計劃安排。

3、大力加強知青教育。中央領導同志說：上層建築路線鬥爭長期存在，今後要在三大革命運動鬥爭中提高三大覺悟。這個工作本身就是上層建築的革命，要關心哲學、歷史、駕馭革命。現在工人精神。糧食少，我們有責任，出版書比較少，各方面的書都要出版，不僅出自然書而且要出文藝書。電影少，知青要看書，要看人民日報，知青把文化帶下去，農村不稀罕勞動力，主要是文化教育。中央領導同志說：要看他們安排時間馬列文化，中央，毛主席希望知青有 2 個小時學習時間。公社要保證，要細水長流，要雷打不動，其他書都要看，可以打打球，看看電影，學習馬列著作，可以抵制逆流，要提高識別能力。如遼寧的張鐵生就是一個例子。他搞教育就行。要學點文學，歷史，科學知識，不這樣馬列看不懂。文學作為很重要。主席最近講，我們黨還沒有馬列主義的理論觀點寫出對紅樓夢的評價。這樣的書不讓我們的後代看，怎麼能不知道封建社會，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形象化地寫出了封建社會。還有一些其他的書籍。青年各種思想都有，有的對農村生疏，要引導好，這樣才能站得住。還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鼓勵他們不要灰溜溜，要重在政治表現，對幹部，貧下中農也要鍛煉。

4、堅決剎住後門的歪風。界線：1972 年 19 號檔要防止高考走後門；40 號文件參軍走後門；44 號文件招工走後門。在三個文件以前是教育。個別情況惡劣，群眾意見大的要處理。文件下達後要處理。進行紀律處分，要退回。走後門的責任在家長，對青年做工作，不能歧視，必須告訴群眾，監督執行。中央

領導同志說：拖子女後腿，主席在五十年代對子女說：“要到農村去，叔叔、伯伯、大娘，我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向你們請教來了。”青年主要是社會教育，不一定會聽你家長的話，有少數人不注意，有的幹部工作從鄉下到城裏，把家屬調到城裏。子女也不願做貧下中農了。這是思想上馬列主義的叛徒。思想上灰塵多了。幹部進城，妻子可以來，子女在鄉下。各級領導要注意把關。我們軍隊幹部要帶頭，不要特殊化。

- 5、要發動群眾對破壞知青的要堅決鬥爭，要依法鎮壓。最近國務院批准姦汙女青年的生產兵團團長，參謀。周總理說：立即槍斃。這不是我們黨的幹部，是林賊的同黨。教育，挽救不能多殺。審判時受害人不能公佈（團長 44 年，參謀 45 年參加革命）。
- 6、要組織上山下鄉規劃與長遠規劃結合。1973 到 1980 年約 1300 萬人平均每年 160 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八年中跨省插隊 130 萬人。上海八年中 70 萬。上海以後分配原則 4 個面向這是重點。江西、安徽、新疆、黑龍江、雲南。檔規定了 4 種形式 1、插隊有條件可以回老家。2、以知青為主，幹部帶隊，貧下中農參加在公社內單獨成立青年隊。貧下中農 15%，幹部 1%。條件地有多，人少。3、集體所有制農場，投資要多一些。4、國營農場，建設兵團。農林牧漁國營農場開發較大，非生產人員多。發揮大寨精神，以糧為綱。

這次會議規定動員上山下鄉的城市要本地幹部帶隊，要有一定數量的女幹部，要參加當地的領導班子，實行定期更換，要與當地幹部，貧下中農合作，要分配一定的職務。沒有職務不起作用，到了生產隊一組帶工資與管青年，三年或更長時間。或者一年輪換。一年換幾分之幾，不要同時換，便於交流經驗，總之路線決定一切，要使學生在德智體三方面發展，要作上山下

鄉的準備，要準備方方面面的人才，這次會議從而使上山下鄉成為一項重大措施，廣大知青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線指引下進行到底。

中央領導同志說：這次會議開得好，是成功的，各級領導同志要切實執行與加強思想教育，學習大寨結合起來，讓我們滿懷革命熱情培養下一代。

上山下鄉運動 1969 年 260 萬最多的一年，是個高潮。因為 1966 年，67 年，68 年三屆畢業生一起下鄉，俗稱老三屆。

1978 年 12 月 10 日，歷時 41 天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結束。《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被中央批轉。這次會議及其形成的檔成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轉折。會議提出：還要堅持上山下鄉，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上山下鄉；要逐步縮小範圍、有條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動員下鄉；尚需動員下鄉的不再插隊，要因地制宜舉辦知青場、隊，國家給以優惠政策；已在農村插隊的知青，要逐步給予解決，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決；城鎮要積極開闢新領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

到 1979 年，全國僅有 24.7 萬人上山下鄉，進入 1980 年，已有 10 省市停止上山下鄉，進入 1981 年，工作重心已轉向安排歷史遺留的 96 萬插隊知青了。1981 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併入國家勞動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仿照辦理。至此，歷時 20 餘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宣告結束。

四、國務院、中央軍委檔（1973）第 104 號關於黃硯田、李耀東姦汙姦淫女知青的通報。黃硯田，黑龍江建設兵團十六團團長，四十九歲，江蘇泗陽人，

一九四三年入伍，一九四四年入黨。李耀東，十六團參謀長，四十八歲，河北遷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黨。姦汙、猥褻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姦汙後，又被李姦汙。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上山下鄉女知青慘遭蹂躪實錄

被社會忘卻了的故事

一個女知青麻木地推開生產隊長家的門，一步一步、沉重萬分地走了進去。

生產隊長的桌上擺著半瓶二鍋頭和一小盤花生米，還有一張招工表格和生產隊革委會的大印。

女知青站住了，雙目無神，象一個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產隊長甚至連門都不關，閃閃爍爍的油燈都不吹，就粗魯地笑著，一把扯開女知青的衣衫，無恥地揉摸那還未完全發育成熟的乳房，然後把她推倒在充滿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

女知青沒有喊叫，怕人聽到，只是心和下體一同疼痛著。

當女知青從床上站起來，滯重地穿著衣服時，生產隊長將血紅的大印蓋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樣鮮紅的還有床單上幾塊處女的血痕。

假如這僅僅是故事，是小說，那麼，本文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了。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七十餘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

科檢查的醫生驚訝地發現，七名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腐性裂痕。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

女知青們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包括所謂回鄉知青）達數千萬之眾，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這上千萬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姦汙的其實無法統計。大部份被侮辱過的女知青都不願暴露真實情況，因為中國的倫理道德將使失去貞操的年輕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

另有一些被姦汙後而上大學、入黨、提幹的女知青更不會將內情暴露。如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某團助理保衛幹事，被一名當權者姦汙後送到四川去上大學，後來此當權者又姦汙其他女知青被揭發出來，坦白罪行時交代出與她有過關係。當外調人員到四川找到她詢問情況時，她卻矢口否認。外調人員失望而歸，那當權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

按當時的說法，這些色狼統統被稱為破壞上山下鄉份子。

這些色狼罪有應得，遺憾的是大部份姦汙過女知青的人並沒有被揭露，他們到死都會為自己的豔福而洋洋得意。

最終倒楣的還是那些弱者，他們心靈的創傷不但終生難忘，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也屢屢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個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趕出家門，因為她不是處女，她的處女貞操在插隊時被公社黨委書記給破壞了，她的丈夫並不因她當時若反抗就會被打成反革命縱火犯而原諒她。當時她看麥場，無意中燒了一百多斤麥子。

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隊時入了黨的回城女知青幾乎百分之百地被懷疑是

被大隊黨書記姦汙後而發給黨票的，因而，這些人連找物件都成了問題。

可確實有這樣的現象，手裏握有黨票、團票，招工、調動、提幹權，以及病退、困退權的色狼們，以這些特權為誘餌，姦汙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上海女知青，長得豐滿誘人，她拒絕了連長的調戲，便被發配到二十裏外的水渠口去開關閘門，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來回一次，半個月後她屈服了，給了連長一個暗示。連長陪她看了一天水閘，第二天她就被調回連隊駐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後一天，她少女的貞操與流水一同東去了。

本文沒有使用強姦一詞，一九七四年打擊這些色狼時也沒有使用強姦一詞，因為絕大部份女知青被侮辱時，侮辱者確實沒有使用暴力，他們使用的只是權力，人民給他們的權力。

悲劇在於人民的女兒正在被這些掌權者姦汙！

五、匯總

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的《情況反映》引起中央領導和與會者的震動：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營長賈小山，強姦女知青20余人；一師某指導員張國亮強姦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50多人；內蒙兵團被姦汙的女知青達299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209人。周總理看後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軟！”

李先念氣憤地說：“這些人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至少是國民黨行為，不知為什麼得不到糾正？省委和軍區難道說也不知道嗎？”

18 團衛生隊長孫濤，45 歲，河北河間縣人。1945 年入伍，1970 年 3 月調入 18 團任衛生隊長。副營級。姦汙女知青 11 人，三人墮胎。占衛生隊女知青人數一半以上…… 李文峰，30 歲，貴州石阡縣人，18 團 20 連指導員。正連級。姦汙、調戲、猥褻女知青 15 名。被姦汙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殺未遂…… ——摘自聯合調查組《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八團部分幹部摧殘迫害知識青年的調查報告》

第 16 團 5 營 3 連連長陳忠友，有婦之夫，姦汙、調戲女知青 11 人，女知青上山割膠，聽見樹葉響都以為連長來了…… 9 營 2 連連長田宮成，有婦之夫，姦汙上海女知青多人……(略) ——摘自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情況反映》(1973 年第 4 號)

第 10 團司令部參謀孫小虎(正連級)，有婦之夫，長期姦汙三名女知青，並致使其中二人墮胎……

第 10 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姦汙男知青 20 余人……(略) ——摘自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會議簡報》

遼寧省 1968 年至 1973 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汙女知青案件 3400 多起，四川省 3296 起。在所有摧殘迫害知青案件中，姦汙女知青案件比例最大，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有的達百分之九十。例如河北省，僅 1972 年迫害知青案件 126 起，姦汙案 119 起，占百分之九十四。江蘇、吉林兩省，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摘自《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簡報》第八期

1 . 拷打批鬥：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吊打知青 69 起，僅一師批鬥知青 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2 . 姦汙女知青(不完全統計)：黑龍江兵團：365 起。內蒙兵團：247 起。雲南兵團：139 起。廣州兵團：193 起。其中師級幹部二人，團級幹部 38 人…… ——摘自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十一期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破壞知青上山下鄉案件的處理情況。

據不完全統計，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自 1969 年組建以來，共發生破壞知青上山下鄉案件 411 起，其中姦汙案 207 起，捆綁吊打案 98 起，兇殺二起，逼婚三起，打擊報復五起，煽動外逃一起，死因不明三起，猥褻 83 起，強姦未遂九起。犯罪人員中，現役軍人占 116 人(師級幹部四人，團級九人，營級 31 人，連級 105 五人，參謀幹事十人，其他七人)，地方幹部犯罪 245 起。已處理 179 件，占百分之四十三點六。死刑四件，死緩二件，無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 13 件，行政處分 138 件，其他 13 件。未處理二百三十二件，占百分之五十六點四…… ——摘自雲南省知青辦《情況反映》(第 14 期)

第十四節 知青的感恩，人民的懷念

知青的感恩，人民的懷念——有感蓉城知青紀念趙凡百年誕辰

滴水湖..2016-04-19 20:01



從網上得知，4月4日成都知青舉行了《紀念恩公趙凡誕辰 100 周年》的活動。4月15日在上海我見到了當年孟定農場知青絕食隊隊長許世輔，知道了當天活動的一些情況。19日，當年雲南農場知青北上請願團宣傳組組長鄒盛永告訴我，活動的一些照片和介紹已經上傳在《西部知青網》上。

這是當年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以後，自發組織的一次紀念“知青之父”趙凡的活動。



我為重慶和成都的知青朋友們點贊！你們是在代表我們大家紀念這位值得永遠懷念的老人。這是人民的懷念！

一九七八年末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際，原雲南農場的知青們寫信、罷工、請願、絕食、下跪，喊出了“我們要回家！”

我們不會忘記：雲南農場的知青們鬥膽上書，罷工請願，歷經瀾滄江畔的誓言，滇緬公路上經費被劫，昆明鐵路上臥軌，讀書鋪小站上巧妙上車等等。北上知青代表忍饑挨餓終於從亞熱帶的西雙版納來到了北風呼號的首都。為了什麼？為了回家啊！



我們不會忘記：在大返城的相持時刻、較勁時刻，是雲南孟定農場的知青們橫下一條心，奮起抗爭，絕食相拼。在死亡面前，211名絕食的知青命懸一線。為了什麼？為了回家啊！



那一刻，全國在撥亂反正，在邁向新的征程。那一刻，雲南前線已經聞到了戰爭的硝煙。那一刻，上至北京，下至千千萬萬個知青家庭在關注著遙遠的雲南邊疆。



這時，趙凡來了。

時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趙凡臨危受命，急赴雲南邊疆。

我們記住了，是趙凡置個人仕途榮辱得失而不顧，把還在苦難中掙紮的知青們視為知己的孩子。至今我們還記得他老人家的那句話：我也是知青的家長啊！



我們記住了，是趙凡不分晝夜連軸轉地跑一個個農場，一次次面對知青們苦口婆心的說服、啟發、教育、批評。他是高潔人品和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親眼目睹了知青在農場的現狀，下定了幫助知青們回家的決心啊！



我們記住了，是趙凡那句“知青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挽救了多少知青啊，是趙凡親手扶起跪倒在地上的知青們，心痛地勸導大家：吃飯，好好保養身子啊。感動了所有在場的知青們。



我們記住了，是趙凡審時度勢，以過人膽識及時向北京反映農場知青的問題和他們的正當要求，為知青的命運呼號！他以一位老革命家的胸懷向黨中央呼籲：讓孩子們回家吧！

從此，回城的大門打開了。

從此，農場的知青可以回家了。那一刻啊，我們除了淚水更多的是對這位可敬的老人的感恩！

從此，雲南知青感激于趙凡的恩德，把趙凡老人稱之為“恩公趙凡”。



我能夠想像出成都的知青朋友們舉行這樣一個紀念活動時，全體知青起立奏響國歌的那一刻是何等激動人心。當一位位親歷者再次回憶起趙凡老人當年的奔波、勸說、安慰、激憤、決心的情景，在那一幅幅留下的照片裏我看到了與會者的淚水。特別是在螢幕上再次出現趙凡身影的時候，仿佛趙老又回到了他的忘年交的知青朋友中間。



這一刻我們應該聽到有過知青經歷的朋友們在心底裏呼喊：謝謝你，趙老！

這一刻我們應該聽到的是人民對於真正做了好事的老一輩革命家真誠的懷念！

我看到了當年雲南農場知青北上請願團糾察隊長李長壽在趙凡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發言中那段話：“我們敬仰您，是因為您已經成為了人民的榜樣，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們是多麼的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有更多更多的，像您，我們知青的恩人——趙凡先生一樣的幹部！”



應朋友們的要求，我將成都和重慶的知青朋友們上傳的活動照片展現一部分。讓我們以這樣的方式紀念趙凡！







重庆知青李长寿动情的发言
他是当年北上请愿代表之一

热血为民洒 功留青史贯中华



当年孟定农场绝食队代表
成都支边知青罗仁秋发言



**成都残疾人作协作家、
原云南陇川农场成都知青杨鲁勇说：
2003年赵老专程亲临寒舍看望我这位残疾人，
关心我的生活及困难，鼓励我勇敢看，往前走！**



**赵大姐向《恩公赵凡》影片制作者
原八团成都知青肖家琪表示感谢**



余傑：雲南農場知青的兩次下跪

來源：共識網

摘要

趙凡親眼目睹了知青們艱難的生存現狀，當幾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聲大哭時，他也流下熱淚。趙凡大聲說：“孩子們，都起來！你們的情況，我一定如實向中央彙報！你們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親，也有三個孩子正在插隊啊！”

跪下的是膝蓋，挺起的是胸膛！

從 1978 年秋天開始的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到 2010 年 4 月原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趙凡逝世，雲南農場知青有過兩次下跪的經歷。

1979 年 1 月，在雲南孟定農場知青跪倒在趙凡面前，懇求北京來的中央調查團同意我們回(城)家！

2010 年 4 月，回城後的原雲南農場的知青們在北京八寶山跪倒在趙凡的遺體前，為“恩公”送行。

兩次下跪，感人肺腑。

1979 年 1 月，雲南農場知青的第一次下跪

1978 年 10 月 16 日雲南景洪農場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幫助下返城。公開信像燎原烈火一下子點燃了被壓抑十年之久的知青心中的不滿，雲南各個農場的知青開始了罷工。12 月 16 日雲南農場的第一批上訪代表步行出發。12 月 18 日丁惠民帶領第二批上訪代表徒步北上。12 月 24 日晚，第一批上訪代表在昆明火車站登車未果，開始臥軌。

在得知雲南農場知青的事情以後，剛剛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任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和時任雲南省委書記安平生接到國務院值班室通知，

立刻去雲南處理此事。當時趙凡還有另一個身份是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趙凡說：李先念說知青這個事情是四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鄧小平也說要解決知青問題。政治局、國務院開了幾次會，但是不好解決。去雲南，是中央對我的信任，臨危受命。我是農墾局長，國營農場知青鬧事，我責無旁貸。

1978 年的年末，雲南各個農場已完全陷入癱瘓的狀態。生產停止，一些農場領導甚至被知青扣為人質；在幾萬知青的背後，是他們在全國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親人，還有全國上千萬知青的關注。當時又正要面臨對越自衛反擊戰……擺在趙凡和調查團面前種種棘手的問題像一團亂麻，但是主線是十分明確的：知青要回城。

一到昆明，趙凡在會議上說：“參加革命半輩子，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考驗了我們，也鍛煉了我們……知青鬧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採取正確辦法，是可以解決的。”

12 月 30 日趙凡從昆明飛抵雲南農墾總部（原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所在地思茅，聽取了從景洪趕來的西雙版納州委書記王澤民和西雙版納農墾分局黨委書記張志誠彙報情況。

農場和地方當局報上了自願參加罷工的 64 個（知青罷工請願的領袖和積極分子）名單。反映的主要問題是知青打人，挖公路，堵軍車，散佈政治謠言，不聽招呼勸說，破壞國家安定團結等等。他們彙報廣大知青長期遭受的苦難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種種冤案和悲劇。聽了彙報後，趙凡首先給予了慰問鼓勵：“領導特別體會你們在第一線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難。基層幹部更困難。”他指示：“要宣

傳憲法。要有護路隊，重要橋樑保護起來，警衛、保衛、保密都要注意。”對於農場方面提供的 64 人帶頭的知青名單，趙凡指出：咱們第一批工作組認為這些知青裏邊鬧亂子，要造反，都害怕了，著急了，要公安部門派人來插手。我說能這麼考慮嗎，這中央沒這個精神啊，凡是對這個知青下放說兩句話的，就鬥人家，就當成人家這個反革命了。農墾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這個錯，判斷是錯的，……。

趙凡說：“知青鬧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採取正確辦法，是可以解決的。”

一句話挽救了整個局勢的進程。

這樣來看待這麼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動，是“有少數階級敵人的挑動”？是“境內外敵人的唆使破壞？”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幫’當，破壞當前大好的抓綱治國的大好局面”。這些在當時十分盛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一開始我們的一些領導就把這場風波定性為“敵我矛盾”的範疇。這就可以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解決這起事件了。在當時全國出現了一個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實話實說、國家百廢俱興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鄉運動歷時十年，全國 1600 萬知青，背井離鄉，遠居天涯。廣大老百姓家庭無奈的沉默、無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況下；在對越自衛反擊開戰在即，需要一個堅強、穩固的後方的關鍵時刻，假設採取了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解決這起事件，其後果可能就是“自毀長城”了，就會激起社會的動盪人民的憤怒，就會斷送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大好局面。這是對立的雙方都不願意看見的一個結果。

當時，雲南各個農場的局勢很不穩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接見了雲南農場知青北上請願團。除了批評知青們以外沒有任何同意知青回城的承諾。在壓力

之下，請願團被迫做出檢查，並且向雲南各個農場還在堅持罷工的知青們下達了“復工令”。消息傳來，激起了留在農場的知青們的強烈反對。

1979年1月6日，雲南孟定農場爆發了211名知青絕食行動，堅決要求回城！正在雲南農場處理知青事件的趙凡是在1月8日接到中央電報的。趙凡當即決定出發去孟定農場。晚上8點趙凡不顧連續幾天工作的疲勞立即出發，兩位司機輪番開車，趕了將近400公里的路程到了孟定。

1月10日下午4點，在雲南孟定農場招待所前。知青終於看到了中央派來的領導。全體在場的知青們齊刷刷地跪下了！跪在趙凡和中央調查組面前！

知青跪下了，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北京來的趙凡：知青們以絕食的拼死一搏來表達回城的決心！211人水米不進靜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開自己的手腕，噴濺的鮮血震驚全場。趙凡親眼目睹了知青們艱難的生存現狀，當幾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聲大哭時，他也流下熱淚。趙凡大聲說：“孩子們，都起來！你們的情況，我一定如實向中央彙報！你們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親，也有三個孩子正在插隊啊！”

知青跪下了，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北京來的中央調查團：我們要回家！

知青們看到了第一位來自北京的高級幹部為知青們流下的同情的熱淚。知青們以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向這位老幹部致敬。當時在場的一位知青事後回憶說：“這一種臉頰還流淌著淚水，早已哭的紅腫的雙眼，卻瞬間變幻成發自心田的笑顏逐開，非親歷者是根本無法想像的。歷史對於錯誤的糾正常常會以過激的形式表現出來，有時候猶如暴風驟雨一般，好在這一切都已經成了歷史。”

歷史記住了趙凡。他親自率領調查組深入農場，傾聽職工特別是知青們的呼聲，體察民情，積極開展工作。緩和了當時罷工最為嚴重的東風、猛捧等農場的局勢，及時果斷化解了臨滄猛定農場千余名知青靜坐絕食的行為。趙凡馬不停蹄地召開了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知青、幹部的調查會、商討會，尋求解決知青罷工風潮的途徑和辦法。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知青鬧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絕不是壞人鬧事，不能當成鬧動亂抓壞頭頭。如果那樣，肯定處理不好，而且添新亂子。我們必須用疏導的辦法。”

趙凡認為：“這次遇到了請願，罷工，靜坐絕食，包圍幹部，向工作組下跪等辦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作為調查組，是我參加革命以來，遇到最棘手的問題。抗戰時打鬼子就是了，現在軟的、硬的都不行。黨中央檔，從來都是歡迎的，惟有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體問題，知青探親，困難很多，社會遭遇難應付，又沒有錢。他們談到這些我都流了淚，論年歲，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幾個壞分子可以煽動起來的。”（見趙凡：《憶征程》215頁）

於是趙凡反復做雲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領導的工作，希望大家審時度勢，為雲南知青問題的解決做出了正確的決策。1979年1月21日，雲南省委書記安平生向趙凡表示，雲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說：“知青願意留在農場的，歡迎。”“不願意留的統統走。”

以趙凡為首的調查組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國務院知青辦的名義於1979年1月18日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了6條處理意見，其主要精神：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辦理回城；

城鎮職工退休後，可以由其在農場當知青的子女回城頂替；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國務院迅即批准了這個《請示報告》。這實際上為農場知青回城開啟了方便之門。

1979年1月21日，雲南省委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邀請趙凡、四川省知青辦、成都市知青辦、上海知青辦的同志共同研究協調解決農場知青問題。安平生作會議總結時明確：雲南決心兩年內分期分批解決農場的7萬余名知青問題，凡是不願意留在雲南的，統統回原籍。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下和國務院調查組的幫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關省、市的大力協助下，雲南省委迅速草擬出了統籌解決雲南農場知青問題的辦法——《關於解決雲南國營農場知青問題的意見》。1月25日、27日，雲南省委專門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討論這個草擬稿。會議在其他方面都很快達成了共識，但在解決這批知青安置問題的時限問題上仍然有不同意見（後來，為了照顧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壓力，雲南在最後形成的檔中沒有規定安置農場知青的具體時限）。

一場以雲南知青為先鋒的知青請願回城的風波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2010年4月，雲南農場知青的第二次下跪

當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這一頁翻過去以後，人們沒有忘記趙凡。

2003年，當年親歷“第一次下跪”的知青們為趙凡立起了“功德碑”——

歷史將銘記您的膽識和功德——

中國知青史上的：

荒漠甘霖，冰河春風；

黎明曙光，人心良知、

特此立碑

功顯今世，德彰千秋！

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成都支邊戰友聯誼會

西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敬立

趙凡先生功德碑

尊敬的趙凡先生：

人品高潔

膽識過人功德無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成都支邊戰友聯誼會

西元 2003 年 3 月 7 日敬立

趙凡先生功德碑記

西元一九七八年歲末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際，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農場知青，不堪忍受長期置身惡劣處境和遭到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屆三中全會”肅清“四害”流毒，撥亂反正的東風，公開提出恢復知青名份，返城回家與親人團聚的合理要求，遭到地方和農場當局拒絕後，遂以非常之舉罷工絕食抗爭。時值中國大陸極左思潮陰魂未散，尚以“兩個凡是”為基本國策，知青

此舉，大有“破壞國家安定團結，反革命暴亂”之嫌。如是，罷工絕食的知青在企盼呼號，磨刀霍霍之聲中，生死存亡，命懸一線。

趙凡先生，時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臨危受命，以國務院調查團團長的“欽差”身份，親赴雲南邊疆，力挽狂瀾，洞察入微，置個人仕途榮辱得失不顧，以高潔人品，過人膽識，和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為知青的行動正名，為知青的命運呼號，擲地金聲，大氣凜然，義薄雲天。充分體現了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高尚節操。終致為國家分憂，化干戈為玉帛；為知青普渡，解危難於倒懸。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立碑。

是為記。

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成都支邊戰友聯誼會

西元 2003 年 3 月 7 日敬立

（來源：《颶風刮過亞熱帶雨林》中國國際實業家出版社·637 頁）

趙凡原名趙有成，1937 年參加彭雪楓領導的八路軍“學兵隊”，1945 年 8 月到當時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 年 6 月起，他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副市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趙凡被關押了整整 10 年，至 1978 年 3 月恢復工作。

在處理了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事件以後，趙凡回到了北京。事後在國家農墾總局的碰頭會上，趙凡總結說，知青不僅是雲南的問題，新疆、黑龍江、上海、北京都存在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工作中心轉移都有困難。

趙凡在當時就指出：不讓知青上山下鄉，難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麼多知青派去了雲南，吃不飽。後來動盪了，政策就更亂了。政治形勢好了以後，人們都希望改變這個做法，當然也有人反對。所以知青工作會議吵得很厲害，最後還是沒讓知青回來。但是 1978 年撥亂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該讓知青回來。所以我去雲南解決知青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我是執行黨中央的決策，這個功勞是黨中央的。

這就是知青心目中的趙凡，他把這一切的功勞都記在了黨中央！

2003 年，趙凡受知青邀請到成都做客。知青們後來寄給他一本厚厚的畫冊，貼滿他們在成都相處的照片。空白處寫著敬語，第一條就是“建設兵團知青之父”。

以後，曾經的知青們都會把趙凡稱為“知青之父”！

2009 年，《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山旭寫了一篇《“知青之父”追憶知青大返城始末》的文章。在文章的一開始是這樣記載的：

北京三裏河白沙溝社區 10 號樓，《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與 92 歲的趙凡相對而坐，一點一點回憶 30 年前的線索。有時候實在想不起來了，又沒有材料可以參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發上，歎息道：“現在沒人研究這些了。”

“現在沒人研究這些了。”

這是感歎、是傷感、是無奈、是期盼：是對於我們曾經經歷大返城的知青們的一個囑託！

我們不能使老人失望啊。

2010年4月14日，“知青之父”趙凡走完了人生之路。消息傳來，知青們紛紛表達了哀悼之情。他們派出代表前往北京送趙凡最後一程。

曾經在雲南孟定農場帶頭絕食的成都知青許世輔手持“恩公趙凡走好”的悼念橫幅，跪倒在趙老的遺體前。

三十年後，知青們第二次跪在趙凡前！這一跪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感動了天下所有的知青們！這是感恩的一跪啊！

為了這份感恩，曾經的知青們破了八寶山的“規矩”。

雲南知青代表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趙凡老人送行，在挽聯下的落款中，堅持寫上‘跪拜’字樣。這是違反了送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慣例，按規定只能寫‘敬挽或千古’字樣。經過交涉，官方被以知青代表們的發自肺腑對趙凡的崇高敬意和對老人的深情所感動，最終同意了知青們的要求。

在追悼會上，許世輔帶領參加追悼會的知青代表們手持悼念橫幅，跪倒在地上當堂驚天動地的號啕痛哭，打破了送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慣例。以往在送別現場，從來不允許有橫幅，不允許當堂痛哭，哪怕你是至親。發生在八寶山送別趙凡老人的這一幕，目前是唯一的一次特許。

這是知青們發自內心的悲痛實實在在地送別一位曾經為改變知青命運的老人的真情流露！

從31年前驚天動地的孟定一跪到今天撼天動地的八寶山跪拜，兩次跪拜是對於真正為人民做主的好人的感恩啊！

2016年4月，在趙凡老人百年誕辰之日，曾經親歷雲南農場大返城的知青們齊聚成都，自發地舉辦了“民間”的紀念會。深深地懷念趙凡。試問：一位打天下的老幹部活在大普普通通的知青們的心裏，能有幾人？

由此我想到了這樣一句話：天地之間有桿秤！這桿秤啊，是老百姓的心！

由此我想起了誕生於1989年的那首歌《好大一棵樹》——

腳踏一方土

風雨中你昂起頭

冰雪壓不服

好大一棵樹

任你狂風呼

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樂也有苦

歡樂你不笑

痛苦你不哭

撒給大地多少綠蔭

那是愛的音符

風是你的歌

雲是你腳步

無論白天和黑夜

都為人類造福

好大一棵樹

綠色的祝福

你的胸懷在藍天

深情藏沃土

曾經的知青們會記住改變知青命運的人！

歷史一定銘記所有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

第十五節 中國知青館建設與發展

2015 中國知青館建設與發展研討會在西昌召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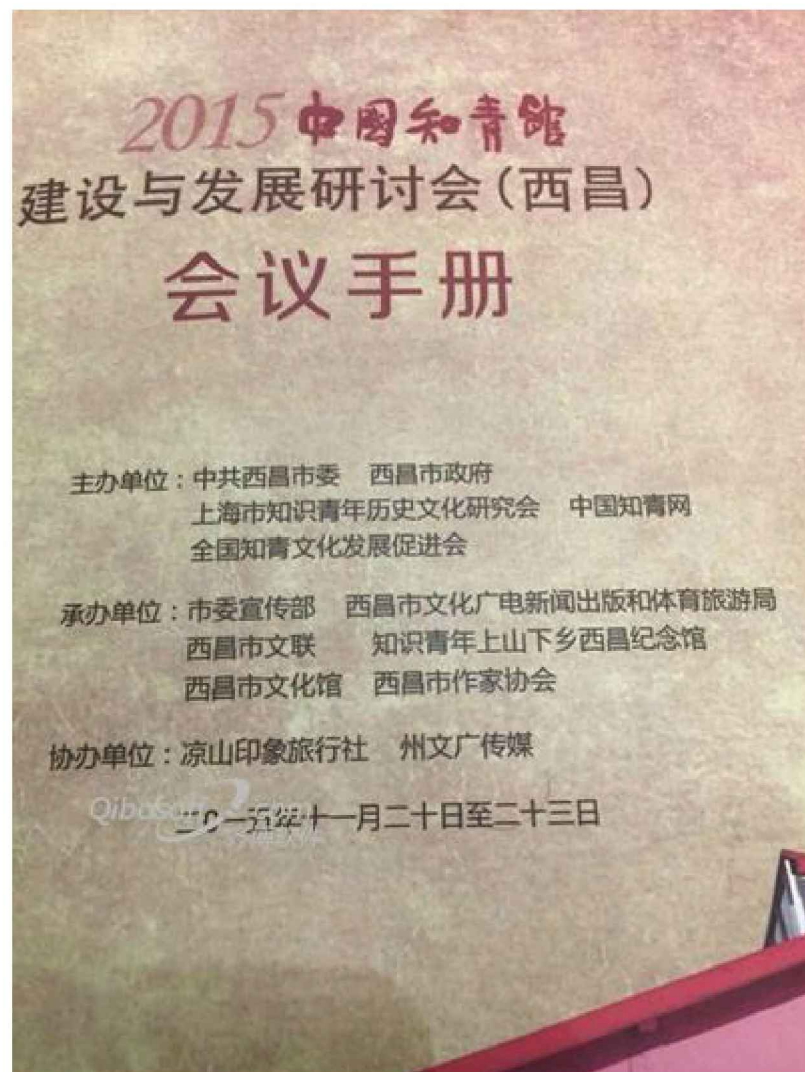
2015 年 11 月 21 日，2015 中國知青館建設與發展研討會（西昌）在西昌天季酒店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場館負責人和知青組織代表 150 余人參加了會議。西昌市代義副市長主持了開幕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羅開蓮女士致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龔心瀚致賀辭，上海市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阮顯忠致辭。另外，中知網馬雲昌、全國知青文化發展促進會鐘楊、雲南省人民政府參事花澤飛、四川省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李蓓、海口市知青聯誼會常務副會長鄧子堅、涼山州文化影視新聞出版局副局長黎毅也分別做了致辭。

開幕式後，舉行了主題報告會。西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博物館館長馬玉萍，做《立足我館地方特色，加強知青館的建設和發展》的報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原辦公室主任、上海博物館原黨委副書記王蓮芬，做《知青博物館發展中的

熱點思考》報告。在下午的報告會上，中國博物館協會陳列藝委會委員、中國知青博物館聯席會秘書長李玉棠做《從上海知青博物館現狀看全國知青博物館的發展態勢》的報告。黑龍江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張剛做《知青館的使命：還原知青歷史、記錄知青》的報告。大豐旅遊局黨組書記、局長陶聳做《從“知青文物”到“知青文化遺產”——淺談“知青文化遺產”中的“地面文物保護”問題》的報告。河南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馬朝顯館長做《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的建設和管理體會》的報告。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劉曉航教授做《在中國社會發展探索的大視野下談知青博物館的發展》的報告。南開大學徐保滿教授做《架起溝通的橋樑——關於建立知青博物館資訊員制度的建議》的報告。阮顯忠會長、李蓓處長分別主持了上下半場的主題報告會。阮顯忠會長對以上報告做了點評。報告會後進行了討論。

在馬雲昌主持的閉幕式上，阮顯忠會長做總結發言並宣佈下一屆研討會的主辦單位。馬玉萍館長向下屆主辦單位移交會旗。涼山州西昌市政協副主席劉效成

宣佈閉會。





晚上，與會代表觀看了涼山州歌舞團的歌舞《彝紅》。

22日晚將在天季酒店舉行論壇專家訪談。

第十六節 反映知青經歷作品

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檔“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一、著作小說

《知青心中的周恩來》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雨》和長篇小說《雪城》及據此改編的這兩部同名電視劇反映了關東的知青（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戰士）的生活。

梁曉聲的電視劇《年輪》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葉辛所寫的著名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孽債》，描述的 1990 年代時，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插隊時所生的兒女，來到上海尋找親生父母的故事。早期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及其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阿城：中篇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董戎：長篇小說《狼圖騰》，以自己在內蒙古插隊時的見聞寫成。

史鐵生：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王小波：中篇小說《黃金時代》

作家老鬼：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電影

舒淇和劉燁主演的電影《美人草》演繹了雲南知青的一段愛情故事。

導演張暖昕拍攝的知青電影《青春祭》，描寫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在西雙版納的知青生活。

陳沖導演的電影《天浴》描寫了一位上山下鄉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慘命運。

1983 年出品的由謝飛導演的電影《我們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電影，描述了當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裏京和林芳兵主演。

三、 影視作品

電視劇作品

《血色浪漫》是以這次上山下鄉為背景的一部電視劇，局部反映了當時的一個城市知識份子下鄉的背景，可以說是下鄉運動描寫最真實的一部電視題材的作品。本劇的主演有劉燁和孫儷。

《北風那個吹》主演閔妮、夏雨、馬蘇，是高滿堂根據自己年輕時下鄉的真實感受創作，講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實生活，以二十多載的命運跨度，以笑淚交融的獨特講述方式，閔妮在劇中扮演了憨厚樸實的大隊長牛鮮花，她愛上了由夏雨飾演的知青帥子，兩人由此開展了一段跨越 20 年的姐弟情緣。

三、紀實作品

《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鄧鵬主編
鄧賢著有紀實作品《中國知青夢》，描述在雲南知青的抗爭故事。

四、知青歌曲

歌曲《小芳》，李春波的歌，被認為是描寫知青在農村戀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時。

知青歌曲《鎖鏈》，肖義璞作詞作曲，寫于 1968 年，曾流行全國。

歌詞：

條條鎖鏈鎖住了我

鎖不住我唱給你心裏的歌

歌兒有血也有淚

伴著你和那車輪兒飛

生活像逆水來行舟

刻下了記憶在心頭

在心頭啊熱似火

親愛的朋友你可記得
你可記得
袋中的話梅碗中的酒
忘不掉海邊的小朋友
深情的歌啊激情的琴
忘不掉異鄉的女知音
你像妹妹我們就像哥
心中燃起友誼的火
友誼的火啊永不滅
手挽手兒從頭越
從頭越
人生的路啊血花碎
聽了你的經歷暗揮淚
淚珠飛啊濕衣衫
相逢惟恨相見晚
相見晚要分手
靈魂兒離身跟你走
跟你走不分離
好朋友啊你可願意
天邊的雲啊山間的霧
淚眼望不真你離去的路
空中的月兒海裏的帆

何時飄回我身邊
何時飄回我的身邊
風聲狂雨聲急
風裏雨裏想念你
友誼的歌友誼的花
要用鮮血培育它



第四章 全國山河一片紅

第一節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標誌著從1966年“5.16”中共中央通知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28個月左右時間從建立政權的角度講完成了“換代”。“全國山河一片紅”了。當時全國郵政總局發行的紀念郵票“全國山河一片紅”錯版成了至今收藏家的珍寶。“革命委員會”至文革結束才退出歷史舞臺。

第一節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一、 工宣隊的由來

據事後作為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指揮部成員之一遲群回憶。在 1968 年 7 月 26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住所就派出制止武鬥隊伍進駐清華問題親自做了決定。並在清華的地圖前還對隊伍的進駐路線作了具體的部署。

毛澤東此次召見北京紅衛兵五位領袖的直接起因是 1968 年 7 月 27 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發生的嚴重流血事件。這一流血事件源自於清華大學文革群眾兩派，即作為激進造反派的“井岡山兵團總部”（以下簡稱“團派”）和作為相對溫和造反派的“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以下簡稱“四派”），主要基於關於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開了持久的論戰，並最終於 1968 年 4 月 23 日爆發了全校規模的大武鬥。這場直至 7 月 27 日由於毛澤東派出工宣隊才結束的、史稱“百日大武鬥”的事件，共造成清華師生員工 11 人死亡，400 多人受傷，經濟損失無法估計。〔3〕

根據毛澤東的決定，由來自北京 61 個工廠工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警衛團（8341 部隊）人員領導的三萬多工人組成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制止武鬥，遭到了團派的武力抵抗。而與此同時，四派採取了先是觀望後是認可的態度。自中午時分至子夜，共計有 5 名工人被打死，731 名工人、解放軍官兵受傷。那一天，進駐清華的工人們和清華大學的所有人員都不知道這一工宣隊進駐是由毛澤東本人直接決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趕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與吳德等人爭吵，他都不知道工人這次進駐清華的內情，直至次日清晨見到毛澤東不久，才如夢初醒。

從韓愛晶在 7 月 27 日午後才得知清華聚集了眾多工人的消息而趕往清華的經歷來看，他們這些紅衛兵領袖（如韓愛晶、李冬民〔4〕等）和前來清華的工

人都不知道調集數萬工人來清華的內情。清華的團派喇叭還在廣播，指責工人們受到了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後臺的操縱。韓愛晶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有關部門打電話，不得而知，給北京市領導人打電話，也聯繫不上。眾多的事例表明，毛澤東決定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一事，在實施之前，僅限於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所知。毛澤東的保密性突然性再次體現出來，這時離“全國山河一片紅”完成換代僅有 30 多天時間。毛澤東到了讓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全國人民厭惡的。騰出手著手解決紅衛兵組織，各造反組織的時間了。清華武鬥提供了一個機會。

一般人認為是鳥盡弓藏的手法，實際上是正常的政治形象。各個歷史時期有各個特定的歷史任務，任務完成了就該換能完成新任務的人選。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人民用選票換下了立下歷史功勳的邱吉爾首相，這區別在於一個是個人獨裁決定的，一個是國民決定的，這就是封建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區別。

二、 毛澤東召見紅衛兵代表

7 月 28 日凌晨 2 時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發生在清華大學嚴重的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驚奇之餘，大為惱怒，脫口而出地說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毛澤東對於清華“七·二七事件”當下的反應，充分表明毛澤東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派出工宣隊所帶來的事態的嚴峻性。當時，毛澤東再也無法入睡了，他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在那裏的湖南廳召集會議，開始著手處理這一事件。

凌晨時分，韓愛晶接到電話，通知他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活動。在這之前，韓愛晶等並不知道是毛澤東的召見。在韓愛晶、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來到人民大會堂等待接見，議論起清華白天發生的事情，只是王大賓提起了

清華學生開槍打死了工人，看來，韓愛晶、聶元梓、譚厚蘭三人當時並不知道清華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他們在由謝富治領進會場時，才知道是毛澤東要召見他們。謝富治對韓愛晶、聶元梓等四人說，“今天是毛主席召見你們，還有中央首長參加。”謝富治又重複說：“是召見我們，不是接見啊。”〔6〕這次活動，正如謝富治所強調的，不是毛澤東接見，更不是會見，而是“召見”。這次毛澤東與紅衛兵五位代表長達五個多小時的談話，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也是在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紅衛兵代表的正式談話。

從毛澤東接到周恩來報告清華發生流血事件的電話後趕往人民大會堂，到韓愛晶等人出現在毛澤東等人面前，可以斷定，毛澤東在召見這幾位紅衛兵領袖之前，已經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亦即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多數成員有過商談。韓愛晶也指出了這一點。這個商談的內容至今沒有透露。而這種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地與紅衛兵五位領袖的談話架勢，非同一般，也從未有過。

蒯大富因為忙於清華流血事件後疏散團派人員以及到北京電報大樓緊急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等等事務，沒有及時趕來。毛澤東在談話剛開始時，還有點不滿地問道：“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謝富治、韓愛晶分別作瞭解釋。由於在北京航空學院“暫時避難”，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時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以及聶元梓的電話轉告趕往召見會場的。在蒯大富進來時，據毛澤東身邊的警衛人員回憶，他們把蒯大富隨身所帶的刀子等加以收繳。〔7〕根據蒯大富與我的多次談話記錄，蒯大富一再強調，他沒有攜帶任何刀子、手槍之類的武器。〔8〕今天看來，蒯大富的說法是可信的。

7月28日凌晨3時半至上午8時半，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緊急召見了北京地區紅衛兵代表人物：聶元梓（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領導人）、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航紅旗戰鬥隊領導人）、譚厚蘭（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北師大井岡山公社領導人）、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東方紅公社領導人）和蒯大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領導人）。

參加召見的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還有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政委黃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共計20人。李作鵬、張春橋沒有參加這次召見。

毛澤東在談話一開始，就把向清華大學派駐制止武鬥的隊伍即工宣隊的決定當成他個人的不容對抗的命令。毛澤東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

清華大學又一次成為毛澤東直接關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單位，工宣隊的領導人先是中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楊德中、張榮溫，後是自1970年之後，遲群、謝靜宜，成為清華的主要領導人。不僅如此，遲群、謝靜宜還被委以重任，負責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學、北京市共青團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們兩人直接行使著來自毛澤東權威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總管”職責。

長達5個半小時的召見後，謝富治在湖南廳門口對出來的五位代表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一句話你們都不檢討。”〔9〕謝富治的意思是五位代表尤其是

蒯大富應該在毛澤東等人面前對“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種自我批評的態度，但是處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領袖怎麼能夠表示清楚這種態度呢？謝富治在這次召見之後，立即讓這五位代表討論並且由韓愛晶執筆起草關於毛澤東這次召見談話的一個用於公佈的檔，旨在立即有效地結束北京地區特別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眾武鬥。這個名為《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的檔，稍後得到周恩來等的認可，經上報毛澤東、林彪後，迅速地以佈告、更多地是以傳單的形式轉發全國，而沒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檔的形式加以正式公佈、傳達。另外，還可能有一份在周恩來主持下的關於這次召見談話的書面整理稿，這個整理稿沒有公佈。

肇始於清華大學武鬥事件而來的這次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位代表，既是毛澤東在文革經歷了兩年多後最終決定“重整”文革的群眾組織和群眾武鬥的契機，也是毛澤東首次通過面對面地同紅衛兵五位元元代表的談話方式，來總結和改變文革運動的轉機。工宣隊進駐後，一切權利統統歸工宣隊，紅衛兵組織、各造反組織走到了盡頭，造反的日子結束了。

毛澤東通過這次召見談話，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個文革的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單位性的群眾武鬥。從這次召見談話之後，文革群眾運動開始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歷史帷幕。

第二節 毛澤東送芒果給工宣隊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將巴基斯坦贈送給他的芒果轉贈給清華大學工宣隊以示慰問。並於8月15日接見了工宣隊代表以示更大的關懷。

最高指示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在慶祝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中，公佈了毛澤東第一次發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11〕這是首次向全國公佈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基於清華“七·二七事件”而來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轉換。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見後，基於對當時大學文革情況的分析和對文革全局的推斷，毛澤東採取了把最初派駐大學去制止武鬥的工宣隊“升格”為領導大學的政治力量。隨後，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12〕時，這一點就非常明確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寫就的題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一文送給毛澤東審閱。姚文元寫道：“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13〕毛澤東修改、審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來的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紅旗》雜誌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經過毛澤東多處修改、補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澤東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寫進去的話語，把清華“七·二七事件”所導致的文革策略的變化加以明確的概括：

一是確立以工人階級身份出現的工人宣傳隊對大學文革的佔領地位，“並且永遠領導學校”。〔14〕

二是大學中所有的學生、知識份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過“走資派”反的紅衛兵小將，都不可能完成鬥、批、改等任務。

三是在所有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和單位，要“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只有如此，知識份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6〕

四是繼續進行毛澤東所部署的鬥、批、改任務，即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權力機構、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等，〔17〕就是使文革沿著毛澤東指出的軌道進行，而不是陷於群眾內訌和群眾武鬥之中。在1968年整個8月裏，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認真搞好鬥、批、改”，〔18〕這就表明，“鬥、批、改”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題，在經過了群眾運動的演變、取代以及被群眾武鬥所異化之後，開始重新回到文革運動的中心地位。

8月25日同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這個通知指出，根據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宣傳隊的經驗，決定向全國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領導各個學校文革的工宣隊。〔19〕自那時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實質上已經不起什麼作用了。

三、 佔領一切上層建築

8月25日《關於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下發後，全國所有學校都進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城市是工宣隊進駐，在農村是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進一步凡是鬧派別鬥爭的，有武鬥的，一切工廠單位組織借用清華經驗統一派工宣隊進駐。進駐後不管是什麼派別的造反隊一樣聽工宣隊的。工宣隊的

隊員是從工廠抽調，從甲廠調到乙廠，乙廠調到丙廠，從丙廠調到甲廠。在農村則由貧下中農宣傳隊擔負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派別鬥爭特別嚴重的單位則有軍人一起參與進駐。甚至有完全由部隊組成的軍宣隊進駐。為了提高工宣隊的社會地位。毛澤東採取當年請紅衛兵到北京朝聖一樣，由各地區單位造反派工宣隊的代表進京受毛澤東的接見。原則上每一個代表發一隻芒果，以示與清華工宣隊一視同仁。工宣隊代表接受了芒果返回原單位作為貢品放在單位的主要地方，沒有人敢動直至爛了也沒人敢處理。

工宣隊，軍宣隊，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各單位後，對消除派性，穩定單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一不做二不休，工人階級代表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全面進駐上層建築各單位，從學校深入到醫院、報社、文藝宣傳、公檢法等等一切上層建築單位。工人階級必須佔領一切上層建築來完成都批改任務。如果一個基層工廠比較穩定的則要同時派出多支工宣隊分別進駐學院、醫院、工廠等。工宣隊人員除少數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外，絕大部分是一線的工人，前提永遠是出身好。隨著挎著軍用包，手拿一本“毛澤東語錄”開開座談會即可。而原在上層建築工作的人員無論是否審查物件都分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或者說“辦學習班”時間有長有短。“五七幹校”直至文革結束才陸續關閉，撤銷。

本節部分內容摘錄與：唐少傑：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樂曲

第三節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姚文元

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引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放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當前的重大任務，就是不失時機地認真搞好鬥、批、改。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份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僅僅是在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黨、全軍、全國和廣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領導中心。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的各項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階級和億萬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體現了無產

階級對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堅強領導。正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才能發動這樣一場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首先要保證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工人階級的最高戰鬥指揮部的每一個號令，都能迅速地暢通地貫徹執行。必須反對“多中心即無中心論”、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種種破壞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反動傾向。各地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各單位都應當接受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我們國家中，不允許存在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相對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獨立王國”。舊北京市委那種抗拒毛主席指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是中國赫魯雪夫等一夥大陰謀家對抗工人階級領導、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手段。這個“獨立王國”已被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了。它的階級鬥爭的歷史教訓，應為一切革命者所記取。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小獨立的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

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出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

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毛主席最近指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毛主席這個指示，指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徹底摧毀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的銳利的武器。廣大青年學生，要熱烈歡迎工人階級佔領學校陣地，參加鬥、批、改，並且永遠領導學校。

工人階級有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豐富的實踐經驗，工人階級最仇恨一切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教育制度，最反對某些知識份子破壞國家財產、阻礙鬥、批、改的“打內戰”行動，最討厭言行不一的空談習氣和兩面派作風。所以，工人階級群眾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相結合，能夠最有力地制止一切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錯誤傾向，最有效地解決種種所謂“老大難”的問題。知識份子糾纏不休不能解決的矛盾，工人們一到，很快就解決了。隱藏在幕後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一小撮壞人，只有在工人、解放軍的參預下，才能把他們的反革命面貌徹底揭發出來。

“工人只要管工廠就夠了。”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人階級懂得：只有解

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不把學校中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搞徹底，不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工人階級就不能最後得到解放，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有重新被剝削被壓迫的危險。積極參加各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文化教育陣地，是有覺悟的工人階級應當肩負的責任。

“我們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參加。”《十六條》說的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難道工人不算“群眾”？難道工人階級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當作人民群眾中最先進、最有覺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戰士、學校中革命的積極分子“三結合”，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證。那種把工人當作“自己”以外的異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塗，他自己就是工人階級的階級異己分子，工人階級就有理由專他的政。有些自己宣佈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份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謂“高級知識份子”這樣說。還是收起你那一套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臭架子吧！有兩種教育：資產階級教育和無產階級教育。你們“懂”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假“學問”，教理工科的不會開機器和修機器，教文學的不會寫文章，教農業化學的不懂得施肥料，這樣的笑話不是到處都有嗎？

理論與實踐一致的無產階級的教育制度，只能在無產階級的直接參加下才能逐步創造出來，你們於此是一竅不通的。

“工人不瞭解學校情況，不瞭解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同志，不要著急，工人是會瞭解的。工人階級比那些目光短淺、只看到自己一個小山頭的知識份子，水準不知道高出多少。他們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長期工作下去，要永遠佔領學校和領導學校。一切客觀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認識的，工人階級將會通過自己的革命實踐更深刻地認識世界，並按照工人階級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傳隊要有步驟、有計劃地到大、中、小學去，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中去，到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去，以毛澤東思想為指標，團結、幫助那裏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聯合大多數群眾，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識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促進那裏的鬥、批、改。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前一頂偉大的歷史使命。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本身會受到深刻的階級鬥爭鍛煉，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工人幹部，充實到國家機關的各個方面以及各級革委會裏去，不但管理學校而已。

為了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工人階級必須認真學好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歷來教導的群眾路線和調查研究的作風，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加強革命的紀律性，不斷批判工人階級內部各種資產階級腐朽作風的侵蝕及影響。在文化教育單位，資產階級有它的傳統勢力。在工人階級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即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時，資產階級總是力圖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腐蝕工人隊伍包括其領導幹部中的薄弱部分。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惕。必須保持堅定的無產階級立

場。必須警惕糖衣炮彈或其他形式的手段對工人隊伍的襲擊。還要認真地做好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抓革命、促生產，搞好工廠企業的鬥、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

毛主席的這段話，是對鬥、批、改階段群眾運動發展的總結，為我們完成工廠企業鬥、批、改的任務指出了明確的道路。

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工廠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革命的群眾性的大批判，使人們清除了中國赫魯雪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提高了兩條路線鬥爭覺悟，從政治上、思想上為清理階級隊伍開路，並且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起著發動群眾、鞏固鬥爭成果的作用。清理階級隊伍，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特務、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純潔自己隊伍、清除鑽到內部來的階級敵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為大批判提供了生動的活材料。兩者相互促進、相互推動。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為整黨創造了最好的條件。經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階級鬥爭的嚴格考驗，廣大黨員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眾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進，黨內的極少數壞人清除出去了，黨員的政治狀況、組織狀況基本上弄清楚了，並且吸收一批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組織，使黨增加新鮮血

液，逐步形成一個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核心，這樣，我們就能整頓好黨的組織，我們就能實現毛主席指出的偉大整黨目標：“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在工礦企業中的運動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在黨、政機關中的運動，也大體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動著生產的高潮。由於幾萬萬貧下中農努力，我國農業生產多年獲得豐收。有了一個鞏固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才能使城市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節節勝利。我們向工人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貧下中農致敬。隨著鬥、批、改的深入開展，工業戰線上也在湧現出許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過程中出現了蓬蓬勃勃的技術革命。形勢大好，振奮人心，一小撮妄想復辟的階級敵人徹底完蛋了。現在美帝、蘇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日子很不好過，他們焦頭爛額，分崩離析，走投無路。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則是光輝燦爛，前途無量。我們一定要努力跟上發展著的形勢，充分發動群眾，及時總結經驗，做好調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認真打好鬥、批、改這一仗。這是我們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中的一仗，讓我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乘勝前進！

（原載《紅旗》1968年第2期）

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加寫的一段話

毛澤東

1968. 08. 00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有些自己宣佈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份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第四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革委會成立時間補正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革委會成立時間補正

原作：宋禹飛

“革委會”是“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它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各級地方政權機構的組織形式。“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除臺灣省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一、名稱的由來

各省級臨時政權成立時的名稱並非一開始就叫“某某省革命委員會”，這中間有一個過程，有個分水嶺。一是1967年2月19日印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麼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即真正代表廣大群

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黨政軍機關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中央批准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二)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除對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用人民公社的名稱。”〔1〕二是1967年3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社論提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此後，新成立的省級政權名稱均叫“某某省革命委員會”，並先報經中央批准。這樣的有山西、北京、青海、內蒙、天津、江西、甘肅、河南、河北、湖北、廣東、吉林、江蘇、浙江、湖南、寧夏、安徽、陝西、遼寧、四川、雲南、福建、廣西、西藏和新疆。而那些先于此成立的並非叫“某某省革命委員會”的省級政權也在檔印發後先後更名為“某某省革命委員會”。這樣的有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這也是我見到的很多誤區的地方，這裏著重補正。

二、成立順序

1、黑龍江省

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在哈爾濱北方大廈門前廣場舉行。會上宣佈“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宣讀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告》。《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權力歸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領導權。這也是全國第一個奪權後建立起來的省級地方政權機構。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龍江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為主任，汪家道為副主任，范正美等為常委。3月23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

員會發出通知，從該日起，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改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2〕

2、山東省

1967年2月3日，以王效禹為首的“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等25個造反組織，在山東省體育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奪權大會，宣佈奪取中共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這次大會宣佈成立山東省的臨時權力機構——“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

2月2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改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3〕

3、上海市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

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通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指出：“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上海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名稱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們深深感到，這一指示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關懷，對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愛護。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指示，一致通過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4、貴州省

1967年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同年8月1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改名貴州省革命委員會。

這裏面有個問題。1967年2月22日《新貴州報》刊登了《告全省人民書》，

文中有“現在，我們向全省人民莊嚴宣告：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無產階級革命派真正行使大權的臨時機構——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了！”許多人包括筆者剛開始也以為 1967 年 2 月 13 日 成立的是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其實不然。因為這份《告全省人民書》是經毛主席親自審閱和修改過的。毛主席在修改時去掉了“毛澤東思想”，所以直接稱呼“貴州省革命委員”。但“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一名一直使用到 1967 年 7 月底，8 月 1 日，才正式被“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取代。

所以，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四省市並非一開始就叫“某某省(市)革命委員會”，而是有一定的過程。故而如互動百科 1967 年詞條“2 月 13 日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是不確切的。應是“1967 年 2 月 13 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8 月 1 日，改名貴州省革命委員會。）”許善斌著《證照中國 1966—1976》第二章關於“革命委員會”介紹的問題則在於：一、並非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其他地方奪權後產生的權力機關才都叫革委會，而是中央有規定，新成立的權利機關名稱叫革委會。二是黑龍江、山東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間比上海早。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至此，當時我國（除臺灣省之外）29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為慶祝這一盛事，郵電部決定於當年 11 月 25 日發行一枚面值 8 分的郵票，取名“全國山河一片紅”。2009 年，一枚面值 8 分的大幅“全國山河一片紅”以 368 萬港元刷新單枚中國郵票拍賣最高成交價世界紀錄。

附：各省級革委會成立時間（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1967 年

1 月 31 日 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成立(3 月 23 日改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

2 月 3 日 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成立(23 日改名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2 月 5 日 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23 日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2 月 13 日 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8 月 1 日改名貴州省革命委員會)。

3 月 18 日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4 月 20 日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8 月 12 日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1 月 1 日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12 月 6 日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1968 年

1 月 5 日 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 月 24 日 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 月 27 日 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2 月 3 日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2 月 5 日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2 月 21 日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3月6日 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3月23日 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3月24日 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4月8日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4月10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 4月18日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5月1日 陝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5月10日 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5月31日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8月13日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8月19日 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 8月26日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 9月5日 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參考資料：

〔1〕《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中發〔67〕57號 1967年2月19日

〔2〕範正美《秋夢追思》第四章 京搗鼓諫

〔3〕《濟南市大事記·1967》濟南市檔案局 濟南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資料

黑龍江（1967。1。31）：潘復生——文革前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為第一書記）。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開始後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文革中

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黑龍江省軍區政委。九屆中央委員。1971年6月被撤職。黑龍江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副主任汪家道接任。1980年去世。1982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龍江省委的結論：歷史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文革中的錯誤不做組織處理。

山東（1967。2。3）：王效禹——文革前任山東省青島市副市長。文革中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九屆中央委員。1971年3月被撤職。濟南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副主任楊得志接任。1979年被開除黨籍。

上海（1967。2。5）：張春橋——文革前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組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市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文革前的海軍政委蘇振華接任。1977年7月，被永遠開除黨籍。1981年1月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4年死於獄中。

貴州（1967。2。14）：李再含——1955年授大校軍銜。文革前任貴州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文革中任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昆明軍區副政治兼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九屆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10月被撤職。54軍副軍長藍亦農接任。1975年去世。

山西（1967。3。8）：劉格平——文革前任任山西省副省長。八屆中央委員。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九屆中央委員。1969年7月被免職。69軍軍長謝振華接任。1976年底，調回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1992年去世。

北京（1967。4。20）：謝富治——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八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革中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2年去世。文革前的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當時的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接任。1980年被開除其黨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鑒於其已死亡，決定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青海（1967。8。12）：劉賢權——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青海省軍區司令員。文革中任青海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青海省軍區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顧問等職。九屆、十屆中央委員。1968年調任鐵道兵政委。文革前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當時的浙江革委會主任譚啟龍接任。1992年去世。

內蒙（1967。11。1）：滕海清——1955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文革中任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九屆中央委員。1971年5月，因“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案的錯誤，被免職。調回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接任。

天津（1967。12。6）：解學恭——文革前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劉子厚為第一書記）。文革開始後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文革中任天津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江西（1968。1。5）：程世清——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26軍政委。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九屆中央委員。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撤職、隔離審查。文革前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接任。後被開除黨籍。1981年解除關押。

甘肅（1968。1。24）：冼恒漢——1955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文革中任甘肅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九、十屆中央委員。1977年因“四人幫”案被撤職、降級。文革前的蘭州軍區國防工辦副主任、當時的甘肅省委副書記宋平接任。1991年去世。

河南（1968。1。27）：劉建勳——文革前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中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等職。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1983年去世。

河北（1968。2。3）：李雪峰——文革前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革開始後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河北省軍區第一政委。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1年1月，李雪峰因“陳伯達案”被撤職。文革前的河北省第一書記、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劉子厚接任。1979年12月改正。2003年去世。

湖北（1968.2.5）：曾思玉——1955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司令員。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1975年調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文革前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為第一書記）趙辛初接任。 廣東（1968.2.21）：黃永勝——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八屆中央委員。文革中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總參謀長。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1年9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職。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劉興元接任。1973年被開除黨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確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3年去世。

吉林（1968.3.6）：王淮湘——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文革前任16軍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瀋陽軍區副政委、吉林省軍區第一政委。九、十屆中央委員。1977年2月，因“四人幫”案被免職，調任武漢軍區副政委。文革前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接任。1980年被開除黨籍。

江蘇（1968.3.23）：許世友——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文革中任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文革前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為第一書記）、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彭沖接任。1985年去世。

浙江（1968。3。24）：南萍——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文革前任20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九屆中央委員。1972年4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職，隔離審查。文革前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接任。1981年解除關押。1989年去世。

湖南（1968。4。8）：黎原——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文革前任47軍軍長。文革中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九、十、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1970年調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47軍軍長。文革前的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平化為第一書記）、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接任。

寧夏（1968。4。10）：康健民——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文革中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自治區委第一書記。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1977年病逝。文革前的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接任。

安徽（1968。4。18）：李德生——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12軍軍長。文革中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等職。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副主席、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0年調任總政治部主任。文革前的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為第一書記）、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宋佩璋接任。

陝西（1968。5。1）：李瑞山——文革前任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第一書記）。文革中任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九、十、十一

屆中央委員。1978年，調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接任。

遼寧（1968.5.10）：陳錫聯——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文革中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政委曾紹山接任。1999年去世。

四川（1968.5.31）：張國華——1955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藏軍區司令員，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文革中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九屆中央委員。1972年去世。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劉興元接任。

雲南（1968.8.13）：譚甫仁——1955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工程兵政委。文革中任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昆明軍區政委。1970年遇刺身亡。文革前的雲南省省長、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周興接任。

福建（1968.8.14）：韓先楚——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文革中任福建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75年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接任。1986年去世。

廣西（1968.8.26）：韋國清——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前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廣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文革中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廣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總

政治部主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九屆中央委員、十、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文革前的廣西區委書記處書記、當時的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安平生接任。1989年去世。

西藏（1968。9。5）：曾雍雅——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文革中任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西藏軍區司令員。九屆中央候補委員。1970年12月調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西藏軍區政委、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任榮接任。1995年去世。

新疆（1968。9。5）：龍書金——1955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湖南軍省區司令員。

文革中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九屆中央委員。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解除職務。文革前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當時的革委會副主任賽福鼎接任。2003年去世。

第五節 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又寫來報告說：“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直在進行著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四十二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獨

廣東一處。”（毛澤東對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關於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的批語，手稿，1968年7月21日。）”

68年5月15日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出了《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由此啟動了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清理階級隊伍必須以立即制止武鬥為條件，於是1968年7月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發出“七六三佈告”，嚴令：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幹擾和串連，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臺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請注意，這個佈告中沒有提及支持造反派，是對一切派別的命令。但是已經習慣了中央文革的無條件支持的造反派，仍然以為這個佈告僅僅對保守派有效，而不予理睬。

不得以，二十天後再次發出“七六二四佈告”。

這個佈告首先強調：“一、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七六三佈告’，不得違抗。”。

這次顯然是警告造反派不得再次違抗中央的嚴令了，否則只能“軍法從事”！

“清階”是文革一個主要部分

毛澤東在 1968 年十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4]“現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5]

因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發佈公報，說：“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混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6]此後，“清階”即成全國文革的主要內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不是“清階”的主要對象。

共產黨所有的派系聯合起來，對人民實行專政。毛澤東依靠的還是原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黨和政府機構的系統。他本身就是那個系統的一員，沒有那個系統的正常運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澤東依靠黨組織和軍隊控制社會。一切都是舊的。唯一的新東西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階級宣傳隊”。

紅衛兵運動偃旗息鼓了。又輪到姚文元替毛澤東闡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實是黨領導一切。黨又勝利了。工人是點綴品。工人在“工人階級宣傳隊”裏是跑龍套的。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的主要頭目遲群、謝靜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

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會”，才是這場“清階”運動的直接領導者。

遍佈全國的“紅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點本來是揪“走資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務”，走資派卻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目標。按毛澤東的說法，“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7]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8]這表明打擊的重點實際還是傳統的“階級敵人”。“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物件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是不可少的。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類人”。被歸於“??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

“政治、經濟大掃除”

颱風最大十二級，可是江蘇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颱風”。五月間，先將縣一級的現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縣城召開大會批鬥、掛牌遊街；全縣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餘人。[9]

“紅色颱風”：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農的財產在“土地改革”時已被沒收，他們只剩下一兩間陋屋遮遮風雨，已過了十七年的赤貧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臨，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10]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佈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二千五百八十五兩，銀一萬五千兩……”[11]

湖南醴陵縣，“九月九日，全縣開始刮‘紅色颱風’，大清查、大批鬥，抄家 9,824 戶。”邵東縣，“九月七日、二十七日兩個晚上，全縣統一行動，綁走所謂‘壞人’9,243 人，查抄財物折人民幣 71 萬元。”[12]

江蘇如東縣也大刮“紅色颱風”，僅三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六十人被關押，一百八十三戶被封門抄家。1966 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甚至連傢俱也在查抄之列。[13]

湖南邵陽縣，在三次“刮紅色颱風”行動中，抄家 9302 戶。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 287,885 元。沒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14]

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一年多。直到 1970 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兩萬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查“二十六種人”，共抄了 4,683 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錶、自行車、收音機。[15]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

工廠、城市的“紅色颱風”也不弱。山東小城市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 5,014 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一間大型飛機製造廠。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過程中造成十人死亡。[16]

江西大屠殺

江西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在“三查”中有個口號，叫“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結果便是胡亂屠殺。

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說：“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17]

武甯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又到縣裏去聽了一個報告，題為“燃起‘三查’萬把火”。回到大隊傳達說：“上頭說了，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還從縣裏學得一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耳朵割下來往地上一丟，狗就銜著跑了。”回到大隊，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拷打過幾十次的“反共救國軍”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18]

江西在“三查”中瘋狂屠殺“階級敵人”。興國縣殺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縣殺死了三百多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19]

瑞金縣發明瞭新名詞：“民辦槍斃”。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一級。瑞金縣各公社僅從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7 日，就殺了 177 人，年齡最大的 70 歲，最小的只有 11 歲。其中有 40 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 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

其他都是所謂“四類分子”。[20]

怎麼殺的呢？瑞金縣有個小理髮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一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一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髮店門口張貼了一張佈告。

有一個人民公社，把揪出來的各種“分子”集中起來，要他們到山上去挖樹洞，分散開，見不到彼此。誰報告說“挖好了”，還不等他說完，看押的貧、下中農就一頓鐵鋤，把他打死，埋在那個“樹洞”裏。

各種“分子”的子女也殺。有一個公社，把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裏，一個個捆在樹上。正在這時，縣委來通知，因為殺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這個公社的負責人說：“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孩子就這樣被殺害了。

掌權的軍人是指揮者

執掌各省、市黨、政、軍大權的軍人是這場運動的指揮者。幾乎每個省、市都是他們在主持這種大規模迫害運動。他們控制了“新生的”革委會，接過紅衛兵的“紅色恐怖”口號，改成“刮紅色颱風”：“十二級颱風”、“二十四級颱風”。他們經過權力鬥爭的洗禮，以鞏固權力為第一要務。他們需要靠“紅色颱風”產生威懾力量，壓制曾經對自己的權力有過威脅的反對派，恫嚇可能更反對派走的普通老百姓，藉以鞏固政權。

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湖南省委書記蔔占亞的口號是“搗老巢、斬黑線、挖隱患。”1968年8月下旬，湖南省軍區在南嶽召開“刮紅色颱風”會議，提出：請農

民進城抓壞人,“清理階級隊伍”。邵陽縣支左辦公室負責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柴德林提出“颱風刮 12 級不行,要加大到 24 級。”他先後三次組織 1 2 萬農民進城,背起梭標、烏銃,掛起“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招牌,進駐縣黨政領導機關、廠礦、學校和企事業單位抓人。縣委和縣人委機關支持過群眾組織的中層幹部,群眾組織頭頭,出身不好的人,站錯隊的人等,三分之一以上有機關幹部被五花大綁,頭戴高帽,身掛黑牌,遊街示眾。

1968 年八月,吉林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搞了個「省市文化系統學習班」,將省直和長春市的文藝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一年。

大慶油田自 1967 年三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六八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殺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殺三十六人,打死七人。”[21]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1968 年四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麵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一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一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行了美人計。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一起並上吊死。事後,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22]

天津市塘沽城面廠有八個工程師,被軍管會定為特務。軍代表指揮打手,將他們抓起來不久就用種種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元元元劉姓老工程師的妻子已五十六歲,也被關押。她被逼交出電臺,交不出就打,就不給飯吃。折磨了兩

年後回到家裏，軍代表扔給她一個骨灰盒了事。[23]

安徽大學在“支左”的軍代表指揮下，“搞法西斯專政，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八百〇九人，受審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一百二十人……並有五人被迫自殺。”[24]

各類“敵特分子”遍佈全國

由於中共中央檔中指明要清查“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凡與外國有點瓜葛的人都成了“審查”、揪鬥對象。

蘇聯、外蒙古、朝鮮都“修了”，所以還要抓這三個國家的特務。從一九三八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一。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25]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所以重點是抓“日本特務、蘇聯特務、國民黨特務”。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 539 人，共用刑罰 33 種 290 樣；致死 76 人，致殘 192 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蒙古、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26]

“國民黨特務”冤獄遍地

由於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地“清階”中大抓“國民黨特務”，一時間“國特”冤獄遍佈全國。

1968 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在《深入開展對敵鬥爭大會》上做

報告說：“有那麼一個辦事處，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們通過學習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國民黨的特務、叛徒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二百多名。”[27]

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殘五十一人。”[28]

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關押批鬥，致死十多人。[29]

1938年周恩來到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廳”為招牌，將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者組織成幾支抗敵演劇隊，到各戰區演出，宣傳抗日。各隊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領導，直到抗戰結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別動隊”。“據不完全統計，僅抗敵演劇隊成員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蘇、浙江、湖南、廣東、雲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30]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電影製片廠實行軍隊編制。女演員舒繡文也得了個校級的軍銜。現在就成了“反動軍官”。1968年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一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五十多個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31]

黑龍江省賓縣弄出“常安國民黨部”、“狴猊國民黨建軍”、“猴石國民黨部”等組織，揪鬥近千人。其中一百四十三人致死，另有三十二人致殘。[32]

北京密雲縣，“製造了‘反共救國軍庫北地下野戰軍’假案，有一百餘人遭陷害，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33]

前所未有的農村“階級鬥爭”

駐上海川沙縣的軍宣隊、工宣隊在金橋公社製造了一個“青年反共救國同盟軍”，在蔡路公社弄出一個“青年救國軍”，“進行破壞性抄家，逼取偽證……有二百十五人受殘酷迫害，致死的二人，致傷殘的二人。”[34]

陝西安塞縣是個人口不足十萬的小縣，“清階”持續兩年多，弄出一大批冤、假、錯、案，“十一名幹部、職工自殺，農民十二人自殺。”[35]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台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調防時各店鋪門口都放水一盆鏡子一面，為其送行。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一九四九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認為烈士，凡與李家有一點聯繫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挑過夫？誰的爺爺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五百戶的莊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十年的米穀四歲喪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全國被揪鬥者近三千萬

這是一場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的對人民大規模政治迫害。各地運動的成績是按“挖出”各種“敵人”的數目衡量的，數量之大，空前絕後。

為了對敵人形成威懾，一般都先將各類分子“示眾”。譬如河北成安縣革命委

員會召開萬人大會，把全縣的各類分子揪到會場“亮相”，拳腳相加，令其爬行。會後層層仿效，捆綁吊打遍及全縣。

雲南瑞麗縣搞的不是遊街，而是讓老百姓“觀看”各類分子。觀看前，先給分子們套上書寫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腳踢。而後讓他們跪下低頭，供人“觀看”。由於“分子”的人數太多，“縣糧食局的商品麻袋幾乎用光。”[36]

更普遍的是遊街示眾：各“分子”一一掛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遊行。一般一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河南新安縣，六月召開“深挖叛徒、特務，清理階級隊伍誓師大會”，將各類分子遊街示眾。被關進“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的有一萬多人。江蘇昆山縣總共四十六萬人，“學習班”辦了一萬一千多個。各類“分子”天天掛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一萬八千餘人。”[37]

貴州思南縣甚至有三歲的女孩和五歲的男孩，因撕破了毛澤東像，被掛上“現行小反革命”的黑牌。其母被勒令抱著孩子在縣城遊街。[38]

江蘇省，武進縣“刮紅色颱風”期間揪鬥了一萬四千六百多人。如皋縣，“全縣共有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鬥。”高郵縣軍管會從七月開始搞“清階”，“至1969年底，全縣有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後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39]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一萬五千餘人，其中八千四百餘人被定為“敵我矛盾”。[40]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極個別的縣份 [41]外，一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如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一萬一千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 11,471 人被審查批鬥。”[42]

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者有)一萬二千餘人。”[43]

陝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一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

一萬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為“敵我矛盾”。[44]

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一萬多人之後，宣佈清理出兩千六百多個各類“分子”。[45]

只有人口較少的小縣，揪鬥人數才不到一萬。廣西大新縣，人口共二十萬， “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萬人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 2,648 人。人口 3.25 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 名，其中八人自殺。[46]

以人民公社為單位看，一個公社達數百人。如岳陽縣烏江公社“集訓審查”了六百多人。[47]

全國兩千餘縣、數萬人民公社，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

農村“新挖出階級敵人”數百萬

當時盛行一個詞，叫“漏網”的什麼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網右派”、“漏網反革命”。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揪出的“漏網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階級敵人”。譬如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清階”中“新挖出階級敵人 9,835 個。”衡陽縣，“有 2,528 人被打成‘叛徒’，5,005 人被定為‘特務’，14,909 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48]陝西長安縣，“查出”所謂“階級敵人”4,334 人。[49]

上海川沙縣，除叛徒、特務、走資派外，更著重於揪“漏劃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九類對象”共揪出四千多人。

河北阜平縣柳樹底大隊，“總人口 1,300 人，打成‘國民黨’的有 264 人……除四人有歷史遺留問題外，其餘 260 人都是被逼供‘亂咬’出來的。”[50]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至 1969 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階級敵人”6,666 人。批鬥拷打之中，“當時死亡十七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二十人。致殘三

十人。” [51]江西景德鎮“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 156 人，富農 145 人，資本家 464 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分子 207 人。”此外，還有三百八十個“懷疑物件”…… [52]

“群眾專政指揮部”

毛澤東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也就是“革命群眾”有權對所謂“反革命”實行專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如江西萬年縣總共二十一萬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〇七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乳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53]

吉林伊通縣成立了“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各公社分別成立“群眾專政小組”，製造出“紅旗黨”等三起假案。“受株連的幹部、群眾 589 人，致死 14 人，致殘 48 人。”[54]

1968 年五月，山西鄉寧縣“群眾專政指揮部”“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傷打殘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刑訊逼供，又打死三人，打傷打殘十多人。[55]

1967 年冬，廣西容縣城廂區對“四類分子”實行“群眾專政”。“全區 19 個鄉，除木井外，18 個鄉都召開了‘群眾專政’大會，先後亂殺死 133 人，逼死 50 人。”[56]1968 年 9 月 7 日至 17 日，上思縣革委會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

會，公開殺人。一次殺了幹部和群眾 12 人。[57]

有的地方不叫“群眾專政指揮部”，名稱變種，幹的事與“群眾專政指揮部”無異。譬如浙江武義縣 5 月 1 日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並未指揮武鬥，卻先後關押了 6,425 人，“其中打成重傷的 181 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 59 人。[58]

造反派被“清理”

其實，文革中無論哪一派，包括紅衛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沒有造共產黨反的企圖。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構不成威脅。造反派已被繳械，可是執掌大權的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首腦們對參加了失敗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運動初期鬥爭過黨的幹部的人，無例外地利用“清階”予以清算、鎮壓。

1967 年二月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下達後被捕、四月《十條命令》下達後獲釋的人，大多數成為“清理”對象。譬如湖南寧鄉縣，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59]

湖南邵陽縣，在縣支左辦公室負責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柴德林指揮下，凡曾站在支左辦公室對立面的群眾組織頭頭及相關人員全部被抓，所有的群眾組織全被衝垮，全縣上下，到處一片吊打聲。七裏山園藝場 22 歲的回鄉知青向啟文、24 歲的國營河伯嶺林場工人蔣紹畢，都因參加了“湘江風雷”群眾組織被活活打死。該縣小溪市公社群眾組織“資江烽火”，有九千多人，是全縣最大的群眾組織。“刮紅色颱風”時該組織中被關押吊打的有 264 人，死 3 人，受株連者不計其數。

大學是“清階”重點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湖南大學自“學校革委會成立後，被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十八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錯判刑的十六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立案審查的達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60]

清華大學六千名教職員工，五分之一被“審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為“敵我矛盾”。[61]十二人自殺，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陳祖東、李丕濟，以及在北京香山雙雙上吊自殺身亡的基礎課講師殷貢璋、王慧琛夫婦。

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殺。[62]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陳浩煊，於六八年七月自殺身亡。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八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一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63]

北京農業大學學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關押。1968年四月二十一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視窗扔下，年僅二十六歲。周恩來聞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夫婦，卻急不擇言，說“‘為有犧牲多壯志’，幹革命怎麼會不死人呢！”[64]

農村中小學教師遭殃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臺縣有四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八人被逼自殺身亡。廣東和平縣，共有一千一百餘名中、小學教師，被抓

起來“審查”的多達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陰縣，六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在殘酷的“清理”鬥爭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65]

邵陽縣小溪市公社原有教師 73 人，被揪鬥批判的有 57 人，打死一人，重傷六人，開除九人，辭退三人。縣一中是湖南省屬重點中學。老教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陳劍候被活埋，易權民被沉河，劉文林、鄧星杞被迫自殺，李江被判刑坐牢，還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師被開除回家。全縣中小學教師死了 29 人，其中 8 人系重刑當場致死，16 人被迫自殺，5 人被打成重傷後不治身亡。教師中被刑訊逼供，捆綁吊打的 857 人。

科研單位“開殺戒”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所屬二二一廠及開採鈾燃料的礦區，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產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階”。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趙登程在該廠宣佈：“二二一廠的反革命特務一夥一夥的，象花生一樣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樣一窩一窩的。”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四十餘處監獄，先後關押四千餘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一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務”、“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專家和一名工程師在逼供時被活活打死。他們聲稱“九院要殺人，要開殺戒”，先後槍斃了五人，並指使警衛團挖了十六個待日後槍斃人時用以埋屍體的坑。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五十九人，打傷、打殘的則有三百多，被逼瘋的職工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66]

英文裏，中國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稱的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

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颱風刮到該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67]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會指示撤銷。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殘廢，四人自殺，包括一九四九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68]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一九五〇年自美國歸來，一九五七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年十月，他在“牛棚”內服安眠藥自殺。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見的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十五歲的女兒一併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一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69]

文藝界大恐怖

張海默，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劇作家，1968年五月十六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四十五。

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傢夥霸佔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一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團體被集中起來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

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四十餘人。“在專縣，打死迫死，打殘打傷的不勝枚舉。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70]

三月，上海當局宣佈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一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四月，一代名優黃梅戲名角嚴鳳英不堪凌辱，自殺身亡，年僅三十七歲。

十一月，上海電影製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裏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雲珠回到“牛棚”，女演員王丹鳳、黃宗英均發現她表現異常，但沒能探問出緣由。當晚，她從家中的視窗跳下，自殺身亡。[71]

革命樣板戲之一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而來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編〕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元滬劇愛好者組織起來，在里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年九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一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四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72]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的母親、女作家謝冰瑩抗戰勝利後赴臺灣師範大學執教，再也沒有回來；父親符號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物件。在一次圍鬥後，她跳樓自殺身亡。學校給其父符號發電：“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73]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揭露賀綠汀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電視鬥爭大會》，一周後“上海市政法指揮部”逮捕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四月四日，上海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將賀的女兒、該院學生賀曉秋關押審訊。六日，賀曉秋留下遺書後，自殺死去。[74]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董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樑自盡。一九五九年為中國掙得第一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一九五七年他歸國時才十九歲，可是也是“特務”嫌犯。六月二十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教練傅其芳一樣，用一根繩子將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75]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變也成了鬥爭對象。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衛戍區八三四一部隊於 1968 年九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一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作為“清階”運動的學習檔，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宣稱該廠“反動勢力相當龐雜，線多、面廣、根子深”，大搞毛澤東的“群眾辦案”，將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進廠的老工人“審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處理的工人、幹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類帽子在廠內“群眾專政”，四個“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殺身亡。說了一句“江青也不見得一貫正確”的、無意將謎底為“爛肉好酒”謎語寫在周恩來、江青講話小冊子上的，或生產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有一個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

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76]

由於該廠是毛澤東親自搞的“樣板”，全國各工廠都將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當作主要清理對象。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颱風”，揪出了兩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九名幹部和八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由於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全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便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77]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 32109 石油鑽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於連傑。

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二十一軍軍長)宣佈“陝西敵情嚴重”，全省大揪“國民黨特務”。在漢中的飛機製造廠一七二廠，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六十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五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一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乾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運動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十五人自殺未亡，七十四人被打傷打殘。[78]

陝西銅川市焦坪煤礦將一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一口水、還在爐邊乾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

一通，說在一九六二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一直報到了省裏。胡煒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進一步掀起對敵鬥爭新高潮”。連不識字的、以賣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一隻眼、斷了一隻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五百多人無端受株連，八人含冤自殺。[79]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該局一場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一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汗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殘一百二十八人。”[80]

若干大案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在這一事件中……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人被關押，一萬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兩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殘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臨沂地區弄出一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一事件中，全地區有四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81]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一九三八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82]

1967年九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七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83]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長及七十二名處長、分局和縣局局長被定為“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後，送往勞改農場。[84]

由於江青說天津市公安局“專了我們的政”。於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餘幹警被審查。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髮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往勞改農場。[85]

河北深澤縣是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江青指“深澤有一個很大的叛徒集團”後，天津市有三百〇七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深澤縣“清查叛徒領導小組”派出一千多人外出調查，查了 5,657 人，鬥了 1,845 人。46 人被劃進“叛徒集團”，36 人被迫害致死，6 人致殘。“抓叛徒辦公室”還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一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連的達三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僅一個村子中白莊，就在“深挖叛徒”時打死了三個人。[86]

湖南邵陽縣血案

1968年8月4日，湖南省邵陽縣發生以“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名義屠殺地富及家屬的事件。縣支左辦公室負責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柴德林召開緊急電話會議，要求幹部學習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這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絕對不能向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潑冷水。”

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創造了“銃決”一詞。在一張“佈告”上寫道：“???", 男, 現年 38 歲, 家庭成份地主。……經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立即執行銃決。”因為政府殺人用“槍決”, 農民沒有槍, 用“銃決”。

直至 8 月 24 日駐湖南省的第 47 軍 139 師施工連到達邵陽縣, 施工大隊的副政委陶柏榮在塘田市見到一隊農民手執各種武器, 將被捆綁成一串的五個人推到河裏淹死, 立即與當時靠邊站的塘田市區區委書記的甯斌會商, 次日以 47 軍師政委的名義召集區、公社、大隊三級幹部緊急大會, 宣佈殺人要償命, 方止住塘田市區的殺人風。據寧斌回憶:“據當時區委秘書統計, 二十天內被殺 310 多人。其中大會前 280 多人, 大會後又追殺了 30 多人。”“有少數人怕被其後人報復, 偷偷摸摸的搞斬盡殺絕, 斬草除根, 故大會之後, 又追殺了三十多人。”[87]陶柏榮又以“師政委”的名義打電話給縣“支左辦公室”柴德林政委, 要求剎住亂殺人之風。該縣的殺人風方於 9 月初平息。據 1974 年 1 月邵陽地委、邵陽縣委聯合調查團調查, 該事件中全縣共抓捕 11,177 人, 關押 7,781 人, 打死、殺死 322 人, 669 人被逼迫自殺, 共計死亡 991 人; 另有 113 人致殘。[88]

少數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涼山彝區區的“羅羅王國”, 1956 年“民主改革”後, 黑彝阿侯(奴隸主)交出一切財產, 僅留一點土地和牲口維持生計。十二年過去了, 阿侯還是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准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鄉裏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一個阿侯家的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乳頭的嬰兒, 被一位當年的女奴隸救起, 躲往另一個部落, 扶養成人。而那個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 升任副縣長。[89]

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縣“評審四類分子”, 刑訊逼供, “在批鬥會上被打

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六人，被迫自殺十人。”[90]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階”中重劃階級成份，“共挖出'階級敵人'6,666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殘三十人。[91]

廣西壯族自治區大屠殺

1968年3月，廣西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一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92]6月中旬凌雲縣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期間，縣革命委員會主任王德堂佈置開展“革命大批判”，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鬥。19日晚，縣人武部第一政委趙永禧等數十人被拉到街上，其中趙永禧等11人被活活打死。次日，王德堂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說：“群眾運動死幾個人沒有什麼奇怪，這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等等。並佈置說：“各公社回去後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決不能心慈手軟”。從那天起至8月，全縣280人被殺害，140人被迫害後自殺。[93]

如果說寧明、凌雲縣的屠殺還是零星、個別的行動，到“清隊”時就變成了全廣西的大規模殺戮。

196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廣西革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後，支持伍晉南的“四?二二”派繼續與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鬥爭。韋國清為控制全自治區，從1968年六月開始對“四?二二”實行屠殺。這場由廣西軍區組織，各縣人武部具體執行的大屠殺，使全國文革期間任何一場殺戮都相形見绌。因官方承認“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眾組織”，便將“四?二二”派冠以國民黨“反共救國團”而屠殺。

1968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與廣西軍區發佈《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號召全廣西人民

緝捕“反共救國團”成員。繼而以毛澤東的“群眾專政”為根據，由“聯指”派成員執行屠殺任務。即捕即殺，法律程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發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錘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四十多名“反”字型大小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殺完了對立面，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部分是農民，部分是華僑。華僑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員，被活活打死的有一百多人。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四?二二”，派了一個連去縣武裝部，繳了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

武鳴縣各公社在聲討“反共救國團”會上當場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親屬。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94]

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95]

八月十六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二十三種人”〔各種“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複雜的”，“犯過錯誤的”，還有他們的親屬子女，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96]

為圖省事，往往將“四?二二”成員押到江邊，打死後推入江中。一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九具。作家

秦牧說，當時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一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97]

各縣解決後，廣西軍區便對南寧、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據點實行總攻。槍炮、坦克、水火一齊上。因據守南寧展覽館的“四·二二”成員躲進地道，當局採用水攻，下游水庫關閘，上游水庫放水，一直淹到該城最高點火車站。地道裏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無人知曉。

官方的數字是：“1968年7月至8月一個多月中……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賓陽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桂林市殺死、打死、害死1128人……天等縣殺死、害死1,651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占當時全縣人口1.33%。”[98]

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案

1968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以實現內蒙自治為目標。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動。〕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鬥、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99]

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一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個才二十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一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去。[100]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一百二十多戶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還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終身殘

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八十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101]

整個內蒙因“內人黨”案被刑訊而造成終身殘廢的多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則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102]

瘋狂的雲南“劃線站隊”

1968年八月，譚甫仁從北京飛赴雲南，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他到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他發了很多指示：“(階級敵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我在個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103]

於是，全省各地層層“劃線站隊”，大批人無辜被害身亡。譬如騰沖縣召開黨代表大會，“會上‘劃線站隊’，對幹部進行批鬥、押、綁、吊、打、遊街……會後，從上到下層層‘劃線站隊’，被批鬥人數達 4,654 人，吊打致死 15 人，逼死 71 人，打傷致殘 247 人。”蒙自縣“被捆綁批鬥的 2,624 人，打傷 385 人，打殘 103 人，非正常死亡 67 人。”思茅縣“打傷致殘 95 人，非正常死亡 56 人。”[104]

僅下關市一地，為追查所謂“滇西挺進縱隊”分子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傷致殘一千多人。打傷一萬多人。臨滄地區的“慰問‘滇西挺進縱隊’”一案就株連一萬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傷打殘，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曲靖和昭通地區的所謂“滇東北遊擊軍”案，牽連六十萬人，其中二萬多人被批鬥，二千多人被關押，四千多人被打傷，二千多人被打殘，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105]

“清階”期間，雲南省會“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佈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

補上告示了事。”“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三十萬人，其中三萬七千人死於非命。”[106]

1968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了趙健民。隨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畫”的分子來。僅此一子虛烏有的案，雲南省就有一百三十八萬人被牽連，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殘九千六百六十一人。[107]

文革中死亡最多的運動

“清階”持續一年多，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階段。除了戰爭年代和一九六零年毛澤東製造的大饑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就全國而言，“清隊”中的非正常死亡超過文革中任一階段。

超過文革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譬如上海寶山縣，橫掃牛鬼蛇神時非正常死亡七十多人，而“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三十四人。”另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108]

超過文革中的武鬥。如上海郊區青浦縣 1967 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一年，總共死亡二十人，傷一百左右。可是從 1968 年三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四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一百七十人。[109 上海縣，“清隊”中“5,600 餘人被審查和揪鬥，385 人非正常死亡(不含 1984 年劃出的龍華、漕河涇、北新涇三鎮)，約占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110]

又如江蘇海安縣，“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幹部群眾共四百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隊’造成的。”[111]

自殺者遠多於被打死的

就全國而言，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清隊”中被迫自殺者多達幾十萬。如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七十三人。”[112]

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餘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陝西漢中市清出“階級敵人、殘渣餘孽一萬零四百十四人。”“五十人自殺，七人逃跑。”上海寶山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於自殺的為二百二十人。此外還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113]應當也都自殺身亡了。

一般每個縣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理階級隊伍”並不僅僅宣佈“挖出”某人屬某“分子”、開個批判鬥爭會就完了。在“清理”過程中，古今中外人類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幾乎都同時在全國各地施行。大批無辜者死於酷刑或自殺身亡。

遼寧台安縣成立以原來的縣委武裝部長為首的革委會後，“按全國統一部署……搞清理階級隊伍”。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門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用細鐵絲勒到脖子上)、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全縣處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許多人致殘。四十三人被投獄判刑。”[114]

許多人在“清理”、“審查”中被毒打致死。如貴州習水縣，“深挖’四種階級敵人”，“挖出 548 人”，其中“120 人被捆打致傷致殘，34 人非正常死亡。”[115]

全國兩千餘縣，大多數縣在“清隊”中死了一百多人。譬如北京郊區懷柔縣，11,148 人被“立案審查”，2,362 人被揪鬥，110 人非正常死亡。[116]又如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運動，“造成 107 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117]

河北成安縣，一百二十五人非正常死亡，致殘八十八人。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 925 名，“致死 143 人，占被揪鬥人員的 15.45%。致殘 32 人。”[118]河北阜平縣，“清隊”中“1,052 名黨員、幹部被立案審查，110 名幹部被迫害致死。”[119]

人口較少的小縣“清階”中死人數才少於一百。中蘇邊境上的愛輝縣，人口僅數萬，關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點二五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殺。[120]

若以區和鄉(公社)為單位來看，死人數則大約數以十計。如黑龍江省伊春市帶嶺區，“挖出”十三個“反革命集團”，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賢縣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鬥，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121]廣西扶綏縣昌平公社，“清階”時“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縣古碑、七鄰灣兩個公社，“使用十多種刑罰搞逼、供、信，致死三十多人”。[122]

若再將單位縮小至一個村(生產大隊)，也有數位記錄在案：吉林省延吉縣軍管會和革委會號召“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該縣樺田大隊一百一十戶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鬥，致死致傷四十一人。[123]

許多縣非正常死亡高達數百

這場運動，有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縣，“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鬥，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川沙縣，“有二百九十三人被迫害致死。”[124]上海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四百五十六人。”[125]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廣東和平縣，“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七百五十餘人。”[126]

吉林省榆樹縣，“僅 1968 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一千八百多人。”[127]

1968 年七月下旬，廣西扶綏縣革委會派出工作組到各公社“清理階級隊伍”，“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傷致殘多人。”[128]

又一個“擴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澤東的肅反運動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澤東搞反右運動，製造了更多的冤、假、錯案。毛澤東死後，中共說，搞是應該搞的，但是搞“擴大化”了。

十年後“清階”，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又說是“擴大化”了。

不同之處是，“肅反”和“反右”的“擴大化”是毛澤東死後其繼承人下的結論。而“清階”，毛澤東當時就不得不承認了。

由於“內人黨”案件，“五十孤兒上訪團”、“一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紛紛到內蒙古軍區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給他寫信，報告內蒙揪“內人黨”的情況，周恩來才採取措施停止了這個運動。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在 1969 年四月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輕描淡寫地說：“清理階級隊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擴大化。抓了一些人，不應抓的也抓起來了。群眾起來了，多抓了一些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搞的，規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擴大化了，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129]

第六節 六廠二校經驗

毛澤東親自指導“六廠二校”鬥、批、改，以此推動全國鬥、批、改運動

1968 年夏秋，為了推動全國的鬥、批、改運動，毛澤東派中南海警衛部隊進駐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木材廠、北京新華印刷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化工三廠等六個工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領導那裏的鬥、批、改，取得經驗以推動全國的鬥、批、改運動。

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六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的鬥、批、改，主要由毛澤東派去的中央警衛團 8341 部隊的遲群和謝靜宜等親自領導，他們進廠進校後，解散造反組織，讓兩派嚴重對立的工人和學生回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車間和班級，然後發動兩派群眾批判兩派組織頭頭的資產階級派性，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以工人和解放軍為核心的革命委員會，掀起了十二級紅色風暴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整團清除“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黨員、團員，吸納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入黨入團，重建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工廠進行管理機構改革，學校進行教育改革。

毛澤東經常聽取“六廠二校”的彙報，親自指導“六廠二校”的鬥、批、改，

經常批示“六廠二校”鬥、批、改經驗，在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向全黨介紹“六廠二校”的經驗，以此為樣板來指導全國鬥、批、改運動。

1968年12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新華印刷廠關於對敵鬥爭中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報告》上批示：“林周及各同志，建議將此件轉發各地參考。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於犯錯誤的好人要多作教育工作，在他們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毛澤東還先後對北京木材廠、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鬥、批、改創造的經驗作出批示。

在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講到“六廠二校”的鬥、批、改運動說，有些工廠不整不得了，比如北京有個木材廠，一千多人，就有二百多個資本家。有些工廠是三朝元老、四朝元老。比如北京新華印刷廠，就是四朝元老，北洋軍閥時印鈔票，日本人來了給日本人印報紙、印傳單。國民黨接管了，又跟著國民黨跑。共產黨來了，他們又吃得開。他就成了“三開、四開”幹部。我們派進去的，又很不得力。這樣的工廠不清一清，整一整，工廠究竟是誰的，就成問題。

毛澤東說，對於清理階級隊伍，一要抓緊，二要注意政策。不是講穩、准、狠嗎？這個穩可以有右的穩，一穩就不搞了。狠過了頭，也就不那麼准了。狠不起來，也就不那麼准了。要重證據，不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戴高帽子、掛黑牌子，不要搞噴氣式，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不要那麼純，純得那麼厲害，我看也不好。有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是死不悔改的。你整他，他也不會改。北京大學哲學系有個老教授叫馮友蘭，你叫他不搞唯心主義，那就很難。還有一個翦伯

贊，是歷史系的教授，還是個副校長。你叫他離開他那一套觀點，也很難。這些人的用處不多了，可能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就去請教馮友蘭。如果你要問帝王將相，你還得請教翦伯贊。為了反對帝王將相，還得搞點帝王將相。我不是讓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將相，青年學生也不要搞。但是少數人搞可以，使帝王將相不要絕了種。這些人是放毒的，怎麼辦？還是要對他們進行批判，要一批二保。你得給他飯吃。有些人下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也不行了。不是保他當校長和系主任，而是教授的頭銜還是可以存在，以便領薪水。有些人，不要搞得太過份了，把人家的薪水減到了每月二十元、四十元，人家還有一家人嘛！現在的辦法就是，哪個地方的知識份子多，就把工農宣傳隊開進去，摻沙子。那個地方的土太板結了，叫做粘結土，不僅不長糧食，還不透氣。所以在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一切機關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把宣傳隊開進去。

毛澤東談到陳毅、譚震林、李富春等所的“二月逆流派”說，“二月逆流”是件大事，不是一件小事，要說那麼了不起，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七八個人反對，這個地球就不轉動了？我看天塌不下來，地球照樣轉動。對他們還是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謂保，就是要幫助他們，看他們的態度，至於改還是不改，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如果強迫人家改，我就不贊成。我們這個黨，歷史上出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聞天、博古、張國濤、高崗、饒漱石，這次又清除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彭、羅、陸、揚，更說明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介紹“六廠二校”的鬥、批、改。毛澤東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事情都上綱、上線很高。北京有個工廠，有八個專案組，說他們的廠長是狗特務，經過群眾審查，結果這個廠長是好

的。有些項目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萬多職工，8341 進校前，工宣隊抓了五百多人，原來的工宣隊不交代問題，現在又不總結經驗，也不找 8341 彙報工作。北大是三進三出了，這樣對軍隊也不好嘛。63 軍就不要撤了。主要是領導不下去，層層聽彙報。劉信是 63 軍政治部副主任，七個月來，也沒有聽下面彙報過一次。我原來認為，北大這樣的地方的工作好做，現在看來，不一定。現在不是鬥爭矛頭對準劉鄧一小撮嗎？北大是在抓一小撮嗎？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放回去。教授、副教授、講師，他們手無寸鐵，造不了反，造反再抓嘛。《十六條》的第七條，我要加一句：‘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放火、投毒、破壞國家機密的現型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其他的一個不抓，一個不關，一個不殺。’右派不要隨便戴帽子，帽子拿在我們手上，他要造反再戴。戴帽子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家子的問題。為什麼要把他們都推到敵人那邊去呢？你們關的人太多，統統地放出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過兩年會改的。聶元梓不是改了就不錯嘛。”毛澤東還說：“馬克思從來不認功勞大小，都是共產黨員。我贊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贊成有些人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批示，將“六廠二校”的鬥、批、改經驗批轉全國，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六廠二校”鬥、批、改，因此就成為全國進行鬥、批、改的樣板，鬥、批、改中一系列“極左”搞法，也就得以在全國延續。

（節選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2007 年立項重大科研課題之研究成果——陳煥仁著、未能出版之書稿《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節 整黨建黨

經過文革一系列政治狂飆，積累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幹部想平反，青年人升學就業，被審查的想平反。混亂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等等。總之一切所有的人都在翹首以盼“中共九大”的召開，以期在會議上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有一個結論，至少緊繃的神經之弦可以略為放鬆。但遺憾的是：所有人的期許都落空了

1968年開始的整黨，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吐故納新，即清除混進共產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同時把工人、貧農、紅衛兵中造反的積極分子吸收入黨，重新恢復共產黨組織。

一、吐故納新

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原有的組織暫停活動，通過整黨恢復共產黨的組織，毛澤東對此早有所思。早在1967年底，毛澤東就對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說：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

怎麼重建共產黨的組織？毛澤東說：“我們的黨要吸收新鮮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人有動脈和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迴圈，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

毛澤東在這裏說到的“吐故納新”，就是要清除混進共產黨內的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以及那些喪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意志的黨員，也就是那些

思想保守不敢造反的黨員，同時把工人、貧農、紅衛兵中造反的積極分子吸入黨，這樣來徹底改變共產黨的成分，使重建的共產黨保持著造反精神的朝氣。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後發出了《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關於已經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中共中央隨後又通報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收集到的對“九大”提出的意見、建議和希望，積極準備於1968年春天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開展整黨整團。

但是，由於發生了“楊、余、傅事件”，全國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重新燃起了血腥的武鬥戰火，恢復共產黨組織不得不停頓下來，直到毛澤東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名義派出工人和解放軍，佔領一切武鬥指揮中心，解散造反派組織，在工人和解放軍領導下進行鬥、批、改，1968年秋天，整黨整團工作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整黨整團開始的標誌是，《紅旗》雜誌1968年第4期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這篇社論公佈了毛澤東關於整黨的指示。毛澤東說：“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迴圈，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的就沒有朝氣。”

社論對毛澤東上述指示進行了闡釋：

“毛主席這個生動的比喻，包含著極其深刻的辯證法。毛主席教育我們：要把無產階級革命黨看成在革命的新陳代謝過程中發展著的組織，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變的組織。”

“‘清除廢料’，就是必須把證據確鑿的叛徒、特務、一切反革命分子、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堅決清除出黨。死氣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則應勸其退黨。”

“‘吸收新鮮血液’，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任務，吸收一批優秀的造反派，首先是產業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入黨，選拔優秀的共產黨員參加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工作。”

社論同時傳達了毛澤東的另一條指示：“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的基本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

社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方法進行的空前規模的開門整黨運動。這次整黨運動，無論深度或廣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組織整頓的徹底性上，都大大超過了解放以來任何一次整黨。這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的偉大鬥爭。這是全國最廣大的革命群眾在毛主席的號召下行動起來，揭露和批判中國赫魯雪夫等鑽進黨內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偉大鬥爭。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的一場決戰。”

《紅旗》雜誌這篇社論告訴我們，毛澤東提出的整黨運動，並非簡單地恢復中共黨員的黨籍，簡單地恢復中共黨組織系統與活動，而是要通過“吐故納新”

的整黨運動，徹底清除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大量吸納文化革命中從工人、農民、紅衛兵中湧現出來的造反派。

（節選自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2007 年立項重大科研課題——陳煥仁著、未能出版的學術專著《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書稿）

二、五十字綱領

“文革”時期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是毛澤東在《對青海省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請示報告的批語和中央複電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強調的。正如人們所知，“文革”是 1966 年 5 月發動的，到 1967 年 10 月已經一年多。在這一年中，經過 1967 年上半年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和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三結合”，許多地方和單位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但是，各級黨組織都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更是無從談起。然而，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與黨的組織是一個什麼關係？這個問題亟須明確。1967 年 10 月 19 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去《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請示報告》的電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給予了答復，毛澤東在請示報告的批語和中共中央複電稿的修改中提出和回答了這個問題。〔1〕青海省核心小組在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中說：“我省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已陸續建立，但黨的組織均未恢復。工作中經常遇到需要黨組織處理的一些問題，如過去作了組織處理的黨團員，有的要求重新復查處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黨入團等。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1〕(p427)毛澤東 10 月 24 日在這個電報上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應討論一下，給以答復，同時轉發各地照辦。”

[1] 在電報“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畫了橫線，並寫了“應當這樣做”的批語。10月27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合署名給毛澤東並林彪報送了一個報告，報告是由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說：“主席批示小組應該討論青海核心小組關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小組在二十六日討論了，但沒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擬出通報，而竟節外生枝，搞煩瑣主義，向青海通一個電話，又不先向主席請示，完全擅作主張。這個錯誤，完全是由我們負責的。類似這種錯誤，已有好幾次。謹此請主席嚴厲批評或處分。”“附電話原稿。這個電話已經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銷。”這個電話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於10月26日3時打給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組長劉賢權的。張春橋在電話中說：“中央認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以照你們來電，過黨的組織生活。但是，這是件大事，涉及許多問題，如怎樣‘恢復’？是否原有黨員都過組織生活？是先整頓領導機關的黨組織再整頓下級組織，還是同時進行？支部同革命委員會的關係怎樣？還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黨員，輸進新的血液，等等。請你們討論一下，根據不同意見，整理出一個簡要的材料，送給中央，並由你或派負責同志到北京同我們一起討論，報中央決定後再正式答復你們。”[1] (pp427~428) 毛澤東當天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林彪、恩來、中央文革各同志：電報改了一下，請你們再開一次會，如能通過，即可發出。”

[1] (p426) 同時，毛澤東還對陳伯達10月27日送審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複電稿進行了修改。毛澤東在複電稿的“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十月十九日來電請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這句話之後，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

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 (p426) 從毛澤東的批示中我們可以看到，後來在中國共產黨“文革”這段歷史上所講的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的最早來源和出處。

但是，細心人會發現，毛澤東在這裏對整黨建黨講的不是 50 個字，而是 46 個字。查找歷史文獻我們發現，後來的 4 個字是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1968 年元旦社論上加上的。“兩報一刊”1968 年元旦社論的標題是《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社論中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在這個指示中增加了 4 個字，即在階級之前增加了“無產”兩字，在群眾之前增加了“革命”兩字，這樣整黨建黨綱領的表述就從 46 個字增加到了 50 個字。〔2〕那麼，這個社論發表前毛澤東看沒看過呢？檔案材料顯示，發表前毛澤東審閱和批准了這個社論。當時負責起草社論的是姚文元，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員。1967 年 12 月 28 日，他將社論送審稿呈毛澤東審閱，並在呈送件上寫道：“元旦社論，已經碰頭會討論通過（談了兩次），現送上，是否妥當，請審閱批示！”毛澤東於 29 日上午 4 時審閱完後作了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覺得可用。去掉了幾個浮誇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 [1] (p426) 這篇社論在 1968 年 1 月 1 日的“兩報一刊”上同時發表。從此，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就被正式提出和廣泛使用。

1968 年 8 月 25 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 2 期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講到了這 50 個字，將這 50 個字作為毛澤東指出的偉大建黨目標來闡述。毛澤東審改了這篇文章，對這個表述給予了肯定。 [1] (pp526

～534)到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使用了這段話，並將這50個字寫入報告。報告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這50個字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3〕而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也將這段話的內容和思想寫入了《黨章》的總綱。寫入《黨章》總綱的這段話是這樣表述的：“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由於行文的需要，《黨章》總綱對原來的50字進行了個別改動，但主要精神和思想則是完全一致的。這裏雖然也是50個字，而“文革”期間在實際工作中所說的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所指的還是“兩報一刊”社論講的那50字。

〔參引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2〕《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論》，《人民日報》1968年1月1日，第2版。

〔3〕《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第1版。

〔4〕《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過）》，《人民日報》1969年4月29日，第2版。

三、整黨建黨在基層

1971年1月16日所在單位的負責人傳達了中共上海市第四屆黨代會精神。傳達了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中共上海市委滬71(1)號文中共上海市委名單：市委書記7名，市委常委16名，市委委員59名。候補委員17名。正式委員比例：幹部17名。軍隊16名。工人16名。其他勞動人民代表2名，農民4人，積極分子4名，10名女同志；17名候補委員：幹部3名，軍隊5名，工人6名。農民1名，其他勞動人民1名，知識份子1名。召開了中共四屆一次全會，選舉了常委、書記。大會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關懷下，在九大路線指引下召開的。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同時傳達了張春橋1月4日、1月13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的講話：學習檔是九大檔、公報、新黨章、主席講話，這些東西到現在我們還不太理解。現在講一講九大建議的第一部分。主要講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自從學習了主席九大講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林副主席政府報告，對文化大革命基本理解了。從上海市委說明這個問題，決議中有這麼一條：有些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五年來還不能說完全理解，在國內看到了，國際上正在發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不理解，紅衛兵起來了又不理解，工人運動起來了又不理解。因為沒有精神準備，特別是群眾，但引發了武鬥，真是莫名其妙。上海武鬥水準差，只有一家開槍，上海是歷來階級鬥爭的戰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無產階級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鬥爭的焦點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司令部瘋狂反對毛主席。毛主席在1963年就尖銳的指出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就要改變顏色。這種危險情況將是陳丕顯、曹荻秋篡位後更加明顯了。64年以後鬥爭焦點是政權，關於一月革命風暴問題在決議中已經寫了。革命運動的幾次曲折。主席九屆一中

全會上講了“不講全部，恐怕是相當的大多數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手裏，不在工人群眾手裏”當時的工人運動有些老工人上當了。因為毛主席講了抓革命，促生產，他們用生產壓革命，失敗了又搞經濟主義，搞經濟主義不滿意就搞停產。1966年毛主席同阿爾巴尼亞同志談話講到文化大革命勝利問題時，一種失敗，一種勝利，一種可能性不大的勝利。67年講勝利，失敗，當時毛主席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遼寧。主席還講1967年是全面內戰，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當時主席為什麼只是指4個地區是重點。以後才知道北京是首都，上海、天津、遼寧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區。這四個地區控制問題就好辦了。京劇改革，批判三家村，文革都是毛主席親自批改，沒有陳丕顯、曹荻秋的份。1月4日告上海人民書，主席8日看到了，9日全國廣播，沒有毛主席支持能行？，舊市委一件好事也沒有做（徐景賢：那時主席就派春橋同志來）上海工人階級奪了權。

上海奪權不容易，一共奪了三次。第一次一個工兵團同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各自奪權。同時任命我和文元為書記，事先也不商量，打個招呼。我們向中央報告了。主席認為奪權是好的。提出新市委書記也是好的。所以我們打電話給上海，說黨中央毛主席支持你們奪權，但是要有新名單，經過4年才有這樣一個新名單。毛主席把告上海市民書推廣全國。中央向造反派發了賀電。接下來4個組織發生了康平路事件第二次奪權。第三次由4個組織把各區、縣、局、市委的權都奪來了。第三次奪權各單位還沒有名單。。。。以為有了圖章權就奪來了。如果沒有軍隊權就不能掌權。我們同部隊同志一起之結合這樣才算把權奪來了。我們奪權是中央，毛主席直接指揮的，通過一月革命風暴大權奪來了。。。。66年把可能失敗放在第一位，67年把可能勝利放在第一位。。。。關於領導

班子決議上已經寫了各級革委會黨組織更新了。大多數是好的，但要有毛主席標準是否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路線，是否權在群眾手裏。

從這份會議傳達張春橋講話的記錄稿反映了經過中共九大以後，各級革命委員會逐步進入整黨建黨階段。這時實際上在廬山已經發生了陳伯達天才論和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在高、中級幹部中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中央要林彪手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進一步講清楚階段。張春橋在會上反復講了奪權及路線鬥爭問題。這又是在暗示了。

第二節 中共九大

時間：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

地點：北京

參會人數：1512人

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279人

全國黨員：2200多萬人

一、會議簡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國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開幕式並致開幕詞。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林彪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還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1969年4月28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本次大會上沒有作修改黨章的正式報告，康生作了《關於黨章的發言》通過了黨章。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 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在江西廬山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周恩來宣佈全會的議程，重點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和加強戰略問題。林彪首先發言，大贊毛澤東是天才，隨後的討論卻。

二、會議過程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開幕。毛澤東主席主持了會議，並且作了極其重要的講話。下午五時整，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臺。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代表們極其熱烈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隨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臺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接著大會選出了主席團。大會一致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團主席，林彪同志為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同志為主席團秘書長，並且決定了主席團秘書處成員。

林彪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林彪在報告中根據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黨的戰鬥任務。林彪的報告，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不時被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口號聲所打斷。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黨員中的先進分子。來自工礦企業的產業工人黨員代表，來自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黨員代表，來自各條戰線的女共產黨員代表。這些代表，都是根據黨的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決定，

經過各級黨組織進行了充分的民主協商，並且廣泛地聽取了廣大群眾的意見，一致推選出來的。

大會自四月二日起，開始分組討論林彪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草案。全體代表認真地討論和學習了毛主席在開幕會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表示熱烈擁護，堅決照辦。代表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回顧了黨的歷史。全體代表認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復地討論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報告，對報告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補充和修改意見。全體代表認真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

在四月十四日的閉幕式全體會議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發了言。他們發言過程中，全場不斷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口號聲。大會在通過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後，決定將這兩個檔委託大會主席團秘書處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後發表。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四月十四日下午舉行的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了林彪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的政治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1]

三、會議內容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

- (一) 林彪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 (二) 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
- (三) 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

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 丁盛、于桑、馬福全、王震、王白旦、王進喜、王宏坤、王秀珍（女）、王秉璋、王國藩、王洪文、王樹聲、王首道、王效禹、王淮湘、王超柱、王輝球、王新亭、鄧子恢、鄧穎超（女）、韋國清、天寶、孔石泉、葉群（女）、葉劍英、龍書金、鄺任農、田華貴、申茂功、皮定、劉豐、劉偉、劉子厚、劉興元、劉伯承、劉均益、劉賢權、劉建勳、劉結挺、劉格平、劉盛田、劉錫昌、江青（女）、江禮銀、江擁輝、江燮元、朱德、華國鋒、許世友、任思忠、年繼榮、紀登奎、陳雲、陳郁、陳康、陳毅、陳士榘、陳永貴、陳先瑞、陳伯達、陳奇涵、陳錫聯、李強、李震、李大章、李天佑、李水清、李四光、李先念、李作鵬、李順達、李素文（女）、李雪峰、李富春、李瑞山、李德生、吳濤、吳德、吳大勝、吳法憲、吳桂賢（女）、吳瑞林、呂玉蘭（女）、張才千、張天雲、張雲逸、張達志、張池明、張體學、張國華、張恒雲、張春橋、張富貴、張福恒、張鼎丞、張翼翔、汪東興、邱創成、邱會作、邱國光、楊春甫、楊得志、楊富珍（女）、杜平、蘇靜、肖勁光、餘秋裏、周興、周赤萍、周建人、周恩來、鄭維山、寶日勒岱（女）、範文瀾、宗希雲、冼恒漢、胡繼宗、姚文元、南萍、饒興禮、耿飆、徐向前、徐海東、徐景賢、聶榮臻、唐岐山、唐忠富、錢之光、郭沫若、袁升平、倪志福、夏邦銀、莫顯耀、高維嵩、梁興初、康生、黃鎮、黃永勝、曹裏懷、曹軼歐（女）、尉鳳英（女）、鹿田計、曾山、曾紹山、曾國華、曾思玉、彭紹輝、魯瑞林、韓先楚、粟裕、溫玉成、董必武、董明會、程世清、謝家祥、謝富治、賴際發、解學恭、譚甫仁、賽福鼎、蔡暢（女）、蔡協斌、蔡樹梅（女）、滕代遠、滕海清、潘世告、潘復生、魏秉奎

候補中央委員一百零九人：

林旺丹、馬天水、王體、王新、王六生、王光臨、王志強、王恩茂、王維國、方銘、方毅、鄧華、韋祖珍、尤太忠、文香蘭(女)、石少華、馮占武、央宗(女)、劉西堯、劉春樵、劉浩天、劉振華、朱光亞、華林森、達洛、肉孜吐爾迪、阮泊生、陳仁麒、陳華堂、陳勵耘、陳和發、陳敢峰、李立、李化民、李書茂、李再含、李守林、李定山、李躍松、吳忠、吳純仁、吳金全、呂和、呂存姐(女)、張日清、張世忠、張令彬、張延成、張江霖、張西挺(女)、張秀川、張泗洲、張英才、張積慧、汪家道、楊俊生、楊煥民、宋雙來、岑國榮、羅元發、羅春d i@ (女)、羅錫康、鄭三生、金祖敏、易耀彩、胡煒、胡良才、姚連蔚、趙峰、趙興元、趙啟民、耿起昌、徐馳、聶元梓(女)、唐亮、錢學森、郭玉峰、郭宏傑、梁錦棠、康林、康健民、黃文明、黃成連、黃作珍、黃志勇、黃榮海、崔修範、崔海龍、閻仲川、盤美英(女)、隆光前、曾雍雅、彭、沖、彭貴和、魯大東、韓英、傅傳作、焦林義、舒積成、蔣寶娣(女)、謝家塘、謝望春(女)、藍亦農、藍榮玉、譚啟龍、裴周玉、樊孝菊(女)、樊德玲、黎原

主席團名錄

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於會泳、王體、王震、王世藩、王進喜、王克京、王秀珍、王秉璋、王洪文、王效禹、王淮湘、王景升、王輝球、王超柱、馬毅、馬福全、孔石泉、韋國清、天寶、毛澤仁、鄧子恢、鄧穎超、龍書金、田華貴、皮定均、劉豐、劉興元、劉慶棠、劉均益、劉賢權、劉建勳、劉格平、劉盛田、劉錫昌、華國鋒、華銀鳳、孫秀蘭、孫淑琴、買仁虎、江禮銀、年四旺、馮全民、朱光亞、任榮、許世友、杜平、邱會作、楊育才、楊

春甫、楊桂芳、楊得志、吳濤、吳德、吳金全、吳學珍、汪家道、肖勁光、李大章、李天佑、李四光、李玉英、李再含、李守林、李作鵬、李定山、李桂英、李雪峰、李瑞山、李德生、呂玉蘭、宗希雲、冼恒漢、周建人、金祖敏、周麗琴、羅錫康、鄭維山、張日清、張雲逸、張達志、張生堂、張世忠、張江霖、張西挺、張體學、張連友、張國華、張泗洲、張恒雲、張英才、張耀祠、張富貴、張鼎丞、陳鬱、陳士渠、陳永貴、陳代富、陳愛娥、陳敢峰、陳錫聯、胡世全、胡良才、胡修道、南萍、範文瀾、姚連蔚、映宗、袁升平、浩亮、徐海東、徐道義、徐景賢、聶元梓、唐岐山、唐金枝、殷維臣、顧阿桃、錢學森、尉鳳英、梁興初、康健民、郭沫若、寇秋枝、曹軼歐、曾山、曾紹山、曾思玉、曾雍雅、彭沖、彭貴和、黃成連、黃象和、韓先楚、程世清、舒積成、粟裕、董明會、隆光前、解學恭、謝家塘、賽福鼎、黎原、樊孝菊、蔡暢、蔡協斌、蔡樹梅、滕代遠、滕海清、潘天福、潘復生、譚甫仁、魏秉奎

第三節 林彪中共九大政治報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瞭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後，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的偉大歷史貢獻，就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瞭下列幾點：

-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 （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

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馬克思、恩格斯為此而奮鬥了一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的那些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林塞維克黨以外，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鬥爭的焦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列寧在痛斥老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多次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頁）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根據他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實踐，看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頁）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的結論是：“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頁）

列寧還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頁）

列寧指出復辟的危險還來自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它們所說的武裝干涉，也就是扼殺蘇維埃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頁）

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列寧的這些光輝的教導。從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臺，就立刻把資產階級的“復辟希望”變成“復辟行動”，篡奪了列寧、史達林的黨，把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平演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面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早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毛主席特別提醒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任務。

我們黨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根據毛主席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

線，進行了緊張的戰鬥。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繼續前進的緊要關頭。毛主席鑒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倡狂和我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革命。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率領廣大群眾，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進行了偉大的鬥爭。從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從關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鬥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每一個勝利，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重大戰役的勝利，都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才取得的。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歷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一九三九年，當毛主席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正在蓬勃發展時，劉少奇拋出了他的黑《修養》。這本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它根本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如何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不談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要共產黨員離開偉大的革命實踐去搞什麼唯心主義的“修養”，實際上是要共產黨員“修”成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專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當美帝國主義武裝蔣介石反革命軍隊，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時候，劉少奇適應美蔣反動派的需要，拋出了所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和對美蔣反動派的進攻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鼓吹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的鬥爭”，要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一”為蔣介石的“國軍”，並且

要把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大量復員，妄圖從根本上取消人民軍隊，斷送中國革命，把中國人民用鮮血奪回的勝利果實雙手捧給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劉少奇卻跑到天津，一頭栽進資本家的懷抱。他瘋狂地同剛剛開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決議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相對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年青時代”，要無限制地“大發展”，“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厚顏無恥地吹捧資產階級“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大肆吹噓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歷史關頭，劉少奇一夥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但是，既然他們是反革命，他們的陰謀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魯雪夫上臺以後，特別當蘇修夥同美帝國主義、印度等國的反動派，大規模反華的時候，他們就更加猖狂起來了。

毛主席最早察覺了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

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接著，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規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了警告：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經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更加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了！

所有這些警告和鬥爭，並沒有也不可能絲毫改變劉少奇一夥反動的階級本性。一九六四年，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跳了出來，鎮壓群眾，包庇走資派，並且公開地攻擊毛主席宣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了，胡說什麼不執行劉少奇的路線就“沒有資格當領導”了，他們急不可待地要復辟資本主義。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痛斥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談怪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總結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得出的這個新結論，撥正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

航向，指明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有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份子，對劉少奇一夥的復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鬥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劉少奇這個叛徒、內奸、工賊的歷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廣大群眾參加下，才審查清楚的。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把他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億萬群眾的一個偉大勝利。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裏的大革命。我們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主席的話，打中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要害。他們那麼起勁地抓意識形態，抓上層建築，在他們控制的各個部門向無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反革命專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我們要從政治上打倒他們，也必須首先用革命的輿論粉碎他們的反革命輿論。

毛主席從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鬥爭。全國解放以來，發動過對電影《武訓傳》、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紅樓夢研究》等的多次批判。這次，又是毛主席領導全黨向劉少奇一夥盤踞著的資產階級陣地發動了進攻。毛主席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這篇著名論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批判了劉少奇控制的文藝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文化部“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衛生部也應改名“城市老爺衛生部”。在毛主席的號令下，無產階級首先在京劇、芭蕾舞、交響音樂這些被地主資產階級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發動了革命。這是一場短兵相接的搏鬥。儘管劉少奇一夥千方百計地對抗、破壞，無產階級經過艱苦戰鬥，終於取得了重要的戰果。一批光輝的革命樣板戲出現了，工農兵的

英雄形象終於在舞臺上站起來了。接著，毛主席又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為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整個運動的偉大綱領。這個《通知》徹底批判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為鎮壓這場大革命而拋出的“二月提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特別注意揭發“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這是向全國人民發出的開展政治大革命的偉大動員令。這個《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投入了戰鬥。北京大學寫了一張響應中央號召的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大字報迅速佈滿全國。接著，一批批紅衛兵起來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劉少奇集團亂了手腳，慌忙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殘酷地鎮壓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但這並沒有為他們爭得多少苟延殘喘的時間。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綱領性檔。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毛主席在給紅衛兵的信中指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接著，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門，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一千三百萬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革

命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機關革命幹部的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大字報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萬炮齊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全國。億萬群眾炮打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戰鬥，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任何反動階級都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當革命觸動到資產階級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時，階級鬥爭更尖銳了。在劉少奇已經垮臺以後，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斷地變換手法，拋出什麼“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實右的口號，妄圖繼續打擊一大片，保護他們一小撮。他們還分裂革命群眾，操縱和蒙蔽一部分群眾，保護他們自己。而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了這些陰謀以後，他們又來了一次倡狂反撲，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

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但是，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嚴肅批判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抵制，它終究阻擋不住革命群眾運動的主流奔騰前進。

革命運動的幾次曲折和反復，使廣大群眾進一步懂得了政權的重要性：劉少奇一夥所以能幹壞事，主要是因為他們竊取了無產階級在許多單位和地方的權力；革命群眾所以受壓，主要是因為那裏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裏。(2)(3) 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的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或者仍然在原來的資本家手裏。特別是當走資派藉口“抓生產”來壓革命的陰謀遭到失敗，刮起罪惡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時候，廣大群眾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才能從根本上打敗走資派。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

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

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接著，毛主席又發出了“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主席繼續總結了黑龍江等一些省、市的經驗，確定了建立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鬥爭。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從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其間有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進行了反復的政治較量，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了劇烈的鬥爭，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終於克服了這種困難。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視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引導廣大革命群眾逐步地分清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進一步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使這場鬥爭的過程，只是亂了敵人，鍛煉了廣大群眾。

潛伏在群眾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野心家、兩面派，他們不到一定的氣候是不暴露的。

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們從右的方面和極“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動的翻案邪風。他們的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妄圖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但是，這一小撮壞人，終於同他們的頭子劉少奇一樣被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三、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

這場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的問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除臺灣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誌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前進，“認真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緻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根本，必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幾十年來，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著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於劉少奇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廣大革命群眾難以直接聽到毛主席的聲音。這場大革命的風暴摧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閻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廣大革命群眾見面，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中，得到這樣廣泛的普及，

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認真學、認真用；最新指示一發表，立即宣傳，立即行動，這種最寶貴的作風，必須鞏固下來，堅持下去。要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繼續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們全國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這是促使上層建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一項根本原則。重疊的脫離群眾的行政機構，壓制、束縛群眾革命積極性的繁瑣哲學，講究排場、追求形式的地主資產階級作風，都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而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以及其他組織，都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聯繫群眾，首先是密切聯繫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等基本群眾。新老幹部都要經常掃除官僚主義的灰塵，不要染上“做官當老爺”的惡習。要堅持節約鬧革命，勤儉辦一切社會主義事業，反對鋪張浪費，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要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

制度。要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解剖一個到幾個麻雀，不斷總結經驗。要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照毛主席關於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鬥私，批修”，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國家的主要成份是軍隊。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工農的子弟兵，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鬥爭中，在保衛祖國、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鬥爭中，立下了偉大的歷史功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戰員參加三支兩軍（即支援工業，支援農業，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軍事管制，軍政訓練），軍隊代表參加三結合，受到了階級鬥爭的鍛煉，密切聯繫了群眾，促進了軍隊的思想革命化，為人民立了新功。這也是最好的戰備。我們要發揚“擁政愛民”、“擁軍愛民”的光榮傳統，加強軍民團結，加強民兵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三年來，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企圖破壞我們這一支偉大的人民軍隊，沒有能夠得逞，就是因為人民擁護了軍隊，軍隊保護了人民的緣故。

在上層建築領域中，文化、藝術、教育、新聞、衛生等部門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七屆二中全會就決定了“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路線。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令下，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工人階級和它的鞏固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登上了上層建築的鬥、批、改的政治舞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階級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長期被那些走資派統治的場所，開進了一切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無產階級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陣地牢固地佔領下來，用毛澤東思想把它們改造過來，是能不

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關鍵問題。毛主席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親自抓典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輕視思想文教戰線的錯誤傾向，緊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艱苦細緻的工作。“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總結領導上層建築鬥、批、改的經驗，把這條戰線的仗打好。

四、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為了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條》中，早已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確規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項政策具體化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

黨的各項政策，包括知識份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群眾組織的政策，對敵鬥爭的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

從舊學校中培養的知識份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願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於那些結合得好的，對於那些積極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實行馬克思所說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對於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於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後、治

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毛主席最近指出：“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在對敵鬥爭中，必須執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要執行毛主席關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我們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於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採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

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要具體地研究本單位的情況。凡是革命大聯合還不夠鞏固的地方，應當幫助廣大革命群眾在革命的原則下，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凡是階級隊伍還沒有清理、或者剛剛開始清理的單位，必須按照黨的政策，抓緊做好。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單位，應當根據毛主席對鬥、批、改各個階段的指示，抓緊其他各項工作。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壞人又囂張起來怎麼辦？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

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階級敵人如果再興風作浪，發動群眾把他們再一次鬥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條》中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我國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造了歷史上最高生產水準，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頁）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麼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系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鬥、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要充分發

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計畫。可以斷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必將繼續促使經濟戰線和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新的躍進。

五、關於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確實是偉大的。但是，決不能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紮。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後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於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於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階級鬥爭還是會有反復的。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在當前落實政策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幹擾。做好鬥、批、改各個階段的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我們要緊跟毛主席，緊緊地依靠廣大革命群眾，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曲折，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

六、關於黨的整頓和建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毛主席向全黨指出的那樣：“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

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毛主席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設起來的黨。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我們的黨，經歷了武裝奪取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鬥爭。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始終站在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的最前線。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在國內外敵人極其強大、情況十分複雜的環境中，我們黨領導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前僕後繼，英勇奮鬥，才使黨從最初只有幾十個成員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成今天領導著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深深懂得，離開了人民的武裝鬥爭，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要永遠記住毛主席的教導：“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在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哲學等各個方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證明瞭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主席在談到整黨建黨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迴圈，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毛主席用這個生動的比喻，講出了黨內矛盾的辯證法。“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鬥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鬥爭，沒有吐故納新，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關於黨內矛盾的理論，是今後進行整黨建黨的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歷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鬥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鬥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歷史時期，無產階級的專政和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實現的。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不能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正是從根本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黨的建設的理論。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重要時刻，劉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養》，其目的就是為了推翻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在抄錄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話時，再一次故意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個最重要的結論，明確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面目。劉少奇還繼續散佈“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作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等等反動謬論，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應當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最廣泛、最深刻的整黨運動。各級黨組織，廣大的共產黨員，經受了兩條路線的劇烈鬥爭，經受了大規模階級鬥爭的考驗，經受了黨內外革命群眾的審查。使黨員和幹部經了風雨，見了世面，提高了階級覺悟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這場大革命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必須向廣大黨員進行階級、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教育。必須在黨內外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把叛徒、特務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分子清除出黨，把大風大浪中經過考驗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吸收入黨。必須努力使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必須使黨員真正做到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使黨員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只有這樣，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教導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的學習和宣傳，對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學習和宣傳，對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學習和宣傳，都不能只進行一次，而要反復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有這樣，才能使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剛冒頭時，就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批判和抵制，保證我們黨始終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修改黨的章程。中央已將黨章草案提請大會討論。這個草案是全黨和全國革命群眾共同參加起草的。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層黨組織參加修改黨章以來，中央收到了幾千份草案。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黨章草案以後，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又一次進行了熱烈的認真的討論。可以說，新黨章草案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的意志，是黨一貫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特別重要的是，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劉少奇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央相信，經過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以後，我們的黨一定能夠按照新黨章的規定，建設得更加偉大、更加光榮、更加正確。

七、關於我國和外國的關係

在這裏，我們還要著重地說一說我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

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從來都是相互支持的。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全世界的廣大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許多友好國家、友好團體和人士，都給了我們熱情的讚揚和支持。我在此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我們堅決保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當前世界的總趨勢，還是毛主席說的那兩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一方面，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高漲。越南南方、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尼、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武裝鬥爭日益壯大。“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日益為廣大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臟”地區，爆發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眾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覺醒。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正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陷於政治經濟的危機，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他們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在爭奪原料、市場、附庸國、戰略要地和勢力範圍方面，他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為了實現各自的野心，都在擴軍備戰。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頁）列寧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

夜。”（《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頁）列寧的這些科學論斷並沒有過時。

毛主席最近指出：“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這是因為，當代的世界存在著四大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可以斷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戰強加在世界人民頭上，那只會大大加速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全世界人民起來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統統送進墳墓。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毛主席指出的這個偉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志，指引著我們在同帝、修、反的鬥爭中不斷取得勝利。

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國主義這個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越來越走下坡路。尼克森上臺以後，面臨著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和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面臨著全世界人民和國內人民群眾的巨大反抗，面臨著帝國主義國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的困難局面。尼克森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樣，繼續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面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模地擴軍備戰。美國的軍費開支，逐年增加。美帝國主義至今還霸佔著我國領土臺灣。它把侵略軍隊派到很多國家，還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它搞了那麼多飛機、大炮，那麼多核彈、導彈。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是用來嚇唬人民、鎮壓人民、屠殺人

民、霸佔世界的。而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它到處陷入與人民為敵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众的包圍和痛擊之中，並且必將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規模的革命。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面目，暴露得越來越清楚了。還在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剛剛冒頭的時候，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現代修正主義對世界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毛主席領導全黨，同以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同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使全世界人民在鬥爭中逐步學會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社會主義，使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宣告破產。同時，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堅決批判了劉少奇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履行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後，蘇修叛徒集團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內外困難越來越嚴重，就更加瘋狂地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對內，加緊鎮壓蘇聯人民，加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對外，加緊勾結美帝，加緊鎮壓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加緊控制和剝削東歐各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緊同美帝爭奪中東和其他地區，加緊對我國的侵略威脅。派幾十萬軍隊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對我國領土珍寶島進行武裝挑釁，就是蘇修最近的兩次醜惡表演。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奪作辯護，它鼓吹什麼“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這一套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的主權是“有限”的，他的主權是無限的。你不服從嗎？他就對你實行“國際專政”即對各國人民專政，以便組成新沙皇統治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即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日

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樣。列寧痛斥第二國際的叛徒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頁）這完全適用於今天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成的蘇修叛徒集團。我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一定會起來推翻這一小撮叛徒集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由於蘇聯政府一手製造了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的事件，中蘇邊界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蘇邊界問題，同我國和其他一些鄰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黨和我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在解決以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衝突。根據這個主張，我國先後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鄰國圓滿地解決了同他們的邊界問題。只有蘇聯、印度同我國的邊界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中印邊界問題，我國政府同印度政府進行過多次談判。由於印度反動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僅要我們承認舊中國歷屆反動政府都沒有承認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妄圖進一步侵佔一直在我國管轄之下的阿克賽欽地區，從而破壞了中印邊界談判，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蘇邊界問題，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紀下半葉，那時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的地位，沙皇政府採取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強加給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大片中國領土，還在許多地方越過不

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線，進一步侵佔中國領土。這種強盜行徑，曾經遭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憤怒譴責。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偉大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鄭重宣佈：“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列寧的這個無產階級政策，沒有能夠得到實現。

我國政府本著對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後兩次主動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一九六四年，中蘇雙方在北京開始談判。儘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從維護中蘇兩國人民革命友誼的願望出發，仍然主張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邊界問題。但是，蘇修叛徒集團背叛列寧的無產階級政策，堅持新沙皇的社會帝國主義立場，拒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的，還堅持要我國承認他們違約侵佔和企圖侵佔的中國領土都是屬於蘇聯的。蘇聯政府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使談判遭到了破壞。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後，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了我國神聖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三月二十二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復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繫，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三月二十

九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面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面表示願意恢復“協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復。

我們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的無產階級對外政策，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堅持實行的政策。我們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後也仍然堅持這樣做。

我們歷來主張，各國的內部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來解決。不論大國、小國，大黨、小黨，都必須把相互關係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同蘇修叛徒集團醜惡的大國沙文主義，進行了長期的鬥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蘇修叛徒集團口口聲聲“兄弟黨”、“兄弟國家”，實際上把自己當作老子黨，當作可以任意侵佔別國領土的新沙皇。他們不但對於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等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進行破壞和顛覆，而且對於一切略有不同意見的黨，對於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見的國家，都擺出一副兇惡的架子，進行鎮壓、破壞、顛覆，甚至出兵侵佔他們的所謂“兄弟國家”，綁架他們的所謂“兄弟黨”的成員，無所不為。他們這種法西斯主義的強盜行為，決定了他們必然覆滅的下場。

美帝、蘇修總想“孤立”中國，這是中國的光榮。他們倡狂反華，動不了我們一根毫毛，反而激發我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反而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同美帝、蘇修劃清了界限。今天，決定世界命運的，不是帝、修、反，而是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各國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真正的馬克思

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是新生的力量，有無限廣闊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堅決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我們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鬥爭，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尼、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革命鬥爭，堅決支持美國無產階級、青年學生、黑人群眾反對美國統治集團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國人民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正義鬥爭，堅持支持日本、西歐和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堅決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蘇修侵略和壓迫的正義鬥爭。所有受到美帝、蘇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

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億萬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下定決心，並且充滿了勝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聖領土臺灣，一定要把一切敢於來犯的侵略者，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蘇修、美帝狼狽為奸，做了這麼多的壞事、醜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會饒過他們的。世界各國人民正在起來。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美帝、

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

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我們黨的歷史發展的重要時刻，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時刻，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我們大會的代表，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鮮血液。產業工人黨員代表、貧下中農黨員代表和女代表數量之多，是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所從來沒有過的。人民解放軍的黨員代表中，有老紅軍戰士，也有新戰士。紅衛兵中的黨員代表是頭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多的代表，從五湖四海來到北京，來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共同商量和決定黨和國家的大事，這就標誌著我們的代表大會，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大會，是一個團結的大會，是一個勝利的大會。

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我們的祖國空前統一，我國人民形成了極其廣泛的革命大團結。這個大團結，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各個兄弟民族，包括長期以來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了好事的愛國民主人士，包括廣大海外愛國僑胞和港澳愛國同胞，包括在美蔣反動派壓榨下的臺灣愛國同胞，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我們相信，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全國各族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必將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在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中，在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事業中，爭取更大的

勝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說過：“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毛主席這個高瞻遠矚的雄偉展望，照耀著今後我們前進的道路，激勵著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英勇奮鬥。

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章程

(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過)

第一章 總 綱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黨經歷了長期的武裝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階級鬥爭的鍛煉，在反對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滿懷信心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全黨必須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領導全國各民族億萬人民，繼續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團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為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

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第二章 黨 員

第一條：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認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交納黨費，都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第二條：申請入黨的人，必須個別履行入黨手續，有黨員二人介紹，填寫入黨志願書，經支部審查，廣泛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由支部大會通過和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第三條：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做到：

- (一) 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 (二) 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

(三) 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並且認真改正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手裏；

(四) 有事同群眾商量；

(五) 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

第四條：黨員違反黨的紀律，由黨的各級組織，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按照具體情況，分別給以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處分。

黨員留黨察看最長不超過兩年。在留黨察看期間，沒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黨員死氣沉沉，經教育仍無轉變，應勸其退黨。

黨員要求退黨，由支部大會通過除名，並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備案。必要時，在非黨群眾中公佈。

證據確鑿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應清除出黨，並不准重新入黨。

第三章 黨的組織原則

第五條：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

全黨必須服從統一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定期向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報告工作，經常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接受監督。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

議。黨員對於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允許保留，並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報告。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及其他革命群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

第六條：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地方、軍隊和各部門黨的領導機關，是同級的黨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和它產生的黨的委員會。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由各級黨的委員會召開。

地方、軍隊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黨委員會的人選，都必須經上級組織批准。

第七條：黨的各級委員會，根據一元化領導、密切聯繫群眾和精簡的原則，設立辦事機構，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機關。

第四章 黨的中央組織

第八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第九條：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產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黨的地方和軍隊中的組織

第十條：黨的地方縣以上、人民解放軍團以上的代表大會，每三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地方和軍隊各級黨的委員會，產生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

第六章 黨的基層組織

第十一條：廠礦企業、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一般設支部；黨員較多或者根據革命鬥爭需要，也可以設立總支部，或者基層委員會。

黨的基層組織，每年改選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第十二條：黨的基層組織要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它的主要任務是：

（一）領導黨員和廣大革命群眾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二）對黨員和廣大革命群眾經常進行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領導他們向階級敵人作堅決的鬥爭；

（三）宣傳和落實黨的政策，貫徹執行黨的決議，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

（四）密切聯繫群眾，經常聽取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鬥爭，使黨的生活朝氣蓬勃；

（五）發展新黨員，執行黨的紀律，經常整頓黨的組織，吐故納新，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

第五節 周恩來在中共九大上的發言

1969年4月14日

同志們：

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我熱烈慶賀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導下的新黨章的產生。

毛主席在講話中，要我們回顧四十八年來黨的歷史。我們應該經常回顧黨的歷史，回顧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劉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鬥爭的歷史，回顧黨在四十八年所積累的勝利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鬥爭經驗，回顧黨在國際關係中的鬥爭經驗，回顧我們為什麼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接著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二十年後的今天又面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只有懂得了這些，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在講話中說：“我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們都表示決心，並且都堅決相信，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一定能夠實現！

林彪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精闢地闡明瞭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論證和說明瞭毛主席這一偉大學說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且從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證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宣導和發動億萬群眾來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林彪同志在報告中，扼要地、系統地總結了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今後發展的方向和戰鬥任務。他在報告中，恰當地給予了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以應有的評價。在分組討論中，大家公認，林彪同志的這一報告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這是完全正確的。

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革命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

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在他的宣導下，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就推廣到全國直至全世界。可以說，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這一紅寶書，把毛澤東思想所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眾化了，使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以至世界革命人民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傳播，從思想上武裝了億萬革命群眾。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輿論動員，並且具有深遠影響。

一九六五年底，在毛主席發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之後，林彪同志揭發了羅瑞卿反黨、反軍的反革命陰謀，並且在他的倡議下，召開了形成與彭真《二月

提綱》針鋒相對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發表了它的紀要，這都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前進。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闡發了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提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林彪同志的這一重要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

在近三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許多關鍵時刻，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工業會議，一九六七年三月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揭發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問題的大會，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講話。他根據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徹底揭露了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嚴厲批判了來自右的和‘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風，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的這些講話，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讚揚，成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全國億萬革命人民，特別是對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在“三支兩軍”工作中的戰鬥號令。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反對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抗日戰爭時期反對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在解放戰爭時期反對劉少奇、彭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在全國解放後反對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的鬥爭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堅定地站在鬥爭的前線。

在彭德懷的篡黨、篡軍陰謀被揭發後，林彪同志親自主持軍委的工作。林彪同志發揚毛主席古田會議的建軍思想，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重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提倡把我軍建設成為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有力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眾性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方法，這就是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一整套方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至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申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援。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國內外形勢是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敵人的。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緊密

地團結起來，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周圍，落實政策，奮勇前進，就一定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

最後，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插話

（1969年4月14日）

同志們，我沒有準備講話，但是我要插兩句話，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他對毛主席的這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現在這樣的地位。那中國就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國，那中國就是黑暗的中國，而不是一個紅色的中國。

而今天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紅色的、偉大的、光榮的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這樣強盛的國家。而能影響全世界，諸種因素中的最重要的，決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偉大的英明的領導，毛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至於我個人覺得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領導人中間，比較起來，前前後後我比

來比去，我那時候就認為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地看問題，沒有達那個水準。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準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

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賀龍底下，在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也早就沒有了，一定沒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肯定地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的。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能夠允許我存在嗎？那就變成段德昌，（1928年開到鄂豫皖去的……）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而我的能夠存在為黨貢獻自己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那種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志們作這麼一點簡單的聲明。

第六節 中共“九大”軼事

報告兩易其稿

歷次黨代會最重要的內容莫過於政治報告的發佈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未來的規劃，所以，起草政治報告被作為歷次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準備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視，九大也不例外。陳伯達是黨內的大筆桿子，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文采極好，歷史上也寫了不少重量級的文章。“文化大革命”

以來，他在推行“左”傾理論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就是出自他的手筆。陳伯達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器重，起草過許多重要的文件，這次起草九大報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張春橋和姚文元自從 1965 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視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也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一路走紅，作為黨內筆桿子的“新秀”，實力也不容小覷。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就落到了這 3 個人的頭上。

由於預定由林彪在黨的九大上做政治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灣談起草報告的問題。林彪一向比較欣賞陳伯達，決定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先動筆起草。陳伯達作為一個所謂的“大理論家”，自恃資格老，水準高，從心底裏就看不起張春橋、姚文元這幫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輩，所以他不願意同張、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單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決定撇開張春橋、姚文元自己寫。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就拿出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他帶著這個提綱和林彪商量了一陣子，之後做了一些改動。定稿後，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圈閱退回，表示同意。就這樣，陳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九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他這樣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兩個幾次三番地來電話詢問報告的起草情況，而陳伯達要麼不理，要麼找個事由搪塞過去，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以後，再也不來電話了，看來兩人明顯是被惹惱了，準備採取措施報復一下這個所謂的“大理論家”。陳伯達急於邀功表現，寫這個報告很艱苦，每字每句都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推敲。時間在不斷地向前推移，離大會召開的日子也一天天臨近，而陳伯達的起草工作卻進展得十分緩慢，先前報送毛澤東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終沒有回音。

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陳伯達心裏沒有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越是這樣越寫得慢。當他的稿子寫到只剩下最後一點時，毛澤東忍不住了，召集了一個會議討論報告起草工作的進展。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恩來說：“看來恐怕不行吧！”毛澤東對陳伯達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而耽誤九大的召開非常不滿，便接著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就這樣，陳伯達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張春橋、姚文元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陳伯達也抓緊進度趕寫出了政治報告的全稿。兩個稿子排成清樣，送給了毛澤東和林彪審看。毛澤東看了之後，覺得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而陳伯達的稿子就被直接擱置一邊了。直到九大召開以後，陳伯達收到毛澤東處退回來的檔，才發現之前他送去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拆封，更不用說看了。陳伯達對此很是失望，這也許正預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勢。

因為政治報告遲遲沒有拿出來，九大又推遲了一個星期才開會。當時由於代表都已經陸續來到了北京，只好先組織他們參觀。作為報告人的林彪只和陳伯達商量過起草報告的問題，他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滿，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現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況。

極為嚴格的保密工作

與八大自信開放的風格完全不同，九大從籌備到開幕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保密措施。為什麼採取這樣一種方式呢？這就不得不提到那個年代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到1969年，兩國兩黨之間關係的公開惡化，已經持續了10年。這年春天，戰爭的陰雲越來越濃，蘇聯邊防軍

幾次出動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入侵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造成了流血事件，我邊防軍被迫奮起反擊，逐出入侵者。這使得事態更為激化，上升為邊境武裝衝突。蘇聯隨後調集軍隊，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毛澤東和中央由此判斷：國際形勢嚴峻，戰爭難以避免。馬上要召開的九大，備戰也成為重要的議題。為了防止蘇聯的突然襲擊，也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九大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

為了保密，事先並沒有公佈九大召開的日期，開會前3個月，代表們先是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起來進行全封閉的學習，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除了少數軍政高級領導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隨時準備進京出席九大。由於九大代表不是選舉出來，而是各革委會根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協商推薦”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質很低，鬧出了不少的笑話。廣東韶關地區的一位元瑤族代表眼看年關將近，還遲遲沒有進京的消息，就不幹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結果被哨兵給攔住了。哨兵問他：“你不想去北京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了？”這位代表滿臉委屈地說：“眼看快過年了，我家就我一個男人，我不回去過年，豬誰來殺？”

日復一日，好不容易盼來了進京通知。代表們被以參加學習班的名義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後，他們分別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代表入住的賓館如臨大敵，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們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內電話也被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不能讓“階級敵人”覺察絲毫痕跡。不久，代表們得到通知說，4月1日下午舉行大會，會場在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處於天安門廣場附近，遊人很多。1500 多名九大代表要在這裏集會，想不為人知，絕非易事，為了保密，大會的組織者真可謂煞費苦心。據當年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回憶：住各賓館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車，每車 45 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外面的行人看不見。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後每隔三四分鐘，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這樣每個賓館只需六七次，約半小時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行車路線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說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到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一公里，行車時間也只需兩三分鐘。但為了不引起外界的懷疑，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人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這才神不知鬼不覺地由便門進入會場。會場內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的，從外面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這個程度，可以說是滴水不露，加上對外嚴密封鎖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開的時間和地點，甚至不知道有這回事。所以，當 4 月 1 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以高亢洪亮的聲音播出九大開幕的消息時，國內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經召開。這件事情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外國媒體迅速報導了大會召開的消息，同時都很驚訝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看了之後也像是打了一場大勝仗一樣，非常高興。

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 月 24 日，九大進行了選舉，共選出中央委員 170 人，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只有 53 人繼續當選，不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一

些德高望重的老幹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勢力卻大大增長，林彪手下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青集團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躍進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黨的組織上的嚴重混亂。

在這次選舉中，只有兩個人得了全票，一個自然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頗具有傳奇色彩。他 1935 年出生在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解放後先後在太原鋼廠和齊齊哈爾北滿鋼廠當工人。1969 年九大召開以前，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必須是有 7 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中意的人選要麼不是黨員，要麼是黨齡不到 7 年，陰差陽錯的，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當了代表，還一下子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原來，當時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國沒有名氣，誰也不會想到他會被選上中央委員，也都沒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劃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謙虛，選了自己，結果使自己成了 170 名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當大會宣佈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全場頓時議論紛紛，因為作為副統帥的林彪比他還差兩票呢。

作者：《黨史縱覽》/郭玉振（北京）

九大召開後，上海市革會在傳達“九大”精神中講到：不是中共黨員也有參加“九大”的，如山東省青島市的造反隊負責人

第七節 一打三反運動

一打三反運動源於 1970 年中共中央發出的 3 個檔。1 月 31 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 月 5 日“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簡稱“一打三反”是文革中“鬥、批、改”的一

個重要措施。“一打三反”運動寫進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會議公報。

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指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絕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的小組成員。（注：“五。一六”組織原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這都歸入一打三反運動。

一、 胡守鈞小集團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姚文元在毛澤東批示照辦的檔“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下，在全市範圍內各大中小單位開展了轟轟烈烈，又人人自危的“一打三反”運動。在運動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復旦大學“胡守鈞小集團”的反革命案件。胡守鈞當時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名義上是復旦大學鬥爭胡守鈞，實際上是上海市革會抓的典型案子，更是響應毛澤東“一打三反”運動的具體行動。用學生們的鮮血染紅了頂子。王洪文（時任上海市革會副主任，第三把手）在復旦大學“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胡守鈞小集團反革命罪行大會”上，代表市革會作了發言。在發言的最後指出：“同志們、戰友們！目前革命形勢大好，“一打三反”的運動正在穩步地節節進展。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沿著黨的“九大”指引的勝利航向——認真學習毛主席親自批發的北大的三個經驗，認真學習兄弟省市的先進經驗，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肅”的教導，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將這場偉大的鬥爭進行到底”。在這案件中將胡守鈞與同學、朋友來往的信件、言論摘錄後出了四本革命大批文選，又有有關材料關押、下放到農場，涉及到近百人左右。

二、 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 王銳：

筆者在拙作《誰簽署了遇羅克的處決令》中有一個小節《“一打三反”運動與周恩來》，其中提及，就這場“一打三反”運動而言（遇羅克等就殉難於“一打三反”），筆者在毛澤東文革講話及文稿中尋不到半點依據，就此推斷“一打三反”運動，是當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動並主導的。

《遇》文主要是談遇羅克遇難經過及相關情形，未能對“一打三反”運動，尤其是與周恩來的關係作更多研討。之後，筆者經友人建議，就此問題進一步探討，其結果顯示，這場對國人為害甚烈，而影響甚至到文革結束後的 1980 年代初，長達 10 餘年的“一打三反”運動，確實是周恩來要負主要責任的。

三、 周恩來為“戰備”發動“一打三反”運動

“一打三反”運動發起於 1970 年 1 月，其依據是當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以及 2 月 5 日發出的《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其後，相關檔材料及報刊簡稱為“一打三反”運動。

其實，這個所謂“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於“一打”。因為“三反”，“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屬經濟範圍，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鋪張浪費”，更是工作作風問題，連犯罪也談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問題，是怕危及政權的核心要害。從日後各地貫徹執行看，此運動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會政工組 1970 年 3 月 24 日編發的《政工簡報》第 11 期在“合肥市‘一打三反’運動一個月來情況綜述”中就說：“這次運動只要我們切實把握‘一打三反’

的精神，突出一個‘打’字，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簡報”中另一篇安徽絲綢廠的經驗文章標題更為直接：《突出一個“打”字，狠抓一個“准”字》（摘抄自該《政工簡報》原件）。

因之，弄清這份《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如何出臺的，就成了問題的關鍵。各方資料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臺是周恩來的意思並親自主導，而非出於毛澤東的相關指示。

首先，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找到依據。該《年譜》1970年1月30日記載如下。

1月30日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4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這個記載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來主持相關會議（極可能是政治局會議）“幾經討論”後，送交毛澤東批示的。特別是“我們……認為現在需要”這種句式和語氣，明確表明是周主動搞這樣一個檔，而不是受毛澤東指令被動地這麼做。

同時，筆者查證，在另一個更顯權威性的官方文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記載表述中，這種主動與被動的關係更為清楚明確。《文稿》在《對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指示稿的批語》篇目中，這份“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的毛澤東批語僅有兩個字：“照辦”。而在其“注釋”中，則對這份檔的出臺因由經過和具體內容有以下詳細記載和說明：

周恩來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審的這個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為落實戰備，鞏固國防，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予以打擊。……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寫道：“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閱後，寫了這個批語。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這個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第 77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可見，這份至關重要的、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數萬人被處決的中共中央《指示》，從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幾經討論”，再到報送毛澤東批示，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而且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包括回憶文字）顯示，是毛澤東讓周恩來如此搞的。而大規模開展“打擊反革命”的原始動機，如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所述，是為“戰備”考慮，“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

（本文寫成後，筆者在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中，看到一個間接的材料——吳法憲傳達 1970 年 5 月毛澤東關於當前形勢的指示：國內方面，毛主席對三件事情很讚賞，一是全國計畫工作會議，二是中央發的三個檔，三是戰備。其中“三個檔”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個文件。關於“一打三反”，毛的原話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擴大化，投機倒把、貪汙盜竊，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賠的就賠，退賠實在困難的可以減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對“一打三反”最核心最關鍵的“打擊反革命”，毛沒有提及。其詳待考。）

四、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解讀

筆者手中沒有這份檔的原始文本，不過，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

《毛建國文稿》中那段“注釋”，都有該檔的內容簡述。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收錄了原文件全文外，筆者查到內地公開出版物中記敘最詳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的 4 卷本《共和國史記》第三卷中的記載，所引文字都打了引號，應是編者直接從這份中共中央檔中摘錄下來的。

關於出臺這個檔的由來和動機。《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有的散佈戰爭恐怖，造謠惑眾；有的盜竊國家機密，為敵效勞；有的趁機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聯，陰謀暴亂；有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有的破壞插隊、下放，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無惡不做，危害很大。”（引號內的文字完全錄自該書，下同）

關於具體內容。《指示》要求：“一、要放手發動群眾。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是打擊蘇修侵略陰謀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項重要的戰備工作。”“二、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嚴格區分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敵我，區別輕重。”“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對於那些罪惡雖屬嚴重，但民憤不大者，可分別判以死緩或無期徒刑；罪行較重，必須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對於那些罪行較輕者，可交群眾嚴加管制。”“四、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

執行。這樣才會人心大快，敵人震懾。但是，殺人不可過多，殺的應是極少數，關的亦不應多，管的是大多數。”“五、要統一掌握批准許可權。按照中央規定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六、要加強領導。必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具體指導，深入實施。”（以上見《共和國史記》第三卷 527 頁至 528 頁，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

筆者以為，以上 6 款內容，最重要的是 2、3、4、5 等 4 款，第 2 款規定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第 3 款是規定打擊手段是關、管、殺，尤其強調“對於那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為日後的大規模處決行動，開了綠燈。這也是導致遇羅克，及以後的張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處決的依據。第 4 款是規定“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文革中以及其後數十年間普遍實行的對罪犯搞“公判大會”、“遊街示眾”的由來和政策依據。第 5 款是將殺人許可權重新交與地方，中央僅是“備案”。這是 1960 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決權以來最重大的變動。

五、 周恩來對“一打三反”運動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周恩來主持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一打三反”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他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並作過一系列明確指示。僅以《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就可以知曉他對此運動的重視和關注之切。

3 月 5 日對國防科委九院某廠追查反革命組織問題指示：一要抓緊，二要注意政策；要“穩、准、狠”，特別是“准”字，強調：防止“逼、供、信”，肅反發展到追查反革命組織時要慎重，要防止擴大化。（《周恩來年譜》下卷第 352 頁）

3月31日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二十九日關於新疆地區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情況的彙報批示陳伯達、康生：“我意打擊罪大惡極、證據確鑿的頭頭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國集團要嚴，處理受蒙蔽被脅從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寬，否則就有擴大化的危險，應提起他們注意。”（同上第359頁）

4月針對“一打三反”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一打三反”已開展，運動未起來時往往右傾，起來後則易“左”傾，“逼、供、信”，亂提口號。（同上第364頁）

6月18日將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產量下降情況的簡報批給李先念、餘秋裏，指出：要抓這七個省的鬆勁現象，要“敲警鐘”。“因為這七個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龍江、北京外，均減產。這不是個別問題，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產節約’運動後一種反常現象，應引起各地嚴重注意。防保守，排極左，仍然是當前主要任務。”（同上第374頁）

12月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會議的彙報。會上，批評公安部四年沒開會，專案組亦有神秘化傾向，提出：專政機關不專政比什麼都嚴重，但殺人也不可過多，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同上第413頁）

從這一系列指示中不難看出，周恩來儘管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相當繁忙，日理萬機，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體行動上，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仍是將“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作為頭等大事在抓，在過問，細緻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單位的運動都有具體指示。甚至在研究解決北方7省煤炭產量下降這種純生產性問題時，也硬要將之與“一打三反”聯繫起來，要求相關領導在運動中要“防保守，排極左”。

六、北京市為各省市“打擊反革命”作樣板示範

中共搞政治運動以至經濟活動，向來喜歡搞“樣板”、作示範，比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以至文藝上的“樣板戲”等。周恩來搞這場“打擊反革命”運動，也不例外，運動發動之初，就為各省、市、自治區樹立起一個“樣板”，這就是北京市。

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 1970 年 1 月 30 日發出的，但中央內部及相關部門的醞釀準備要早一些，內定為全國“樣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發出之前就已經動手執行。

在該檔發出三天前的 1970 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號稱 10 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 19 人（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 19 號判決書。筆者在寫《遇》文時，曾疑其時間，以為這批人是在 3 月 5 日與遇羅克一批被處決，其實真正是這個日期，與遇羅克不是同一批）。而此前的 1 月 9 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 20 人“處決名單”。也就是說，早在 1970 年 1 月初，在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出臺前大約一個月（擬定名單到印發《通知》起碼得有幾天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已經在著手“打擊反革命”，並擬定了第一批處決名單。

筆者在研究這段史料時，發現其間有個很值得史家重視的“時間差”。也就是在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下發前，北京市有關機構實際上已經在開始行動。換句話說，毛澤東本人尚未審閱並作批示，周恩來主導或授意下已經在具體實施（這麼大的決策不可能是謝富治或是比他級別更低的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副主任劉傳新能夠作主的）。這明顯就有點“先

斬後奏”的味道。這也是 10 年文革中筆者僅見的，中共重大政治運動出現了毛澤東本人尚未批示，周恩來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經實際上在著手實施的情況。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會”處決後，不到半個月的 2 月 11 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公佈了包括“北大才子”顧文選、沈元，以及張郎郎、聞佳等在內的 55 人“罪行”名單。之後的 3 月 5 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 18 人，加上遇羅克共 19 人，同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 10 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北京市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 30 號判決書）。同一天，聞佳被北京市西城區公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北京西城區公法軍管會[70]刑字第 10 號判決書。其他區縣情況不詳）。遇羅克被處決的 3 月 5 日這天，北京市區（縣）在同時行動開“公判大會”（起碼西城區如此），是在落實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關於“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以達到“人心大快，敵人震懾”的效果。

一個多月後的 4 月 18 日，這份名單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處決。

（余傑《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學家沈元》）

不到三個月時間，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就如此高密度，強態勢地開展宣判處決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為全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樣板”，給各省、市、自治區當局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做出示範，以促進全國此項政治運動的開展。

有中央如此嚴厲而具體的指示，有周恩來如此的關注過問，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樣板”示範和帶動，聲勢浩大，規模和範圍空前的“一打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處決浪潮。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動得比較早也跟得很堅決的是許世友坐鎮的江蘇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查金華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楊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中說：

查金華是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頭一個被槍斃的人，僅僅因為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小組，用馬列的觀點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一點懷疑，於是這個認真的年輕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第126頁，朝華出版社，1993年1月）。

為強化運動聲勢，江蘇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華日報》，破例於當天出了“下午版”，在報導公判大會實況同時，發表“大號黑體字”排印的極帶殺氣的社論《堅決鎮壓反革命》。沒料，此舉引來“反彈”，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讓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處決。

查金華被處決及預示大恐怖開始的《新華日報》“2·12”社論，引起一些民眾尤其與查金華一樣具有點獨立意識的年輕人的不滿乃至憤怒，並以行動表達自己的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鄉蘇北的高中生陳卓然及安姓同學，當天用剪刀剪下社論上的一些字，用這些字再組成表達不滿抗議的類似“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條“標語”貼於紙上，於夜間張貼于南京主要街道。

標語出現，轟動南京，省市公安機關忙成一團，作要案偵查。“排查幾乎落到每一個人頭上，尤其是回城知識青年。”兩個月後，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時年僅20歲的南京8中學生陳卓然於1970年4月28日在五臺山體育場萬人

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同時被處決另有 10 餘人。同案的安姓同學判刑 15 年。（以上見《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

1970 年 3 月 19 日，“文革思想者”張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廟”體育場公判大會後被處決（張 2 月 25 日被捕，從逮捕到處決僅 22 天）。

1970 年 4 月 14 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應星等，在甘肅被處決。49 歲的女教師毛應星，其兄毛應鬥曾就職於著名的西南聯大圖書館，與時在聯大附中任教的諾獎獲得者楊振寧是摯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間，曾參加西南聯大組織的假期旅行活動，與楊振寧等一起受到過地方軍政首腦接待並合影。毛又喜歡集郵、收藏有一些國家領導人肖像郵票。毛應鬥後來與楊振寧、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學。赴美前，曾將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郵票）交妹妹毛應星保管。沒想到這些照片和郵票竟成了文革中將妹妹送上斷頭臺的“罪證”之一。

毛應星 1969 年 7 月 1 日被判刑 5 年，關押於甘肅省第四監獄，其在獄中對文革現實及中國革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寫下 30 多萬字筆記。“一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對其“罪行”的認定升級，甘肅省革委會 4 月 3 日討論該案時，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表態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家庭。”（指其兄毛應鬥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 12 年）。6 天後的 4 月 9 日，當局派人于獄中向毛應星宣佈死刑判決。4 月 14 日押赴刑場處決前，上午 9 時，有關人員與之在監室中有這樣一段頗意味深長的對話：“今天將要執行，你有什麼話要說？”毛答：“我沒有說的話，我認為我的問題只有到中央才能解決。這個執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沒有意見。”可悲可歎的是，毛應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於死命的這個運動恰恰是來自中央！這正是文革中許多人難以逃脫的“誤區”之一，認為所有的“壞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況下，地方上搞出來的。

而不管毛澤東代表的中央，還是周恩來實際主持的中央，始終是“英明、偉大、正確”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歲的女知青丁祖曉被處決。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華等，在新疆被處決。……

總之，全國各地都緊跟在北京市之後，大張旗鼓，大造聲勢地展開宣判處決“反革命”行動，惟恐落後或開展不力。

七、北京“西單商場爆炸案”被舊案重提

“一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各地都有一批過去已被定案了結的“舊案”，被重新翻找出來，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來重新審視，來個“舊案重提”、“舊案新審”（遇羅克案、張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處決的“文革思想者”，其實都是“舊案重提”、“舊案新審”）。

曾經轟動海內外的“北京西單商場爆炸案”，在已經定案結案的情況下，被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有關人員翻出來，重新審理偵辦，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單商場發生爆炸事件。爆炸發生在下午6時45分，爆炸中心位於商場南門左側，被炸面積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爆炸產生的衝擊波將東面60米內的東西全部震碎。5人當場殞命，100多人受傷。

這是中共執政以來，首都第一次發生如此嚴重而慘烈的爆炸事件。鑒於文革的特殊形勢和國際國內背景，許多人認為此爆炸事件非同尋常。公安機關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國外特務機關派來的特務幹的。京城反響強烈，周恩來親自對該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緊偵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聲響起時，西城公安局的 60 名幹警正在作檢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請示、晚彙報”中“口齒不清”。案件一出，經周恩來特批，他們立即解脫，投入到了案件的偵破中。

經現場勘察，公安機關發現炸死的 5 人中有 4 人身份很快查實，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時偵察員還在該屍體周圍發現棉花和導火索，還有兩張遼寧省糧票，而這些與後來技術人員鑒定的棉花導火索的產地相吻合。同時技術人員根據現場勘查情況推斷，炸藥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懸空爆炸的。

鑒於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國共有 17 個省市公安廳、局，緊急協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據現場遼寧省糧票這一線索，遼寧省成了重點破案地。5 月初，案偵取得突破性進展。5 月 11 日，經家屬確認，死者系農民董世侯，家住遼寧，參加過當地的水利建設，用炸藥開採過石頭。深入當地的調查中，有人證實，其偷過製造炸藥的一些物品，在世時也多次表示對現實不滿。經上述調查結果認定，董世侯就是西單商場爆炸案的案犯。並就此結案。

然而，事過近兩年之後，在“一打三反”的嚴峻形勢下，在階級鬥爭理論和“深挖現行反革命”的辦案指導思想下，有人對“西單商場爆炸案”又舊案重提，北京市區兩級公安機關重新立案偵辦。爆炸案件製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偵辦自然又會牽涉殃及一批無辜。

辦案人員的傳統法寶是刑訊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對象被嚴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願意再冤及更多的無辜者，在獄中兩次自殺未果。事情報到周恩來那裏。按理說，周對當年“西單商場爆炸案”偵結情況及結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製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現在被偵辦的自然無辜者。然而，他對此作出的

相關批示卻耐人尋味。1970年2月27日，周恩來批示說：“待其蘇醒過來，必須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養，不忙追供，然後才能弄個水落石出；否則，已自殺兩次，惶惶不安，可能亂說亂供，或者仍會自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51頁）

周恩來這裏的批示，關注的不是這個被逼兩次自殺的無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機關偵辦人員是否刑訊逼供，而主要是關心是否“能弄個水落石出”。批示有關部門“使其安心休養”，也不是真正從人道主義出發，主要目的還是立足於日後再追供。

八、 劉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鐵根被處決於“一打三反”

蔡鐵根是一個有紅軍經歷的高級軍事參謀人員，曾任職中央軍委。劉伯承元帥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組建南京軍事學院，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蔡鐵根被劉任命為學院訓練部部長，是劉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軍授銜時授大校銜，差一點成為將軍。

1958年“大躍進”背景下，為貫徹中央關於反右傾，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彭德懷主持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掀起一場“反教條主義”風暴，矛頭對準劉伯承元帥主持的軍事學院和與總參平行的訓練總監部（劉伯承兼任部長，建於1956年）的批判。這個以“反教條主義”為名的建國以來第一場軍內大批判，最初由時任國防部長並實際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發起並主持，黃克誠主持的總政治部具體執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綱上線亦不太高。到了當年6月，形勢陡變，原因是毛澤東於會議期間的6月23日、29日連續發話。批評“教條主義”，還點名批了劉伯承。

由此，軍委擴大會驟然升溫，會上對劉伯承元帥及手下將領展開了越來越出格，上綱越來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線鬥爭”，是“向黨進攻”、“反黨反中央”。在此壓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養的劉伯承，被迫冒著雙眼失明的危險趕回北京在大會上作檢查。違心地主動承認錯誤，試圖保護手下一批將領。

但會上鬥爭批判的火力和勢頭仍是不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劉帥得力下屬，訓練部部長的蔡鐵根挺身而出為劉帥及肖克、李達等一批高級將領當眾說了句公道話，並由此惹火燒身。當事人肖克將軍回憶當時場景：“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准的，話未說完即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連轟帶扭，趕出會場，關押起來。”肖克將軍對蔡鐵根當場被關押一事感歎說：“眼前發生的這一切真是觸目驚心！這是我入黨以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情，而且竟發生在一千幾百位我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我真是痛心極了。”（肖克《建國後的第一次軍內大批判》，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第 186 頁至 189 頁，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這場“反教條主義”的軍內政治運動落幕之後，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大批高級將領受到撤職，或是降薪降級處理。最嚴重的是開除軍籍，安置地方。蔡鐵根是少數挨整最重者，被開除軍職，降薪降級，安置到江蘇省常州市商業局某下屬公司。

在常州期間，蔡與一些有獨立見解，對時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為有軍方背景的幹部），其中有同他一樣被從軍內處理到地方的某部團級幹部吳翼等。由此被有關方面注意，列為“政治案件”。再後來，上升為“反革命集團”，蔡鐵根作為“首犯”被拘留，關押入獄。獄中蔡鐵根曾三次絕食抗議，並曾想逃出監獄赴京告狀，被察覺後甚至上了鐵鐐。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將與蔡有牽連的15人，以辦“學習班”名義集中審查，15個物件竟建立起15個專案小組。“學習班”結束，未作定論。“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整個案件驟然升溫。3月初，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作出判決，以“蔡鐵根、吳翼為首糾合反革命活動”之名，判蔡鐵根、李業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長，40年代從事革命的老地下黨員）死刑立即執行，吳翼死緩。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時，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飯。飯後五花大綁帶至一房間宣佈判決。荒唐的是，拘押多年，處決時才宣佈“正式逮捕”。先是讀“逮捕證”，之後是死刑等判決。據現場目擊者說，蔡鐵根當場抗議：“你們無權判我，我要上訴！”回答是：“不准上訴！”蔡感歎：“不可思議！我革命幾十年……”臨刑前，蔡與被判“死緩”的吳翼道別說：“你看過古戲《搜孤救孤》沒有？”吳說：“看過。”蔡說：“活著的，要把這個官司打到底！”當天上午9時40分，蔡鐵根、李業舫等，被槍殺於常州市西門外公墓刑場。老紅軍蔡鐵根被處決時，年56歲。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當年黨內軍內鬥爭的荒謬和殘酷，也讓人看到當年所謂“一打三反”運動中，究竟打的是些什麼樣的“反革命”。

九、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

周恩來發動並主持的這場“一打三反”運動，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時，卻在當年12月被突然打斷而逐漸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動力，筆者認為有兩方面原因。大的背景來說，全國政治形勢有變，這就是當年夏天第二次“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的翻船。毛澤東決心趁此收拾“副統帥”林彪，並於會後先黨內後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批陳整風”運動。毛澤東向來更關心自己身邊的高層權力鬥爭。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運動不得不讓路。

另一個原因更為直接，對發動並一直主持“一打三反”運動周恩來可謂是迎頭一棒，這就是毛澤東突然以嚴厲話語批評“一打三反”運動“殺人過多”。

毛澤東是何時察覺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殺人太多，又是如何發話予以制止的，相關文獻並無準確記載，不過，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來年譜》有如下記載：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最近對鎮反問題重要指示的請示報告》。次日，將根據政治局會議意見所擬中央對公安部報告的批復稿報送毛澤東、林彪。同時，附信說明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整個公安工作及其幹部隊伍遭受嚴重損失的情況，並介紹於十二月中旬召開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議題，即認真落實毛主席關於鎮反、審幹的政策，逐步恢復在各級黨委領導下的公安部門上下級聯繫和業務關係；而當前則應貫徹毛澤東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殺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報告經毛澤東批准，以中共中央檔發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424頁）

最近，筆者有幸從故紙堆中查到了一份當年中共中央檔原件，才弄清楚當年毛澤東批評的原話。

這是《周恩來年譜》中提到過的編號為“中發（1971）20號”的一份《中央批轉〈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發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會議紀要》的第一部份，《一、會議的收穫》有這樣一段話：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對公安工作非常關懷，會前，毛主席提出了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重要指示。會議期間，毛主席對一九七一年中發一號文件親自指示“照辦”，又作了對公安工作要一分為二的重

要指示。這對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提高路線鬥爭覺悟，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摘自文件原件第 3 至 4 頁）。

其中，“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照辦”、“對公安工作要一分為二”三句話用的是黑體字，按當時的慣例，表明此為毛澤東的原話。最關鍵的“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一句，檔說是毛澤東在“會前”（即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之前）說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於 1970 年 12 月 11 日至 1971 年 2 月 11 日（開了整整兩個月）。毛澤東發出這個指示，應當是在這之前的 12 月上旬或 11 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傳達貫徹毛澤東指示不力或不及時之嫌了）。

分析毛澤東這個指示，可以說是表達了毛澤東對當時各地濫捕濫殺的不滿。

“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話。周恩來遭毛澤東如此當頭棒喝，可以說完全措手不及，一時也亂了方寸。這才有了《周恩來年譜》所記載的那一系列舉措，又是讓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弄出一份《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最近對鎮反問題重要指示的請示報告》出來，又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對之討論修改，然後將該報告及政治局意見分別報送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自己又附一長信，詳談文革以來公安工作情況，第十五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議題，以及如何落實毛這個指示，制止濫捕濫殺等等。而這一系列舉措的直接結果，就是“一打三反”運動的降溫。

行文至此，筆者不得不多說幾句。“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這句話竟然出自毛澤東之口，這實在耐人尋味，也值得史家重視。就毛澤東而言，他曾經稱自己（或是以他為代表的中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在 1950 年代初期，大規模“鎮反”時，毛多次親自代中央草擬電令，讓各地加緊“鎮反”，甚至給地方規定處決指標。這些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都有記載。不過，那以後，對捕人殺

人（尤其是殺人），卻持謹慎態度。1955年開始的第二次鎮反（肅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風審幹時“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否定了黨內有些人要處決胡風、潘漢年等人的主張。“二次鎮反”及羅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躍進”搞“第三次鎮反”（捕所謂“反革命”極多），處決的人確實大減。一直到這次周恩來搞“一打三反”，10年來算是重新大開殺戒。從毛澤東對此表示的不滿，以至說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這樣的話來，從中大致可以體察出毛對“殺人治國”舉措的心跡變化。反過來對周恩來來說，從其發動並一直主導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帶來10餘年惡果的“打擊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檔來看，不難體察得出其一貫的“治國思路”。他確有“靠殺人來統治”的意圖和傾向，否則不會造成遇羅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慘遭處決的全國普遍現象。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關文字披露，毛澤東是在什麼時間、地點，什麼人在場的情況下，對誰說這句話的？不過，筆者認為，不管毛澤東在什麼情形下，出於什麼樣的動機說出的這番話，還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話。因為世界上不管什麼政權，哪一個政黨執政，確實不能“靠殺人來統治”。當然，還應再補充一句：“也不是靠勞改、勞教來統治”（正是這份中共中央轉發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復和整頓被文革中斷影響了的勞改、勞教制度）。

十、“一打三反”運動的終結和惡果

這場“一打三反”運動到底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學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提供了相關資料：“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3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關於這些資料的出處，海外文革學者王友琴女士在《顧文選的故事》中評述說：“該書沒有提供數位出處。問及該書作者，他說書中這類數字都是中共中央檔上抄下來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這些檔。”不過王友琴女士質疑這些資料，尤其是死刑數。王友琴寫道：“既然是政權機構所做，應該有一個文字記錄。不管定死罪的標準是什麼，殺了多少個人應該至少有記錄在案。王年一書中竟然只能用‘數以千計’這樣一個對死刑判決來說是太含糊的數字。另外，‘數以千計’在數量級上也離開實際情況很遠。從各地都大批槍斃人的密度來看，全國被槍斃的人的數字不可能只是數千。”王友琴女士質疑這個“死刑”數字的依據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鎮反”運動時，中央（實際是毛澤東講話中）給各地規定的“殺人指標”（殺人按人口比例實施，也算是中共的獨創）。當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指出：“各地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王友琴引自華齡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

“這段話後來印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頁，只是少了‘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這一句。”（以上見王友琴《顧文選的故事》）

筆者也對“一打三反”處決數為數千人這一說法存疑。照當時中國人口官方數字以6億人計，農村4億多，城市近2億人計算，按“鎮反”殺人指標，起碼有數十萬之多。當然，由於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高潮僅有10個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轉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鎮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開足馬力搞下去，

搞上幾年，說不定能達到當年“鎮反”的規模。不過，恐怕“一打三反”運動當年實際處決數達數萬人之多是真實的。

關於這場“一打三反”運動開展和持續的時間，就全國範圍來講，在毛澤東作出那個關於“殺人”的指示後，“一打三反”的勢頭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漸停止下來。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中，對“一打三反”運動給出的資料統計，以**1970年2月到11月**為限。這大概反映出官方學界對這場運動時限的認定。

從實際情況看，這場運動並沒有立即停下來（只不過確實減弱了勢頭），中共中央也沒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發出的中共中央檔，其通知正文中雖然沒再提“一打三反”運動，但轉發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卻在肯定及例舉這場“一打三反”的業績的同時，在《今後工作意見》部份，還繼續給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發出這樣的指示：

（二）繼續抓緊“一打三反”運動。要加強調查研究，分析敵情，總結經驗，克服麻痹鬆勁情緒，深入發動群眾，打擊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把運動搞深搞透。結合“一打三反”運動，認真抓好社會上特別是城市街道的清隊工作。要認真學習北京六廠二校的先進經驗，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錯誤傾向，全面落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等無產階級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頁）

由於種種原因，這場運動在各地的進展和持續時間不盡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續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學者麥克法誇爾和沈邁克所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頁）一書中，提供了有關於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運動的不同進度和相關資料，說明這場運動在全國各地的開展和持續時間不大相同。該書中寫道：

在北京城區，“一打三反”運動一直延續到了 1970 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內的大多數地區，運動延續的時間要長得多，一直到 1972 年、1973 年中央當局才收到了運動“勝利結束”的報告。1972 年 1 月，黑龍江革命委員會把“在全省財貿戰線”破獲的 3173 起“政治案件”和 37462 起“經濟案件”歸功於“一打三反”運動的成功開展。（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1949.10—1989.12）》，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 頁）在同一個月，廣州市當局宣佈在運動中破獲了 2168 起“大案”，發現了 147 個“反革命集團”。（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廣州黨史大事記》，313 頁）在河北省保定市，運動一直延續到了 1972 年 12 月，在接連 7 場公開審判會上緊張達到了高潮，17 人被處決，1325 人得到了從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懲處。（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保定黨史大事記（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361 頁）在上海，運動在 1972 年底漸漸平息。在該市郊區的 10 個縣，有 64000 人被揪出來進行鬥爭。其中有 520 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中冊，523 頁）

從以上材料中可見，“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各省、市的進程和結束時間，有很大不同。這方面的情況，還有待史學界進一步研究。

2010 年 5 月 20 日初稿 8 月 10 日二稿

附：我們應該怎樣記憶歷史——“一打三反”四十周年反思

作者：白磊（本文寫於 2010 年）

四十年前，即 1970 年的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1970】3 號檔：《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檔的主要內容在一、二、五條“一、要放

手發動群眾，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二、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五、要統一掌握批准許可權。按照中央規定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2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1970】5號檔和6號文件：《關於反對貪汙浪費、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5號檔指出：一小撮階級敵人……夥同暗藏在財經部門的壞人，內外勾結，侵吞國家財物；有的倒販票證，倒賣國家物資；有的私設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俱樂部；有的行賄、受賄，走後門、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動，謀取暴利。《指示》要求開展一場反對盜竊、投機倒把的群眾運動，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非法犯罪事件，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直至槍斃一小批最嚴重的貪汙盜竊犯和投機倒把犯。

這三個檔被官方概括為“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文革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打三反”運動即由此得名。

請看這場運動的赫赫“戰果”——

從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個月時間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48萬多名。（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周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9，第330頁）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

北京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一案中的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南京馬列小組的組織者查金華，以及為他鳴不平的陳卓然；廈

門書寫“反動標語”的僑生洪滄海；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海南白沙縣某團女醫生官明華；上海靜安區“破壞樣板戲”的談元泉；蘭州甘肅師範大學反對階級鬥爭歷史觀的老教授張師亮；南昌反對個人迷信的青年吳曉飛.....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極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649—650 頁）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五千多“有問題的物件”、“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據文革研究學者丁抒先生的調查統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員的數字應該在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丁抒《文革死亡人數一家之言》，摘自官史和官方檔中對陝西的“一打三反”的情況鮮有提及，筆者不揣固陋，補述如下——

1970 年 2 月 10 日，中共西安市革委會核心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 3、5、6 號中央文件，對“一打三反”運動作了具體部署。運動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動群眾，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清理。截至 3 月底，全市共檢舉、揭發各種問題 15 萬餘件，涉及 42000 多人。許多單位出現亂揭發、亂揪鬥，甚至製造假案，誣陷好人。不少單位把原有的專政物件，不管有無破壞活動，一律拉出來批鬥。有的單位揪住一些人小偷小摸、男女關係等問題不放，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許多人被隨便抄家，追查銀行存款，採取隔離措施，甚至刑訊逼供。運動開始僅 2 個月，全市就有 89 人逃跑，160 人自殺（死亡 125 人）。

第二階段是開展大批判。各系統、各單位普遍舉行學習班，召開講用會，開展大批判、小評論，揭批所謂“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資本主義傾向和資產階級思想作風”。

在大批判中，工廠著重批判所謂“貪大求洋、爬行主義、物質刺激和技術掛帥等修正主義黑貨”；農村重點批判所謂“重副輕農、棄農經商的資本主義道路”。結果，幹部、群眾思想更加混亂，生產、科研受到影響。城鄉批判所謂“管、卡、壓”之後，無政府主義更加氾濫。

第三階段是定案處理。到 1970 年底，全市共清查出被認定有政治問題的 7451 人，其中所謂集團案 33 起；有經濟問題的 18875 人，計金額 659 萬餘元，糧食（含糧票額）70 萬公斤，布票額 9000 余米。定案處理時，587 人受到刑事處罰。這場運動，雖查處了一些應處理的人和事，但在左傾思想指導和派性幹擾下，又造成許多冤假錯案。（《西安市志政治軍事卷》，西安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西安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 73 頁）

原西安第八設計院技術員施大偉，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不滿，對 1957 年至文革期間的一些方針、政策進行議論，1970 年 3 月被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原市衛生宣教館美工余正常，僅因為保存部分名人字畫及自己創作的寫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保存黑畫、利用黑畫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由，按反革命罪處以死刑。

在西安交通大學，2 月 16 日至 21 日，學校舉辦校、系兩級幹部貫徹中央三、五、六號檔學習班。27 日，全校召開了貫徹中央“三、五、六號檔”動員大會。軍宣隊負責人做動員，說這次“三、五、六”運動是“清隊”的繼續。隨後，各單位又紛紛舉行群眾學習班，運動進入“四大”（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

理)、“三批”(批判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批判資本主義的傾向、批判資產階級作風)。1969年剛剛結束緊張的“清理階級隊伍”，經過短短的時間，恐怖、緊張的階級鬥爭氣氛又籠罩整個學校。4月初，工、軍宣隊舉辦“三、五、六”學習班，全校職員1350多人被按聯隊編制，集中起來住進幾棟樓房，限制教工自由，劃定活動範圍，不得隨便離開，星期日也不能休息，一般不准請假(《西安交通大學文革大事記》，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4月1日，全校集中舉辦“三、五、六”學習班開學。軍宣隊負責人做了總動員。在這之前，3月31日，學習班召開了全體黨員大會。儘管“清隊”已搞了兩年多，後果極為嚴重，但此時的軍宣隊負責人仍說：“交大有一條又粗又長的黑線”、“隱藏了一個很深的特務集團”，“潛伏著國民黨殘渣餘孽、特務、叛徒”，什麼“叛國通敵者有之”、“盜竊機密者有之”、“刺探軍情者有之”、“殺人行兇者有之”、“反攻倒算者有之”等等，把交大的敵情和政治情況說得非常嚴重。在4月8日的連長、指導員會上，軍宣隊負責人還說：我們手中還缺乏突破口的物件，要求各連加緊準備，選好口子，並說敵人挖出多少，是衡量學習班是否辦得好的標誌之一。

學習班開學後，領導小組決定，從抓盜竊機密搞起，確定抓三名教師(其中一名是精神病患者)為打開局面的突破口。4月16日，學校召開全校批鬥大會，宣佈拘留了兩名教師。其中一名教師，早在1968年10月的“清隊”時，只因他以前曾與一些同事談論反右、大躍進、知識份子政策、文革等問題，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而加以審查、隔離、抄家。這次運動開始，他又被作為突破口之一，以所謂現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後於1972年逮捕，判刑20年。在獄中無辜被關押8年，直至粉碎“四人幫”後，1979年才宣佈無罪釋放。另一位教師，任教機械系，是因所謂“盜竊機密”被拘留，並在拘留前就被隔離，進行突擊審訊，

誘逼其承認所謂盜竊國家機密的“罪行”。6月，碑林分區結論“教育釋放”，分局通知接人，但校軍宣隊負責人卻以配合運動為由，一直拖到12月才將他接回學校。

4月16日大會後，全校掀起了一個以反對盜竊機密為中心的揭發、批判高潮。各連隊紛紛召開揭發批鬥所謂重點人的大會。一些教師被懷疑為所謂“國際間諜”、“現行反革命”，慘遭迫害。在整個“三、五、六”學習班期間，僅短短幾個月，又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其中錯定現行反革命35人，錯定反革命集團多起，6人被迫自殺致死，13人被無辜送司法機關拘捕。許多教工在“三、五、六”運動中，再次受害遭難。

陝西安康縣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以上所述，只是陝西“一打三反”的冰山一角。

這場發端於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極權政府發動的又一場大規模以言論思想迫害民眾的政治運動，在這樣一場遍及神州大地的紅色恐怖中，多少如遇羅克、張志新一樣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被處以極刑，而更多的失去生命的無辜者，則是因呼錯口號，或無意中損壞了毛的畫像。直至今日，在各地官修史書上，“一打三反”中的死亡人數仍未公開。

四十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對這一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而這一認識，取決於來自民間的記錄。我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拿起筆來，寫下當年的所見所聞，寫下自己對文革的思考。文革時期有一句口號：“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今天，我們的任務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研究進行到底”。

附： 一打三反學習班的四十種刑罰

一 背 寶 劍

將受刑者右手從右肩反向背後,左手往背後反上,然後用銬子將雙手銬住,三天三夜不松銬,飯倒在地上用舌舐,舐不淨即遭打,連屙屎、屙尿、睡覺都不松銬。受刑者有伍星雄等。

二 緊 箍 咒

先將粗麻繩在受刑者頭上反復纏上幾圈,後將繩頭兩端捆住一根木棒,執刑者手握木棒上下旋轉,使套在腦袋上的麻繩越轉越緊,頓時頭昏腦漲,眼睛發黑,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立即昏死。受刑者有曾早生等。

三 坐 轟 炸 機

將受刑者雙手反捆懸空而吊,在他脖子上掛一個籬筐,再往籬筐中放磚頭,而且逐步加多,使之如轟炸機狀,並將受刑者推拉幌蕩。受刑者有鄧裕耀等。

四 筷 子 夾 手 指

將受刑者的一隻手掌插入竹筒,然後往空隙處加插筷子,越插越多,插不進就用鐵錘敲打筷子,使之往裏硬擠,手指被擠壓得骨痛肉麻,全身發顫,汗流如雨。受刑者有皮春媚等。

五 吊 半 邊 豬

將受刑者的一個大姆指和一個大腳指分別用麻繩捆綁,然後將繩頭合攏懸空上吊,邊吊邊打,時間長了,手腳指往往被吊斷,形成終身殘廢。受刑者有唐漢春等。

六 抬 杠 子

先將受刑者打倒在地,然後用繩索將其雙手雙腳捆綁好,再用木(竹)棒從捆牢的腳手中穿過,由兩人抬起棒子的兩端上下擺動或來回走動,然後連人和杠子

一併重重的摔在地上,受刑者全身骨頭象散了架子一樣,久久昏死。受刑者有胡英祥等。

七 雷 公 尖

先讓受刑者將手掌伸直,用麻繩將五個手指紮緊,再用槌子敲打木尖,使木尖硬生生地從指縫中擠過去,俗謂十指連肝心,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鄭仲翔等。

八 四 馬 分 屍

將受刑者打倒在地,用四根繩索分別將其雙手雙腳捆緊,由四個人站在四個不同的方向捏住繩頭,使力拖拉,只拉得受刑者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受此刑的有粟匡國等。

九 金 線 吊 葫 蘆

用一根麻繩將受刑者的大姆指紮牢,懸空上吊。由於一個姆指承擔不了全身的重量,致使手指吊斷或皮肉剝落。受此刑的有胡祥等。

十 拖 泥 船

將受刑者反手捆綁,俯躺在地,然後再用繩子綁住其雙臂,由執刑者拉住繩頭,來回拖動,象拖泥船一樣在地上磨擦,使之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受此刑者有鄧雲卿等。

十一 坐 噴 氣 式 飛 機

先將受刑者雙腳捆在一起,然後將雙手向後反綁,再在脖子上套一根索子與反手捆綁的繩索子相連接,隨即臉向下背向上懸空上吊,還要在背上加放土磚一至兩個,或層層加碼,受刑者立即骨折筋斷,眼鼓舌伸,當場昏死。受此刑者有周維精等。

十二 沖 確

讓受刑者跪地,將其雙手反綁,並與雙腳捆在一起,全身成了弧形,然後將繩索一拉一放,使之前後上下擺動,額頭碰地冬冬作響,就象舊時沖確一祥,執行者哈哈大笑,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楊遠棟等。

十三 吊 頭 發

將女受刑者的頭髮紮在繩子之上,然後懸空上吊,使頭髮因承受不了全身的重量而連頭皮一併剝脫,鮮血直流,人被昏死,慘不忍睹。受此刑的有簡剪肖等。

十四 人 上 吊 人

先將受刑者雙手反綁懸空而吊,然斥將其雙腳併攏捆緊,腳下留一小圈,圈內橫插一木棒,執刑者采在木棒上任一擺動,受刑者無力承受,當場昏死。受此刑者有楊理智等。

十五 坐 快 活 凳

受刑者雙手向後反綁並上牽引至後脖,然後將反綁的雙手套入一條豎立的長凳上,隨後對豎立的長板凳猛踢一腳,凳子落地平立,受刑者遭此猛烈震動,肝腸寸斷。受刑者有劉千雲等。

十六 陪 斬

縣大米廠老工人、共產黨員謝長髮在“一打三反”中被誣為“大老虎”,死不認罪,正好縣裏槍決反革命犯劉吉生,便趁機將謝五花大綁,與死刑犯同車同跪,槍響後,謝形同死色,神智不清,從此一蹶不振。

十七 吊 秋 遷

受刑者反手捆綁至後脖,然後懸空上吊,執行者將他來回推拉,使之象打秋千一樣前後幌動不已,上吊者慘不忍睹,行刑者卻哈哈大笑。受罪的有李東元等。

十八 蛤蟆呷水

受刑者跪地,雙手向後反搏,脖子上再掛上一快 64 斤重的大雜木板,執刑者將其頭部一下一下往下按,木板也跟著一下一下往前移,於是出現了蛤蟆喝水的祥子,受刑者的脖子被撐得稀爛。受刑者有蔣子正等。

十九 拔河

先將受刑者雙手向後反綁,再在雙手臂上各套一根繩索,由執刑者二人站左右兩邊,分頭象拔河一樣緊拉不舍,硬將其兩隻胳膊拉得重疊在一起,結果輕者脫臼,重者骨折。受刑者有蔣順甫等。

二十 過軟橋

將受刑者雙手反綁,推倒在地,呈俯臥狀,讓執刑者數人在其身上背上采來采去,象過軟橋一樣。受刑者肋骨脊骨被采斷,並且屎尿直流。蔣順甫等遭此刑法。

二十一 人造拱橋

受刑者雙手反綁跪地,行刑者從後用膝蓋力頂其腰,雙手抓其雙肩,使力後扮,另一執刑者將其頭用力往後腳跟上按,成拱橋狀。馬文卿等受此酷刑。

二十二 掛燈籠

將受刑者雙手捆綁,懸空上吊,再在其腳上吊土磚,狀如燈籠,受此刑者有陳介之等。

二十三 踢足球

受刑者雙手向後反綁至後脖跪地,執刑者以其為中心圍成一圈,然後左右開弓,拳打腳踢,對受刑者象踢足球一樣踢來踢去,踢得他死去活來。受刑者有王濤等。

二十四 岩鷹呷食

受刑者跪地,雙手臂平衡伸開與肩平,用一根兩米長的木棒橫放後肩,再用繩索將雙手臂捆綁在木棒上,然後在他的前胸和肚腹上大施拳腳,使其頭不住的往下點,就象岩鷹吃食一樣。受刑者有鄧先福等。

二十五 犀 牛 望 月

受刑者雙手反綁跪地,執刑者一手捏其鼻孔,一手端其下頷,用力後扮,使其成仰頭望天之勢,而且頭越按越下,鼻孔不能出氣,脖頸和腰子被扭得嘎嘎響。受刑者有王克俊等。

二十六 反 手 吊 土 磚

將受刑者雙手向後反綁,又從脖子上套一根繩子與綁手的繩索相連接緊拉,把雙手拉至脖頸,然後再在繩索上吊土磚,一直加到五個,計重 150 斤,人被吊得崩血而死。受刑者有鄧雲橋等。

二十七 栽 跟 鬥

受刑者被反手捆綁至後頸跪地,執刑者從背後用腳猛踢,使其象栽跟鬥一樣栽了過去,又用腳踢,讓他再倒過來,如此反復不斷,受刑者被栽得頭破血流。受刑者有鄧成銘等。

二十八 推 磨

將受刑者雙手反綁至後頸跪地,再將一根木棒從背手之間往下插抵地,執刑者一人扶住木棒不動作軸心,其餘的行刑者硬推著他轉圓圈象推磨一祥,如此反復推磨,受刑者手、腿、背被磨得血肉模糊。受刑者有蔣順甫等。

二十九 跪 刑

1、跪刺蝟皮：該皮有針如鋼,強迫受刑者光膝跪上,還要在雙肩上加壓,使其越刺越深,刺入骨髓；

2、跪 凳：讓受刑者跪在木凳上，然後猛然將木凳踢倒將其重重的摔倒在地；

3、跪 柘木刺棒；

4、跪碎瓷瓦片和玻璃碴子；

5、跪碎磚頭；

受此數種跪刑的有鄧初良、劉根柱等不計其數。

三十 火 燒 眉 毛

受刑者反手被綁，跪在板凳上，執刑者用打火機打火，燒他的眉毛、鬍鬚、臉、鼻、下巴被燒焦燒爛。受此刑的有朱得喜等。

三十一 打 排 球

受刑者雙手反綁至後頸，打手在他的周圍形成圍圈，然後將受刑者象打排球一樣推來推去。受刑者有曾重元等。

三十二 人 造 天 花

將受刑者的衣服強行脫光，然後，打手們用手或別的刑具在他身上亂打、亂紮、亂抓，使其全身又青又紫，象天花一樣遍體淤傷。受刑者有謝武邵等。

三十三 壓 面

受刑者面地俯臥，手腳被捆綁，再將一根六寸圍的木棒橫放在他的背上，執刑者分別在木棒兩端用力（也有坐人的），在他的身上壓來壓去象擀麵條一樣，只壓得他骨碎筋斷，屎尿直流。受刑者有楊遠棟等。

三十四 碰 壁

抓住受刑者的頭髮，將其頭部在牆壁上亂撞亂碰，只碰得他頭破血流，形成嚴重腦震盪。受刑者有王球等。

三十五 扮 手 指

讓受刑者手掌向上,手背緊貼桌面邊沿,行刑者一手將其手掌按住不放,另一手向下猛扮其手指,使之皮綻骨折,甚至變成殘廢。受刑者有朱篤品等。

三十六 打 刑

一、拳打、腳踢、抽耳光；

二、用鐵絲、皮鞭、三角皮帶猛抽；

三、用布鞋底、皮鞋、鐵釘鞋掌嘴；

四、用木棒、竹鞭、扁担等物在全身亂打。挨以上毒打者不計其數。

三十七 掛 靈 活 牌

一、掛木板牌子加青磚。首先在受刑者脖子上用細鐵絲吊一塊六十三斤重的雜木板子。板子上再吊四個青磚。另兩人在其左右兩旁將木板來回拉鋸一樣推動,鐵絲即刻紮進皮肉。出現了一條又長又深的血痕,受刑的有朱得喜等。

二、將幾十斤重的雜木板子用麻繩掛在受刑者耳根上。受刑者耳根如刀割。

三、將受刑者脖子上掛一個籬筐。籬筐中間放煤灶心十多個。而籬筐正面又用紙糊成紙牌狀。上面寫著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表面上看去活象一張紙牌,受刑的有陳遠魁等。

三十八 劃地為牢

首先在地上劃一小圓圈,要受刑者站在其中,看守者則輪流換班在旁監視。若受刑者腳手伸出圈外,即遭毒打。腳手浮腫直到昏死。受刑者有康杏喜等。

三十九 空中罰站

先在桌面上放一條凳子,然後要受刑者用一隻腳站在凳上。另一隻腳懸空。單腿長久站立,持續時間越長越好,受刑者多次摔倒在地,痛苦難堪。受刑的有胡松江等。

四十 舐痰

受刑者在遭受種種酷刑後屈打成招,爾後又矢口否認,於是刑罰再次加碼,讓受刑者舔吃自己吐地的濃痰。白倉公社食品站職工莫萬秋就受到把濃痰舔盡的酷刑,前後折磨了七個多月,被逼瘋自盡。

第六章 林彪事件

第一節 緊急會議

1971 年全國進入全面批、改的階段，上、下級的社會系統有點正常，官方傳達了國慶日要舉行遊行活動，這是夏天的事情。隨著十月一日的臨近，到了 9 月中、下旬官方通知，今年十月一日不舉辦遊行慶祝活動，上海市革委會通知理由是：準備打仗，蘇修要發動攻擊中國的侵略活動，同時通知各單位民兵文功武衛隊伍要加強 24 小時戰備值班。於是各單位革委會紛紛做了安排並上報上級領導。9 月 22 日我所在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上海市委擴大會議精神”，根據但是會議記錄抄錄如下：

市革會緊急會議精神

一、王濤（市革委會成員，工交組負責人）

現在是處在非常時期，要有組織地疏散人口。二條腿走路，動員回鄉，疏散 4 各省，浙江、江蘇、安徽、江西，疏散人員能對口就對口，不能對口就不對口，不對口可以種田。動員回鄉，疏散、堅持生產全是、局、區、公司、廠要作計畫。除了堅持生產都要疏散。回鄉每個同志思想上要做好準備，最後要服從組織上的安排、決定，思想上要適應，不能被迫接受，各級領導要作計畫、作方案，要從最困難、最嚴重的方面去設想。工交組要有一個設想，按照工交組職工人數堅持

生產崗位占總數一半，疏散、動員回鄉占一半，郊區工廠堅持生產人員多一些，但也要做好疏散工作。關於疏散到後方去的工作，4個省落實到哪一個省、地區、工廠都由市委統一考慮安排部署。是這樣的，第一步由市委與各省領導商量，第二步由市各組辦領導與各省具體商量，第三步各個局與各個省領導具體安排。準備工作主要是三個方面：堅持生產，兩條腿走路，從前一階段工作來看立足於大不夠，現在是立足於得要保證能夠做到的，要求各單位抓緊，要在緊急情況下，立即就能疏散，社會上的疏散工作，由街道里弄負責，各個單位要積極支援配合。今天會議主要是解決疏散人員問題，另外還要解決物資疏散和物資儲存量，上海疏散儲存多少、疏散多少、疏散到哪里要有計劃，軍工生產由中央統一安排，各單位要有計劃，民用生產不能少，要多生產。小三線建設要加快，要爭取時間加快建設包括大三線。今年國慶日我們偉大領導毛主席親自批准不遊行，不召開大的慶祝活動，這是解放以來第一次，由各單位自己搞慶祝活動，國慶期間要嚴格值班制度、保密保衛制度。既要防止敵人的突然襲擊，又要防止階級敵人的破壞。有的領導叫苦，工作插不進，這是非常錯誤的，另外衛生部的工作要抓緊，醫藥的儲存、急救包、醫藥器材都要做好準備。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全國防空工作會議上指示：存戰爭徵兆工廠就要搬走，上海那麼多工廠還能留給敵人嗎？不能。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像發瘋子一樣，美帝、蘇修把氫彈、原子彈到處亂投。周總理在全國防空會議上的講話摘要：我們要有全面戰爭的準備，這對美帝、蘇修都說過，現在毛主席健在、林副主席健在，我們要準備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作為一個馬克思住的忠實信徒就應該看，要看的遠嘛，我們要準備蔣介石在東南沿海竄犯，特別是中、小規模的竄犯。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不要出岔子，你們三個軍區要負責，不能讓他們

上來，一、二個師上倆抓一把，出影響。蔣介石來你們要把他們打下去，三個軍區委要負責，蔣介石在聯合國地位未定，想用常犯大陸來轉移視線，可以混過今年的聯大表決，以上說的是常規戰。二個敵人美帝、蘇修擁有核武器，這是現代武器，準備時間短，等到發現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現在要有準備，從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要重視才能戰勝敵人。戰爭立體化了，縱深地區的城市交通樞紐、工業基地可能遭到空襲，後方可能比前方損失更大，要知道核武器殺傷力很大，我們的原子彈直徑有幾十公里，有了防護就不一樣，歷史上就是如此。毛主席指示要大搞地下工作，可以保護，可以出去，還可以上課，以為城防過時，聽天由命這是錯誤的，這是和平麻痹思想。搞城防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全國人民的關心。聽了傳達後我立即反映出：不是要打仗，一定是中央出事了，用打仗做藉口，當時市民得到反映可能也會有這種判別，只是相互之間不敢交流，怕拋進賤民隊伍，成為黑六類。

時間到了9月25日以後，市民中開始流傳林彪時間的小道消息，在自己家人或三、五好友人之間悄悄地議論林彪出事了。在議論中還不敢直呼林彪的姓名，因為大家被文化革命搞怕了，攻擊毛澤東的接班人，這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按公安6條精神是反革命罪，要被槍決。但林彪究竟出什麼事並不清楚。我也與幾個同學一起議論過，這肯能是相關部門有意放出的消息以避免直接傳達帶來極大的心理、社會衝擊。還有人議論到：上海大場機場解放軍（陸軍）卡車開進機場跑道上接管機場。

第二節 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

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節錄）

林彪

1970.08.23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擁護主席的指示。這幾個月來，主席對於這個憲法的問題和人代會的問題都是很關心的。這個憲法的修改、人代會的召開問題，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為這很必要，很合時宜。在這次國內外大好的形勢下開這個人代會和提出修改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對反帝反修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會有深遠的影響。

這次全會的三個題目，即憲法問題，計畫問題，戰備問題，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來同志剛才所講的關於這次會議的議程的安排。

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間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們黨、軍隊、國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因素總是多種的，不會是平均的，必然有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客觀的條件當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國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勢，但無很好的領導，就不能成功。我們是既有這種客觀條件，又有這種正確的領導。這種正確領導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使得我們成為勝利的國家，成為勝利以後繼續前進的國家，繼續革命的國家，而不是中途停頓的國家。沒有被世界上修正主義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為中流砥柱，這是很不容易的。擋

住這一個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地位是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在國內、國外除少數極端反動分子以外也都承認。中國革命半個世紀的歷史都證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確的方向，代表歷史發展的要求，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麼陳獨秀哪，什麼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劉少奇哪，中間還有個張國燾，還有什麼張聞天這些，照著他們的領導走下去就只會把革命引向失敗，就會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損失。我們是很幸運的，在各個嚴重的歷史關頭，靠著毛主席扭轉了這種形勢，使它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轉敗為勝。這是大量的、長時期的、重大的、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瞭的。差不多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工作是前進還是後退，是勝利還是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還是不鞏固。在過去，有的時候是鞏固的，但有的時候是不鞏固的，有些時候很不鞏固，而有些時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可以說，這已是我們看慣了的事情，例子是不勝列舉的。而這些經驗，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關於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特別是年老同志，必須把這些思想向下傳播，傳下去，講清楚。使年青的同志們知道來之不易。就是：勝利絕非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革命也可以失敗的。很多國家，象歐洲那些國家，都進行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但沒有成功，損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敗了嘛，有很好的客觀形勢，也都失敗了。很好的形勢沒有搞起來，或者搞起來失敗了。

我們革命勝利以後的二十年，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以來，繼續和更加證明毛主席思想的偉大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子，老實講，不管什麼

地方，不管什麼部門，什麼單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對毛主席著作肯學、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變。跟之而來的，就是物質的這種力量發生巨大的變化。不是小小的變化，而是一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原來認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實際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毛主席的具體政策，具體指示，具體做法，一旦深入群眾的時候，一旦群眾領會的時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發生變化。主觀世界的變化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各個地方，各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可能不太一樣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總是不平衡的，總是有差別的。敵人當然是反對了，不消說的了，就是黨內也是不平還衡的。我雖然不能經常到基層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辦法，就是派些人下去問，下去調查研究。所碰見都是這麼一種情況，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別的原因，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運用毛主席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鬥私批修，提高階級覺悟和路線覺悟。同時開展階級鬥爭，狠批資產階級思想，走資派的思想，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思想，堅決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和他在各個領域裏面的思想，以及各種具體政策，這一切對動員群眾，都起極其重要的作用。我覺得“老三篇”還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領導我們革命幾十年了，他對各種問題都接觸了，都做了深刻的調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幾十年前寫的東西，我們都覺得是比我們現在的水準高。世界上是有創造的，不但是社會科學的發展方面，是有創造的，自然科學萬面，你看那個時期沒有創造？毛主席的學說就是科學，解放人類的科學，解放無產階級的科學。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是有創造的。他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然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

有新的發展。怎麼能夠說沒有發展？

沒有發展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說事物是不發展的，思想也是不發展的，只要舊的就行了，這是過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確的思想。在歷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看法，想把思想的發展停下來，認為是已經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會歷史研究方面，都有這種人不承認發展。可是事物總是在發展。這個地球原來就是一團火，然後慢慢地又有空氣又有水，然後慢慢地有低級的生物，然後慢慢地有動物和高級動物，進入人類社會有低級的社會，高級的社會。現在我們是處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全面崩潰的時代。同一百年前的馬克思時代相比，我們這個時代是前進了很多。比列寧所處的時代也前進很多了。我們所遇到的重大事變跟當時他們所遇到的重大事變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說是沒有發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這些問題嗎？不是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回答了這些問題嗎？毛主席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現在的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相合。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毛主席的著作中間所發揮的，所具體化的，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他們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那個客觀條件，不能對於現在的新問題做出預先的答復和解決。所以，不能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

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變化的，隨著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原則，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上層一些同志的一股風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

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敢於這樣勇敢地向敵人進攻，發動革命，狠狠地打擊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資派和各種階級敵人，很廣泛地動員工農兵群眾，同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和革命魄力，他的馬列主義的最高水準，歷史的廣闊眼界，是分不開的。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這個黨、國家、軍隊，今天能夠在國內取得這種地位，在國際上取得這樣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領導幾十年來的鬥爭，是分不開的。這次憲法裏面規定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規定毛澤東思想是領導思想。我最感興趣的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

第二點，就是憲法裏面突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也是體現了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

8月2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華北組會議第2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開展了全國範圍內的“批陳整風”運動。同時，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部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康生任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一路南巡，分別與沿途的黨、政、軍領導吹風打招呼談廬山會議的情況，將林彪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二個司令部的鬥爭公開化，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事。

《我的一點意見》

毛澤東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

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擴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澤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

根據中共中央檔刊印（有手稿）

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

在講到高級幹部讀馬、列的幾本書的問題時，毛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麼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末，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基本開始嘛，不妨礙工作。”“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一講讀哲學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麼辦？其實是有時間的。你不讀點，你就不曉得。這次就是因為上當，得到教訓嘛，人家是哪一個版本，第幾版都說了，一問呢？自己沒有看過。”

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毛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在講到黨內外團結問題時，毛說：“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所謂講團結是什麼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提出團結的口號，總是好一點嘛，人多一點嘛。包括我們在座的有一些同志，歷來歷史上鬧彆扭的，現在還要鬧，我說還可以允許。此種人不可少。你曉得，世界上有這種人，你有啥辦法？一定要搞得那麼乾乾淨淨，就舒服了，就睡得著覺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時候又是一分為二。黨內黨外都要團結大多數，事情才幹得好。”

第三節 六號簡報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舒雲點評：這個簡報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的簡報”成為毛澤東打倒陳伯達的重磅炸彈，也成為“林彪集團”的導火線。以後由於鄧小平的關照，李雪峰恢復黨籍，這份“反革命簡報”也隨之平反。但是原件從未在中國中央文件中披露。

現在我們看這份檔，怎麼“聞”也不能“聞”出“反革命”的“味道”。倒是白紙黑字，看出汪東興“跳”比陳伯達還高，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可是毛澤東關押了陳伯達，卻放了汪東興。按常理高抬貴手後應該踢開汪吧，可是毛澤東卻仍讓汪東興留在身邊，委以重任，這個就意味深長了。真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華北組二十四日上、下午討論了林副主席極其重要的講話。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組會，都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另有簡報）。

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

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等十二位同志發了言。陳毅同志也發了言。

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用得好，在每個關鍵時刻，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最好、最正確，這種態度，代表了我們的心願，代表了全黨的心願，代表了全軍的心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願，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願。使我們很感動，很激動，很觸動，是個極大的督促，極大的鞭策，極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堅決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努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緊跟毛主席。劉子厚同志說，學習林副主席講話，使自己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感到更親。過去學習毛主席思想就是學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今後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學好毛澤東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觀。

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為了反擊這種反革命陰謀活動，錢學森同志首先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著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

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大家認為，不能讓妄圖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主席的陰謀得逞，不能把減少毛主席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作為藉口，實際上現在絕大多數外賓，毛主席都接見，幾乎到中國的外賓是毛主席不見不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不是一樣在接見外賓嗎！

馬福全同志說：我們河北省廣大群眾在討論憲法時，一致認為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要求憲法上寫上。

1970年8月24日 廬山

汪東興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全文

1970年8月24日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革”十年資料選編》影本

舒雲點評：為什麼汪東興不僅自己擁護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還代表八三四一部隊？這說明毛澤東肯定讓汪東興放過話。這在我的《林彪畫傳》中有披露，邱會作回憶錄中也有詳細說明，毛澤東讓汪東興傳話給中央政治局，讓林彪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拒絕了，說他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如果毛澤東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給汪東興十個膽子他也不敢這麼說，更不敢代表八三四一部隊！

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輝榜樣，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學得好，用得好。在關鍵的時刻，林副主席的態度是正確的。

這種態度代表著我們的心意，代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動，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並且努力緊跟。

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氾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講話中說，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幾十年鬥爭中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較量中比較出來的。這個領導地位，除極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

林副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各種因素中的決定因素。我還記得林副主席早就說過，沒有毛主席，也沒有我們自己。

林副主席特別強調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條是我國革命經驗中最根本的經驗。

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這些精闢、透徹的闡述。

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有的說不當國家主席可以減少些事務，如接見外賓等，事實上凡到中國來訪問的外賓，絕大多數主席都接見了，到中國來的外賓，主席不接見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見，影響是巨大的。

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

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伯達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解讀

華北組簡報一是“揪人”，二是擁護毛當國家主席

作者：余汝信

原載《記憶》第 34 期，2009 年 10 月 14 日

1970 年 8 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後來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的簡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一版第 247 頁）。這個在批判林彪時曾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革命的簡報”到底有些什麼內容？許多人並不清楚。

一、吳德對簡報簽發過程的回憶

關於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華北組討論的情況以及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當事人（簽發人）之一的吳德生前曾回憶道：“8 月 24 日下午的華北組討論會，陳伯達迫不及待首先發言，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經過很多鬥爭的。他講了一通‘天

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並閃爍其詞地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並且說有人聽說毛主席不做國家主席了，就高興得手舞足蹈了”〔1〕。

對於陳伯達的發言，吳德回憶明顯有不準確處。陳的發言並沒有涉及國家主席問題。“手舞足蹈”一段話，是汪東興發言談及國家主席問題時陳的插話，並不是陳自己發言中的話。

吳德接著又說：“汪東興跟著講了話，主要的意思是設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他也講了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2〕。對於汪的發言，吳的回憶倒是基本準確。

關於簡報的簽發過程，吳德稱：“晚上 11 點多鐘時，我和李雪峰、解學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在華北組的簡報組，他參加了整理簡報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簡報稿子拿來送審。簡報的內容就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內容

〔3〕。解學恭拿著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幾個字。我沒有參加會，發言的具體情況也不瞭解，我對李雪峰說：印發簡報你們簽字就行了，我就不簽字了”。“李雪峰說：簡報是本著有文必錄的原則整理的，簽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簽個字吧”。“這樣，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簡報稿子上簽了個‘吳’字”。“我們簽完字後，簡報就送中央辦公廳了，很快印好就發了。這個簡報就是華北組的第 2 號簡報，全會的第 6 號簡報”〔4〕。

這樣，我們知道了，簡報的簽發人是李雪峰、吳德（可能還有解學恭），李、吳、解都不是以後官方認定的所謂“林彪反黨集團”（前又稱“林陳反黨集團”）成員（李曾經是，文革後就不是了）。

二、林彪講話與陳、汪發言的擁護者

第六號簡報列舉出參加討論、並“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的發言者有：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及陳毅。

這些人當時的職務——劉錫昌：原北京光華木材廠工人，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鄭維山：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郭玉峰：原陸軍第六十四軍政委，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業務組負責人；聶元梓：原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時任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劉子厚：原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河北省省長，時任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馬福全：原石家莊 3302 廠工人，時任石家莊市革委會副主任；錢學森：原七機部副部長，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鄺任農：時任空軍副司令員兼中國民航總局局長；吳濤：時任內蒙古軍區政委，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吳忠：原陸軍第四十軍軍長，時任北京市衛戍區司令員；尤太忠：原陸軍第二十七軍軍長，時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彭紹輝：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副總參謀長；陳毅：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他們均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

這些人當中，調子最高者，如錢學森。簡報稱，“為了反擊這種反革命陰謀活動，錢學森同志首先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著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陳毅的調子據說也不低，可惜他當時被視為‘右’的代表，已經沒有什麼實權（他的外交部長一職，1970年6月已被姬鵬飛所“代理”），簡報勢利地沒有引述他尖銳的發言，可見當時發言能上簡報是件光彩的

事，同時也不是那麼容易上的。同樣地，發言者中除陳伯達外，沒有以後官方認定的“林彪反黨集團”（前又稱“林陳反黨集團”）成員（鄭維山、劉子厚曾經‘上賊船’，以後解脫了）。

文革後，發言高調者，如陳毅，仍被譽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錢學森，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進入國家領導人之列；即便“上了賊船”的鄭維山，亦重任大軍區司令員。官方說，他們只是曾經受了蒙蔽而已。

三、“華北組最激烈”

九屆二中全會分組討論，按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組。官修《毛澤東傳》聲稱：“六個組中，華北組最激烈”〔5〕。所謂最激烈，不外是最為群情洶湧，慷慨激昂。體現在簡報中即為以下段落：“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大家認為，不能讓妄圖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主席的陰謀得逞”。“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

這些話語，足以引起江青、張春橋的驚恐不安，也使毛澤東立即下大決心使全會的形勢發生逆轉。

《毛澤東傳》還稱：“這天上午，葉群已同吳法憲等商定採取統一行動；各組討論時，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要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

西北組同時發難，擁護林彪講話，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強烈煽動‘揪人’”〔6〕。

誠然，陳、吳、葉、李、邱的發言，矛頭一致指向了張春橋，惟卻都沒有“要求設國家主席”的內容。“九一三”事件後中央專案組選印的《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即《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指責他們“向黨發動了倡狂的進攻”，不過就是向張春橋發動了攻擊。《罪證》引述的陳伯達的發言稱：“吳法憲同志說得很對，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但是這種妄圖，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起來，已經站來的偉大中國人民，很能夠識破他們，揭穿他們的各種虛偽。”葉群稱：“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吳法憲稱：“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鵬稱：“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會作稱：“對毛主席思想態度問題，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為什麼在文化革命勝利、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7〕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反對張春橋一類極左派，沒有其他的理論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論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對毛、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彪為籍口。這是今天很多人感到困惑、感到難以理解的。惟五年以後的那一場歡欣鼓舞的勝利表明，打倒張春橋一類極左派，是歷史前進的正途，是受到廣大人民擁護的，並不是什麼罪行。如果說他們有什麼錯，錯只在選擇這麼一個發難的時機大大失策而已。

眾所周知，九屆二中全會結束，首先倒楣的是參與華北組活動的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在華北組反張及鼓動設國家主席最積極的汪東興，檢討過關；而受汪誤導選擇了在一個錯誤的時機聯合汪一起向張春橋發起攻擊的葉、吳、李、邱（還有林彪及沒有上山的黃永勝），毛一直沒有放過他們，廬山的事沒有個完，直至走到了“九一三”。

注釋：

〔1〕〔2〕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116—117。

〔3〕簡報中並沒有陳、汪發言的內容而是稱陳、汪的“重要發言（另有簡報”。

〔4〕同〔1〕書，117—118。

〔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74。

〔7〕陳、葉、吳、李、邱的發言節錄，見《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頁9—13。

第四節 林彪出走的通知

中共中央關於向全國群眾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的通知

中發〔1971〕67號

毛主席批示：照發。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

中央決定：各地、各單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工農兵群眾傳達。傳達的辦法如下，

一、傳達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個重要文件（中發〔1971〕66號文件）和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

二、傳達的範圍：全體共產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戰士，工廠、礦山、企業、事業單位全體職工，農村人民公社全體貧下中農和中農，大學、中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小學教職員工和高年級學生，城鎮居民中的勞動人民，黨、政、軍機關工作人員。

地、富、反、壞、右、資本家，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和正在進行審查的人，都不能聽傳達。外國人也不能聽傳達。

傳達的範圍可以逐步擴大，先黨員、工農兵，後其他；也可以同時傳達。由各地、各單位自行安排。但最遲應在十一月底以前傳達完畢。

愛國人士、外國專家和中國籍外國人如何傳達，另行通知。

三、傳達的方法。根據若干試點單位的經驗，首先應將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讀。其中，57號、65號和《我的一點意見》要反復宣讀、講解多次。宣讀的同志，事先要弄懂檔，做好準備。宣讀以後，組織群眾討論。群眾提出的問題，屬於檔已經講了的，可以通過討論、講解檔解決。廬山會議情況，可以由參加批陳整風的同志進行說明。在宣讀、討論和講解的過程中，要始終抓住重點，而不要追究枝節問題。要引導群眾學習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多次指示，使廣大群眾充分認識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妄圖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鼓舞廣大群眾同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鬥爭的決心和信心。一個單位經過十天左右的時間，經過幾次宣讀、討論、講解，大部分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有些問題，需要在今後學習中逐步解決。

四、加強領導。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在全黨、全軍、工、農、兵和廣大群眾中進行傳達，是全國政治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大事。各級黨委務必抓緊，抓細，抓好。要根據本地區、本單位的具體情況，作出統一規劃。在農村，要注意農時，適當安排。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幹部都應當親自試點，向群眾宣讀、講解中央文件，參加群眾的學習和討論，總結群眾的經驗，正確地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作出恰當的處置。中央相信：經過傳達、討論，經過對林陳反黨集團的鬥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必將進一步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五、在廣大群眾中傳達以後，原來關於林陳反黨集團問題的保密規定，應作相應的修改。在工農兵和勞動人民中議論這個問題，是允許的。但是，仍然不登報，不廣播，不寫大字報，不寫標語口號。同時，要教育聽傳達的群眾，提高警惕，不要向階級敵人洩露。

六、各單位傳達討論情況和揭發材料，逐級上報。重要的可以直送黨中央和毛主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此件發至農村人民公社黨支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支部，機關、連隊黨支部）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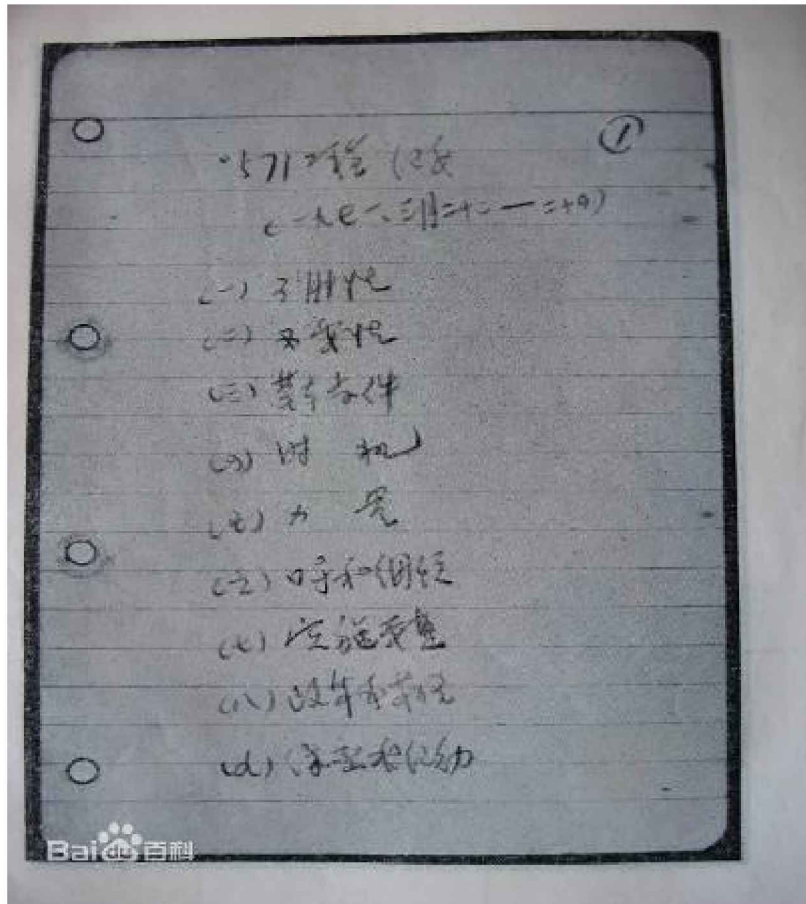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571工
程”紀要，

屬於 1971 年一份中央文件公佈的林彪罪狀



“571 工程”紀要（影印件）

（附）“571 紀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條件

（四）時機

（五）力量

（六）口號和綱要

（七）實施要點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紀律

附件二

“571工程”纪要^①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 (一) 可能性
- (二) 必要性
- (三) 基本条件
- (四) 时机
- (五) 力量
- (六) 口号和纲领
- (七) 实施要点
- (八) 政策和策略
- (九) 保密和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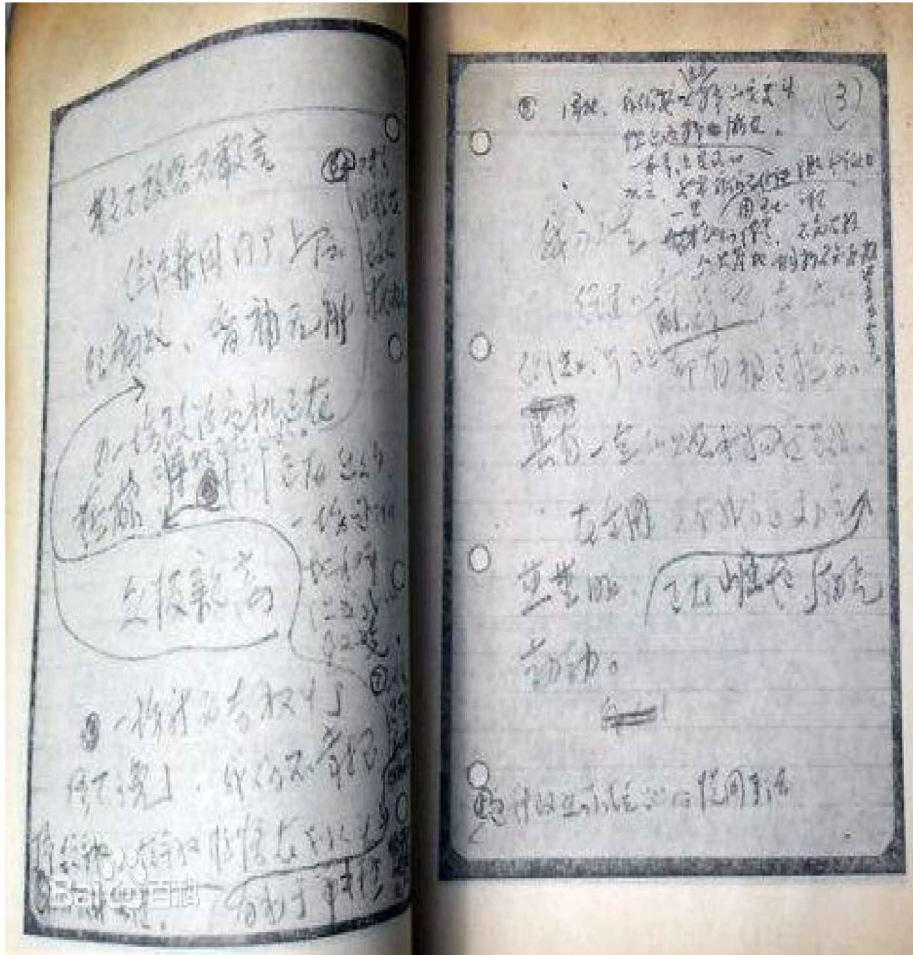
^①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划□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内。

可能性

9.2 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 (1) 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
- (2) 奪權正在進行。

- (3) 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 (4) 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 (5) 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 (6) 他們“故計（伎）重演”。
- (7) 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



(8) 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9) 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準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

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

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兩種可能性：

（一）奪取全國政權，

（二）割據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 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託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人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條件

有利條件：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

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 軍心不 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

——小撮秀才 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

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威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上講：國土遼闊、迴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困難

△ 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

△ 群眾對 B-52 的個人迷信很深

△ 由於 B-52 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

△ B-52 身（深）居簡出，行動神秘鬼（詭）窄（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時機，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只要他們上臺，我們就要下臺，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

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 B-52 在我手中，敵主力艦均在我手心之中。

屬於自投羅網式

△ 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

△ 先斬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實，逼迫 B-52 就範，

逼宮形式

△

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記小分隊

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

△ 九師、十八師
△ 二十一坦克團
△ 民航
△ 三十四師
借用力量：國內
△ 二十軍
△ 三十八軍
△ 黃軍委辦事處
△ 國防科委
△ 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江、西安
△ 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箝）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3]

口號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
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
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 B-52 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聯。

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3]

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第一、準備階段

(1) 計畫

(2) 力量

△ 指揮班子

江、王、陳

△ 兩套警衛處

公開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組負責。

新華一邨

教導隊

△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

△ 南空直屬師工作

（十師）

周建平負責

爭取二十軍

（江、王、陳）

-----擴大艦隊

-----加速根據地建設

京、

滬、

杭、

蜀、

穗、

(3) 物質準備

武器

領

自造

通訊器材（包括 01 工程）

車輛

掌握他們倉庫地點、只要軍械庫

(4) 情報保障

掌握三個環節

搜集

分析

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

奇襲式

一個先聯後斬 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

一個先斬後聯。

一個上下同時進行。

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佈他叛徒罪行。

總的兩條：

一是奇襲

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第三階段

鞏固陣地，擴大戰果 奪取全部政權

(1) 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

△ 盡力堅守上海

佔領電臺、電信局、交通

把上海與外地聯繫卡斷

△ 力爭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禦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運

(2) 政治上採取進攻

△ 上面攤牌

△ 掌握輿論工具

開展政治攻勢

(3) 組織上擴大

△ 迅速擴軍

△ 四方串聯

政策策略

打著 B-52 旗號打擊 B-52 力量

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

緩和群眾的輿論

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數

集中打擊 B-52 及其一小撮獨裁者

我們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數）

保護（團結）一大片

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

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批，各個擊破。

他們一批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們這樣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

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宣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

今天甜言蜜（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他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

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 B-52 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瞭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

對過去 B-52 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洩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制裁。

注釋：

△B52—毛澤東，張—張春橋，黃—黃永勝（軍委辦事組）

△艦隊以及下文的聯合艦隊等均為檔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稱，這些名詞以及後文中的“江△田島精神”等出自《啊，海軍》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電影和國外“五七一工程”小分隊。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雲、江騰蛟以及他們控制的空四軍，空五軍）

△民航（文革時民航由空軍接管）

△新華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據點）教導隊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

△南空（指南京軍區空軍）自造通訊器材（包括 01 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設計的一種發報機）

第七章 最後的歲月

第一節 “十大”準備工作

1973年6月13日，我所在單位的負責人傳達了上海市革委會馬天水傳達5月20日到5月3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

馬天水傳達：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在毛主席親自關懷下，總理主持，參加中央會議由來自各省市各大軍區、各部共240人。2個議程：1、籌備十大。2、批修整風。3、討論今年國民經濟計劃。

一、關於籌備十大問題。

籌備召開十大偉大意義和認識。這次中央中心議程主要是十大。總理說：毛主席黨中央要召開十大，從九大到現在十年。經過批修整風有了準備，條件成熟。在討論時一致認為搗毀了劉少奇、林彪給國內外階級敵人沉重打擊。全黨、全國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黨的隊伍更加壯大，全國人民更加團結。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條件成熟。總理說，九大的政治組織路線，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時召開的，在會議過程中受到林賊的幹擾影響，主流是好的。挖出了林賊使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召開十大要總結經驗，九大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陳伯達、林賊的報告是不行的，後來由春橋、康生、文元修改的。主席說你不改我來說，林賊只是簽了字。以後寫黨史可以批判。九大報告是林賊念的，九大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體現。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九大的組織路線是正確的。總理回顧了七大、八大是整風基礎上召開的，是戰爭時期。那次七大白區代表少，七大組織成分那時只能這樣，八大代表組織成分就受到劉少奇幹擾不那麼符合主席思想。我們黨是農村中長大的。農村、軍隊黨員大多數。工業基礎差，發展不平衡，產業工人少，平均一萬名代表中一個黨員，不能反映工人狀況實質，不能反映當時形勢。特別八大代表分配到各地代表過多。因此代表性不強。那麼恰當。這次九大情況不同，工人、學生代表到北京參加慶祝

會，第二天上天安門，他們說心情很激動。總理說，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籌備九大時就考慮要增加工人代表。當然也考慮其他階級代表。當時有很多地方在整黨，不少地方鬧派系，所以沒有按照黨中央黨員數量推代表。這也是當時決定的，工人代表 30%，農民代表 20%，其他 5%，知識份子 5%，解放軍 28%，解放軍在起了決定性作用。解放軍代表應該多，林彪黑手幹擾。解放軍主流是好的，幹部 12%。當時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反映了當時情況，在中央委員中林彪死黨 10%，大多數是好的。特別是工人、農民除了個別以外，。廬山會議有些工人中央委員起哄他們是受騙，康生再三強調要幫助，九大路線是正確的，林賊是曇花一現的人物，九大團結的精神要反映林賊死黨有的早發現，有的晚發現，主流是無辜的，基層組織是好的，因此在這情況下召開十大成熟條件。

二、關於修改黨章的問題

總理、春橋，江青作了講話。總理說。九大黨章在政治生活中是好的，是積極的。修改重點在總綱。首先總綱中講林賊一段要全部刪除，這是毫無異議的。本來主席說要造就千百萬接班人，現在只有林賊一人。關於時代問題，主席對這個問題多次講過，主席最近說，現在的時代是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並沒有改變。馬天水說參加會議的同志說，時代的提法沒有變，但形式變了。而時代的進程沒有改變。關於三個里程碑的問題，黨章中文字的表達意思是有的，毛主席說，我從來沒有承認過。在當時馬天水說，這說法主席沒有承認，並不是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但毛主席不同意這種提法，當有人吹捧林立果第四個里程碑時毛主席說，我連第三個都沒有承認。總理說，主席說黨章不要寫人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到的提法毛主席不同意。關於黨的指導思想政治局在起

草中仍保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主席、康生都圈閱了。黨章其他文字方面也要修改。比如活學活用本來不是不好，而是現在林賊利用了，所以黨章不用了。又如突出政治高舉黨章是還要改。春橋說：黨章總綱問題，怎樣修改有二個方案，一個是作文字修改，另一個是內容，結構都要修改。鑒於上面提到的一些問題，現在作原則修改，還要作文字修改。另外還要主席的一些指示如不稱霸，還有第十次路線鬥爭經驗。這樣一來，作個別修改不能解決。政治局有傾向要作原則修改，但文字不要大修改。

三、關於產生十大代表問題

這次名額 1240 名，主席說少一點好，包括少數民族，港澳臺灣（1）中央規定產生代表的指導思想根據毛主席教導：“五十字建黨思想”全黨認真執行毛主席三要三不要。（2）中央規定十大條件，1、必須中共正式黨員，在八大時非黨代表參加 2、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第十次路線鬥爭中表現積極密切聯繫群眾包括犯了錯誤願意改正的老幹部 3、本人政績清除

（3）代表名額及分配。代表 1240 名，產業工人 30%，農民 25%解放軍 16%其他 5%知識份子 5%幹部 1%婦女代表 15%~20%工農勞動群眾 20%以上少數民族 5%~10%，在軍隊知識份子占 60%上海名額 60 名北京 50 名，山東 30 名福州 21 名臺灣 2 名浙江 30 名（4）代表產生方法，代表產業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各省市自治區可召開全體會議或者擴大會議，通過充分協商，經過群眾充分討論，再集中討論選舉產生（5）關於上海代表名額方案：60 名。中央建議，春橋、洪文、文元、陳雲出席十大代表（不算入上海名額）經過市委討論：產業工人 35 名 58.4%，農民 6 名，10%勞動群眾 5 名 3%知識份子 6 名 10%，婦女 5 名，工人農民勞動群眾在生產第一線包括半脫產支部書記，工交 34035 名，產業工人 32 名，

幹部 1~2 名知識份子 1 名，郊區 8 名，貧下中農 6 名工人 1 名幹部 1 名，財貿 4 名，勞動人民 3 名工人 1 名。地區系統 5，勞動群眾 2 名工人 1 名幹部 1 名，中學教師 1 名，文教系統 3 名，知識份子科技技術人員 1 名，市級機關幹部 4~5 名。

四、關於批陳整風

馬天水說，這次中央會議各單位彙報，交流了批陳整風經驗，著重討論了幹部政策。總理指出：目前形勢大好，主要標誌劉少奇、林賊揪出來，有人說形勢不好，主席說總比劉少奇林賊搗亂時好。全國批林整風正式深入。會議要求抓緊抓好。儘管林賊與 571 寫的那麼嚴重，他們想是那麼想，真心動起來沒有人敢幹。他們要浙江調一架飛機，執行反革命任務，9 月 8 日要用了。貌似強大搞陰謀的人，在我們黨邪不壓正。總理說，主席說犯錯誤批判從嚴，在中央裏林賊死黨不多。就是抓起來的也要區別，一分為二上了賊船可以下賊船，主席在巡視，有地方負責同志打了招呼。廣州軍區有一個人犯了嚴重錯誤，主席向他說了，仔仔事先召開了會議傳達過主席的指示，發現林賊情況向中央反映，所以在去年批修整風會議中向中央提出要檢查，主席說，不要檢討了，只要有新的情況報告就行了。總理說 9 月 13 日這是界限，既是犯了錯誤交代了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看態度，只要聽毛主席的話，以前有錯誤知道情況只要向中央反映，中央可以等的。主席說：自己知道要揭要交代要自覺。總理在開幕會議上宣佈了列席會議的李保華，王稼祥、廖志高，秦基偉。會議開到後期，譚震林，陶魯笏、江華，總理在會上講了幹部，黨員問題。總理說，我記得在寧都會議上，被錯誤路線排擠了。主席說，如果前方需要我，隨叫隨到。主席守紀律顧大局。以後再起來要受得起考驗，主席樹立了榜樣。主席叫王洪文到政治局工作，王洪文務過農，做過

工，當過兵，不要看他青年，我們要幫助他，要支援他，不要看他年輕，他是我們政治局中最有希望的一個。總理說，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怎麼這樣說呢？把劉少奇、林賊揪出來這是多麼大的勝利。這麼大的運動可能要傷點人，這麼大的洪水下來，受到衝擊的同志應該按照主席的精神要你能上能下，黨的生活就正常，不要發牢騷。總理還說，葉劍英同志能上能下，林賊，羅瑞卿整過他，9.13 後參加政治局工作，這有好處。經得起考驗，要把這些情況講給大家聽，總理又說，根據主席的指示政治局的同志要懂得政治、軍事、文學、中國歷史、世界史，要學習上層建築要懂得各種學派，認識真假馬列主義，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到共產主義都要研究總結。中央號召全國人民把召開十大這件大喜事當做強大的東風，把召開十大的過程當做思想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用新的成績迎接十大召開。

從當時的會議記錄來看，中央十大的召開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怎麼這樣說呢？這深刻地反映全黨、全國人民對林彪倒臺而來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質疑的反映，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強詞奪理。

第二節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以後，文革進入末期階段，因人民經過長達十年折騰後，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身心都到了極度疲勞的程度，國家、家庭、個人的前途問蒼茫大地無人回答。

時間：1973年8月24日至8月28日

地點：北京

參會人數：1249人

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319 人

全國黨員：2800 多萬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隆重舉行。毛澤東同志主持了這次大會。

八月二十四日，大會正式開幕。當毛主席出現在主席臺的時候，全場歡聲雷動，代表們懷著激動的心情，長時間地熱烈鼓掌，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毛主席親切地向代表們揮手致意。

大會選舉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組成的主席團。大會一致通過毛主席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同志為主席團副主席，張春橋同志為主席團秘書長。大會正式開幕這一天，大會代表通過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巨幅畫像的大廳，進入了莊嚴的會場。他們之中，有的是產業工人黨員代表，有的是貧下中農黨員代表，有的是來自邊疆、警惕地守衛在國防前哨的人民解放軍黨員代表，還有的是革命幹部、知識份子和其他勞動人民的黨員代表。工農兵黨員代表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婦女黨員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漢族以外各兄弟民族黨員代表，也佔有一定比例。臺灣省在全國各地的黨員所選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八月二十八日，大會經過認真、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了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和王洪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幾個檔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內外大好形勢，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線指引下各條戰線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總結了兩條路線鬥爭，特別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基本經驗，進一步明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方向和任務。大會經過反復醞釀、討論，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了中國共產黨第

十屆中央委員會。當選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員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補中央委員，體現了老、中、青三結合。大會憤怒地聲討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全體代表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議：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的黨籍；永遠開除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分子、託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一致擁護中共中央委員會對林彪反黨集團其他主要成員的處理和所採取的全部措施。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大會的各項檔，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

議事日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

- 一、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 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 三、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選舉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一百九十五人

毛澤東、丁節盛、丁可則、丁國鈺、馬寧、馬天水、于桑於、會泳、于洪亮、王諍、王震、王必成、王宏坤、王秀珍（女）、王國藩、王洪文、王樹聲、王首道、王淑珍（女）、王淮湘、王超柱、王稼祥、天寶巴桑、方毅、鄧小平、鄧穎超、尤太忠、孔石泉、孔照年、烏蘭夫、韋國清、馮鉉司、馬義·艾買提、

白如冰、田華貴、田維新、皮定均、葉劍英、劉偉、劉子厚、劉興元、劉伯承、劉均益、劉賢權、劉建勳、劉盛田、劉湘屏（女）、劉錫昌、江青（女）、江禮銀、江擁輝、江燮元、朱德、朱穆之、許世友、呂玉蘭、安平生、莊則棟、華國鋒、華林森、喬冠華、任思忠、年繼榮、紀登奎、邢燕子（女）、陳雲、陳郁、陳康、陳士榘、陳永貴、陳先瑞、陳奇涵、陳錫聯、陳慕華（女）、杜平、李達、李強、李震、李大章、李井泉、李水清、李任之、李先念、李志民、李順達、李素文、李葆華、李富春、李瑞山、李德生、穀牧、楊勇、楊春甫、楊得志、吳濤、吳德、吳大勝、吳桂賢（女）、蘇靜、蘇振華、張才千、張雲逸、張平化、張達志、張池明、張延成、張體學、張宗遜、張恒雲、張洪池、張樹芝、張春橋、張維民、張富貴、張福恒、張鼎丞、張翼翔、汪東興、肖勁光、岑國榮、宋佩璋、餘秋裏、周興、周宏寶、周麗琴（女）、周純麟、周建人、周恩來、寶日勒、岱希雲、林麗韞（女）、羅青長、羅錫康、冼恒漢、金祖敏、姚文元、饒興禮、段君毅、祝家耀、胡繼宗、趙紫陽、耿飆、耿起昌、錢之光、錢正英、郭玉峰、郭宏傑、郭沫若、徐向前、徐景賢、夏邦銀、唐岐山、唐忠富、倪志福、聶榮臻、莫顯耀、秦基偉、陶魯笏

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二十四人

卜谷香、七林旺丹、馬明、馬小六、馬立新、馬金花（女）、鄧華、王體、王謙、王六生、王光臨、王百得、王志強、王美季（女）、王景升、王德山、文香蘭（女）、葉飛、央宗（女）、石少華、厲日耐、馮占武、馮品德、申茂功、盧忠陽、白棟材、江華、江渭清、呂和、呂存姐（女）、任榮、達洛、孫健、孫玉國、劉西堯、劉光濤、劉春樵、劉振華、向仲華、朱光亞、朱克家、肉孜·吐爾迪、阮泊生、肖克、吳忠、吳從樹、吳玉德、吳向必、吳金全、楊貴、楊

大易、楊坡蘭（女）、楊俊生、楊富珍（女）、陳玉寶、陳代富、陳和發、陳佳忠、陳佩珍（女）、李化民、李守林、李定山、李祖根、李躍松、張令彬、張懷連、張世忠、張江霖、張英才、張林池、張國權、張泗洲、張積慧、宋雙來、宋慶友、宋時輪、陸金龍、汪家道、王湘君（女）、余積德、鄭三生、林李明、羅春娣（女）、胡煒、胡良才、胡金娣（女）、趙峰、趙興元、趙辛初、姚連蔚、姚依林、徐馳、唐亮、唐克碧（女）、唐聞生（女）、鐵瑛、賈那布林、錢學森、高淑蘭（女）、諸惠芬（女）、郭耀卿、康林、康健民、黃文明、黃成連、黃作珍、黃知真、黃炳秀（女）、黃榮海、隆光前、崔修范、盤美英（女）、彭冲、彭貴和、魯大東、蔣寶娣（女）、謝家塘、謝振華、謝望春（女）

主席團名錄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秘書長：張春橋

劉伯承、江青（女）、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紀登奎、汪東興、華國鋒、吳德、丁盛、馬天水、馬甯、馬金花（女）、於會泳、鄧小平、鄧穎超（女）、王體、王震、王六生、王必成、王永禎、王秀珍（女）、王淮湘、王德山、巴桑（女）、尤太忠、毛遠新、韋國清、韋彩猷、文香蘭（女）、瓦力斯江·吐爾地、白如冰、皮定均、玄順姬（女）、任榮、劉子厚、劉興元、劉慶棠、劉建勳、劉春樵、烏蘭夫、孫玉國、江禮銀、朱興亞、朱克家、朱秀峰（女）、朱明倉、華林森、年繼榮、邢燕子（女）、陳雲、陳永貴、陳先瑞、孜牙、杜平、楊勇、楊得志、李大章、李志民、李秀蘭（女）、李素文（女）、李瑞山、張鳳英（女）、張平化、張世忠、張達志、張江霖、張延成、張秀芝（女）、

張體學、張恒雲、張宗遜、張洪池、呂玉蘭(女)、呂存姐吳向必、吳桂賢(女)、時克啟、宋佩璋、餘秋裏、佟純良、汪家道、餘積德、蘇振華、周興、週一良、周建人、周麗琴(女)、寶日勒岱(女)、冼恒漢、林麗韞(女)、金祖敏、趙紫陽、郝建秀(女)、浩亮、耿飆、徐向前、徐景賢、郭宏傑、郭沫若、倪志福、唐岐山、唐忠富、唐聞生(女)、海呷子、錢學森、聶榮臻、秦基偉、諸惠芬(女)、梅小丫(女)、尉鳳英(女)、黃林英(女)、盤美英(女)、曹軼歐(女)、曹蓮鳳、康健民、梁錦棠、姬鵬飛、彭沖、韓英、韓先楚、粟裕、解學恭、曾紹山、曾思玉、謝振華、謝靜宜(女)、董明會、雷桂梅(女)、譚啟龍、賽福鼎、蔡暢(女)、蔡協斌、蔡樹梅、潘世告、魯瑞林、樊德玲、魏秉奎

第三節 “十大” 政治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的。

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向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報告。主要內容是：關於九大路線，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勝利，關於形勢和任務。

關於九大路線

黨的九大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舉行的。

九大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歷史經驗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鮮經驗，批判了劉少奇修正

主義路線，再次肯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同志們記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開幕的時候，發出了“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偉大號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確指出：“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要保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去爭取勝利。”毛主席並且預言：“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毛主席的講話和大會通過的中央委員會的，為我們黨規定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大家知道：九大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但是，九大期間和大會以後，林彪不顧毛主席、黨中央對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繼續進行陰謀破壞，一直發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政變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 7 1 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畫，九月八日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陰謀失敗後，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投奔蘇修，叛黨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九大以後取得的最大的勝利，是對國內外敵人沉重的打擊。九·一三事件以後，全黨、全軍、全國億萬各族人民進行了認真討論，對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及其死黨，表示了

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表示堅決擁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開展對林彪一類騙子的革命大批判，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清算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事實證明，林彪反黨集團不過是一小撮，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極為孤立，無礙大局。林彪反黨集團，不但沒有也不可能擋住中國人民的革命洪流奔騰前進，反而進一步激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九大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九大路線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壞了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作風，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得到發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加強戰備、參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設方面作出了新貢獻。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團結，更加堅強。我們的黨，經過吐故納新，現在已經是由二千八百萬黨員組成的更加朝氣蓬勃的無產階級先鋒隊。

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我國人民戰勝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破壞，克服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奪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我國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財政貿易情況良好。我們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市場繁榮。文化教育衛生科學技術事業，也有許多新成就。

在國際方面，我們黨和我國政府，堅決地貫徹執行了九大制定的對外政策。我們同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同各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之間的革命友誼，同友好國家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我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復。孤立中

國的政策宣告破產，中美關係有所改進。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我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更加廣泛，我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推動著世界形勢繼續朝著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發展。

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

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勝利

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經過，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已經知道。因此，在這裏就不需要多講。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黨內鬥爭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劉少奇叛徒集團垮臺，林彪反黨集團跳了出來，繼續同無產階級較量，正是國內國際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刻，蘇修叛徒集團的頭子勃列日涅夫在高爾基州的一個群眾大會上，就瘋狂地反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公開宣佈他們站在劉少奇叛徒集團一邊，說什麼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垮臺，“對中國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大悲劇。因此，我們對他們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並且公開宣佈繼續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方針，說什麼要“爭取使它回到國際主義的道路上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報》）一九六七年三月，蘇修另一個頭目在莫斯科的群眾大會上，更露骨地說什麼“代表中國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遲早還會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在自己偉大的國家獲得勝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報》）他們所說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會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利益的腐朽力量，他們所說的“決定性的話”就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所說

的“思想勝利”就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修正主義在中國上臺，他們所說的

“國際主義道路”就是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團迫不及待地說出了反動派的共同願望，也說出了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右實質。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黨是一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他們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他們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罪惡目的，就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徹底背叛九大路線，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法西斯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國內，他們要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

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他有一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毛主席把“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主要條件之一，並且寫進了我們的黨章。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分水嶺，是真共產黨員和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林彪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參加共產黨的。那時他就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正在古田會議以後，毛主席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給林彪的長信，對他進行了嚴肅的耐心的教育。事實證明，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又總是耍兩面派，用

假像欺騙黨，欺騙人民。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繼續發展，特別是當中國革命的性質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逐步深入，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時候，林彪這一類只為少數人謀利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隱藏不住，就要跳出來，同無產階級較量了。當他適應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需要，跟著蘇修的指揮棒，妄圖“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的時候，也就宣告了他的總暴露，總破產。

恩格斯說得好：“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誰要是象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鬥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鬥爭都多（因為我們把資產階級只當作一個階級來看待，幾乎從來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那他對爆發不可避免的鬥爭也就不會感到十分煩惱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380頁）

同志們！

在半個世紀中，我們黨經歷了十次重大的路線鬥爭。林彪反黨集團的垮臺，並不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國內外敵人都懂得，堡壘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由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比地主、資本家親自出馬要好得多，特別是地主、資本家在社會上名聲已經很臭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就是將來階級消滅了，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這些矛盾的先進和落後、正確和錯誤兩條路線的鬥爭，仍然會存在。何況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

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反映這些矛盾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林彪，還會出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人物，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我們全黨同志在今後的長期鬥爭中，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不論階級敵人怎樣變換花樣，都能因勢利導，奪取無產階級的勝利。

毛主席教導我們：“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不正確，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地方的領導權、軍隊的領導權，也要跨台。路線正確，沒有一個兵也會有兵，沒有政權也會有政權。我們黨的歷史經驗，馬克思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結果是，一切不能指揮，一切不能調動。問題決定於路線。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毛主席為我們黨制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並且為各項具體工作規定了具體路線和政策。我們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視黨的具體工作路線和政策，而且要特別重視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這是我們黨取得更大勝利的根本保證。

毛主席總結了黨內十次路線鬥爭的經驗，特別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經驗，號召全黨：“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為我們指出了劃分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標準，指出了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守的三項基本原則。我們每個同志都要牢記這三項原則，堅持這三項原則，積極地正確地進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

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反對陳獨秀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掩蓋著“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王

明“左”傾機會主義。糾正王明的“左”傾，又掩蓋著王明的右傾。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掩蓋著林彪的修正主義。這種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一種潮流來了，多數人跟著跑，只有個別人頂住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今天，在國際國內鬥爭中，類似過去同資產階級講聯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鬥爭；同資產階級決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聯合的傾向，仍然可能出現。需要我們盡可能地及時發現，及時糾正，而當一種錯誤傾向象潮水般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於反潮流，敢於硬著頭皮頂住。毛主席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毛主席就是在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中敢於反潮流，敢於堅持正確路線的代表和導師，我們每一個同志應當向毛主席好好學習，堅持這個原則。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同黨內的、黨外的、國內的、國外的、武裝的、非武裝的、公開的、隱蔽的階級敵人，進行了長期的較量。我們黨沒有被分裂，沒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更加發展，我們黨更加壯大。歷史的經驗使我們深信：“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預言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只要我們全黨牢記歷史經驗，堅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資產階級的一切復辟陰謀總是要失敗的。不管再發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線鬥爭，也改變不了歷史的規律，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終究是要勝利的。

關於形勢和任務

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帝國主義作了科學分析，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

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指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極端尖銳化。因此，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並且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史達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完全正確的。列寧逝世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正是列寧分析過的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現。緩和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大亂還將繼續下去。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喚醒了人民，鍛煉了人民，推動國際形勢進一步朝著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

第三世界的覺醒和壯大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鬥爭中加強了團結，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偉大勝利，有力地鼓舞著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鬥爭。朝鮮人民爭取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的鬥爭，出現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鬥侵略的鬥爭，非洲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鬥爭，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堅持二百海裏領海和經濟區的鬥爭，都在繼續前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爭取和捍衛民族獨立，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資源的鬥爭，有了更加深入和廣泛的發展。第三世界同歐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義鬥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列寧說：“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它們天天喊裁軍，實際上天天在擴軍。目的就

是爭霸世界。它們既爭奪又勾結。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宣佈歐洲年，召開歐安會，表明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西方無戰事就好。中國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但是，這塊肉很硬，多年來誰也咬不動。“超級間諜”林彪垮臺了，更難下手。現在，蘇修是聲東擊西，加緊在歐洲的爭奪，加緊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擴張。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這是它們製造的各種假像掩蓋不住的。這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民和國家所識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強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不滿。美蘇兩霸內外交困，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處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蘇會談及其以後的形勢，更加證明這一點。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美蘇兩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國，咬不動；對歐洲、日本，也咬不動，更不要說廣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國主義從侵朝戰爭失敗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它公開承認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從越南撤退。蘇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從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這二十年來已經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它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經濟、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對外，侵佔捷克斯洛伐克，陳兵中國邊境，出兵蒙古，支援朗諾賣國集團，鎮壓波蘭工人造反，干涉埃及、專家被趕，肢解巴基斯坦，在許多亞非國家進行顛覆活動。這一系列的事實，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醜惡面目，它“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它做的壞事、醜事越多，被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送進歷史博物館去的日子來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對中蘇關係問題講了許多廢話。說什麼中國反對

緩和世界局勢，中國不想改善中蘇關係，等等。這些話，是說給蘇聯人民和各國人民聽的，妄圖挑撥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掩蓋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說給壟斷資本家聽的，希望仗著反華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賞錢。這是希特勒的老把戲，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罷了。你那麼想緩和世界局勢，為什麼不做一兩件事情，比如從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軍隊、歸還日本北方四島，來證明你的誠意呢？中國沒有侵佔別國的領土，難道要中國把長城以北統統讓給蘇修，才算表示我們贊成緩和世界局勢，願意改善中蘇關係嗎？中國人民是騙不了、嚇不倒的。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妨礙兩國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中蘇邊界問題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我們的一貫原則。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夥分贓”。（《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屬於前一種；列寧的判徒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幹的是後一種。

列寧多次指出，帝國主義就是侵略，就是戰爭。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聲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覺醒的各國人民，認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強團結，堅持鬥爭，就有可能制止戰爭。如果帝國主義硬要發動戰爭，

必將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們的滅亡。

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把我們中國的事情辦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國際，我們黨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黨的一貫政策，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在國內，我們要遵循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我們必須堅持毛主席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教導，對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發動突然襲擊，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準備。英雄的人民解放軍和廣大民兵要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

臺灣省是祖國神聖領土，臺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對臺灣同胞寄予無限的關懷。臺灣同胞熱愛祖國，嚮往祖國。臺灣同胞只有回到祖國的懷抱，才有光明的前途。臺灣一定要解放。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要統一。這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志願和神聖義務。讓我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共同努力！

同志們！

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總是趕不上客觀形勢的需要。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還很繁重。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批、改的任務，各條戰線都需要繼續深入。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某些不正之風，還有待努力克服。我們全黨要抓緊當前的有利時機，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項工作做好。

首先，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充分利用林彪反黨集團這個反面教員，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教育，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使廣大群眾從我黨十次路線鬥爭中吸取歷史經驗，進一步認識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特點和規律，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

全黨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改造世界觀。特別是高級幹部，更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力求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瞭解馬克思主義同新老修正主義和各種機會主義鬥爭的歷史，瞭解毛主席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希望，經過持久的努力，“使我們廣大幹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

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繼續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教育衛生革命，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辦好五七幹校，支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我國在經濟上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要貫徹執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抓革命、促生產。要繼續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和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獨立自

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馬克思指出：“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二十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基本經驗，就是依靠群眾。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就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幹勁、智慧和創造性。在這個基礎上，加強計畫，加強協作，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更好地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黨組織要重視經濟政策問題，關心群眾生活，做好調查研究，切實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計畫，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各級黨委要學習毛主席《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著作，總結經驗，從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同時要發揮革命委員會和各個群眾組織的作用。要加強對基層組織的領導，使那裏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貧下中農、其他勞動群眾手裏，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個基層。各級黨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領導水準。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警惕這種傾向，認真地改變這種作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群眾創造的老、中、青三結合的經驗，為我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創造了有利條件。各級黨組織都要把這項百年大計經常列入議程。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要經歷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鍛煉，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因此，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能上能下，經得起幾上幾下的考驗。不論新老幹部，都要密切聯繫群眾，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到黨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崗位元上去，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定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

同志們！黨的十大在我們黨的發展歷史上將有深遠的影響。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對我們黨、對我們國家寄託著很大的希望。我們相信，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全黨一定能夠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我們的工作做好，不態辜負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我們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讓我們全黨團結起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紹興人。終年 77 歲。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政府總理，兼任過外交部長，並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第四節 黨章

中國共產黨章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過)

第一章 總 綱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歷了五十多年的艱苦鬥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大革命。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黨要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農聯盟，領導全國各民族人民，繼續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備戰、備荒、為人民。

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為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

中國共產黨是在反對右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原則，要於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發揚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

評的作風，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以保證黨的事業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前進。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第二章 黨 員

第一條：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認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交納黨費，都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第二條：申請入黨的人，必須個別履行入黨手續，有黨員二人介紹，填寫入黨志願書，經支部審查，廣泛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由支部大會通過和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第三條：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做到：

（一）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

（二）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

（三）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並且認真改正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手裏；

（四）有事同群眾商量；

（五）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

第四條：黨員違反黨的紀律，由黨的各級組織，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按照具體情況，分別給以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處分。

黨員留黨察看最長不超過兩年。在留黨察看期間，沒有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黨員革命意志衰退，經多次教育仍無轉變，可勸其退黨。

黨員要求退黨，由支部大會通過除名，並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備案。

證據確鑿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應清除出黨，並不准重新入黨。

第三章 黨的組織原則

第五條：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根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

全黨必須服從統一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定期向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報告工作，經常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接受監督。黨員有權向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黨員對於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見，允許保留，並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主席報告。決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第六條：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地方、軍隊和各部門黨的領導機關，是同級的黨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和它產生的黨的委員會。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由各級黨的委員會召開。地方、軍隊和各部門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黨委員會的人選，都必須經上級組織批准。

黨的各級委員會，根據密切聯繫群眾和精簡的原則，設立辦事機構，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機關。

第七條：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和民兵，工會、貧下中農協會、婦女聯合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紅衛兵、紅小兵及其他革命群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在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中，可設立黨的委員會或黨組。

第四章 黨的中央組織

第八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第九條：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產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黨的地方和軍隊中的組織

第十條：黨的地方縣以上、人民解放軍團以上的代表大會，每三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地方和軍隊各級黨的委員會，產生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

第六章 黨的基層組織

第十一條：廠礦企業、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根據革命鬥爭需要和黨員多少，設立支部、總支部、基層委員會。

黨的支部、總支部每年改選一次，基層委員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第十二條：黨的基層組織的主要任務是：

（一）領導黨員和非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

（二）對黨員和非黨員經常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領導他們向階級敵人作堅決的鬥爭；

（三）宣傳和落實黨的政策，貫徹執行黨的決議，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

(四) 密切聯繫群眾，經常聽取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使黨的生活朝氣蓬勃；

(五) 發展新黨員，執行黨的紀律，經常整頓黨的組織，吐故納新，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

第五節 王洪文修改黨章的報告

在中共十大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報告，八月二十八日通過)

同志們！

現在，我受黨中央的委託，就我們黨的章程的修改問題，作一個扼要的說明。

根據毛主席、黨中央關於修改黨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九大黨章的修改問題。會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黨委和中央直屬單位的黨組織，都成立了黨章修改小組，廣泛徵求了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正式向中央報來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這同時，各地黨內外群眾還直接寄來了許多修改意見。現在提請大會討論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據毛主席關於修改黨章的具體建議，在認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見的基礎上起草的。

在討論修改黨章的過程中，全黨同志一致認為，從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線指引下，深入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在國內和國際鬥爭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偉大勝利。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

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一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一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爭經驗的內容，這也是各地送來的修改稿的共同特點。

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線鬥爭的勝利，積累了戰勝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對於全黨是十分寶貴的。毛主席說：“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我們全黨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線問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實現。

在這個方面，修改草案增寫了哪些內容呢？

第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黨運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粉碎了以劉少奇為頭子和以林彪為頭子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對國際國內一切反動勢力的一次沉重打擊。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這次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重大意義，並且明確寫上了：“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僅國內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

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國際上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對我們進行侵略和顛覆，也必然會到我們黨內來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階級鬥爭的現實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深入進行思想、政治、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還要進行多次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第二，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則，最基本的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搞馬克思主義，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大多數人謀利益，就一定要團結，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義，專為少數剝削階級分子效勞，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修正主義是一種國際性的資產階級思潮。修正主義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帝、修、反採用打進來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劉少奇、林彪這類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儘管表現有所不同，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搞修正主義的頭子，從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化了，爛透了！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這是千真萬確的。修改草案根據各地的建議，把“三要三不要”寫進了總綱。在黨員必須做到的第一條、基層黨組織任務的第一條中，還吸收了北京市修改黨章座談會上工農兵同志的意見和有些省、市的建議，增寫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學習馬克思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是我們

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一個長期任務。

第三，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許多同志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繫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認為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過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當然，對錯誤潮流，不僅有個敢不敢的問題，還有個能不能識別的問題。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是極為複雜的，當一種傾向被另一種傾向掩蓋著的時候，許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陰謀詭計的人，又故意製造假像，更增加了我們識別的困難。經過討論，許多同志認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切客觀事物都是可知的。“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只要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積極參加鬥爭實踐，努力改造世界觀，就能夠不斷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區分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正確觀點與錯誤觀點。

在開展鬥爭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關於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不僅有堅定的原則性，而且實行正確的政策，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團結大多數，遵守黨的紀律。

第四，要在群眾鬥爭中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主席說：

“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裏所說的要培養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千百萬。這樣的任務，只有全黨重視才能完成。在討論修改黨章過程中，許多老同志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許多年輕同志也熱烈地表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要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幹部都表示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草案在總綱部分加了要培養接班人的內容，條文部分加了各級領導機關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我們要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著重從工人、貧下中農中選拔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還要注意培養婦女和少數民族幹部。

第五，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發揚黨的傳統作風。無產階級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必須領導一切，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單位關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建議，在條文部分規定：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各個革命群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黨的一元化領導，在組織上應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同級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級關係上，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我們黨歷來的規矩，必須堅持下去。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不能用幾個方面的“聯席會議”來代替黨委會的領導，同時也要充分發揮革命委員會和各個方面、各級組織的作用。黨委會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集體領導。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頭主義。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黨的一元化領導，最根本的是正確的政治路線的領

導。各級黨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修正草案把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寫進了總綱。毛主席宣導的我們黨的這個優良傳統，是老一輩共產黨員熟知的，但也有一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續發揚的問題；許多新入黨的同志，更有一個學習、繼承和發揚的問題。毛主席經常拿黨在艱苦鬥爭年代的事例來教育我們，要與廣大群眾同甘苦，共命運。我們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糖衣炮彈的襲擊，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堅決反對特殊化，認真糾正“走後門”之類的一切不正之風。

這裏，著重講一下接受群眾的批評監督的問題。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勞動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有權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實行革命的監督。這個觀念，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黨是加強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數幹部，特別是有的領導幹部，聽不得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甚至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個別的還相當嚴重。對人民內部問題，採取“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是黨的紀律絕對不允許的。修改草案在條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話：“決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我們應當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同這類違反黨的紀律的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經常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武器，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

第六，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們黨的一貫原則。這次修改草案，又寫上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我們永遠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當前，特別要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我們務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防止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毛主席說：“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我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我們一定要使國家富強起來，也完全能夠富強起來。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堅持“不稱霸”的原則，不做超級大國。全黨同志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一百年也不要驕傲，二十一世紀以後也不能翹尾巴。同時在國內，也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各種表現，進一步增強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團結，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完成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同志們！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相信，全黨按照十大確定的政治路線和通過的新黨章去做，一定能夠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朝氣蓬勃。讓我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新華社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訊）

第六節 批林批孔文件

一、中央文件

1974年5月22日單位負責人傳達中共中央中發1974（17）號檔。毛主席圈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略）

中央最近接毛主席指示，討論了批林批孔運動的幾個政策問題，通知如下：

一、幾個月來的運動，衝破了種種阻力，排除了一些幹擾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正在深入發展，當前要注意掌握黨的政策，注意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二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利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爭取批林批孔的更大勝利。爭取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的新勝利。

二、在運動中，廣大群眾揭發批判了許多同林彪反黨集體有關的人和事。這是完全必要的，繼續把這方面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領導上必須注意清除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體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1971）57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党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體劃清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中央重申中發（（1971）57號檔宣佈的政策“中央對於堅決同林彪劃清界限的同志，不論他過去是否受過林彪的影響，是否犯過錯誤，都是同樣愛護而不會輕易懷疑的”。中央希望再林彪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已經交代了問題的同志放下包袱執著精神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將功補過也希望那些隱瞞了某些問題的同志，把問題講清楚，凡屬好人犯錯誤，都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各級黨組織應當為這些同志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三、確定陸海空軍的軍（省軍區、警備區、科研單位，軍事院校不含，野戰軍含）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律堅持思想教育。這樣做有利於集中力量把軍以上單位的運動較快地搞好。請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照這些方針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學習，並隨時總結這方面的好壞經驗報告中央軍委。

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馬克思主義佔領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法律等在內的

整個上層建築領域，還需要我們全黨作極大的努力，批林批孔運動中湧現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應當注意培養並且團結一切願意批林批孔的知識份子推動他們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論隊伍，使全黨全軍能文能武。各級黨委要把這個問題當做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百年大計，認真抓起來。

五、批林批孔運動進一步證明瞭毛主席的估計：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是比較好的。我們的黨，國家機關，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是好的。是經得起風浪的。經過八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的。各級黨委應當結合學習毛主席、黨中央的歷次指示，認真地總結自己的經驗，分析形式，加強領導，爭取批林批孔運動和各項工作的新勝利。

中共中央 1974年5月18日

（發至縣、團級。傳達到群眾）

對於林彪事件許多專著無法將全部編入本史稿，在這裏僅編錄了主要脈絡的文章以作參考。

二、大批判

在批林批孔的過程中，上海區縣局一級的機關普遍成立了大批判小組。以寫出文章指導本系統的大批判活動，同時也有調查研究之責以供領導參考。梁效寫作組是代表最高級別的指導運動方向的大批判寫作組。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研究小組”，由當時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他們佔領了北京大學朗潤園一座幽雅的小樓，組員多達三十餘人。這些“秀才”們根據來自釣魚臺的指

令，炮製了二百多篇文章，內中有三十多篇重點文章，成了當時的“學習檔”。他們的文章，連篇累牘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發表，擁有“權威性”。除了常用的筆名“梁效”之外，還用過筆名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以筆名“羅思鼎”著稱（取義于雷鋒名言“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羅思鼎”為“螺絲釘”的諧音），成立於 1971 年 7 月，直屬張春橋、姚文元。除了常用羅思鼎筆名外，還用石侖、康立、翟青、齊永紅、石一歌、史鋒、史尚輝、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樓、靳戈、方岩梁等筆名。

三是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筆名“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成立於 1973 年 9 月。

四是文化部寫作組，筆名“初瀾”，取義於“青出於藍”，“青”即江青，“藍”乃藍蘋，“初瀾”及“出藍”之諧音。

9 月 4 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在《北京日報》發表；

9 月 15 日，“石侖”的《論尊儒反法》發表於上海《學習與批判》創刊號上，《紅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轉載；

9 月 27 日，“唐曉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發表於《人民日報》；

緊接著，《“焚書坑儒”辯》、《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資產階級和儒法鬥爭》……一連串的“大塊文章”。

江青的“重點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彙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澤東，附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建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以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並發出了《通知》。

《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個部分：

- 一、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
- 三、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誣蔑勞動人民；
- 四、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 五、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
- 六、用孔孟反動的處世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

七、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還用過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幾個筆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頻率最高、名聲最大。

與同時期的“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池恒”（《紅旗》雜誌寫作組）、“初瀾”（文化部寫作組）等其他寫作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響力，其消息來源也更廣，名氣更大，所有的知名學者更多。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籌備十大的工作會議。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駁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歷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1]。

十大後，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兩校“大批判組”其實就是梁效，它名義上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大批判組”，實際是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抽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有關人員，拼湊起來的御用寫作班子。

1973年10月，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組”，1974年人員調整後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等為筆名。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摧毀後，梁效也隨即退出歷史舞臺。

1973年，清華大學做了一份《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給毛澤東。毛看後說：“清華是理工科學校，不懂這一塊。”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師來整。當時的北大老師被4+4341部隊的領導找去的時候，心裏都很高興。這些材料寫好後，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主導材料。[2] 梁效的代表作還有《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右傾翻案風》、《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事件剖析》、《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1976年，毛澤東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

1976年10月，梁效也因被十一大政治報告點名，其成員受到範圍不同、程度不一、長短各異的批判、審查，並被要求說清楚其與四人幫的關係。部分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

人員組成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由駐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另有4+4341部隊一名軍人委任書記，清華、北大各一人委任副書記。梁效分別為寫作組、研究組，寫作組負責具體寫作，研究組（後改名注釋組）主要負責對寫作組的文章進行“把關”。他們先要由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

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轉達、貫徹；此外，他們還要根據江青等人的授意，揣測他們的意圖進行寫作。

該寫作班子選拔的都是當時國內著名的文史哲專家，如範達人、何芳川、湯一介、葉朗、胡經之、馮天瑜等。他們中間有四人曾被選為第四屆人大代表，一人參加中共十大，兩人列名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學史家馮友蘭、歷史學家週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等曾任顧問。

所寫文章

為了當時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寫了 219 篇文章，發表的有 181 篇，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檔。由於文章包含著毛澤東及文革小組的“意見”，因此，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先後轉載。而且，這些文章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等重要機關報刊中都居於顯赫位置，當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主要文章有：

1973 年 9 月 4 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4 年 1 月 21 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略論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4 年 1 月 26 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子是怎樣利用教育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的？》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4 年 2 月 1 日，《紅旗》本年第二期轉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讀柳宗元〈封建論〉》一文。本文先發表在 1973 年 11 月 9 日《北京日報》上。江青看後，深為欣賞，下令《紅旗》轉載；

1974 年 2 月 20 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 年第一期一口氣

發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國師大國”是叛徒賣國賊哲學》等文章共八篇以上，占了該期學報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丘其人》，先後在本年《紅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學學報》第二期發表。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學而優則仕”析》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論商鞅》，在《紅旗》本年第六期發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在《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同時發表； 1974年6月20日，施鈞、金戈的《談商鞅變法》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三期發表；同日，《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三期發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呂後》；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剝掉孔老二“博學多識”的畫皮》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四期發表，9月9日，《北京日報》又加以轉載；同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論愛國主義者王安石——兼論歷史上儒法之間賣國與愛國兩條路線的鬥爭》、《論三國時期的法家路線》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四期發表， 1974年9月8日，《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一文在《人民日報》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時又作了許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論賈誼》、《古代偉大的無神論者——西門豹》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四期發表，《有作為女政治家武則天》這篇文章的原題是《法家女皇武則天》，發表時臨時改了標題； 1974

年9月14日，梁效顧問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並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報》發表《封建末世的歷史畫卷——讀〈紅樓夢〉》；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文在《紅旗》本年第十期發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點體會》、《論康熙維護國家統一和抗擊沙俄侵略的鬥爭》兩篇文章，在《歷史研究》本年第一期發表；
同日，聞軍的《論劉禹錫的政治詩》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六期上，
1975年2月1日《紅旗》本年第二期轉載；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論王莽復辟的歷史教訓》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評孔老二吹捧的子產——兼論春秋末期儒法鬥爭的階級陣線》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舊，堅持繼續革命》一文在《紅旗》本年第三期發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聞軍的《論李商隱的〈無題〉詩》在本年第二期《歷史研究》上發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評林彪所謂的“仁政”》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二期發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專政，還是儒家的“仁政”——試論太平天國在政權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杜甫的再評論——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二期上發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反動的孔學》一文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四期發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務運動與洋奴哲學》一文在本年第五期《歷史研究》上發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小評論《孔丘之憂》；
1976年年2月15日，

高路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小評論《“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再論孔丘其人》在《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一期同時發表； 1976年2月，梁效編寫《蘇聯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辯論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須批孔》一文刊載於《紅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克己復禮”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和高路的《“整頓”與“正名”》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二期發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醜惡表演》在《北京日報》發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謠言的破產與鄧小平的垮臺》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本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一文發表在《紅旗》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一文在《紅旗》本年第九期上發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農兵名義編寫的《堅持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列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戰鬥七年》小冊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寫了《劉邦死後，呂後是如何按劉邦的既定方針辦的》、《劉邦死後，他的既定方針是怎樣傳下去的》、《周勃是如何支持呂後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論總綱〉和克己復禮》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成為梁效歷史上的最後一份公開記錄。

以批判林彪為由的批林批孔運動似乎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大批判熱潮。水又沸騰了。周恩來 1972 年 5 月確診膀胱癌，毛澤東病重，一個月發兩次燒。說話也不太清楚。鄧小平因林彪事件後寫信給中央表示決不翻案。在這種形式下，鄧小平複出，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並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並著手整頓為綱的科技、工業系統整頓工作。而相反報紙上則推出了交白卷上大學的張鐵生。北京小學生黃帥反對師道尊嚴的榜樣。在工業系統搞出了風慶輪事件等作為國民厭倦了無休止的爭論。大多數也表示了冷漠。但心裏還是在期盼。國家能出臺一些具體的針對個人、家庭有所改善的政策。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文革期間最後一場由官方指導的大規模的批判運動，緊接著 1975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逝世。1975 年 7 月 6 日朱德逝世。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逝世。中共進入了接班人之爭的腥風血雨之中。



1974 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年 3 月，北京國棉三廠工人在批林批孔鬥爭中，寫大字報批判孔孟之道，在廠區張貼大字報批判林彪。攝影：許林



1975年3月，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社員結合報紙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攝影：許林

第七節 全國四屆人大

一、上海籌備

1973年10月19日單位領導傳達了上海市革委會10月13日下午擴大會議精神。馬天水說，市革委早就應該召開，外地一周之前就開了。，為什麼不開，是因為等中央有一批名單，全國北京、天津、上海比較晚。今天會議主要是產生名單，周總理在報告中講了，最近要召開四屆人大。十大後中央發了2個通知，第一個通知，關於召開人大會議是粉碎林彪反黨集體勝利召開的，代表名額減少三分之一，現在2403名。本來在70年下半年召開，由於林彪推遲三年。再加上機動97名。主要給少數民族、華僑、工人、農民。

勞動人民 64%，幹部 9%，知識份子 5%。解放軍 16%，特別代表 3%，華僑 1%。上海 94 名。70 年 140 名。第二個通知，根據各地討論情況在工農兵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要增加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又增加了 200 名。由北京、天津、上海產生，特別代表要作為正式代表，有利於調動積極因素，要作好工作，特別是原來是代表現在不是代表的思想工作，著重說明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符合條件的，調整有三個原因：1 代表名額減少 2 時間過了三年代表情況發生了變化 3 有些代表工作有變動或者其他原因，這次當選十大代表、候補委員除了工作需要，讓給一些非黨同志代表。9 月 29 日中央建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協商產生，不算上海名額。金祖敏同志算上海代表。愛國人士 15 名。華僑 2 名，有 53 名全國著名人士代表由上海協商產生。

金祖敏說。9 月 19 日市委召開會議討論了中央通知，9 月 22 日搞了草稿。今天交給大家討論。上海 94 人，根據上海情況分配，產業工人 60 名，63.8%。農民 6 名，6.4%勞動群眾 10 名 10.6%知識份子 10 名 10.6%其他 8%這次代表與 70 年相比有較大變動。如代表中有 23 名代表入了黨，中央建議宋慶齡等 55 名代表在上海產生，由於代表少不可能全面照顧，有的民主人士就沒有，在政治協商會議可以考慮。

馬天水說，根據小組討論意見總是好的，對代表提一些意見，我們轉達。有的提小學代表，是有的不算在 94 名單中，有的說體育界沒有代表，我們準備向中央反映，代表中注意照顧到上山下鄉的代表，總的反映這次代表工作做的很細緻，採取舉手通過的方法。第一次通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第二次通過 94 名代表，共通過 170 名，把這次擴大會議的精神向全市人民傳達，主要講清楚調整的原因。

馬天水對當前工作的幾點意見：

- 1、深入學習十大檔完成中央提出的各項任務，學習國慶社論，我們學習十大檔要以基本路線為綱。國慶社論所說的四個重點很重要，學習十大文件要與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相結合，要反復學習，長期學，凡是這樣做的，學習就可以深入，這樣做的路子就越來越寬，十大三個檔是第十次路線鬥爭的總結，不要把批林批孔與批劉少奇對立起來，批林與批劉少奇結合起來，批孔為了批林、劉修。現蘇修大力吹捧孔老二。學習十大要抓重點，要抓典型要抓頭，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要辦好學習班，中央辦了，上海也辦了。
- 2、加強戰備，學習十大檔要加強戰備，要充分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勝利，要加強戰備，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要認識蘇修的本質，在蒙古屯兵 20 萬，亡我之心不死，西歐經濟產值達，東歐是殖民地，蘇修最近在中蘇邊境尋事生非，我們說了 4 年，現在還是確定不下來，我們要警惕他們突然襲擊。軍隊，民兵軍工生產要動員起來，做到平戰結合，打起來上海要留 100 萬工人上海準備留 200 萬到 250 萬人左右，疏散 200 萬左右，要大家來考慮要通過各種管道疏散，多花點錢是可以的，一切要圍繞早打、大打，敵人下來。我們要準備，各項工作要與裝備結合起來，這次洪文同志到上海作了 2 點指示，一是學習十大，二是戰備。
- 3、接班人的問題，我們要充分認識培養接班人的重要性，培養接班人是堅持党的基本路線，要反對論資排輩，要敢於堅持正確路線，堅持原則到崗位上來，現在有了傾向，就是離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單純看資格看群眾路線這是不對的，要抓革命促生產的優異成績向四屆人大獻禮！

單位負責人還傳達了葉劍英報告摘錄如下：

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協商臺灣籍代表時葉劍英，王洪文、李德生等同志參加政治局委員十一人參加今天的介紹一下：十大產生的新的領導洪文同志，敵人天天在關注不是一個人的事，是毛主席的戰略，蘇聯沒有這樣，我們吸取了教訓，在十大前王洪文同志參加工作，在毛主席的教導下，很快成熟，萬一有三長二短就會少些被動。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新聞公報（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新聞公報（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訊^[4]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隆重舉行。

大會的議程是：一、修改憲法；二、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工作人員。

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場主席臺上懸掛著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巨幅畫像。畫像兩邊樹立著鮮豔的紅旗。大會選舉了由二百一十八名代表組成的主席團。朱德、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為主席團常務主席。吳德為秘書長。

在主席臺前列就座的還有：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江青、許世友、華國鋒、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

朱德委員長宣佈大會開幕，全體代表熱烈鼓掌。樂隊奏國歌。會上，張春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政府工作報告》。

從一月十四日起，全體代表認真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請大會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上述兩個報告。

在籌備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全國經過廣泛的民主協商，反復討論，共選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們當中有產業工人、農民、其他勞動人民、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愛國人士、歸國華僑的代表。工農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婦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個少數民族都有代表參加。參加大會的還有十二名臺灣省籍同胞的代表。許多代表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充分體現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各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反映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興旺氣象。

大會正式開幕前，從一月五日到十一日舉行了預備會，



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

全體代表討論了會議的主要檔和其他準備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很大成績，國內外一片大好形勢下召開的。大會自始至終洋溢著歡欣鼓舞、緊密團結、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氣氛。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一月十七日，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張春橋同志所作的《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批准了周恩來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們為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光榮任務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大會根據中共十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候選人名單，經過認真討論，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任命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

當宣佈選舉結果和任命名單時，全場又一次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代表們興奮地表示，這次大會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規定了今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任務，選舉和任命了新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這一切充分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到底的

共同願望，必將極大地激發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積極性，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在我國的歷史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大會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執行和勇敢捍衛新的憲法，努力實現大會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大會指出，全國人民要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用馬克思主義佔領整個上層建築領域。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設。要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爭取提前完成國民經濟計劃，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努力。

大會指出，當前天下大亂的國際形勢，繼續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正在進一步激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越來越激烈，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各國人民對於世界大戰必須有所準備。大會強調要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堅決支持第三世界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和人民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威脅和欺負的鬥爭。大會號召全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加強戰備，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入侵之敵。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

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

（《人民日報》19750119 第1版）

主席團和秘書長名單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5] 主席團和秘書長名單

主席團（共二百一十八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丁盛、於會泳、千比、馬天水、馬正壽、馬甯、馬惠敏（女）、王大任、王鳳恩、王六生、王必成、王芸生、王克強、王洪文、王維儉（女）、王敬美（女）、王淦昌、王淮湘、王震、鄧小平、鄧兆祥、鄧初民、鄧穎超（女）、韋國清、木沙·司馬義、尤太忠、貝時璋、牛學智、牛乾一、毛遠新、烏雲其其格（女）、烏蘭夫、方毅、巴桑（女）、葉劍英、田富達、史良（女）、白如冰、白迪·海山、鄭健康（女）、馮友蘭、皮定均、呂玉蘭（女）、呂美英（女）、劉大年、劉大傑、劉子厚、劉文輝、劉慶棠、劉光濤、劉興元、劉聲、劉伯承、劉建勳、劉斐、江青（女）、江渭清、朱永嘉、朱光亞、朱蘊山、朱德、喬冠華、喬曉光、伍禪、任榮、許世友、許德珩、華國鋒、華羅庚、莊則棟、莊希泉、湯一介、孫玉國、孫衍坤、孫鴻志（女）、嚴濟慈、蘇和、蘇振華、杜瓊書（女）、楊木蘭（女）、楊立如、楊光、楊坡蘭（女）、楊榮國、楊勇、楊得志、肖勁光、吳玉英（女）、吳有訓、吳桂賢（女）、吳德、吳耀宗、何生祥、餘秋裏、鄒清蓉（女）、辛志英（女）、沙千里、沙馬力汗（女）、沈雁冰、宋長庚、宋慶齡（女）、宋佩璋、陳雲、陳永貴、陳永祥、陳先瑞、陳逸松、陳望道、陳淑清（女）、陳錫聯、李大章、李井泉、李世英、李世榮、李達、李光慶、李志民、李先念、

李麗(女)、李順達、李素文(女)、李強、李瑞山、李德生、張鳳玲(女)、張平化、張宗遜、張春橋、張鐵生、張越男(女)、張鼎丞、張福財、阿沛·阿旺晉美、茅以升、林巧稚(女)、林麗韞(女)、林岳川、林耀華、果基木古、羅叔章(女)、帕巴拉·格列朗傑、季方、金秀清、金祖敏、周興、周叔弢、周建人、周恩來、冼恒漢、屈清華、孟繼懋、趙朴初、趙辛初、趙紫陽、榮毅仁、翦子昂、胡清碧(女)、胡厥文、胡愈之、侯雋(女)、費彝民、姚文元、姚連蔚、秦基偉、袁水拍、聶榮臻、晉桂香(女)、錢學森、倪志福、徐廷澤、徐向前、徐致祥、徐清秀(女)、徐靜洲、郭公舉、郭沫若、曹軼歐(女)、戚玉珍(女)、常維華、崔海龍、康生、康健民、梁必業、梁祥勝、彭沖、董雙琴(女)、董必武、董加耕、董其武、蔣錫明、韓先楚、覃應機、粟裕、傅玉芳(女)、童第周、魯瑞林、曾紹山、曾思玉、謝冰心(女)、謝拴貴、謝靜宜(女)、瑞板、藍榮英(女)、藍盛花(女)、路希傑、筱文豔(女)、解學恭、蔡暢(女)、廖志高、廖承志、賽福鼎、譚餘保、譚啟龍、譚震林、樊德玲、潘廣生、薛清泉、薛喜梅(女)

秘書長：吳德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訊)

(《人民日報》19750119 第2版)

5 政府報告編輯

周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6]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周恩來)

各位代表！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我代表國務院，向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

從三屆人大以來，我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目前正在全國普遍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是這場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促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保證了我國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一邊。它提供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經驗，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各族人民廣泛開展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上層建築領域的鬥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密切了和群眾的聯繫，大批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茁壯成長，以革命樣板戲為標誌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深入發展，教育衛生革命生氣勃勃，廣大幹部和工農兵學商堅持五七道路，上百萬赤腳醫生成長起來，近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參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正在壯大。這一切新生事物的湧現，在上層建築領域加強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更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儘管我

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盪、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我們同各國人民一道，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我們粉碎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侵略和顛覆，加強了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我國在聯合國長期被非法剝奪的席位得到恢復。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增加到近百個，有經濟貿易關係和文化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一百五十多個。我們的鬥爭得到各國人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援。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經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鍛煉，我國各族人民更加團結，我們的軍隊更加堅強，我們的偉大祖國更加鞏固。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各位代表！

我們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再一次闡明瞭毛主席制定的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進一步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方向。

我國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努力實現十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決不能因為批林批孔已經取得很大成績而有所鬆懈。我們要繼續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為今用的原則，總結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並在鬥爭中建設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用馬克思主義佔領整個上層建築領域。實現這個任務的關鍵，就是要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廣大幹部和群眾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要通過批林批孔，進一步推動文藝革命、教育衛生革命，推動各條戰線的鬥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加強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設。各級領導班子要提高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更加密切地聯繫群眾。積極培養青年、婦女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著重從工人、貧下中農中選拔優秀分子到領導崗位上來。精兵簡政，減少層次。新老幹部要互相學習，加強團結，要能上能下，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我們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認真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要依靠廣大群眾，穩、准、狠以准為重點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要按照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方針，採

取民主的方法，認真解決好人民內部矛盾，把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我們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團結其他勞動群眾和廣大知識份子，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統一戰線。我們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共同奮鬥。

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推動力。我們必須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在革命統帥下，努力增加生產，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更加鞏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制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畫。

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直到工礦企業和生產隊等基層單位，都要發動群眾，經過充分討論，制訂自己的計畫，爭取提前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為了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有更大的發展，必須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繼續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和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畫。在國家統一計畫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更好地執行鞍鋼憲法，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

我們的各級領導同志，在抓經濟工作的時候，務必十分注意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抓緊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產。要深入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鋪張浪費等錯誤思想和作風。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條路線，使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任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風潮起伏，我國經濟始終紮實地蓬勃發展。我們要永遠堅持這條路線。

各位代表！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仍然是天下大亂，而且越來越亂了。資本主義世介面臨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傾向蓬勃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越來越激烈。它們的爭奪遍

及世界各個角落，爭奪重點在歐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聲東擊西。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和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它們的激烈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世界上到處講緩和、講和平，恰恰證明，這個世界沒有緩和，更談不上什麼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國際形勢總是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世界的前途總是光明的。

我們要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著眼於人民，寄希望於人民，把對外工作做得更好。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我們要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我們要加強同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團結，堅決支持他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保護本國資源，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我們堅決支持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南部非洲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我們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和人民反對超級大國控制、威脅和欺負的鬥爭。我們支持西歐國家在這個鬥爭中聯合起來。我們願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為增進兩國友好睦鄰關係而努力。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分歧。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三年來兩國關係有所改進，兩國人民的往來有了發展。只要中美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能夠認真執行，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

蘇聯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同他們的原則爭論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我們歷來認為，這種爭論不應妨礙中蘇兩國正常的國家關係。蘇聯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惡化兩國關係的步驟，對我國進行顛覆，直至挑起邊界武裝衝突。他們背棄中蘇兩國總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達成的諒解，拒絕簽訂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致使中蘇邊界談判至今沒有結果。他們連中蘇邊界存在著爭議地區都不承認，連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防止武裝衝突這樣的事情都不幹，卻侈談什麼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條約，這除了為著欺騙蘇聯人民和世界輿論以外，還有什麼呢？我們奉勸蘇聯領導，還是老老實實坐下來談判，解決一點問題，不要再玩弄那些騙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我們要保持警惕，加強防禦，準備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軍擔負著保衛祖國的光榮任務。全軍要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建軍路線，加強軍隊建設，加強戰備。要認真辦好民兵。人民解放軍和廣大民兵要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入侵之敵。

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臺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崇高目標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國內外大好形勢下，我們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我們必須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抓大事，抓路線，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

我們必須堅決擁護黨的一元化領導。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須置於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之下。

我們必須發揚遵守紀律的光榮傳統，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我們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的大多數。不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

我們必須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我們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一邊。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發揚成績，克服缺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乘勝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訊）

（《人民日報》19750121 第1版）

五、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張春橋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張春橋 1975.01.13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一月十七日通過

各位代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大會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已經發給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託，作一些說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憲法，是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總結了歷史經驗，鞏固了我國人民的勝利成果，為全國人民規定了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前進道路。二十年來的實踐證明，這個憲法是正確的。它的基本原則，今天仍然適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的部分內容，今天已經不適用了。總結我們的新經驗，鞏固我們的新勝利，反映我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共同願望，就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主要任務。

二十年來，我國人民的新勝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逐步地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經過同國內外敵人的反復較量，特別是經過八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我國各族人民空前團結，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為我們制定了一條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

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黨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這條基本路線。我們同劉少奇的鬥爭，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這條基本路線，還是改變這條基本路線。歷史的和現實的階級鬥爭都證明，這條基本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也是我們國家的生命線。只要我們堅持這條基本路線，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戰勝國內外敵人，奪取更大的勝利。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也是我們這次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

現在提出的這個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憲法的繼承和發展。它是經過全國各族人民反復討論產生的，是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產物。序言是新寫的。條文從一百零六條，縮減為三十條。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幾點：

（一）修改草案從序言開始，記載了我國人民英勇奮鬥的光輝歷史。“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我國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現在寫進了修改草案總綱。草案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又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由於不設國家主席，草案對一九五四年憲法關於國家機構的規定，作了相應的修改。這些規定，必將有利於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

(二) 修改草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又規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和政策。在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中湧現的政社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和實行革命三結合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也分別寫進了修改草案。這樣，就明確地規定了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各個階級在我們國家的地位。馬克思、列寧一貫教導我們：“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家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機器”。我們的草案，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一原則立場，同孔老二的什麼“仁政”，同蘇修叛徒集團的什麼“全民國家”之類的謬論劃清了界限。

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二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國人民戰勝敵人、保護自己的法寶。我們必須很好地愛護它，不斷地加強它。我們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人民解放軍和民兵，加強國家機關的建設。要繼續鞏固工人階級和它的可靠同盟軍貧下中農的聯盟，團結其他勞動人民和廣大知識份子，發展包括各愛國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行有效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鞏固我們偉大祖國的獨立和安全。

(三) 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對敵人實行專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修改草案規定了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又規定了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其中特別規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婦女的權利。修改草案還規定了

人民群眾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同時，根據毛主席的建議，草案第二十八條增加了公民有罷工自由的內容。我們相信，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廣大革命群眾一定能夠更好地運用這些規定，“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四）一九五四年憲法提出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國人民取得的這一偉大勝利，規定我國現階段主要有兩種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修改草案對於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對於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也作了規定。這些規定，把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同劉少奇包產到戶、取消自留地之類的荒謬主張劃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規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應當指出，在我們國家，仍然存在著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象初升的太陽，還很年輕。它是在鬥爭中誕生的，也只能在鬥爭中成長。就拿國營經濟來說，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的領導權並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工人手裏。許多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去佔領。孔老二死了兩千多年，無產階級的掃帚不到，這類垃圾決不會自動跑掉。修改草案關於“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以及國家機關、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密切聯繫群眾、糾正不正之風等項規定，就是要我們

十分注意抓上層建築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注意解決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把正在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用馬克思主義佔領一切陣地。

（五）根據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教導，我們將“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寫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們國家今天不稱霸，永遠不稱霸。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我們要永遠同全世界各國人民團結在一起，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

各位代表！

修改憲法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五年。這次大會將要完成這項工作，公佈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法。這是一件值得我們熱烈慶祝的大事。長期以來，為了爭取和捍衛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權利，為了粉碎劉少奇、妄圖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對外投降賣國的陰謀，為了戰勝國內外反動派，我國人民進行了尖銳複雜的鬥爭，成千成萬的烈士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這些鬥爭的勝利，產生了這個社會主義憲法。我們相信，全國各族人民，首先是共產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一定會認真地執行這個憲法，勇敢地捍衛這個憲法，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保證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

（新華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訊）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年)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75年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序 言

第一章 總綱

第二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節 國務院

第三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

第四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第五節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四章 國旗、國徽、首都

序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人民革命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歷史階段。

二十多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乘勝前進，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

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我們要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繼續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備戰、備荒、為人民。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我國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國內外敵人，克服一切困難，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
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
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
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
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
安排下，從事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
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

礦藏、水流，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於全民所有。

國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對城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實行徵購、徵用
或者收歸國有。

第七條 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

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一般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

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不可侵犯。國家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公共利益。

第九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國家保護公民的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第十條 國家實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在社會生產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第十一條 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各級幹部都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國家機關都必須實行精簡的原則。它的領導機構，都必須實行老、中、青三結合。

第十二條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文化教育、文學藝術、體育衛生、科學研究都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在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

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第十四條 國家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

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裝力量。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支戰鬥隊，同時又是工作隊，又是生產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任務，是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防禦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顛覆和侵略。

第二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十六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選出的代表組成。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特邀若干愛國人士參加。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在特殊情況下，任期可以延長。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修改憲法，制定法律，根據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批准國民經濟計劃、國家的預算和決算，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應當由它行使的其他職權。

第十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它的職權是：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委員長，副委員長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

第二節 國務院

第十九條 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若干人，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等人員組成。

第二十條 國務院的職權是：根據憲法、法律和法令，規定行政措施，發佈決議和命令；統一領導各部、各委員會和全國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工作；制定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管理國家行政事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三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

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地區、市、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農村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兩年。

第二十二條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同時又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並報上級國家機關審查批准。

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都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一級國家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

第二十三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在本地區內，保證法律、法令的執行，領導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審查和批准地方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決算，維護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權利。

第四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第二十四條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和革命委員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除行使憲法第二章第三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外，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行使自治權。

各上級國家機關應當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積極支援各少數民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第五節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

第二十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設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任免。

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

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於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群眾討論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二十六條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每一個公民的崇高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榮義務。

第二十七條 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照法律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除外。

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公民對於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婦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國家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條 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任何由於擁護正義事業、參加革命運動、進行科學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給以居留的權利。

第四章 國旗、國徽、首都

第三十條 國旗是五星紅旗。

國徽，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穀穗和齒輪。

首都是北京。

七、會議通過修改後的《中華人名共和國憲法》，通過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
會議選舉朱德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董必武、宋慶齡
(女)、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艾則孜、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
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女)、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
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連蔚等 22 人為副委員長，委員 143 人。任命
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
永貴、吳桂賢(女)、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等 12 人為國務院副總理；



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會議並作政府工作報告^[2]

任命喬冠華為外交部部長，葉劍英為國防部部長，餘秋裏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谷牧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華國鋒兼公安部部長，李強為對外貿易部部長，方毅為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沙風為農林部部長，陳紹昆為冶金工業部部長，李水清為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劉西堯為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李際泰為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王諍為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李成芳為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邊疆為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汪洋為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徐今強為煤炭工業部部長，康世恩為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錢正英(女)為水利電力部部長，錢之光為輕工業部部長，萬裏為鐵道部部長，葉飛為交通部部長，鐘夫翔為郵電部部長，張勁夫為財政部部長，范子喻為商業部部長，於會泳為文化部部長，周榮鑫

為教育部部長，劉湘屏(女)為衛生部部長，莊則棟為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第八節 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

一、事件經過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3月29日，南京大學師生率先發起反對“四人幫”、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史稱“三二九南京事件”。該活動震撼全國，成為“四五運動”的先聲。清明節前後，北京市上百萬人民群眾，自發地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籃、送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對於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當時的領導人歪曲和捏造事實。4月4日，華國鋒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認為群眾的革命行動屬於反革命性質，並在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抓走許多堅持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當時，作為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毛澤東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4月5日，北京廣大人民群眾紛紛提出抗議，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形成了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運動，並同工人、民兵、員警和戰士發生嚴重的衝突，導致車輛和治安崗亭被燒。當晚7時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廣播講話中說，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九時半，出動1萬名民兵，3000名員警和5個營的衛戍部隊，帶著木棍，包圍天安門廣場，對留在廣場的群眾進行血腥鎮壓，並逮捕了一些人。

二、結果



四五運動 1976 年 4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員聽取北京市委的彙報，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並要北京市委寫成材料通報全國。毛澤東又根據毛遠新的書面報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決定。4 月 7 日，毛澤東同意發表吳德的廣播講話和《人民日報》記者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導”。姚文元組織攥寫的《人民日報》報導文章，把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 4 月 7 日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同時，認定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並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錯誤決議。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

三、天安門廣場詩選（摘錄幾首）

鬼蜮枉生非

星隕五洲慟，名高萬古垂。

蚍蜉爭撼樹，鬼蜮競生非。

國中人猶記，民心孰敢違。

誓傾哀痛淚，淨洗英雄碑。

壯志掃魔瘴

總理兒女在，那容妖倡狂。
雄心除鬼蜮，壯志掃魔瘴。
重演紅場戲，定無好下場。
國際悲歌一曲，狂飆必然從天降。

我按三尺劍

悲風平地起，狂飆從天落。
英雄別故土，肝膽照山河。
熱血湧心頭，痛詞壯征歌。
我按三尺劍，犬物敢禍國。

人民非阿斗

——讀 3 月 25 日《文匯報》有感

總理精神在，光華萬丈長。
小丑狂吠日，早晚自遭殃。
人民非阿斗，沉默有主張。
誰敢興妖風，定叫它滅亡。

光輝同日月

巨星隕落環球哀，山河悲泣悼恩來。
英名光輝同日月，恩德永遠記心懷。

世代記心頭

北風悲啼青山愁，江河嗚咽淚泉流。

舉國上下齊哀慟，總理世代記心頭。

挽聯花圈道民心

清明時節思親人，步入廣場淚滿襟。

仰望碑文魂猶在，挽聯花圈道民心。

鐵拳痛擊挖墳人

長江嗚咽日月昏，千頰掛淚泣周君。

詆毀忠魂萬眾恨，鐵拳痛擊挖墳人。

只緣妖霧又重來

悲風颯颯舉國哀，悼念總理淚滿懷。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只因人民力量大

總理形象真偉大，人民敬仰敵人怕。

為何生怕死也怕 只因人民力量大。

化作雷電擊妖蟲

清明家祭赴京城，緬懷總理蓋天功。

英靈直上九重天，化作雷電擊妖蟲。

誓作斬妖人

清明倍思親，深切悼念您。
光輝永不滅，照引後來人。
妖魔何所懼，誓作斬妖人。
繼承革命志，妖魔難稱心。

怒斥妖婆娘

昔日悼總理，悲痛苦斷腸。
今朝想總理，渾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懼，虎豹咱敢降。
識破假馬列，怒斥妖婆娘。

唯有今年不同處

清明每到淚紛紛，天下幾家哭斷魂
唯有今年不同處，舉國都是心酸人

總理花中現

烈血點點灑大地，碑石巍巍沖雲天。
妖魔倡狂得意時，須防總理花中現。

打殺白骨精

積年魔怪何日平，總理身逝卻永生。
我們同持猴王棍，打殺人間白骨精。

鐵拳

總理英名垂千古，誰想抹灰是妄想。

不信小丑試試看，人民定給鐵拳嘗。

征途上英魂指引

寄哀思聊表衷情，承遺志億萬軍民。

征途上英魂指引，除妖魔自有後人。

千鈞鐵棒打小妖

楊花春風上九霄，灰撕萬裏江山嬌。

盡瘁馬列無媚骨，千鈞鐵棒打小妖

所摘錄的幾首詩詞是千萬首中的一點水，一朵浪花，是民眾對文革的不滿與反抗的反映，借悼念周恩來爆發了，四五期間用花圈、詩詞作為武器，向文革開火，向封建王朝開火，民眾劍指毛家獨裁，天開始亮了。

四、“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拿著毛澤東給他的手諭在腥風血雨中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榮任中共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1967年10月6日，華國鋒在葉劍英等人支持配合下，用宮廷政變的手法抓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全國人民經歷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個歷史階段，長達13年6個月23天的文化大革命落幕了，毛澤東窮畢生精力以犧牲國人福祉生命為代價建立起來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王朝屍骨未寒就轟然倒下了。可悲的竟是毛澤東親自挑選的“你辦事，我放心”堅持“二個凡是”的華國鋒是始作俑者。然而華國鋒好景不長，被鄧小平用類似的手法趕出了歷史舞臺，自己成了總設計師。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封建政治的翻版，這與社會進步無益，與國人進步無益，得益的仍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集團。

我編寫的《文革史講稿》到此該結束了，但全體國人應該留下些思考，否則愧對在文革中死去的冤魂；愧對在文革中遭受苦難的國人，用人性，用民主政治，用普世價值作為思考的標準，才能得出真正的教訓。

第九節 文革期間的文藝

走向“文革”藝術：1959—1965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導致了全國性“大躍進”運動，進而產生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整個國家的人民處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烏托邦激情之中，只有那些少數冷靜的現實主義者對由毛澤東發動的運動所產生的後果異常擔心，他們從統計出來的數字中發現了經濟甚至政治上的危機。中共中央在年底敏感到了問題的出現，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直至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浮誇與激進思想已經開始進行，但是，這已不能夠阻止1959年底暴露出來的因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的嚴重後果。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解決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14日，毛澤東在他戰爭年月的戰友彭德懷給他的信中讀到了讓人難受的文字，“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政治掛帥不可代替經濟法則”。可以想像，這個意見讓毛不快。聯系到彭剛從蘇聯回國就發生了赫魯雪夫宣佈中國的人民公社是不知道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人幻想的產物，以及赫魯雪夫撕毀中蘇涉及軍事技術援助的協議，毛澤東將彭的意見理解為是一場對抗性的政治較量，他告訴在廬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員：廬山出現了一場政治鬥爭，“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對

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廬山會議將對“大躍進”提出不同意見的高級領導人彭德懷、黃克誠（1902—1986）、張聞天和周小舟定性為“反黨集團”，彭德懷國防部部長的位置被林彪接替。為了進一步鞏固這次政治鬥爭的成果，中共各級組織從 1959 年到 1960 年初還開展了發右傾的政治運動，以肅清廬山會議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繼續“躍進”。嚴酷的政治鬥爭使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看法進一步得到強化。

但是，農業的急劇減產和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的嚴重饑荒與數千萬人的死亡證實了彭德懷觀察的真實性。1961 年初，政府為解決嚴重的經濟危機，實行了“包產到戶”政策，並且通過將城市的部分人口推向農村以緩和糧食短缺的壓力，有七千中共地方幹部參加了對過去“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定性的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毛澤東帶領中共部分領導做出了自我批評。

1961 年，陳毅（1901—1972）代表黨再次向知識份子發佈在政治上鬆動的消息：黨需要知識份子，陳毅說：“思想改造主要是靠個人的覺悟，要他自己好好考慮，企圖用強制的方法、群眾的壓力來解決思想問題是不行的。”經過了反右運動以及之前的政治批判運動的一般知識份子沒有因為這樣的鬆動資訊而釋放內心的餘悸。相反，那些在政府和黨的機構中佔據領導位置的知識份子卻以雜文和戲劇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對政策甚至對毛澤東本人的批評。1957 年被免去《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的鄧拓、北京副市長吳晗（1909—1969）和北京市委統戰部官員廖沫沙（1907—1990）用“吳南星”這個筆名在鄧拓編輯的《前線》發表了數十篇雜文，名為“三家村筍記”。鄧拓本人在《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上也單獨發表了系列文章《燕山夜話》。這些在體制內部發表的含含蓄蓄的

批評文章是針對之前尤其是“大躍進”中出現的政策錯誤與問題而來的。不過，像《專治“健忘症”》和《王道和霸道》這樣的文章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專制及其後果來的。

從反右運動之前，毛澤東就已經發現黨內的不同觀點與措施限制著自己的決策的執行和推動，為了擺脫“大躍進”帶來的困境，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高層領導支持推動了農村的“包產到戶”，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可是，毛澤東對這樣的舉動給予了嚴厲的指責。黨內的矛盾繼續進行著。

1962年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和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鑒於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那些主張並支持農村“包產到戶”的領導人的言行，鑒於這些措施統統屬於資本主義的東西，鑒於彭德懷繼續長篇大論地申訴他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應該是資本主義正在復辟，全黨應該高度重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階級鬥爭，他決定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共中央先後下發《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等文件，掀起從1963年至1966年為時四年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或“四清運動”)。這個運動很快將問題的焦點轉向了“階級鬥爭”。之後，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醒：“所有知識份子都不能放鬆自己的改造”，並且要通過“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群眾，參加階級鬥爭，參加生產勞動”，使自己“革命化”。這樣，藝術家開始成群結隊地到農村，為一些基層單位畫村史、家史或者是一些有關普及科學、衛生、文化知識的掛圖、連環畫、壁畫、幻燈、黑板報。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

毛澤東精通中國歷史，他對那些借用歷史典故提出質疑的黨內知識份子的立場非常清楚。政治上的危機是如此地讓他擔心和憂慮，他告誡人們，不要放棄警惕，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將不斷地以各種對抗性的方式出現。順著這樣的邏輯，人們在1963年中共九篇評論蘇共的《公開信》的文章中發現，兩黨之間從1960年公開的意識形態衝突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中共高層告訴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赫魯雪夫和鐵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各自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以及對個人崇拜的批判是遠離列寧主義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提醒全黨：要提高警惕，避免“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避免作為“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這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就被認為是“挖修正主義根子”。9月，這個國家進入了更為嚴峻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鬥爭時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的提出，給作為藝術宣傳機構的美術家協會提出了直接和具體的政治任務。“四清”運動在藝術家引起了“藝術如何為五億農民服務的課題”。不斷的政治與學習會議，啟發和喚起了藝術家們對“服務”與“主題”的認識。1963年12月召開的美協工作會議告誡藝術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以長期蹲點為好；但也要因地制宜，譬如有些年老體弱的或工作忙的同志，長期下去有困難，組織他們短期到生活中看看也有好處。不論長期下去還是短期下去，都應該重視對階級狀況的分析，從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中瞭解人，不斷積累豐富的生活鬥爭知識和人物形象素材；要像文學家那樣多方面地熟悉自己的人物，不能只為滿足一般造型需要而停留於形象的表面記錄。不能把深入生活的過程

僅僅看作創作的準備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術家必須重視自我的思想改造。”

雕塑試圖起到繪畫那樣的宣傳與鼓動的功能，雕塑家錢紹武（1928—）在《美術》雜誌上提出建議，他呼籲通過“村史紀念碑”的建立來發揮雕塑在政治功能上的作用：“一、它可以擴大社會主義的文化陣地，直接向農民進行形象的社會主義教育，從而也就把土地廟、關帝廟等封建迷信陣地奪取過來；二、在我們雕塑工作者來說，可以受到具體生動的階級教育，大大有利於改造自己，是革命化的好途徑；三、在創作的實踐過程中，可以更好地在批判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民族形式，批判‘洋’形式，為雕塑民族化積累經驗；四、結合工作，提供了深入生活，和勞動人民結合的較為有利的條件；五、長期、經常搞下去，可以逐漸產生合乎民族化、群眾化要求的好作品，可以培養出一批合乎民族化、群眾化要求的雕塑工作者。”不管是雕塑家的呼籲，還是藝術工作者自己的敏感，他們將塑造的對象進一步轉向了農民。

1964年初，“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口號成為全國各個行業需要呼喊的口號，文學藝術領域也不例外。與其他文藝團體一樣，美術家協會在組織“美術家”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工作上不遺餘力，大量作品成為人們歌頌新社會的宣傳工具，大多數作品充斥著工人、農民和人民解放軍戰士的形象，可是，黨內部分知識份子官員對毛澤東的指示仍然表現出明顯的惰性，毛澤東在6月27日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上這樣寫道：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來，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

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樣的批示引發了文藝界新的政治空氣。文藝界的著名人物例如夏衍、田漢，以及像楊獻珍(1896—1992)、孫冶方(1908—1983)、翦伯贊(1898—1968)這樣的知識份子遭受批判。各種宣傳機器告訴人們：這個時代的英雄是大慶油田的王進喜(1923—1970)、大寨農村的陳永貴(1914—1986)和解放軍戰士雷鋒(1940—1962)，他們共同象徵並代表著應該給予充分宣傳和歌頌的“工農兵”形象——他們被認為從來就沒有出現在過去歷史上的任何文藝中。

1964年9月至1965年7月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美術展覽會是反映“社教運動”的展覽，為時9個月的展覽分期分批展出了全國26個省(區)、兩個市的2025件作品。“不少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現實鬥爭的作品”因“在創作中運用了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被認為是成功的。

不過，在藝術領域裏配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表現階級鬥爭主題的代表作品是1965年下半年僅用4個月完成的《收租院》。

早在1963年2月，毛澤東根據湖南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河北保定地區“四清”的情況，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經驗總結。很快，全國各地開始進行“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敵人出現了，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田金鐸(1932—)的《哨兵》、孔凡偉的《海哨》提醒觀眾，目光前方可能有敵人。事實上，“美術家”們並不清楚，毛澤東所說的“敵人”隱藏在中央。

1964年，在北京展出的“四川雕塑展覽會”因“以滿腔熱情來塑造工農兵的形象”而獲得藝術官方的認可。劉開渠在《美術》1964年第3期裏的文章《鼓舞人心的雕塑新成就》使用了這樣一些文字對四川雕塑給予評價：“無論是關於我

國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傳統的題材，無論是當代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題材，作者都以滿腔熱情來塑造工農兵的形象，來表現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有鮮明的時代感情，有強烈的戰鬥性。”之後，將泥塑群像《收租院》這個階級鬥爭的任務交給四川的雕塑家顯然是可以值得信賴的。

連環畫式的雕塑《收租院》沒有作者署名，這是那個消除個人名利思想的時代特徵，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在這裏列出他們的名字：雕塑系教師趙樹桐、王官乙（1935— ），學生李紹瑞、龍緒理（1941— ）、廖德虎（1939— ）、張紹熙、范德高（1939— ）；學校之外的參與者有李奇生（1939— ）、張富倫、任義伯（1936—1998）、唐順安和民間藝人姜全貴，在後期工作中，雕塑系教師伍明萬（1932— ）、龍德輝（1932— ）和學生隆太成（1944— ）、黃守江、李美述、馬赫土格（彝族）、洛加澤仁（藏族，1946— ）也參加了進來。1965年6月，四川省委委託四川美術學院為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創作泥塑《收租院》，這樣，老師帶領學生開始了他們的雕塑的“階級鬥爭”。由一百多個與真人同樣大的泥塑人物構成的雕塑群僅僅消耗了4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它們被排列在四川大邑縣的地主兼軍閥劉文彩（1887—1949）的大院裏。

《收租院》裏的人物形象被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據官方的表述，他們共同構成了1949年之前在這個院子裏發生的故事。悲慘的農民——男女老幼包括一個孤老太婆——每年向地主交租，自己卻所剩無幾，在“小鬥出大門進”的盤剝下，他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孩子，或者被關進水牢——儘管以後發現不曾存在“水牢”這一事實，以至在饑餓與貧困中死去。最終，拿著扁擔的農民準備起來反抗地主——這是1965年的原作結尾。“文革”爆發之後，這個故事開始根據江青提倡

的革命樣板戲的模式進行改造。在 1968 年的修改中，結尾是農民高舉政治標語和毛主席語錄。《收租院》被認為直接反映了 1949 年以前中國農村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是“一幅舊社會縮影的圖畫”。雕塑者希望在作品裏“既要表現地主階級的殘酷兇狠，也要表現他們的虛弱；既要表現農民受壓迫的悲慘痛苦，也要表現他們的反抗精神；既要表現當時當地的冷酷現實，又要預示前途和未來”。“不僅要讓觀眾為過去苦難的農民流下同情的眼淚，而且要激發觀眾仇恨舊社會，熱愛新社會的感情”，這是《收租院》創作的全部目的。《收租院》所具有的故事性（情節性）、對原地場所的利用、像傳統“泥菩薩”造像那樣直接用稻草粗泥加上混合了棉花、細沙的細泥作為基本的材料，以及用嵌入黑玻璃球代替挖洞陰影法，被認為是這組雕塑的藝術手法和特點。

1965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美術》第 6 期發表了 6 篇關於《收租院》的文章，編輯寫下了這樣的評價：“四川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收租院》泥塑創作，為廣大群眾所歡迎，為美術家所重視。它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堅持黨的文藝方向在美術創作上的重大勝利。它是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產物，也密切配合了革命鬥爭的根本任務。它從思想高度反映了我國民主革命階段的階級鬥爭，體現了廣大群眾絕不忘記階級鬥爭，絕不容忍剝削制度復辟的革命意志。它的思想性高，藝術性也高，是對群眾進行階級教育的有力武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一創作實踐，既是美術工作者不斷革命化的集中體現，也為美術工作者不斷革命化提供寶貴的經驗。”當《收租院》於 1965 年 10 月完成以後，延安版畫家李少言（1918—2002）在《四川日報》（11 月 29 日）發表了《向雕塑工作者學習》的文章，《美術》當年第 6 期給予轉載。1966 年 1 月 4 日，在《人民日報》的《雕塑標兵——參觀〈收租院〉泥塑群像》

一文裏，作者王朝聞——他是延安時期的雕塑家和理論家——乾脆說明：“這是革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是文化革命的一大勝利。”

同樣是延安藝術家的蔡若虹也及時地在《紅旗》雜誌 1966 年第 3 期中發表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勝利——評〈收租院〉泥塑群像》。這位直接聆聽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評論家說：《收租院》的創作“解決了雕塑工作上的一個大問題，即雕塑如何為五億農民服務的問題”。在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年月，《收租院》的展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組作品很快被要求複製——《收租院》創作組和中央美術學院雕塑創作室共同完成複製工作。《收租院》部分複製品連同原作的全部照片於 1965 年 12 月 19 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後來移到故宮神武門城樓）展出，每天有成千上萬的觀眾前來參觀，據新華社 1966 年 7 月 11 日電訊中的不完全統計，參觀者達到 100 萬人次以上。這時，它被認為“是雕塑藝術革命化的活樣板，是雕塑藝術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它不僅壓倒了外國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謂雕塑藝術的‘頂峰’，而且開闢了無產階級革命雕塑藝術的完全嶄新的時代”。它成了“階級教育的好學校，階級鬥爭的活教科書”。在藝術上，《收租院》是之後 70 年代在主題上更富於杜撰色彩的《農奴憤》的樣板。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黨內部分領導人對其中的用詞多少有些領悟，當讀到“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他們明白這應該理解為大禍就要臨頭。11 月，歷史學家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姚文元的分析中被認定為階級鬥爭的反映，是一棵“毒草”。毛澤東同意姚文元的分析，他乾脆指明：《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

(1514 —1587) 的官，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很快，中國將從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於很短的時間裏，由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1931— ）等激進的知識份子構成了新的團體，在林彪、江青、陳伯達的相互政治利用中形成了黨內新的政治集團，曾經是黨的文藝思想的堅定執行者的周揚等人很快將失去 權力。林彪在江青的支持下開始在軍隊建立他的威信和影響力，這年，人們開始購買曾經只是在軍隊裏流行的紅色封面的《毛主席語錄》——這是軍隊對地方開始產生政治影響的標誌，文藝領域開始接受軍隊而不是文化管理部門的直接影響。之前的 1964 年 7 月 10 日，由總政治部、文化部、中國美協聯合舉辦的“中國人民 解放軍第三屆美術作品展覽會”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展覽期間，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組織了部隊美術座談會。全國美協於 7 月 17 日至 23 日邀請了部分美協分會 的負責人前來觀摩和座談，並請總政治部文化部的那狄（1918— ）和部隊美術家向來京的分會負責人及首都美術家作了 7 個專題的報告。《美術》1964 年第 4 期也介紹了這個展覽，為“學習解放軍美術”作了比較全面的輿論 準備。展覽在美術界宣傳了“部隊美術工作革命化”的經驗。軍隊的美術工作者通過階級鬥爭和部隊鬥爭生活的主題配合政治任務，以表明被認為是必須堅定的政治 方向。在“介紹經驗”中，軍隊代表將軍隊內部的工作方式作為藝術的經驗給予推廣，即由軍隊領導出題目、分任務、統籌安排。 這導致了一種所謂“領導”、“作者”和“群眾”“三結合”的模式並被給予推廣。“三結合”的方法被認為“可以充分調動和發揮領導、作者、群眾三方面的積極 作用，也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集思廣益，把三方面的積極作用，集中地通過作者的創作實踐具體體現出來，從而保證作品品質的提高。在題材和主題的安排上，運用 這一方法，可以保證反映社會主義生活和鬥爭的作品占主導的地

位，這樣也就能夠保證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的正確執行。領導出題目、分任務，具體安排與作者的特長相結合，既可以保證主導題材，而且有利於題材的多樣化，也有利於促進在為工農兵、為社會主義服務前提下的形式、風格的百花齊放”。

1965年1月31日正是“第四屆全國美展”華東地區作品展開幕的時候，蔡若虹在他的《山東年畫有三好》中使用了來自軍隊“三結合”的概念：“山東年畫由於運用‘三結合’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值得我們在組織創作的工作部門加以推廣。”自此，“三結合”組織創作的方法得到普遍效仿，一段時間裏，“加強黨的領導，實行‘三結合’的方法”成為藝術官僚的口頭禪。大量被藝術官僚認可的藝術被冠之以“三結合”的產物。華君武甚至說：“哪里三結合實行得好，哪里的創作就會出成績。”

1966年1月20日至2月20日期間舉辦的“華北區1966年年畫、版畫展覽”以及同時舉行的“華北地區美術工作者觀摩大會”構成了一個極端指令性的政治安排，通過這個屬於政治典型的展覽，在作為組織者的藝術官僚們看來是為了服務於變化中的政治鬥爭。1966年2月的“全國美協分會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努力學習解放軍、華北地區和四川、山東等分會以毛澤東思想指導創作和工作、突出政治的正確做法。”這樣，山東的年畫、華北地區的“年畫、版畫展”、四川的泥塑《收租院》，便構成了這個即將進入政治白熱化時期的典型和樣板，它們共同暗示著一場暴風驟雨的來臨。王朝聞乾脆就說明：《收租院》“密切配合了當前革命鬥爭的根本任務”。

1966年，《美術》雜誌第2期在安排“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討論的同時寫了“編者按”：“長期以來，美術界在思想與技術的關係問題上，在紅與專的關係

問題上……是存在著原則性分歧的。在我們美術工作者的思想上、生活上、藝術修養上，在美術創作、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要不要突出政治，實行不實行以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改造一切、推動一切，是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主義的鬥爭，能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根本問題。”

1966年2月19日至23日，全國美協在北京舉行了全國美協分會工作會議，會議《紀要》這樣寫道：

代表們一致認為：學習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之首要，根本之根本。哪個地區工作、創作和隊伍的革命化，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結果。有些同志檢查本地區前幾年的工作，認為一些錯誤的發生，都是由於沒有很好地聽黨的話，沒有突出政治。在處理政治和業務、美術工作與其他革命工作的關係時，顛倒了位置，不適當地強調藝術特性；沒有抓好人的革命化，使工作脫離了政治、脫離了革命、脫離了群眾，走入了斜路；對於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的歷史任務下，怎樣發揚革命傳統，將革命進行到底，缺乏認識。這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是很嚴重的教訓。同志們決心在今後的工作中，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著作當作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要努力學習解放軍、華北地區和四川、山東等分會以毛澤東思想指導創作和工作、突出政治的正確做法；領導同志一定要帶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與工農兵結合，實現領導思想的革命化，帶領出一支革命化、戰鬥化的美術隊伍。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所寫的介紹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1922—1964）事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同時發表了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在“政治掛帥”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沒有誰像焦裕祿這樣能夠成為鼓勵黨的幹部的典型，

因為他將自己的時間與精力完全用於十分落後的農村經濟工作，以至最終病逝。這是一個符合中國傳統道德而同時表現了黨要求的幹部與群眾之間的魚水關係的形象，自然成為歌頌的典型。儘管在他去世的病床上同時發現了《毛澤東選集》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是他的工作熱情和力量的來源被認為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劉少奇要求的“修養”，“焦裕祿同志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新的英雄誕生了，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美協分會工作會議，當即通知全國各地分會展開學習和創作活動，並發表了致全國美術工作者的一封信：《學習焦裕祿徹底革命化》。這封信安排了全國藝術家當前的工作。

4月18日至5月29日，中國美術家協會將幾個月內全國各地藝術家完成的任務集中起來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美術作品展”，展出雕塑、年畫、連環畫、版畫、素描、油畫、國畫、彩墨畫、宣傳畫等80餘件。從發動創作到展覽所花去的時間不到4個月，時間短暫而組織工作是如此的有效。可是很快，更為迅猛的“文革”風暴就要席捲開來，曾經堅定地執行毛主席文藝革命路線的人在新的革命時期即將自身難保，他們不同程度地將成為各種名目的壞分子而受到批判，即便是那些在之前的不同政治運動中批判過別人的人也不例外。

1966年初，《紅旗》雜誌發表了元旦社論《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這是一個信號，它意味著一個新的政治運動馬上就要開始。“政治”在1949年以後是統帥文藝工作的關鍵，只是被稱之為“政治”的東西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那裏究竟有什麼含義難以廓清。不過，每一個“政治嗅覺”靈敏的人都知道，“政治”就是保證自己不致成為人民、進步、革命、黨的對立面的東西，以至

從 50 年代到“文革”，政治無所不在，人們一直就謹小慎微地討論政治、關心政治和參與政治。這樣，黨的文藝官僚要求藝術家“必須提高政治修養”（朱丹）、要求藝術家“以政治統帥創作”（華君武）就很好理解，即便是畫家傅抱石的文章題目叫“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大驚小怪。可是，說出政治並不困難，困難的是不斷地理解、參與政治，並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遊刃有餘。現在，理解新的政治成為關鍵，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梁寒冰（1909—1989）在“華北區 1966 年年畫版畫展覽”觀摩會上提醒藝術家：“要畫革命畫，先做革命人。”同時要清楚，“做革命人首先要突出政治，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反復講，要講千遍萬遍。幹一輩子革命就要講一輩子突出政治，學一輩子毛主席著作，永遠以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行動的指標，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事實上，在對政治極端強調的空氣裏，政治已經失控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藝術：1966—1976

1963 年和 1964 年，毛澤東先後在柯慶施（1902—1965）的報告以及《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中分別做出了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和各個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的結論。作為毛澤東的夫人，江青開始組織對若干電影——《不夜城》、《林家鋪子》、《舞臺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等——進行批判。很快，在毛澤東的同意和康生的支持下，江青開始組織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的配合下，江青合作完成並以姚文元的名義在《文匯報》（1965 年 11 月 1 日）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次日至 26 日期間，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

《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北京的報紙因為彭真的控制沒有及時給予轉載，這導致了毛澤東的“生氣”。彭真很快通過《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給予轉載，試圖彌補這個有意的失誤，不過以後的情況表明這個遲來的彌補為時太晚。這是一個在表面上以“百家爭鳴”的氣氛中進行的政治鬥爭，雙方都在報刊上發表了各自的文章。12月21日，毛澤東對陳伯達、艾思奇、胡繩（1918—2000）、關鋒（1919—）、田家英（1922—1966）在談及戚本禹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時候，說出了那段需要點名批判《海瑞罷官》的話。現在，吳晗的歷史觀成為了一個政治鬥爭的契機。姚文元在他的文章裏就是這樣利用文字的：他假設吳晗對“海瑞罷官”的實際要求是“退田”，可是這個時候的田已經成為人民公社的財產，田會退還給地主嗎？這顯然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姚文元假設吳晗也同意學習“平冤獄”，可是，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究竟要為誰平反呢？顯然是那些失去田地的地主和失去財產的資產階級，而這樣的人正好應該是被專政的物件。

在此之前的2月，毛澤東於1964年指示成立的以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康生、周揚、吳冷西（1919—2002）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完成了被稱之為“二月提綱”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檔，這個“彙報提綱”已經承認了“資產階級”對文化領域的侵害，但也表示盡可能地在“以理服人”的學術範圍內給予批判性的解決。2月5日，這個彙報提綱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上獲得通過，卻完全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組織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準備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檔，

在修改中被轉換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與此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完成了一個與《二月提綱》相對立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毛澤東認可了。4月10日，著名的《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檔印發全黨——這是江青從一個普通黨員轉而可以合法行使黨的最高層政治權力的標誌。《紀要》的重要內容是：

在我國革命的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文化戰線上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我們黨的歷史上，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也都包括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就是對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統的歷史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在我國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毛主席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兩篇著作，這是我國和各國革命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的最新的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新發展。

但是，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卻基本上沒有執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

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藝術家們被告知：過去十七年的文藝遭遇資產階級的“黑線專政”，因此，新的藝術應該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文藝，必須通過“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將歷史顛倒過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對十七年的估計構成了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四人幫”專政。

江青出現在 5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讓所有的人都很吃驚。在之後若干天裏，批判文章接連出現在《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被稱之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通知》告訴人們：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十三人組成，這個小組直接向毛澤東負責，與被撤銷的“文化革命小組”對中央書記處負責不同，這個以“文化革命”為名的新的政治權力機構，在以後若干年裏成為中共

實際的權力中心。顯然，未來的目標不僅僅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也是組織上的徹底清洗。

5月16日之前，中國美協黨組還在組織學習《二月提綱》，並制定了本年度學術批判題目：一、蘇修美術；二、資產階級學院派教學思想；三、美術上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四、在政治與藝術問題上美術界青年和學生中的問題。可是，當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清洗“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五一六通知》發出之後，全國——從學校開始——的政治形勢開始產生徹底的紊亂。

5月25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1921—）為代表的部分教授和學生寫出第一份大字報，儘管這是針對本校黨委的，但是，這個舉動對於全國其他學校來說，無異於一次激進的煽動。6月1日，人們通過報紙和廣播知道了毛澤東對這份大字報的支持態度，於是，自發的群眾造反獲得了事實上的合法性。這個時候，新的文化革命小組已經掌握了《人民日報》，它通過主要的黨報和雜誌對這樣的造反給予輿論上的支持，很快，造反行動蔓延至全國各大高等院校，僅僅只有4天的時間，造反的學生從激進的自由行動，迅速過渡到成立自己的組織——紅衛兵。6月24日，一張署名為“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出現在清華大學，直至7月23日《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出現，由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試圖引導學生政治方向的“工作組”喪失了控制局面的能力，7月的最後幾天，紅衛兵們似乎覺得可以徹底地展開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了。在文化藝術機構，“群眾”開始對他們認為的“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進行清查和揭發，並迅速展開批判。6月21日，蔡若虹、華君武、王朝聞、江

有生被要求停職反省；7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肅清周揚在藝術院校的流毒》和《周揚為古今中外的牛鬼蛇神續家譜》；7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的文章《周揚的“自由化”毒害了中央美術學院》；7月28日，《解放軍報》發表文章《徹底揭露“三家村”黑畫家黃胄的反革命嘴臉》。

藝術家尤其是老的藝術家們的肉體和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處境在中央美術學院任何一位教師的經歷中可以找到，王琦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當學校的教師在完成“四清”工作從農村回到學校時，等待他們的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和革命的批判：

我們一進校門，便被集中在大禮堂，已經進駐美院的工作組領導曹某某是解放軍大校，他在臺上宣佈：“剛從邢臺回來的全體教師，所有的日記本，筆記本都要上交，如果隱藏不交，查出來以反革命論處……”

接著，版畫系的同學便把我和李樺、黃永玉等人叫去系辦公室，那裏已列隊等候著，我們剛跨進門口，他們便一齊高呼：“打倒走資派李樺！”“打倒反動權威王琦！”“打倒反動權威黃永玉！”接著便是七嘴八舌地對我們批鬥了一通。並要我們到樓上走廊裏參加同學們對葉淺予的批鬥會。

葉淺予事後的描述是觸目驚心的：

美院紅衛兵第一大棒，是火燒舊教具，把石膏模型統統砸碎，堆在操場中央；又搜集舊講義、舊畫冊作燒料，燒起熊熊大火，從牛棚里拉出來全體牛鬼蛇神，跪在大火周圍。紅衛兵宣佈，我們這些人是舊世界的渣滓，要為舊世界殉葬。我們背後站著革命造反派，稍一挪動，後面的就伸手將你撥正，不許亂動。火越燒越旺，臉上烤得發痛。我旁邊跪著的是國畫系副主任，他有風濕症，膝蓋痛得不行，連聲叫饒，造反派哪管你死活，你越叫他越吼你罵你。

南方藝術家的境遇同樣觸目驚心。林風眠不僅受到數次抄家，還因包庇“叛徒”被送入監獄。

8月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對“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要求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宣佈可以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去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決定》強調發動“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來進行這樣的改革。18日，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人的海洋，毛澤東在這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接見來京“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來自全國各地到北京的紅衛兵進行了8次遊行，文獻記錄的人數共有1300萬人。到了年底，新的中央文革小組要求紅衛兵停止大串聯，回到所在的地方與當地黨委和當權派進行鬥爭。12月，人們已經能夠看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這表明中央最高層的政治分裂已經眾所周知，毛僅僅依靠著林彪和江青等人，中央文革小組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得到徹底的凸現。林彪明確號召學生要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給予了各地紅衛兵對被認為是“四舊”的一切給予破壞的公開批准。結果，全國開始了以破“四舊”為名的毀滅性行動。紅衛兵搗毀文物、燒毀古畫、破壞宗教設施，他們可以對任何一個被認為是“牛鬼蛇神”的人的家裏進行抄查，搗毀文化與藝術品。11月23日，在各地寺廟被不同程度地遭受毀壞的同時，孔廟裏的“萬世師表”橫匾連同其他文物被扔進熊熊大火之中。在各個大學出現混亂的同時，全國藝術院校（中央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魯迅美術學院、四

川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的老教授、老畫家紛紛受到紅衛兵批鬥。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社論宣佈:“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月11日,《人民日報》以“粉碎蔡若虹、華君武在美術界的資產階級專政”為主題,發表了三篇文章:《為復辟資產階級效勞的美術綱領》、《華君武是炮製反黨黑畫的老手》、《蔡若虹是美術界的罪魁禍首》。歷史被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再次改寫:蔡若虹(當時為中國美術家協會駐會副主席)被認為從1951年起就抵制新年畫創作;華君武(全國美協秘書長)被認為是30年代上海資產階級右翼漫畫家,是一個反黨漫畫老手。所有曾經在機構中擁有職務的藝術官員如蔡若虹、華君武、王朝聞,以及所有曾經被認為是知名的畫家如潘天壽、林風眠、劉海粟、葉淺予、黃胄、石魯、豐子愷等,都沒有逃脫嚴厲的批判,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肉體上的摧殘。這個波及一切領域的清洗是如此的徹底,以至去世數年的齊白石也被江青給予補充清算,他被認定為奴顏媚骨的“反動畫家”。

直至1972年國務院文化組主辦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會”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之前,藝術都處在死亡中。這個時期出現在大街小巷、群眾組織的傳單、報刊以及有限的媒體上的圖畫,大致以批判內容的宣傳畫和簡潔的漫畫為主,藝術史家用“紅衛兵美術運動”來概括這個時期的藝術。

可以想像,隨著紅衛兵組織的增加和批判活動的進行,官方美術家協會控制的《美術》雜誌停刊了,大量的紅衛兵美術報刊和不同方式的展覽替代了官方展

覽，官方美術機構徹底癱瘓。1967年5月23日，由北京84個革命造反派組織聯合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革命畫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展出了版畫、漫畫、宣傳畫、新語錄畫數百件。直至6月，被認為是得到林彪和軍隊支持的紅衛兵展覽“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在北京舉行，作品表現出鮮明的政治觀念與符號化的模式，這不是美學的簡潔，而是意識形態的本能表現。現在，主辦機構不再是美術家協會和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門，而是“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展覽的內容分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橫掃社會上牛鬼蛇神”，“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四個部分，展覽作品中有大量用於宣傳的水粉畫及雕塑。

1967年10月，一個包括國畫、油畫、版畫、宣傳畫、泥塑和工藝美術品超過1600多件作品的展覽“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在中國美術館開幕。著名的作品《炮打司令部》（王為政[1944—]）出現在這次展覽上。的確，畫家們很快就理解了應該如何去歌頌領袖和新的權力人物，金色的陽光從身後灑來，就像一個舞臺的場景，導演通過“逆光”來塑造中心人物。展覽中展出的巨幅油畫《東方紅》就是這樣，領袖毛澤東帶領他重組的新的政治力量——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1967年11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1967年11月28日）發表了“中央直屬美術系統革籌小組”評論組的文章《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頌歌》：“革命化”、“戰鬥化”、“群眾化”被認為是這個展覽的特點。

事實上，這年最為重要的作品是同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展覽中的《毛主席去安源》。這件被印刷了數億張複製品的作品是由中央工藝美院學生劉春華（劉成華，1944—）完成的，在這

個批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的時代，作品的署名是“北京院校同學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儘管劉春華是美院井岡山兵團的一個紅衛兵，但是，這件作品仍然是由造反組織（北京市工代會、紅代會、總工會）安排的政治任務。在江青的決定下，《毛主席去安源》和鋼琴伴唱《紅燈記》被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化路線的新成果給予廣泛推廣。1968年7月1日，作品以單張印刷的形式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行，很快，各地報刊以同樣的重視給予了刊載，有《毛主席去安源》的各種材料的印刷品紛紛出現，到了10月，北京市美術裝潢包裝工業公司甚至用鐵皮印製《毛主席去安源》給予發行。7月7日，劉春華在發表於《人民日報》的文章《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中有這樣的文字：

在構圖上我們把毛主席的形象安排在最突出的地位。毛主席高大的形象迎著我們，向著我們走來了，像一輪光彩奪目的朝陽從我們面前升起，給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毛主席的一舉一動，都體現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動態的處理上，要讓毛主席的每一微小的動作都有一定的含義：用稍稍揚起的頭和稍稍扭轉的頸部表情，說明毛主席不畏艱險、不畏強暴、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緊握的左手錶現毛主席具有堅決、徹底、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為爭取解放全中國全人類的雄心壯志和必定勝利的信念；右手挾著一把舊雨傘，說明毛主席風裏來，雨裏去，為革命不辭辛苦，跋山涉水，到處奔波的艱苦的工作作風；邁著穩健的步伐，踏在不平的路上，表明毛主席為我們披荊斬棘，踏平了我們前進的道路，引導我們勝利前進；秋風吹起了由於工作緊張而沒有時間修整的長髮；衣衫被風吹得飄起來，表明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時刻，是革命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時刻。我們看到，隨著紅太陽的升起，安源山區見到了紅色

的曙光。

文字裏涉及的所有政治象徵和文學性的聯想，是“文化大革命”藝術的基本邏輯，大多數畫家熟悉這樣的邏輯，他們知道只有按照這樣的邏輯才有可能符合時代的藝術標準。

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大量的畫家從事著毛澤東形象的塑造，在以後的毛澤東題材的作品中，領袖很難再是曾經出現在 50 年代畫家筆下那樣的和藹可親、平易 近人的形象，毛澤東變得極其高大、居於構圖的中心、永遠紅光滿面——這些總是作品的基本特徵。藝術家曾經接受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藝術思想 的教育，現在，江青推出的樣板戲的舞臺效果——強烈的逆光、大面積的紅色或暖色、顯示力量和革命情緒的造型以及工農兵形象對中心人物的環繞——成為新的藝 術標準，這個標準被簡潔地概括為“紅、光、亮”和“高、大、全”。曾經跟隨毛澤東從事革命的中共領導人幾乎都被打倒了，新的歷史畫就剩下身後散發金光或者 紅光的毛澤東，這樣的風格與早年藝術家描繪的毛澤東形成鮮明對比——領袖被徹底神化。

1967 年 1 月，上海奪取權力的“一月風暴”成為紅衛兵造反、破壞時期結束的標誌，當毛澤東於 13 日對劉少奇主動提出辭職表示默許，並告誡後者“好好 學習，保重身體”時，對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打倒”——組織清晰——已成事實，之後的政治任務是建立新的權力體系。1 月 15 日，造反派組織“工總 司二兵團”、“上海市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進入上海市委機關大樓，人們歡呼“奪權成功”，四天後，張春橋將這個“一月奪權”稱之為“一月革命”，他要人們相 信，一個類似巴黎公社的“新上海公社”已經誕生。22 日，當《人民日報》《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的社論發表之後，爭奪權力的鬥 爭在

全國各地迅速蔓延。

“奪權”導致不同派別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與衝突，哪里有權力需要奪取，哪里就會發生爭奪權力的鬥爭，直至發生武裝衝突。但這不是毛澤東所期望的結果，很快，毛澤東要求改變這樣的局面，因為作為他在黨內的敵人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已經被揪出來，紅衛兵的政治任務已經完成，現在不再需要學生運動導致的混亂。1967年2月22日，北京各高校紅衛兵共同召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佈了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個“最高司令部”旗幟下的聯合；3月，在全國串聯的紅衛兵被要求回到自己的所在地學校“複課鬧革命”，“教育革命”開始；各地黨政軍機關、學校和其他職能機構的領導人被抓回到當地接受造反派揪鬥批判；6月，全國範圍內的“抓叛徒”在肉體與人身自由的摧殘中進行。不同的政治背景導致不同的看法，7月22日，在紅衛兵成都部隊給陳再道（1909—1993）的信中出現了把“世界上空前的獨裁分子從地球上消滅”的文字，致使毛澤東沒有心情再次橫渡長江；1968年夏天，不斷發出終止武鬥的中央文件漸漸消弭了革命造反派的極端鬥志，毛澤東讓工人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名義進入學校，以便控制學生的暴力行為。外國人贈送給毛澤東的芒果被轉送給工宣隊——這表明革命的權力從學生移交到工人，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轉變；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文章，之後的情況是，大批城市學生和知識青年陸續被要求到廣大的農村安家落戶，在那裏他們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他們曾經戰鬥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第一線，而現在，他們的覺悟被認為已經不如農民，必須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毛澤東的經典語錄“廣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為之後大多數宣傳畫和其他形式作品的題材和內容。

很快，鼓動知識青年在農村接受教育並為農業建設做貢獻的繪畫開始出現。在大量反映城市青年到農村參加勞動和階級鬥爭的作品中，劉柏榮（1952—）的油畫《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1969）、逸中（陳逸飛[1946—2005]、徐純中[1947—]）的水粉《毛主席的紅衛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樣金訓華同志學習》（1969）、馬振聲（1939—）的木刻《梁山需要你們》、溫承城的國畫《上大學之前》（1972）、徐君陶（1943—）的國畫《團代表》（1973）、周思聰（1939—1996）的國畫《長白青松》（1973）、周樹橋（1938—）的油畫《春風楊柳》（1974）、徐匡（1938—）的木刻《草地詩篇》（1976）等許多知青題材的作品構成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特殊記憶。“知青”的歷史是一個複雜的精神史，在之後的歲月裏，大量的“陰 暗面”和問題被暴露出來，可是，不少反映“知青”題材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面貌也不完全是虛假的——溫情、浪漫、詩意、淳樸不時在作品中透露出來，儘管這個時期的理想主義缺乏分析的理性。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黨中央的領導集團由不同政治勢力——林彪、江青以及那些殘存下來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代表構成。這年正是中蘇發生領土爭端並構成武裝衝突的緊張時期，毛澤東告誡軍隊“準備打仗”。次年出現的以珍寶島事件為題材的水粉畫《生命不息，衝鋒不止》（何孔德、嚴堅[1941—]）也因其嫺熟的技法表現而成為美術工作者記憶尤深的作品。1971年3月，“海軍美術作品展”使美術展覽從混亂的業餘展覽再次恢復到官方的控制中，200多件作品表現的是海軍戰士在領袖——包括林彪——的視察和教導下的情景。儘管這是一個提倡工農兵成為美術工作者的時代，但嫺熟的油畫技法表明了專業畫家的參與。此時，海軍美術創作集體的負責人是早

在 50 年代就以軍事生活為題材完成了不少作品的畫家呂恩誼（1930— ），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必須適應這個特殊的政治時代的需要，隱姓埋名，成為一名不計名利的普通的人民戰士，輔導並參與完成歌頌領袖與人民解放軍的作品，由他完成的作品被標上“海軍美術工作者”參加展覽。

無論黨內的政治鬥爭如何複雜難以廓清，1972 年 2 月仍然是一個提示人們歷史將發生變化的重要的月份，毛澤東同意接受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的來訪，表明了他對之前自己設計並導演的政治運動有了深深的倦意。在國際上，中國失去了蘇聯的支持；在國內，人們深陷盲目的政治鬥爭而相互殘殺；在黨內，曾經的戰友已經所剩無幾成為自己的敵人，親自培養的接班人也背叛了自己，毛澤東需要改變這樣的局面，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標誌著中國準備與西方重新對話。這時，毛澤東仍然是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何況以江青為首的政治集團在政治上還需要這樣的“陽光”對民眾的普照。

1972 年 5 月 23 日，“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晚會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這是自 1964 年最後一次全國美術展覽以來所舉辦的第一次官方展覽，這個為時兩個月的展覽有包括國畫、油畫、版畫、年畫、宣傳畫、水彩畫、剪紙等多種藝術形式的 270 多件作品。

唐小禾（1941— ）的《在大風大浪中前進》（1971）將毛澤東游長江的事件作為題材，畫家想表現的是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的高大形象和跟隨領袖的紅衛兵與解放軍戰士，毛澤東高大的體魄在周圍人物的動態和造型——軍人、紅衛兵與他比較起來顯得那樣地矮小——的烘托下顯得不可阻擋，他號召人們乘風破浪——這是那個時期人們對領袖的認識。之後，唐小禾和程犁（1941— ）又完成了同一題材的作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畫家似乎想表現

領袖的一種溫情和從容。廣東畫家陳衍甯（1945— ）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將 1958 年毛澤東視察廣州郊區棠下大隊的歷史事件作為題材，畫家顯然清楚應該如何表現領袖：中心的位置、高大的形象、紅光滿面。這件作品因造型的堅實、富於趣味的筆觸給這個時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不少年輕的繪畫愛好者在陳衍甯這類畫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不同於過去的油畫表現方法。由張自嶷（1935— ）、蔡亮、諶北新合作的《毛主席在大生產運動中》的構圖同樣是遵循著“文革”美術基本原則的作品；國畫《延安新春》也是通過將寫實技法對傳統繪畫的引入來表現領袖與革命題材的作品。不少陝西畫家在有黨領導的“創作組”裏進行創作，他們被安排到延安體驗生活，像士兵一樣出操、學習和拉練，他們在艱苦和被監視的狀況下理解革命歷史和藝術。無論任何題材，毛澤東佔據構圖的中心位置以及四周人們的環繞成為表現領袖題材的基本模式。

顯然，畫家們已經能夠主動地利用江青規定的“高、大、全”與“紅、光、亮”的美學樣式：作為中心的領袖、閃耀光芒的背景、溫暖的空氣以及戲劇化的激動場面。在視覺感受上，毛澤東不再是人民群眾中間的人，而成為在特定的空間中人們崇拜的神了。無論出自任何原因，曾經因為繪製《劉少奇在安源》而受到政治迫害的侯一民和其他畫家（其中有靳尚誼、詹建俊）共同完成了《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72），燦爛的陽光和紅色的光芒以及領袖所具有的雕塑般的造型，構成了“紅光亮”美學的典型，這些畫家顯然理解來自政治權力的美學原則。在過多的“紅光亮”的作品的氾濫下，“遼寧省宣傳館美術創作組”（實際作者是吳雲華）的《虎口奪銅》因為其對細節和逼真性的強調獲得了評委的一致認同，這件以“抓革命，促生產”為主題的畫雖然以暖色調作為一種政治的基調，但是，觀眾總是要被發光的安全帽、結實的臉龐以及從石縫落下的水

滴所吸引。潘家峻（1947—）的《我是海燕》給觀眾印象最深的是接近逼真的風雨和濕透的軍服體現出來的人體，儘管紅彤彤的臉龐仍然是那個時期的美學特徵。湯小銘（1939—）的油畫《永不休戰》正是因其技巧上的表現和色彩上的灰調子的運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任何人都熟悉魯迅，可是畫家在這個時候採用這個題材有其政治上的考慮，他設定構圖表現的是早年魯迅對周揚的批判——四年後這個構圖被用來對付鄧小平。觀眾不一定理解畫家的出發點，在普遍採用過分強烈的色彩和模式化構圖的作品氾濫的時期，他們在湯小銘的“魯迅”中看到了更加符合人性的色彩與氣質。同時展出的《女委員》、《虎門民兵》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國畫領域，楊之光的《礦山新兵》、《激揚文字》（另一個作者是歐陽[1937—]）也因為清新的人物形象和流暢的筆法成為“文革”晚期的代表作品，林墉（1942—）的《戰地新歌》通過漁民與軍人的聯歡來表達政治上的立場和心情上的溫馨。狂風暴雨的革命似乎暫時有些減弱，時間暴露出人們需要溫情，而表現溫情——對真實的嚮往——的技法就成為一種感染人們的清新的美學空氣，更為年輕的畫家從這些作品中吸收有趣的因素。這個時期，廣東畫家的技法構成了一個微妙的美學傾向：嫺熟的造型、瀟灑的筆觸、接近真實的色調以及退出重大題材的構思，例如陳衍甯於1974年完成的《漁港新醫》中特殊的構圖和衣褶的筆觸趣味成為不少年輕的畫家模仿的典範。人們顯然注意到了，藝術家們開始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署名。

1973年10月1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全國連環畫、中國畫展覽”被認為是一次重要的展覽。在這個展覽上，陳衍甯的《長征日記》，趙志田（1940—）的《大慶工人無冬天》，王迎春（1942—）、楊力舟（1942—）的《挖山不止》，張永新、王啟祿（1930—）、趙華勝（1939—）的《奪鋼前哨》，侯傑（1937—）、

延生（1943—）的《義務看車員》，唐大禧（1936—）的《人民的蘋果》，楊孝麗、朱理存（1940—）的《叔叔喝水》，全太安（1945—）的《送子務農》，梁岩（1943—）的《申請入黨》，徐君陶的《團代會上》，周思聰的《長白青松》，歐陽的《雛鷹展翅》表現出寫實技法對中國畫根本性的改造，畫家已經能夠在解決造型的準確性的同時盡可能地保留筆墨的趣味。同時，儘管題材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多數政治生活的內容，可是，作品普遍表現出對重大題材和“紅光亮”美學的退出。在山水畫方面，關山月的《綠色長城》，王頌餘（1910—2005）、賀建國（1940—）的《導洪穿運》，宋文治的《太湖之晨》，林曦明（1925—）的《太湖新歌》成為改造中國畫運動的最後的總結——來自特殊時代的政治要求並且不可能重複的美學趣味。

1974年10月1日，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展覽共展出包括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年畫、連環畫、宣傳畫、磨漆畫、水彩畫、水粉畫以及剪紙在內的647件作品。《人民日報》再次對展覽作品配合政治形勢的思想和技巧水準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不過，人們從類似湯集祥（1939—）的油畫《耕海》和反映農村建設的一批新山水畫中看到了政治情緒的緩和。展覽中有關“少（少數民族）、小（小孩）、漁（漁民）、女（美女）”題材的作品明顯增多，表明了畫家們對藝術豐富性的嚮往。然而，畫家的藝術是否獲得成功仍然取決於特殊的命運，當江青在《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站崗》前滯留並說出知青畫家畫出這樣的畫來“不容易”時，沈嘉蔚（1948—）便獲得了特殊的認可，他的作品被印成數十萬印刷品廣為散發張貼。

1975年10月1日，“全國年畫少年兒童美術作品展覽”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對年畫的強調（261件作品）表明了這個時候的藝術官員希望通過年畫來普及

黨的意識形態，這讓我們多少聯想到 1949 年開始的新年畫運動的情形。《人民日報》報導：“這屆全國年畫展覽展現了我國年畫創作的成就、新水準。許多年畫作品熱情歌頌我國日新月異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大好形勢，努力反映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重大題材，具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精神。不少作品表現了我國當前正在深入開展的學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文藝教育，衛生革命，以及各條戰線的新生事物。”在這個展覽裏，人們仍然能夠看到歌頌領袖的作品，普遍的微笑、結實的臉龐、建設的氣氛、歡慶的場面以及批判的現場，所有的題材與主題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一個必須肯定的現實：“革命形勢一派大好。”

1973 年 10 月舉辦的“戶縣農民畫展”和 1974 年底國務院文化組在中國美術館主辦的“上海、陽泉、旅大工人畫展”仍然體現了這個時期工農兵在藝術中的主體性，業餘和專業畫家在表現工農兵生產建設和政治鬥爭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作品，農民畫的風格的確因缺乏專業寫實訓練而表現出稚拙——與五六十年代的農民畫沒有太大的區別。有趣的是，評論家對農民完成的主題創作的專業性充滿肯定：

劉志德（1940—）同志創作的《老書記》一畫，著意刻畫了一位老幹部抓緊勞動間隙，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著作的情景。他是那樣聚精會神，被書中的革命真理所吸引，以致銜了煙鬥、拿了火柴想吸煙，又忘了擦火。這個細節抓得多好啊！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量的農民作者仍然接受了地方美術老師的輔導。作為政府的一級機構，人民公社經常舉辦農民們美術班，美術院校（西安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以及其他藝術學院）的教師和縣文化

館的美術幹部參與了包括戶縣在內的農民美術技法培訓。在一個需要樣板的時代，戶縣成 為專業和業餘美術工作者學習的楷模。與大躍進時期的農民畫相比較，這個時期的農民似乎已經不同程度地掌握了繪畫技法，業餘畫家的那種生動與稚拙感大大減 弱。似乎，這個時期的政治思想需要更多的技術而不是觀念來維持。

大批判、工業建設、成就展示以及虛設的對敵鬥爭是普遍表現的題材，不過，人們仍然從《春雨》這樣的作品中看到了畫家的個人趣味：晶瑩透明的水珠以及溫暖中透露出來的冷調子。

從“文革”爆發到 70 年代上半期，老畫家陸續去世，1968 年 5 月 11 日蕭傳玖逝世；1970 年 1 月 29 日陳半丁、倪貽德去世；12 月 28 日陳煙橋去 世；1971 年 9 月 5 日潘天壽去世；1973 年 5 月 23 日王式廓去世；1975 年 9 月 15 日豐子愷去世；11 月李斛逝世。時間讓新的藝術家隊伍在不斷發 展，在參加 1972 年到 1975 年的美展的作者中，人們很少能夠見到曾經活躍於表現革命和歷史題材的那些知名畫家，在政治題材決定一切的背景 下，老的國畫 家再也難以提供滿足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需要的作品，五六十年代因不同機會接受藝術教育的年輕人構成了這個時期的主力。他們在處於政治和社會動盪中的學院教 育和印刷品的薰陶下理解藝術，在美術家協會發佈的展覽通知中領會中央精神；他們在技術上表現出敏感性，在藝術思想上保持著服務於政治的慣性；他們偷偷翻閱 被批判的“封、資、修”的舊畫冊，卻也對語言的徹底開放性表現出無知；他們口中不斷念叨的是在五六十年代獲得的那些俄羅斯和蘇聯畫家的名字，卻不瞭解三四十年代不少中國畫家開創性努力的歷史。

中國的藝術家恐怕沒有什麼特殊的藝術觀點，他離不開黨的政策所規定的那

樣一些文藝原則，即使有一點自己的這樣的看法、那樣的看法，那都不見得能成一個什麼體系的東西。如果一定要說什麼觀點的話，那就是憑良心幹活。

藝術家或者美術工作者不斷地聽命於藝術官員和中央精神，可是他們對發生在國家高層的政治鬥爭幾乎一無所知。在微妙的感覺萌發的同時，影響歷史的因素也 不斷地發生變化，1971 年 9 月的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試圖盡可能地恢復曾經被他廢棄的政治資源，可是，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1973 年 8 月）給予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這個重組後的政治集團——“四人幫”——以更大意識形態權力，到了 1974 年 1 月，江青等人借用毛澤東同意對林彪與孔孟之道聯繫 起來批判的機會——“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了對周恩來的詆毀，他們將三年前周恩來安排畫家為賓館完成的繪畫定性為“黑畫”，2 月 15 日至 4 月 5 日，“黑畫 展覽”在北京中國美術館（以後移至人民大會堂）展出，展出作品 215 件，江青將那些“黑畫”進行示眾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找出“黑手”，試圖將周恩來趕出政治 舞臺。1975 年，毛澤東不再聽信於“四人幫”，他請在江西當農民的鄧小平回到北京重新主持工作，他開始接受恢復經濟建設的意見。他對鄧表述了他對文藝現 狀的瞭解，並且很不滿意：“樣板戲太少了，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他知道人們“怕寫文章，怕寫戲”；他承認現在“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就在同一個月，毛對江青也再次抱怨：“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已經意識到了文藝領域裏的凋零。

緩和的政治空氣在也 1975 年的展覽活動中體現出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加拿大風景畫展”（4 月 16—30 日）和“澳大利亞風景畫展”（9 月 2—17 日）分別在中國美術館和北京民族文化宮展出。可是，毛澤東對鄧的工作成果的性質的判斷仍然猶猶豫豫，“四人幫”借用毛澤東對《水滸》的看法而開展了對鄧小 平的批

判，他們理解毛澤東的意思是：不能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再繼續走下去。

1976年是一個灰暗而具有可能性的轉折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取代了鄧小平；3月19日，借清明祭祖掃墓的慣例，學生、市民、解放軍戰士以及各階層人士開始陸續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面安放花圈，這個包含懷念與象徵的舉動在4月4日達到了200萬人以上規模，紀念碑周圍成為花圈的海洋，有人在人群中發表講演，在大量的悼詞和詩歌中，人們看到了對江青等人的不滿和詛咒；4月7日，新華社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7月，朱德去世；8月，導致二十多萬人死亡的唐山地震爆發；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汪東興（8341—）指揮的8341部隊逮捕。歷史因人的意志、行動和命運而發生改變，這向人們多少年來習慣的對本質主義歷史觀的絕對信賴提出了挑戰。

第十節 文革時期各地區群眾組織匯總

文革中全國各地群眾組織情況概況

全國有的地區成立了按行業劃分的工人造反組織，如“全國臨時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轉為正式工。復員、轉業軍人成立“全國複、轉業軍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央發文明令禁止成立全國性的行業組織。給予取締。同時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警惕利經濟主義歪風。”“防止經濟主義轉移鬥爭大方向”等等。總之一句話，全國性組織決不能成立。地方上的群眾組織則力量強的，緊跟快的就支持，快刀斬對立派，直至一統天下，不惜“武鬥”。

現將在省級（含直轄市）水準對全國各地情況作一簡略描述，以證明上述判

斷。據我的調查和統計，紅衛兵的派別鬥爭在運動中始終表現為保守派與造反派對立的，在二十九個單位中只占六個單位。不難理解，由於情況錯綜複雜，而研究者調查瞭解和閱讀材料的範圍有限，更由於不同的人對本地情況有不同的描述，所以對某些地區情況的回顧不但可能是不準確的，而且可能是錯誤的。我希望錯誤是個別的，並且不十分嚴重，因此不影響總體判斷。當然，我更希望我的說明能引來眾多文革研究者的指正和周全、深入的說明。

還有兩點情況需要說明。第一，對各省情況的描述基本上以各省首府城市的運動過程為主，雖然有時同一省份中不同城市派別的劃分、性質、結盟關係有所不同(例如福建省的福州市和廈門市)，同一派別在不同城市的處境不同(例如廣西的『四·二二』派在南寧和桂林)，但大致說來，省府城市情況可以代表全省運動情況。第二，雖然本書研究的是紅衛兵運動中的派別鬥爭情況，但在提到各地區的派別組織時，將依文革中的慣例稱呼當地的各個大派。所謂大派，指立場、觀點一致的，往往表現為省級規模的大型群眾組織聯盟。

在全國二十九個省級單位(省、直轄市、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我將首先按慣常順序和運動情況的相關性說明二十六個地區的簡況，然後在下一節較為詳盡地說明湖北、四川和廣東的情況，從中概括出我的結論。

北京。紅衛兵組織於 1966 年初夏起源於北京某些中學，其中某些組織因反工作組而有造反的色彩，但總體上說因大搞血統論，保『走資派』而被視為保守。這部分紅衛兵因在 8 月得到毛的大力支持，大搞『紅色恐怖』而聲威大振。在大專院校，造反的少數派在 8 至 9 月逐漸成立自己的組織，中學的造反組織在 9 至 10 月形成。從 9 月下旬到整個 10 月，下列一系列事件使得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誰勝誰負大勢已定：9 月 17—20 日，中央文革小組連續四次召集大專院校造

反派座談彙報會；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代表毛澤東、黨中央、中央政府講話，提出鬥倒走資派和與資反路線鬥爭；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反路線；10月5日，中共轉發軍委、總政緊急指示，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銷毀黑材料；10月6日，造反的『首都三司』發起全國在京師生十萬餘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受毛和黨中央委託出席並表示大力支持；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文革中兩條路線鬥爭，批血統論；10月25日，林彪和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號召造反。在各大專院校，

保守派組織到10月底已大部分自動消解，而中學生保守的『老兵』與『三司』等造反派鬥爭到年底，到1967年1月公安部抓捕『聯動』，二月初《紅旗》第3期社論把『聯動』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標誌了保守派的徹底失敗。2月22日，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3月25日，中學紅代會成立，其中完全沒有保守派的份額。但造反派從一成立組織起就有內部分歧，基本上形成兩派觀點。中學生在2、3月軍訓時就鬥爭激烈，終於形成激進的『四三』派和溫和的『四四』派。大學兩派的分歧由來已久，終於在4月8日和11日釀成武鬥流血事件。在此之前和之後，幾乎每個大學的造反派都分裂為兩派或多派，大致的陣線是『天派』和『地派』。『天派』於5月10日發表〈對首都大專院校目前形勢的幾點意見〉，地派則發表〈關於目前形勢座談紀要〉作為響應，兩派分歧從未彌合，直至全部退下政治舞臺。

上海。保守的紅衛兵組織大致於9月在各校成立，大學和中學的全市性統一組織『紅衛兵總部』分別於9月中旬和月底成立。大學生的造反組織大致在10月成立，如『紅革會』、『炮司』等等，並在成立之後發展中學生造反組織。中學

生自身的跨校造反組織于 11 月成立，如『紅東北』、『紅西南』等(以區為單位，對應於教育局轄區，故名)。『紅衛兵總部』捲入工人中保守的『赤衛隊』與造反的『工總司』之間的鬥爭，在 12 月底『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中，『赤衛隊』被打垮，保守的『總部』紅衛兵也隨之消散。在 1967 年 1 月的奪權浪潮中，造反派紅衛兵因爭權奪利和觀點分歧而互相鬥爭，如『上三司』、『紅三司』和『紅革會』都各自籌畫奪權，但由於張春橋完全排斥紅衛兵自行奪權而未使分裂演化成分明的陣線。在上海，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穩固地位和工人造反派勢力強大，造反派內部的鬥爭雖從 1967 年初起一直存在，仍未成為當地運動的主線。但激進的反張春橋的『紅革會』、『炮司』、『中串會』等與屬於擁張主流派的其他組織之間鬥爭從未停止，比如 1967 年 2 月初上海鐵道學院『紅革會』與『紅三司』爆發武鬥，引起外校不少組織介入；又如擁張的紅衛兵組織紛紛批判『中串會』等發表的〈一切為了九大〉等激進造反的綱領。

黑龍江。1966 年 8 月初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造反派組織『紅色造反團』成立，緊接著保守的『八八紅旗戰鬥團』成立。8 月下旬起，以此兩組織為領導和核心形成全省性的『造反團』派和『八八』派。由於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亮相支持造反，林彪、毛遠新公開表態站在造反派一邊，到 1966 年底，保守的『八八』派處於不利地位。1967 年 1 月，造反派聯合潘復生和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奪權，保守派也針鋒相對奪權，但遭潘和部隊鎮壓，中央宣佈幾個保守派組織為反動組織，因此全省保守派在 1 月下旬瓦解。奪權後造反派中一部分人與潘復生髮生矛盾，潘立即予以鎮壓，哈軍工『造反團』公開支持炮轟潘復生後，潘和汪於 5 月下旬組織支援自己的『捍聯總』，從此揭開全省『炮轟』派和『山上』派的鬥爭，儘管兩派曾於 9 月初和 12 月初在京達成停止武鬥和聯合的協定，但潘

復生不願協議，用武鬥等手段打垮了『炮轟』派。

山東。從 1966 年 8 月起就有統一的造反派組織，後擴充成全省性的『紅衛兵山東指揮部』。到 10 月時，因內部權力爭奪，該組織主力，激進的老造反派『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認為『指揮部』右傾保守而從中拉出，另立『山東省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總站』。在 11 月、12 月、1967 年 1 月的一連串事件中與『指揮部』發生糾紛和鬥爭，奪權時兩派衝突，釀成大武鬥。2、3 月『復辟逆流』時『山大主義兵』一派受到革委會和當地駐軍壓制，此時原保守的『濟南紅衛兵師』以新牌號復活，藉著批判『山大主義兵』大肆活動，直到 5 月經『反復辟逆流』後才徹底失敗。山東省軍區於 5 月底承認在 2、3 月犯了取締造反派的方向路線錯誤，『山大主義兵』一派作為『犯過錯誤的造反派』被省革委和軍區承認和受到『正確對待』。

山西。長期由原來的幹部、勞動模範、工人和軍隊左右運動局面，紅衛兵作用較小。保守派很早就失利，紅衛兵組織參加以工人為主體的『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於 1967 年 1 月 12 日進行奪權。奪權後造反派馬上因為對待參與奪權並獲得要職的老幹部劉志蘭態度不同而分裂為兩派，山西大學『紅色造反者革委會』等屬打劉派，而黨校『東方紅』、山西醫學院『紅革聯』等屬於保劉派，前一派後來發展成為以幹部劉格平、程守創為首的『紅總站』派，後一派發展成為受六十九軍和軍分區支持的『紅聯站』派。兩派武鬥不息，運動經歷許多反復曲折。

貴州。1966 年 8 月底省委負責人買啟允命令各行各業的人都當紅衛兵，保衛省委，圍攻造反派，但保守派在年底之前即徹底垮臺。1967 年 1 月 25 日，造反派統一組織『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奪省市大權並得到中央承認。

造反紅衛兵有統一組織『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其中一批激進份子於 1967 年 2 月 3 日拉出一些人成立『貴州省大專院校革命造反聯絡站』。4 月 10 日成立省紅代會時，此派中若干組織衝擊大會進行造反，理由是紅代會由省革委會包辦成立，且對參加成員不區分保守和造反派。此後形成『四·一一』派和『支紅』派，武鬥從 5 月延續至 8 月，由於中央支持掌權的李再含，『四·一一』派雖然被公認是造反派，但也遭到鎮壓。

河北。石家莊市統一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石家莊革命造反司令部』（『紅革司』）成立於 1966 年 10 月 25 日，它迅速擊敗諸如成立於 9 月 10 日的『紅衛兵石家莊總部』這樣的保守組織。各行業造反派於 1967 年 1 月底組成『石家莊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進行奪權，但它在 2 月份就解體了，因為其內部分裂為反軍派（『工聯司』、『師大東方紅』等）和擁軍派（『紅革司』、『十院聯絡站』等）。到 1967 年 5 月，當在 2、3 月份受到鎮壓的反軍派翻身後，兩派開始戰鬥。5 月底，溫和的擁軍派聯合為『大聯指』，於 7 月與激進的反軍派『狂人公社』發生一系列武鬥。後由於陳伯達明確表態，致使『狂人公社』徹底失敗。

遼寧。到 1966 年底時，保守的『毛澤東思想八·八紅衛兵』已垮臺，造反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占絕對優勢。但在 1967 年 1 月下旬的奪權活動中，造反派發生分裂，遼寧大學『八·三一』等退出總部，另組『瀋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從 2 月起瀋陽市形成以遼大『八·三一』和以東北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為中心的造反派內的兩派尖銳鬥爭。『八·三一』派因攻擊瀋陽和遼寧軍區而受到鎮壓。原『總部』於 1967 年 2 月 16 日聯合其他組織成立『瀋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聯』），容納了不少以前的基層保守組織，協助軍區和復活的保守派鎮壓『八·三一』派。到 1967 年 5 月，以宋任窮為首的

東北局幹部發表三點聲明，把鎮壓造反派的責任歸之於瀋陽和遼寧軍區。軍區遂與宋等反目，而『遼聯』中一部分組織(以原保守派居多)在軍區支持下打宋，從『遼聯』中分裂出來，成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遼革站』)。反『二月逆流』之後，尤其是在中央 117 號檔表態之後，『八·三一』派恢復活動，但『遼革站』在軍區支持下與此派和『遼聯』派不斷武鬥，直至 1968 年 1 月下旬，三大派均被中央定為革命派，實現大聯合並進入革委會。『遼革站』被造反派視為保守派，因為它在軍區支持下堅決與造反派作對，且其成員多為前保守派，但該組織自稱造反派，因為它要打倒宋任窮等『走資派』。

吉林。1966 年 9 月初成立的保守派組織『紅衛兵長春市總部』(又稱『大廟總部』)於 12 月初垮臺，造反派的『二總部』於 9 月 21 日成立，但在 10 月和 11 月內部即出現分歧，因為省市委表面支持造反，拋出一些幹部作為犧牲，引起造反派組織對省市委評價的分歧。在 1967 年 1 月奪權和是否支持軍隊鎮壓『工人造反大軍』等三個組織問題上發生分裂，『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一五』、『人大紅野』等退出『總部』，於 2 月 8 日成立『長春公社』，但 3 月即被鎮壓。『二總部』支持軍區鎮壓『工人造反大軍』和『長春公社』。公社派於 4 月份獲得新生，但從 4 月中旬即與『二總部』發生武鬥，持續到 10 月，兩大派於 1968 年初達成大聯合協定。

江蘇。保守派為 1966 年 9 月初成立的『南京紅衛兵大中學校總部』，南京大學為著名的造反派根據地，但該省造反派分為『八·二七』和『紅色造反隊』兩派。1967 年 1 月 3 日保守派和造反派發生大武鬥，保守派由此垮臺，這時造反派有統一組織『南京地區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1 月 26 日奪省市委權時，以『紅色造反隊』為首的奪權派排斥南京『八·二七』、『南京工學院東方紅』等造反組

織。造反派因此分成支持奪權的『好派』（因其口號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主力為『紅總』、『新工總』）和反對奪權的『屁派』或『P派』（得名於其口號『一·二六奪權好個屁』，以『八·二七』、『工院東方紅』為主），兩派在2月下旬因江蘇電臺播放『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的新聞稿而發生大規模武鬥，後來，自5日起兩派武鬥不斷，直至1967年底和1968年初各組織陸續實現聯合。

浙江。在1966年的8月底9月初，部分學生就對省委、杭州市委、金華地委等大造其反。在杭州，保守的『紅一司』成立於9月4日，造反的『紅三司』成立於11月15日，兩派在支持還是打倒省委常委、文革組長陳冰問題上一直衝突，11月21日發生武鬥。196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十條決定』，表態支持造反派進駐省軍區，使其聲威大振。1月19日，『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所屬五十個組織討論大聯合和奪權問題時，有些組織提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形成分裂。2月上旬，造反派分為打倒江華（省委第一書記）的『省聯總』派和保江華（因周恩來接見群眾組織時說毛澤東要保他）的『紅暴會』派，兩派鬥爭不已，『省聯總』因得到中央文革、直屬中央的空五軍、二十軍支持而占上風。而省軍區則支持『紅暴會』以及保守的『紅一司』。1967年7月在京解決浙江問題，其決議稱駐浙空五軍、二十軍正確，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支左犯方向路線錯誤，『省聯總』應為大聯合核心。『紅暴會』被稱為『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但直至1968年底，它的一些組織還遭鎮壓。

安徽。運動前期保守派力量十分強大，在1966年底、1967年初和造反派武鬥時占居上風，這導致毛澤東下令軍隊介入運動，支援『左派』即造反派，此舉使得保守的『合肥地區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紅總』）和『工總』、『軍總』、『文總』等保守組織馬上垮臺。緊接著，造反的『八·二七』等組織在省軍區支援下

於 1967 年 1 月 26 日奪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權，他們排斥和鎮壓其他造反派。參加奪權的一派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稱為『好派』，未參加奪權的造反派說奪權『好個屁』，稱為『屁派』。1967 年 3 月底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批評了對『屁派』的鎮壓，此派翻身後，與奪權派的鬥爭不斷。

福建。保守派『東海前線紅衛兵總部』一直活躍到 1967 年初，造反派兩個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革命革員會』（『紅革會』）和『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打葉飛（省委第一書記）時是戰友，1967 年 1 月底準備聯合而未成。

『紅革會』等因衝擊軍區而遭鎮壓，『八·二九』派掌權，在 2、3 月中說明鎮壓。到 5 月開始釋放被抓捕的人，被鎮壓的一派要求平反，批判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八·二九』派阻撓平反並保韓。兩派自 6 月起武鬥，持續到年底，有的地區持續到 1968 年初，到 1968 年 5 月，各派均被承認為革命派而實施歸口大聯合。廈門的情況和福州有所不同，同觸『八·二九』派，以『新廈大公社』為首的造反派分裂為激進的反軍派『促聯』和溫和的擁軍派『革聯』，雙方大打出手，背後有不同軍隊支持。

河南。運動初期的保守派為『鄭州市紅衛兵總部』，由於省委主要負責人支持造反，力量並不強大。造反派紅衛兵在 1966 年 10 月 11 日召開批判『資反路線』大會時成立『河南省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到 1967 年 1、2 月份，以鄭州工學院『造總』（2 月下旬發起成立『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即『河造總』）為首和以鄭州大學『聯委』（1 月下旬發起成立『二七公社』）為首的兩派造反組織為爭奪《河南日報》大打出手。3 月，河南省軍區在『河造總』和保守組織『十大總部』、『公安公社』支持下鎮壓『二七公社』，直至 6 月初才為其平反，造反的兩派從 5 月初開始武鬥，到 1968 年 1 月，『二七公社』以左派身分，『河造總』

以『犯過方向、路線錯誤的造反派』身分實現聯合。

湖南。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在 1966 年 12 月之前以『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組織的垮臺而結束，此後除 1967 年『二月鎮反』有一些反復外，主要事件一直是造反派之間的鬥爭和造反派不斷的分化。造反的『高沙高司』於 1966 年 12 月初和原省委達成妥協，與激進的『工聯』、『湘江風雷』發生分歧。後來，『高司』因協助軍區鎮壓『湘江風雷』而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偃旗息鼓。緊接著，『工聯』和『湘江風雷』分裂，這既有權力之爭的原因，也因為『工聯』觀點較為溫和之故。當『工聯』和『湘江風雷』實行造反派大聯合共同進入權力機構時，更激進的在野派別『省無聯』向暫時在朝派別提出了挑戰。

雲南。保守派是『紅衛兵總部』，造反派以雲南大學『炮兵團』和昆明工學院『八·二三』為首。至 1967 年初，保守派完全失敗。造反派在 1967 年 1 月初成立聯合組織『昆明大聯合指揮部』，1 月 8 日沖進軍區大院，之後對於是否撤出產生分歧，『炮兵團』等自行撤出，從此形成對立的兩大造反派別。較溫和的『炮兵團』派得到省軍區支持，較激進的『八·二三』派得到中央文革小組和駐滇野戰軍十三軍、十四軍支持，兩派從 1967 年 5、6 月起開始大規模武鬥，8 月達到高潮，直至 1968 年春才逐漸平息，1967 年 3 月『八·二三』被軍區鎮壓時，保守的紅衛兵一度復活，但只是曇花一現。

陝西。保守的『西安紅衛兵司令部』在西北局、省委直接策劃下於 1966 年 8 月 31 日成立，但在 1967 年初失勢。著名造反派領袖李世英領導的『西安交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屬於統一的『大專院校聯合指揮部』，但在 1967 年 1 月中旬，李被指責為對保守派妥協、搞折衷而受到批判，從此，西安交大的造反派和以西安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為首的造反派公開分裂，不斷鬥爭，前者組織的

『工總司』和後者所隸屬的『工聯』從 1967 年 4 月至 9 月武鬥不斷，到 1968 年 6、7 月還在武鬥，保守派一直想借造反派內鬥之機復活，但終於沒有成氣候，被排除在大聯合、三結合之外。

甘肅。保守的『蘭州市紅衛兵總部』成立於 1966 年 10 月初，失勢後加入『革聯』(此派得到北京南下學生支持，但被中央定為保守組織)。造反的學生在 10 月中旬批『資反路線』中作跨單位聯合，於 1967 年 1 月 22 日形成大派『紅聯』，但在 2 月 5 日奪權後分裂。被『紅聯』開除或後來自己造反殺出去的組織於 5 月成立『紅三司』，被中央認為是左派，而『紅聯』被視為是犯了錯誤、但可以團結的革命群眾組織。當中央於 5 月中旬發表關於甘肅問題意見後，『革聯』與『紅聯』有大武鬥，6 月底，『紅三司』與『紅聯』發生武鬥。從 8 月起，『紅聯』聯合『革聯』與『紅三司』鬥爭，此兩派後來拒絕了為其保留的三結合名額。

青海。1960 年 8 月下旬，省委為了對付造反派的攻擊，決定組織保衛自己的紅衛兵，『青海紅衛兵總部』於 9 月中旬正式成立，著名的造反組織『八·一八』於 9 月 28 日成立。到 1967 年 1 月底，以『八·一八』為主體的造反派統一組織『青海省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成立。青海軍區在 2 月開槍鎮壓造反派，釀成全國著名的『二·二三』流血事件，經中央果斷處置，造反派於 3 月 28 日得到平反，在 2 月復活的保守派隨之土崩瓦解。之後造反派內部紛爭不息，一方面，有『東方紅公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以『打倒楊植霖』的口號來與『八·一八』作對，另一方面，『八·一八』內部有持激進觀點的組織(比如『長征人』)鼓吹『左派分化論』，『青海需要第二次大亂』。直到 1968 年初，『八·一八』主流派還在批判『極左思潮』。

天津。造反派紅衛兵於 1966 年 9 月 24 日成立全市性統一組織『天津大專院

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保守派于 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大部分瓦解。但造反派由於內部的權力爭奪和『一月奪權』過程中各自抓權而分裂，天津大學『八·一三』和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退出總部，雙方大肆互相攻擊。『二月逆流』中，天大『八·一三』和南開『衛東』等與保守組織一道，配合軍隊鎮壓其他攻擊過軍區的造反派，3 月下旬開始反擊二月逆流，但李雪峰等領導人和當地駐軍繼續支持在 2 月份恢復的保守派，此後造反派和保守派武鬥不斷，直到 1967 年 9 月在中央促合下造反派和保守派實現大聯合。

寧夏。保守的『銀川市紅衛兵總部』及所在大派『銀川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在造反派的強大攻勢下於 1967 年 1 月瓦解。造反派『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指揮部』及其所在的大派『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聯合一些造反組織於 1967 年 1 月 27 日奪自治區和銀川市的權(有其他造反派反對)，寧夏軍區支持並參與奪權。但軍區在 2 月 11 日撤回支援，壓製造反派，大力支持在 3 月份復活的保守派『籌備處』。『總指揮部』4 月在反擊『復辟逆流』的浪潮中恢復，從 5 月初起與『籌備處』武鬥，同時也與自稱第三勢力的溫和造反派『甯總司』、『甯三司』發生武鬥。由於寧夏軍區司令員朱聲達堅決支持保守派，而且 8 月 8 日『總指揮部』與『籌備處』(從 7 月底升級為『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在吳忠縣的武鬥中，造反派有人被槍殺，導致中央調遣第六十二師等部隊到寧夏支左，即支持『總指揮部』派。『甯總司』、『甯三司』抱怨六十二師偏袒『總指揮部』，而『籌備處』在武鬥中圍攻支援造反派的部隊，使得部隊開槍，造成『八·二八青銅峽流血事件』。由於中央文革的堅決，反復表態，並調走朱聲達，保守的『籌備處』終於在 1967 年底逐漸瓦解。1968 年初，以下四派在中央主持下實現了大聯合：『總指揮部』、『甯總司』、

『甯三司』以及『籌革造』。最後一個組織是『經過教育、幫助從籌備處中造反殺出來』的，這種安排是為了表明所有各派的群眾組織都參加了大聯合。

在描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一直是運動中派別鬥爭主線的地區之前，有必要指出，天津和寧夏是一種混合過渡類型，即保一造、造一造兩類鬥爭並存，而原因均在於當地駐軍堅持支持保守派。由於情況不容易掌握得十分清楚而只能作簡單分類，本書只把天津、寧夏當作這種類型，實際上混合、複雜型可能更多，派別鬥爭模式單一，界線分明的情況更少。

在以下的幾個省(自治區)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占居主導地位。當然，它們的情況也不完全一樣，其中有的地區造反派中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分化和差別相當明顯，但兩派之間的鬥爭與保一造的鬥爭相比處於次要地位，而有的地區則沒有表現出造反派內部的分裂與對立。另外，在中央最後處理某地區的決定中，有的省(自治區)只有造反派取得合法地位，而有的地方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得到中央承認，在大聯合和三結合中共同取得地位。這幾個地區的共同點是，由於保守派得到當地駐軍頑強支持(原因多半是，中央出於特殊考慮而容忍了當地軍區的所作所為)，始終沒有垮臺，不論中央如何定性表態，他們一直有力量和造反派對抗。

內蒙古。由於軍區的支援，保守派沒有像在其他地區一樣因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失敗。1967年2月初，以『呼和浩特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為主的造反派因衝擊軍區而遭到鎮壓，但中央旋即於4月13日發出處理內蒙問題八條決定，全力支援造反的『呼三司』，改組內蒙軍區。之後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仍然十分激烈，直至6月，造反派才支配局面。從1968年2月起，挖『內人黨』的大規模迫害事件一浪高過一浪地進行，保守派趁機重新活躍，向

造反派反攻倒算。而占居主導地位的『呼三司』內部發生分化，有人堅決支持挖『內人黨』，有人消極甚至反對。

江西。鬥爭幾乎一直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進行，第一次大衝突發生在 1966 年底，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省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等在南昌與造反派衝突。1967 年春天之後，保守派(統一為『聯絡總站』)在江西省軍區及下面軍分區支持下向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發動武裝進攻。中央在 8 月作出處理江西問題決定，改組省軍區，鮮明地支持造反派，嚴厲點名譴責保守派。保守派未能參與大聯合與三結合，但由於省軍區以下許多軍分區堅決支持保守派，因此兩派鬥爭並未停息。值得注意的是，從 1967 年 6、7 月份開始，南昌市出現了一股由老造反派形成的『極左』力量，持激進觀點，向『大聯籌』挑戰(批判其『右傾』)，一些單位甚至發生武鬥。

廣西。自 1966 年 9 月上旬造反派和保守派發生衝突以來，造反派一直較佔優勢，但從 1967 年 2 月中旬起，以韋國清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和軍區改變支持造反派的立場，實行支保壓造的政策。自 1967 年 4 月兩派在爭奪《廣西日報》社大打出手以來，保守的『聯指』以軍區為後盾，對造反的『四·二二』大舉進攻，甚至發展到圍剿和殘殺。1967 年底，中央在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中承認兩派均為革命群眾組織，雖然在 8 月底，周恩來代表中央表示過，『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群眾組織(注意，在文革中，造反派等於革命派，而『群眾組織』則含蓄地表示不是革命組織)。中央的讓步實質上是對韋國清的讓步，因為越南戰爭的關係，毛不打算搞掉他，這使得廣西軍區敢於逆全國形勢而動，支持保守派殘酷打擊造反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廣西，造反派也有不少分裂和鬥爭，只不過強敵壓迫，這種分裂沒有充分發展。這裏可舉幾例。第一次，1967

年1月7日，『廣西革命造反指揮部』等組織封閉了《廣西日報》，但在15日，『工總』等組織重新封閉並接管《廣西日報》，他們指責前一次封報是搞折衷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第二次，在1967年3月，造反派在是否應該砸爛『工總』問題上發生對立；第三次，在4月造反派分成打韋（國清）和保韋派，打韋派支持原省委幹部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而保韋派則要堅決打倒這三人；第四次，1968年3月底，『四·二二』派在對待大聯合，抗擊『聯指』進攻問題上發生分裂，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兩個組織。

西藏。由於地理位置和民族狀況，情況非常特殊。一是學生不是運動主要力量：西藏唯一的大學即民族學院設在陝西鹹陽，拉薩只有兩所中學。二是運動發展比內地晚得多，群眾組織起來之時，內地各地『兩條路線鬥爭』已見分曉，因此沒有別處那種保守派和造反派初期的誓不兩立的對抗。1967年1月形成兩大派對立組織，一是『造反總部』，一是『大聯合指揮部』，外地的人一般認為『造總』是造反派，因為它曾圍攻《西藏日報》社、軍區，成立『專打土皇帝聯合委員會』，打張國華，而把『大聯指』當保守派。『造總』在1967年『二月逆流』時受軍區鎮壓，4月初獲得平反，其後兩派武鬥，7、8月達到高潮。軍區一直支持『大聯指』。1967年9月中央表態，確立兩派均為革命派，1968年3月達成大聯合協定，但接下來又是武鬥，直至1968年7月底還未平息。按文革中的標準，西藏的『兩條路線鬥爭』未搞徹底，這顯然是因為中央害怕放縱造反而引起動亂。

新疆。文革前表面上的第一領導人是自治區主席賽福鼎，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是作為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兵團第一政委的王恩茂，各群眾組織以對王的態度劃分派別。『二司』堅持打倒王恩茂，『三促』（『工促會』、『農促會』、『紅促會』）提出『鐵心死保王恩茂』，而『三司』、『紅革聯』提出對王『一

批二保』。1967年夏天武鬥時，保守的『三促』和溫和的『二紅』（『紅革聯』、『紅三司』）聯合對付『三新』（『新疆紅二司』、『新疆職工總司』、『新疆農民總司』），結果是『三新』節節敗退。儘管中央一直表態說二司是左派，但在實行大聯合和組織建革委會時，中央讓上述所有組織都進入權力機構，『三促』、『二紅』還略占上風。造反派在新疆未獲全勝，原因在於中央不希望新疆局勢動盪，不打算打倒王恩茂。另外，當地群眾造反熱情低於內地（許多單位是生產兵團建制，便於控制指揮）。

摘自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略作修改。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第十一節 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研究

“文化大革命”據統計，196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出版的報紙（專區級以上）由343種下降為43種，雜誌由790種下降為27種¹。如果除去被奪權後在動亂中斷斷續續出版、內容與《人民日報》基本相同的29省市自治區機關報，這一時期基本上沒有其他行業和部門報紙。

另一方面，以“紅衛兵”、“東方紅”、“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眾組織自發創辦報刊，遍及全國，其總量至今無法準確統計，據我個人估算，大約在10000種以上，又可謂“滿街紅綠走旌旗”。

“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興起與衰亡首先，要給“文革”群眾組織報刊下一個定義。根據我的研究，可以提出這樣的幾個標準：一、從時間上看，應該是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出給紅衛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眾組織公開化以後創刊的。“文革”前已經存在的各種機關團體報刊（取得登記資格的），無論其以後是否被奪權，一般不應包括在內（如《羊城晚報》改名《紅衛報》）。但

一些由“文革”群眾組織獨佔、並改換名稱的報刊可以視為階段性的“文革”群眾組織報刊（如“新北大公社”時期的《新北大》）。

二、從主辦者看，必須是由“文革”群眾組織而非合法機關團體主辦的。各級革命委員會雖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眾組織奪權產生，但是經上級單位批准後已不屬於群眾組織，並且革命委員會在1975年已被載入憲法成為國家地方權力機構，因此各級革命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的機關報不應屬此類（如北京市工代會辦的《北京工人》）。三、從出版看，必須是鉛印、署名主辦者、有出版期數、公開發行（一般均出售），否則應視為傳單和內部資料。

根據上述標準的個人調查，最早創刊的“文革”群眾組織報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紅衛兵創辦的《紅衛兵報》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創辦的《紅衛兵》²。北京六中紅衛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紅衛兵之一，積極參加了“破四舊”等活動，由於採取了嚴重的打砸搶行動，一個多月後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幾期。“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又稱“一司”，成立於8月27日，主要負責人為高幹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被斥為“保皇派”，報紙出了二十幾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後，隨著對“工作組”和“反動路線”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紅衛兵崛起，其報刊代表有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東方紅報》、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紅》、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的《井岡山》，加上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稱為北京地區紅衛兵五大造反組織報紙。這些報紙的特點是，因為組織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國有很大影響，發表的社論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態度，有指導運動的作用。報紙

的出版、印刷、發行比較正規，前期還通過郵局訂閱，存在時間也很長，一般都延續到 1969 年。

1967 年 1 月，由《文匯報》被奪權開始的上海“一月風暴”，使報紙成為各群眾組織奪權的主要對象。1 月 22 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聯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統的造反派組織發出的“緊急呼籲”，要求“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取出版大權”。此後，各地“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興辦達到高潮。據目前不完全統計，種數最多的地區有：北京 900 多種，上海 300 多種，江蘇、遼寧、四川都在 300 種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決於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僅跨行業的“文革”群眾組織辦，一派組織辦有多種，甚至連一個小學的幾個人組成的“文革”群眾組織也能辦報。例如 1967 年周恩來曾經詢問四川重慶的解放軍支左負責人，重慶“反到底”派有多少報紙？回答是有 30 多種。從報紙特色看，西藏地區雖然只有十幾種，但卻辦有獨具特色的藏文版《紅色造反者》（據說是造反派奪了藏文版《西藏日報》權後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師範大學還辦有中英、中俄文版對照的《教育革命》等報刊。從辦報人的職業看，由於造反浪潮涉及各個階層，各色人物都有，以學生、教師、幹部居多，工人其次，農民再次。一些軍事院校“文革”組織也以軍人身份辦報。尤其有趣的是，還出現了聾啞人辦的《聾人風暴》，甚至從監獄“平反”出來的囚犯也辦有《紅囚徒》。

當時“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五類：

一是“大批判”，連篇累牘地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單位“走資派”的“罪行錄”。尤其是 1967 年 8 月康生主持下以中央名義發出《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之後，各省市區的報刊公開點名批判了一大批黨政軍領導人中的

“走資派”，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罪行”形式刊登的言論，今天看來仍不乏閃爍真理光輝之處。如鄧小平“不管黑貓、黃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名言，最早廣為人知，就是通過這種形式。

二是刊登內部“首長講話”和檔。除了刊登本派組織的“決定”、“通知”等文件外，許多著名“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為了顯示自己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幾乎都設有“動態組”、“情報組”，派出記者尾隨中央文革成員參加活動，搶先發表他們得到的“首長講話”。中央文革小組有些新的部署，或是某些不便公開的策劃，也常常有意通過“文革”群眾組織報刊製造輿論。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認為，從許多報紙的引語和文章重複來看，“估計這些材料是由隸屬文革小組的某個專門機構預先準備好提供給紅衛兵的”。在一定程度上揣測到了當時的歷史內幕。無所適從的軍隊支左負責人也往往從“文革”組織報刊刊登的講話中摸索政治動向。

這一部分內容在今天的歷史研究中價值很大。因為那些“首長”往往執掌生殺大權，一句話即可結束一個人的政治乃至肉體生命，成為冤假錯案的起因；或是將一個“文革”組織定為“革命”、“反革命”，影響整個地區的形勢。而這些人當時講話卻又多數是信口開河，沒有講稿，更沒有收入檔案。因此，各家“文革”組織報刊的刊登，成為保存的主要形式。在審判林彪、江青集團成員時，常常可以看到有關的取證。

三是刊登“派性鬥爭”和武鬥的消息、文章。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各省市自治區“文革”組織都分裂為幾大派，如北京有“天派、地派”，四川有“八二六派、反到底派”，廣西有“聯指派、四二二派”，江蘇有“好派、屁派”等等，各自在自己的報刊上刊登攻擊對方的文章，指責對方是“保守派”。一些

“文革”組織的分裂，導致了原有報刊的分裂。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報之外，又出版有“兵團 414 派”辦的《井岡山報》，名稱一字之差，卻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發展到最激烈的 7、8、9 月，各報報導最多的是武鬥“血案”、“慘案”，其中當然有不少是捕風捉影，煽動對立情緒，但較多的是真實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災難。如著名的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四川瀘州武鬥、西安未央路武鬥等等，在報刊中都可找到詳細的敘述，雖然在細節上由於偏見不完全準確，但作為徹底否定“文革”的反面教材也有一定價值。

四是刊登“路線鬥爭”的歷史資料。在造反過程中，一些“文革”組織從“走資派”家中或是機要部門抄得了不少機密檔和檔案，如過去沒有公開的毛澤東內部講話、中央內部檔等等，予以刊登，有些被編寫進反映歷史問題的“路線鬥爭”史。其中最著名的有清華大學《井岡山》和地質學院《東方紅報》分別連載幾十期的“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後來曾經出版單行本。這些內部檔案的披露，使外國研究者不僅瞭解到“文革”時期的資料，而且接觸到建國以來歷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檔案，成為他們研究中共黨史的重大突破口。例如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著作中，就廣泛地參考和引用了“文革”組織報刊的這部分內容。五是本派“文革”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首長講話、中央文件的心得體會，分析討論形勢的意見等等。前者一般沒有多少歷史價值，往往是空話連篇。後者卻有不少深刻反映社會思潮的代表作，如遇羅克等人辦的《中學文革報》刊登的《出身論》，引起了一場大爭論，實際上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對建國以來階級關係的反思。再如 1967 年被許多“文革”組織報刊轉載的《中國向何處去》文章，公然提出反對成立革命委員會，要

求進行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是當時極左思潮的頂峰。因而遭到中央的嚴厲批判和禁止。

這些報刊是“文革”的產物，又推動“文革”走向失控，因而當權者對其態度也基本上經歷了鼓勵、限制，到禁止的變化。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的報刊的宣傳的意見》，首先肯定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編印的各種報刊、傳單，在宣傳戰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後針對一些嚴重問題，提出以下意見：一、應該嚴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論進行宣傳。二、毛澤東、林彪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中央內部檔、內部談話，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編印流傳。三、報刊上不得發表反對解放軍的文章和報導。四、必須嚴守黨和國家的機密。目前群眾組織報刊洩密相當嚴重，透露了國防工程、設施、部隊調動情況、備戰計畫、措施及經濟、外交、機要方面的重要機密，必須迅速制止。五、不要搞“黃色新聞”及其他庸俗、低級的東西。六、對國際重大問題的宣傳，要按中央方針進行。七、不要傳播“馬路新聞”、政治謠言。

就在《意見》發出一周後的5月22日，發生了一場風波。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中央報告，一名外國記者向海外發出了“二月提綱”的全文，陳伯達、江青批示：“要追查，這是盜竊機密檔。”“建議趕走這個記者”。經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調查，記者所發電內容抄自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小報，趕走記者的理由不充分，此事作罷³。

由此可見，“文革”組織報刊產生的嚴重後果已經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不安。然而，這個《意見》既然首先對這些報刊予以肯定，提出的又是“改進意見”，就決定了這種狀況不可能改變，根本原因還在於“文革”本身需要。

毛澤東在運動初期曾肯定了“文革”組織報刊的作用，並用其瞭解和指導社會動向。1967年6月，他會見外賓提到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報》時說：這些報紙何止幾百種，有幾千種。我就收到兩百多種，看不完。他還當著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面，嚴厲批評了“文革”組織報刊上刊登的污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百醜圖》，說：不能讓這種醜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7月至9月，毛澤東對華北、中南、華東地區進行了視察。出發前一天，他對從湖南來彙報武鬥動亂的老同學周世釗談起了湖南形勢。周十分驚訝毛非常瞭解長沙武鬥情況。毛說：你看我的辦公桌上不是放著一大堆小報嗎？有些情況我是從小報上看到的。他又說：工人和學生都是革命的，兩派必須聯合起來⁴。在視察沿途中，他還從各地“文革”組織報刊上瞭解到武鬥分裂情況，從而發出了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厲害衝突，沒有必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指示。

據此，中央發出了要求各“文革”組織回本單位實現大聯合的通知。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北京衛戍區發出佈告，要求外地來京人員不許在北京設立聯絡站，出版報紙。社會上流散狀態的“文革”組織報刊開始急劇減少，繼續存在的多是有較大影響的各單位造反組織報刊，一般在內部發行。1968年7月，隨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機關，紅衛兵開始上山下鄉和畢業分配，“文革”組織報刊逐漸走向衰亡，大多數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中停止出版，只有少數改為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工代會機關報，“文革”組織報刊的出版歷史基本結束，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辦的《工人造反報》是個特例。

以後，在上山下鄉中，也有些知識青年辦有《廣闊天地》、《自修大學》等報刊，但或者是合法宣傳品，或者是非法地下流傳，不屬於“文革”群眾組織報刊性質。“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運作與特例辦報理論：一般報刊都沒有這方

面的專門論述，但新聞單位的群眾組織報刊如新華社“新華公社”的《新華戰報》、“革聯”的《新聞戰線》，“首都新聞批判聯絡站”的《新聞戰報》，《光明日報》的《光明戰報》等，則有些專論。《新聞戰報》第19期（1967年9月28日）刊載文章《贊紅衛兵報》，堪稱代表作。文章提出：紅衛兵報的出現是“無產階級新聞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認為初期紅衛兵運動的傳單、小字報，“就是紅衛兵報的雛形”；紅衛兵報的功勞，是使“被扣押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毛主席的指示”及“文革”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登出來了，並且刊登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首長”的各種講話和事蹟；另一個功勞就是“大批判”。文章認為，紅衛兵沒有學過“新聞學”，也不懂什麼“五要素”、“八要素”，但是他們的報紙“堅持了最徹底的群眾路線。十幾年來未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報導者和實踐者相脫離的現象，在紅衛兵報上被徹底克服”。文章還批判了所謂新聞“客觀公正”論，認為“建築在階級鬥爭上的社會裏，是不會有‘公正的’科學的”。儘管文章把“革命性”作為紅衛兵報的生命力所在，但實際上這些報刊吸引讀者的地方，主要是違反當權者要求，刊登了大量的所謂被“扣押”的有關指示、內部講話和檔，比正式報刊披露了很多資訊，也即通常所說的“新聞性”。

編輯技術：在當時政治環境中，也帶有其特殊的色彩。由於任何一個文字錯誤都可能帶來上綱上線的攻擊，因此當時的“文革”組織報刊的錯字率都很低，甚至低於現在的通俗報刊。《新華戰報》曾批判對立面的《新聞戰線》，開列的“罪狀”有：刊登劉少奇會見赫魯雪夫的照片時，保留了在場的康生的部分頭像；在勃列日涅夫的照片上沒有打叉；刊登毛澤東的指示放在末頁位置，等等，都被指責為“用心何其毒也”。由此可見當時的辦報者心態。

辦報經費：“文革”初期通常作法是逼迫“走資派”簽字發給購買紙張費用，作為“革命行動”，印刷、油墨等費用一般都無須支付，只要給印刷工人準備簡單的用餐即可。待到出版若干期後，儘管報紙定價較低（通常八開四版為0.02元），但因為沒有紙張、工資、稿酬等成本，一般都能有相當贏利。所以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雖然作出規定“各革命群眾組織已經出版的報紙一律實行自費，虧損不補”，但較大的報刊已不存在經費問題，甚至有的辦報者獲利頗豐，中飽私囊。

印刷排版：“文革”初期，當群眾組織勢力不大時，印刷是個大問題，如《首都紅衛兵》第一期無處給印，幾乎跑遍了北京各家報社，跑了六家印刷廠，最後才在《前進報》（原《大公報》）排版，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出。當主辦者“三司”名聲顯赫時，這些問題當然就不存在了。使用紙張，較大的報刊一般都是用新聞紙，也有少數用能搞到的各種雜色紙。顏色一般是單色，報頭套紅。字體一般用鉛字排印，也有出版專業的報刊如《美術戰報》、《地圖戰報》用照相製版，比較精美。版面一般是八開四版和四開四版。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學者唐德剛曾經以很多“文革”組織報刊中有繁體字而認為是臺灣等地後人偽造，這是不瞭解當時的情況所致。“文革”前國務院雖然已經陸續公佈了幾批簡化字，但限於經濟條件，多數基層地區舊有的繁體鉛字暫時未能全部替代，所以在“文革”組織報刊中常常混用。報紙印數，一般都在幾千份左右，故多用平板機印刷，只有北京五大造反組織等報刊發行量在萬份以上的才用當時較先進的滾筒印刷機。

流通發行：“文革”初期，一些著名的群眾組織報刊曾通過郵局訂閱發行。全面動亂以後，郵局也分裂為幾大派，拒絕發行對立面的報刊，於是各報刊主要採取郵購和零售方式。在武鬥嚴重的地區，有的群眾組織還出動“文攻武衛”隊

保護發行。各大城市都形成了自發的集散地。如北京形成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百貨大樓門前和西單商場門前幾大零售市場，後來發展成為交換市場，許多市民和外地來京者用自己的多餘報紙互相交換。一些搶手的報紙甚至出現了高價出售的情況，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為此曾發佈告禁止“投機倒把”。一般說來，售報者主要是各報刊本組織的成員“義務勞動”，並不重視贏利，有時賣不出去就索性當傳單贈送。為了擴大影響，一些報刊往往押解本單位的著名“牛鬼蛇神”上街賣報。如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姬鵬飛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貨大樓前廣場賣報。喬覺得這樣“有失國體”，想了個對付辦法，待到押解他的造反派剛走，就把小報往地上一放溜走，然後用自己的錢冒充報款上繳，還要多出幾角錢，造反派諷刺地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此事傳到毛澤東耳中，1973年4月他還特地為喬冠華的一首打油詩改寫了後兩句，全詩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⁵影響最大的“文革”組織報刊：是《首都紅衛兵》、《中學文革報》、《工人造反報》。

《首都紅衛兵》創辦於1966年9月13日，當時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宣傳部”主辦。1967年1月25日，《首都紅衛兵》發表社論《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毛澤東看到後，感到這篇文章有助於控制越來越趨向分裂的“文革”組織，於是在標題上劃上紅圈，要求各大報立即轉載。2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一齊轉載，並在編者按中引用毛澤東的批語指出“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極其重要的問題”。《首都紅衛兵》開始聲名大振，執筆社論的一個大學生也被調到《人民日報》工作。此後《人民日報》又四次轉載該報文章：1967年2月12日《奪頭腦裏“私”字的權》、1967年2月20日《必須充分重

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1967年8月29日《堅決做解放軍的可靠後備力量》、1967年9月13日《紅衛兵要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這一時期，《人民日報》也先後轉載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北師大《井岡山》、北京大學《新北大》等報刊的文章，但數量不能和《首都紅衛兵》相比。

“三司”由此在外地成為中央文革的代言人，紛紛開設駐某地聯絡站，發號施令。據不完全統計，1967年1月底，“三司”在外地的42個城市設立了聯絡站，《首都紅衛兵》辦有上海、重慶、西寧、株洲、長沙、無錫、常州等分刊。在北京還辦有中學中專版。其發行總量，估計在50—100萬份，是北京和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文革”組織報刊。

1967年2月22日，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成立，因為“三司”是核心，故《首都紅衛兵》也就成為“紅代會”機關報。不久大學造反派分裂為“天派、地派”，《首都紅衛兵》也分裂為兩種，出現另創刊的“紅一號”，各地分刊也獨立行事，出現了分刊批判本刊，本刊宣佈分刊非法的狀況。

《中學文革報》同樣是北京和全國影響最大的報紙，命運卻和《首都紅衛兵》截然不同。

1966年底，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看到失學青年遇羅克的文章《出身論》，十分讚賞。他向學校借貸500元，聯繫1201工廠印刷，於1967年1月18日以“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的名義出版了《中學文革報》第一期，全文刊登了《出身論》。報紙出版後，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反響，許多群眾組織報刊圍繞《出身論》的觀點展開了大辯論，多數予以嚴厲批判。《中學文革報》又陸續刊登《談“純”》等文章進行反駁。

《出身論》開篇指出：“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作者經過統計和分析，針對當時盛行的血統論，尖銳地呼籲：“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的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裏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

“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娘胎裏決定不了。任何通過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當時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這篇文章大膽提出的觀點，對長期以來“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嚴重扭曲對立關係，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和造反。其所提出的從實踐中檢驗好壞的論點，實際是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之前的民間探索。它雖然利用了“文革”組織報刊的形式，卻是當時從實質上否定“文革”的唯一一份報刊，因而一方面受到群眾的歡迎，一方面必然遭到打擊和迫害。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在講話中點名批判了《出身論》和《中學文革報》。此後遇羅克和辦報者都受到殘酷迫害。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判處死刑殺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遇羅克無罪。

《中學文革報》到1967年4月1日共出版了6期，每期印數在3萬到6萬之間。載有《出身論》的第一期還出版特刊重印，前後共發行10萬份，都銷售一空。至今，這份報紙仍然是收藏者眼中的珍品。

上海《工人造反報》是出版時間最長的群眾組織報刊。該報從創刊之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御用工具。1966年12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接見“工總司”代表，提醒他們注意抓輿論陣地。

王洪文等人便於12月28日創辦了《工人造反報》，張春橋看了創刊號，要求他們“辦得潑辣，敢於講話”，“造反報火力可以強一些，不然的話，要這

樣的報紙幹什麼？有些文章《文匯報》不能登，造反報、紅衛兵報可以登，火力要超過《文匯報》。出一期報紙要使有些人睡不著覺。別人不敢講的，造反報你們要大膽講。”這家報紙名為群眾組織報刊，實際上被上海“官方”直接操縱，重要稿件都由“康辦”（康平路辦公室，上海市委及張、姚在上海辦公地點）審閱，報紙負責人經常出席“康辦”會議，使該報與當時的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合稱上海“三報一刊”，媲美於北京中央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工人造反報》的許多社論是與上海“三報一刊”合寫的，不少被張春橋、姚文元指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轉載，影響很大。

該報發行量最初為 3 萬份，1969 年增加到平均每期 41 萬份，最多一期達到 64 萬份，遠遠超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機關報《解放日報》。該報還出版了大量的“學習材料”，被各地競相翻印。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各群眾組織報刊先後停刊，只有《工人造反報》堅持出版，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便以此為榜樣，要求復刊。1971 年 4 月，張春橋不得已指示《工人造反報》停刊，前後共出版 488 期 7。

“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收藏與研究“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收藏，實際從“文革”中即已開始。從 1967 年 1 月 27 日到 8 月 28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通訊社都多次刊登啟事，“希望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大力協助，及時把你們辦的報紙及刊物每期寄送十份”。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革命文獻資料部當時也曾經發出類似通知，並派人每週一次到各主要報刊編輯部或交換站索取。所謂交換站，即是與現在的機要交換站類似的機構，在數個比較權威或地理位置便利的群眾組織所在地，設若幹口袋或格架，各報刊有

固定的位置，每次將自己的報刊插入各格，並取走別家贈送的報刊。以北京為例，清華、北大等北京五大造反組織、煤炭部、北京三中、北京師大一附中等，是當時交換比較廣泛的內部集散地。

由於時局的動盪、人員的沉浮，這些“文革”群眾組織報刊至今仍集中存留在個人手中的已不多見，主要保存於專門的圖書檔案部門。據筆者所知，目前世界上收藏最多的四家單位是：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其中北京地區佔有兩家。各家中，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部所藏種數、期數最為浩繁，共有報刊 2611 種、66790 期，其中北京地區的有 315 種、5864 期。已製成縮微膠捲，由於資料內容特殊，尚不能公開借閱。北京大學圖書館據說有 1700 多種。此外，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中共中央組織部圖書館也收藏有相當數量。後者以藏有毛澤東曾經閱讀、批註過的報刊獨具特色。

進入 90 年代，隨著人民經濟條件的改善，民間收藏蔚為風氣。“文革”組織報刊以其特殊歷史背景而備受集報者歡迎，收藏者眾多，各地集報協會中都有專門收藏此類者。但由於特殊政治內容，不能進入拍賣市場，流通管道主要是民間文化舊貨市場，如北京潘家園、鄭州古玩城等地攤市場是比較集中的場所，出售者主要是走街串戶的廢品收購小販，從收購的廢報刊中挑選出來到地攤出售。由於來源日少，目前價格不斷上漲，普通每份在 5-10 元，創刊號每份高達幾十元不等研究者目前主要是境外學者，尤以美國為最。

美國政府情報機構自 1966 年便開始搜集“文革”群眾組織報刊，途徑主要是通過中立國家的外交人員、過境旅客等，採取現金收買的方式，每份高達 8 美元。這些報刊被製成縮微膠捲，聘用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仔細的研究分類，最多

時達 60 多人。不久，這批近萬張縮微膠捲作為學術資料贈送給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1968 年起又整批贈送給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並撥款 50 萬美元資助其公開影印出版。從 1975 年起，出版了 20 卷《紅衛兵資料》，共 1064 種、10343 頁，成為 70 至 80 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資料，美國各主要大學東亞圖書館一般都有收藏。此外，比較詳細的目錄還有美國國外廣播新聞中心編輯《特別備忘錄：紅衛兵出版物目錄及說明》及《聯合研究所藏紅衛兵出版物目錄》、李洪永著《紅衛兵出版物研究指南》等。

90 年代，一批在美國各大學畢業的中國“老三屆”學生先後在美國大學任教或擔任圖書館負責人，有感於《紅衛兵資料》的遠不全面和影印品質較差，決定以自行集資的方式繼續進行搜集和整理。自 1995 年起，由美國狄金森學院、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的華人學者開始主持，通過網路向全世界的研究者、收藏家徵集“文革”報刊，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計畫在 3-5 年內，以《新編紅衛兵資料》的形式，仍由“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等機構出版 100 卷。其中北京地區將包括 936 種，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份不差的整套報刊；全國共 3000 種、10000 份以上。

美國之外，據筆者所知，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室烏索夫教授著有專著；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編有《紅衛兵報總目 1-5》（主編加加美光行，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編有《紅衛兵新聞》目錄縮微膠捲；日本早稻田大學文革資料研究會出版有《紅衛兵報揭載志紙別索引》（主編鱒澤彰夫）；香港友聯研究所編有《紅衛兵資料目錄》；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沈邁克教授長期搜集並著有研究論文，還舉辦了紅衛兵報刊展覽。此外，據介紹在蘇聯東歐劇變之前，東歐一些學者也有研究。

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曾經這樣評價“文革”組織報刊說：“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內情的全部材料幾乎都是由為數眾多的紅衛兵組織發表的，這些組織在1966—1967年間曾遍佈整個中國。其中一些是在紅衛兵小報上定期發表的，還有一些則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他認為，“紅衛兵材料的可信性是大大打了問號的，但如果慎重使用，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依據”。這也是比較中肯的判斷。但是，他認為，“中國自己保存的紅衛兵出版物顯然寥寥無幾”。這當然是因為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和保管而不為外人所知所致。據筆者所知，國內發表過研究成果的學者，僅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印紅標等幾人。

由於“文革”時期群眾組織報刊的特殊政治內容，不可能也不應該形成廣泛的研究領域。但是，這畢竟是歷史的特殊產物，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具有一定的價值。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歷史，存在著怎樣荒謬的“文化”與“革命”。

1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79年編。2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部藏紅衛兵報刊登錄卡片：1966年8月11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已辦有《快報》第三期。疑為傳單性質。3 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第282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4 周彥瑜、吳美潮：

《毛澤東與周世釗》第210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 章含之等著：《我與喬冠華》，第49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廖公子”指當時在日本訪問的廖承志，“韓大哥”指當時在美國進行談判的韓敘。6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著：《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第22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版。7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第134頁，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版。

第十二節 文革中的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於 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分別召開了第九次、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共計選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322 名。據不完全統計，到“文革”結束後，第九、十屆中央委員有百分之四十多被清查，上百名中央委員犯有錯誤或罪行，其中有 13 人淪為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王洪文、張春橋、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姚文元。

犯有罪行的中央委員有 30 多名，下面按時間順序予以敘述：

1971 年 3 月至 8 月間，中共中央先後對山東、山西、貴州、黑龍江 4 個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兼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予以撤職或免職。他們是王效禹、劉格平、李再含、潘複生，王效禹後來還被開除黨籍，是“文革”中最早處理的第九屆中央委員。

1970 年廬山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從政壇消失。在隨後進行的批陳整風中，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作了檢查，林彪與葉群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乘機離開北戴河，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留下千古之謎。林彪手下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隔離審查。

在 1981 年的公審中，林彪、葉群已經死亡，不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被判處有期徒刑。參與林彪集團的重要幹將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兼空一軍政治委員王維國被判處有期徒刑。原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空五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犯有罪行被免予起訴，開除黨籍、軍籍。原中央公安部部長兼中央專案小組第三辦公室主任李震畏罪自殺。原浙江省革委

會主任兼省軍區政治委員南萍、原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兼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劉豐受到撤職處分。受到撤職並降級處分的有原海軍第二政治委員王宏坤、原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原新疆軍區司令員兼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龍書金、原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張池明、原福州軍區政治委員周赤萍、原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原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兼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原江西省革委會主任兼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程世清、原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等 9 人。大別山走出來的將軍只有王宏坤、張池明陷的較深。

由於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又是黨章規定的接班人，處理時，中央委員中有 20 多人受到處分。經過長期審查，後來還對其中的一些人給予適當改正，如閻仲川按正兵團職離休、王秉璋在沉寂多年後，在電視劇《羅榮桓》中以顧問身分出現。

1981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經過審理，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改判無期徒刑。王洪文、姚文元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康生、謝富治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清出八寶山公墓，鑒於他們已經死亡，特別法庭不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由各地人民法院予以審理，並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他們是：

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兼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和王秀珍、

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兼同濟大學革委會主任陳敢峰、

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兼上海市婦聯主任汪湘君、

原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兼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聶元梓、

原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河南省總工會主任申茂功、

原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鄭州市委書記唐岐山、
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唐忠富、
原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兼省總工會副主任夏邦銀、
原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成都軍區副政治委員劉結挺、
原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張西挺、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河北省總工會主任樊德玲、
原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耿起昌、
原中共蘇州市委書記兼江蘇省總工會主任華林森、
原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省委工交口領導小組組長陳佳忠、
原第六機械工業部黨組成員張國權等 16 人。

撤銷職務並開除黨籍的有：

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
原文化部部長於會泳、
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革委會副主任馬天水、
原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
原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
原衛生部部長劉湘屏、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姚連蔚、
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
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委主任解學恭、

原河北省總工會副主任馬福全、

原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副主任王光臨、

原中共撫順市委書記兼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組副組長王景生、

原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區委常委兼包頭鋼鐵公司黨委書記王德山、

原共青團雲南省委書記朱克家、

原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劉均益、

原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兼省革委會農業組組長劉盛田、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江禮銀、

原安徽省革委會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李定山、

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吳從樹、

原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兼瀋陽市委書記吳玉德、

原中共廣西自治區區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岑國榮、

原中華全國總工會九大籌備組第一副組長張世忠、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山東省總工會副主任張延成、

原中共甘肅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副主任張恒雲、

原文化部副部長張維民、

原教育部臨時領導小組組長周宏寶、

原公安部核心組成員祝家耀、

原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郭宏傑、

原中共延邊州委書記兼自治州革委會主任崔海龍、

原湖北省婦聯副主任兼中共武漢紡織工業局黨委副書記謝望春、

原中共廣西自治區區委委員兼賀縣縣委副書記盤美英、

原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鹿田計、

原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省總工會主任梁錦棠、

原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武漢市總工會主任董明會、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大籌備組組長金祖敏、

原中共福建省晉江地委書記兼地區革委會主任陳玉寶、

原貴州省革委會副主任兼省總工會主任羅錫康、

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等 38 人。

被撤銷職務的還有：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曹軼歐、

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楊春甫。

受到撤職降級處分的軍隊幹部有：

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兼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恒漢、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宋佩璋，

原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兼市總工會副主任劉錫昌被黨內除名，原青海省革委會常委兼省總工會副主任隆光前被取消黨員資格，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也相應免去。

還有 31 人，保留黨籍，改任職務較低的領導工作或任一般幹部、工人。他們是：

原黑龍江省革委會副主任于洪亮、

原北京市總工會副主任兼首都工人民兵副總指揮馬小六、

原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王體、

原黑龍江省總工會副主任兼中共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王百得、

原中共唐山地委第二書記兼遵化縣委第一書記王國藩、

原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兼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王淑珍、

原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厲日耐、

原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雙陽縣委書記馮占武、

原甘肅省革委會副主任年繼榮、

原國務院副總理孫健、

原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孫玉國、

原中共青島市委副書記兼山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楊坡蘭、

原陝西省革委會常委兼省貧下中農協會副主任李守林、

原江西省總工會副主任李祖根、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素文、

原寧夏回族自治區總工會主任李躍松、

原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兼共青團省委書記張洪池、

原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兼市總工會主任張福恆、

原中共徐州礦務局黨委副書記陸金龍、

原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陳代富、

原上海市婦聯副主任陳佩珍、

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周麗琴、

原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副主任胡金娣、

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高淑蘭、

原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兼省總工會主任彭貴和、

原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謝家塘、

原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樊孝菊、

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兼省貧下中農協會副主任黃炳秀、

原中共南寧市委書記郭耀卿、

原江西省總工會主任潘世吉、

原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崔修範。

1978 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清查林彪、江青同時，中央發現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吳德、陳錫聯 4 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1980 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了他們的辭職要求，退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崗位。陳永貴是全國聞名的勞動模範、山西昔陽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工作。1980 年 9 月，中央批准了他的辭職請求，改任北京市東郊農場顧問。與此同時，中央還批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的辭職請求，回到陝西任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廠工會主席。吳桂賢是全國勞動模範趙夢桃小組的傑出代表，

摘自《黨史天地》2005/10

第十三節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一九六六年紅色恐怖殺人十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一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

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沖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六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當然沒有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確實也不主張打死人。他不過是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罷了。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檔，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員警都對紅衛兵行兇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十萬人。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裏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

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甯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一九七五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廿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有文革學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至少是毛澤東估計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萬

1967-1968 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于 67 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六八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 85 人、蒲城 34 人、安康縣 784 人。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援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二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

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 191 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 27 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 135 人，打殘 319 人，燒毀房屋 1200 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 286 人，自殺 20 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裏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 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 5063 人被揪鬥，236 人死亡。寶山縣揪鬥 1702 人，死亡達 334 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 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 1500 多人，65 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 110 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 41 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 名 1949 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 多人被審查，14 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 18 人，折磨致死 6 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 人活活打死，10 人打成殘廢，4 人自殺，包括 1949 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 9 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 年 1 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 138 萬人被牽連，17000 餘人被打死、61000 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 1473 人，打殘 9661 人。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佈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 年 2 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佈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就是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夥，是黑窩”，該局 1200 餘幹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 44 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 1924 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 34 萬餘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 87180 人，整死 16222 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七〇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三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

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處的有二十二。”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

“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五千多“有問題的物件”、“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里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〇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槍決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殺身亡。

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一天，人口僅三十萬的省會銀川市近十萬人擠滿體育場和

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二十二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佈的刑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氾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一九七〇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

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監房裏，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兇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 ‘你！’ ‘你！！’ 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十五至二十萬之間。

結語：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二十四萬餘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一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十多萬。概而論之，說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萬以上不會過多。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產物

林彪主持軍隊工作期間，軍隊總政治部主編的毛澤東“紅寶書”第一頁第一段開宗明義的指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而實踐這個理論的是中國共產黨。那就明確地告訴了全體民眾：凡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就必須實踐馬克思主義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理論，否則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肖子孫。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因此，階級鬥爭是所有共產黨人從娘胎裏帶出來的天性。鬥爭是絕對的，不鬥是相對的，與黨外鬥，與黨內鬥，特別是中國這個沿襲幾千年封建統治的國土上更是如此。

攜建政的餘威，在農村實行合作社，在城市實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切收歸國有以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擺在了全體共產黨人的面前。

早在 1954 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眾運動”作為“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杠杆”。[1]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宣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2]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劉少奇講話後，1958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裏，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為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4]同天《人

民日報》就發表了曹禺先生“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宏文（曹禺生於 1910 年 9 月 24 日~1996 年 12 月 13 日，湖北潛江人，原名萬家寶，主要著作《雷雨》、《日出》、《北京人》曾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就是這個萬歲將曹禺踢進了牛棚，批鬥、鬥臭成了一個沒有資格的坡腳文人，自取其辱。這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必然結果，後人應引以為戒。

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 年 12 月 27 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5]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1965 年 10 月 30 日）”。這份檔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6]他們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為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打下了基礎。這確實是一個集體智慧。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 1966 年 1 月 23 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彙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這一檔裏，

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貢獻，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為“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在 1964 年 6 月 11 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雪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這一目標上是一致的，劉少奇認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雪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為，劉少奇也算是“赫魯雪夫”；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

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8]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在實踐中打擊範圍一定會擴大），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拋進“賤民隊伍”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8]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殘酷迫害無辜群眾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毛澤東。

從1966年5月到7月，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這段時期內，劉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了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的“文革”運動。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檔，以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10]

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對象無一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

林楓、副校長範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當時定性為“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為“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為“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為“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蒼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為“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為“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為“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為“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穀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

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11]”。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那時候，“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造反派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縱觀史料，文化大革命確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結晶就是封建法西斯政治，並在這結晶過程中為毛澤東封建獨裁統治的建立起了催化劑的惡劣作用。審判江青時，江青面對法庭，面對全國轉播的電視說：“我是毛澤東的一隻狗，他要我咬誰，我就咬誰”。聽了不寒而慄。嚴肅的政治活動成了狗咬狗的鬧劇，這是對“文革”作了最完美的注解。

注釋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第 292-293 頁。

[12]見中共中央[63]347 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13]尚東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北京：紅旗出版社，2000 年），第 1055-1056 頁。

[14]“1964 年 7 月 21 日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見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2 頁。

[15]出處同注[13]，第 1054-1055 頁。

[16]見“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1964 年 6 月 23 日。

[17]見“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 年 9 月 1 日。

[18]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1964 年 10 月 24 日。

[19]這類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指示”（1964 年 6 月 25 日）和“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1964 年 11 月 12 日）等。

[20]分別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兩個中共中央檔。

[21]出處同注[18].

[22]“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批判劉、鄧、陶聯絡站”編，《揭開桃園假四清真復辟的黑幕》，1967 年 5 月，第 4 頁。

[23]出處同注[9]，第 348 頁。

[24]羅冰，“毛澤東發動社教運動檔案解密”。香港：《爭鳴》月刊 2006 年 2 月號。

[25]出處同注[9]，第 276 頁。

[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 487-488 頁。

[27]出處同注[13]，第 1102 頁。

[28]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1117-1130 頁。

[29]出處同注[7]，第 77 頁。

[30]出處同注[6]，第 1126 頁。

[31]出處同注[7]，第 78 頁。

[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173 頁。

[33]高華，“1964-1965 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執”。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8 年 4 月號。

[34]出處同注[6]，第 1335 頁。

[1]陽翰笙，“向波蘭人民學習”，原載《人民日報》，1954 年 9 月 27 日。

[2]原載《人民日報》1956 年 9 月 17 日。

[3]原載《人民日報》1958 年 5 月 27 日。

[4]原載《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9 日。

[3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292-293 頁。

[40]出處同注[13]，第 1084 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第 247 頁。

[42]《批判資料：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 年 9 月。

[43]出處同上。

[44]出處同注[13]，第 1054 頁。

[5]出處同注[28]，第 1121 頁。

[6]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二室編，《中共共產黨社會主義時期文獻資料選編（五）》（北京：[內部出版]，1987 年），第 653 頁。

[7]出處同上。

[48]出處同注[13]，第 1056、1060 頁。

[49]劉源，《劉少奇和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第 219 頁。

[50]王光美、劉源等，《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第 241 頁。

[51]馮來剛、魯彤，《劉少奇在建國後的 20 年》（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11 頁。

[52]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612 頁。

[53]見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第 265-270 頁。

[54]出處同注[52].

[55]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頁。

[56]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出處同注[52].

[58]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0]這些檔包括，中發[1966]326號檔“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1966年6月26日），中發[66]342號檔“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發[66]344號檔“中央批發北京市委‘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發[66]347號檔“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7日），中發[66]345號檔“中央轉發華北局‘關於華北地區城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部署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8日），中發[66]353號檔“中共中央同意華東局對山東省委關於各類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7月11日），中發[66]363號檔“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19日），中發[66]372號檔“中央轉發西北局‘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發[66]374號檔“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21日）等。

[11]程惕潔，“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紐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2006年。

[61]吳迪，“內人黨’大血案始末”，載《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 2001 年出版），第 61—62 頁。

[62]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63]毛澤東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給我的信和通知，已經收到看過。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69 頁。 [64]1966 年 5 月 30 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 61 頁。

[65]見“鄧小平對《人民日報》等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的談話”（1966 年 5 月 31 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66]王友琴，“劉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國》（美國網路雜誌）2003 年 6 月號。

[8]摘自《劉少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北京：“首都揪鬥劉少奇聯絡總站”，1967 年 8 月），第 2 頁。

[9]“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撰，《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洛陽：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六兵團”印，1967 年），第 56 頁。這一數字可能有所誇大，但是以當時北京有近 30 萬大學生計，按劉下達的指標至少也要打 3 千名右派。

[69]王年一，“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載《回首文革》（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 年），第 769 頁。

[70]出處同注[55]，第 38 頁。

[7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年），第 648 頁。這裏所說的“五不怕”，是指毛澤東過去提倡的“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72]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編 後

奔走覓資料，求索尋事實。歷經幾載《文革史稿》出版了。在成書期間得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查閱資料的方便。在國內也查閱了不少資料，世界華語出版社也為最後完成做了許多工作，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一介普通國民，要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史》編寫是力所不能的，只是盡了一個親歷“文革”全過程的一個普通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文革史稿》僅是提供了一個脈絡，一個框架，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全體國民、全人類對“文革”的關心和研究，以全人類的力量徹底清除中華民族身上的污垢，從而汲取教訓輕裝上陣，使中華民族趕上世界現代文明的步伐。

“文革”是中華民族一段無法繞過的歷史，由此帶來的傷痛將深深影響中華民族的發展。只有徹底剷除產生“文革”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只有徹底追究發動、領導、參與“文革”的人和事；只有拿起普世價值這個全人類共同的思想武器。那麼才能真正防止“文革”歷史的重演；才能使中華民族真正屹立在世界先進民族之林，而得到全人類的尊重；才能使全人類真正多一份實踐《聯合國人

權宣言》的力量。

已經實踐、認識普世價值的民族和地區有責任、有能力、有義務幫助目前尚未實行普世價值的民族和地區，使這些民族和地區早日沐浴在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的陽光下。從而使整個世界相互促進，而更加和平、繁榮。以自覺摒棄殘害人類健康發展的異端邪學，這才是研究“文革”歷史的真正目的和意義所在。

徐志高

2016.2.1